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7—1931)

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12

中央文献出版社





ISBN 7-5078-1168-8/K · 561

定价: 280.00 元(共 6 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二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7—1931)

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7-5073-1168-6

I. 共… I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1927~1931②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1927~1931 N. ①K260.6②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0270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编 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田松年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 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开 22.75印张 567千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073-1168-6/K·561 定价:280.00元(第7—12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益涛

学术指导

李 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M·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B·舍维廖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编者说明

一、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2卷。本卷汇集了除丛书第7、8、9、10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以外散见在中文图书报刊中的部分有关文献资料，包括过去已经由外文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

二、本卷所收文件主要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31年12月的文献和档案。有些专题由于缺乏原始资料，不得不选用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性文章。

三、本卷共7个专题，各个专题以及每个专题内的文件大体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为适当集中，有些文件难免提前或移后。

四、本卷注释凡标明“编者”的，为本卷编者所加；其余均为原编译者所加。原稿中有明显文字错误的地方，作了必要的订正。为了统一起见，原稿中加着重号的字一律改为黑体字。

五、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姚金果负责选编。

目 录

编者说明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与中国革命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发言（节录）
（1929年7月3日—19日）（3）
- 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瞿秋白同志在
第十次全体会议上的演讲（47）
-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
（1929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57）
- 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
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通过）（64）
- 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
..... 秋白（74）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反倾向斗争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 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节录）
（1929年3月） 米夫（91）
- 国际共产党反右倾的斗争（节录） 亮萍（101）
-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
（1929年8月13日）（118）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
反对派的决议
（1929年10月15日）（123）

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少山同志 在直支干事会议上的报告·····	(132)
反取消派斗争中之严重现象·····	伍美 (136)
反右倾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忠发 (139)
群众斗争的教训——党内严重的右倾危险·····	笑影 (141)
地方暴动与右倾观念·····	石恪 (145)
肃清对国民党与改组派的幻想·····	天生 (148)
反右倾与改造党的基础·····	笑影 (151)
反对派对于中国问题的错误·····	吴良赋 (154)
中国革命往何处去·····	沙法洛夫 (163)
中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	顾秋莫夫 (167)
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	秋白 (181)

三、共产国际与立三“左”倾错误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节录)

(1930年2月21日)·····	立三 (195)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要求在国际决议上 确认中央已定路线 (1930年6月12日)·····	(202)
苏同志(中共)在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30年7月15日)·····	(203)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 (1930年7月23日通过)·····	(20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信 (1930年8月5日上海)·····	(221)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关于全国 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党的行动路线	

(1930年8月5日)	(2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16日)	(2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20日)	(231)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	
(1930年8月)	(236)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苏维埃 建议条例	
(1930年8月)	(242)
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共产国际东方部 提纲草案	
(1930年8月)	(247)
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共产国际东方部议决案	
(1930年8月)	(254)
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共产党的任务	
(1930年)	米夫 (265)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立三 (273)

四、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 草案 (1930年8月)	(293)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	
(1930年8月)	(302)
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 国际电	

(1930年9月8日)	(307)
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	
(1930年9月24日)	恩来 (308)
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	
(1930年9月)	(330)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0年10月)	(351)
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	
(1930年11月25日)	(362)
中央决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骥何子述四同志的 处分问题的决议	
(1930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364)
反立三主义要与改造党的领导机关联系起来 … 为人	(366)
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国际路线	泽民 (370)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	
(1930年12月)	(387)
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 的报告	
(1930年12月9日)	(435)
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 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	
(1930年12月22日)	(442)
五、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449)
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	(451)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1931年1月)	(461)

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江苏省委关于王克全同志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 (1931年1月17日江苏省委常委会议通过) ……	(471)
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 (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	(474)
中央巡视员会议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 ……	(478)
全总党团常委决议案 (1931年1月26日通过) ……	(480)
立三同志给政治局与四中全会的声明书 ……	(482)
秋白同志声明书(一) ……	(483)
秋白同志声明书(二) ……	(486)
我的政治态度 …… 贺昌	(488)
罗迈同志声明书 ……	(490)
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	(491)
关于贺昌等同志问题的决议案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	(495)
关于开除王克全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王凤飞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	(496)
关于开除王克全党籍决议案 (1931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	(499)
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的斗争 (1931年2月5日) …… 泽民	(500)
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 (1931年2月) ……	(510)

中央政治局关于 1929—1930 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
行动问题的决议案

(1931 年 2 月 20 日) (512)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
(1931 年 2 月 22 日) (514)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931 年 2 月 22 日) (531)

拥护四中全会宣布脱离右派的声明书

一 徐锡根同志声明书 (548)

二 余飞声明书 (551)

三 陈郁同志声明书 (557)

反对王凤飞的右倾机会主义

(1931 年 3 月 8 日) 葛耀山 (562)

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苏区中央局
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

(1931 年 4 月) (565)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信

(1931 年 7 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

..... (573)

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发言(节录)

(1931 年 3 月—4 月) (597)

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

(1931 年 8 月) (618)

中国的革命的职工运动的任务

(1931 年 12 月职工国际执行部第八次会议的决议案)

..... (630)

- 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
(1931年12月29日) (647)

七、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给全团的一封信——接读青年
共产国际2月27日信及中国共产党中央5月5日
来函后的决议
(1930年5月20日) (651)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
(1930年8月) (663)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关于接受青年共产国际本年
8月全体会议决议案的决定
(1930年9月5日) (675)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鉴于农民运动的发展给中国
团中央的信
(1930年9月) (685)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团关于工会运动中的
任务的信
(1930年9月) (690)
- 青年共产国际来信——关于建立青工部与青年全权代表
团体的方式的材料
(1930年9月) (696)
- 青年共产国际致中国团中央关于出版书报问题的信
(1930年12月18日) (703)
- 团中央局关于党四中全会的决议
(1931年1月12日中央局会议一次通过) (707)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发言^①（节录）

（1929年7月3日—19日）

第一次会议（1929年7月3日上午）

库西宁作《关于国际形势和
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

.....

中国局势

美国依仗其经济实力，暂且把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即在财政和外交上辖制中央政府放在第一位，借以补偿其未能如英日在华攫取领土势力范围之不足，以便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手段。中国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幻想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首先是依赖美国的支持，使中国的独立发展取得较大的成就。实际上，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某一关键时刻适应于某个强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那种“权利”而已。比如说，中国形式上的关税自主意味着什么呢？你们会记得，托洛茨基分子怎样夸大过这个问题的意义，他们大概是把这个问题当作中国革命的决定性问题了。请看南京政府得到的关税自主吧，从现有关税税率来看，只不过是一种财

^① 本次全会的资料，是根据苏联国家出版社1929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编译的，文末所注页码是原书页码。——原编者

政税率,它只能稍微使政府的收入有所增加,却根本不符合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当然,最近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或许可能有某些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暂时的而且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将在国内引起在民族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意向,而这种意向总是要碰到世界帝国主义采取殖民压迫的手段。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这种冲突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每每都要贩卖民族独立的利益。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投降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直接利益与各帝国主义资本家集团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工农运动最后一次高潮时期、即1927年革命事件期间出现了阶级矛盾的极度尖锐化,这使得中国资产阶级终于投向了反革命阵营一边。

同样地,最近时期,各帝国主义政府暗地施展阴谋诡计,唆使国内各军阀集团混战不休,这也显然地表明国民党政府不能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国家统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和土地革命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和消灭封建残余密切相关的。但是中国的这个最重大的问题,资产阶级是无法解决的。

报刊上一些一般的报道已经表明,中国农村是一片汪洋大海,它一旦行动起来,就再也不会平静;游击战此起彼伏,几乎从未间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在农业危机尖锐化的基础上趋于成熟。任何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平静的”、“基马尔式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在中国,现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锐化了,这就必然导致新的革命总危机,而这个危机将具有比1926—1927年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性质。

(第1卷,第25—27页)

第七次会议 (1929年7月6日上午)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皮亚特尼茨基 (共产国际执委会):

.....

现在我要谈一谈中国问题。在全会前夕，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位代表的来信，其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的问题和赤色工会的状况。现在，我引用信中的某些段落。信中写道：

“我们说：要摧毁黄色工会，不让它们扩展。为此，我们的同志应当在这些工会中工作。对的，是应当这样。但是为此就需要我们的同志加入他们的工会，对我们同志信任的工人们，也会随着参加进去。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是我们扩展了国民党的工会呢？”

“另一个难题是：我们说，需要建立赤色工会。如果我们又在赤色工会工作，又在黄色工会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因为我们的力量不足。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软弱的论据，但实际上是稍微有点困难。我们的工人要给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交纳双重会费，工人的负担就要增加一倍。他们每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个小时。为了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工人必须有高度的觉悟，因而需要得到党的大量思想上的帮助。全党，从政治局到我们，都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工会的组织状况是：我们（即赤色工会）到处在衰退，国民党则在增强。”

关于在国民党黄色工会中工作的问题，不是已有决议了吗？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中国同志们却整整一年都动摇不定呢？而且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的问题，曾作出专门的决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会运动”的决议中，在关于中国的一章第二节（2）条中指出：

“凡是黄色工会专靠军警镇压和恐怖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方，它们连在一小部分工人当中站住脚都是不可能的，这只能导致这些组织的崩溃。”

在第二节（3）条中写道：

“凡是黄色工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这种

情况是少见的),并在一部分工人群众中站住脚的地方,那里阶级性的工会运动的拥护者,就应当到这些组织内部去工作。”

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部分关于中国的一条写道:

“许多中国工会运动的工作者过去认为,需要限制或停止派遣同志到反动工会中去,因为他们在那里会腐化起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拒绝到这些工会内部去做分化它们的工作,拒绝把这些组织里的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的同志不是参加军事当局任命的反动工会的上层领导机关,而是应当到组织在这些工会里的群众中去工作。”

可见,决议是有的。这些决议,中国同志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在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国赤色工会有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它曾参与制定了我上面援引的某些段落的决议。这个代表团想必传达了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想,这些决议中国已经有了。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中国同志们对于是否到国民党工会中去工作,还在动摇不定。结果会怎么样呢?赤色工会人数稀少;国民党工会人数众多。共产党人都呆在赤色工会里,而群众性工会里却一个共产党人也没有,于是,国民党人成了完全的主人,可以任意影响工人,而那里却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共产党的工作。这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吗?我认为,不是。对于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的问题,我将在讨论工会问题时再谈。这里有人说过,中国共产党也许能和联共相比,它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等等。不错,确实如此,它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我们党也曾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喊声:“在更加险恶的条件下”)。联共,或用它以前的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从1907年开始到1912年,就在非常恶劣和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也有人被处死,当然,不及中国那么多;我们的同志也被投入苦牢,遭到杀害,如此等等。然而俄国的布尔什维

克从来没有中断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无论多么困难，布尔什维克始终在各企业中工作。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但每当谈到中国共产党时，只是提出它的困难处境，只是提出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曾经起过并将继续起的英雄作用。现在必须向中国同志们指出他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中国共产党目前没有充分的无产阶级基础。它几乎不依靠工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代表瞿秋白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共现有十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五名党员，其中只有三十个城市中的三千四百三十五人是工人。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都是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组成。在中央和地方，应当说都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工作不力。应当告诉中国同志们，他们应当到那里去工作。我希望中国同志们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不是中国通，我只是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从一些到过中国并看到中共工作的同志那里得知一些情况。如果中国同志们能反驳我，说我讲的不对，那我会很高兴的。中国同志们在全会结束后离开时，不仅应该明确已经解决了的法西斯主义问题和法西斯主义的作用问题，而且应当在离开这里时也认识到，中共应当到工人阶级中去工作，应当依靠工人，应当到国民党工会中去工作，应当使自己的成员更新，把那些能够担当起工作的同志，以及不畏艰难做过这项工作的同志选拔到领导机构中来。

关于我在发言中提出的组织措施，我还是想在议事日程第一项的提纲以外，再加几点补充，这也许有助于像1925年那样再次提出组织问题，因为无疑地，我们要去迎接大规模的战斗；因此，必须在这些事件尚未爆发之前，及早改组我们的队伍和改进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我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1) 必须保证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列宁学校中进行党的建设教育，以适应共产国际各支部的需要。

2) 必须增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中的实习生人数；由共产国际各重要支部、首先是由大型工厂基层组织调来。

3) 责成共产国际各支部推荐人员，由共产国际任命担任指导员的工作。

4) 责成共产国际各支部有系统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党内情况和党的建设情况。

5) 委托政治秘书处审查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的这些提案，并加强监督共产国际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我占了大家很多时间，但是我认为，同志们自己也相信，大家应当尽量利用现有的那些机会。如果有人讨论中发言说，他们一切都没问题，一切都很顺利，那对这些话不要太相信了。无论他们怎么证明他们工作得很好，他们还是可以做得好上百倍嘛。(掌声)

(同上，第 153—156 页)

福特(美国)：

……

我认为，我们没有充分注意中国的问题。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今天早晨就中国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我想请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造成了目前这种状况？难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应负一部分责任吗？我们和中国是什么样的关系？

(同上，第 156 页)

第十一次会议(1929年7月9日上午)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莫洛托夫(苏联)：

.....

现在应当谈谈我们当中有人试图否认革命高潮到来的问题。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调和派妄图逞能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最常提出的论据是：如果三年前，在英国总同盟罢工期间，在中国革命高涨期间，不谈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问题，那么现在，在1929年，怎么能谈这个问题呢？十分明显，这样提问题是不对的。如果否认这样一些事实——英国总同盟罢工和1926—1927年中国革命，以及著名的维也纳起义——对于整个工人运动所具有的革命意义，那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况且，若是没有这些事实，我们现在就不能如此迅速地发展那些标志新高潮到来的事件。无论是英国总同盟罢工，或者是中国革命，对于动摇资本主义的稳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强大的冲击力量，冲击了资本主义的稳定。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些事件直接地只是对个别国家（英国、中国）具有代表性。

这些事件当时在其他各国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反响。现在，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的情况是，在欧洲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在发生一些标志革命高潮日益增长的事件，这个革命高潮并不是某一个别国家特有的现象，总的来说，它对于欧洲许多主要国家都具有代表性，况且还不止于欧洲。

目前谈论在中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问题，还为时过早。不过，即使在中国，我们也没有销声匿迹下去。相反地，在这里并没有停止革命的酝酿。而且在这里，无论是在工人群众中，或是在农村，革命力量都在明显地增长。如果说，谈论中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问题还为时过早的话，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否认中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否认新的革命高潮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在逐渐成熟，就不是什么别的，而只能是可鄙的自由派的短见了。目前在印度，广大的工人群众，还有部分农民群众，越来越多地参加到

革命运动中来，这种局面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要知道，印度革命运动的高涨，对于整个东方，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具有极其伟大的革命意义。

目前，在国际工人运动方面，没有英国总同盟罢工那样的重大事件。不过，当时总同盟罢工毕竟还是个一般的孤立事件，它甚至在英国都没能直接转变为新的革命高潮。现在，在德国、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在美洲和亚洲，出现了工人阶级争取改善经济状况的日益扩大的斗争和政治上的发动，这表明国际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只有我们队伍中的调和派庸人，才会否认我们将迅速迎来比1926年英国总同盟罢工更为重大的事件。只有那愚蠢的机会主义者，只有那可鄙的自由主义者，眼盯着世界工人运动的这些事实，却看不见我们已经切切实实地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爆发具有国际意义的极其重大的革命事件的阶段。

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最重要的职责是，为极其重大的革命事件做好准备，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战斗做好准备。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应当大大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在动员革命力量去进行新的大规模的阶级搏斗方面，我们对工人阶级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把现在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转变为夺取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革命斗争——在这方面，大大有赖于作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的共产党。

(同上，第277—278页)

第十二次会议（1929年7月9日晚）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罗英（音，中国共青团）：

我认为，许多殖民地国家的农业危机，特别是中国的严重饥荒，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殖民地国家的饥荒不是罕见的现象。那里年年都闹饥荒。可是今年饥荒空前严重。其原因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殖民地农民毫无出路的处境，必然招致各种连续不断的农业危机。在中国，遭受饥荒的地区逐年增大，而且无法加以限制和减少。可是这种危机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一方面，它迫使农民背井离乡，出外逃荒；另一方面，高利贷资本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的大量后备军使得殖民地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恶化了。当地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想利用这支后备军的任何尝试，都将轻易地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打消。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要利用这支后备军来争夺当地的工业。帝国主义分子在殖民地国家造成农业危机，然后好利用这个危机。我们应当指出这一点，为的是反对我们队伍中那种非殖民化理论的残余，为的是说明帝国主义在第三时期的破坏性作用。

.....

我来谈谈印度问题。革命发展的自发性是目前印度革命的特点，这与1925年的中国革命十分相似。比如说在孟买，罢工前只有几百名工会会员，但罢工以后会员增加到好几万人。不过有一点，印度的情况不同于中国以前的情况，那就是其本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反革命了。在印度革命中建立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认为，在全会的决议中必须详细提出某些策略问题，明确指出我们的印度同志的当前任务。我认为，中国党的经验，目前对我们的印度党来说，应当有所借鉴。我想指出中国革命的某些重要情况，其中的经验想必对今日印度大有用处。

第一，必须建立坚强的基层组织，如工厂党支部和工人的工会组织等，以便建立强有力的党，形成坚定的革命工会运动。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借以强化印度的革命运动。这也会大大加强运动对反动势力的抵抗力。

第二，我想谈谈统一战线问题。为要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应当为统一战线建立极为鲜明的阶级基础，而且工作应当自下而上进行。不要象中国过去那样的做法。在中国，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最大错误，就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忘却上述原则。

我们看到，在印度采取调停手段来取消罢工。有时罢工刚一宣布，政府或者改良主义分子就出来提议调停。这会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很大害处，这会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削弱我们的领导。在中国，我们犯过一个极大的错误，当时在广州和武汉，我们不仅没有进行斗争，而且还促成了调停。在印度，必须最坚决地反对任何调停方式，无论是政府出面的调停，或是改良主义者搞的调停。

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共青团在革命中的作用很大。印度共青团组织数量极少，而且十分软弱。因此，向我们的印度党提出这样一项任务——建立强有力的、群众性的共青团，是绝对必要的。

我再就中国问题说几句来结束我的发言。我们党已经摆脱了困境，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已经恢复了对工人群众的领导。对于党来说，最危险的是今年三月间的势态，当时上海党委进行了反对中央的派别斗争。各种派别斗争对于一个不合法的政党来说，当然是极端危险的。幸亏党中央能够迅速而恰当地结束这次斗争，共青团中央在这一工作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反革命事件之后，我们党认真地进行了反对悲观主义者、反对动摇分子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继续清除一切动摇分子以纯洁我们的党，特别是现在，正当中国革命如此迅速复兴起来的时候。在这一年，许多工人，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了许多大城市的“五一”罢工和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特别是在上海“五卅”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工人以及大学生捣毁了国民党机关报和另一反动日报的处所。这就是革命运动高涨的标志。党虽然增强了，但仍然跟不上工人思想激进的程度。原因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动摇分子，

特别是右倾的危险还没有清除，同时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还缺乏新的方式方法。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会运动的软弱性，在这方面，正如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业已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具体的、有效的策略。我希望在议事日程第二项中，我们能讨论这个问题，并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应当更加重视中国革命，它不仅没有象托洛茨基所预料的那样被摧毁，而且迅速地重新强大起来，并将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胜利的伟大力之一。

（同上，第 301—304 页）

第十三次会议（1929 年 7 月 10 日上午）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米夫（苏联）：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曾指出，殖民地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因素，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难以摧毁的策源地，它具有现实的意义和日益增长的影响。过去的一年完全证实了这个论点。这种状况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机构急剧发展，日益与市场条件不相适应造成的。于是，乃发生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来源、争夺投资范围、争夺分割殖民地的疯狂斗争。这种斗争目前在英美之间进行得特别激烈。

现在，美国已开始向整个东方进攻。就拿美国商品对华输入来说，1913 年只占外国商品对华输入总额的百分之六，而到 1926—1927 年，已占百分之十六点四。显然，这种增长是靠减少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份额取得的。于是就造成了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争夺原料来源的斗争也是如此。这从中国对美输出商品上可以看出。1913 年对美输出占中国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九点三，而

到1926—1927年则已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就最近几年看,以1927年来说,我们看到美国是对华商品交易额大增的唯一的国家。1927年美国在对华商品交易总额中,已从第三位跃升为第一位,把日本和英国挤了下去。1928年它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因而根据初步资料,十拿九稳可以事先肯定地说,1929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的份额,将有进一步的增长。

可是,美国资本在中国的这种经济侵略,不只是通过输入和输出来进行。而且通过投资来进行。目前,美国一家最大的银行正在商议提供中国四、五亿美元铁路贷款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只要注意到中国现在的整个铁路网,不算中东铁路,其总值大约也只是这个数目。其次,美国银行集团借助微不足道的英国资本,以中国货币一亿元在上海收买了一座电站。这座电站不仅是世界电力工业的大型企业之一,而且它在中国经济中,首先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工业中心,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此外,美国资本现在还在中国建立飞机制造厂、汽车制造厂,修建道路、汽车场。在我们这里失掉外高加索特权的哈里曼,现在在中国却获得了特权。

……

我们看到,现在,在所有东方国家,在一切部门,都出现了美国资本的强有力的攻势,首先是针对英国势力。这种经济侵略导致了相应的美国对外政策。在中国,美国第一个承认南京政府,并表示同意关税自主。现在,在中国的所有政权机关里,都充满了美国顾问。……

……最后还应当指出这样一个论断,即对殖民地日益加紧的压榨,会加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附性。

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指出,过去的一年证明了任何非殖民化的议论都是一派胡言。过去的一年暴露了这一理论的资产阶级本质,揭示了在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激烈竞争的背景上国

际帝国主义所维护的殖民制度的实质。外国资本不仅没有把自己的阵地交出，让位于当地的资产阶级，而且相反地，它还靠牺牲民族资本的利益以自肥。

让我只举出几个事例来说明这种状况。就拿中国的煤炭工业来说，1923年这个部门的百分之五十四属于外国资本，而到1928年已有百分之七十二为外国资本所操纵。在中国的纺织工业中，1922年属于中国资本的有一万三千台织机，属于外国资本的只有八千台。而现在属于外国资本的整整多了一倍——一万六千台。再拿中国的冶金工业来说，外国资本所占比例，从1923年的百分之七十增加到1928年的百分之九十。外国资本在中国扩大阵地的情况，就是如此。

.....

正因为如此，如果总结过去一年“东方的”经验，就不能不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加强，帝国主义强国之间，首先是英美之间的矛盾在增长；第二、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残酷压榨有增无已；第三、当地资产阶级营垒中民族法西斯倾向抬头，小资产阶级上层出现右倾；第四、在殖民地国家农民运动高涨的同时，无产阶级的反帝罢工斗争发展起来。

这些结论都不难在许多东方国家中找到实证。

首先必须谈到中国，原因如下：在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首先是英美资本之间的矛盾，现在表现得比其他地方更加明显，更加一目了然。虽然中国革命失败了，但直到现在，中国在殖民地世界中仍然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一个最狭小、最薄弱的地方。这一点必须从这方面来理解，即某些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不仅没有平息，不仅没有缓和，而且相反地加强了，并具有了特别尖锐的形式。中国仍将是这些帝国主义的矛盾最有可能爆发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地方。

可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就

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在中国，两种帝国主义意图的斗争十分突出地显露出来。

英国和日本这方面，采取这样的方针：瓜分中国，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作为英日资本武装代理人的个别军阀集团的统治。

美国采取的方针是，在中国确立南京国民党政权下的形式上的统一，当然，其条件是南京国民党将是美国资本所操纵的无所作为的、俯首听命的傀儡。美国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而美国资本却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这就促使美国能指望在财政经济上以及政治上使整个中国服从于美国资本的利益。

美国竟然也得以在中国占领了某些相当重要的阵地，这就使它和英日资本的利益发生愈来愈大的矛盾。这些矛盾酝酿着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太平洋战争、随后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因此，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在库西宁同志的论题中，有一处谈得完全正确，他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进行的“小型战争”（中国：桂系和南京的冲突，冯玉祥的活动），后面都隐藏着日益增长的英美竞争，这是英美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大战的先兆。

与此同时，完全无可争议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大大增加了自己在政权中的比重。但是在这方面，如果把事情说成是地主从政权中被排挤出去，资产阶级经过战斗打掉地主阶级手中的权力后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如果把事情说成是这样，那就是错误的了。我认为，我们这里曾有人错误地打算把这种战争，其中也包括南京与桂系的战争，解释为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武装斗争。不久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十号通告，就是按这样的精神写成的。在这个通告中，对南京与桂系的战争的分析归结为：“资产阶级想要打击封建势力，改善农民的状况，逼退帝国主义列强并实行关税自主；因此，在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分析。桂系并不是清一色的地主，同样，南

京集团也并不单纯只依靠资产阶级分子。无论是这个集团，或者是那个集团，都是代表在中国与地产有联系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但是桂系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与英资勾结的、老的商业买办资产阶级为基础，而南京集团则首先是由指靠美资帮助的、比较年轻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所支持。南京政府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触动土地所有制。因此，历史上必然发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基本矛盾在现有制度下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只要国家的经济分散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只要产生中国军国主义的半封建关系还没有连根铲除、彻底消灭，只要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中国支持各个军阀集团，并利用国家的分裂状态和封建残余——只要这种帝国主义统治还没有消灭，那么，国家的真正统一，军阀集团统治的消灭，就都是不可能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所有这一切基本任务，是互相纠结在一起的，是彼此相关联的，只有通过胜利的工农革命，才能得到解决。由此可见，提出新高潮必将到来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的征兆。

因此，我想给大家援引一些关于中国罢工运动高涨的材料。根据国民党社会调查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在1928年头九个月里，仅上海一地就发生了一百七十五起罢工，有二十三万三千名工人参加。关于这些罢工的积极作用，从下面材料中就可以推断出来：四十八起罢工是反迫害、反虐待的，十八起是要求提高工资的。1928年后来的几个月，罢工运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天津和青岛罢工风起云涌。满洲发生了九次极大规模的罢工，香港发生了十六次共产党人领导的罢工。

如果总结一下1928年罢工的总成果，那么计算起来，参加罢工的人数有三十万到四十万人，而且我觉得后一个数字比较真实。若是注意到不久前革命的失败，以及阶级性的工人运动所遭到的空前的血腥镇压，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个极其巨大的数字了，它

特别具有典型的意义。

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相应地农民运动也日益增长起来。如果谈论最近时期的农民发动问题。那我们可以举出甘肃农民的暴动；可以举出“红枪会”和“小刀会”再次兴起的积极活动。其次，可以提到共产党人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游击活动，尽管反动当局用尽一切手段对付他们，他们还是保存了自己的干部，得以在福建省取得一定的成就。最后，可以举出去年3月浙江省宁波的农民骚动，参加者达七万人。还可以提到今年4月封中（音）县（广东）的农民起义，其结果有九个村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最后还可以举出不久前在上海附近爆发的农民风潮。

当然，根据这些事实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现在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但是，这些事实却可以证明，现在正在创造着这种高潮的前提。

因此，再就中国共产党问题讲几句话。为了更加认真地开展群众工作，中共必须克服目前在其队伍中出现的那种右倾性质的动摇。这种右倾动摇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是由于个别共产党人根据纯粹取消派的推论而产生的，他们认为新高潮的到来已属无望，中国有和平解放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对革命失败和反动派胜利这一事实的估计太过分了；对反动势力的增强和国家形式上统一的评价过高了；对经济上有些起色，肯定得太多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答应中国关于民族独立和关税自主的要求，信以为真。由此而得出革命失败已无可挽回的结论。基于这一点，个别共产党人就走向取消主义，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当然，这种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并不普遍，但这并不能认为党无需与这种情绪进行严肃的斗争。

由于这种取消主义观点的存在，也就出现了过分醉心于合法主义的情况。个别人提出了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的要求，还有人贬低非法的共产党组织的作用。故而还必须提出个别共产党人对

国民党抱尾巴主义态度的问题，他们要求制定另外某种对国民党的策略，提出“不应扰乱国民党”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消除险恶的右倾危险这个任务时，也应当注意自己的农村策略，注意明确规定自己对中国农村各社会阶层的态度。党应当制止一切认为党在农村的总路线需要联合富农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那些同志，是曲解最近一次中国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为大会指出过总路线的规定：必须依靠贫农并联合中农。主张“联合富农”这个口号的人们，完全忽略了中国富农的社会本性，要知道，他们是封建关系的代表，就其实质来说是半地主，他们通常是倾向于反革命的，他们会帮助国民党镇压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真正革命运动。所有这些右的错误和倾向，其根源无疑义地就在于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党就其总体来说是健康的，它现在有个紧密团结的领导，执行着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

关于印度，再讲几句话。我们看到目前印度罢工运动在蓬勃有力地发展着。但是，若将印度与中国对照来看，可以指出下列几点。

第一，在印度，没有中国所存在的那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尖锐斗争。印度完全由英国资本所统治，英国资本用带刺的铁丝网把印度与外界隔绝开来，使印度颇为孤立，游离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运动之外。

第二，印度同世界社会主义发源地——苏联没有直接的联系，而由于中苏领土相邻，苏联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影响。

第三，在印度，没有军阀集团相互之间的内战，而这种内战在削弱中国的反动势力，使得中国工农革命斗争易于向前蓬勃发展。相反，在印度，我们看到有一个组织得很坚强的国家机器，它由精心布置在全国重点要地的十分可靠的军警武装力量保卫着。

第四，显然最为重要的是，在印度，共产党的发展比中国缓

慢。这种情况日益具有险恶之势。

最后，为了探讨印度群众运动难干活跃起来的困难条件，还须指出，在中国革命以后印度的运动是有所发展的，即不仅印度工人阶级可以从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汲取教训，而且帝国主义和当地资产阶级也可以从中国事件中为自己汲取适当的经验。特别是在印度，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办不到的。在中国，尽管这个策略实行得很差，但是这个策略在中国还是起了它的历史作用。它在解放运动的最初几个阶段，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农民很快地积极行动起来。

印度虽然有这一切困难条件，却也有一个很大的优越之处，就是工人阶级人数比中国多，它现在正在经受更为切实的阶级斗争锻炼。

……

……我不想贬低香港半无产阶级的英勇罢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也不想贬低上海人数众多的同盟大罢工的意义，但是必须承认，在中国，这种罢工在一定程度上只对北伐，即对民主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军阀斗争起了从属的作用。……

……

现在我概括地为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东方的工作作个小结。

1) 我们在罢工运动方面，特别是在印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预示着工农革命将有所发展。

2) 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阵地巩固起来。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证明工人阶级中意志消沉的状况开始消除，证明失败的最低点已成为过去，工人阶级又开始大显身手了。

3) 我们看到在一切东方国家中，群众运动都在发展，共产国际的影响都在增强。

……

(同上第 328—340 页)

第十七次会议（1929年7月15日上午） 台尔曼作《经济斗争和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

整个形势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进展

在论述第一个问题^①时，我们应当以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规定的政治方针为依据。应当肯定指出，在贯彻这些决议中，我们一些党虽然有过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但毕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凡是坚决贯彻我们的策略的地方，那里的成绩就非常显著。而党的行动迟缓的地方，没有迅速利用当时形势、没有迅速采取新策略的地方，结果多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整个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群众发挥创造精神，建立了新组织，创立了新的阶级斗争方式。我们看到，群众不仅对共产国际，而且对红色工会国际的信赖也增强了，这种情况非但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特别是，也出现在近几年来开始民族革命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第二时期，中国大革命尚未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但在第三时期，在殖民地革命运动进入新高潮的同时，欧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也将高涨起来，殖民地革命运动必将得到他们的革命支援。毫无疑问，这对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的今后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3卷第3—4页）

① 第一个问题是：整个形势的变化及其引起的阶级斗争的进展。——原编译者

第十九次会议 (1929年7月16日上午) 讨论台尔曼和洛佐夫斯基的报告

邓^① (中国):

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工会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起到1928年5月。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意志普遍处于消沉状态。

第二阶段——从1928年5月日寇制造济南惨案起到同年10月。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已局部地振作起来,采取了守势。

第三阶段——从1928年10月邮政职工罢工起到今天。邮政职工的罢工,对全国的工人运动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消沉状态完全过去了;手工业工人、店员和产业工人的战斗情绪日益增强。上海是起点。随后,这种战斗情绪遍及全中国,中国的阶级斗争重新激烈起来,重新尖锐起来。

关于全中国的罢工,没有统计资料。仅有上海的统计数字。革命惨重失败后的1928年,上海罢工的人数为二十三万九千人。同1926年的二十万二千人相比,罢工人数增加三万七千人;同1927年的二十三万人相比,罢工人数增加九千人(当然,这里不包括1926—1927年起义时期的罢工)。这些数字证明,虽然大革命遭到了失败,但工人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只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经济性罢了。

今年以来,上海工人的斗争蓬勃开展起来。斗争浪潮席卷全国,尤其是在华北。甚至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充满恐怖的广州,目前,小规模的战斗和无产阶级的罢工也时有发生。

称霸一时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同盟,不再是铁板一块。蒋

① 即邓中夏。——译者

桂战争刚结束，蒋冯之间的斗争又开始了。无论是北洋军阀时期还是现在，军阀之间的混战始终未停。日趋崩溃的反动统治的这一缺口，使无产阶级得以重新发动阶级斗争。

国民党从叛变革命时起，它的整个工人政策是实行白色恐怖。国民党动辄封闭革命工会，鼓励白色工会。

由于去年5月的济南惨案，工人阶级的反抗逐渐明显地增强了。反革命的国民党清楚地了解：光靠白色工会，必将一事无成。为避免白色工会和革命工人之间的对抗尖锐化，乃建立了黄色工会。黄色工会的使命是完成白色工会所做不到的事情。可见，黄色工会是国民党手中对付工人阶级的一种新武器。当然，这并不排除大部分白色工会的继续存在。

国民党一投入反革命营垒，马上就取消了工人阶级用鲜血换来的共产主义成果。目前，中外资本家还在继续共同地向工人进攻。工人的生活水平极度下降：工资普遍降低，工作日延长，工作更加沉重，对待工人的态度更加恶劣，失业人数急剧增长。

国民党工商部炮制劳动保护法案，其目的无非是要做给当时在中国收集情报资料的托马·阿尔贝看；同时，在报刊上发表这个法案，还会激起一部分无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幻想。这部法律至今还没有不加删改地正式颁布（我坚信，它是永远不会被颁布的）。国民党从不实行任何改革，即使偶尔办点“慈善事业”，也是装装门面。例如，蒋介石送给铁路工人一万至一万二千银元，冯玉祥为工人修建澡堂。国民党军阀这类施舍的目的，是为个人捞取声誉。当然，国民党，特别是未参加政府的派系，象提出改组口号的汪精卫、陈公博等一派，都在为自己的改良主义政策拼命宣传。他们大唱革命高调，企图在落后的工人群众中散播幻想。

国民党的政策并不属于社会改良主义性质，而是属于民族改良主义性质。下列口号便是证明：“为民族利益要牺牲阶级利益”，“为祖国要大力发展生产”，“建设时期不准任何罢工和怠工”，“为

了中国的富强，为了子孙后代的康乐，要坚持不懈地工作”。他们用铁和血迫使工人相信这些口号。殊不知，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却每况愈下。

首先，我们应当弄清楚，中国有没有实行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的回答是：没有。即使采取最审慎的态度，我们也认为：微乎其微！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1. 帝国主义者要竭力从中国榨取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他们当然不希望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丝毫提高。

2. 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作用极其微小。它只有加紧剥削无产阶级，才能经得住外国资本的压力。

3. 工人贵族，由于他们人数不多，并不成其为多大的势力。

这就是改良主义在中国不能象在欧美那样根深蒂固的原因。机会主义分子顽固地不愿意理解这一点。

正因为这样，黄色工会的基础非常薄弱。在中国，以前也曾有过黄色工会。例如1925年上海就成立过“工会联合会”。这个工会在共产党人猛烈攻击之下瓦解了。广东机器工会吸收所有工业部门的机匠。由于广东工业不发达，机匠多半都失业，那些为谋生而寻求工作的工人，不得不加入这个工会（工会头目是原先的工头和小作坊主）。只是由于这种特殊条件，广东机器工会才得以存在下来。虽说改良主义的局面早已形成，但是后来，还是采用了武力（组织了五六百人的打手队）来制止会员的活动，摧毁会员的反抗。实际上，这个机器工会是个半改良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的混合性组织。

去年突然出现的黄色工会，其成立无疑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很清楚，反革命分子把黄色工会作为从属于白色工会的辅助组织。最初，黄色工会是由工人贵族，即职员和工厂管理人员组成（工厂管理人员在革命时期也曾加入赤色工会，但没有被选举权，因此，工会中占整个统治地位的是无

产阶级的底层和共产党人)，后来很快地，它们就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庸。

所谓黄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破坏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罢工。当工人要求宣布罢工的时候，它们就千方百计地使用压制手段来制止罢工或延缓罢工，代之以请愿或仲裁。如果任何压制手段都无效，或者罢工已经自发地爆发起来，那它们就立即夺取罢工领导权，以便阻挠共产党人的工作。从每个罢工宣言中，你们必定可以找到一段咒骂共产党人的话。对罢工中表现积极的分子，黄色工会就马上给他们扣上共产党人的帽子，并对他们的行动自由进行威胁。黄色工会拒绝其他工会给予援助，理由是“共产党人想乘机扰乱我们”。如果过了几天罢工还没有停止，它们就开始散播种种谣言，说什么资本家的态度很坚决，说什么罢工经费已经用光了等等，这些谣言都是为了使工人气馁，以便把他们压制下去。它们就是这样地把罢工引向妥协和失败的道路。黄色工会往往同国民党党部串通一气，利用罢工对资本家进行勒索。如果勒索未成，它们就建议工人继续罢工，同时却背着工人跟资本家在钱的数量上讨价还价。钱一拿到手，它们就不顾工人的利益，驱使工人复工。如果工人不肯终止罢工，它们就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正当工人集中在广场开会时，就会出现士兵和警察，将工人押回工厂，强迫复工。

不应认为中国的所谓黄色工会同欧美的改良主义工会是相同的。在中国，群众与黄色工会之间的关系，同欧美群众与改良主义工会之间的关系，也有着重大区别。要知道，所谓黄色工会，是建立在整个企业的工人集体会籍的基础上的；会费由资本家从工资中扣除，因而工人即使在不想当会员的情况下，也不得不交纳会费。不考虑这一特点，就不能正确评价我们的运动。

关于赤色工会会员的人数，我们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只是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我们有比较坚实的基础。中国的赤色工会

之所以软弱无力，其客观原因是残酷的白色恐怖，其主观原因是我们党在工会中的工作不力。回顾一下过去，我们看到，在大革命兴旺时期，我们革命工会拥有大量会员，达两百万到七百万人。但是，会员群众与工会之间在组织上没有十分牢固的联系。当国内笼罩着白色恐怖，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的时候，我们的工会就完全解体了。在这一紧要关头，我们党竟未能迅速寻求正确的路线去建立新的组织。当最终找到正确路线时，我们又缺乏信心和决心去实行这条路线；因此，赤色工会至今未能建成。

在疯狂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反革命的国民党宁肯对工人作某些让步，但绝对不准工厂留用一个政治上积极的工人。这样的工人很快就被开除出厂或遭到逮捕。工人只要一表现出政治上的积极性，就会被解雇。

在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两派：一派患有“左派”幼稚病，坚决拒绝在黄色工会中工作；另一派是右倾机会主义，坚决主张不管怎样，也要在黄色工会中工作。前一派已经完全退出舞台；后一派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

现在谈谈建立工厂委员会的问题。中国的工厂委员会情况，同苏联的，甚至同中欧的，完全不一样。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白色恐怖，不允许工厂委员会制定一定的章程、设立办公地点和征收会费。最重要的是，工厂委员会必须由全体工人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迫切要求。它在企业主面前应当保护工人的利益，并为改善工人的日常生活条件而斗争。工厂委员会可以由斗争委员会组成。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索薪委员会及其他组织）是短期性的组织；斗争一结束，它们就应当解散。而工厂委员会是固定性的组织。我们的最重要任务是掌握工厂委员会的领导权，以使用工厂委员会来对抗黄色工会。尽管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曾提出（作为一项新的指示）建立工厂委员会的任务，但至今成果并不显著，甚至在某些地区，对工厂委员会存在

的意义和重要性，仍然毫不理解。

可以断言，我们党内的盲动倾向（强迫罢工、让群众采用红色恐怖手段等等），已被肃清。但与此相反，等待时机和合法主义的论调却盛行起来。这种倾向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我们实行新策略时缺乏耐心和决心，而且由于我们接连不断地遭到镇压，乍看起来，似乎毫无出路了。但是，我们党英勇地领导了多次战斗，如去年年底上海法租界的水电工人罢工。在这次罢工中，我们党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在黄色工会中工作时，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广大群众中的下层，而不是机关中的上层。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在反动政权力量薄弱或即将垮台的地方，或者在革命群众具有适当的力量和自我牺牲精神以保卫自己组织的地方），我们才能争取整个机关。因为国民党强迫工会公职人员加入国民党，所以有些人宁愿不担任公职也不加入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保持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一旦进行斗争，群众将重新跟我们站在一起。

赤色工会的处境很困难。我们党在工会的策略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因为新策略执行得不够坚决和正确，所以赤色工会的工作没有取得重大的成绩。我们不应借口黄色工会中有薄弱的改良主义基础而拒绝在其中工作。相反地，我们应当在黄色工会中更加努力工作，以便把跟随它们走的群众争取过来。

我们不应假借某种理由就毫无条件地在黄色工会中工作，从而放弃了我们本身的工作，比如，不去建立秘密的工会支部——黄色工会内部的革命反对派。同时，不应忽视把那些尚未组织起来的广大工人群众、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广大工人群众（铁路工人、海员、矿工、纺织工人、市政工人等等）组织起来的任务，要尽快地把他们组织起来，从而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要把农业工人迅速组织起来，以便无产阶级能够依靠这个强有力的同盟军。

因此，我建议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全会闭幕之后马上给中国共产党发专函，就工会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

最后我可以说，我们党和我们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我们唯一的弱点是，我们在组织上没有巩固这种政治影响。尽管我们党很年青，但我们还是要竭尽全力地去克服这一缺点。一切征兆表明，第二次大革命的浪潮即将来临。我们在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我们希望尽快地纠正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工会运动一定不会再犯最近这次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那种组织上的错误。这就是我们在新的革命浪潮即将到来之时取得胜利的保证。

关于经济斗争和共产党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我想再说几句。我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想作一些补充。

首先我要指出，在这个决议中丝毫没有提到社会帝国主义工会官僚在东方的活动。大家都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就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曾向黄色工会国际发出电报，呼吁给予援助，而黄色工会国际对此竟置之不理。而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工人阶级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猎犬突然对东方大感兴趣。从报纸的报导中已经很清楚，日内瓦国际劳工局局长托马·阿尔贝在周游远东期间，进行了十分卑鄙可耻的活动。在中国，他会见了国民党的反革命领袖和黄色工会中的叛徒，同他们称兄道弟。他完全赞同国民党的政策：消灭和屠杀共产党人。

这一年，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代表会议上，有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拉拢中国工人的代表。当然，这个国民党委派的代表，与其说是中国工人的代表，倒不如说是个叛徒。托马·阿尔贝曾同国民党商量，在上海设立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支部。日本帝国主义的奴仆铃木，早已醉心于召开泛亚劳工大会的计划。现在，托马·阿尔贝已确定召开这次大会的日期（1930年4月在印度）。所有这一切证明，改良主义者想要完全控制殖民地国家的工人，以

便将他们拍卖给帝国主义，遭受进一步的奴役。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者想要利用殖民地国家作为未来帝国主义战争的基地，特别是反苏战争的基地。

在殖民地国家中，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所谓黄色工会，一开始就处于社会党叛徒（资产阶级的公开代理人）的领导之下。黄色工会与白色工会（反动统治势力的工具）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容置疑，共产党人应该独立地进行争取殖民地群众的斗争。首先，必须揭露叛变了的社会党领导人的可耻行径，并最终把这些叛徒从组织中驱逐出去。在我们的队伍里，不允许存在满脑子机会主义思想、准备同黄色工会领袖合作的那种人（例如在印度）。

帝国主义分子总是企图利用殖民地国家（印度）中工会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此相反的是，封建地主则极力利用罢工来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今年汉口的反日罢工就是例子）。赤色工会应当竭尽全力地把反帝运动、土地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以便使群众从一切反动势力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最后，我们应当特别注意把那些正在觉醒的群众组织起来。在这次印度罢工期间，左翼工会的会员人数，出乎意料地增加了几十万。这同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的中国工会的情况完全一样。那时候，一个星期之内就有两三万人加入工会。这种会员群众同组织之间是否有牢固的联系呢？没有。因而，当反革命恶浪掀起的时候，上海的工会全被封闭，工会会员立即由三十万人减少到五万人，后来由五万人减少到两万人。这种自发地大批加入工会的情况，如果不能很好地从组织上加以巩固，则一遇到失败就会引起回潮。在印度，不应重犯中国过去所犯的错误。殖民地革命工会在每次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牢固的组织。必须广泛地进行工作，把殖民地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组织起来，建立

革命工会。还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把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业工人也组织起来。

(同上，第110—116页)

第二十次会议（1929年7月16日晚）

讨论台尔曼和洛佐夫斯基的报告

皮亚特尼茨基（苏联）：

我在对议程第一项发言时，提到中国共产党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问题，目的是希望洛佐夫斯基同志在作工会问题报告时以及中国同志在发言时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今天中国的邓同志在这里发了言。遗憾的是他没有谈及这个问题。他的发言与洛佐夫斯基同志完全一样。他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顺便提到中国近来的罢工是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其实，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因此，如果全会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不作出专门决议的话，那么，在这次全会结束后，或者在工会工作委员会中，就应当赶紧研究并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对议程第一项发言之后，收到了一份罢工综合报告，这是一位刚从中国来的同志根据国民党的官方资料写成的。从这个综合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毫无疑问地已经出现工人运动的高潮，但是在这些罢工中，几乎看不到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没有，就是显得无关紧要。

这就是有关近来罢工运动的一些材料。1928年，上海一地发生了一百二十次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是男工六万八千七百二十八人，女工十二万二千八百零七人，童工二万二千四百三十一人。参加罢工的总人数为二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人。罢工者提出的要求的特点是：二十四起罢工是反对解雇工人，十三起是反对对待

工人态度恶劣，一起是反对罚款，七起是表示同情被捕工人，六起是表示同情其他企业工人，三起是因工人同警察发生冲突引起的，两起是由于对工会委员会不满而举行的。我们列举的，仅仅是那些不属于经济要求范围的材料，但在罢工中也曾提出关于增加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等等专门的要求。再说一遍，我所列举的都是最特殊的事件，我所选择的都是绝对政治性的罢工。这是官方的报导，是国民党公布的。我坚信，罢工的次数被国民党大大缩减了。

发生罢工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企业呢？按照工人人数，可以划分如下：

三十一家企业	拥有工人	10 至 100 人
六十三家企业	拥有工人	101 至 1000 人
二十一家企业	拥有工人	1001 至 10000 人
两家企业	拥有工人	10000 人以上

1928 年的一百二十次罢工，分别发生在下列各国工厂：中国厂九十六次，英国厂八次，日本厂七次，其余外国厂九次。

根据国民党公布的关于 1929 年 1 月份罢工的材料，情况如下：十二次罢工波及五百一十二个工厂，有六千四百六十九名工人参加。在 1929 年的 1 月里，除这十二次罢工之外，还发生了六十五次冲突，波及一千零五十一个工厂，有二万零四十九名工人参加。同年 5 月，上海举行了一系列罢工。举行罢工的有码头工人、铁路工人、裁缝、时装商店店员等等。同年 6 月，天津电车工人举行了罢工。各发电站纷纷支持电车工人。工人提出了十项要求，其中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接回被解雇的工友，生病期间工资照发，节日上班发双薪，解除外国监工和白俄监工的职务。电车工人的情绪很高。他们抓获了工贼，抄走了无数枚铜板，狠揍了那些企图勾结工贼组织复工的比利时工程师。1928 年和 1929 年的罢工，开始都是自发的，绝大多数不是在赤色工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是谁领导了罢工？如上所述，罢工一开始是自发的、但在罢工掀起之后，国民党工会就把罢工控制在自己手里。当时，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还很大。不但如此，而且1928年和1929年的所有罢工，几乎都是通过国民党的仲裁而告终的。诚然，现在已闪现出一线光芒，这显然说明国民党对工人的影响已开始消失。

今年5月孙中山安葬那一天，被宣布为全国纪念日，而两千名兵工厂工人，在这一天却拒绝臂戴黑纱，并继续上工，不愿承认这一天是自己的纪念日。

试问，假如中国共产党在工厂中，以及在拥有广大工人群众的黄色工会中进行工作的话，那它是不是能把这些没有共产党人帮助而提出政治要求，并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而举行罢工的群众争取过来呢？我认为，它能把这些群众争取过来。不管怎样，即使它没有完全掌握罢工的领导权，那它在国民党工会中的地位也会得到加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下面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5月30日，即1925年枪杀示威群众纪念日，尽管国民党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尽管中国警察和英国警察作了一切防备，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邮政工人、码头工人和许多纺织厂工人、店员等等举行了罢工，几万名工人和学生在上海各主要街道上举行了持续几个小时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捣毁了两家国民党报馆，砸碎了电车和外国人的汽车的玻璃。这次游行示威和罢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利用英国兵打死一名中国人的事件，开展了反帝斗争。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由党外人士组成的援助被害者家属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在市邮政总局召开了有六十个工会和学生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作出了号召举行“五卅”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决议。隶属于国民党的邮政工人工会，在5月30日以后被国民党解散并改组了。凡是有学生参与“五卅”游行示威的大学，一律被封闭了。

这证明在中国的群众中进行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可惜没有在群众中进行任何系统的工作。

我以为邓同志一定会对是否需要和怎样在黄色工会中工作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遗憾得很，他的发言反倒使这个问题混乱了。因此，必须赶紧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在群众中，在黄色工会中，以及在国民党的群众性工会中，要迅速地开展不懈的工作，因为在其中进行工作是办得到的。

这里碰到一个关于公开工会和秘密工会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区别地对待。在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而广大工人组织却公开存在的那些国家中，平行地建立秘密的赤色工人组织是不适宜的，因为共产党可以更方便、更有效地在公开存在的群众性工人组织中进行工作。我认为，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工会工作经验，证明了这个见解的正确性。我想，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经验，也必将证明这个见解是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秘密的共产党在适当时机不应组织公开的平行工会（如果现有的黄色工会或改良主义工会不是群众性的工会），或者不应在根本还没有工会组织的那些部门组织公开的工会。但在任何阶级性的工人组织都不准许公开存在的那些国家（意大利），情况就不同了。在这样的国家中，必须建立秘密工会。凡是建有秘密工会的地方，务必把它们保全下来，因为一旦法西斯制度发生动摇，它们将起重大的作用。不但如此，而且意大利秘密工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各工厂的法西斯工会会员中做工作，因为他们十分了解工资率、保险、劳动条件和一般日常生活等问题，易于同法西斯工会官僚展开斗争。

不过，如果存在着广大的公开工会，那就不可能出现工人大批加入秘密工会的情况，至少我们在实践中没有过这种例子。即使有工人加入这种秘密工会，那也是一些靠拢共产党的分子。他们是共产党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应当把他们派到广大的公

开工会中去。洛佐夫斯基同志昨天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提得十分慎重，但总的来说，我是同意他的如下意见的：秘密的共产党无论如何应当力求保住现有的广大的公开工会，保住不能公开存在的半公开工会，只是到万不得已时，即连半公开工会都绝对不能存在的时候，才应转入地下。秘密的工会积极分子（就说意大利的这种积极分子吧），在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们就要公开露面，夺取工会运动的领导权。

……

现在我谈谈合尔曼同志昨天简略提到的问题——保证书问题。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保证书问题，当前只是在德国可以接受，不过是否在所有城市和所有情况下都可以接受，还是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当工会官僚让共产党员在反党或反对整个革命运动的字据上签字时，共产党员最好拒绝签字，因为签字有损共产党的威信。在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工会决议中有一段话：关于保证书这一条，我们决定把它从决议中删掉，因为保证书问题，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能同样地解决。这是完全不能同意的。比如说，假如国民党工会领导人，对于那些想被选入工会领导机构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凡是提出候选资格的人，均须立下字据，说明他不是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要夺取这些工会及其领导机构，那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不可以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人呢？可以！一般说来，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没有、也不能负有任何责任。而改良主义工会、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天主教工会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只是为了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工作，我们对它们说什么都行。就拿在德国签署保证书的问题来说吧，即使德国共产党面临着工人运动的蓬勃高涨，难道现在可以在所有城市和所有工会都完全一样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一律不答应改良主义者提出的签字要求吗？为什么不可以呢？就是为了要更顺利地、把形形色色工会的会员争取到工会反对派方面

来。工人们一定会理解这样的共产党员。但是，如果共产党员是知名的人物，比如说有这种情况，柏林党组织提议把皮克同志选进某工会代表大会，可是为此他就得不承认共产主义。而皮克本来能对工会工作和整个工人运动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他要说，他是共产党员，决不签署反对自己党的任何字据。

问题是每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每个城市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也不一样，因此，认为共产党员一律不能签署保证书——这种解决问题的见解是不对的，是胡说。假如我是一个工人，到某工厂办公室请求雇用，那里对我说，他们不录用共产党人，于是，我就把我共产党员这一事实隐瞒起来，目的是能够被录用。为了能够在那里工作，我情愿在资产阶级工厂办公室里签署十张字据。未必会有谁反对工人给厂主签字吧。关于签署保证书的问题，对于改良主义者应作这样的规定，因为他们已经彻头彻尾地倒向了资产阶级。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个问题不能对所有国家和所有情况都作同样的规定。为了更好地扩大和加强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各国共产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拒绝签字或者接受签字，借以争取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应该这样地处理保证书问题。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

最后，我谈谈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问题。

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和主席团，近来常常讨论工会运动问题。它通过了许多很好的决议，如果现在让我评价这些决议，那我是极端赞成的。不过，光是这样做是不够的。作决议和给予书面指示的做法，已经过时了。例如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之后，至今仍在讨论如下问题：是否应当在群众性的黄色工会中工作？如果共产党员去黄色工会中工作的话，那结果会怎么样，工人会跟我们走吗？造成这种情况的过错，首先在于红色工会国际，其次才是共产国际，因为工会工作是由红色

工会国际领导的，而且应当归它领导。

.....

最后我要指出，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方法必须改变。红色工会国际应当切实地领导法国、捷克、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全国性赤色工会。

红色工会国际不仅要在中央机关有各国赤色工会的代表，而且也要关心赤色工会在地方上的工作。它应该作相应的指导，派人出去，保持真正的联系，发出自己的指示等等。

(同上，第 141—147 页)

米夫（苏联）：

我想专就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发言说几句。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关于中国工会运动的发言，大部分我是同意的。基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力开展群众工作，必须在群众性的黄色工会中进行更多的工作，这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讲话中的许多论断，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他在这里列举的仅仅是中国罢工运动的某些数字。这是必要的材料，但很不充分。其中我应当指出，甚至国民党社会调查局所公布的数字，也比他在这里宣读的关于中国罢工和罢工者的数字大得多。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所作的统计，显然是不正确的。我可以指出如下事实：1928年参加罢工的人数，不是象他所说的二十一万三千人，而是二十三万人，这不是整整一年的统计，而仅仅是1928年头九个月的统计，而且不是全中国的统计，仅仅是上海一地的统计。这是根据国民党社会调查局的资料得到的统计数字。我已经报导过这个数字，并且根据我的计算，假如把1928年全中国的罢工运动都统计进去，那么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将近四十万人。这个数字证明中国的工人运动已有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前不久工人运动曾因革命失败而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

我想谈谈中国革命刚刚失败后的局势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工

人运动的特点。在1927年和1928年上半年期间，中国爆发了自发的罢工，这些罢工的特点是，大多没有明显提出罢工工人的要求。象这种罢工时不提任何一项要求、乍看起来十分奇怪的现象，我们从来还没有在哪个国家见到过。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许许多多问题。任何一个工人或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在会上向罢工者讲话时提出某一具体要求，他就完全可能马上被凶残的反动派逮捕，并且第二天就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指责共产党完全脱离群众，不领导这一罢工运动呢？我认为，不考虑上述白色恐怖情况而作出这一结论，是不太慎重的，因为整个中国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目前仍在血腥屠杀。

我应当再说几句，并请注意下述情况：由于这种疯狂的白色恐怖和党机关遭到全面破坏，共产党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不同工人阶级失去组织上的联系。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在上海，三任支部书记先后被杀害，无一幸免。在武昌、汉口、长沙和其他大经济中心，党委会接连遭到十二次搜捕，被破坏无遗。只要新党委一成立，党委成员马上被抓走并被杀害。我为什么要列举这些事实，大家是很清楚的。我不再接着阐述我们所了解的1928年年中的中国局势，我列举这些事实的目的，只是希望某些同志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本人，放弃那种认为党对工人阶级失去思想影响的错误观点。

当前中国的形势可以说是这样：在那里，我们的罢工运动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剥削：本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剥削。

第二、我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正在向政治斗争转变。第三个论点是，国民党在这种自发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在其对工人运动的政策方面耍某种手腕。其中包括国民党允许工人在罢工时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目前，这一点为共产党的工作开创了更为有利的前景。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员可以提出更多的

要求了。第四、最近我们看到党的影响已有显然的增长。近来，我们知道，香港发动了十六次罢工，这些罢工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有组织地进行的，紧接着天津发动了六次罢工，满洲和其他地方发动了十八次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罢工是以工人获胜而结束的。

在中国革命蓬勃发展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它发动了一系列总罢工，因而它的影响已深入到中国无产阶级极为广泛的群众中去。目前，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在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工作，以维护并提高它在阶级斗争中所获得的威信。

我的具体意见是：第一、必须保持住所有革命工会的中央机构，并竭力巩固工会本身；第二、必须大力加强群众工作，要充分利用那些刚刚开创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以便在黄色工会中开展工作；第三、凡是黄色工会拥有大量工人群众的地方，必须尽力设法把先进工人诱导过来，以便这些人在黄色工会中结成一派，不让他们涣散，而是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从组织上同党发生联系；第四、党应当利用目前工人群众同资本家之间、帝国主义者同中国劳动群众之间的一切冲突，其目的是不断扩大这些冲突，以便加强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党的领导作用。

(同上，第 151—153 页)

贝维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

第二、我想对米夫同志在这里所谈的中国赤色工会的工作问题讲几句话。首先，我要指出的是，米夫同志所提的四点具体意见，没有包含一项对赤色工会的指示。他建议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建议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但对赤色工会应做些什么，却只字未提。然而，中国面临的情况证明工人运动新高潮业已到来，关于这一点，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已经谈过。米夫同志说，他掌握有更

能证明中国罢工运动蓬勃发展的确切材料。这尤其能够说明党可以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可以组织群众性的发动，等等。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指出：赤色工会目前大多无所作为，它仅仅由党员组成，而且它还没有把所有的党员联合起来。对此必须补充一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大量的工人党员。很明显，这种情况怎么也不能证明党同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中共中央本身也认为党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削弱了。这一情况特别严重，因此，显然地，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应以严肃的态度帮助中国共产党。

最后，我想谈谈同志们发言中未曾提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为反对企业主和警察企图破坏罢工和破坏无产阶级战斗机构而组织无产阶级自卫的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共产党有着丰富的经验，因而特别重要的是，要让波兰共产党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整个共产国际。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许多党的面前。比如，据我们收到的最近一号《人道报》报导，在法国的一些大工厂门前，工人同全副武装的警察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警察局派出警察队到各工厂，企图驱散群众大会和飞行集会。工人赶走了警察队。警察局又派出警察队来援助，工人也从厂内调来增援力量。在雪铁龙汽车工厂前终于发生了一场大搏斗。因此，组织无产阶级自卫的问题，务必写进提纲。

(同上，第 161—162 页)

皮亚特尼茨基（苏联）：

很明显，米夫同志不了解摆在这次全会面前的任务，他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几次三番地谈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群众性工会中工作的问题。他在这里谈了些什么呢？1927 年中国出现过罢工，但罢工者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害怕蒋介石地盘上笼罩着的残暴恐怖。在 1928 年，仅上海一地就有四分之一的无产阶级罢工

工，我在这里已经宣布过有关罢工的详细统计材料，因此不再重复。1927年和1928年之间的区别，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瞎子也都知道。1928年罢工者不但提出了经济要求，并且他们公开声明支持被捕者，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要求。这证明群众已经十分坚强，他们连提出政治要求都无所畏惧了。

米夫同志不是明确而机敏地作出指示，指出不能放过中国已经出现的或者显然增长的工人运动高潮，而是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正确与否，对我就这个问题的表态正确与否进行争辩，糟就糟在这里。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说明什么呢？难道我非要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不成？我丝毫也没有这方面的念头。中国党的优秀分子遭到了屠杀，上来了一些新同志，他们没有经验，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及时地指示他们应该做什么。共产党员在群众性黄色工会中应当组织共产党党团，应该领导起这些工会的工作，把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中，要在这些黄色工会中同国民党分子展开竞争，尽力设法把他们从黄色工会中排挤出去。

.....

(同上，第165—166页)

余非(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党党团)：

自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工会运动经历了一个由地下转为公开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期间，在上海自来水工人、电车工人和邮政工人罢工之后，在北方京奉铁路、开滦煤矿和北京制毯业的工人，在南方沪宁铁路的工人，都先后举行了罢工。在蚌埠、汕头、杭州等城市，人力车夫举行了罢工。这一时期中国工会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工人阶级由地下转入进攻性斗争；除此之外，所谓黄色工会开始成立，以替代迄今存在的白色工会。而黄色工会很快就暴露了它的工贼面目，后来已具有半黄半白的性质。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员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也有所增长。

目前，国民党的工人政策的核心，仍然是白色恐怖。现阶段的特点是，一方面，国民党利用所谓黄色工会、劳工法宣传和工人分红等等进行活动；另一方面，它与国际联盟、欧洲改良主义者（诸如曾窜到中国大肆进行宣传活动的托马·阿尔贝之流）开始密切接触。国民党派出代表参加国际联盟劳工局会议，并伙同阿姆斯特丹国际、日本和印度的改良主义者，企图召开泛亚工会大会，以与太平洋工会书记局相对抗。

我们不能否认，黄色工会对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矛盾，不能使国民党实现任何缓和工人斗争的改革。可见，中国的改良主义并不具有欧洲那样良好的经济基础。在上海邮政工人罢工期间，国民党当局人士请求英国、美国、甚至日本的军队占领各邮政局，破坏罢工。在邮政局中，邮政工人被剥掉工作服，并被赶到街头上去。罢工结束之后，国民党发表了一个宣言，声称工人的生活要比农民强得多。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工人应当作出自我牺牲，所以工人不该罢工。这些十分明显的事实，逐渐撕掉了国民党分子的假面具。

在中国工人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争取群众的工作中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系统地揭露那些用伪善的改良主义宣传掩盖其屠杀工人阶级的本性的国民党分子，向工人揭露所谓黄色工会和“第三党”改组派^①的叛卖行径，坚决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托马·阿尔贝、泛亚工会大会和其他帝国主义走狗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以便使中国工人群众摆脱形形色色改良主义者的影响。

为了使中国赤色工会顺利展开工作，必须同中国工会运动队伍中的右倾危险作无情的斗争。在空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有些同志看不到革命的前景，他们要求“降低共产党的政治口号”，有

^① 即国民党左翼。——原编者

要把工作引向合法化的倾向。这种右倾危险会发展成为1926—1927年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过的那种机会主义。而这种机会主义会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工会运动听任中国资产阶级的摆布，阻止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所谓黄色工会中的工人，乃是共产党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应当深入到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利用工人的一切不满情绪来展开斗争。在所有罢工中，应当尽力设法揭露黄色工会领袖对工人的欺骗，把罢工委员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在罢工斗争中，必须建立起坚强、独立的赤色工会小组和党支部。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各个企业中去。在各个企业中，务必建立起坚强的秘密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要把该企业的全体工人团结在这些组织周围。

在发动群众去进行新的革命战斗中，要特别注意把力量集中于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和农业工人组织，不要象1925—1926年以及1927年革命时期那样。因此，目前我们应当牢牢记住这两个工作领域。在新的革命浪潮中，在规模较大的阶级搏斗中，主要的工业部门（如铁路、海运、矿山、纺织工业和公用事业等），将起决定性的作用。谁掌握这些部门中的大多数工人，谁将是胜利者。在轻工业部门，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对女工和青工进行工作。

农业工人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的支柱，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桥梁。他们协助工业无产阶级实现其对农民的领导权。1925—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往往工人运动汹涌澎湃的时候，农民运动却瓦解了，相反地，在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的地方，却根本看不到工人运动。因此，工农运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合作。在东方，在中国，在这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没有强大的农民运动的支持，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总结这一经验，加紧进行农业工人的组织工作，以便通过他们使

工农运动结合起来。

此外，上述的农业工人，不只是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太平洋沿岸各国，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如在日本、印度等国，至今也很少注意这个工作领域。

现在我谈谈印度问题。

1928年，印度发生了二百次罢工，有五十万工人参加。这一年的罢工浪潮发展得既深入又广泛，因而它颇似中国1925年的上海事件。但是，印度无产阶级只有百分之十参加了工会。目前，运动虽然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但是，它的有组织的力量还比较软弱。在这方面，印度的运动同1925年的上海事件也很相似。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去加紧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那么，反动势力一旦猖獗，运动很快就会瓦解。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经验足以说明这一点。印度同志在自己的斗争中，必须加强这种组织工作，以免重犯中国的错误。

.....

此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以往的经验表明，我们可以把广大群众吸引到反帝运动中来。在外国企业中做工的工人群众，遭受着外国资本的惨重压迫，所以他们对反帝斗争特别积极。由此可见，反帝工作必须与日常斗争相结合。这对印度工人运动来说，也是特别确切的。

（同上，第173—176页）

第二十一次会议（1929年7月19日）

洛佐夫斯基的结束语

.....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会运动

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运动，即有相当年头的工会运动之外，我们还有殖民地国家的新兴的工会运动，而且可以把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分成几类。在一些国家中，工会运动战后就已经出现，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它仅仅在两三年前才出现。

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各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把殖民地国家归纳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举例来说，有这样一些国家，那里同时公开存在着合法的改良主义工会和左派革命工会，尽管左派革命工会遭到警察和帝国主义等等的打击。属于这一类的，有印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还有另一类的殖民地国家，例如中国，那里既有秘密的革命工会，又有政府和警察操纵的黄色工会。在这一类国家中，极其秘密的党和极其秘密的工会同政府和警察所操纵的黄色工会之间进行着争夺群众的斗争，在这些国家里，例如在中国，这一斗争进行得异常激烈，革命工会运动和共产党在这一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有这样一些国家，那里的工人运动最近才登上历史舞台，比如中非的许多国家，那里没有工会，但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领导经济斗争的半政治和半经济的联合组织，这种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制而遭到破坏，乃转入地下状态。此外，还有许多殖民地国家，那里只有改良主义工会，但是正因为它们是殖民地国家，所以改良主义工会在那里具有反帝的性质。例如非洲西海岸的塞拉勒窝内。就是这样的殖民地。有这样的殖民地国家，那里有白种工人组成的改良主义工会和黑种工人组成的革命工会，南非属于这种情况。还有这样的国家，那里的革命工会运动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那里既有公开活动的民族主义工会，又有独立工会，还有第三种工会——秘密工会，即秘密工人团体。印度尼西亚属于这类国家。菲律宾也可归为第一类国家，那里同时

存在着革命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

在殖民地国家工会运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在工人运动政治水平不一致的情况下，领导罢工斗争的问题，无疑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工会是在罢工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因为对许多国家来说，分散的工人正是通过这种经济斗争才成其为工人阶级。我们认为最集中反映这一情况的是印度，那里一年前，罢工还是自发进行的，而表面上是由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在纺织工人反对改良主义工会的斗争过程中，出现了左派工会；这个工会联合了比改良主义工会多十倍的工人。目前，改良主义（即民族资产阶级）同政治上尚未定型和组织上还很薄弱的、隐藏在左派工会内部的共产主义之间，已经展开争夺罢工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在这方面非常有意义的、值得严重注意的是印度最近一年的经验。我们认为这一殖民地国家的经验是：通过罢工运动，党日益得到发展，左派工会日益得到发展，我们的据点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也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

我们在殖民地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为所有国家制定一条共同的路线，这当然不行。总的来说，同志们，殖民地国家远不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工人运动水平和工人运动经验，都各不相同，因此，对各个殖民地国家，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

我们在殖民地国家的直接任务是什么呢？很明显，由于党和工会是在经济斗争中诞生的，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抓住时机建立由我们来领导的真正阶级性的工会。

在那些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的国家，即党在斗争中已经得到锻炼的国家（例如在中国），以及在那些除政府工会、警察工会、特务工会、黄色工会和半改良主义工会外，还存在着秘密工会的

国家，必须巩固这种秘密工会，并开展秘密工会的工作，以便在这些殖民地国家里采取那些法西斯恐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应采取的策略，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在罢工运动的浪潮中，要从地下走出来，创造各种掩护，冲破一切严重障碍，无论如何要尽力设法把群众运动领导起来，并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培养一批又一批干部，扩大自己的影响，以此争取公开存在的权利。

但在这种公开存在的情况出现之前，即还没有争取到这种公开存在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些国家千方百计地巩固革命的秘密工会，其中尤其是要巩固中国的秘密工会。

邓同志引用的实际材料，说明中国党内某些同志有一种不愿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倾向。这是危险而又有害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倾向。

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由于极端恐怖而产生的倾向，认为我们就得在黄色工会中工作，我们应当尝试一下合法化。这是十足的取消主义，它产生于厌倦情绪，这不仅会导致取消秘密工会，而且还会导致取消秘密党。

正如米夫同志在《共产国际》杂志3月号上非常正确地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内，既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我们不应为局部要求而斗争”，又有那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我们就得在黄色工会中，即公开工会中工作。必须全然放弃运动的多余的政治色彩，必须放弃过激的口号。”总而言之，他们的论调，很象我们俄国取消派在1908—1914年间放弃“革命口号”的那种主张。我认为这种倾向是极其危险的。

.....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

——瞿秋白同志在十次全体会议上的演讲

我以为共产国际中右倾的危险不仅从关于西欧的一般政治问题中表现出来，不仅从宗主国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从殖民地问题中表现出来。他方面，机会主义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国的哥哥，还走得更远。我们如果拿关于战争危险和第三时期的矛盾等问题来看，则右派机会主义的政纲有一部很好的中文译本。

中国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人以为中国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狂热发展的时代。甚至成立一种理论，认为“工农失败以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有广大发展的可能性”。于是，人们直至于说：中国不仅有资本主义发展，而且也走上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第六次大会时，英国代表团谈到印度及其他殖民地之“超殖民地化”（Decolonisation）时候，也表示这种见解。我认为英国同志现在也还未远离这种见解，因为他们嘱咐他们的党的地方党部去研究那英国代表团所附加于大会关于殖民地的提纲的修正案。他方面，如果殖民地和宗主国机会主义者，以为第三时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恢复时期”，那么战争危险和国际矛盾加剧就成了问题。

我们不要相信：右派只停止在这样道路上而不更向前进。在法国，有一些同志以为法国帝国主义是退兵的，帝国主义者是要和平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减少的。在中国，机会主义以同样方式提出战争危险问题，而推论说：美国既然借二十万美金给“南满铁路公司”，可是美国有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以剥削中国的意，可见国际资本利益这样结合起来，太平洋战争的恐吓是要减少的。

我们知道，最近，人们认为英国工党和日本自由派上台是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新时期开始，自然人们要相信：这样，在某种限度之下，可以促成殖民地之超殖民地化。

我们应该说：这种轻视战争危险的倾向，也存在于反苏联战争的问题中。人们肯定说：一般说来，帝国主义都不愿意战争和骚乱，因为这将妨害了合理化的实现，资本主义状况的改善，帝国主义者地位的加强等。人们由此推论说：至于苏联，则资本家是不会对他宣战的。对于中国问题，也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危险。人们肯定说：中国有内乱，已将近二十年，大家都愿意和平，帝国主义者将控制中国军阀扰乱，他们将容许工商业发展，因此中国工业将有依照本主义进化道路而发展的可能。

所有这些见解归结于：在西方，将有一个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时代，而在东方，在殖民地，则将有超殖民地化和工业化之可能。事实上，在殖民地是完全相反的。只要看一看关于印度的几种文件，就可以知道：在印度所发生的绝不是超殖民地化和工业化。英国帝国主义资本之剥削印度，一天比一天厉害起来，印度民族资本一天比一天愈要隶属于英国资本。至于中国，我们则有明白的事实。首先，无论关税怎样提高，但中国海关的监督和指导仍像从前一样落于英国人之手。他方面，我们又听见中英有个协定，关于派遣中国学生赴英国学习军事的事情和此协定已经签字的消息。英国在中国南方帮助建筑粤汉铁路和两广间的汽车路等，这不仅是要扩大市场，增加商品销路和采办中国原料，而且有一个军事战术上的目的。所谓英国人来“创立强有力的中国海军”，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这乃是英国的一种武装力量，而不是中国自己的力量。

至于日本，我们很明显看见：无论政友会上台或民政党上台，总归是一个样的。日本总归要实行一种政策，即加强其在满洲的军事基础，一部分也加强其在内蒙古和鲁直二省的军事基础。现

在，人们宣称说：日本要召集一个太平洋会议，在此会议上，“日本代表将军事观点和经济观点上证明满洲不应该属于中国而应该属于日本，因为如果不然，日本将受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恐吓。”一切手段，如日本撤退山东驻军和新内阁召回南满的一些官吏，都不改变现状。恰好相反，英国工党政府和日本民政党政府，只用这样手段来掩饰他们对于战争之狂热准备，他们对殖民地，对印度中国等等加紧剥削的政策。

至于美国，则应该说：他拿钱给中国，绝没有要使中国工业化的意思，也没有帮助中国资产阶级以发展其资本主义的意思。恰好相反，我们现在所得的一切材料，证明美国要在中国创立其太平洋军事基础，因为美国资产阶级比一些共产党员还更知道：没有战争是不能夺取英日的中国市场的。至于说到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中国内战不要军阀战争的一些见解，则最近几个月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见解是错误的了。

恰好相反，英国和日本公开的或秘密的帮助中国几派军阀，并造成国内新战争的条件。应该说：自从蒋介石战胜桂系以来，南京更加受美国的影响。但在同一南京政府内部都有英日美三国为夺取对这政府之霸权而起激烈的冲突。这就造成了内乱发展的一切条件，而非造成统一中国的条件。英国和日本都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都不容于中国统一，都以种种方法帮助中国军阀及其战争，为的要夺取中国新地盘并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

不仅英日如此。甚至德国，甚至现在一般人所称为贫穷帝国主义国家的德国，现在也宣言在中国要有德国租界。南京政府的德国顾问鲍尔（Bauer）说：中国没有统一的可能，中国要恢复战前制度，即德国在中国要有租界和军事基础。

有些中国同志以为现在人们不能说共产党员要帮助中国资产阶级，但必须指出：蒋介石和李济琛间的战争乃是民主资产阶级和对封建军阀间的战争，为此之故，蒋介石在这个战争中是代表

进步的力量，蒋介石之胜利，据他们看来，使中国有某种超殖民地化和工业化之可能，这样就可造成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即革命的主要动力，没有这个动力，任何革命高潮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得到结论，即：我们虽然不应该拥护蒋介石，但我们应该将蒋介石看做一种进步的力量。他方面，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像中国和印度那样广大的殖民地，其面前有二条发展道路：第一条是苏维埃的道路，第二条是美国的道路，即由美国资本帮助工业发展的道路。人们说：全世界既然没有革命局势，而中国革命潮流又是低落，则第一条道路是不可能的；第二条道路对于殖民地工人或有很大用处，因为工业发展，工资自会增加，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线也自会改善。人们肯定说：为着这些好处，人们可以放弃革命。我们以为这里有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所以我请大家原谅，如是我要先说几句关于瓦尔嘉同志。他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线在某种程度之下是抬高的，无论如何也是不降低的。如果说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即应该将中国苦力和印度南洋等的工人也都包括在内。我不明白：他说到统计表的时候，为什么忘记这些工人。或者他以为中国本没有一般的统计表，为此之故，在计算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线时可以将中国从总统计表中除去吗？

其次，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问题。在第三时期的过程中，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将发展吗？封建关系将渐进的但必然的消灭吗？这是纯粹资本主义关系即自由竞争不相干涉的关系来代替封建余孽的统治之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倾向吗？我相信这个问题从未曾在任何大会任何全体会议中提出。可是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殖民地的共产党，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资本主义在宗主国和一部分在殖民地实行合理化，如果资本的输出有增加，人们是否就可以推论说：在殖民地经济中有一种更资本主义的更工业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素将必然战胜殖民地的封建余孽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蒋介石就确实是一种进步力量，无论如

何他是代表那要摧毁中国封建制度的民族资本主义。但我以为问题不是这样的提出。事实上，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愈加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而帝国主义也绝没有专门帮助“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丢弃旧买办和封建力量而不顾的意思。关于印度的材料，证明英国政府倾向于加重对印度资本的压迫。同时英国政府公开宣言：印度土著王公是很可宝贵的，应该保护这些王公，免使他们受“国民会议”或资产阶级的政权的侵害。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关系是很明白的：帝国主义者利用民族资产阶级为一新的力量，同时正要依靠于封建力量之上，以便巩固其在殖民地的统治。

至于经济关系，则我们知道：在帝国主义资本能于殖民地发展的限度内，在外国商品竞争，因宗主国合理化关系，能战胜殖民地土著商品的限度内，数量不大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进入生产和投入农业及工业要遇见巨大的困难。下等的和恶劣的资本形式，要非常自然的发展，尤其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要发展。

这样就造成了殖民地封建残余能维持存在，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多少成为资本家的资产阶级，能与封建剥削分子亲密结合之一些前提。所以我以为中国军阀战争这件事实很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中国战争，首先是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总危机增长之征兆。

人们不能将蒋介石和冯玉祥间的战争，看做是一种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划别很清楚的战争。我们看见蒋介石军队是军阀的成份，与冯玉祥和李济琛的军队一样。人们说：吴佩孚、孙传芳和李济琛都是英国的走狗。吴佩孚迫不得已削发为僧并隐匿在庵庙内。但这绝不是说英国势力也迫不得已隐匿在庵庙内了。李济琛现在被监禁起来，但这绝不是说英国势力也被监禁在南京狱中，因为两广还有许多旧军阀，他们以前服从李济琛，现在服从蒋介石。将来要重新造成独立力量。如果冯玉祥离开中国，但他的右手鹿钟麟还在中国，鹿钟麟形式可以服从南京政府，实际上则还在准

备一个新战争反对蒋介石。他方面，蒋介石迫不得已要奉送新的特权给其他军阀，以使得到他们帮助来反对李济琛和冯玉祥。这样使中国封建军阀的政权更加巩固起来。

必须再指出一件事实，即蒋介石以其代表上海资产阶级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格，是要控制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市场的。他讲了许多好听的话，说他是要中国统一，要中国超殖民地化，要确定固定的币制等。民族资产阶级要以此维持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并阻止民众的反对战争的斗争。如果人们不能够说中国有宪法的幻想，但“统一”的幻想是存在的。

至于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在未来帝国主义间战争中或在未来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中之作用，则殖民地资产阶级在这样战争中是要帮助资本主义政府来抑制群众之革命斗争的。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我只举出一件事实。一年以前，胡汉民曾到伦敦游历，随后又到君士坦丁堡；他在那里与基玛尔曾经有一次谈话。基玛尔告诉他说：你要知道苏联中的回教民族是受苏维埃政府压迫的，而苏维埃政府拟定一个大计划要夺取新疆。胡汉民为此问题曾在南京大作宣传，号召中国的回教徒组织起来，为反对苏联的红色帝国主义而斗争。

在第六次大会时，我曾经说过：蒋介石主义不是别的，只是“民族法西斯主义”。这次全会中对于法西斯主义曾有许多辩论。我特不能参加这个辩论，因为时间来不及；但我只说一点：即当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拿到政权时，他绝没有依照民主主义教科书中一条条实行的意思。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指导中间，有某种“不平衡状态”存在，即我们在这里写布尔塞维克的提纲和议决案，而人们在那里只读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说：资产阶级要民主，而封建势力要君主。照这些教科书说来，如果资产阶级拿到政权，他必然是要民主的。

但事实却另是一种样子。武汉政变之后，有一个时期中一些

共产党员还希望：纵然不是蒋介石，至少也是汪精卫，一定会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制，允许中国共产党得以合法手段为争取群众而斗争；他们希望这样就可以得到“安心建设这些合法的群众组织”之可能性。但过了几天以后，人们看见：不仅蒋介石，而且汪精卫和邓演达也直接拿取武器并开始残杀工农。还有一层，南京政府热烈的欢迎意大利的法西主义，聘请意大利顾问到南京来。我不晓得这些事实有什么意义？是法西主义不是？称这个为法西主义，在科学观点上也许是错误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尚未拿到政权的印度，已经开始以民族和社会的虚伪名义拿恐怖和专政的方法来压迫工农运动。

我们必须注意，既然知道在德国在英国在美国等垄断资本的统治，已开始变成“社会法西主义”之公开专政，那么帝国主义的政权，垄断的财政资本的政权，在殖民地，必将由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三时期”中，帝国主义者究竟将帮助民主资产阶级之议会政制呢，还是维持那资产阶级占有重大作用之恐怖的和专政的政制？我以为应该以肯定的方式答复我所提出问题之第二部分。

其次，如果在大的殖民地，譬如中国印度及其他，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明白反革命的力量；如果殖民地资产阶级有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如果这个资产阶级帮助帝国主义维持其统治，那么我则以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团，如汪精卫，邓演达，“独立同盟”（少年 Neran），及其他政团，就有西方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作用。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公开的恐怖政策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之明白背叛民族独立斗争，将使资产阶级不久失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于是资产阶级左派就拿和平主义的和假革命的空话来掩饰资产阶级的这种政策的真面目。他们，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团，将努力抓住群众，将欺骗群众并将以此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自然，我并不是说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只是说其优秀分子，其所

谓领袖，他们说要革命，但不愿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这些分子的作用，将比民族资产阶级更加危险，所以我们必须有个完全恰切明白的态度对待他们。可是右派机会主义者却继续坚持有创立一个“民族革命党”之必要，就像以前他们主张工农团体加入印度的独立同盟一样。你们不要惊奇，在中国无论白色恐怖怎样厉害，仍还有些共产党员主张现在应该恢复与汪精卫陈公博的同盟，因为不这样做，则我们太孤立了，太脱离群众了；他们又主张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必须要有个帮助者，一个同盟者。总之，右派机会主义者宁愿与资本家的资产阶级联盟，而不愿与农民联盟。他们的策略就在放弃对于工人斗争独立的指导，就在放弃那为争取土地革命中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之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就在适应于资产阶级领导下殖民地“民主化”之前途。

现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怎样呢？一切事变，战争和危害五千七百万人以上的饥荒，证明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大多数人的地位是一天比一天困苦的，但其领导分子则惧怕共产主义甚于帝国主义。在这一点，汪精卫的一篇论文之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即：“我们是在夹攻中奋斗”。小资产阶级将有什么作用呢？他们将社会民主党左派或波兰社会党的作用，即他们高喊革命，他们抗议，反对南京政府，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所有这些呼喊和抗议，只为得要欺骗群众。他们纵然也能使反动派营垒内部组织发生相当的涣散，但他们总是遮掩南京政府和国民党的真正作用以及民族改良主义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真正面目的。所以必须坚决的斗争，反对这些领袖，反对殖民地中小资产阶级的煽动分子。

我们知道：土地革命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之中轴，尤其在中国和印度。我们十分知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此问题取什么态度。但这里，重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将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配合起来，那么我们究竟要趋向农民中那种分子呢？有些人还以为在殖民地中农民整个的是无知的群众，可以

完全跟着我们走，是整个赞成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另有一些人看得更远些，他们肯定说：我们应该联合富农并与富农一致行动来摧毁地主的封建制度。人们肯定说：只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一个民主专政，而不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若没有富农，则专政立即就是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内存在有这种倾向。

但他方面，另有一种形式提出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南京政府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是一个富农的政府，所以我们的任务就只在组织雇农并从事于“纯粹的阶级斗争”。任何封建残余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可以希望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就像托洛斯基所说一样；这个革命，当其他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都被推翻时候，是要爆发的。这样的提出土地问题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斗争以反对这种路线。自然，英国人美国人及其他帝国主义者，要经过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之中介，努力促成富裕农民的发展并倚靠在经济力强的农民身上，而且他们有了这一类的企图。但有些同志从这个理论推演出来，说在中国和印度，斯托雷宾的路线，比俄国更易于实现，因为反动的富农力量，在这些国家内是现成的。所以我们有一种前途，即在中国和印度农村当经济力强之农民不停的发展的限度之内，农业在工业化和合理化底下还能够更强大的发展。根据上述理由，我们的同志做出结论说：农村平静下来，农民的战斗将迅速的消灭，因此土地革命问题就要退出议事日程了。结果，他们走到“经济主义”，即是说在农村中只可从事于经济的斗争。中国党十分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毫无足怪的，因为自从革命失败以后，自从我们得到一切教训以后，对这个问题还存在这些模糊的观念。据我看来，我们应该认定在一切殖民地中正在有一个土地革命摆在我们面前，这些国家的革命，目前正活动于各种矛盾基础之上：

首先是广大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中间的矛盾。

其次是农民和地主封建势力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国家革命之出发点。自然，我们绝不惧怕殖民地农民之分化过程。这种分化帮助贫农和农村无产阶级，使之更接近于城市无产阶级。我们不应该光只攻击大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几千线索与封建残余结合起来，积极的反对土地革命，不能够实现任何重大的土地改良——我们还要反对半地主的富农，小地主，我们不应该离开这条道路，而将他们看做农民。其次我们也应该攻击富农，纵然他们现在参加反军阀和反地主的斗争。我们应该反对富农，不仅因他们是反动派，他们一般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坐探，而且因为他们在全国有汪精卫谭平山等的作用。他们有时也领导农民斗争，以反对捐税，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狡诈，因为他们要藉此表示他们也在企图领导贫农至于胜利，而不像共产党员要没收贫农的土地。我们应该攻击这些富农以领导农民基本群众反对捐税等的这些运动。

在一切情形之下，我们应该努力组织农村无产阶级，使之成为独立力量。这是在二十五年前就说过了，而现在还是正确。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唯有用这个政策去对待富农，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联合农民。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必须与贫农联合起来，并在这基础之上巩固我们的领导。无产阶级对整个农民的领导。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发展步骤，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并非要在殖民地先为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而争斗，然后再做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有权利可以像列宁对俄国革命转变问题那样的说：我们利用农民对地主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并非为帮助富农来打击农村无产阶级，而是为能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向前走上社会主义革命。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1期)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

(1929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且深切感觉全体会的路线与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别反对党内右倾取消派及调和派的论断是给与中国党战胜取消主义与调和派的最锋利的武器；因为中国取消派与调和派在各方面的表现，正是与国际取消派调和派的思想，一条路线，一个系统。因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仔细的研究十次全体会议的一切决议，并且根据这些决议配合实际情形坚决的执行。

一、全体会指出一年来事变的发展，“一天一天更加看出第六次大会对于目前时期估量的正确。认为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的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激烈的时期”，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国际形势上，如各个帝国主义因为抢夺市场，争取投资本的势力范围，以求重新分割殖民地而加紧世界大战的准备，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更加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更积极的向苏联进攻；因为生产合理化，更残酷的榨压工人，而促成工人阶级的日益革命化；因为更厉害掠夺殖民地劳苦群众的血汗，而促起殖民地工农劳苦群众自谋解放的革命斗争更尖锐的向前发展；因为这些原因而促进了世界革命新的浪潮的兴起，完全证实了这样的估量。就中国现在一般经济政治危机的形势，也完全适合于这样的估量。如英美日帝国主义抢夺中国的矛

盾日加尖锐，一方面极力指使中国军阀互相抢夺，战争不已，另一方面极力在中国树立军事的根据，美国占有航空，英国夺取海军，日本在山东满洲扩大其自由驻兵的范围；这便是各个帝国主义加紧准备直接战争的形势，因此，中国已成为爆发帝国主义大战主要危险区域之一。如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武装夺取中东路，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让日本积极进兵北满，请求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共同干涉，都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加紧。如帝国主义更厉害的侵掠中国，勾结国民党军阀取得更多的经济政治的特权（如航空，海军，内地杂居，内地租借权，内河航行的扩大等），而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因此促起了工农劳苦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重新兴起。如中外资本竟行生产合理化，加重工人工作，增加失业，工资减少，童工女工增多，使中国工人阶级为救死求生不得不坚决起来斗争，而就开展了工人运动复兴的形势。这些事实都是“帝国主义的一切根本矛盾同时尖锐化”的有力的证明。所以右倾派及调和派说“帝国主义间的一些协约协定（如杨格计划等）可以相当缓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或者说“资本主义国内矛盾日渐衰弱”都是些无稽之谈。特别是中国的取消派认为帝国主义可以对中国资产阶级让步，可以放任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更是完全走上了社会民主党讴歌世界资本主义繁荣的观点，无疑的是绝对错误的。

二、全体会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互相冲突的中心，是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在殖民地的‘小’的战争（如中国蒋桂间的战争），其背后都隐藏着英美间为争世界霸权的冲突”，这是不容丝毫怀疑的。最近改组派军阀反蒋战争的兴起，也同样有英帝国主义的积极作用（如汪精卫回国前首先至伦敦与麦克唐纳会见，香港成为改组派策动中心，同时香港政府又操纵两广战争等），又是一次有力的证明。所以英日美在中国的三角冲突，固然日美间表现得更加尖锐（如日本积极组织北方军阀反蒋及对满洲问题等），

而英帝国主义决不会取消极的态度，尤其不能与美国妥协一致以稳定南京政府；并且就发展的形势看，必然要从三角冲突而走向英日协调与美对抗的形势。如果轻视了英美间的矛盾，那么，一切政治问题的估量都会走到极端错误与右倾的方面去。

三、无论帝国主义营垒怎样的敌对和冲突，但主要的世界矛盾，是世界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两个经济政治系统的冲突，特别是一年来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出乎右倾派意料之外的更加巩固起来，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扩大起来，所以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也就日益紧迫。帝国主义在他互相冲突更加紧张的时候，更要企图首先消灭苏联的。所以全体会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只有取消主义者陈独秀们，才在极明显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中东路问题上把帝国主义战争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危险平列起来，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这样的观点只是替帝国主义在群众中散播和平欺骗的空气，来松懈广大群众武装拥护苏联的决心。

四、全体会议指出“经济上采用榨压工人的政策，同时政治上的反动也更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蒂化，在社会民主党占有势力的国家，另有一种社会法西斯蒂的形式”，更残酷的来镇压工人。另一方面也就造成了“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危机”，广大群众日益左倾革命化。于是左派社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有力的工具，“这个左派传播幻想，使人相信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中领导一派的政策，以此来缓和社会民主党崩溃的过程，其实这个左派是尽可能拥护社会法西斯蒂政策的”。所以“共产国际及各国支部，特别严重的提出，加紧坚决斗争，以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左派的任务，尤其要反对社会民主党左派，因为他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是工人群众积极力和战斗力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更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轻视了反社会民

主党左派的斗争，无疑的要堕入右派调和派的泥坑。同样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也极力利用民族改良主义来缓和工农革命斗争；国民党，特别是改组派，第三党，是他们最有力的工具。现在广大群众对这些改良主义的政党，的确还有不少的幻想的残余；特别现在形势，军阀战争更加扩大与混乱，工农革命斗争更加向前发展，改组派，第三党更要加紧他的欺骗宣传，实在是党夺取广大群众之最严重的敌人。所以党必须更严厉的作反改组派与第三党的斗争，不断的揭破他们的欺骗，然后才能领导工农革命斗争更快的向前发展。

五、全体会指出“国际六次大会以后发现的新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明白表现的左倾，和工人革命运动新的浪潮开始”。过去的洛茨同盟罢工，柏林五一示威的巷战，鲁尔的斗争，印度革命的继续高涨，以及最近的澳洲矿工的大罢工，东京电车工人的同盟罢工，美洲海地工人的武装斗争，都充分证明这一估量是完全正确的。在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增加，工人生活更加痛苦，社会民主党公开的法西斯蒂化，更暴露了他的假面具，共产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势力的增加，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危机的加紧：在这些条件之下，无疑的群众革命斗争要更快的成熟为世界的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右倾派与调和派认现在新的革命浪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好象有一座万里长城隔住，无疑的是极端错误的。同样的，现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根本矛盾，都更加尖锐化，资产阶级因为他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国家财政资本的利益，不可分离，和他与封建势力反动联盟之故，决不能实现丝毫改良的企图，而只有更加走入反中国独立的帝国主义的营垒中去，更残酷的剥削工农劳苦群众。这样自然要更加促起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各地罢工潮流的兴起，特别是主要产业工人，农民的土地斗争与武装斗争到处爆发，兵士哗变普遍了全国，都证明中国革命运动的复兴，证明国际第十次全体会与中国党的二中全会

对中国革命的估量是完全正确。尤其是最近的形势，军阀战争扩大，统治阶级的危机加深，工人斗争渐次走上反黄色工会与国民党的斗争，每个经济罢工都很快转为严重的政治斗争，甚至武装冲突（如青岛纱厂工人，北京人力车夫，武汉纱厂工人等），农民暴动与游击的范围日益宽广，红军的组织特别是政治影响，更加强大起来，这就表现着这一革命复兴的形势，要更迅速的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取消派陈独秀等，以为现在群众斗争“正是革命高潮的反面”，这不过证明他们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抹煞一切事实而幻想资产阶级的稳定罢了！

六、在这样革命浪潮发展的形势之下，党必须提出更坚决的策略与政治口号来领导群众斗争更快的发展，所以全体会指出“政治罢工，成为直接的时代的坚决问题”，是异常正确的。特别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尽量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取消派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无疑的是替资产阶级服役来阻止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

七、特别是全体会坚决反对右派与调和派的路线，指出“机会主义是传播资产阶级影响于工人阶级，并传播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间谍〔谍〕”，中央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因此，中央更完全同意全体会反对布哈林同志的调和主义，同意决定免除他的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

布哈林同志远在指导中国党的六次大会的时候，虽然根本上是依据共产国际的整个路线，但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暴露了他的调和派的观点。如在他的演说中，因对富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观点不正确而得出将来工农专政时还会有与其他急进的革命政党成立

联合政府的形式，“或者会形成一个甚么急进的革命党，它在某一阶段，将与我们共同行动，或者如左派谭平山党……”，尤其论到组织问题，提出“和气一致”的口号等，都是极明显的右倾的不正确的观点。必须明白的指出这样观点的错误，而肃清这样思想的残余，否则，在将来还可以成为右倾思想的基点。

八、中国党一方面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残留，还伏着很深的根蒂，另一方面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尚很薄弱，因此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乃更加严重。所以六次大会后中央开始工作即坚决的与机会主义的残留思想斗争（如顺直问题，江苏问题，广东问题）。从三十四号通告起更明白的指出右倾是党内主要的危险。二中全会便在这样的精神之下，确定了党的路线，更加强了党内反右倾的斗争。在中东路问题爆发以后，机会主义——反对派，公开的提出他的取消主义的路线来反对共产国际，党的六次大会，二中全会与中央的整个路线，更加表现出右倾危险的严重。中央在一贯的反右倾的路线之下，动员全党的同志，与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现在虽然相当的战胜了取消主义的思想，并且在组织上开除了一些公开反党的取消派的领袖，陈独秀彭述之等；可是这一斗争还是在异常严重的时期。因为党的一般的理论水平很低，同时取消派正在积极作反党的活动，所以要肃清取消主义的思想，更须要全党继续不断的加倍的努力。特别是调和主义的思想，还在活跃，还需要在思想上给以严重的打击；所以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的最严重的问题。必须依据国际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与路线，继续坚决执行反右倾的斗争。

九、且目前右倾危险，是有他的客观的强大的基础，是由于阶级矛盾的更尖锐化，历史上空前的事变，将要到临，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留，为这样严重的事变所吓怕，自然要更加动摇而走向右倾与调和的方面去。特别是中国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尚不宽广，理论水平都很幼稚，更易于反映右倾的思想，甚至在坚决

执行反右倾的路线之下，而在某些策略上亦仍然可以犯到右倾的危险。譬如中央一年来总的路线，主要的是反对右倾，可是过去在政治的分析上，过分估量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在农民问题上，对富农的认识不清楚，与策略的动摇，在职工运动上，主张在黄色工会之下，不能建立对立的赤色工会等，都是极明显的犯到右倾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在接到国际的指导后很快的纠正了，但仍然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因此全党在坚决反对取消派与调和派的斗争时，仍然需要很仔细的检查自己的策略与工作，肃清一切右倾的危险。现在党内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倾向等仍然异常严重；特别是国际决议案上最后所指出的“目前时代最大的危险，就是共产党有追赶不上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可能（尾巴主义）”，在中国党内表现得尤为严重。最近几月来工人罢工潮流的发展，党很少在事前起领导的作用，大部分都是跟着群众的尾巴跑，尤其在策略的运用上，随处表现出尾巴主义的精神。所以中央号召全党的同志，必须坚决的接受国际全体会议的指导：“以最坚决的精神，反对这种反映社会民主党遗传的尾巴主义倾向。不战胜这种倾向，是不能尽工人运动先锋队的作用，即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到新的革命战争和新的胜利。”

中 央

一九二九，一二，二十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接受国际 1929 年 10 月 26 日指示信的决议*

——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930 年 1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通过)

年前十月二十六日的国际来信,对半年来的中国事变与党的目前主要任务,都给了明确的分析和指示,这足以证明中央于二中全会后,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一般的是正确的。只是中央在策略的运用和工作的布置上,尚仍不免犯有错误,虽中央已曾自觉的改正过来,但国际这一指示,确给了中央更有力的督促与帮助。因此,中央除完全同意国际来信的指示外,更成立下列的决议:

一、全国的危机与革命的新浪潮

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一方面是农业危机之深入,民族工业的衰败,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重新爆发,而各派军阀的背后,都站着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剧烈起来;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之迅速的发展,如罢工,工人斗争,农民斗争与暴动之增加。中东路事变之起,也因帝国主义之内外的危机加深,苏联因五年计划之成功而日益巩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激烈,帝国主义乃更要首先压倒世界革命大本营的苏联,故指使国民党军阀进行军事的进攻。目前向全世界唯一的工农国家的进攻是失败了,虽然现在以和平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正准备

更大的更高度的新的进攻。同时因进攻苏联而引起的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营垒的矛盾与对抗，亦更加剧烈。故党必须断然排斥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将帝国主义相互冲突与其对苏联的冲突平列来看之非阶级的观点，因为如此，必然要减轻全世界无产阶级拥护苏联的任务。纵然在帝国主义间为夺取市场与原料，为增加军备，特别为瓜分中国之不断的斗争使他们彼此的矛盾更加尖锐，但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最大的危险，却是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

国民党反动统治一年来的外交政策，如借款建设，关税自主，撤消领事裁判权等，都已完全破产。国内政策，则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白色恐怖的压迫，既没能真正缓和与压住群众的革命运动，更不能使这一企图在和平统一问题上求得丝毫成就。这一切尝试之根本失败原因，自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强与其所操纵的军阀战争的继续，以致一年来许多民族工业日在衰败（特别是面粉业、丝业、航务、矿务）农业危机与灾荒现象更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之经常状态，而外国资本在全中国经济生活中却日渐扩大起来。机会主义——反对派闭着眼睛说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陈独秀语），所以“下一次革命爆发之前，必须有经济的复兴”（刘仁静语）；这种取消主义的估量，完全敌不住现实生活的一击！

因此，目前中国工农生活更加一般的恶化：城市的大批工人失业，物价腾贵，工资减低，工时增多，工作加重；农村中大量农民失业破产，大量的灾民无法生活；军队中士兵生活苦到万分，成千整万的死在战场；这些都是造成革命新浪潮的客观基础。故近半年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在上海每月有成百次的斗争，北方有天津电车工人的罢工，开滦五矿的斗争，北平人力车夫的巷战，青岛纱厂工人的苦斗，武汉有数千纱厂工人包围公安局的示威；农民斗争更是不停息的在南北发展，尤其是游击战争的发展，苏维

埃区域的扩大，土地革命的深入，各地红军的壮大；反动军队的兵变已形成全国的潮流(虽其发动的还多为反动军官的军事阴谋，但客观上却是反映士兵群众不能再忍受军阀压迫的痛苦与自找出路的要求)；同时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复兴，城市贫民的日益不满，使着这一革命新浪潮更加平衡的发展起来。现时虽不能预言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中央现在正号召全党同志在这一路线上加倍努力。取消派不了解这一革命形势，骂国际及中央是在实行盲动主义，只得由他们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为实现国民会议而斗争去吧！

二、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中分出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

国际来信很系统的指出：在中国反革命胜利的初期过后，帝国主义及全部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已在生长和深入他们中间的矛盾和分裂。现在这个联盟更分裂成为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一个是包含军阀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当权各派；一个是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之现时处在在野地位的改组派。他们都绝对属于反革命的经营垒，都参加反苏联的战线，因此，都是帝国主义反苏联联盟的臣仆，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在当权的各派中间，因为各种矛盾的加剧，根本便没有和平而只有不断的军阀战争。改组派便企图利用群众对此的不满，散布自己的改良主义影响到中等资本家，到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到乡村不满意的小地主及一切富农。他的主要目的是在与当权的各派争夺南京政权与预防新的革命爆发。当他在开始争夺时，他便极端妥协和驯服于帝国主义及军阀，所以陈公博曾主张亲美，汪精卫曾亲去拜会麦克唐纳尔，在军事行动上除靠张发奎外，便要同桂系冯系乃至北洋残余联合，在政纲上首先以“讨俄不力”罪南京政府以献媚帝国主义。同时，用国

民会议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实际上是迎合各派军阀的分赃主张，这不仅表示改组派没有能力树起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权，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更加发展的条件之下，他必要很快的丧失他在野党的态度，很快的与当权的各派合并，重修旧好“成为统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来一致压迫革命。

只是，现在革命浪潮尚在初期，群众中尚存有对国民党改良主义的幻想，改组派不仅“还没有来得及在劳动民众之前完全暴露自己的真相”，并且他还以代表工农小市民的理论，以国〔民〕会议（这也是托洛斯基派陈独秀的口号）树立民主势力的口号，以爱国主义的欺骗，甚至在上海利用“四次暴动”^①的名义，在广东利用“农民自卫军”的名义，在北方利用群众不满意政府的情绪，来哄骗工农群众供他军事阴谋的牺牲，做他争夺国民党部的工具。这些，确如国际所指，都极需要党与他作“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他的反动妥协欺骗的影响”，这实是革命争取胜利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之必要的前提。中央在过去一年多工作中一开始便指出改良主义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反改组派斗争是我党中心任务之一。特别在每一次的群众斗争中都提出坚决反改良主义反改组派反第三党的口号。确实的，这一工作做得还不充分，客观上自然会给下级党部一般同志以更加忽视的机会，在少数同志中间（如过去直隶，江苏，浙江，安徽等少数外县党部）便有如国际所指出的“常常要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变动和勾结，来代替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甚至加入国民党企图掩护，——这简直是“机会主义公开的露骨的表现”，中央与省委都曾予以极严厉的斗争。还有在敌人军队中做工作的分子，亦有表现出机会主义的见解与行动的。但这决不能如机会主义——反对派解释成为中央对改组派有幻

^① 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江苏省委拟准备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没有实现。

想，中央与军阀们勾结，因为这不仅是造谣，且是蒋介石污蔑共产党之最好的间谍。

三、全国危机中的特点

在全国危机与革命新浪潮中，国际指出两个中国式的特点：一个是军阀战争的继续，客观上是在日益削弱反动统治的政权，引导工农群众走上反抗运动的道路；另一个是农民战争的发展，北方自发的回民暴动，蒙古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红枪会大刀会等类的武装斗争，与南方各省的农民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相互呼应着，而成为革命浪潮中一个主要的支流。密接着这两个特点发展的便有普遍全国的兵变潮流。然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在这一切革命斗争中，中国党确已渐能树立起自己的领导力量，尤其是去年各地的政治示威与农民游击战争，但还不能令人满意。中国党的领导力量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还跟不上工人群众斗争的发展。赤色工会数量的微弱；黄色工会的影响还大；党过去在黄色工会中策略的错误，这些错误实际上是把赤色工会的作用估量得过低，没有完全了解独立领导的意义；党过去还很少有计划的组织工人阶级经济的政治罢工；党更没能够很注意吸引革命的工人干部在自己的周围，也没有充分注意于在广大基础上组织雇农工会的预备工作。在农村中，因为党过去策略运用的错误，致使富农路线常常代替了党的正确领导；南方游击战争发展区域，有些地方，地主的土地还未没收；北方各省看着农民自发的或为反动领导的群众武装斗争，我们不能领导，而自陷于合法运动和平发展；在江苏已有无数次刀匪群众的武装，而仍有人怀疑到在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游击战争是否可能。许多兵变客观上只有与土地革命汇合才是出路，但我们不能领导。反帝运动之单独组织与经常斗争，在许多大城市中甚至如香港，天津，武汉，奉天，都还缺乏；广大的城市贫民尤其是在北方，党

还没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工人阶级在城市的有力同盟军。这一切尾巴主义的严重现象，在许多地方许多工作上部〔都〕表现出，尤其是对取消派以及对改组派有幻想的分子，都需要党予以无情的斗争。必如此，党才能转变“成为广大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发展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必如此，党才能打破目前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发展，尤其是工人阶级自发斗争的主要危险现象。

四、党的目前主要任务

依据上面的分析，就足以规定中国党目前的任务，同时足以证明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所指出的主要任务与策略完全是适合于国际的指示的。

第一，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必须在一切宣传与鼓动上，最大限度的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必须在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中联系到目前两大任务，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应准备群众，破坏一切军阀派别的政权，破坏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之一切企图“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党在群众鼓动中主要的紧急的口号。过去拥护苏联的口号，在许多城市已收了相当成效，反之，在广州暴动纪念中之反军阀战争的动员，却还未能扩大起来，这需要各地党部予以极严重的注意。

第二，党必须以改良主义为目前革命复兴中之最危险的敌人，以反改组派的斗争为争取群众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之最主要的前提。党必须以最大努力最坚决的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去破坏改组派的一切影响与领导，去揭露改组派的反革命的面目。只有群众斗争广大的向前发展，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坚决的领导斗争组织斗争，欺骗群众抑压革命的改组派，没有不在群众革命巨潮之前

跌落下的。青岛纱厂工人，上海码头工人，开滦矿工，北平人力车夫的伟大斗争前面，改组派总是仓皇失措转而与当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来压迫工人的。但我党的领导亦常常在这种斗争前面表示软弱畏怯，甚至不能给改组派一个适当的打击，这在客观上无异于挽救改组派在群众中已失的信仰。同时党必须更积极的暴露改组派所谓代表工农小市民的政纲，实际上是在代表资产阶级说话，反对工人，反对土地革命，而投降驯服于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指出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好友，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以揭破改组派爱国主义的欺骗；以工农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行动，答复改组派反革命的军事阴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回答分赃会议式的国民会议的号召。在这里，同样要注意现在反动统治的当权各派，一样是以改良主义的语句来欺骗群众，来抑阻革命，我们必须如反对改组派一样在群众中反对他们，对第三党的一切活动也要如此。

第三，党必须特别注意于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依照中央所决定的有计划有准备的去组织同一产业同一职业的罢工。在配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候，党更须以全力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的计划。党在准备政治罢工的目标上，必须以发展经济罢工为基础，但同时要认清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一厂一业的经济罢工常不可避免的要生长到政治罢工，且在斗争一开始时便须有政治要求的条件，以推进斗争局势之开展。在工人运动中，党同时要以建立赤色工会与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成为经常而又切要的任务。党必须坚决的肃清工会工作中的委派制度与命令主义的残留。党必须有计划的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民主集中制的一产业的赤色工会，这便是产业的阶级工会。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每个工厂建立一个赤色工会的分会。在每一个有黄色工会的工厂，必须组织赤色工会的支部，以便动员群众，去扑灭黄色法西斯蒂工会的力量，驱逐黄色领袖，以该产业的革命的阶级工会的

分会去代替黄色工会。这必须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去夺取群众到我们政治与经济的纲领之下，我们一切的活动都必须为的实现我们的目的：去夺取群众，以便组织在我们的工会之内，而不是去夺取黄色工会机关中的地位。因此，在客观上必然要推翻国民党工会（不论是改组派领导的，或当权的国民党领导的）压迫的权力，这是帮助发展工农兵苏维埃权力的一种方法。工厂委员会与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在目前更成为必要，这不仅在斗争中去发展，且要成为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树立起全厂工人与中坚的群众组织。

第四，党必须更加注意于反帝运动的领导，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之下，一定要加紧反对美帝国主义。过去一年，党在反帝运动中确收有成效，尤其是在五卅，八一，九一，九七等示威运动中，国民党改组派之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的确减低不少。但党还应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强暴表现，来发动群众革命斗争，组织政治示威，同盟罢工以及单独的反帝组织，来吸引工人群众与广大的农民及城市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党必须使反帝运动与工农斗争尤其是反国民党改组派的斗争相联接。在乡村，要深入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在满洲等地，党更应有计划的在一切反帝运动中，提出直接拥护苏联的口号，以对抗国民党的欺骗，以揭露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这一工作，在哈尔滨一中学生斗争中（一一九示威），曾有显著成效，党应运用这一经验到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去。党要纠正过去忽略城市贫民工作的错误，要知道城市贫民工作比学生运动还更重要，党要组织他们在反帝反军阀战争反捐税争自由的斗争战线之内。

第五，党必须以扩大游击战争，有组织的进行兵变，组织地方暴动为深入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党应坚决的肃清乡村党内的富农，排斥农会中游击队中的富农分子，反对党内对农民战争以及兵变的估量不足。党不仅在南方各省要集中红军，集中武装的

农民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没收〔收〕地主的土地，便在北方各省也一样要打破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观念，不自限于反捐税的斗争范围，要领导农民直接起来为土地的斗争，一样要领导农民灾民乃至回民自发的群众暴动，夺取被反动领导的红枪会大刀会的武装斗争到革命的领导之下，分化与改编他的组织与系统，以发展游击战争，兵变潮流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且须与农民土地革命相配合，以更加削弱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军阀战争区域，这一工作更有他便利的条件，党应坚决的组织兵变，“最大限度的武装工农，解除军阀的武装，夺取交通的用具”，以彻底实现党在军阀战争中之失败主义的策略。在这一切斗争中，党必须扩大工人阶级的影响，要以全力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党必须加强国际的任务：第一，要使中国工农群众明了他们与其他被压迫民族，如印度人，韩人，马来人之相互的关系；第二，要加强与日本及其他各国，特别是与苏联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关系。

五、党的领导作用与布尔塞维克化

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中国党的根本之主要任务，恰如国际所指是争取革命运动里的领导作用与党的真正布尔塞维克化。只有党完全肃清过去脱离群众的现象，积极的领导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斗争，推动群众斗争日益进到更高的阶段，党才能将自己锻炼成为最有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党在斗争中，坚决的勇敢的吸引无产阶级积极的斗争分子，来充实自己的队伍，引进斗争的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党才能将自己变成群众革命斗争中之有力的领导者。只有党不断的无情的与党内党外政治上思想上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党才能将自己真正布尔塞维克化。因此，党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他们现在已结成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

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同时更要认定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富农的思想，黄色工会工作中不正确的策略，对改组派的幻想，对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尤其是党在群众斗争中所表现的尾巴主义取消主义倾向，党内斗争在各方面所发生的调和倾向，以及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危险估量得过低——都需要党以全力来战胜。没有这些胜利的保障，党是不能领导新革命高潮之来到，达到组织武装暴动的任务的。

为要切实与一切动摇，犹豫，机会主义，取消主义（这是右倾之最高度的表现）做无情的斗争，各级党部以及全体同志必须执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必须认识自己对于一切错误倾向的存在，然后才能使国际正确的路线，得以坚决的有保证的执行。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世界革命高潮之前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

秋 白

—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首先就说明战后资本主义进到了所谓“第三时期”，——第三时期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剧烈起来，资本主义的稳定更加动摇起来，因此，工人群众亦就左倾起来。根据这种分析，世界大会指出战争危险的事实，并且指出反对苏联的战争危险。社会民主派，在这个新的时期，更明显的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以及工业管理机关，托拉斯化的资本，混合生长起来；所以第六次世界大会特别指明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尤其是他的左派的必要。第六次世界大会，因此也就完全赞成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二月）的新策略：就是共产党和赤色工会，独立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不用那种联合黄色工会领袖的统一战线，——都要坚决执行纯粹下层的统一战线。再则因为资本主义稳定里的矛盾剧烈起来，所以第六次世界大会特别指出反对党内右倾的斗争，特别指出右倾的危险：各国党内有过分估量资本主义稳定的情绪，有对于社会民主党，尤其是他的左派，抱着调和态度的，有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以及黄色工会的机关和规则，表现合法主义的关系的。固然，一九二八年二月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已经就指出反对右倾的任务。

但是，第六次世界大会更加进一步，指出不但要反对右倾，并且要反对党内对于右倾调和的倾向。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一九二九年七月），完全证明第六次世界大会决议的正确。

第六次世界大会（一九二八年八月）到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之间，经过许多重大的事变。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准备战争和反对苏联，欧美和东方革命新高潮的兴起，以及各国共产党内右倾危险的表现，都完完全全证明：世界第六次大会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只有根据这种路线，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方才能够领导得起正在兴起的革命高潮。

各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在这个期间里，有许多已经变成公开的叛徒，而公然起来反对共产国际；而以前党内的调和派，事实上已经成了右派。右派的政治路线是：——说资本主义的稳定不但不动摇，而且正在巩固起来；说反对苏联以及一般的战争危险，不但没有加紧，而且已经减少；说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在法西斯蒂化，而且仍旧是民权主义的势力；因此，认为必须要实行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联合战线。世界第六次大会上，各国共产党的调和派，形式上还是赞成共产国际的路线，而反对右倾的路线的。但是，到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各国共产党的调和派，首先就是德国的，已经“进步”了，已经站到右派的政纲上去了。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他们说资本主义是在巩固起来，至多只有列强的国际关系比较的恶化；对于职工运动策略的问题，他们反对独立的领导工人斗争，尤其反对领导“无组织的”工人群众，（在黄色工会之外的群众）；对于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左派社会民主党是共产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调和派和右派的分别，只在于调和派不是公开的反对党的路线，而是暗藏的对。调和派对于党的路线和国际的路线，是用着全副的力量来反对，可是对于右派却有很亲密的关系。

再则，托洛斯基派，现在已经和右派混合生长起来。第六次

世界大会到第十次执委全体会议之间，正是托洛斯基派和右派混合生长起来的过程；差不多在右倾的取消派和托洛斯基主义的取消派之间，已经完全没有界限。托洛斯基在今年六月十二日公布一篇文，题目是“再论白朗德尔和答尔黑美”^①，表面上是反对他们，实际上是比右派还要更右倾；他（托洛斯基）说：“我们现在的时期，是极大的反动时期，是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三年革命年代之后的反动时期。从第一国际起直到现在的历史，都证明这种低落和反动时期是不可免的……俄国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二年的反动，是这样的，欧战时期，全欧洲亦是这样的。”托洛斯基，原本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例如奥国社会民主派鲍威尔），早就说中国革命失败，不会很快的有什么新高潮，而是在反动时期里走上资本主义进化的道路。现在，他的这种“反动论”应用到全世界，自然，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在巩固起来，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在强健起来，革命的高潮和前途，完全没有希望的了！

第十次执委全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简称，下同）正在反对这些机会主义（党内党外的机会主义）的旗帜之下，进行自己的工作的。他研究一年来的斗争经验，分析世界政治经济情形，考察欧美和东方革命高潮的形势，综合反对右倾的党内状况，而规定出向前斗争的主要任务。

二

最近一年来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完全证明右倾机会主义派的观点，是绝对不正确的。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经过资本主义稳定里矛盾的继续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稳定的继续动摇，引导到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异常剧烈”（第六次世界

^① 白朗德尔（Brandler）和答尔黑美（Thalheimer）是德国党一九二三年革命失败时的领袖，就是现在被开除的右派领袖，他们自己有机关报“反对潮流”。

大会政治决议案)。这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生长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国内国外矛盾加快的剧烈，不可避免的要引导到帝国主义战争，巨大的阶级冲突，要引导资本主义主要国家里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展，和殖民地国家里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第十次执委会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十月英法的海军协定，远东方面英日同盟复活的趋势，英美之间的冲突剧烈起来；一般的说，英美冲突，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一切冲突的枢纽。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波兰罗马尼亚的军事阴谋，苏联西境各国里反苏联的策划，波斯统治阶级的亲英更加厉害，阿富汗反动政变的受英国指导……直到今年七月中国国民党军阀的强占中东路。凡此一切，都明显的证明：战争危险的日益逼近和资本主义稳定的腐朽和动摇。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他的对美政策的“变更”，美国总统凯洛的禁止战争公约，以及德国赔款问题的会议（以杨氏计划代替道威斯计划的问题），都只是和平主义的假面具。英国工党政府和美国的谈判，甚至于临时的协定，都不能避免英美之间的武装冲突，却正是准备武装冲突的步骤。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之前，也有过这一类谈判和协定的尝试的。至于杨氏计划（德国赔款分配）问题，华尔加（Varga）同志说：这一计划的实行，可以缓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

第十次执委会大多数都反对这种意见，大家一致通过的意见是：“杨氏计划对于德国赔款的重新整顿，不但不像改良派所说的一样，仿佛可以削弱帝国主义的矛盾，恰好相反，他正要引导到帝国主义营垒里的剧烈冲突，（英美互争赔款银行的支配权，德法之间的对抗，而且因为德国更加引到帝国主义反苏联的军事政策的战线里去，所以反对苏联的财政封锁，以至于武力干涉的危险，也要更加深入”。总之，帝国主义的列强，进行所谓杨氏计划，只不过使社会改良派又多一个“证据”，来宣传和平主义的荒谬的

超帝国主义理论。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据共产国际的估量，只是血腥气的乌托邦。财政资本独占性企业的国际混合（国际的卡德尔，投资联合会，杨氏的国际太上银行的赔款分配计划），不但不能减轻战争的危险，恰好相反，正在加强这种危险，造成一种前提，使将要到来的战争变成全世界的战争，变成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

至于资本主义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第十次执委全体，也给了极明显的分析。布哈林同志在第六次世界大会上，说“第三时期”的时候，只说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改造时期”，却没有说苏联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当时就指出这种分析根本不对，而且不能解释：为什么第三时期里反苏联的战争危险更加厉害起来。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于布哈林这种观点是纠正了的。本来，所谓“资本主义的改造”问题，是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问题。机会主义的右派，看见现在资本家实行合理化和发明新的技术，便说是“第二次的工业革命”来了（美国共产党代表洛夫斯敦^①）。其实，合理化和新技术的问题，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改造”或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问题。第一、现在的新技术，一大半是军事工业里的新发明；第二、独占性的资本，对于技术的进步，给了一定的限制，独占性的资本是有阻障进步的作用的（列宁）；第三、新技术现在虽然有些大的进步，可是，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不相关联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就有人误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认为合理化的主要特点，是技术上的改良，因此，主张不要反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只要反对合理化的“有害的结果”。当时德国代表团就反对这种观点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主要的并不是技术改良，而

^① 洛夫斯敦（Loveston）和彼彼儿（Pepper）是美国党出席第六次世界大会时“多数派”的代表，现在已经开除出党。

是“改组工作过程”，就是加重对于工人的剥削，以增高劳动的生产量（例如，工厂管理和监督的加严，分配工人的工作增加等）。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合理化，是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一方面严密的组织工厂管理，竭力减少浪费的时间，而真正增加生产，别方面，却并不增加工资，并不减少每天的工作时间，并不增多对于劳动的保护（保险制度改良，医药休养的津贴等等）。所以资本主义合理化，反而是增加每天工作时间，更使劳动条件恶化。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合理化，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对立起来；决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仿佛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又有“新的资本主义”的可能！

第十次执委全会上，虽然没有人公开起来拥护资本主义改造论，但是，华尔加同志却提出工人生活程度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国家里，只能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不能说工人阶级生活程度低落。他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国家内，现在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绝对的恶化，而只是相对的恶化。他甚至于说，因为合理化的关系和新技术的关系，工人的工资有增高的情形。华尔加同志是被资产阶级的统计所迷住了！他的意见显然是机会主义的。第一、他说工人阶级的全阶级的时候，没有把失业的一千一百万或一千二百万工人算在里面；第二、他没有把中国印度等殖民地落后国家的工人算在里面；第三、他只根据工资统计的平均数，没有注意工人贵族所得的较多的工资数目，把工人群众的很少的工资数目掩盖起来了；第四、他没有注意工人劳动的加强，和工人健康的消耗，以致于工资的程度，到处都比劳动力价值的程度来得低。第十次执委全会完全反对他的意见，而特别加重的指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低落。现代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这样一个时机，——私有财产的关系，已经和工人阶级生活程度的增高，完全不能相容了。

再则，关于国内国外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布哈林同志在第六次世界大会时，就有一种倾向，以为帝国主义的国际矛盾是在加强，而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却在削弱。他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是有来源的。他所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里说：“财政资本，把大资本主义国家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了”。列宁在这句话上批着：“没有消灭！”最近，第十次执委会的前几天，布哈林同志发表两篇文章，又说：因为财政资本统治着的缘故，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有组织有规划的资本主义经济排挤那自由竞争；所以，竞争式的斗争从国内移转到国际关系方面去了。第十次执委会，对于布哈林等的这种意见，加以严重的驳斥：“调和派对于资本主义国内矛盾削弱的观念，以及认为国内市场有组织的可能，无政府状态完全只保存在世界市场上的观念，照最近几年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看来，是不合事实的，而且这种观念事实上是对改良主义的思想投降。”

至于资本主义里新的阶级关系，社会民主党及其左派的作用问题，世界第六次大会时，也已经有过争论。当时的右派和调和派，便否认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性。他们现在，更否认社会民主党法西斯化的趋势。社会民主党，自己以为是民权主义的政党，一方面反对共产主义，别方面亦反对法西斯主义，仿佛这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反对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右派和调和派，却学习着社会民主党的这种论调，否认社会民主党的法西斯化，机械的把法西斯主义和民权主义对立起来。右派还说：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九年便用屠杀政策，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不说社会民主党法西斯化呢？其实，社会民主党当时还只有法西斯主义的一些零星的成分。现在，资本主义发展里的新的阶级变更，使社会民主党，有系统的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混合生长起来，黄色工会的工会官僚和资本家的工业管理机关，混合生长起来，他们开始有系统的宣传“工业和平”和

“经济的民权主义”，要想阻滞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偶然的实行武力屠杀，而是无耻的宣言，说要实行独裁制——资产阶级的公开的独裁制（今年六月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开会时的演说）；——这就已经是完备的十全十美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了。而“左派”社会民主党，却散布一种幻想：仿佛“左派”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站在在野党的地位，而加以批评；其实，他们正在阻碍社会民主党崩溃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赞助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总之，国际社会民主派，都有法西斯化的趋势，德国的是已经实现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英国的工党，也正在走上这条路去。至于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如英国的独立工党等等，都是赞助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在野党”(Opposititon)，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化，尤其危险。共产党必须坚决的实行反对这些派别的斗争。

三

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从世界第六次大会以来，很明显的表示着高涨起来的形势：德国鲁尔区域工人群众反对闭厂的运动，法国青年下半年的罢工潮，波兰洛市的纱厂罢工，澳洲运输工人的罢工，美国南部的罢工潮流和许多革命工会的成立……尤其是今年五一的国际示威；德国柏林工人群众，抵抗社会法西斯党的压迫，以致于武装的巷战。“柏林的五一事变是德国阶级斗争的转机，要加快德国工人运动的革命高潮的速度”。右派和调和派，曾经想说广州暴动是盲动主义；现在，他们竟公开的说五一巷战，是盲动主义的德国共产党中央牺牲群众的举动了！可是，柏林工人的英勇斗争，事实上能够打退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禁止五一示威的企图，并且影响到其他欧洲各国。第十次执委全会，完全赞成德国共产党中央的策略：“能够对于反动一步都不退让，并且不受资产阶级的挑战，而轻易在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去发动武装暴动”

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潮，表示于：（一）工人经济斗争从小的战

斗过渡到更大的更群众的；(二)工人群众更多的转到反攻的形势；(三)无组织的工人一天天的更加积极起来；(四)冲破工会的合法主义；(五)罢工运动更加政治化和革命化；(六)工人运动国际性的表现，一直到殖民地以及英国都同时有罢工的潮流。

改良主义工会的法西斯化和工人运动的高潮，恰好引起改良主义工会运动里危机的生长。这种危机，表现于改良主义工会的衰落(英国)，群众的革命工会的形成(美国，拉丁美洲，印度)；表现于群众对于工会官僚的不信任，同时，社会法西斯派和工会官僚也就进攻赤色工会和工会里的革命反对派，广大的开除革命工人的会籍，甚至公开的宣言“开除几十万人也所不惜”。改良派工会现在更加厉害的取消工会里的民主主义，对工会内的革命反对派(赤色职工国际派)，提出一种所谓“Beveres”的办法，(哀的美敦书式的提出许多反动条件，要革命的会员签名反对共产党等，否则，就要开除)。而且改良主义的工会，很明显的有贵族化的趋势，其中交纳会费很多的会员的百分数，有极大的增高。总之，革命高潮之前，一方面工会官僚明显的反革命化，和资本家及国家机关混合生长，别方面，群众的左倾日益厉害。社会民主党的法西斯化也正因此而格外加紧。

可是，右派却说现在并没有革命高潮的形势。他们的理由是：前几年英国有总同盟罢工；中国的大革命，我们没有说“第三时期”和“革命高潮”，何以现在又说是高潮呢？这种观察，就是完全没有看到群众运动性质的不同，和社会民主党及黄色工会的丧失群众信仰，这就是完全没有看到“第三时期”里无产阶级先锋的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加强和独立性的增高——“阶级反对阶级”的新口号，是英国总同盟时期实际生活所没有的。事实上很明显的：至少德国、法国、波兰、印度，已经明显的表示高潮的生长。至于英国，虽然比较落后，但是英国矿工罢工失败后的消沉状态已经过完；这次工党执政，表示着群众左倾的过程正经过着“过渡

的站头”，对于工党政府的失望，将要很快的促进工人群众更大的左倾。现在的工人运动高潮，国际性和阶级性特殊的鲜明。无组织工人的积极，和经济斗争里工人反守为攻的形势，是现在的特点。而且反抗逮捕革命工人的同情罢工，亦很多的发生。此外，印度的“五卅”已经在完全新的阶级关系上发动了；中国革命受着如此之大的摧残而自发的罢工潮流显然走向新的高潮。还有许多国家里，例如，西乌克兰、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德国、荷兰，雇农和农民都加入了运动。甚至于帝国主义的军队里（法国），都有革命的骚动。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世界六次大会所提出来的；而当时怀疑资本主义列强国内矛盾的剧烈的布哈林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恰好是最为难答复而用猜头的办法躲避的。（参看：俄文本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纪录卷一的第三百九十页及卷二的一百五十三页，和布哈林同志的结论）现在，事实替他答复了！

固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很明显的是：工人运动的革命新高潮的生长，决不能再另外想出一个“第四时期”，而在现在的形势和直接革命的形势之间，筑起一座万里长城！现时的经济斗争已经是到处转变到政治斗争，所以“群众的政治罢工问题，是最近期间决定一切的问题”。譬如八一示威，在会议上特别讨论过，而因为机会主义的堕性，有许多党里还是表现调动群众力量的薄弱，而群众自动的前进，却表示群众左倾的速度，和斗争政治化的趋势。

争取群众的任务，因此格外重要起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共产党必须迎着革命高涨起来的时机，努力去独立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坚决的实行反对社会民主党，尤其是他的左派的斗争。必须在反动的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里工作，打倒改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工会官僚的影响，团结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关于争取群众的任务，右派的机会主义者，往往有一种组织上的拜物

教，仿佛必须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加入了共产党，然后才算是争取了群众。资本主义统治存在的时候，决不能想和平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投票，而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就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也不能只想着合法公开条件之下安安逸逸的把大多数组织到党里来。右派以为如果是秘密党，因此不能公开而没得大多数工人，那就算是脱离群众。这是合法主义和取消主义的观点。决不能这样形式上的统计上的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资产阶级独裁制之下，只能是经过许多普通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等，取得对于群众的直接影响，取得群众斗争的指导权。尤其是更能加紧党的影响在重要的决定一切的地方。最主要的中心区域，最主要的产业部门，要集中党的影响。

为争取群众——工人阶级大多数起见：第一、必须加紧反对社会民主派，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左派，是共产主义在工人运动之中的最危险的敌人，也就是工人群众积极化的最主要的障碍。第二、必须打破资产阶级阻碍共产党影响的其他方法。资产阶级在改良主义的作用低落的时候，正想拚命的救自己的命：用恐怖手段压迫共产党，使他们完全秘密起来，这样来企图割断党与群众的联系。共产党如果不能适应秘密的环境，那就是很大的危险。所以必须一方面反对党的消极态度，而极力去实行反对恐怖的斗争；别方面要准备能够秘密起来，而且更加能够开展群众的工作。

四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的生长，不但表现于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群众斗争的发展，并且还表现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在进攻国内城市和乡村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里，有完全实现的可能。五年计划事实上是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计划，是世界革命的伟大计划，他是世界无产阶级进

攻资本的最重要的队伍。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绩，已经是恢复战前经济程度之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的伟大的工业化的开始。现在再进一步而有五年计划的实行，这就不但是巩固苏联无产阶级独裁的基础，而且是国际无产阶级整个的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共产国际的右派，以布哈林同志为首领，却反对工业化的计划和进攻富农的政策。布哈林同志早就有一个极不正确的理论，就是认为“富农可以生长到社会主义里去”，无产阶级国家里，已经不会再有阶级斗争的剧烈。意大利的谢腊（Serra）同志，甚至于说：要等苏联一切农民都有现在富农的生活程度，那时，方才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化”（设立苏维埃国立农场，组织农民的集体农场等等）。所以，右派和调和派反对工业化的计划，反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新经济政策之下，主要的只好用市场竞争的方法，去渐渐压服富农，所以决不可以对于富农加重租税，决不可用“非常办法”，决不可以“过分的”投资到重工业和机器制造的工业里去，免得富农反抗，以至于农业退化粮食不够。布哈林反对现在苏联中央和国际的政策，认为这是要“引起农民暴动”，以至于使“革命灭亡”的政策。这种立场，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稳定，估量得过分，甚至于说资本主义改造，要产生有组织的新资本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却估量得不够，不承认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造，反而说苏联倒只可以用市场竞争的方法。这种机会主义的右派，显然是捣乱无产阶级的队伍，而投降资本主义。

第十次执委全会，完全赞成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对于布哈林等主张和立场，加以严重的驳斥。

五

至于殖民地革命运动，尤其是印度，也显然高涨起来。中国一年来的罢工潮流日益紧张，农民暴动和游击战争继续发展。固

然，中国现在还没有革命的高潮，可是，现在还要说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中国资产阶级开辟了资本主义长足发展的道路，还要否认中国正在走向革命的高潮，那真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废话！而且中国革命对于一般东方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有极伟大的影响。一九二八年印度的工农革命运动，已经很明显的表现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的斗争方法：孟买和嘉尔古德的工人站在革命的前线，已经不但反对英国印度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并且反对背叛独立运动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今年四月直到现在的孟买纱厂罢工之中，并且表现出所谓民族运动的“左派”（印度独立同盟），包办着印度职工会大会的，一开始就公开的实行工贼式的破坏罢工政策。

中国革命不但使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以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并且加紧了各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分化。过去一年之中，殖民地上差不多到处都是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的营垒里去；而且小资产阶级的上层领袖，亦脱离民族革命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到处发动反共产的运动，反对共产国际“干涉内政”；有些地方，他们一定要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拿着武装起来反对苏联，参加反苏联的战争，中东路事件是很明显的例（我在七月八日会议上说过南京政府的反苏联战争，而七月十日便发生中东路事件；这亦很有趣的了）。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不是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赞助帝国主义巩固其对殖民地统治的力量，现在已经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客观上造成发动平民群众的形势（像一九一九年那几年似的），而是民族资产阶级企图用民族的社会的武断主义(National And Social Demagogy)，来控制群众，制造御用“群众团体”，压迫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在野党”“左翼”，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便帮助着迷惑群众欺骗群众，努力维持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卖国的降服于帝国主义的奴才统治。

这种地方，有着革命的“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但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并且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这一运动之中的领导权。共产国际的任务，就在于竭尽全力去赞助群众的共产党的建立和巩固，——只有共产党，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将要到来的巨大的革命战斗之中的先锋和指导的力量。现在的时期，殖民地上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彻底的民权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有决定一切的重大意义；而共产党对于工人的经济斗争，以及农民运动，直到反对帝国主义政权和当地统治阶级的总的政治斗争，都要有坚决的独立领导的策略路线。然而右派〔例如印度的鲁易^①〕，却主张一定要等到民族资产阶级“积极的仇视工人”方才可以抛弃联合他的政策，右派还认为印度的国民大会，是独立运动的健将。

机会主义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表现，便是联合反动的资产阶级，或者主张投降小资产阶级而组织两阶级的政党（鲁易），再“进步些”，至少也要专门去联合富农；并且同样有抛弃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而专做“反帝运动”的主张（彼彼儿），同样有合法主义的投降国民党工会领袖的主张。至于殖民地工业化，殖民地非殖民地化的理论，或者中国资本主义稳定，还有长足发展，甚至于会发展出中国的帝国主义的理论，——这不过是社会民主党“健全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稳定万岁”的整个机会主义的政纲，一切合法主义妥协主义取消主义策略的张本！

因此，第十次执委全会说：“殖民地上的共产党里，亦必须加紧反对右倾的斗争——殖民地共产党里的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的传达者，他们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藉口“党内和平”的口号，要用防止党内纠纷的名义阻

^① 鲁易（Roy）已经在德国右派“反对潮流”报上做文章，骂共产国际，并且已经退出共产党。

止反对右倾的斗争，只不过调和主义的表现，客观上是赞助机会主义的。

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共产国际的任务是要争取工人阶级群众，调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拥护苏联，准备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而走向“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各国共产党，不肃清公开的暗藏的机会主义分子，便决不能顺利的前进，去解决工人运动的新阶段上阶级斗争剧烈起来的新任务”。

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 反倾向斗争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节录）

（1929年3月）

米 夫

近几个月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巩固党的队伍和制定政治路线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两个大会对中国的总政治形势做了估计并规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主要工作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为提高战斗力并使党的策略更加适应目前斗争条件而采取实际措施的原则基础。肯定指出下述情况，我们恐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路线，现在正逐步地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使它在广大党员群众和同情我们的群众中日益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成就，但仍远未克服全部困难。至今，党员群众中还严重地存在着组织涣散和互无联系的情况，党还远远没有消除因反动派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猖獗而出现的党组织联系严重削弱的情况。与此同时，由于对目前党的政治状况和在目前条件下党的路线理解不透而产生的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在党的队伍中也并非孤立现象。这种种情况都严重阻碍着党开展活动。

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一项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克服一切思想上的动摇，因为这些现象只能降低党在政治总形势中的作用，影响党的发展壮大。有些党员意志薄弱、极不坚定、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对革命活动灰心丧气，从而偃旗息鼓，放弃同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党首先要防止这些党员所造成的危险。当然，还不能说这类情绪在中共党员中已非常普遍。沾染这种情绪的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减弱同各类取消主义观点进行坚决彻底的思想斗争的必要性。在革命失败和工人运动遭到迫害的形势下，这类情绪可能会影响和左右一部分在革命高潮中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过斗争的工农群众。

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已经显露出这个过程的一些征兆了。对它们可能产生的危险，我们不可小视。更何况中国当前的形势提供了某些因素使人们产生和散播一些幻想，似乎中国的经济能够在现政治制度的范围内得到发展，中国能够通过和平方式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革命运动再次出现新高涨则是完全无望的了。反动派破坏了革命组织，镇压了群众运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瓦解了党的队伍，南京政府的执政者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这一切都被过分渲染，因而产生了革命已完全失败，革命已毫无出路的想法。另一方面，对于因内战稍有停息而出现的局部经济复苏却又估计过高。于是这种过高的估计就造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稳定和经济开始和平地健康发展的幻想，因而可以从日程上取消新的革命激荡。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帝国主义列强许下种种诺言，承认关税自主和以南京政府为首的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而对此人们则信以为真了。

对中国国内外形势的乖谬看法会得出极端错误和严重危及党的命运的结论，即取消必然到来的中国革命高潮的结论。

.....

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各项

密切相关的基本任务还丝毫没有完成，对以南京政府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说来，这些任务也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造成中国经济分裂局面和反映在政治上的基本矛盾，必将更为激化。因此，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修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六大制定的关于更为广阔、更为强大的革命新高潮必将到来的相应决议。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实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丝毫否定不了，反倒只是证实了这种前途。很清楚，在这种条件下，使群众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党员中间不应存在气馁、悲观失望、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等情绪。这种种有负于形势要求的情绪应当坚决予以克服。党要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好，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影响，首先要领导起工业无产阶级，使劳动群众做好准备去推翻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当革命危机来临时，群众是否作好准备和团结起来，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影响是否有力和广泛，就决定着行将到来的阶级搏斗的结局。在打着共产党的旗帜组织和发动群众方面，共产党人不应稍为懈怠，不应坐失良机。

即使我们可以设想，在两次高潮之间会有一段稍长间隔时间，即使可以做这种考虑，即中国未来的革命高潮可能延缓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这段间隔的时期也不会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平静顺利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动荡，将是一种较为经常的现象。农民群众的饥荒和赤贫化，随之而来的农业危机日益加深，在这个时期也会使基本农民群众同骑在他们头上的剥削阶层发生许多冲突。城市居民日益贫困，中国无产阶级遭受极为残酷的剥削，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些部门必然发生的危机——这种种情况都会激化劳资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加紧压榨，必将相应地引起劳动群众的反抗。还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还将出现因军阀争斗引起的武装冲突。简言之，将来的局势不大可能是和平的、宁静的。党的任务就是要不停地利用每一次冲突来扩大

自己的影响。不能放过任何一次国际帝国主义的暴行，任何一次劳资纠纷，任何一次农民同地主、士兵同军官的冲突。这一切情况，党都应用之于加深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扩大群众运动。

同时，利用一切合法条件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是完全必需的。但是，这时党应当防止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在当前斗争的实际中已开始形成，并表现为个别同志过分醉心于合法主义。这些同志借口要使自己的工作适应新的客观条件而滑向拒绝完成解放斗争既定根本任务的道路。的确，现在坚持“降低党的政治口号”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条件的人暂时只是个别的。还有些同志用同样的腔调提出要“避免对政府的现行制度进行革命的批判”，其理由是不要过早地打草惊蛇，使政府机关起而反对我们。另一方面，端正政府机关的路线以及由党的地下组织批判政府机关的活动等做法，都被看作是“不符合现实条件”，“不切实际和不合时宜的干涉”，“实际工作中不必要的障碍”。这类情绪继续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贬低地下党的作用，放弃革命斗争的根本任务，用取消主义的态度来迁就现有工作条件。党根据新的条件来改变工作的方式方法时，不应删削减少自己的主要口号，应当巩固党的秘密组织，提高党的威信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此，党应当毅然决然地克服那种近似公开的取消主义的合法主义倾向。

自然，这种取消主义情绪是同我们在本文开头就谈到的那种悲观失望、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现象有直接关系。不管这种情绪在党员中间散播的面多么小，阶级斗争的整个逻辑和经验都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地把它们清除干净。由于从前对国民党采取的尾巴主义政策，这些情绪有复萌之势，且有所增强，因此要更坚决地予以清除。

问题在于现在“统治着”中国的国民党，除了对共产党人使用疯狂的恐怖手段和极为残酷地镇压工农革命斗争的一切活动之

外，还竭力影响和控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群众。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困难的工作局面，动用国家机关的全部力量去散布幻想，好象国民党决心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决心采取一系列社会措施来改善工农的境况。国民党此举暂时并非无所成就。为了这个目的，制定召开国民大会的草案，制定南京政府劳动局关于缩短工作日和工人参加分红的社会改革的法令草案、颁布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法令。当然，所有这些草案都是一堆废纸，骗人的空话，是从来也不打算付诸实施的。但是，这并不排除国民党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在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间找到一些上当受骗而真心相信国民党的作用并甘心听命的人。甚至在个别共产党员身上也会发现这种混乱思想，而这种思想必然使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例如，有个别共产党员竟主张必须支持国民党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的口号，还可以从另外一些人的嘴里听到“不要动摇国民党的口号”的说法。

不克服这种尾巴主义的情绪，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坚决斗争，而这远不是什么次要任务。不推翻同国际帝国主义、中国反动势力休戚相关的国民党政府，要解决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消灭封建残余这两项中国革命最初阶段的基本任务，那是不可思议的。而要使群众做好准备去推翻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其前提则是坚决地揭露国民党的政策，与南京统治者散播的各种幻想进行英勇的斗争。

上面我们指出的个别共产党人的错误，具有共同的内因，反映出资产阶级思潮已经渗入到共产党队伍内部。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堕落到公开的取消主义的合法主义，对国民党实行尾巴主义，这一切都是充满了改良主义臭气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管这些情绪散播的面多小，它们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内右倾危险日益增长的信号。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摇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中国共产党凭以往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的阶级搏斗的经验，

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我们并不怀疑，中国党能够及时防止这种危险，不让它播散，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国党会用批判的武器及时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摇摆现象，定能在社会上接近我们的群众中间，对这种摇摆现象予以足够有力的抵制。

中国党在反对右倾危险的同时，不应停止系统地克服“左”倾的工作，因为这种倾向特别是在基层组织中间还远未清除干净。“左”倾的后遗症还表现在时而此处，时而彼处不断地冒出一些由于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实现的盲动计划。个别共产党员表现出革命的急躁情绪，指望革命新高潮会过早地很快发展起来，过高估计反革命营垒崩溃的强度和深度。他们仓卒地下结论，说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反动政权必将更迅速地走上全面动摇和崩溃的道路”。这样过分估计革命新高涨成熟的速度引出了类似“打倒土豪、劣绅和地主”的口号。甚至在最近的一些通函里，我们见到这样的号召：“大家到土豪、劣绅、地主家里去过过年”。这些“左”的喊叫未必能提高党的威信，未必能加强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感。

从另一方面看，“左”倾现在还表现为“不愿进行日常的预备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不承认为局部性口号进行斗争的合理性”。不用说，首先因为不理解群众工作和工会工作的全部重要性，再加上不理解革命正确利用合法条件的必要性，就会造成党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异常严重的危险。这样，争取劳动群众并使之革命化的任务，将成为纸上谈兵。如果党不消除脱离广大工农阶层的危险。这将是不能实现的。个别共产党员不适应和不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对劳动群众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应继续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群众这一基本任务的障碍。这项任务必须为全体共产党员所理解并全力实现之。

由于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党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应当特别重视反帝斗争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强

调指出，“低估反帝运动，放弃争取运动的领导权的斗争，是极大的错误”^①。然而，中国共产党对这个运动至今未予足够重视。不久以前，我们亲眼看到，因日本占领了山东省部分地区，反帝斗争又明显地蓬勃发展起来了。党并没有十分积极地参与这个过程。近几个月来，汉口的抗日运动颇有声势。但即使在汉口，党也没有利用一切时机。的确，汉口的抗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英国人策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某些阶层鼓动起来的。对这场运动的结局不应抱有什么大的希望。同这些或那些外国资本相联系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个别派别，为了某个外国资本的利益，会掀起虚假的反帝运动来反对相与竞争的另一个国家。同时也不能排除，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的领导威望也会试图吸引部分劳动群众参加这场虚假的反帝斗争。当然，资产阶级将扼杀一切反帝斗争，因为在斗争中，群众会越出民族资产阶级幕后谋划的框框，而表现出独立性。很明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也不应该对资产阶级的种种举动袖手旁观、缄口不语。姑且回顾一下列宁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怎样论述如何利用资产阶级各种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如何利用自由主义者与黑帮地主之间的冲突的吧。列宁把过低估计革命新高涨酝酿过程中的这类现象称之为“与正常相反的真正的孟什维主义”。

“俄国革命的经验，如同其他各国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如果存在着形成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那么最细小的，似乎同革命的真正起因毫无关系的冲突，作为一个口实，作为使杯子里的水满得溢出来的一滴水，作为情绪转变的起因等等，是会

^① 引文与文件原文略有出入。中共六大决议第十三条指出：“忽视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去力争领导，是异常之错误的”（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5页）。——原编者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①

在“到处布满易燃物”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虚假的反帝斗争，在中国也可能成为远远超出“中国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之间细小冲突的范围的‘事件起因’。当然，党不应认为这些冲突具有‘独立自主的意义’”，不应“对纯粹资产阶级的把戏虚与委蛇。但是，‘一个领导整个解放斗争的阶级的党，应无条件地利用一切冲突，使它们加剧，扩大它们的影响，把它们同我们的革命口号的鼓动工作结合起来，把有关这些冲突的消息带给广大群众，唤起他们独立地和公开地进行斗争，提出自己的要求等等’”。^②

在中国，共产党也应当争取吸引最广大群众来参加反帝斗争，应当维护群众在运动中的独立性，应当不放弃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假反对派的斗争作为理由来争取本党的领导权。这时，共产党应当坚决果断地揭穿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实质，应当把反帝运动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因为后者业已沦为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帮凶。

除了提高党在反帝运动中的积极性之外，同时还要开展争取群众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加强在群众组织，首先是在团结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的活动。如果党不能通过自己的影响争取工人阶级群众，如果党不能巩固这种影响，不能掌握整个工会运动，那么党在中国革命中就发挥不了领导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想分析一下与罢工斗争的扩大和改良主义的黄色工会的发展有关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来参加罢工的人数已达二十万，而且这些罢工多数带有自发性。这些事实证明，工人群众的情绪已经有了一定的转变，正在克服意志消沉的状态。当然，不应过高估计这些现象。但这些现象毕竟还是无可辩驳地为共产党的工作创造了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1卷，上册，第162页。——原编者

^② 同上书，第163页。——原编者

比以往更为有利的条件。工人阶级情绪局部转变的开始，应促使中共在中国无产阶级中间更加积极地开展活动。因为改良主义的黄色工会的作用增大了，它们企图控制工会运动并使之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所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大了。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压迫下，革命工会组织的会员减少了，这时黄色工会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控制工人阶级的人数方面，都有了发展。因此，中国党要更加重视这个方面的工作。党应当尽最大努力恢复和巩固阶级性的革命工会。同时，在反对国民党对工会实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党应当加强本党党员在这些黄色工会中的活动。共产党应当把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工人争取过来。党应当为全面的工会民主，为在黄色工会中自由选举领导机关而进行斗争。在党的工会工作中，罢工斗争现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党应当把它们组织起来，置于自己的领导权，揭穿黄色工会头目们的妥协和叛徒嘴脸。

现在，我们来做总结。我们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方面的工作。我们没有谈到那些不言而喻的，诸如组织和团结党的队伍，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党等的任务。不做这些工作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同样，我们也没有涉及开展一场更为严肃的运动来反对谭平山和陈公博集团一类新政治派别的迫切性，对于党来说，这是刻不容缓的。本文的任务不是详尽阐述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目前面临的为数极多的，各式各样的任务。我们只想集中精力来分析那些根据总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所提出来的那些最重要的任务。

因此，我们强调指出的，是目前在个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间日益增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各支部提出：右倾危险是主要危险，同时又指出，不久前“左”倾是中国党最主要的危险这一特殊情况。因为，这段时间内，

情况有了本质的变化。“左”倾已经失去了一定的土壤，失去了起初的那种锐气，而右倾摇摆在近几个月党的实践中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机会主义错误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但它们现在已经成为展开党的活动的严重障碍。这些错误还表现为对总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歪曲解释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作用，在利用合法条件方面采取错误的策略，贬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秘密组织的作用。这些错误在农民问题上又相应引起了一些新的机会主义错误。关于这一点宜专文论述。因此，共产国际在最近下发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和给中共中央的信^①中指出右倾“是当前形势中特别危险的倾向”这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件，使正在增大的右倾危险更为加重。我们不妨举例说明一下。如果说德国党通过刊物和召开专门会议或用其他方法能够系统地领导各个共产党团和个别共产党员的活动，能够纠正个别党员的错误路线，那么在中国，这种领导方法就要遇到一系列客观困难。正因为如此，党应当立即用思想影响的办法来防止右倾危险，记取以往机会主义的做法的严重后果，不让右倾危险进一步发展。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正在坚定不移地执行共产国际和党的六大决议的本届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全体党的积极分子，定能实行这一忠告，从而使党免受机会主义摇摆的危害。

(摘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① 指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1—18页。——原编者

国际共产党反右倾的斗争（节录）^①

亮 萍

布尔塞维克主义，是在不断的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

（一）总的国际政治形势的估计

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上，尽了非常伟大的作用。这次大会，把现在的世界形势，作了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估计。根据于这个估计，他决定了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六次大会把国际上反托洛斯基主义的斗争，作了一个总结；他指出以后“最主要的反党路线，是右倾”。六次大会的这句话，在过去一年全世界共产国际的生活中，都已经完全证实了。在六次大会以后，各国党内（尤其是苏联，德国，捷克斯拉伐克，波兰，美国等）的右倾分子。开始激烈的反对六次大会政治路线的斗争。他们在现在世界政治形势的估计及各国共产党实际任务的确定上，都与共产国际采取截然不同的意见。因之，他们的策略路线和工作方法等等，也自然和共产国际两相分歧。

现在我们首先说目前世界政治形势的估计。

^① 此文的（一）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八）、（九）发表在同一刊物第3卷第2、3合期。——编者

六次大会，指出大战以后资本主义恐慌发展的三个时期。我们现在正是处在战后资本主义恐慌发展的“第三时期”上。第三时期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三时期，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程度，并且在有些国家里，在有些工业上，甚至已经超过。资本主义生产，经过极大的改造（生产合理化）。可是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现在整个战后的帝国主义制度，发生极大的冲突。战后帝国主义国家，所有的商品市场，非但没有增加，而且甚至减少（苏联之脱离资本主义经济，欧洲国家工人及一般劳苦群众的贫穷化，殖民地国家的工业的发展等等）。此外，这个市场的分配，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譬如美国有这种发达的生产，而几乎没有扩大自己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市场；德国也是如此）。在这种的客观情形之下，帝国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遂日益尖锐化起来。第一、帝国主义为着维持本国生产的发展，就不得不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旧的帝国主义霸主（英国）竭力想保持他的原有地位。新的帝国主义健将（美国）拚命想扩大他的势力范围，要求“门户开放”，要求重分殖民地。于是帝国主义自身间（尤其是英美间）的冲突，就日益尖锐化。第二、资本主义稳定的主要基础，本来就是对于工人阶级剥削的加紧。现在对于市场的激烈斗争，更使资本家不得不减低价格，以与他国竞争，要减低商品价格，就必然要进一步的向工人进攻（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等）；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化（工人劳动强度的加重），于是就特别加紧地往前进行，资本和工人的冲突，也就日益带着更剧烈更尖锐的性质。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尤其往下衰落的英国）要维持其经济地位，不得不加重对于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但他方面，战后殖民地国家工业的相当发展，使这个国家里增加了一枝新的革命生力军（工业无产阶级）。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在战后也得到相当的发展。民族独立的要求，和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压迫，同时加重起来，这样，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中间的冲突，也就

更加紧迫。第四、帝国主义和苏联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这是两个不能调和的敌对的制度。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建设可惊的发展（尤其是在开始实行伟大的五年计划以后），使帝国主义对于苏联的仇恨，更形刺骨。帝国主义把本国工人运动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发展，都归咎于苏联。苏联已成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眼中钉。帝国主义和苏联的冲突，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扩大，而更加剧烈。

这些根本矛盾的尖锐化，使腐朽的、不稳的资本主义稳定，更加动摇。在资本主义稳定的内部，发展着一种破裂资本主义稳定的力量。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形成资本主义稳定的基础，可是他方面，在战后资本主义恐慌的特殊条件之下，他又使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更加尖锐化，而造成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力量和条件。这正是革命的辩证法，这正是第三时期上世界形势发展的特点。

根据于这个第三时期的估计，国际指出现在国际事变发展上的主要特点，是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准备，新的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左倾。因之各国共产党目前的根本政治任务，是反对新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保护苏联，获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准备最高形式的革命斗争——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

六次大会以后世界事变的发展，充分的证明了这个估计的正确。英法间的军事协定，美国大批战舰的建造，新加坡军港的加紧建筑，印度军队的改组与扩大，各国军队的充实（日本，法国等等），法国全国皆兵案的通过，航空事业之竭力扩张（尤其是德国的宰配林飞机的成功，引起全世界的注目；美国现向德国定造多架宰配林飞机），各国军费的激增，军用工业的扩大，各国自愿武装组织的兴起（如意大利，波兰，捷克，法国，德国，美国等等）的法西斯蒂武装组织），各国爱国主义宣传和军事教育的加紧

……这些事实，指示些什么呢？他们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美法）准备战争的激进。东欧各国（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中间的秘密军事协定（显然是对付苏联的），阿富汗的事变，印度军队的额外扩张（即英帝国主义自己所派的西门宪法调查团也“痛诋印度之军队改编，认为其兵力超过当地需要”），各国资产阶级报章不断的反苏联运动，以及最近的中东路事变等等，更证明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加紧和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的激增。波兰洛慈的总罢工，德国鲁尔区域及其他地方的巨大经济斗争，法国北部纺织工人和矿工的坚决的罢工，捷克五金工人和农村工人的罢工，印度孟买工人的总罢工，各地工人对于警察的武装反抗，德国共产党在工厂委员会改选上的胜利，柏林五月的巷战，美国纽贝特福特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纽奥玲电车工人的总罢工，八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盛大示威运动，这许多事实，都表示出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和工人群众的左倾。

共产国际十次扩大会议根据上述这些新的事实，比六次大会更进一步地指出：（一）国际工人阶级的左倾，已是显明的事实；（二）现在已有新的革命的高涨，这个高涨，不是一国两国的特殊现象而是带着国际性质的；（三）我们应该准备采取更高的革命斗争形式——群众的政治罢工和夺取政权的斗争。

共产国际对于世界形势的估计，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看右派及调和派分子的估计。

右派首先否认资本主义稳定带着腐朽的不稳的性质。譬如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瑞士党的代表恩贝尔特罗（Humbert Droz）说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六次大会实际上已经摒斥了一般的模糊的公式（腐朽的不稳的等等的资本主义稳定），因为这个公式丝毫没有说出确定的意义……”

再次，譬如前国际执行委员意大利代表适拉说道：（一九二九

年三月)

“如果像德国同志那样，说德国资产阶级的稳定，是腐朽的，那么等于闭着眼睛，不看事实。”

再如德国调和派的代表美以尔说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台尔曼同志（德国中央负责同志）怎么能说一九二八年的资本主义稳定比较一九二六年更要腐朽些呢？……”

所以右派及调和派分子，以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稳定，不是腐朽的不稳的，而是健全的巩固的。他们以为像德国同志那样说的人，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可是上面我们所举的事变，正是证明他们自己“闭着眼睛，不看事实”。难道上述这些革命事变和斗争，表示资本主义的健全和巩固的稳定吗？事实正和右派及调和派所说的相反。

右派和调和派分子既然以为现在资本主义稳定，是健全的巩固的，所以他们便能进一步承认：

“现在发展着的巨大斗争，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及资产阶级政权腐败和衰落的时候，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及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加强了时期”（恩贝尔特罗的演辞）。

“……可是中央不愿意看到别一方面，即经济迅速发展的一方面，这种发展是说：现在相对的资本主义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得到巩固，因之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更巩固……”（摘自德国爱浮尔德等调和派的宣言）。

所以右派分子对于世界形势的分析是：资本主义的稳定，不是腐朽的不稳的（这样说来，自然是健全的和巩固的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权是已经“加强了”“巩固了”。这种理论，和社会民主党歌颂资本主义“复兴”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右派及调和派分子，显然地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接收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他们没有看到，更正确的可以说，不愿意看到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他们抛

弃了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需的“客观事实的科学的分析”(列宁),实际上他们已经陷入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烂泥坑中。

根据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形势的分析,所以产生了两条绝对不同的策略路线。

共产国际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世界形势的分析,以为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准备将要到来的巨大革命事变。可是,怎样去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呢?国际在这上面,指出主要的方法是:独立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从下实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的策略,加紧共产党人在改良主义工会与无组织工人中的工作,拒绝任何与社会民主党及改良主义工会上层分子勾结的策略,加重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尤其是应该更坚决地反对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因为左派以更卑污更精巧的方法来欺骗工人)。社会民主党日渐蜕化为法西斯蒂主义,他企图以法西斯蒂方法(如五月柏林社会民主党警察总监宰几培耳屠杀工人的方法),来阻碍工人阶级的左倾。所以反对社会法西斯蒂主义的斗争,应当带着更尖利更峻刻的性质。没有坚决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共产党即不能有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斗争。

右派和调和派分子,根据他们机会主义的世界形势的分析,以为共产国际过分估计了世界形势的革命性质和工人阶级的左倾,以为大部分工人还是遵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所以共产党人在职工会中,在各种选举运动里,还是应和社会民主党左派上层分子联络。共产党人不应该独立领导罢工以“破裂”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在工会中为避免开除起见,不应该提出共产党的主张。他们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名词,因之,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反对职工国际及共产国际所决定的新的罢工策略,新的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工作的方法,以及新的选举策略(在各种选举运动中绝对拒绝和社会民主党合作,独立提出名单)。根据他们的意见,革命高涨,是遥遥无期

（因为现在资本经济加强，政权巩固），现在我们尽可不必准备巨大的革命事变。实行他们的主张，等于放弃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缴去自己的武装，向社会民主党投降。

两种不同的政治估计，产生两种不同的策略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列宁主义的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准备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路线。右派的路线，是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向社会民主党投降的路线。在这两条政治路线之间，没有共同之点，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

在这上面，我们要对调和派的作用说几句话。调和派非但阻碍反右倾的斗争，并且在许多国家里（如在德国）已经代替执行右派的作用。在政治的估计和主张上，他们实际都是和右派相同的。他们表面上拥护六次大会路线，实际上执行右派的主张，这种行为，对于党更是危险。所以坚决反对调和派的斗争，应与反对右派的斗争，同时进行。

……

（摘自《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

（八）反右倾的斗争和中国共产党

机会主义的领导，是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机会主义领导破产以后，中国党内经过一个非常艰苦的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时期。经过这次坚决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后，我们能否说机会主义活动，在党内已经没有了呢？不能说。机会主义者，还时常蠢蠢思动，企图重整旗鼓，和党斗争。在中东路问题发生以后，这种企图，尤其明显，尤其急进。他们的错误（譬如陈独秀信内所表现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系统的，一贯下来的。现在我们把中国机会主义者的观点，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机会主义者对于世界形势估计如何？

在陈独秀致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信上，这样的说到：

“……最近索性更进一步（指中央），换一句更确定的话说“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现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烈”时期，拿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见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小册子第一〇八页）。

根据独秀意见，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与殖民地革命运动，一定是丝毫没有加厉，世界资本主义，一定是非常稳定，因之他骂中央居然采取“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

陈独秀否认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否认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加紧，否认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外在他致中央关于中东路问题的信里，说中东路问题“不只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且是国际纠纷问题的导火线”，于是定出两个发展的前途。这样独秀更是看不到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底紧迫，否认帝国主义进攻（唆使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明显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世界形势，有显然相反的两种估计。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认为“国际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认为世界革命运动向上高涨；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以独秀为代表）完全否认这些，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右派分子一样，大骂中央的估计“这样的错误……与夸大……”

机会主义者，绝对没有看到，更正确点说，不愿意看到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事实，看到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德，法，波兰，捷克，美，以及其他各国的巨大罢工和更高形式的斗争（如柏林的巷战，各国工人与警察的武装冲突），印度，非洲（如刚果，摩洛哥等），南美近东以及中国的不断兴发的革命运动，都不在机会主义者的眼里。他们根本否认帝国主义

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世界还是安谧太平，这种估计是社会民主党的，他是和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不能并存的。

有了这样机会主义的世界形势的估计以后，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形势，也自然产生一种非常离奇的错误的分析。第一，完全看错了帝国主义的作用，第二，过分估计了资产阶级的胜利，第三，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

中国机会主义者，绝对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者为维持其经济地位起见，一方面加重对于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他方面更激剧地加紧对于殖民地的榨取和压迫。英帝国主义对于印度加紧的掠取，法帝国主义对于非洲加重的剥削（引起广大的黑人的暴动），美帝国主义对于南美更急进的侵略，都证明这点。在中国这点尤其明显，自大革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更加厉害。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山东得寸进尺，尽力扩大经济及政治势力，满洲已实际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英国在南方，巩固香港的经济势力，尽力向两广进取，在长江流域，以上海为根据，也不绝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美帝国主义也同样的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他帝国主义，也莫不恢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南京政府对于帝国主义进攻。总是投降总是屈服。中国机会主义者竟会忽略这样明显的事实而说：“……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同书九十二页）

这样，根据机会主义者意见，帝国主义者竟会根本改变以前的传统政策，对中国资产阶级让步，来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独立的发展，这种不顾事实的分析（事实所表现的却正相反），只有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会做得出来。（读者注意，独秀的这封信，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五号写的。）

对于帝国主义既然采取这样错误的估计，对于中国本国的阶

级关系，也自然发生非常离奇的分析。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高潮，使中国资产阶级，畏惧到极点，于是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残余，来建立南京政府。南京政府，是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帝国主义的工具，反动势力压迫工农的联盟。机会主义者竟会忘记这样明显的革命教训，而说：

“…他（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的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不错，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使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主要的是在工农运动的勃兴，震撼了整个旧社会的基础，吓退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于是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妥协，共同来压迫革命；而不是机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根据机会主义者意见，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这个资产阶级得了胜利以后，对外已经使帝国主义让步，并且甚至获得帝国主义的帮助，在内部呢，封建残余，已受最后的打击。这种估计，实在讲来，和蒋介石走狗颂扬南京政府的话，有什么区别？

机会主义者，只要不是硬闭着眼，总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大，乡村间豪绅地主阶级势力的恢复（在革命失败以后，恢复得很快）以及资产阶级卑躬屈节的投降。二年以来的事实，都充分证明这点。马克思主义者要以客观事实的科学分析为基础。机会主义者把这点完全忘记了，更正确点说，把他完全抛弃了。我们且摘引另外一段话，来和机会主义者所说的相比较：

“……二年以来，不平等条约不独未能废除，且因修约而加一层保障……土豪劣绅，大肆活动……”

你知道这段话，是谁说的？这是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上

海国民党全县代表大会正式宣言内的一段。机会主义者说帝国主义者往后让步，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员自己承认帝国主义利益，更得一层保障，机会主义者说封建残余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国民党员自己承认，土豪劣绅大肆活动。机会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胜利的估计，竟极大地超出国民党本身的估计之上。这真是可怜已极，而且简直是可耻已极！

机会主义者既然幻想帝国主义采取这样的态度，中国资产阶级获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所以无疑地对于自己力量和工农斗争就会发生取消派的观点。他们于是就幻想中国统治阶级会得长期的稳定，说“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说“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幻想群众情绪这样的消沉失望，说党领导工人斗争“是盲动主义”，说各种示威（包括广大群众热烈参加的五卅）是把群众“玩把戏”。这种批评，就是连一丝一毫的共产党意味都没有了。中国的工农，亲身受到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加紧，资本家封建残余剥削的加重，他们坚决地不断起来奋斗，他们决不像机会主义那样闭着眼睛，空口瞎喊“盲动主义”，他们以自己阶级的意识领略到斗争的紧迫，各地工人（尤其是上海）的经济及政治斗争，各地农民对于反动势力的反抗和暴动，各地士兵的变乱等等，都给机会主义者的狂呼，以明白的答复。

根据机会主义者的国内形势的估计，（一）帝国主义，改变态度，对于资产阶级让步。（二）中国资产阶级获得“伟大胜利”，封建残余，已受最后打击。（三）群众消沉，斗争是党的“盲动政策”，示威运动，是“玩弄把戏”，“革命斗争，更加衰落”，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至少在很遥远的将来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什么出路呢？于是机会主义者献策道：

一、“首先要铲除中央盲动主义的精神……”就是说不要发动群众，来作斗争，来作示威运动。

二、“……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斥，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内排斥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斗争……”

关于第一点。在帝国主义侵略，更是加紧，中国经济不断破坏，农村经济，继续破产，工农及城市贫民生活，不绝恶化的环境中，无产阶级先锋的政党，是否可以不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在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日益加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万分紧迫（南京政府已经秉承帝国主义命令向苏联进攻）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先锋的党，是否可以束手不顾，不去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保护苏联”？这种斗争和示威的发动，是否是“盲动政策？”。我们想谁要是还有一些共产党的意识，他一定会说：“党应该起来，发动斗争和示威”。机会主义所说的“取消盲动主义！”就是取消斗争的发动，使中国共产党，变成和平发展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党反对盲动主义，但是党现在更要坚决地反对机会主义的“不动主义”，这种不动主义，会使党放弃革命的任务，实际上等于向帝国主义及统治阶级投降。

关于第二点。机会主义者把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的情形，和中国现在相比，证明要利用“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

这上面首先应该解释清爽原则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是否可以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我们的回答，是：可以而且应该（参看列宁的“共产主义中的左倾幼稚病”）。但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所不同的，即在共产党把公开可能的利用，看作一种工具（而且是次要的工具）来促进群众斗争的发动，（主要的是在群众斗争）社会民主党却把公开可能的利用，本身当作一个目的，而放弃群众斗争的发动。

机会主义者，既然抛弃群众斗争的发动，那么公开可能的利

用，自成一种目的，这样就明显地陷入社会民主党的泥坑。

再次，关于现时在中国利用合法可能的问题。一九〇八年时的世界形势及俄国国内形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及现在中国国内的形势，大不相同。俄国那时有稳固的沙皇政府，群众革命运动又无快要起来的希望，所以列宁和“召还主义者”斗争，主张参加国会，利用公开可能来训练群众，但是他一方面，我们更不能忘记列宁更坚决的反取消派的斗争。取消派主张只顾部分的经济斗争，专门利用公开可能，取消秘密组织。这种主张，等于把自己缴械，向敌人投降。所以列宁一方面反对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他一方面更坚决地反对那些以利用合法手段为主要出路的“取消派”。

中国现在的客观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情形和一九〇八年时的沙皇俄罗斯绝大的不同。党中央的路线“并没有抛弃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十月五日政治局决议案），不过现时在国民党残酷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公开的可能，非常的狭少，而且现在中国群众斗争和革命运动，也决没有一九〇八年俄国那样消沉（现在客观事实指出革命斗争正在开始复兴），所以一方面固然“要利用公开与合法的可能”，他方面更紧迫的，是要直接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作政治的示威。机会主义者放弃群众斗争和示威的发动，而以“利用一切合法可能”为主要出路，这就证明他们还幻想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会有广大公开的可能，证明他们已经陷入“取消派的泥坑”（“国民会议”的口号，是这种主张的逻辑的结论）。

总起来看，我们可以获得机会主义意见的系统：第一，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及殖民地革命运动低落，资本主义十分稳定，第二，中国资产阶级完全获得胜利。帝国主义让步，封建势力受最后打击，第三，党应该取消“盲动政策”（机会主义者所说的盲动政策，即指群众斗争和示威的发动），去利用不带任何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这种估计，和策略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反党的，而

且是违反事实的。

中国机会主义者，非但在时局的估计上，和国际及党采取相反的意见，而且更进一步，在革命的几个根本问题上，(革命性质问题，土地革命问题)，也和党采取绝对不同的意见。在这上面，我们更可以明白看到，右倾机会主义者，已经和“左倾”的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派)混在一起了。

先说革命性质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根据革命的任务，规定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点党内同志都已经十分明了了。

现在我们来看机会主义者的意见。独秀在他的信内，这样说道：

“……封建残余……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的残余……”——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第九十二页

封建势力，已经变成了残余的残余，那么现在统治于乡村中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南京政府既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统治于乡村中间的，又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那么目前中国工农革命的主要目标，自然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样说来，中国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这种理论的错误非常明显。我们只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眼光，去详细考察中国乡村经济，就可以看到，现时在中国乡村中居主要地位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南京政府不是单独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豪绅资产阶级所共有的政权。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所要实现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全部势力，实现土地革命，实行真正的统一。这三大任务，都是资产阶级性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显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机会主义者根据他的“社会主义革命

性”的理论，对于土地革命的任务和动力，就发生错误到极点的意见。封建势力，既成残余之残余，那样土地革命最主要的敌人。就不是地主。土地革命的主要目标，将是对付乡村的资产阶级。这样，无怪陈独秀说：

“……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前书第九十八面）

这个土地革命动力的估计，是和他的“社会主义革命性”的理论相连的。既然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反对农村资产阶级时，中农一定动摇，这是逻辑的结论。他不知道，土地革命根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性质（因他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更不愿意从事实上看到土地革命的目标，顶主要的是对付地主（不知道陈独秀有否研究过去革命的经验）。在这个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富农，因其特殊的经济条件（对于贫农的封建剥削，高利贷等等），一定反革命，可是中农同受残酷的封建剥削，一定能成为贫农和雇农的坚固联盟者。土地革命的柱石，自然是贫农和雇农，但如果没有中农的坚固联盟，那么土地革命必然要受很大的打击，以至被敌人的联合力量扑灭。在民主革命阶段上，贫农雇农如果没有中农的坚固联盟，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机会主义者放弃中农的坚固联盟。把他们看作动摇分子。这正是帮助地主和富农，来破坏土地革命。忽略中农的策略，是托洛斯基派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机会主义者在这上面，已经和托洛斯基派坠入同一的泥坑中去了。

我们已经明白的可以看到，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及战略问题上（世界形势估计，中国形势估计，策略路线等），机会主义都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采取截然不同的意见。这已经不是简单策略上的争论，而是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一个是列宁主义，他一个是孟塞维克主义。伟

大的中国革命，因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已经受到无数的损失和摧残。只有消灭党内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肃清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成份，党方才能够坚决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引导群众，来准备新的中国革命的高潮，以获取最后的胜利。

(九) 总 结

国际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和殖民地革命运动，不绝往前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更加尖锐化。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成为妨碍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实际任务。

在这种历史转变的阶段上，将趋灭亡的资产阶级，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延缓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用出最后的政治工具——社会民主党——来欺骗工人，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在这种历史转变的阶段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共产党——内部，也有一部分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的依附分子，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而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机会主义的动摇(右倾)，是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危险。历史(尤其是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和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我们，如果没有坚决的列宁主义党的领导，那么革命虽有良好客观条件也是不能获得胜利的。所以反右倾的斗争，就成为准备革命高潮所必需的工作。只有肃清内部的动摇，共产党方能毫不犹豫地坚决领导工人群众，去和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斗争，以获得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在坚决反右倾的斗争中，党内有种调和派分子，掩护右派，妨碍反右倾的斗争。在许多国家里，显然的右派机会主义分子被党开除以后，调和派公然在党内代替执行右派的作用。所以反对调和派的斗争，应该和反对右派的斗争，同时进行。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急剧地紧张起来。世界上已经显明地

分划了两个营垒：一方面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反革命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等等），他方面有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殖民地劳苦群众。帝国主义日夕准备的武装进攻苏联，以图消灭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武装进攻苏联，是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危险。在这两方面坚决的斗争中，共产党人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的，犹豫和动摇，就是帮助敌人。机会主义者，在紧急的时候，每易被斗争所吓倒而引起党内的动摇。只有消灭党内任何机会主义的犹豫和动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完成他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合期）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

——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

(1929年8月13日)

(一)

托洛斯基反对派在国际上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国际六次大会断然地排斥这一组织是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反革命的工具，特号召各国党一致地肃清反对派所散布的非列宁主义的思想，消灭他在党内的任何活动。最近，托洛斯基更明显地成为资产阶级最好的朋友，各国帝国主义甚至中国国民党都在利用这一最好的工具，来做反世界革命反苏联以至反中国革命的宣传。

(二)

过去曾经走入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歧途中去的，只要不愿为反革命的，现在多已觉悟认错而回到列宁主义党的旗帜之下，来一致奋斗了。在这时，中国党内忽然开始了他的活动，这并不是无因而至的事，很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在中国党内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反对派思想经过一小部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的传播与宣传，经过中国机会主义思想予他以关于中国革命之共同见解的赞助，加以现时党内理论水平线低微与党内历史纠纷尚有残留，于是反对派在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中，便有他暂时活动与发展的机会。据现时中央所发现的，他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

他的秘密的（对党的而不是对敌人的《新生命》月刊久已连篇累牍地登了托洛斯基的文章）出版物。他也同各国反对派一样地或更加甚地撷拾一些关于个人的非事实的无原则的谣言来攻击党的指导机关，尤其是中央，企图借此团聚一切在某些问题上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分子到他的旗帜之下——反党的旗帜之下。这一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党丝毫忽视。

（三）

中国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与在各国一样地是与党站在两条路线上，站在对立的路线上来进行分裂党之反革命的工作的。他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确也用着列宁的名义来眩惑群众，但中国革命的群众与站在正确路线上的一般党员都会知道他们的活动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现时托洛斯基反对派之乱用列宁名义与考茨基之乱用马克思名义以掩饰其反革命罪恶的并没有两样。

（四）

我们与托洛斯基反对派斗争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托洛斯基主义无论对于世界革命问题，对于苏联问题，对于中国革命问题，都处处与列宁主义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托洛斯基主义最主要的危险便是：不承认一国范围之内如苏联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认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关系，于是乃形成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要从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开始。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党内反对派所特别重视的，也是从“五卅”到现在，他们一贯主张中国无产阶级不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有一时的合作，不应加入国民党，不承

认国民党当时是革命各阶级的联盟，武汉时期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来与国民党对抗，在现在则更不承认有地主阶级与土地革命的存在，不承认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尚未完成，认为现时中国革命已经死灭，故主张现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应只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应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在反对派方面说来，确是一贯而自成系统的，故我们必须指出他的基本谬误，排斥他的整个纲领，然后才能肃清反对派的一切危害于革命的思想；如有人以为托洛斯基主义对于欧洲问题苏联问题虽然不对，但对中国革命问题还有某些部分的见解是对的，这种观察完全是支解了托洛斯基主义，并且可给中国党内的反对派借此为负隅之抗，混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有害于中国党的正确路线之进行。

(五)

托洛斯基反对派不仅在思想上形成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组织上已纯全做了反革命的工具。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从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六)

各级党部及全党同志必须站在国际六次大会及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严重地注意这一问题。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掉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如被劝告而无效，则党必须予

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如有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党必须与之作坚决的理论斗争，且这些同志必须公开承认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同时在行动上必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绝对不容许以自己错误的见解来代替或动摇党的路线。

（七）

各级党部对于中国党内反对派的活动及与其思想上的斗争，须开会讨论，并须有决议的回答，公开地采取断然的排斥以绝其分裂党的企图。每一同志如发觉有人在党内散布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或从事小组织的活动，必须立即向所属党部报告，不应怀着好奇的心理代为隐藏甚至在同志中间反互相传说；这样，必将不自觉地做了反对派的宣传和活动的工具，而有害于党的巩固和一致。

（八）

党更须在一切思想斗争上，在一切革命策略上，严防托洛斯基主义思想之侵入，如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斗争，必须从半殖民地的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互相联系上来认识苏联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好友，苏联是全世界工人的国家，而主张保护苏联，不应如中国反对派只空喊为世界革命而保护苏联的口号而不联系到现实的中国革命阶段中为民族解放利益必须联合苏联的主要内容相联系，如我们在不混淆乡村中反地主的土地斗争之主要矛盾的路线上号召雇农加紧对于富农的阶级斗争决不同于反对派从社会主义革命观点上认为与富农的斗争是目前中国乡村斗争的主要内容。这一切的尝试，都足以妨碍目前中国革命阶段中的策略之正确的运用，都足以阻碍党的一致前进而帮助敌人。故中国党不仅在理论上组织上，肃清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思想与活动，并且要更加严重地注意在一切日常斗争与革命运动上，反对派的非

列宁主义的策略从各方面侵入的尝试。

(九)

在与反对派的思想斗争中，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必须与党内反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与他一无二样地来反对现时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故在现时中国党内斗争的路线一方面是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必须努力于肃清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且机会主义复活的企图在中国党内更有他的历史残留的根据，中国党内的托洛斯基反对派又必然要利用这一斗争，以便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扩大他自己的活动范围。因此我党在无产阶级最高原则之下，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任何小组组织的活动，反对机会主义残留的复活，以肃清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以消灭反对派所能利用的党内基础。党只有在根本肃清这些危害于革命的企图和尝试以外，中国革命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更顺利地进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才更能得到巩固与一致。

中 央

一九二九，八，十三日。

附：

各级党部讨论此通告时，可参看《红旗》关于反对派问题特刊的一切文字。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1929年10月15日）

在现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异常严重，国内的革命斗争日益紧张的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都乘时活动起来，积极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好象与敌人联盟一样的来向党进攻，这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明确的认识，只有坚决的肃清党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党在目前紧张形势中之“拥护苏联”与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同时必须坚决的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推进革命的发展，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思想。

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观点，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

（一）他们认为过去机会主义发生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因此他根本否认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和加入国民党的路线，这就是托洛斯基当时攻击共产国际的观点，已经共产国际批评得体无完肤。在中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是

由于中国党当时的指导机关，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把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变成了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决不是当时暂时联合资产阶级和加入各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根本路线错误。独秀同志不去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于是他遂与托洛斯基主义同样的走入了更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的观点。

(二)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观点。照这样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他让步了，那么，在经济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束缚都没有了，可以坐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矛盾都没有了，自然统治阶级只有稳定，绝“没有动摇”了。这样很简单的取消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自然根本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失败，不是无产阶级失败，而且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得胜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是胜利了，但是对帝国主义是屈服了，因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强，对封建势力妥协了，因之，封建势力又得到一时的恢复，所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一点也没有解除，故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现在的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并且日益加紧，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

(三)他认为“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胜利了”，自然结论到“现在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历史证明这样的观点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是背叛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势力，而得到部分的政权，并

没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而建立他自己一个阶级的政权，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就是这一联盟的具体形式，所以他们内部才包含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正在互相抢夺中国的统治，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正在互争这一反革命的领导权，各派军阀正在互争地盘，遂造成不断的军阀战争，一天一天的走向崩溃的道路。

（四）他们不了解这样的观点，因此得出极奇怪的结论，以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一点矛盾也没有了，而军阀战争却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重工业资本与轻工业资本等）的冲突所造成，这是毫无经济常识之谈。在一国内的资产阶级内部因各种经济原因而发生利害的冲突，发生政治的派别，可是决不能发生国内战争，因为在经济上他们互相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大于他们的冲突。在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每个国内战争，都必然要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扫除封建藩属制度的日本西南战争，都是一样。独秀同志把这些战争都认作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闻！至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军阀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相互冲突的结果，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目前的反蒋战争，双方都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其所以赞助这一战争，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工具来扩大他的利益范围，任何一方面的封建势力也是为着自己的阶级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军阀来保持他的封建剥削关系。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都是要妥协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都只有反革命的作用，都没有丝毫革命的意义，所以这样的战争是毫无疑问的反革命的战争。

（五）他从这样抽象的观点出发，因此对于经济的分析，不顾事实的而肯定“封建势力经过商业资本的侵蚀，帝国主义商品经济伸入农村，尤其大革命的经过，已经受到最后的打击，已经是

残余的残余，”已经不再保持他的封建的剥削而“努力资本主义化”，而结论到“封建势力已经完全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只有共同点而一点矛盾没有了”，这只是脑子里面的幻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关系，虽然经过长期的变迁（主要是商业资本的侵蚀与农民暴动）虽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资本主义的形式占优势，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则封建的形式仍然占极大优势。帝国主义商品经济如狂风暴雨般侵入农村，使半自然经济更加崩溃，封建地主更加动摇。可是，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却更加残酷。大革命的经过，的确给这样的剥削以莫大打击，同时，在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封建剥削关系，又得到一时的恢复，地主阶级的势力又得到暂时回光反照的机会。同时现在全国的情形，支配全国的经济生活的：第一，是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第二，是封建的剥削关系；第三，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剥削。资产阶级虽然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封建地主也想蜕化为资产阶级，可是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无法实现这样的企图，因此资产阶级便不能放弃他的改良政纲的斗争（但这一斗争因为惧怕工农民众起来的原因又必然是要勾结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而封建势力更加要保持并且要更加紧他的封建剥削，这是明显的客观的事实，任何人只要能抛弃脑子里的幻想与成见，细心的去研究中国经济关系，都能了解这一正确的观点。

（六）因此他所承认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到来的可能”与六次大会和中央所指出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意义完全不同。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意义是指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仍然在极野蛮的统治中国，封建阶级仍然是在加紧他的残酷的剥削。资产阶级因为得不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让步，只有更厉害的向工人进攻，那么，广大劳苦群众找不到第二条出路，因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来。所以现在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突起，工人斗

争的发展，农民暴动之不断的爆发，决不是什么“革命失败之余波”，“革命高潮的反面”。而是明显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他们否认这样的前提，他们认为帝国主义让步了，而且帮助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了，（那么所谓帝国主义宰制中国便成了一句空话！）封建剥削更没有了，那么，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了。有的只是工人对资本家的革命了。所以他们否认现在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农民不断的暴动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且否认一切的革命象征。六次大会与中央指出这些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统治阶级是走向崩溃，而革命形势是走向高潮，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开始复兴。他们只承认工人与资本的矛盾一点，同时又认为现在工人的斗争“只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那么所谓“革命高潮必然有再来的可能”只是与“我们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得到最后成功”一样的毫无现在实际策略意义的话。他们以为“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是取消派的见解”，其实说革命高潮永远不会到来，何只是取消派的见解，而且是疯子，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空想，所谓取消派的观点正是如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承认须经过统治阶级的稳定，然后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见。

（七）依据他们的观点，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那么不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来，而是统治阶级稳定不可避免到来，根据这样的观点出发来决定策略的路线，自然要在原则上采取合法运动，而“国民会议”应该是中心的口号，苏维埃的旗帜只好取消。独秀同志却是很怯懦的不敢如托洛斯基一样的公开主张合法运动与国民会议。只是消极的攻击中央的路线，攻击中央号召“五卅”“八一”……的示威运动是盲动，是玩弄，不敢公开的提出积极主张。实则在他们的观点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力求合法，才不是玩弄才不是盲动了。所以借着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合法手段”的一句话，透露他自己的观

点。如果他的主张真果是如当时列宁的主张一样，那么，决不会觉得中央是盲动。因为中央的路线只是反对合法主义（带血热性合法），并没有抛弃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而且积极指出要利用公开与合法的可能来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同时既然统治阶级是在走向崩溃，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那么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来组织群众，光只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不够的。必然同时要领导群众的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以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如果说这是盲动，这只是从他的取消观点出发的取消办法，根本上与第三党的口号毫无二样。

（八）从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认为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资本主义剥削，于是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雇农贫农对富农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斗争，地主的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次要又次要的了。所以他们认为“富农是反革命，中农是中间动摇的分子，只有雇农贫农是革命的柱石”，所以他们的策略路线是“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这又是对于土地革命对于农村斗争策略的取消观念！事实上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军阀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封建剥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只是与地主阶级利用土地使用关系对农民的剥削相互勾结着，并且多半是豪绅地主兼营，至于富农对雇农的剥削在整个的农村经济关系中，还是次要的地位，所以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他不能坚决参加反封建的斗争，所以现在农村中从雇农至中农都是遭受封建剥削的革命的群众，富农是动摇以至反革命的分子，所以我们农村斗争主要的口号是土地革命，斗争的策略以雇农为主要基础，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如果现在不以反军阀地主封建剥削为中心口号，决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如果不与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便要削弱革命的力量，决不能推翻统治阶级。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取消革命的最好办法。

（九）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宁这样说过）的办法；如果主观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而要想扩大党的民主化，只是放任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倾向在党内发展。现在中国党的情况，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既弱，尤其是客观上白色恐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残酷，加以革命斗争又异常紧张，国内军阀战争，国际的反苏联战争都摆在党的前面，他们却在这个时候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中央都实行民主的选举，这无异于要求党放弃目前实际的革命斗争的任务，来实行党内清谈。要求松懈党的极端秘密的组织好让警察巡捕得以大施破坏。至于因为中央要求全党同志服从党的决议，在党的策略上一致行动，便说：“这是命令主义”“这是一贯的命令主义”，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党的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的根本原则，绝不能容许这样无政府的思想来破坏的。至于主张党内和平，不过是要求党放弃对于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指斥，放任这些倾向在党内发展。诬蔑中央用“警察政策”，这更是学习托洛斯基攻击俄国党的最卑污的挑拨离间的手段。可惜太不聪明了，因为把这些话用到中国党来，只有得到全党同志的嘲笑与愤慨的回答！

依据上面的分析，他们的观点与路线都是一贯的取消主义，他们分析革命失败的根由是反对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取消了土地革命，分析革命形势，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这样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要主张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罢工与示威，都成为玩弄与盲动了。在组织上自然要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要纪律，不要服从上级党的决议与指示，主张党内和平，一切不正确思想都有权利在党内自由

宣传。这便是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整个的路线。这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在党内发展，不止是破坏党执行目前迫切的革命任务，而且可以使党分崩离析以至灭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坚决站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与中央决议之上反对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把它彻底肃清。

现在党内还有一种严重的调和派的倾向，如说“托洛斯基主义是有理论的系统，我们不好简单的批评他。”“他们固然错误了，中央也不完全是对的”，……等、这种调和的观点，只是模糊同志的观念，松懈党对于取消派的攻击，掩护取消派的思想在党内发展，想拿一些技术的，非政治的问题，来动摇党为正确原则的争斗，为列宁主义路线的争斗。他们与取消派的不同，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原则上是一样的动摇党的路线的。并且不肃清调和派的倾向，决不能执行反取消派的斗争，所以反对调和思想的斗争与反对取消派一样的重要。

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在未开新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党同志都必须绝对服从最后一次大会的决议，违反大会决议的观点，绝对不能容许在党内自由讨论，并且现在革命斗争异常紧张的时候，煽动党内原则不同的讨论，毫无疑问的是阻碍革命斗争，破坏党，客观上便是帮助敌人。所以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必须迅速的把它肃清，尤其不应该因为这样的讨论而松懈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

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了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反对派已经有他们的秘密刊物，在党内传播，独秀同志也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

(一) 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

参加的同志须与以组织上的制裁。

（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的开除出党。

（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中央认为在目前革命斗争紧张的形势之下，上面的决定，是巩固党，使党能坚决执行领导革命斗争任务的必须的方法，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

托洛斯基反对派在 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少山^①同志在直支干事会议上的报告

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上说：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在中国党内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活动情形，与反党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党丝毫忽视。

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有人说反对派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莫斯科回来学生”，这是错误，他们只是起了反对派介绍作用。我们指出主要的几种客观的原因。

第一，南京政府在初成立时，都注意如何引俄国反对派到中国来，以分裂中国共产党，托洛斯基反对派这个宝贝不但为欧洲的资产阶级所利用，即中国的统治阶级也一样的看上了。在联共的反对派坚决的固执他们的路线时，欧洲资产阶级即非常之注意，想利用他们分裂联共的组织，破坏联共的正确路线。在中国，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都企图藉着宣传反对派以分裂中国党，中国的统治阶级恨不得抓住中国党内的这一工具，以达到消灭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的确许反对派在中国活动。这是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在革命失败之后，必然有许多失败的情绪，引起许多

^① 即周恩来

争论的问题。俄国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德国在革命失败后，都有过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亦是如此。但中国党自八七会议以后，对于机会主义的纠正在组织上有相当成功，但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未完成，直到六次大会，才有相当成功；然党内种种不良的倾向，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不同的政治倾向，尤其是机会主义的倾向，还都是待机而动；这是中国发生反对派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所以形成中国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结合之思想上组织上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国党内生活，到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巩固，虽然在组织上肃清机会主义引进工人分子入党，但尚未把支部生活坚固的建立起来。因此，党的生活上，常发生了动摇的现象。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全体支部热烈的讨论，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当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在上海有些中心的产业支部并不稳固，有些产支非常缺乏政治生活，因此，斗争胜了，支部就活跃，斗争失败了支部就消沉甚至有瓦解的。这表现政治路线还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完全巩固。不但反对派可以藉此活动，即机会主义者亦容易去活动，这是第三个客观原因。

第四，大革命失败以后，看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分子，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这是第四个客观原因。

尽管过去没有发生过反对派的活动，然而有了这四个原因，就必不可免的使中国有反动派暂时活动的可能。自然直接的原因，还是回国的学生与机会主义的复活。

至于托洛斯基反对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我们可以看出有下列

四点：

第一，必然不可免的要与统治阶级勾结。新生命已经登过关于反对派的文章，将来反对派要更利用统治阶级的宣传机关，以进行其帮助统治阶级反党的活动，如果在党内斗争失败了，他们必然整个卖给统治阶级。这是必不可免的前途。

第二，在一切当前实际问题上表现他们的反党路线的宣传与活动。他们在五卅纪念时，宣言号召同志向党斗争，要比反帝国主义斗争更重要，客观上毫无疑义的是帮助敌人。八一示威，他们又认为是盲动主义，反映出许多失败的情绪。在论调上表现出极右的悲观的取消主义。

第三，利用某些不健全的支部生活，以实行其停留在支部内活动的策略。他们藉着停留在支部内，以动摇下层群众，并专门找斗争失败的支部，专利用失败的事实，以攻击党的路线。当斗争困难时，反对派在宣传上可以说出极左的口号，如“没收工厂”，以使工人阶级孤立，引导工人群众幻想未来的天国而忽略了目前斗争的实际意义，反之在实际问题上却又提出极右的策略，使工人支部走到无出路的消沉状态。

第四，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结合。这些机会主义者因为固执自己的路线，现在不能深入群众，现在又不能不找一新的政纲，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样，反对派的政纲，正好在掩饰过去自己的错误上，在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与策略上，恰恰脾胃相合，于是就被他们利用了。而反对派的策略，也正是要利用这些分子帮助他们反党的活动。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在“惺惺惜惺惺”的情形之下，便结合起来了。

此外，因托洛斯基反对派更抛开原则去专门利用些小的问题，小的纠纷，非事实的毁谤，与有意的造谣污蔑。企图用这些卑劣无耻的手段以破坏同志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这除了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指导者以外，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在上海，香港，北方，都发现有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在组织上对党是秘密的。惟其如此就更应该将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的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有些并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有些我们已知道他们有反对派的倾向，有些尚不知道；因此这一问题必须提到支部中，动用这一机会教育同志，树立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务使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所以，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

编者按：本篇系从中央支部生活第十二期中转载。少山同志这篇演讲稿，系去年十月讲的，并经他校阅一过。当时机会主义——反对派在党内正积极活动，所以演稿中说“统治阶级抓住党内这一工具”“中国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经过半年来的斗争，党已把这些取消主义者驱逐到党外，由他们去和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去携手了。我们看这篇演讲再去观察今日的取消派，便可知党在斗争中的进步是非常之大的。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更要从组织上肃清一切取消倾向与右倾的基础，使党的正确路线在组织上得以更能巩固。这也就是本文的主旨。

（录自《党的生活》第6期）

反取消派斗争中之严重现象

伍 美

中国党内发生了取消派，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因素与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之失败情绪，白色恐怖下之恐怖情绪，以及党的支部生活之不健全，无产阶级基础之薄弱，党员政治水平的低微等等，这些，都造成了取消主义思想的基础，再加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变节，脱离工作的失意的党员之小组织的结合，遂形成了目前取消派的组织。

取消派不仅取消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障碍物。而且在中国革命复兴的成熟时，群众斗争日益开展中，取消派已成为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破坏革命之好工具。这绝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绝不容我们斗争有丝毫松懈！

当取消思想在党内方萌芽的时候，中央已号召全党起来为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与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的确，我们必须用斗争的方式，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肃清取消主义，同时必须切实的教育全党同志，彻底的改造党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正确路线在组织上得到巩固，仅在组织上，开除几个取消派，形式上成立几个决议，是决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

我们检查全党反取消派与取消主义的工作，虽有相当的收获，但还十分不够，且表现下列的严重现象与缺点：

一，反取消派与取消主义的工作，未普遍于全国各省各地党部及支部：反取消派的斗争，必须全党一致的动员。但过去仅仅是在江苏，广东，湖南，江西，顺直，满洲等省有反取消派与取

消主义的工作。而在山东，陕西，四川，湖北，广西，云南，尚未开始反取消派的斗争，更未有以之教育同志。这是如何严重的现象！

二，反取消派与取消主义的斗争，未能成为全党经常的工作；一般的现象是接到上级的通告或决议，或发现了某人是取消派某人有取消主义的思想的，即加紧反取消派的工作。但通告与决议讨论过了，某人开除了，某人的观念当时纠正了，反取消派与取消主义的工作，也渐渐消沉了。例如取消派马玉夫跑到上海沪西活动，于是沪西的同志大声疾呼取消派来了，遂加紧反取消派的工作。等马玉夫离开沪西跑到吴淞去活动时，于是吴淞的同志也大声疾呼取消派来了，才加紧反取消派的工作，而同时沪西却松懈了。因此反取消派斗争表现得时紧时松，若断若续，尚未能成为党的经常工作，更未能与一般的工作发生联系。这又是如何严重的现象！

三，没有发见取消思想没有发见取消派，便认为不必做反取消派反取消主义的工作：某省负责同志到上海，曾询及该省，有无做过与取消派斗争的工作？他的回答是：“我们那里没有取消派。”再询之同志中，有无取消思想？他说“我们处地偏僻而又闭塞，取消思想不容易输入。”待向他详细解释后，他才说“等我回去即作。”这更是如何严重而错误的倾向！

四，在上述曾有反取消派工作的各省中，亦还有下面一些缺点：

甲，缺乏积极反取消派与取消主义的工作，多偏于消极的；

乙，斗争方式太简单，未能深入一般下层党员群众中，仅仅在某些地方党部或某些支部有些讨论与决议而已；

丙，除上海外，各地都未能扩大到群众中去，党外斗争的方式很少——取消派却已到群众去活动，行其无耻的欺骗了。

丁，缺乏在党员中，群众中做广大的宣传教育工作，未能从

思想上肃清取消倾向。

为了巩固与实现党的正确路线，必须加紧反取消派与取消主义的斗争。决不是仅仅因为发现了取消派分子才反取消派。更不是仅因为取消派分子来了才反取消派。亦决不是仅因为在某些地方，某些党员中有取消主义思想之明显表现才反取消派。这一工作十分需要我们深切的了解，正确的认识，在上面指出党内发生取消思想之客观基础上，无论在什么地方，任何工作上都有发生取消倾向与取消主义之可能。正为此，才需要全党一致的动员在党内外不断的坚决的反取消派与取消主义，才需要在党内外经常的做教育宣传工作。

取消派日益走向反革命的途程，由破坏党的组织而走向破坏革命群众的组织破坏群众的斗争了！时不容缓，全党必须立即一致动员，坚决做反取消派与取消主义思想的斗争，不仅仅从消极方面反取消派，更需要从积极方面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肃清取消主义！

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坚决的向产业工人开门。坚决引起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发展赤色工农会的组织，加紧创造与健全支部生活，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从党内斗争进而到群众中去斗争。这样才能肃清取消思想与取消主义！

全党同志动员起来！完成反取消派与取消主义的任务，以促进中国革命的胜利！

（录自《党的建设》第6期）

反右倾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忠 发

自六次大会后，党在一年半来的奋斗过程中，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工作上，均表现了不可忽视的进步。经过全党一致的努力，已经将党的政治路线在实际工作中证明是正确，已经将党的组织从破碎的基础上稳定起来，同时并认清了党在各种工作上的缺点，指出了不建立赤色工会与富农路线的错误，这些缺点与错误都经过了严正的自我批评，都坚决的在目前迫切任务中补救与纠正，而目前最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并与之奋斗的，便是党内的右倾危险。

党的二中全会已经指出，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这一指示在几月来的全国工作的经验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还在二中全会之前，中央在解决顺直，江苏等等问题上，即坚决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斗争，斗争的主要方法是采取教育与说服的精神，这些斗争之结果是把当时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纠正过来。但同时有一缺点，即尚没有把这些不正确倾向在组织上的根据坚决指出，从而在组织上根本肃清那些倾向。二中全会后，机会主义——反对派（取消派）开始向党做猛烈的进攻，以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吸引少数具有失败情绪的落伍分子，以似左而右的托洛斯基主义欺骗小部分落后的工人群众，以造谣污蔑的手段攻击党的指导机关；中央首先以说服的方法去教育，继则以组织的纪律去制裁，同时又经过全党一致的努力，这样，在几月的大争斗结果，已经达到了初步的胜利；目前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愈加揭破了取消派反革命

的面孔，愈加证实了党的路线之正确。党对取消派的胜利便是保障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便是党的逐渐布尔塞维克化之具体表演。

但是，同时却不可忽略党内的隐藏的取消主义与右倾危险。不根本克服右倾的危险，决不能完成党在目前的迫切任务，客观上反而帮助了取消主义的发展。

中央在几月来检阅全国工作的结果；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得着相当的巩固；党的组织在质量上有很大的改善，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有了相当的推广；群众工作的路线，已经在有些地方正确的运用；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更加扩大。但是，这一切进步都还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党的尾巴主义仍成为普遍的严重现象。这一现象是右倾危险之具体表现。

同志们！党在目前的政治任务是愈加重大了。右倾危险妨害着党执行他的政治任务，是党的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严重障碍。在执行党的正确策略中，需要全党以严正自我批评的精神，坚决与右倾奋斗，坚决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奋斗！

(录自《党的建设》第6期)

群众斗争的教训

——党内严重的右倾危险

笑 影

对于目前群众斗争的估量：取消派固执着机会主义的路线，闭着眼睛武断的说：“我们——陈独秀等取消派自称——以为：自从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盲动主义根本破坏了工农组织，减弱工人阶级之阶级斗争力量，形成了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他们在这一估量下得出的政策是：“我们在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我们的党，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取消派陈独秀们坐在亭子间，承认“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和经济相当恢复”而产生出来这一完全不合事实的估量与纯机会主义的策略。取消派目前已成为党外的敌人了。

同时党内暗藏的右倾与取消主义，亦是非常严重。

唐山有同志说中央与省委都是放空炮，罢工有什么可能（在北宁路工人将发生与国民党武装冲突，打死黄色工会委员之前）；在北宁路发生武装冲突，国民党派大批军警捕工人，工人非常愤激，市委只提出“不放人，不作工”的消极口号，不敢马上号召罢工。斗争正在尖锐的时候，同志临阵脱逃，告假，躲避，不与群众见面。斗争结束后，市委发出和平的支部讨论大纲，要支部领会这次斗争胜利的原因，工作中的缺点，对目前进一步的斗争策略问题丝毫没有提到。

中东路斗争中，同志躲在工贼的工业维持会的旗帜下，自动

取消失业工人团的组织，并公开声明没有一点赤化嫌疑。

江岸京汉路支部同志，始终不肯坚决反黄色工会（工整会），藉口在黄色工会内作委员去争取群众，以掩饰错误。

湘鄂赣边特委，在九二扩大会有这样的决议：“苏维埃已经公开的地方，依旧极力缓和斗争的形势逐渐转变，尚未公开的地方，应极力预防继续公开，以潜伏的势力，造成秘密的割据”。最可耻的是还引了一句所谓群众的话：“苏维埃是吸引敌人进攻的一个祸根”以为护符，遮掩他们坠入在富农路线中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

仅就以上的实例，已经足够证明党内右倾危险的严重。这样右倾危险，正是党内取消主义的基础。取消派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敌人，而党内右倾的危险，却为一般同志所忽视。

目前群众斗争发展的形势

由于全国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全国群众斗争开展了全国革命复兴的现在局势，这绝不是偶然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愈剧烈，斗争的形势愈尖锐，斗争的地域愈扩大，斗争的内容更深入，必然促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的到来，首先便是几省革命的胜利。在目前全国群众斗争中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接近直接革命形势的几个特点：

（一）斗争的尖锐，已经进到短兵相接直接的武装的政治斗争。上海“三八”示威，群众已经开始演习巷战，夺取街道，冲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压迫，在各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每一次经济斗争，很迅速的转变成为政治斗争。失业工人群众更是政治斗争的生力军。这是目前群众中第一特点。

（二）目前群众斗争的发展无论在地域上，在革命的力量上都还是平衡的。这种平衡的发展，是革命胜利主要条件之一。这是目

前群众斗争中第二特点。

（三）改良主义黄色工会在群众斗争中，撕碎了欺骗群众的面具，缩小在群众中的影响。共产党在独立的号召中树立了领导地位，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自发的斗争逐渐转变到党的领导下，减少了散乱的状态。这是冲破敌人各个击破的主要条件。这是目前群众斗争中第三特点。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正确的认识到这些特点，才能了解目前群众斗争的形势与其发展的前途。

从群众斗争中肃清党内右倾

事实回答了取消派的错误，证明党的分析与策略是正确的。同时党内亦有不正确的估量。

有同志以为党的主观力量太弱，党内工人成份比较少，干部至今仍然缺乏，纵有充分的客观条件，但主观力量太弱，何来革命高潮？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五卅运动的实际教训回答这些同志们，革命高潮的来到主要决定于客观条件，客观条件的成熟，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然而革命的主观力量与正确策略的确能够推进革命更快的发展，革命的主观任务便是促进客观条件更快的成熟，同时加强主观的领导力量。党在目前已经有很多的进步——政治影响的扩大，中心城市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党与群众关系的改善，特别是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之树立，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谁忽视了客观形势之发展，与主观的力量之日益壮大，谁一样要堕入机会主义的泥坑。

有同志以为现在与直接革命是两个阶段。甚至将目前斗争划成何种阶段，如顺直省委同志中便有认为同盟罢工只是经济性的。这都是不了解客观形势之发展的右倾观点。

党内更表现得普遍的现象是党落在群众的后面，许多下级党

部，反映群众斗争非常迟，领导斗争的具体策略每每在斗争已经爆发，将要结束的时候，或已经结束之后，许多支部不了解周围群众的要求和情绪，少预先有计划的组织群众斗争，许多同志斗争中更常常比不上群众勇敢，失去先锋队的作用；这些现象说明党的尾巴主义的现象如何的严重，尾巴主义成了右倾的具体表现。

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坚决的领导群众斗争，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这是目前每个党员的任务。只有坚决的执行党的策略，从群众斗争中肃清右倾尾巴主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样重要的是肃清右倾在组织上的基础，以铲除执行正确策略的障碍。

(录自《党的建设》第6期)

地方暴动与右倾观念

石 恪

托洛斯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取消派——陈独秀派，认为中国革命自一九二五—二七年完全失败到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取得了政权意外的稳定，现在没有革命高潮之到来，现在上海等地的罢工斗争朱毛等红军发展是高潮的反面，是革命余波，主观上是中国共产党盲动政策之人工制造，所以他们取消“苏维埃”，以“国民会议”来代替，取消“武装暴动”，以“合法运动”来代替。自然，在他们心里眼内地方暴动更是“单纯的杀人放火”的“土匪政策”。他们最近在上海祥昌惨案中已加足马力来破坏革命，来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走狗工贼杀人并毁尸灭骸，他们何止是取消派，简直是积极的反革命派。

取消派虽然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已在革命的组织——共产党，赤色工会农会——以外去了，然而取消主义的思想以及自觉不自觉的或多或少的右倾观念，特别是群众尾巴主义的现象，在党内依然没有彻底肃清，尤其对组织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了解与运用上的右倾，更是目前党的主要危险。在许多游击战争尚未普遍或未发生的省区（像江苏，顺直，满洲）仍大部分停留在企图举行小的日常经济斗争的狭隘范围内，并没想到农村经济斗争会很快的转变到直接武装冲突而必然的发生游击战争，以至地方暴动，如江苏南通县三益埠的斗争，安徽六安县独山事件，一开始就有成千成万群众的很快走上武装直接冲突，实行没收分配地

主阶级土地的游击战争，或形成地方暴动，而当地党都只估量到群众和平示威，至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不但没有准备，连想都没有想到！也许是不敢想一想！——因为那些地方都是富农路线的领导，他们也不愿意去想！甚至有些同志，认江浙皖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不能发生游击战争，更说不上地方暴动。这都是极严重的右倾错误。

有些地方（如广东东江，琼崖，北江）仍长期停留在躲避主义的游击战争方式，不敢到达平洋之地集中力量，向主要市镇县城进攻，扩大游击战争，更进与城市的工人罢工，兵士兵变，贫民和学生争自由运动，互相配合，以适应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推进到地方暴动。甚至朱毛和鄂西红军还不十分了解红军集中进攻的策略，还多少存留着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鄂西和湘鄂赣边境，在不久的过去，也有同一样的保守观念，幻想造成长久的割据，拼命的限于一个区域的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苏维埃事业，结果，演成上山主义或下湖主义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远在井冈山朱毛红军割据以前的湘赣边境，党的特委设在山顶，县委设在山腰，区委设在山脚，支部才在偏僻穷乡中，党的上级指导，天上的事是多知道些（翻风落雨他们便首先知道），地下的事则少见多怪，这是标本的取消和保守倾向。

有些地方（如鄂西，粤东，某几县）仍保持着专门做杀土豪劣绅，打民团，反苛捐杂税等工作，根本实施土地政纲成为一般的忽视。鄂西赤色区域有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可能，还没有做；粤东江还有半赤色区域秘密没收和分配土地之滑稽的决议，还有迷恋过去海陆丰苏维埃歌颂升平，认为彻底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不够提起农民对于新的气象的兴趣，要多做深入土地革命以外的演剧，建设俱乐部等娱乐事体，来助长农民保守，和平意识的指示，这也是不向外发展，不深入土地革命，妨碍地方暴动的右倾观念。

更有些地方（如鄂西）用乡村包围城市的办法，不积极发动城市工作，企图把乡村割据起来，然后用军事力量拼命进攻冒险取得城市，这是忽视城市工作的重要，农民意识的表现，也是妨碍地方暴动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机械的解释组织地方暴动以建立城市领导为必要前提；或拿许多条件，才可以十全无缺的进行地方暴动，如粤东江梅县在朱毛红军游击到来之时，又值粤桂军阀战争紧张，秋收斗争开展之下，正是地方暴动的前夜，乃因某同志说教式的演着列宁主义地方暴动的条件，左一比量，右一衡度，竟将摆在目前的地方暴动取消了。甚至东江特委最近报告中，仍有这样一段的说法：在整个斗争形势上看，的确是表现着疲倦状态，但这并不是说群众斗争的勇气低落，而是农村斗争太过突进没有城市工作的配合，而成为孤军奋斗不能免的现象。这真是农村斗争太突进了吗！？农村斗争因此要倒退缓进些，也许是要稍事休息些时，等待城市工作之发展！这又是取消地方暴动的等待主义的右倾观念。

这些，不深入农民土地斗争，不领导农民自发斗争，不发动游击战争，不集中和扩大红军苏维埃区域，不加紧城市工作或等待城市领导而延滞乡村斗争，都是取消和保守倾向，都是组织地方暴动的绝大障碍，都是右倾路线的具体表现，非彻底肃清不可！

（录自《党的建设》第6期）

肃清对国民党与改组派的幻想

天生

“青天白日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工农劳苦群众在国民党统治下，在两年前已认识了国民党的面目。即在改良主义欺骗最浓厚的浙江群众，也大声呼喊着“国民党是豪绅地主的党”（如永康），“国民党的村里制，土地陈报制，这是豪绅的政权”（如温州），“我们不造反，将永远得不到饭吃”（台州）；在湖北的工农群众，叫着“无论如何，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些”（鄂东北）；在安徽的哗变的士兵中，高叫着“一切的人都是欺骗我们，只有去找红军朱毛，才是出路”……一般工农群众，很明显的表示国民党整个的都是臭不可闻的烂尸，只有彻底推倒国民党的统治，才能得到“饭吃”。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都应是群众中的领导者，但许多地方的党部下的情形，党员在群众中的表现都不是这样。

在安徽的党，有一部分党员始终对国民党有幻想。有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大做其文章（如安庆）；有大半支部的同志，是国民党部的职员（如过去的安庆）；有始终与改组派的分子，不肯断绝关系，保留所谓“私人的感情”（一般安徽的同志，多有此现象）；尤其有的以为蒋介石倒后，汪精卫来当然要好些（如南陵）。

在浙江，党提出反土地陈报，但同志为生活问题，反正国民党中身任土地陈报员（如湖州）；有的为国民党土地陈报，号召同志起来宣传土地陈报是共产主义实行的初步（如建德）；有的以为三民主义是好的，但因蒋介石的不实行而没有完成三民主义的使

命，三民主义的实行，应由我们来实现，因为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如永康）；有的派同志参加改组派中去活动，结果使参加的同志竟致企图号召全体同志去参加改组派的工作（如杭州，诸暨）；有的甚至整个指导机关，因改组派的宣传而几乎接受改组派所谓“吃点心”的主义（如温州，即改组派声明他们的目的，亦是共产主义，但是现在时期没有到，要到共产主义，必须先经改组派阶段，所以改组派的活动，有如吃点心，共产主义是吃大餐。温州有的同志觉得是可以先吃点心，再吃大餐）。

全国各省，虽然没有浙江之甚，但在北方各省，以至江苏（在如皋等处）一部分同志，对改组派的欺骗，也同样的仍不能深刻了解，甚至更受其欺骗而有参加其活动的事实。

这许多事实，都表现着有些党部在群众斗争中，在群众彻底反国民党斗争中，不仅未能坚决的更提高反国民党的领导，揭破国民党特别是改组派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面目，反在群众斗争复兴中，表现得特别落后，保留着取消革命，机会主义等严重右倾危险。

固然，这一现象并非普遍，但党内确没有完全肃清对国民党的留恋，特别对改组派的幻想，尤其表现着反改良主义斗争工作的不充分。表现着党的尾巴主义形势的仍然严重，党必须用全力肃清这一右倾的危险。

但是，党指出这一严重现象，绝不是如反对派以及陈独秀等机会主义派以为党仍是继续过去的机会主义，而在工作上采取盲动主义，以诬蔑党，攻击党，破坏党，而帮助了敌人的作用。恰恰相反，党更在正确路线下，党更在积极的意义上去认识并肃清这一右倾的现象。

这一右倾的基础与原因是：

第一：无产阶级基础的不宽广。因之，无产阶级意识，特别在农村地方党部中表现得薄弱，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未能健全的

树立。

第二：党的组织大部分停留在旧的基础上。新的干部的引进还不充分。因此革命失败的情绪，白色恐怖的畏惧，仍反映在摇动游移的分子中。对统治阶级过分的估量，更易使改良主义欺骗，影响到党内落后分子，而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幻想。

第三：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与党改正的几个错误的问题——如富农问题，黄色工会中的策略问题，都还未能深入到所有下层支部，因此在群众斗争中，有些地方仍然犯着过去的错误。

党必须坚决的肃清这种右倾危险之组织上的基础。

党必须号召全党同志肃清党内对国民党对改组派幻想的右倾分子。党必须洗刷最可耻的在国民党中为“生活问题”，为“取得掩护”的游移分子，必须扫除不在群众中艰苦工作，而想依赖改组派的阴谋以转变革命的可耻投机思想，才能巩固党的领导。

同志们！群众斗争高涨的浪潮里，绝不容党内任何犹豫的态度，只有勇敢的在党的正确路线下前进，才能争取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只有无情的肃清党内的右倾危险，在斗争中坚决的扫除党中的右倾分子，才能保障党领导群众向新的革命浪潮里前进，以完成党的重大任务！

(录自《党的建设》第6期)

反右倾与改造党的基础

笑 影

党内右倾的发生，是有其组织上的基础的。只有认清党内右倾的基础，才能根本克服右倾的危险。

（一）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不宽广。党员成分上百分之九十是非无产阶级的，内中包括着一部分富农，地主的子弟，这些分子停留在党内，阻碍土地革命的发展。在江西某地方党部反映富农的意识，提出“不没收革命家族的土地”的口号，只要抗捐抗税抗粮，拒绝抗租抗债的口号；在东江某县党内有所谓“抗外不抗内”怕降低富农为贫农的理论；在平浏党内有主张成立秘密苏维埃，不敢公开斗争的表现；在南通党内发现为地主富农保镖，不领导群众为土地革命而斗争的污点；在广东党内充满了合法运动的观念，停顿在减租减税的范围，不能深入土地革命；在四川荣县曾经在农民斗争起来时，地方党部畏惧目标太大，主张收藏武装，避免冲突；其他各省的农村党内有些地方或多或少反映富农意识，甚至在富农领导下，解散红军赤卫队，与豪绅妥协，避免斗争等等危险的现象。富农在党内不仅是阻碍着土地革命，在农村斗争进步发展时，必然成为农村反动力量最危险的部分。另一方面，全党的工人同志不到百分之十，产业工人，尤其是重工业的工人，在党员成分上还没有成为主要部分。虽然在一年来的工作中，党员质量上有不少进步，工人同志有不少发展，但依然未能适应客观上的需要。这是第一个严重的弱点。

（二）机会主义的残余在党内还未完全肃清，偏僻的地方党部

之下，甚至党有在国民党内隐藏着的分子，在士兵运动中有的地方仍然没有坚决纠正机会主义的路线，没有特别建立士兵群众的基础；有些下级党部的工作路线，工作方法，还继承着机会主义时代的余毒，委派制度，命令主义，还没有完全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在群众斗争的领导上时常表现出来。这是第二个严重的弱点。

(三)党的干部从斗争中引进新的分子尤其是工人干部还不多见，全党的干部多还停留在旧的基础上，一般的党内干部老党员居多，在工作上留恋旧的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很少反映群众斗争在新的环境之下的战略与战术。党内一般的现象是留恋旧干部，欠缺从斗争中引进积极勇敢的分子参加党内工作的决心。旧干部自然有很多的斗争经验，否认旧干部在党内的作用，固然是错误的，但专门倚赖旧干部，不坚决从斗争中引进新的干部，必然减少党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甚至成为群众的尾巴。这是第三个严重的弱点。

这三个严重的弱点，成为党内右倾的基础，是目前革命浪潮中的暗礁，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阻碍。

党应当健全自己的队伍，洗刷党的基础上存留的一切障碍，这是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一)党的发展主要是向着产业工人，特别是海员，兵工厂，铁路，矿山，市政工人，乡村的雇农，党的基础要逐渐转移到无产阶级群众上面，每个党员应该认识工人是社会先进的分子，只有坚决的吸收勇敢积极的分子入党，才能使党建立起宽广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的建设。毫不容情的驱逐富农出党，才能消灭土地革命的障碍，执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任务。

(二)党要坚决的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洗刷机会主义的分子，排斥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工作方法。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要能很

勇敢很活泼的运用党的策略，要在极复杂的环境当中，创造适当的工作方法；这样是健强党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条件。

（三）不断的从群众中引进积极的分子参加工作，改造旧的干部，健全支部生活，加强地方党部对一般党员的教育，这是肃清留恋旧干部的观念，树立党内中心领导力量的前提。

吸收工人分子入党，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引进新的干部，是目前党在组织上反右倾的骨干。谁忽略这种工作，谁便是对反右倾怠工。

（录自《党的建设》第6期）

反对派对于中国问题的错误

吴良赋

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反对派”已由党内的反对派转成公开的反革命派，这个转变堕落的过程，是早已完成的了。在国际上反对派已完全破产，觉悟的工人，明了自己的错误，脱离了反对派，重新回到党里来，不可救药的分子，大部分直接投入社会民主党的怀抱中，(如德国哈莱及其他地方的反对派)小部分还是继续干他们反国际反苏联的工作。这点充分地证明反对派的机会主义实质。托洛斯基出国后的言论(登载于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报纸上)直接为帝国主义效劳，中东路问题一发生，反对派一致攻击苏联，为刽子手蒋介石辩护，这些都非常明显地证明反对派在现时已是最坏不过的反革命派。

自联共十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及国际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以后，反对派在联共及国际内部已受到最后的打击。反对派在党内已经完全失去了根据，布尔塞维克党里，再不容有他们的存在。同时反对派内部的分化，也急转直下的前进，有名的反对派首领(如齐诺维也夫，加米尼夫，最近如拉迭克，斯米尔加等等)及觉悟自己错误的工人，都坚决的宣布与反对派脱离关系；德国的“列宁联合会”，四分五裂，不复成其为组织；联共及国际反对派的崩毁已经达到顶点了。

在这样的国际反对派完全崩裂的形势之下，中国党内一小部分动摇分子，受中国革命失败的影响，根本怀疑及反对中央的正确路线，拾取已经完全破产的反对派的理论，来和中央斗争。我

们为使党内同志更加明了他们错误坚决和他们斗争起见，所以不惮烦的把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重新说明一下。

我们可把反对派对于中国问题的错误分开两段来讲：一，过去历史上的错误；二，目前中国反对派主张的错误。自然，这两段是连接着的，不过为便于说明起见，我们可以这样分开来。

一、在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国革命高涨的时候，联共内部对于中国问题发生剧烈的争论。最主要的争论问题是：

- (1) 中国革命的任务问题
- (2) 封建残余问题
- (3) 联合资产阶级问题
- (4) 国共关系问题
- (5) 武汉时代苏维埃问题

我们现在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的分析一下：

(1) 中国革命是何种性质的革命？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联共中央的回答是：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他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上及政治上的统治，消灭乡村中封建残余（土地革命），统一中国。反对派的意见，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以为中国乡村中的封建残余，即使不是没有，也是非常柔弱，毫无重大的意义（拉迭克意见），他们以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外任务，不是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及政治的统治，而是“关税自主”（!!）（托洛斯基意见），这样反对派既然否认封建残余在乡村中的势力，而且更忽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势力。据他们意见，中国革命现时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乡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求得关税自主；这样，中国革命的民主性，已是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半截不完的社会主义性。反对派虽然否认帝国主义与封建的势力，可是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却还是盘据于城市及乡村中，尽情抽剥及统治中国的劳苦群众。只要稍为知道中国经济情形的人，都可以明了反对派的意见，是何等的错误。

(2) 封建残余的问题 统治中国乡村的究竟是谁?是封建残余抑是资产阶级,是封建式的剥削,抑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联共中央的回答是:在中国乡村中居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残余,和封建式的剥削方式。反对派的回答相反,他们说,居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式的剥削方式。他们的论据是: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已经统治了大部分中国的土地,商业资本的剥削,也就不能称为封建式的剥削。这个论据,是非常错误的。第一,他们不明了土地所有权和剥削的区别,第二他们不明了封建剥削与资本家的剥削的区别。

是的,中国的商业资本已使中国土地的所有权,起了绝大变化。但是商业资本所有了土地,是否雇佣劳动者,应用新工具,来自己进行生产呢?绝对不是,他(商业资本)这是像其他地主一样,把土地佃给农民,抽取租谷或租金(占全生产额百分之四十至七十)因为这样对于他更有利益。商业资本在乡村中没有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剥削形式,他还是用封建式的剥削形式,残酷地抽剥农民的血汗,他自己变成地主。商业资本虽然变更了土地的所有权,可是没有变更乡村中的生产及剥削方式,所以统治于中国乡村中的还是封建的剥削关系。

第二,反对派不明了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区别。稍懂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就可以知道农业上资本主义的剥削,另是一种形式。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通常是地主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资本家投下资本,雇用农业工人来耕种(如在英国)或是资本家兼有土地雇用农业工人来耕种(如在美国)。从工人身上剥削下来的剩余价值,一部作为资本家的利润(大致是按照社会的平均利润率的)他一部分作为地租,归于地主。工人从资本家那边,获得劳动力的代价工资。在这种剥削之下,最主要的敌对阶级,是农村工人和资本家(自然在有地主的地方,地主和资本家,为了利润分配的多寡,也不免要发生争执,但这是次要的),所以无产

阶级革命在农村中的最主要的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剥削。

在封建剥削之下，普通是两个阶级，封建领主和农奴，地主和农民。在封建制度之下封建领主非但拥有全部土地而且拥有农奴的身体（农奴没有自由），农奴应为领主作工（工役制），或把大部分的产品及其他各种贡品，供献领主。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封建制度逐渐崩裂，农民获得了自由，农民开始分化，但是大部分土地还是在大地主的手里，大地主还是握着乡村中的全部政权，地主阶级更加紧的剥削农民以积累更多的财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他们有更多积累的可能），以维持他们的地位，来抵抗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时候，乡村中资产阶级虽然已经形成和发展，但主要的冲突，却是在地主和农民的中间，所以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式的剥削方式，（自然在这个斗争中，决不能一刻忘记富农是贫农和农村工人的敌人），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

现在中国乡村中的主要剥削方式，是封建式的呢，还是资本主义的呢？只要稍微懂得马克思经济学及中国农村经济情形，就可以坚决的回答道，现在统治于中国农村中的主要剥削形式，还是封建的剥削形式。反对派观点的错误，是再明显没有了。

（3）联合资产阶级问题 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既如上述，那么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人和农民。但是在殖民地国家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是否有与资产阶级暂时联盟的可能？根据列宁意见，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暂时与资产阶级联盟，但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资产阶级真正进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斗争，第二，无产阶级政党要有独立的组织，第三，资产阶级不妨碍无产阶级政党严格批评的自由，不妨碍他用革命方法去组织及训练工农群众。所以列宁并不绝对拒绝和殖民地革命资产阶级作暂时的联盟，可是要严守上述条件，上述条件，一

经破坏，则联盟也就不得不破裂，无产阶级政党即不得不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中国机会主义者在这上面最大的错误，即在他们忽视了上述条件（尤其第三项），牺牲工农的利益，减少工农的力量，来迁就反革命倾向日益明显的资产阶级，他们对于共产国际的武装工农加紧军事工作，深入土地革命等等的训令，完全怠工，结果使资产阶级能够容易地压倒工农的革命运动。这绝对不是列宁主义策略的错误，而是机会主义者不懂列宁主义策略所犯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在列宁所提出的条件之下，暂时联合资产阶级，能够加速工农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已经充分证实了这点），反对派不顾客观条件，一般的否认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暂时联盟的策略，这证明他们根本不懂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如果照反对派的意见做去，那么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决不能发展得这么快，工农运动决不能发展得这么广大，无产阶级政党，自己也不能发展得这么利害，反对派主张之有害于中国革命，是很明显的。

（4）国共关系问题 反对派根据上述错误的意见，就把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的政党，所以他们根本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且在民族资产阶级未叛变以前，即主张共产党自动退出国民党。这正是合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需要，这正是减少共产党对于群众的影响，这正是把领导权自愿地退让给资产阶级。当时联共中央的意见，完全不同，联共中央以为那时的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治联盟（Bloc），共产党应在里面争取领导权，扩大对于群众的影响，并且努力的使国民党民主化，削弱上层反革命首领的作用，把国民党逐渐变成民主的组织，中国机会主义者投降了反革命的首领，对于国际所指示的正确路线，完全怠工，结果使反革命首领，能够抓住国民党作为压迫工农革命运动的工具。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可是如果按照反对派主张，在武汉时期以前，自动退出国民党，那么这不只自己缴械，退出战场，而帮助蒋介石

石，这样或许连武汉时代的革命斗争，也不会有，反对派主张的错误和有害，在这点上是非常明显的。

(5) 武汉时代的苏维埃问题 在武汉时期，反对派提议在武汉政府的领土内，建立苏维埃。这个主张在那时是非常错误的，这证明反对派丝毫不懂苏维埃的作用。苏维埃是政权的机关，建立苏维埃就是建立另一个革命的政权。在同一领土内，是不能有两种革命的政权的。苏维埃的革命政权，一定要推翻另一种反革命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就要推翻武汉政府。可是在四月至六月间武汉政府还是反对蒋介石，还是进行革命的斗争，在这时候，推翻武汉政府，就不啻帮助蒋介石。反对派一方面承认武汉政府是革命的，共产党应该用一切可能力量，来帮助他（季诺维埃夫意见），他方面又主张那时就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于说要推翻武汉政府），这正是明白地指出反对派主张的矛盾和错误。

自然，武汉政府叛变以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苏维埃的道路，也就成为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

二、上面我们已经把过去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指示出来，中国革命的失败，使一部分动摇分子，怀疑现在党的正确路线而重拾过去联共反对派的唾余，来攻击中央，我们现在把目前中国反对派的主张，来分析一下。

第一，关于革命性质的问题 中国反对派以为现在在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握取了全部政权，乡村中的封建残余，已经是毫无力量，已经超过了民主革命的阶级，以后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了。这种主张是绝顶错误的，第一，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握取了全部政权是不正确的。南京政府是豪绅资产阶级共有的政府，绝不是单独资产阶级的政府（这点我们在他的对内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纲上，可以明白地看到），各省政权，还依旧是在封建残余的代表割据的军阀的手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第二，大革命失败以后，封建残余在乡村中迅速地恢复了他们的权力（自然有相当变更），封

建残余，又成为左右乡村的力量，这点就是国民党自己也是承认的。第三，革命性质，不能只看革命动力来决定，最主要的还是要看革命所要解决的任务，现在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主要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及经济的统治，土地革命，及真正统一中国。这些任务，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资产阶级虽然变成反革命，反对这个革命，但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派在这上面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关于土地革命的问题 中国反对派现在重唱旧调，说统治于中国乡村中的不是封建式的剥削方式而是资产主义的剥削方式。这种理论的错误，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现在可以不必赘述。反对派说现在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只是表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的性质，完全不能了解。我们且看列宁对于土地革命的意见怎样：

“从社会民主工党产生时起，一直到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总是拥护下列三种主张。第一，土地革命，必然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消灭乡村中农奴式的压迫关系，便是这个革命的内容。第二，未来的土地革命，根据他的社会与经济的意义，将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他不是减弱，而是加强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发展。第三，社会民主党仅有充分的根据，以最坚决态度，去帮助这个革命……”（本文作者加圈）——“重新审定工人政党的土地政纲”作于一九〇六年。

列宁这段话，把反对派对于土地革命的观点的错误，明白地指示出来了。

反对派根据现在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主张在农村中主要的是反对农村资产阶级而使中农中立。这是托洛茨基轻视中国的历史的错误。历史证明如果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没有坚固的中农的联盟，那么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反对派即忽

视目前主要的敌人，又抛弃主要的联盟者，这种政策，如果实行，一定会葬送整个土地革命。

第三、关于现在世界形势及国内形势的估计 反对派和右派机会主义者一样以为现在世界革命浪潮低落，中国的革命斗争，非但没有复兴，而且更是下降。这种意见，只证明反对派不顾马克思主义者在决定策略时所应有的原则，即客观情形的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各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如德国，波兰，法国，捷克，美国，印度等等的巨大罢工运动及革命斗争），更高斗争形式的应用（柏林五月的巷战，各国工人与军警的武装冲突等），都证明世界革命浪潮，正在兴发起来。在中国，工人斗争，亦渐由消沉状况，而趋于活跃，革命运动，表现出复兴的趋势，各大城市（上海，青岛，唐山，北京，汉口，香港，厦门，等）工人罢工运动及群众斗争，都兴发起来，本年十月份罢工的统计，超过以前同一月份的数目，这显明地表现出中国工人运动正在复兴的形势。此外各地的农民运动，游击战争，士兵运动等等，在严重的压迫之下，非但没有消灭下去，而且反扩张起来，这些都是革命运动开始复兴的表徵。所以事实证明反对派对于世界及国内革命形势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第四、国民会议问题 根据于错误的革命形势的估计，反对派就提出错误的策略。革命斗争既然低落，新的高潮，又渺茫无期，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利用公开合法运动的可能了。他们于是就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我们对于这个口号，可以分开两点来讲：

（一）国民会议，是否现在所急需？一个口号的提出，一定要根据于目前阶级的关系及群众急迫的需要。现在除了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之等），以及一部分改组派以外，广大劳苦群众并没有需要国民会议这个劳什子的东西。群众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实质，知道唯有斗争是他们的出路，唯有苏维埃才是他们

所要建立的政权。国民会议这种口号，只能迎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改组派的需要，实际只是帮助他们。

(二)这个口号，现在有非常危险的影响。我们要使群众明了只有苏维埃革命是唯一解放的出路。现在广大群众，自己并不需要国民会议。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会在群众中散播合法的幻想，减弱苏维埃革命口号的影响，转移群众的视线，而和缓迫切的革命的斗争。

从这两点上可以明白看到，国民会议的口号，要给革命斗争的发展，以非常大的妨碍。所以反对国民会议的口号，反对合法幻想，是发展革命斗争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反对派的一切理论和主张（关于苏联问题的，关于国际问题的，关于中国问题的），都已经完全破了产。事实已经证明反对派只是以左倾辞句为遮掩物的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列宁主义路线时，他非但与公开的机会主义者联合，而且还时常与反革命分子联合。列宁主义的党，是在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揭破反对派的错误，肃清一切不可救药的反对派分子，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坚决革命斗争上的一个主要任务。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合期）

中国革命往何处去

沙法洛夫

托洛次基在他的“不断革命”书中，又把中国革命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了。托洛次基虽竭力回忆他过去有一个短时期怎样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可是他现在已经完全走到社会民主党的泥坑中去了。

他在“不断革命”书中，说：

“经济的与政治的不平衡的过程之调和，只有在世界范围中才能达到。局部的，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不能够视为只是中国经济与中国政治范围中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就要谈到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观点：国际革命（!!!）之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民族改良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是落后的中国，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在他自己的民族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这对于不十分发展的民族也是一样。例如英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性质上便要和其他困难与矛盾相抵触，而且他的困难也许不会比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少，要克服这两种情形之下的矛盾，只有国际革命的道路。这样的提出问题，才能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成熟”或“不成熟”的问题取消。无疑义的，这里只剩有一点：中国的落后，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非常困难进行。这是否说，每一个甚至落后的殖民地的国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都已经成熟了呢？假使对社会主义尚未成熟的话。不是的，这决不是这种意思，如果如此，那还有什么一般的德谟克拉西革命，特别是殖民

地的德漠克拉西革命呢？我用问题答复问题说：每一个殖民地国家都已成熟可以立刻解决和完全解决他自己的民族德漠克拉西的任务，这些话要写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应该从另一端来着想。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环境下，民族德漠克拉西革命要想获得彻底的胜利，只有在该国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都已成熟，能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的时候，才有可能。如果这些条件都还没有，那么民族解放的斗争，便一定要得着半途而废的结果，完全反对劳动群众。”

（以上见托氏著“不断革命论”一九三〇年柏林出版，第一四一——一四二页）

这种社会民主党的漂亮说法，我们实在不愿意多废布尔什维克的笔墨，因为在这里托洛茨基已经彻底的取消了殖民地的革命。假使他现在还能迷惑很小的一部分工人时，麦克唐纳尔老爷，以及其他干涉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当然是非常夸奖他的。当托洛茨基向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计算他自己的功绩，并安慰他们说：殖民地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尚未成熟的时候，这些资产阶级的老爷和社会法西斯蒂的先生们怎么不会欢喜呢？当托洛茨基先生向麦克唐纳尔说，现在印度能够胜利的只有圆桌会议，而完全不是革命，当托洛茨基先生虚伪的证明说：目前中国能够胜利的只有武装干涉，农民革命是绝对的没有权利能够存在的！麦克唐纳尔这些老爷们怎样不会向托洛茨基先生鼓掌呢？托洛茨基正是这样肯定这样说的，托洛茨基说：

“中国地主的等级几乎没有，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联系比沙皇俄国还要密切，因此中国土地问题的比重较之沙皇俄国时代还要少得多。”（见“不断革命论”三〇页）

托洛茨基始则在“理论上”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继则取消富农是一个“异己的冒险主义的”阶级，托洛茨基实在不难再进一步的宣布殖民地的革命在一个国家内是没有胜利的可能

了。斯达林同志老早就说过，托洛茨基的确已经回到他的老父亚克雪浴德那里去了。他一天一天与布尔什维主义隔离，与社会民主党的旧理论完全接洽在一起了。社会民主党说：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在全世界各国都同时爆发，才有容易胜利的可能。

这些话，本来是用不着多说的，因为他已与“左”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绝对一样，假使托洛茨基主义派在中国不企图与党的路线争辩，不企图以不断革命论，和工农民主专政相对立的话，托洛茨基主义对殖民地农民革命的取消态度，必然要变成左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武装干涉反对殖民地世界的一个不断派。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在他用广大群众英勇斗争的精神彻底的肃清一切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的农奴制度的时候。在他面前必须打破国际帝国主义流血的阴谋，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工农群众必须使用绝大的力量。

还是在一九〇八年的时候，列宁就指出过，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之非人的压迫已经造成了伟大的革命斗争力量的前提——“欧洲对亚洲殖民地的劫掠已经锻炼了一个日本取得了伟大的军事胜利，以保证他独立的民族的发展。没有丝毫疑义的，英国人对于印度数世纪来的劫掠，与所谓“先进的”欧洲人反对波斯与印度的德漠克拉西的斗争，在亚洲已经锻炼了数百万数千万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可以取得同样的胜利（如日本一样）以反对压迫者。”列宁还是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上便已如此指明出殖民地解放运动有力的那一面，托洛茨基先生在一九三〇年——在世界经济恐慌与帝国主义资本向工人阶级与殖民地实行总进攻的环境下！——却无耻的向全世界宣言说：殖民地的革命在一个国家内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革命，有他的今天和他的明天，新的中国革命还没有生长成为完备的样式，但是他已经敲开了门，为要他公开的爆发出来，便必需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坚忍的力量，需要群众发动的力量，在实际上团结起数十百万饥饿的失望的农民。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夺取的一切优越权利，均应该完全取消，因为经济统治地位

的保存与中国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是完全不两立的，外国的企业必须收归国有。至于中国的企业，这在目前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够把工业国有作为自己最近的任务，这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怕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而是因为他为取得斗争的胜利，不能将自己的革命使命与农民群众的动摇性，及领导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完全隔开。中国无产阶级还不能严厉的集中供给，严格的限制贸易自由，因为他还应该避免一切虚伪的方法，免得农民群众误解我们要破坏小农经济。

目前根本的中心的任务，在革命的意义上来讲，还是在转变中国的农村经济。中国的资产阶级若要采取此种或他种方法，以停止国内一切工业的生产，那么他便必须遭受革命打击，一直到没收他停工的工厂。但是一切革命的手段都应该产生于斗争的逻辑，——为群众所通过，适应群众自己所了解的利益。

在中国，快要来到的并不是他自己的一九〇五，他已经更进一步了，然而还没走到十月的直接门户，他前面还有许多过渡的阶段，这些阶段只有战斗才能解决，只有将人民群众紧密的强固的团结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中国革命的高涨需要国际无产阶级伟大的帮助。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是要来压迫中国革命的，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只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去回答他。中国现在是全世界一切矛盾的集中点。中国革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每个劳动者不仅要明白这一点，而且要知道他自己在全世界反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队伍中的地位。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1期)

中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

顾秋莫夫

“在人口异常众多，社会条件异常特殊的东方各国里，将来的革命，无疑的要表现出一种比俄国革命更加厉害的特殊之点来：关于这一点，完全是欧洲的市侩们所梦想不到的，不消说，模仿考茨基而写的那一种教本，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是一种很有益处的东西，有人曾经这样想：这一种教本，已经预察到今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形式，现在，已经是埋葬这一种意见的时候了。谁如果还要这样设想的话，那我们把这种人叫作十足的傻子，这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了”。（列宁：论俄国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二编第一百二十页）

（一）

中国革命含有许多极大的特点；因为有这些特点，所以他不仅和西欧各国革命不同，而且就是和俄国革命比较起来也是很不一一致的。在一九〇五年的时期，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之下进行了自己的斗争，为的是要夺得工农民主的专政。这种民主的专政，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环境之下（由于许多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阶级各政党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实现了。这种民主专政存在的时期是十分短促的，而且是在一种特殊的“妥协的”偏狭的形式之下实现的，在两种政权形式之下，在工农代表苏维埃（甘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的形式之下实现的。

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环境之下，俄国无产阶级才附带地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彻底解决。

中国现时革命的行程便不是如此。

工农民主的专政在苏维埃形式之下存在着，增长着，发展着，他正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收集成千百万劳动的群众，使同时存在于非苏维埃区域的，还很强大的（主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之帮助），杀人无厌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不得不胆战心惊，坐卧不宁。

对于这一个不断发展的工农专政，足以左右一切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之正确的解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必须由无产阶级握住农民运动里面领导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农民运动，来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平均重分一切的土地，中国共产党将能扩展革命的斗争，将能发动几千万几万万（不仅几百万，好似现在一样）农民群众，不仅发动，而且在斗争中间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去争取土地，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主，——这样一来，中国革命伟大的胜利便有完全的保证了。

要知道：正确的解决土地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乃是解决中国革命目前这一整个的，比较长期的阶段（中国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之全般任务的关建；而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式，以及新的革命运动高涨过程中的许多困难，又在中国共产党及无产阶级前面提出了许多特别重要的组织的政治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又把无产阶级目前领导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具体化了。

在中共领导之下的新的革命高涨，已经获得了许多重大的成绩：苏维埃政权已扩展到包含有四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已增加到十万人以上；罢工运动正在向前发展，就罢工人数来说，中国罢工运动已居世界第一了。只有无产阶级的仇敌或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能抹杀群众运动这一些重大的成绩，才能抹杀中国

共产党这一些重大的成绩。

可是，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一个足以在全国范围内领导武装斗争以反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而又能在自己统治的区域里彻底实行各种革命设施的苏维埃政府，同时，中国红军，虽然正在发展与巩固；可是，还有许多的弱点，还保存有许多农民游击队伍和军阀雇佣军队的遗迹。中国的红军还没有力量去向国民党（更不用说帝国主义了）作一个最后的决战。

其次，革命运动之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南方各省已经充满了农民战争的火焰；而北方的农民，却还没有发动起来，而且，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业中心里面的工人运动，还很厉害地落在农民运动现有的规模之后，现在时局的特点，就是群众运动真正达到暴动程度的还只有单个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面，群众运动已经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取得了胜利，已经开始建设革命的军队和政府；可是，他还不能给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因此，在目前，我们还处在一个比较大的，“横在国内战争总过程各个伟大战争之间”（列宁的话）的间隔里面。

列宁在预察一九〇五年革命发展前途时所说的话，很可以应用到中国现有的环境上面来。列宁当时写道：

“武装暴动之采取更高度的更复杂的形式，武装暴动之变为长期的，笼括全国的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这是完全必然而不可避免的。

这个国内战争，必然是这样一种过程：经过几次大战争之后，就要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间隔，然后又开始一种新的大战争，并照这一种方式发展下去；同时，在这种比较长时间的间隔里面，又要发生许多小小的战争。既然是这样——而且无疑地是这样，那社会民主党（这是列宁在一九〇六年写的。顾秋莫夫注）就要努力造成这样的组织，能够最高限度地领导群众作这些巨大的战争，

而且又能尽可能地领导群众作这些小小战争的组织。”

这种能够最高限度地领导群众进行巨大战争与细小战争的组织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个问题,列宁在更早以前就回答过了。当俄国革命刚开始达到‘民众暴动最后发展阶段’——组织革命军队的时候,列宁就说了以下的话:

“由这种队伍(即指革命军队。顾秋莫夫注)来号召暴动,来给群众以军事的指导;这一种工作对于国内战争(也如对于其他战争一样),乃是必需的,这种队伍要造成公开的全国斗争的支柱,将武装暴动散布到邻近其他各区域里面去;保证——首先也许只在国内不大的一个区域里——十足的政治自由;开始用革命手段改造陈腐的专制的制度,尽量发展下层民众的革命创造力量;他们在和平时期是很少机会表现这种创造力量的。革命军队只有认识了这些新的任务之后,只有很勇敢地将他们尽量提出之后,他才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而成为革命政府的柱石。在民众暴动目前这一阶段,革命政府同样是一个迫切需要的东西,正如革命军队一样”(节录列宁所著的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三八四页)。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这一个前途(就算在国内不大的一个区域里,组织革命的军队与革命的政府)是没有实现的;革命政府是没有组织起来;而革命军队也没有存在多久,而且他所有的规模也是很很小很小的。

可是,在现时的中国,情形却不是如此。在中国,存在有革命的军队及苏维埃政权根据地,而这种根据地又在不断地发生与发展,共产党员正是根据这种事实来决定共产党目前的任务。

中国所有各种重要的特点:全国分成许多帝国主义势力的范围,封建式分裂的状态,中国反革命势力没有统一集中的政权,国内各地革命形势成熟之不平衡,末了,中国疆域之广大与人口之众多,——所有这些,都是决定中国革命之特殊发展道路,特殊

斗争形式与方法的因素，使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例如西欧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这一些特点，根据摆在革命前面的各种困难，以及群众运动所已经得到的成绩，便提出了下列的任务：

（一）组织常备的，纪律化的，工农的（就其成分来说），共产党的（就其领导来说）红军。这个红军，必须在革命的苏维埃区域里面建立自己的强固的根据地。

（二）组织强有力的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必须要能够在自己所属各区域里面，彻底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各个基本的口号，必须以自己的行动来联合与动员中国劳动的群众，使其去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在一切大的工业中心里面，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局部的经济的斗争，更加紧使这些斗争革命化，将无产阶级这些斗争与一般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就是说，使其拥护苏维埃区域的斗争，为达到苏维埃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形式）的胜利而斗争，联系起来。

这是三位一体的任务，这是一个总的任务，把这一个任务实现出来，就可以使中国革命很有成效地发展前去；就可以使群众运动，使无产阶级领导权所巩固起来的群众运动，使无产阶级经过国家政权而实现的领导权所巩固起来的群众运动（红军及苏维埃政府，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一种极伟大的发展；就可以保证中国工农群众在国内战争之大决战中，得到完全的胜利，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

反革命的托洛斯基派与被共产党驱逐出去的陈独秀派，为要反对共产党的总路线，相互之间已经结成联合的战线，企图破坏中国工人与劳动农民群众日益发展的进攻。在他们中间，因各人

嗜好与心理之不同，也有人照旧拿着虚伪的“左派”辞句作护符；而另一部分人，则简直把这些早成为废物一钱不值的辞句，完全抛弃了。

虚伪的，欺人的，“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的”辞句，其唯一的任务，就是掩蔽托洛斯基派及右的取消派之间一致的反革命的口号——召集军阀式的“立宪会议”“全权的国民会议”（托洛斯基的话）的口号；他们这一个要求，是完全反革命的；反革命势力（国民党最近中央全会），已经利用他来反对工农革命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唯一革命的（在目前环境之下）口号了。

在目前残酷的国内战争的环境之下，在蒋介石进攻红军与苏维埃区域的环境之下，谁提出这种反革命的主张，企图转移革命群众的视线，企图使革命群众不去拥护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军队，却使其反转来走入“和平”“合法”斗争的邪途，使其停留在还未实现，可是早已反革命达于极点的，军阀式的，刽子手的混血的“国会”范围之内，谁提出这样的主张，谁就是工农群众之公开的生死的仇敌，这一点，已经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所完全明白了的。

中国先进的工农，正在向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的工农，已经知道托洛斯基下面的说法，完全是反革命的，专门拿来欺骗民众的说法。

“在目前，谁如果把苏维埃口号看作迫切的口号，谁就是冒险主义者，空谈家。反对军事专政的斗争，必须采取一种过渡的形式，必须提出一种过渡的革命民主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可以归结成为一个总的要求，即召集中国的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必须根据普遍的，平等的，不记名的，直接选举制产生之，其目的就是解决中国目前各个重大的问题：施行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土地，保证民族之独立……。”

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革命群众，正在争取自己的苏维埃的政权，建立自己工农革命的红军，分配土地，设立革命的法庭以杀

戮反动的奸细。在苏维埃政权区域里，革命群众之创造的发动性，一天一天发扬出来了，群众的牺牲精神与革命的热情，一天一天增长起来了，朱毛红军斗争的历史，几百万“少年先锋队”及工农自卫队斗争的历史，是一段非常英勇的，非常忠于革命的历史。

当革命热情这样沸腾的时候，反革命的取消派，却企图掩蔽在虚伪的“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的”辞句下面，引诱工农来出卖这一种猛烈的，成绩卓越的（这一点特别重）斗争，引诱他们去要求国民党式的“全权的国民会议”，等待他来施行八小时工作制，解决土地问题与“保证民族之独立”！

在这一个共同的反苏维埃政权，反红军的政纲上面，中国右派的领袖——从共产党开除出去的陈独秀之和托洛斯基打成一片，陈独秀之很快接受不断革命的口号——一点革命气味也没有的口号，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在现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条件之下，半托洛斯基主义者与右派（虽然两者的纲领，还稍许有一些差别），都是反映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倾向于使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使苏联走上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在另一种条件之下，即在革命的中国，托洛斯基派与陈独秀派也是共同执行资产阶级的意旨：根本破坏工农革命的运动，帮助反革命来破坏与消灭新的革命政权与革命军队的萌芽——尚未巩固的，年轻的，但已经很强大的，生气勃勃的萌芽。

因此，向托洛斯基主义及陈独秀主义作毫不调和的斗争，是共产党向前发展，领导群众，以取得胜利的必要的条件。

（三）

因为中国革命高涨及其全部国际及国内环境有许多特殊之特点，所以共产党员必须要有非常严格的纪律性，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及组织性；奋不顾身的革命勇气，同时又要慎重地估计到自己

的力量及敌人的力量，要用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将这两种特性配合起来。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应用无产阶级一切组织上的力量，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任务。

要使革命高涨得到更进一步的、左右一切的胜利，就必须解决下列几个最大的组织的政治的任务：从半游击队伍来组织工农常备的红军（在农民游击运动向前发展的条件之下）；同时，并建立革命的苏维埃的根据地，以图向前收集与团结革命的力量；向前发展工人罢工的斗争，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革命运动扩展于全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单靠革命的狂热，短时期的革命行动，是不能解决这些任务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坚定性，坚忍性，组织性——这就是目前把革命运动推进到更高阶段所绝对必要的性格。恰巧就在这种新的，要转变到提出与解决中国革命新任务的条件之下，在中国共产党一部分领导工作同志（以李立三同志为首）中，便暴露出一种动摇来；这部分同志并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路线——实际上便是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路线，这路线是完全仇视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路线的。这部分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领导工作同志，完全脱离了革命的工农群众，甚至于连一次也没有到过英勇的反国民党的斗争最剧烈发展的区域，更不必说苏维埃区域了。李立三同志只是一味地从事于纸上谈兵的勾当，专门坐在屋子里起草“革命的”通告，论文，“最革命的”必遭失败的计划；结果，他就和共产国际剧烈冲突起来；同样也就和自己的党剧烈冲突起来；而他那种想把自己的党拉来反对共产国际的企图，也就遭受了可怜的失败。在一九一八年时期（与中国现时局面完全不同），列宁在苏俄给“左派”的所下的估计，很可以拿来估计李立三同志所领导的这一部分同志的情绪。列宁当

时说道：

“我们的‘左派’，完全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及其准备，他们遍身都充满了失掉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与小资产阶级）

当这些知识分子的“上层分子”“与上层分子儿”反对这些伟大的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的组织任务时，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工人及被剥削的农民群众——恰巧就是这些群众，却能在实际上，在实际革命工作中，一天一天地，布尔塞维克式地，平民式地（而不是政客式地）解决土地的问题，解决自己的工农军队与工农政权的问题。

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实，就是当联共里面“左”右派联盟（洛明那慈与瘦草夫）正在用两面主义的方法，来反对联共总路线的时候，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洛明那慈同志的学生——瞿秋白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上面，以口头上承认“单个策略上组织上错误”的方法，极无原则地掩盖了分歧的实质，把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还未揭露出来的李立三路线，和党内及李立三政纲内许多极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都掩盖了起来。

因此，在这一个时候，斯大林同志不久以前在另一环境与对另一种任务所下的估计，便很适宜于拿来分析中共目前的任务。

“我们目前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在于：反“左倾”错误的斗争，正是胜利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胜利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特殊形式。”（斯大林：给集体农庄同志们的回答）

那么，这个反列宁主义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的实质（现在，就是李立三同志本人，也拒绝和斥责了这一个路线），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李立三同志用另一条，半托洛斯基主义的战略的计划，来对抗我们上述的那个战略的计划。照他的意见，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土改革命，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就不能取

得胜利，他认为产生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到处成熟了。因此，共产国际应当在全世界采取“进攻的政策”。因此，李立三同志认为，在中国内部，可以实行没有准备的暴动，而实现这一种暴动，是要使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陷于破坏的。

在这个理论里面所包含的许多盲动主义的成份，很快就被中国共产党所铲除了，并没有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得到完全实现的机会。因此，这个理论所剩下的东西，就只是一种托洛斯基主义的，对列宁学说的否认，否认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否认革命不平衡的成熟；只是一种托洛斯基主义的不信任主义的观点，不信任：中国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之胜利，可以不需要世界革命直接随他发生或与他同时胜利的条件。这一种理论，可以使党陷入机会主义，消极等待主义的地位。可是，就是这一种理论，也已遇见党内群众严厉的反抗；并且被他们称为一种与列宁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观点。

其次，李立三同志又根据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说没有大的工业中心，就不能组织苏维埃政府；因此，李立三同志在事实上是拒绝了组织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拒绝了在革命的根据地上建设常备红军的任务，只是命令红军去作经常游击的进攻省城的战争。完全根据托洛斯基主义的精神骂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路线为“地方保守主义的”倾向。托洛斯基主义者认为：苏维埃政权只有占据了大的城市之后，才能有成效地建设起来，如果没有这种条件，那么，农民是不能有所作为的，他既不能建设苏维埃制度，也不能建设红军。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分领导工作同志（以李立三同志为首）并不能给这种观点以反抗。

李立三同志是不能给这种观点以反抗的，因为，他没有估计到无产阶级目前已有的那种伟大的政治组织者的力量；在目前无产阶级已经（甚至于就是在城市运动比较落后的条件之下）应用他这种组织者力量来领导农民运动了。

无产阶级已经经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而在政治上规定了农民的要求（没收地主的财产，重分一切土地，以满足贫农的利益），无产阶级正经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红军的战争，而且无条件的要在中国苏维埃政权里面取得大多数。

在中国革命目前这一阶段上，无产阶级已经在工农民主专政机关中间（苏维埃与红军）实现自己的领导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日益在国家政权里面巩固起来。

因此，托洛斯基主义的说法（说苏维埃政权必须发生与巩固于工业的中心，然后才能扩展到农村中间去），已经遭受了完全的破产，暴露出自己的投降主义的实质，这样的说法，对于先进的工业国家（如德国）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对于中国这类的国家，则已经完全不符事实了；列宁早已预料到，在这类国家里面所发生的革命，将“表现出一种比俄国革命更加厉害的特殊之点来”。

同时，中国革命的经验，完全暴露出托洛斯基主义之孟塞维克主义的实质；不仅是否认农民运动的作用，而且完全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完全不相信无产阶级的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

李立三同志，因为抱着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所以就忽略了一切在土地革命区域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很明显的，李立三同志，既然抱有这种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自然也就不能以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来提出目前阶段中最主要的任务——在革命根据地上面建立工农常备的红军，也就不能“给群众以军事的指导，保证（首先也许只有本国不大的区域内）十足的政治自由……尽量发展下层民众的革命创造性”。（列宁的话）

因此，李立三同志，以及瞿秋白同志（在三中全会上）也就不能估计到红军进攻长沙所得的重要教训，而只是用政客官僚的口气，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开始“和国民党实行正式的（！）战争”（摘录瞿秋白同志的结论），却没有尽量提出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

问题，完全没有了解：在目前情形之下，在现有的工农力量组织程度之下，是不能给帝国主义的与国民党的要塞以迎头的打击的。而且李立三及瞿秋白同志又没有指出长沙党部领导同志所犯的那种不堪入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同志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完全忽视了群众的独立性与发动性，完全忽视了组织工人阶级的任务，完全忽视了建立真正群众的，真正由选举出来的城市工人兵士贫民代表苏维埃的任务。

李立三同志，既不了解由无产阶级经过常备的，有纪律的红军及苏维埃政府以领导农民的任务，自然，也就不能给土地革命（农民争土地的斗争）目前的任务，以任何具体的回答了。

由公开右倾机会主义（主张“联合富农”，反对给雇农与红军兵士分配土地等等），动摇到主张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开始“把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动摇到主张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苏维埃农庄与集体农庄，动摇到投降于托洛斯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这就是李立三同志在土地问题上的“路线”。

值得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共领导机关中这一部分所谓“左倾的”同志，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喊得很“左”，要求共产国际采取左的“进攻的”方针；可是，他们却甚至于不能给许多党部里面这一种右到极点的机会主义的实际工作，如像将土地留给“贤良的”，没有逃出苏维埃区域的地主等，给以应有的反抗！

李立三同志与瞿秋白同志还比不上先进的农民，因为，先进的农民都知道以平民的手段对付地主，根据（主要的是这样）人口多少（而不是根据生产工具之多少）来分配土地；而李立三同志及瞿秋白同志则完全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因此，关于没收一切地主（“贤良的”也罢，恶劣的也罢）的财产的任务，关于给贫农与中农来彻底重分一切土地的任务，关于组织贫农团及巩固与中农联盟的任务，都为李立三同志及瞿秋白同志所仇视，这一点

也是完全显而易见的。

恰巧就是在中国革命这一个中心问题（土地问题）上，完全暴露出“左倾”词句的实质：“左倾”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蔽极右的事业，掩蔽右倾机会主义的勾当，阻碍土地革命，拥护“贤良”地主及“贤良”富农的利益。

李立三同志在工人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是同样的严重，同样是足以危及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李立三同志很巧妙地造出一种奇异的理论，否认工人运动落后的事实，反过来辩护这种落后，赞扬这一种落后，称之为革命的美德。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工人群众中，中国共产党是负有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

大家又知道：这种政治影响在组织上的巩固是多么薄弱；秘密的赤色工会是多么薄弱，会员是如何的少；党内无产阶级的成份是如何的有限。

在这种条件之下，李立三同志不集中全力去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不去使党的政治影响与其组织影响互相适应起来，却反而在其发表于布尔塞维克及红旗上面的论文里，说出这种的论调：“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之下”，“主观的力量”是不重要的。这完全是追随自发性的尾巴主义的观点。而且，在他的冒险主义计划十分流行之时候，他在事实上已经把职工会及青年团取消了，用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上层分子的“中央行动委员会”，来代替了他们。

李立三同志，不但完全不注意工人阶级职工会的组织，而且又完全反对发展工人阶级局部的经济罢工的斗争，而且以毫无准备的“总”政治罢工当作儿戏，结果自然要妨碍工人阶级的发动性，自然要减弱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自然，在这种反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能消灭现有的工人运动落在农民战争之后的现象；而同时，为要保证中国革命真正的胜利的发

展，共产党又无论如何都要消灭这个落后的现象才行的。

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战胜党内李立三这种半托洛斯基主义的盲动主义的观点，如果不同时毫不妥协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在实际工作中，右倾机会主义依然还是主要的危险；而“左倾”的李立三路线，又正是右倾机会主义直接的掩护，就不能在中国革命里面实现正确的布尔塞维克主义的领导。

现在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正是如此。他正在执行列宁的指示：

“唱高调，吹牛皮，——这是失了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特性，富于组织性的无产者，会要惩罚他这一种“癖性”的；惩罚之法，大概是要将他们嘲笑一番，并将他们赶出任何重要职务之外了。”

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就要使自己的布尔塞维克主义化，更进一步，就要使自己的队伍在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更加团结起来。

（选自《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2期）

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

秋 白

一、飞机炸弹枪炮大刀之外的又一武器。二、国民党和托洛斯基派眼光里的共产国际。三、陈独秀托洛斯基派的中国革命消沉论和国民党的统治。四、“盲动主义的过火”恰好是国民党杀人放火的“理由”呀！五、共产国际的组织力量“薄弱”，可是，国民党和托陈党且慢高兴。六、国民党对于托陈党已经钦赐“批评自由”了。七、国民党口中的托洛斯基派立场。

一、飞机炸弹枪炮大刀之外的又一武器

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现在是用全力来压迫。所谓“剿赤”的大军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起码也有四五十万，从今年五月蒋介石亲自出马到现在，也已经有四个月了——以前的还不算在内。单这四个月里面各地方被屠杀的民众，真是数也数不清。国民党的报纸上天天说“捣毁匪巢之伪政府党部”，“杀死几千几万匪徒”“俘虏几万数十万”等等，如果照他们的数目算起来，国民党杀人放火的结果，至少也有五六百万以上的人民是被杀掉了！可是红军却仍旧存在着，有些地方而且还在发展。国民党的这种屠杀政策，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无非是保护中国豪绅地主的剥削和权力，无非是保护中国资本家的发财，无非是想用武力强迫工农民众做他们的奴隶牛马。然而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始终存在着发展着，虽然当前碰着极大的障碍，极困难的情形，而始终不但不消灭，反而日益得到更

广大的民众的同情和帮助，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正是因为他们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指导，因此不但客观条件有利于农民战争的开展，而且这种农民战争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能够日益进步。所以国民党的唯一政策就是竭力企图消灭共产党。大城市的租界政府，各省各地的军阀政府一天到晚是在捉共产党，一天到晚是在压迫工人运动，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运动。革命工人，为着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工人，甚至于简单的只开始表示反对减少工资反对苛刻待遇的工人，都被捉到监狱里面去，受着非刑拷打，以至于枪毙砍头。普通的革命份子所受到的也是同样的待遇，——只要他们敢于对工人农民表示一点同情，只要他们敢于说几句话做几篇文章来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残民的罪状，而主张工农劳动民众夺取政权，他们的脑袋就立刻会有脱离身体的危险。至于共产党员，那更不用说了。这样，国民党用来维持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武器，是样样都有的了：攻打红军的飞机，炸弹，毒瓦斯，大炮，机关枪，枪毙革命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枪弹，砍他们头的大刀，监狱，审判厅，一切稀奇古怪残酷暴虐的刑具。……可是，所有这些武器，看起来都不能够保证中国革命的消灭，都不能够保障国民党的江山。共产党在民众之间的信仰反而一天天的扩大起来巩固起来。

因此，国民党还企图用欺骗民众的反革命宣传来蒙蔽人民。蒋介石自己说过：他是一只手拿着国民党党义，一双手拿着枪炮去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什么？就是工农民众应该做奴隶牛马的理论。国民党宣传这种主义的时候，说句蒋介石自己的老实话，就是对民众说：你们不接受三民主义，你们不安心做奴隶牛马——你们不实行劳资合作，不牺牲阶级利益而为着中国民族（豪绅地主资本家）做苦工，那末，我们就请你们吃枪炮，吃炸弹，吃大刀，吃鞭子，总而言之，就是要你们的命。事实上的确是这个样子，无论是中央党部省党部市党部，无论是张学良是

汪精卫是蒋介石戴季陶，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表面上，国民党总要讲几句体面话，总还想迷惑民众。

不过，因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太醜了，太无聊了，太血腥气了，广大的真正下层的劳动群众实在听不进他们的话。他们竭力要在民众之中破坏共产党的信仰。然而他们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民众却看见国民党自己才是真正大杀人大放火，他们说共产党卖国，民众却看见国民党自己真正是个帝国主义走狗……这怎么样办呢？

好了，救兵到了——出现了一个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托陈派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冒充列宁主义者，出来骂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于是乎国民党在飞机，炸弹，枪炮，大刀，监狱，法庭，三民主义的宣传之外，又多一个武器——托陈派对于共产党的造谣。

大家请看：最近自从蒋介石“御驾亲征”以来，一切国民党的报纸杂志都争先恐后的登载托洛斯基派陈独秀派的文章，例如“光明之路”杂志上最近（第一卷第十期）就有一篇“托洛斯基派口中的共产党”，这简直是完全照抄陈独秀刘仁静等等的文章。

二、国民党和托洛斯基派眼光里的共产国际

中国劳苦群众革命的力量，在于他们能够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中国无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对于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是极其宝贵的，极其有力的领导。共产国际正是代表这种革命经验和组织力量的总机关，在他的领导之下，苏联共产党正在建设着社会主义，欧美一切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城乡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团结日益增长，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民众的解放运动，真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都围绕着他的旗帜。

因此，做帝国主义走狗的国民党，自然对于共产国际非常之切

齿痛恨。托洛斯基派在这里就给国民党一个“很好”的帮助。请看：

国民党说：共产国际在苏联实行的五年计划是资本主义的建设，是要对世界各国实行经济侵略，是要用屯田政策夺掉中国地主资本家的生意。托洛斯基派也说“斯大林派”的政策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消失，变成功富农的国家；进行着资本主义的复辟等等。

国民党说：共产国际是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方民族。托洛斯基派也说苏联对于中东路问题的办法是侵略中国，在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时候国民党做着帝国主义的爪牙，首先进攻苏联，企图挑拨起各国反对苏联的战争，而托洛斯基派到处都宣传不要帮助苏联！

国民党说：共产国际曾经企图包办中国革命，等到“土地革命的政策行不通，煽动阶级斗争的阴谋失败之后，又说中国国民党反动”（胡汉民的话）。而托洛斯基派也说：共产国际“反右倾是强迫执行盲动主义的政策，反左倾，是留作失败后之说话余地”（反对派告全党同志书），——这就是“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之唯一的秘诀”。

这种谣言诬蔑，国民党立刻利用起来，在“光明之路”上就引用这些话来说：“像这样的国际领导机关，哪里有一点资格配领导世界革命，实质上早已宣告破产了”！（“光明之路”第七期第三页）。

国民党要放谣言宣布“共产国际早已破产”，这是对于他们有利益的，他们要企图迷惑中国民众，使民众不相信共产国际的领导。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陈派在这里就老老实实是国民党的走狗！本来，国民党的幻想是要中国民众根本反对共产国际，甘心做奴隶牛马，完全不认识阶级利益；然而最近几年革命的发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了，——民众对于共产国际的信仰一天天的是在增高；于是国民党退一步想，指使一班走狗来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什么共产国际领导错了，说什么“在阶级利益立

场上看来，中国工人正不可以相信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早已破产了”，——这班走狗就是托洛斯基陈独秀派。

三、托洛斯基陈独秀派的革命消沉论和国民党统治

托洛斯基陈独秀的真面目，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冒充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派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代自己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实行机会主义，等到那次革命失败，却来说什么“共产国际断送了中国的革命”。这叫做死不要脸。当初陈独秀派为什么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呢？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能够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所以他们认为共产党用不着去领导无产阶级实行联合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也用不着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照他们的意思，共产党应当怎么办呢？他们说：应当让汪精卫实行分共政策，至后，中国可以有资产阶级式的民权自由，可以定定心心做些国会运动等等。这是要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政党。陈独秀派的这种观念一直保存着，到一九二九年，陈独秀等就公开的出来说：“你看，从汪精卫直到张学良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的革命完成了，封建势力已经只剩得余孽的余孽，国民党政权可以稳定，统一，而且将有长足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托洛斯基派以前在苏联用些左倾的空谈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直到现在还自称“左派反对派”。他们的“左”，“左”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左”原来就在于断定现在全世界都没有革命运动的高涨，全世界都是反统治的日益稳定，中国更因为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已经走进了两个革命之间的反动时期，中国国民党统治稳定而统一，应该做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发展他们的经济日常斗争，领导他们的斗争到争取政权的斗争方面去，领导日益发展的农民战争，创造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而是国民会议运动。这样，事实上是自称“左派”的托洛斯基自然而然的

暴露自己真相，和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机会主义的最右派的陈独秀走到一块去。他们事实上始终只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丝毫没有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气息。他们只在梦想着世界的以及中国的统治阶级快些稳定，给他们一点的当议员做社会改良“事业”的机会。

这种机会主义，客观上不能够不很快的走到反革命营垒之中去。现在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是已经走到了。恭喜恭喜！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一九二九年年底到现在一天天的深入，各国从德国一直到美国都在闹着恐慌，有些地方，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已经发现许多工人巷战，印度非洲等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都在开展，分化，深入。这些情形是不是证明共产国际的观察呢？稍微顾一点事实的人，不能不说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中国呢？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是否统一了中国，完全了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呢？一九二九年年初开始的新的军阀混战——国民党的军阀混战，断断续续一直继续到现在，快要三年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剥削还在日益加重，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动摇，一切种种资本家都赶紧依附投降勾结各派各系的封建军阀，运用武力竞争的新式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方才能够勉强自存，而一般的中国工业就都在极深刻的危机之中，——这在没有出路的中国农业的根本危机的背景之上，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的环境之中，是自然的现象。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继承着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伟大的革命经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肃清自己队伍里面的机会主义分子（如陈独秀之类），锻炼出新的领导，在这种客观条件之下自然不是去做什么国民会议运动，而是准备着自己的力量去争得工农民权独裁的建立——苏维埃中国的建立。极艰苦的大城市之中的工人运动，领导农民战争——红军的产生，苏维埃区域的扩张，都是这种准备的进行。这三年来的事实，是否是中国革命

高涨的复兴呢？谁都不能有什么怀疑的，因为这是大家看得见的事实。

然而托洛斯基派陈独秀派却说：世界没有革命高潮，中国也没有革命高潮！“中国的革命是消沉”了！

这种事实连国民党都不能够否认了。国民党自己反对中国的工农劳动民众，“剿匪”哪，捉杀共产党哪，始终是越剿越多，越杀越旺。他们不能够不深刻的感觉到自己统治的动摇。国民党所最怕的正是无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认识清楚这种客观环境，而团结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使他们自己的斗争很快的从自发的进到有组织的。因此，在这没有办法之中想出办法来了：这就是利用托陈派的宣传来淆乱工农群众的耳目。国民党的反共机关报居然也说：

“本来革命高潮是要一定的时期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形成的，不是随时随地都发生的。但是共产党为要实行其不断的盲动政策，随时随地都瞎吹革命高潮已经到了，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了”……“尤其是信口胡吹，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二页）。

国民党而说出这种话来，岂不是天大的笑说！不是不是，他们是照抄托陈派的文章的，在这些句子底下便引出了一大段托陈派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谣言。本来说起来是很可笑的：国民党忽然说“革命高潮”了。如果国民党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统治，那么，早就要请他们滚蛋；如果国民党仍旧是叫共产党是“反动的”，那么，这里所谓“革命高潮”应当是“反动高潮”了！这里的道理是：国民党自己的三民主义，训政时期，考试制度——造产建设等等的所谓“学说理论”，实在太说不通了，群众对于革命高涨的认识实在是一天天的清楚起来了，因此，国民党就用托陈派的话来说。这意思是讲：你们看——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托洛斯基陈独秀，也说中国和世界没有革命高潮，你们快

些不要暴动罢，不要干红军罢，不要闹苏维埃区域罢，快些来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劳资合作，提倡国货……！这倒要算是“聪明的”办法！这里，托陈派又是国民党的功臣。不过，还可以不算功臣，而算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因为：国民党说训政时期，托陈派也说统治阶级稳定，国民党召集国民会议，托陈派也在主张做国民会议运动……真正心心相应呵！所以说托陈派是国民党忠实信徒一点儿也没有错。既然是一家人，也就不便居功——他们的努力维持国民党统治——反对红军，反对示威……——正是三民主义的忠实走狗应尽之义务了。

四、“盲动主义的过火”恰好 是国民党杀人放火的理由呀！

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怎么样替国民党尽义务呢？他们也来反对盲动主义了。然而我们要知道：盲动主义错误的来源，正是党内有些同志没有完全脱离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是：中国革命，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一定要等待全世界大革命同时爆发。那么，如果某一地方的工农群众已经发动，斗争已经爆发，红军的战争已经开始，那时怎么办？——照托洛斯基主义的逻辑的结论，就只有二条路：一是放弃斗争完全投降，在工人罢工之中是妥协屈服，在农民战争之中是退守以至解散自己的队伍，这是右倾的机会主义；二是盲目的拼命，不顾群众的组织准备工作，用孤注一掷的办法，在工人运动之中就是儿戏的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人的暴动尝试，在红军战争之中就是绝对不要根据地不要准备从内地冲向大城市，从各省冲向武汉上海，仿佛这样便会立刻引起全世界大革命的同时爆发来救中国革命，这是左倾的盲动主义。这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曾经做过的——我们公开的承认，我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已经纠正这种错

误！——革命的先进的阶级决不隐讳自己的错误，他正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之中增加自己的力量整齐自己的队伍，向着胜利的前途走去。可是，托陈派所反对的盲动主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盲动主义呢！当然不是，因为这种盲动主义部分的就是托洛斯基主义的变相。他们是不会反对自己主义的。他们所反对的盲动主义，却是他们造作出来的谣言：他们说共产党用强迫的方法和收买的方法逼迫群众去示威，他们说红军敲竹杠强奸等等。这些完全是他们的造谣！

工人发动群众的示威，如何能够强迫，如何能够收买呢！？这很明显的——是这些托陈派当初在共产党内反对示威运动，结果多数同志不赞成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说：赞成示威的是得了钱了。这是何等卑鄙齷齪的政客手段！

红军的工作人员，红军的兵士如何会敲竹杠强奸等等呢？各地的豪绅资本家和国民党要这样说，托洛斯基陈独秀也这样说！他们无非找着几百件几千件之中偶然的一件事情，偶然的一个人的罪恶行为——苏维埃政府立刻要惩办或者已经惩办的行为，就说是整个红军的情形，好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不要游击战争，不要红军！这是何等明显的反革命！

果然，国民党把他们这些谣言引出来，立刻就下一个断语：

“以上所说，已经把共产党的罪恶，刻划得淋漓尽致，真如电影一般一幕一幕的活现纸上，煞可观也”（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五页）。

这意思是说：请看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陈派也说共产党和红军的确是奸淫掳掠收买匪徒无由取闹的流氓，所以我们国民党用飞机瓦斯毒炸死论千论万的这些工农是有理得很，所以我们国民党捉杀共产党工人开枪轰杀示威民众也是有理得很！大家想想，托陈派对于国民党的功劳是多么大呵！！

五、共产党组织力量“薄弱”， 可是，国民党和托陈党且慢高兴！

国民党在托陈派的赞助之下，拼命的摧残工农运动；他们的狗运气好的时候，破坏了些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勉强的表示高兴，引出托陈派的文章，来证明自己反革命的功绩。他们说：

“总之以观，可知共产党组织的薄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什么力量维持其存在！”（‘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六页）。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固然并不是大得了不得，好得了不得，——共产党自己绝对不吹这样牛皮，共产党天天是在切实的检阅自己的力量，缺点，弱点，艰苦的进行群众之中的各种组织工作。然而共产党的“薄弱”决没有像托陈派所说的那样无希望！

托陈派已经成了另外一个党——资产阶级走狗的党，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认为共产党是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因此，他们竭力说得共产党丝毫也没有组织似的。他们梦想着用这种宣传动摇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涣散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且企图扩大自己的走狗党，替资本家尽力。他们企图用这种宣传散布悲观绝望的情绪，阻碍革命运动的发展。这种手段恰好对于国民党有点用处，国民党拿他们的话来“自欺欺人”。“自欺”是安慰安慰国民党，说共产党快要消灭了；“欺人”是迷惑民众，说共产党已经不能维持其存在了，你们也死了心罢，不要革命了，安心做奴隶牛马好了。这里，托陈党的谣言又是好宝贝！

但是，你们这两个反革命的党，都慢些高兴！受托陈派欺骗的工人分子——极少数的人，现在已经了解陈独秀等的反革命的实质，而回到党里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正在日益进步的工作之下，日益密切的和群众联系之下，开始新的发展。国民党的欺骗，即使借用那些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陈派的话，也是始终没有

多大作用的！

六、国民党对于托陈党已经钦赐“批评自由”了！

现在——我们看见国民党的特别专门反共杂志“光明之路”以及其他一切国民党刊物上面时常很高兴很得意的转载托洛斯基陈独秀派的大文章，——我们不能不回想起陈独秀等最早的态度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以后，直到那年年底，陈独秀说些什么？其余的托洛斯基派的口头禅又是什么？他们总是说：共产党里面是官僚主义的统治，没有自由讨论，没有自由批评。他们很要求“批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批评自由，他们反对所谓官僚主义。固然，共产党内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可以发生官僚主义的错误，可是，这正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竭力反对的。至于托陈派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实际并不是反对什么官僚主义，当他们能够执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例如陈独秀当权的时候，都竭力企图实行完全十足的官僚主义，以保障其机会主义的顺利进行的。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事实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纪律！

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党员，本来是要团结得很紧，我们的道路是艰险的困难的，我们党员大家既然决定了走这革命的道路，自然就要有严格的纪律来团结我们，锻炼我们。我们的四周围都是仇敌，我们时时刻刻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极想自由的决定自己的道路的——决定要革命的，而加入党，这就是决定要和敌人斗争，而不是投降敌人，不是和敌人妥协。可是，党员之中有些人忽然跑出来讲：我们大家都去投降罢（解散红军，抛弃苏维埃的旗帜，参加蒋介石的国民会议，停止示威运动政治斗争）。党员的大多数反对他们，说他们几个人的主张是投降是自己解除武装，而这班人却大叫起来：啊哈！你们是官僚主义者，你们禁止自由批评！自然哪，你们要妥协要投降有你们的自由！现在国民党已经钦赐你这种自由了。国民党的报纸杂

志转载你们的文章，引用你们的理论和谣言；总之，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随便你们怎样“批评”造谣，谩骂，诅咒，你们已经得到国民党钦赐你们的极端充分的自由。你们的心愿达到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们现在在国民党御用之下，帮着他们的大炮机关枪来进攻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农民群众，中国的共产党，运用你们的笔尖，信口造谣毒骂……大概比以前在共产党内“受着强逼”的做“违心之事”——赞助工农为工农服务，要来得舒服得多罢，因为现在这种地位，实际上的反革命地位，对于你们真是称心如意，一点儿不自由也不觉得了。

七、国民党口中的托陈派的立场

托洛斯基陈独秀派这样的帮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红军——和国民党异口同声的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流氓土匪，反对工人——和国民党异口同声说工人示威是受共产党的收买，诅咒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说是“不能够维持其存在了”，骂共产党是官僚主义禁止人家的批评……总之，托陈派在国民党的飞机炸弹枪炮大刀三民主义宣传之后，替国民党添一种反革命的工具，添一种进攻工农群众的武器。然而国民党说：

“可知反对派——托陈派——和共产党是一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是二而一的东西”，（同上第一页）。

这岂不是赏罚不明恩将仇报吗？不然不然！如果国民党公开的称赞托陈派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说他们不是和共产党“二而一的东西”，那么，这些托陈派就丧失了他们的特殊作用了。国民党故意要说托陈派也是共产主义者，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然后才能欺骗群众，使群众相信他们的谣言。所以国民党故意说托陈进是和共产党“二而一的东西”，正是充分的运用这种进攻工农群众的特殊武器呀！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6期）

三 共产国际与立三 “左”倾错误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 与我们的中心任务（节录）

（1930年2月21日）

立 三

七、我们的中心任务

综合各方面的分析，帝国主义极难调协相互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极难解决自己前途的障碍，经济上极少发展的可能，政治上极少稳定的可能，目前虽在两派相持之下而造成一种暂时妥协，虚伪和平的局面，但是根本的矛盾并未减轻，战争终不可避免的爆发，群众斗争又在开始复兴，所以很明显的革命是在生长，革命高涨不可避免的来到。这一总的形势与党的第六次大会时的是更加明显了。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必须严重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比重——同时就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比重又加大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影响又扩大了一些，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又增长了一些，这的确是增加了一些革命的困难。并且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看我们能否很快的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来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有正确的策略，艰苦的工作，那么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将会要继续的扩大，而更延长革命的高潮到来的时期，所以我们目前策略上的中心任务，就是怎样与改良主义斗争，怎样来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危险，争取极广大的群众都走向

革命的道路上来。

现在有两个极端的观念，客观上都是以帮助改良主义影响的增加，妨害革命的进展。

第一，以为改良主义没有一毫实现的可能，或者以为经过艰苦斗争的群众，不会接受改良主义的影响。这一观念的错误，客观的事实已经充分的答复了。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一下，为什么黄色工会能够普遍的发生？为什么已经能够得到部分的群众？为什么群众当中合法运动的观念这样普遍——何以有很多群众的斗争都到社会局去请求调解，或者到市党部去请愿？何以有很多群众自己组织的工会，都愿意到国民党去立案？这不是改良主义的影响生长的表现吗？如果国民党已经召集到了一部分群众的会议，我们还说国民党是没有办法的，这真是一种“盲目的夸大狂”。在上海法电斗争中，我们差不多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群众中的工作，将近一月的艰苦斗争，仅仅相当的揭破了国民党的欺骗，整个的罢工还是失败的，这还不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利害吗？过去许多的事实已经教训我们了，将来的事实还会要教训我们，不过从现在起还不认识这个危险，将来的工作更要加倍的困难。并且这一观念是要减弱我们对改良主义的注意，对改良主义斗争的力量，客观上就是帮助改良主义的发展来危害革命。

第二，以为改良主义有很大的现实的可能，这在客观的事实上——帝国主义不愿有更多的让步，二五减租的不能实行，资本的剥削更加残酷，也已经证明这一观念的错误。但是这一观念的确是有帮助改良主义宣传的嫌疑，如果这一观念在群众中发展，将使群众都渐次离开革命，而走向改良主义的路上去。同时要使党的策略走到极右倾的机会主义方面，更加增长合法运动，和平发展的观念，这无异是帮助资产阶级阻碍革命的进展。这个观念的危险，比第一种还要严重得多。第一种观念将要因客观事实的发展而要渐次肃清，第二种观念或许因资产阶级更努力宣传的结果，

而更要扩大。所以我们要同样的认识这两种观念的危险，但特别对于第二种要给以严厉的批评。

现在我要简单的说明怎样与改良主义斗争的几个主要的原则：

第一，要极力发展党的政纲的宣传。现在改良主义者——主要的是汪陈派，极无耻的蒙了一层“革命”的面皮，摭拾一些革命的名词，极力来宣传他们改良的政纲。因此更加使一般群众认不清他们的真面目，而受到他们的麻醉，所以我们必须加紧我们政纲的宣传，才能使群众得到正确的判断。如反帝国主义问题，他们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他们的政纲，仅是“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必须到群众中去从各种事实的当中极力说明，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只是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异常之不够的，并且这完全是美帝国主义要发展对中国的经济的侵略的阴谋；如果要真正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取消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因为必须如是，然后中国的发展，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他们的办法是“排斥外货，提高生产，援助政府外交”，我们必须到群众中去说明，这是资产阶级的欺骗，这是资产阶级利用反帝国主义来向工人进攻的策略。要真能推翻帝国主义必须先推翻这些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实际是保障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必须与西欧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尤其是与唯一的工人阶级的国家——苏联联合起来，因为苏联是推翻帝国主义的主要的力量。他们的反帝宣传只特别注意到反日，甚至于反英，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这就是资产阶级勾结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并不比日本好些，而只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好诈些，更凶恶些，所以我们一定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些宣传，我们必须更大胆一点到群众中去说，从各种实际的实际问题中去说明，才能使一般群众逐渐的了解起来，渐次的团结到革命口号之下来。现在有些同志，以为“这是不能

宣传的，我们只要一开口，群众就要说“又是共产党来了”，吓得逃跑，下一次再不见我们的面了。”对的！但是宣传的方法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机械的去背诵我们的政纲自然是会得到了这样不幸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从日常的事实中去说明，群众一定不会吓跑而且会感觉到很有道理的。如我们与工人谈到水案问题，我们便说，这就是因为有租界的关系，所以日本炮车才会冲死我们工人，假如把租界收回了，这些事件才永远不会发生。假如他答复说“这怎样能办得到呵？”我们便接着说，这是一方面是我们工人不齐心，如果齐心没有办不到的，以前汉口英租界不是我们工人收回来的吗？那一天真是利害呵，几十万工人都跑到英租界去，英国水兵都吓得逃跑了。第二是国民党不好，假如不是蒋介石叛变把我们工人屠杀，取消我们的工会，恐怕现在全国的租界都收回了。我相信如果我们照这样从一切日常的问题当中去说明，工人群众不只是不会吓跑，而且会感觉津津有味哩！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不能宣传这些政纲，而是应该说，用更好的方法去宣传这些政纲。

第二，是要真能深入群众中去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现在有些同志以为要揭破改良宣传，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口号要比他们高，于是汪陈派宣传八小时工作，我们就要宣传七小时的工作制，这是极可笑的幼稚病。而不知道要使群众认识他们的欺骗，是要在斗争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群众斗争起来了，他们便容易明白资产阶级是一个铜板也吝惜不容易给与我们的，这些好听的话，都不过是他们的欺骗。所以我们必须极力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就是极小的也是好的。有些同志并没有深入群众中去，坐在家发愁，以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这一定是工人日常要求的，而不知道工人日常生活的要求，还有比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更迫切的。有些同志比较实际些了，他看见工人在出厂的时候，资本家简直把他们当强盗，每个人都要经过搜身才放走，于是他提出一个口

号：“反对搜身”！但是结果工人并没有在这个口号之下起来斗争。后来找到工人仔细谈话，才知道工人说“反对搜身是做不到的，只要他不是从小门放工；一个一个的挨次来搜，使出厂的时候要耽搁一点多钟久，而能从大门放工，两三个人一排一排出来，可以早一点回家都是好的。”于是他明白了，马上提出“放工要走大门不走小门”的口号。果然工人群众都响应起来了，在这一日放工的时候，大家都拥在大门口大闹，要开放大门，厂里开了小门，没有一个人肯从小门出去，资本家没有办法，只好开放大门，于是大家一拥出去了，完全搜不成了。于是他在第二天再提出“以后永远不准搜身了”，果然大家都赞成这个口号，出厂时一拥而去，这一搜身的办法就取消了，工人得到了这一点胜利，这一工厂的工会组织也就有一些扩大了。所以要领导日常斗争，必须真正深切了解工人日常迫切的痛苦，然后才能发动他们的斗争，斗争起来了，便可以逐渐进展，揭破改良的欺骗。如果有一点虚想，很极难发动群众斗争的。

第三，要加入到一切有群众的组织当中去，争取群众到革命的影响之下来。只要他是有群众的组织，不管他是黄色工会，反动的工会或者农民协会，以及一切旧有的群众的组织，如行会，堆金会，老君会……大刀会，关帝会，红枪会，……都好，不管他是国民党领导的，西山会议派组织的，或者是豪绅地主领导的，我们都要到里面去做工作，发动斗争，扩大宣传，树立我们的基础，然后才能使这些群众离开这些反革命的影响，团结到革命口号的周围。有许多同志，以为凡是国民党组织的群众团体，号召的群众会议，都是反革命的，好像怕玷辱了自己的清白一样，都不愿参加进去工作，而只在外面唱高调。国民党对群众说一句：“这般东西都是共产党”，于是不怕我们的调子唱得几何好听，并不觉得是与他的问题有关系，并且群众怕砍头，自然都不敢来跟随我们了。做群众工作，是要到群众中去，是要唱群众能听得懂的调

子，才能引起群众的同情，才能使群众和唱起来。决不是坐在外面，唱一些“阳春白雪之曲”，群众莫明其妙，或许还会以为这是一些疯子，决不敢亲近我们了。并且只有参加到这些群众的组织当中去，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要求，才能懂得国民党欺骗群众的方法，才能指出群众一切日常对国民党或者对这些组织的领袖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便可以用这些问题来极力宣传，反对国民党，反对这些反革命的领袖，那么，群众一定要一致起来斗争的。国民党和一切反动领袖也就渐渐在群众中丧失信任。

第四，在各工厂中要很正确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在群众中既然有了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影响，或者没有这些工会而大部分的群众还怕接近我们。那么用赤色工会的名义去领导斗争，徒然是把群众吓跑，徒然是增加群众的畏惧而不敢坚决斗争。如上海某次罢工，召集了一部分群众的会议，一开始就是上海总工会的代表演讲，并且说上海总工会是受共产党指挥的，如是第二次会议便没有一个人来了。这是很可笑的幼稚病！到群众中去工作，要表现是群众一样的人，能说群众心里要说的话，能提出群众迫切要求的口号，绝对不要表现是“额上雕字的共产党”。群众斗争的领导机关，尽可能的经过群众的推派，不管是代表团，交涉委员会，或者不要什么名义都可以。必须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容易领导斗争的胜利，才能使群众在不断的斗争走向革命的道路。到后来就是发现了某人是共产党，他也不觉得可怕，而且更要极力的拥护了。这个策略不只是在工厂中可以运用，就是在农村中，学校中及其他群众经常集合的场所，都一样的可以运用。渐次使群众觉得我们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斗争的，便会渐次离开敌人而团结到我们影响之下来。

第五，我们在组织上的任务，必须特别注意中心区域的工作，产业支部的工作。因为现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特别在工人中扩大，而我们在产业工人中的基础是异常薄弱，如果我不能很

积极的在产业工人群众中扩大党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那么反改良主义的斗争要加倍的困难。上海的邮务斗争，法电斗争，天津的主要的斗争都是很好的教训。所以加紧中心区域工作的口号，不仅是目前党的组织上是十二分的严重，而且是党的目前中心的策略上，尤为必要。

以上只是很简单的说明我们目前策略的中心任务的几个原则，没有能够详细分析党的主要的战术和策略的运用，没有详细分析敌人的各种策略，尤其是改良欺骗的策略，没有分析我们几个月的经验，更没有详细分析现在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因为这篇文章的任务，主要分析目前政治的形势和发展的趋势。至于正确的分析了目前的革命形势以后，自然更迫切需要对于战术与策略以及运用方法的详细的解答，我预备继续写一本“怎样争取群众？”的小册子，来完成这个任务。

二月十一日

（录自《党的生活》1930年2月21日）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

——要求在国际决议上确认中央已定路线

(1930年6月12日)^①

恩来同志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要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① 此年代是文件截记上填写的。

苏同志^①（中共）在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30年7月15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鼓掌）

同志们，列宁的联共（布）党进行了十月革命。它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党，站在世界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列。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产生的。目前，新的革命浪潮正在中国广泛掀起。世界经济危机、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巩固，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第一，中国的普遍危机和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破产。如果说1928年中国的工业和商业曾出现某些兴旺现象，那么近期以来只能说中国民族工业正在日益萧条。轻工业方面，许多面粉厂、丝厂、烟厂、火柴厂纷纷倒闭。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大多数铁路和轮船都无法通行。矿业日益缩减。只有军事工业，军工厂，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有所发展。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情况则恰恰相反，反而蒸蒸日上。中国的农业危机正在成为长期存在的现象。华北的灾荒已经连续了三年。六千万饥民中，近一千万人已濒临死亡。去年华南的收成只达到百分之五十。因此，全国粮食不足。上海的米价上涨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七。蚕丝、茶叶、棉

^① 即周恩来。——编者

花的输出大大缩减，而连年军阀混战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更加加速了中国农村的破产。银行按市场投机的条件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贷款。近几年来，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内债近四亿美元。金融市场遭到严重破坏。银价下跌到百分之五十九。今年上海已发生股票危机。米价飞涨、生活费用昂贵，再加军阀连年混战，使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严重恶化。

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斗争是中国军阀混战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者不仅挑动中国军阀相互交战以加强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剥削，他们还利用中国军阀作为进攻苏联的工具，以求巩固自己在远东的地位。中东铁路事件就是国民党冒险政策的明显表现。结果如何呢？苏联红军给予帝国主义的这一进攻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工农则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举行了示威游行。当苏联红军第一次回击了国民党和军阀的进攻，上海的工人和广州的农民问道：什么时候布留赫尔将军率领苏联红军来到我们这里呢？（鼓掌）特别是苏联红军在满洲里附近的一次胜利，使工人、农民、士兵中的骚动情绪更加严重。保卫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得到广泛的响应。

国民党对外政策的破产，从蒋介石开始无耻地公开出卖民族利益以来同帝国主义者的关系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从那次事变以后，南京政府已经再也不能用民族改良主义的词句来欺骗群众了。关税协定、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事件，一切都说明国民党的每一个步骤都在出卖民族独立和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至于和平、统一、解散国联和裁军等种种骗人的口号早已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只有托派叛徒和中国的陈独秀主义者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独力发展和稳定时局的前景。

目前，中国正在出现新的革命高潮。中国统治阶级不但无法解决引起上一次大革命的各种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而且甚至也不能实现哪怕是最微小的改革。

让我们看一看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吧。1928年参加罢工的为四十万人，1929年达到七十五万人。1930年上半年，工人运动无论从发展速度还是从内容来说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今年春季华北爆发大规模罢工，有一万多名矿工参加。唐山五千铁路工人、哈尔滨二千铁路工人举行罢工。青岛和天津纺织工人经常举行罢工和政治性示威游行。今年4月，上海电厂和电车汽车工人先后有一万人举行罢工，并取得某些胜利。纺织工人的斗争也在继续进行。武汉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反映了群众性的直接行动有所扩大。今年5月1日前夕，上海各工人区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不止一次和工人纠察队一起占领了公共建筑物，并举行大会，会上还通过了给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信。武汉也是这样。只有广州的工人运动稍微落后一些。工人运动已经提高到在某一个工业部门准备全面罢工的水平，这对于中国来说规模已是相当大了。不过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还较薄弱。在大的中心城市中，赤色工会会员只有六万余人。所有示威游行说明，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自行开展政治斗争，尽管存在残酷的恐怖统治，它正在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整顿力量。（鼓掌）

工人及其领导下的城市贫民的斗争，又一次推动了革命的反帝运动。各地建立了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这次新高潮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上发生的。中国正在展开农民土地革命。华南的广大农民群众当前不仅处决或赶走地主，而且还分配土地和组织苏维埃政权。如今，在华南七省的八十个地区（拥有一百二十七个县，计一千四百万人口）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鼓掌）如果再加上游击队地区，那么作战地区的居民已在五千万人以上。（鼓掌）这相当于法国全国的人口。游击地区的面积还要大一些。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发展，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条件下，具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到今年3月，红军已拥

有六万二千多名士兵。(鼓掌)现今它已有近十万多人,五万多支步枪。而且有大炮,机枪,还缴获了几架飞机。(鼓掌)这些飞机是法国帝国主义者给国民党将领们送来镇压农民运动的。红军中的大多数人是农民和从敌军中起义过来的士兵。中国军阀军队中的士兵是破产的农民,他们是军阀战争的牺牲品。土地革命的影响和处境的急剧恶化迫使他们举行兵变。去年下半年,中国发生兵变四十余起。国民党军队士兵的革命运动是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特点之一。目前,红军共有十四个军团,其组织结构大体与苏联红军相似,(鼓掌)

军队中有党组织、政治委员和政工人员。(鼓掌)每个红军战士不仅是士兵,而且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

当前运动的弱点是:华北较华南落后,苏维埃还未能占领工业中心城市。还有,最重要的是: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之间的联系还不够紧密。

广州公社以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斗争目标。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统一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建立真正独立的中国。现在正在召开全中国苏区的代表大会,列入议事日程的有集中领导革命战争和建立革命法制的问题。

同志们,中国革命正在不断巩固。只有托洛茨基叛徒和中国的陈独秀主义者才会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是流氓无产阶级盲动主义者,苏区和红军是新式土匪。

虽然当前中国革命沿着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道路前进,但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消灭封建主义和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因此,中国革命在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并同农民相结合,才能彻底完成。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有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前途,它

将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在全国出现革命高潮以前，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也在个别地区事先存在。

在全国出现革命高潮的情况下，革命有可能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加强工人运动、组织赤色工会、巩固苏区和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开展经济斗争、组织政治罢工、准备总罢工、把这些罢工同农民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华北坚决领导和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必须扩大苏区、集中实行和巩固对红军的领导，特别要实现领导干部的工人化、把军事行动发展到重要交通线附近以夺取工业和行政中心。必须经常在部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和领导士兵的暴动，特别在军阀战争期间尤应如此。占领工业中心以后，苏维埃政府将获得足够的力量，将能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相对抗。在已有苏维埃政权的地区，我们将支援农民分配土地的斗争，并争取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以及反对富农影响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应当实行上述总的策略。

在党内，要始终进行反对机会主义倾向，反对托派叛徒和陈独秀主义者的斗争。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两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党内斗争，因为在新的转折时期，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在中国，正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受到机会主义的抵抗。首先，中国出现了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在欧洲已只是残余了）。其次，当共产国际开始肃清残存的机会主义分子时，中国也出现了叛徒陈独秀分子。他们如今已经公开和托派纠合在一起，并承认托洛茨基是自己的领袖。布哈林同志关于同富农结盟和党内和平的口号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影响。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情绪。右倾仍然是主要的危险。这种情况要求党坚决与之进

行斗争，同时也要反对“左”的盲动主义情绪和宗派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中国实现共产国际的路线，清除中国共产党内的种种倾向。

同志们！列宁的共产党，在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基础上，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两年的伟大转折时期内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

在这期间，联共（布）党给予各国兄弟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事业以极大的帮助。

帝国主义强盗正在从东、西两面向苏联发动进攻。中东铁路事件是一个试图包围苏联并进而实现帝国主义者冒险政策的阴谋。但是，蓬勃发展的世界革命的高潮终于打破了他们的进攻。中国革命正在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向前发展。

同志们，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注视着列宁的联共（布）党，正在沿着艰苦的革命斗争道路行进。我们将同你们和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反对帝国主义者镇压殖民地革命运动的行径。

同志们！举起列宁主义的旗帜！前进！前进！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长时间的鼓掌）

（乌传袞译）

（选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 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

(1930年7月23日通过^①)

一 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决议案，都曾经认定中国革命浪潮的新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最近中国的事变完全证实这些决议案的正确。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和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派，托洛斯基主义，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取消派的预言，完全相反。尤其是最近几个月里面，革命的解放斗争开始发展得很快很显著。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受着反动的打击之后而恢复了气力，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口号之下，又重新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

二、过去几年中国的反动，使劳动群众的状况恶劣到万分。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本来已经是非常的可怜，而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更加实行对于工人生活的极其厉害的进攻。极深刻的经济危机，结果是群众的大批失业，这使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简直弄到了快要饿死的状况。一切劳动条件都在恶化。因为食物价格不断的高涨（最近米的价钱增高了百分之七十七），所以工资更加低落。农民的主要群众亦是不断的破产

^① 所据版本日期为7月22日，编者考订为7月23日。

和贫民化。饥荒的范围真是空前的广大——几千万的农民都在那里等着饿死。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手工业者和农村手工艺工人的群众的大批破产的过程，更加厉害起来。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中国反动的结果，自然不能不使劳动群众更加认清自己的地位在现在这种政治的统治之下是没有出路的，更加认清国民党的一切诳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群众的这种认识现在是不能不更加坚定起来，所有这些情形，都不能不更加加强全国的危机，更加使工人农民的广大群众革命化，更加推动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城市贫民去斗争——去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和站在他们后面的国际帝国主义。所有这些情形，亦就不能不使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

三、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过程，有他的特殊形式。新的革命高涨首先成熟起来的地方，大部分还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种下根基的那些区域，随后才渐渐的推广到其他的区域里去。这种情形，亦可以解释新的革命高涨的最初阶段，的确有一种弱点：就是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斗争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工人和农民不大有利。只有革命斗争向前发展的过程里，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战争能够扩大到新的地域，然后这种相互关系方才能够往好的方面改变。

四、分析现在时期的斗争，应当要注意到：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农民的革命斗争，现在能够胜利的，还只不过在南部几省发展着。统治阶级各派的分裂和互相斗争，还没有使他们完全削弱而走到政治上的完全破产。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分。这一过程的促进，大部分要看共产党有没有正确的策略，首先是能不能正确的解决那领导和发展苏维埃

运动的任务。

二 党的主要任务

五、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相当的力量和意义。因此，必须集中注意去组织并且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共产党应当明白：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开展。

组织政府机关的时候，必须尽可能的谨慎选择职员，无论如何，不要放国民党的旧官吏进去，完全要用经过审查而无条件是忠实的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是汇合农民的发动，最大限度的配合这些发动，而且要根据有坚决的肃清封建制度和军阀，而抑制富农高利贷分子的政策。临时革命政府，竭力去开展正在斗争的群众的鼓动和动员，同时，这一政府应当是保证农民运动之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种政权形式，从上到下，都要保障群众自己的参加革命政权机关。

六、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发动土地革命的力量应当是雇农和贫农，他们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之下，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当对于这样富农的企图，应

当对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他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农民的土地上去（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行，应当和全中国的革命高潮以及工农革命民权独裁的胜利连系起来。

七、苏维埃区域里土地革命的任务，不可分离的和组织雇农工会，乡村无产阶级工会的任务连系着，和组织贫农会的任务连系着。贫农会的目的，应当是团结中农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使苏维埃机关的一切办法，都有利于贫农和中农。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应当求得完全依照选举的原则；要剥夺绅士富农半地主的选举权。党应当把农村苏维埃认为是苏维埃区域里面组织农民群众的主要形式，所以对于农民协会，应当采取逐渐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方针。

八、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上，党应当避免过早的办法，不应当实行那些只会使农民群众离开我们指导的办法。可以放任商业的自由，暂时不要禁止土地的买卖，不要实行集中供给，不要限制境内商业和调节物价，当然，这要除出特殊的例外（盐，煤油）。这种例外办法，一定要是境内人民自己所要求的，是为着军事上的必要或者反对投机和怠工的。

九、苏维埃区域里改良工人生活的政策，在立法上应当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订立最小限度的社会法，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一切其他的改良，应当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形，从阶级斗争和工会工作的结果里面去求得，而不是用苏维埃机关的命令。

十、苏维埃区域里党的行动和革命机关的一切办法，都要是为着真正农民群众斗争的利益的，都要是为着农民运动的向前发展的，都要是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苏维埃区域的继续扩大的。为着这个目的，党应当利用苏维埃区域所有的一切力量，去组织

工农红军。必须完全保障党对于红军的指导和监督——红军对于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应当有极伟大的作用呢。红军应当变成真正全体平民的军队。社会团体，首先就是工会，以及贫农会，应当按期调动自己的会员，去充实红军的队伍。红军的指导干部要有坚强的工人成分，红军部队要用乡村贫农以及一般的革命农民来扩充；红军的官长，首先要用先进的工人来充实。军事的，尤其是政治的指导，应当要有必需的程度，并且要最大限度的集中。

十一、党在一切宣传运动和一般群众鼓动里面，应当特别用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提出以下的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反对帝国主义，一直到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如果他们破坏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统一中国，建立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赞助并且发展苏维埃运动到全中国；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团体监督生产。

十二、党在苏维埃区域里的工作，应当和全中国的行动连系起来。党在日益生长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之下，主要的任务是保障彻底的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农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够胜利的前进，一般的革命解放运动，才能够进到更高的阶段——使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就肃清封建制度和军阀以及外国资本的统治；这种外国资本正在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赞助，并且加强封建的残余，以及一切种种军阀和中国资本家的派别呢。

十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战斗。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层的经济要求。党要加强自己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的工作，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

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凡是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削弱的地方，凡是在革命斗争高涨的地方，要努力去企图把革命的职工运动从秘密状态之下公开出来。

十四、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发展并且领导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党应当预防忽视继续扩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危险。帝国主义方面一切强暴政策的表现，党都应当利用他来引起群众的革命罢工。党应当扩大自己的群众鼓动——宣传：解放中国，统一中国，中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消灭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反对进攻苏联的企图，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迫国家里的劳动群众的口号。

十五、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开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反对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反对一切军阀和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一切派别，——应当是党现在群众鼓动里的紧急口号。同时，争取群众之中的影响的斗争，应当更加加紧，去反对国民党改组派，反对第三党，反对胡适派，他们都想从日益生长的革命的强大的新高涨之下，来救反革命的命呢。同时，党应当暴露陈独秀托洛斯基派的反革命的工贼作用。党应当揭发托洛斯基理论的反革命的真相，托派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假面具，用来掩饰他们实行上显然的取消主义——对于新的革命高涨，完全是取消的态度，对于正在开展的革命的农民群众斗争，完全忽视，而且他们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更显然是替国民党帝国主义当走狗。

十六、对于苏维埃区域之外的农民运动，党应当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和斗争委员会，应当利用一切农民群众的组织方式去进行自己的革命斗争，应当加紧自己的革命鼓动，尤其是因为饥荒和新近的军阀战争发展的缘故。党应当发展抗税抗捐的运动，应当号召游击战争，号召赞助苏维埃区域。党应当号召农民

斗争，去解除豪绅地主反动势力的武装，而组织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十七、此外，党应当加强自己在少数民族之中的工作。党应当去和北部中国回民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并且加以指导，对于内蒙古的民族革命运动，满州〔洲〕的高丽工农斗争，以及南部中国的苗瑶民族，都要这样。同时，党应当认识安南日益生长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扩大自己在安南人之中的影响，尤其是在云南香港和广州。

十八、从第六次大会之后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发展，和自己队伍的布尔塞维克化，都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他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任务没有能够解决。现在，党在解决组织任务提高战斗力之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保障自己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性。然而要保障坚定的政治路线，保障党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新的任务，保障真正的实际上能够执行党的路线，就只有实行两个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左倾”盲动主义关门主义的倾向，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去对付主要的右倾危险。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倾”的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如果没有不调和无情的斗争，那就不能够最终的克服陈独秀派和托洛斯基派，不能够完全消灭对于他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的不调和的两个战线的斗争之中，才能够清楚的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去解决党的当前新任务。两个战线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

十九、现在阶段的条件是：危机的深入和阶级矛盾的剧烈已经这样厉害，甚至于个别发动的失败——只要这种发动的确是群众的——也不能够停止解放运动的生长；党的当前的任务，是要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准备并且集中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党自然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的方法尽量去发展几百万群众的革命能力和斗争：——在这种条件之下，主要的危险是

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尾巴主义，——党或者个别的党部比较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反而落后；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继续发展表现机会主义式的害怕；抛弃罢工斗争的发动，对于黄色工会领袖的攻击表现得不坚决，以及工会的合法主义——有的时候反而投降黄色领袖，因为他们的要求而停止罢工，对于游击战争，估量不足，在苏维埃区域里赞助富农的要求。

二十、可是，因为必须尽量发展游击运动，勇敢领导农民暴动和罢工斗争的关系，所以盲动主义倾向关门主义倾向的危险，也加强起来。这种危险，表现在对于群众作用的估量不足，不估计到广大群众的参加而定出暴动计划，有些时候偏重和农民群众隔离的军阀军队里的兵变，企图形式的机械的实行罢工斗争之中的革命策略，苏维埃区域里经济政策上的“左倾”幼稚病的表现等等。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紧两个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对于党的当前任务的顺利的执行，是主要的危险。

三 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

二十一、资产阶级地主的联盟没有解决引起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矛盾，他亦不能够解决这些矛盾，恰恰相反，他使这些矛盾更加深入更加剧烈。这些矛盾现在在扩大的基础之上重复产生起来，他们用历史上不可延缓的力量预先规定着那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涨。虽然已经看得见的新的革命高涨，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的打击之下，亦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亦有暂时沉寂的可能，可是，土地革命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将要更加发展，而不可避免的要引导到中国革命的全国高涨。

二十二、这种情形使我们现在就要提出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任务的问题。只有在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不可避免的观点之上，才

能够设想现时斗争的进程，而正确的规定党的现时任务和策略。一九一一年革命和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新的革命高涨的时候，革命仍旧保存着以前的任务：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取消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所有这些任务，就规定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

二十三、然而中国革命和普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同，不但因为革命动力的成分，不但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更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要直接反对资产阶级，而去执行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任务。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特殊性，还在于：他的胜利就要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因为有许多原因，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同时也就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却在准备着无产阶级独裁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亦就是中国革命经过许多过渡阶段而逐渐彻底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的经济基础。

二十四、中国的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比较布尔塞维克在一九〇五年条件之下所决定的民权独裁，将要有很大的不同。这里的分别，首先就是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现在有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苏联存在，他正在顺利的发展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的情形，可以预料在革命政府之中共产党要占多数。因此，无产阶级不但对于农民能够实现思想上的领导，而且能够实现国家组织上的领导。同时，必须还要注意到：中国革命不但要和封建制度军阀制度实行残酷的斗争，而且要和外国资本家以及中国资本家实行残酷的斗争。中国的民权独裁，将要彻底没收外国资本以及中国资本企业的必要。将要不能不进行很重要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存在，就是中国工农革命民权独裁的特点。中国革命从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将要

比十月革命有更多的过渡阶段；然而中国革命把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缩短得很多，比俄国一九〇五年条件之下所看得出的速度起来，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要快得多。

二十五、从中国革命转变的前途上看起来，国际的条件，大致说起来，是很有利的。社会上的前提也是很好的。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和乡村贫农的结合，在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最初几个时期，就已经形成起来。这种情形不能不对于中国革命开展的速度和形式，有相当的影响。而且因为实行反对中国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农民的主要群众，将要受革命进程的推动，而来赞助那些反对外国和中国资本的过渡性质的必要的革命政策。

二十六、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亦提出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中国工业农业的危机，使经济上需要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中国的前面站着一个绝对的问题：或者完全殖民地式的奴隶化，而群众更加破产；或者是苏维埃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步骤，可以大致的一般的规定出来，这些步骤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实行的，并且能够保障那些造成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这些步骤，在将来实际的斗争上，应当由中国共产党具体的规定出来。

这些步骤之中可以有以下的办法：外国资本的工厂企业，银行，新狄加，股份公司，铁路，大的航路，航空事业，汽车交通，首先是属于外国资本的——都收归国有；对于反对工农苏维埃运动而组织反革命斗争的中国资产阶级，为着经济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起见，要他们的企业和资本——收归国有；对于其他的小的企业——实行监督，土地，水利，灌溉事业——收归国有；实行彻底的合作社化，从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的最简单的形式做起；然

后，实行集体农场化，完全根据于农民自愿的原则，并且可以得着无产阶级独裁国家的技术上的帮助；建立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去实行继续加强革命的中国的经济命脉。

二十七、中国革命在最初的阶段上，当然，还并不剥夺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真正相反，尤其是对于农业，在消灭地主私有土地制度之后，消灭军阀制度高利贷剥削之后，资本主义一定要表现向前生长的趋势。中国革命经济上的非资本主义性，并不在于立刻便会排斥一切社会关系里的资本主义，而在于革命民权独裁制的机关，利用争得的经济地位，将要造成那种前提和优势，去彻底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这两个倾向的斗争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但要由国内的条件来决定，而且要由国外的条件来决定。应当注意到：社会主义是不能够一下子直接实现的。过渡到社会主义要经过许多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长期的过程，分布在许多要彻底执行的具体办法。进到社会主义的各个步骤，应当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应当要使大多数的人民认识这些步骤的必要。这些步骤，应当是经济实际情形里面已经成熟的，应当是经济上完全可以实行的。中国是小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这些过渡办法应当和农民主要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应当估计到各区域社会情形的区别，估计到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和觉悟程度的不同，估计到氏族祠堂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影响的力量；应当记得：我们的任务不是取消，而是改造小农经济。所以规定过渡办法的时候，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应当脱离自己的农民后备军。

二十八、提出并且宣传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同时必须指出共产国际的方针：（一）和托洛斯基陈独秀主义的概念；（二）和孙文主义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并不像托洛斯基主义的承认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正是托洛斯基，他在承认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左

倾”的空谈之后，暗藏着完全忽视现在发展着的农民群众斗争的特点。对于托洛斯基，这是很大的特点；他对于农民的力量和革命可能估量不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任务和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过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中心是土地革命。革命的本身正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的形式里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学说，和托洛斯基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空谈，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托洛斯基的这种空谈，不过是一种假面具，用来遮盖孟塞维克托洛斯基主义的“国民会议”的实际口号。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方针亦和孙文主义的乌托邦不同的；孙文主义的乌托邦，幻想用部分的节制资本的办法去避免资本主义的流弊，只要看：孙文把自己计划的实行和中国周围资本主义世界的帮助联系在一起，就已经可以看得出孙文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质。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信

(1930年8月5日上海)

致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共产主义
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8月1日和3日政治局会议^①的过程迫使我们极为明确地宣告：中国党有陷入盲动行为的危险，中国党有卷入反共产国际斗争的危险，而这是很大的危险。

李立三说：“你们必须要么遵守共产国际的决议要么表示忠于中国革命！”他在犯错误，而且是危险的错误。

不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就不能保持对中国革命的忠诚。请看一看受到你们坚决反对的各国左的和右的叛徒，他们同样表示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声称：“我们忠于革命，因此才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在这个口号下他们把所有腐化分子纠集起来投入反对革命的斗争。你们亲眼看到，正受到你们最坚决无情反击的陈独秀及中国其他叛徒已走到何种地步。你们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已知道，

^① 指1930年8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阐述了李立三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打算在武汉、南京实行起义和在上海实行总罢工，然后在北京、天津、唐山、郑州和开封举行起义。中央委员会南方局则应该先在广州，然后在香港组织起义。计划第三部分的内容是东北起义，计划中认为，这里的起义具有最为重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和苏联兄弟党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你们也知道，由于这种帮助，整个共产国际现在可以自豪地说：遭到毁灭性失败的中国国民党已重新变成一个强大的、威望日增的政党。你们要明白，对共产国际决议的态度问题，是对中国革命诸问题的态度正确与否的问题。对共产党人来说，并不存在李立三臆造的矛盾：“是忠于革命还是忠于共产国际的决议。”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重申，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国际的来电^①旨在反对在南京和武汉举行起义。在8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在辩论中反对这个电报，不客气地声明：“共产国际没有得到情报，其责任在周恩来及其机会主义倾向，因此我们将反其道而行之”，那么难道能允许对待共产国际决议的这种轻率态度吗？李立三明知，共产国际和中国代表密切注视中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同斯特拉霍夫〔翟秋白〕和周恩来一道正在认真了解中国党的现状。

李立三自己并不相信8月1日他在政治局提出的绝不可行的蛊惑人心的理由。两天之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毫无避讳的声明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应该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应该为改变路线而同共产国际作最坚决的斗争，同时贯彻我们的决议，不理睬共产国际的决议。如电报所表明的，那些决议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诚然，在那天的会议上李立三还有些装模作样地吩咐俄国党：现在嘛，联共（布）该准备打进攻战了，但愿它不要害怕，这样下去联共也一定能完成五年计划！这同托洛茨基主义真是出奇地相似，托洛茨基主义也指责共产国际和俄国党囿于自己的民族局限性而放弃完成世界革命的任务。实际上李立三声明的真谛在于：应该提醒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记住他们对革命负有的义务！

① 指用电报转达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0年7月28日）关于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指示。

但李立三的行动并不限于这一点。他还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以罕见的轻率态度，罕见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说明”此事应该怎么办。他在8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目前中国的中心问题是组织起义，他不分析起义的先决条件和力量对比，他甚至根本不打算为争取武汉、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等城市工人阶级最重要的阶层作出任何努力，而是干脆下令在所有城市举行起义。他不愿为说明国际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作出任何努力，而是简单地声称：现在苏联该向世界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了！

请想想，一个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或者至少认真履行诺言的革命者该是什么样。在目前形势下，这样一个革命者能够杜撰出类似李立三想出的计划吗？要看到李立三是考虑到苏联对世界帝国主义作战的可能性和红军突破蒙古的必要性的，等等，我们丝毫不怀疑，在目前形势下，这样的构想是致命的，但是，假如李立三对自己的责任哪怕有一星半点的认识，那他作为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呢？他应该说：应该立即同共产国际和兄弟的俄国党商定，以便协调所有计划，弄清他们的意见，只有在这之后，他才应该在政治局提出建议。他绝不该先提出建议，然后宣布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没有得到足够的情报，说他们奉行一条不正确的路线。他不该促使政治局作出关于苏军行动和苏联应宣布进攻世界帝国主义的旨在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李立三莫非认为，现在必须在中国实行一种让共产国际面临既成事实即发动盲动主义的冒险行为的政策吗？

同志们，我们十分坦率地向你们声明，如果政治局的领导同志们认为可以不同共产国际协商一致，可以不顾它的意见而通过一些定会招致严重后果的决议，那么你们关于遵守共产国际纪律的形式主义的声明就通通一文不值。

李立三的所作所为要么是最恶劣的盲动主义，要么是最可耻的空谈。请你们看一看吧，李立三下令在全国起义；一些具体决

议先后作出，“调动”〔中国〕苏区的红军，发动世界大战，并且冷静地声明：“如果我们有时间，一定派一位同志到共产国际去。”我们要问你们，同志们，难道一个真正充满责任心的革命者就是这样干的吗？

李立三在其报告中企图把共产国际电报和决议的精神说成是共产国际反对在中国举行起义。这是极恶劣的诽谤！共产国际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无情的斗争，并为创造起义的先决条件而奋斗。三个星期以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向中国党发出一道关于有必要在我们占领的一个区域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令，而李立三当时反对建立苏维埃政府。你们能够设想，共产国际在两三个星期以前发出这样的指令，而三个星期之后就反对起义吗？你们认为共产国际看不见农民革命的高涨、看不见我们红军的胜利、工人罢工浪潮的高涨和总形势的迅速发展吗？难道获悉红军占领长沙全苏联不是人人都欢欣鼓舞吗？难道共产国际上述指令中贯穿的旨在扩大苏区、占领重要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实行最积极、最大胆的政策这样一条路线还不够明确和肯定吗？难道共产国际真象李立三所暗示的那样想阻挠中国革命吗？不，一千个不！共产国际发出电报，是因为它认为还不具备在武汉起义的先决条件。如果说共产国际提请党把注意力集中到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将罢工和示威游行发展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不断训练工人、农民和红军做好起义的准备等问题上，那么它绝不是为了阻挠革命，相反，是为了推进革命。共产国际促使党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正是因为它知道中国事态发展的速度如何，并根据大量革命经验懂得，不争取工人阶级中最重要的阶层，就不能获得胜利和巩固胜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诸委员和俄国同志远非李立三所描述的那种书生气十足的学者。他们了解你们的革命情绪，他们同样了解党的弱点，因此共产国际在电报中警告你们，希望你们在尚未创造出一切必要的先决条件时，在目前时刻不要发

动起义。还请记住一点：尽管有这封电报，任何机会主义者如果在起义的先决条件已创造出来时仍表示反对武汉起义，那么共产国际将同他作无情的斗争。

同志们，我们认为有责任向你们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最坚决地反对在政治局8月1日作出的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和共产国际的决定之间制造矛盾的做法。对于〔政治形势的〕决议，你们迄今未提出任何异议，它经得住检验，是绝对符合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尤其符合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指示精神的。

不言而喻，我们应该最坚决地反对李立三准备起义的方法和理论。决不允许让党左右摇摆。我们举个例子：李立三在8月2日会议上谈过南京起义。我们问他：“你根据什么得出工人群众将站到我们一边的结论？比如说，8月1日动员群众的结果如何？大家不是都知道没有进行群众性的动员吗，并且，与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决定相反，也没有发生群众性示威。这又如何解释呢？”李立三8月2日表示：我们可以随时在南京发起三五万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然而7月27日我们号召南京工人参加示威游行，却只有700人前来）…^①我们问：“共产国际的决议规定8月1日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如果你们可以随时动员三五万工人，为什么8月1日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李立三回答说：这只有在我们发动起义时才有可能。或者另一件事：从南京往前线派出六千名伤兵…^②南京似乎已准备起义了，但谁也不动，党不采取任何办法。李立三再次断言，任何大的行动都会导致起义。同时党正在准备起义，许多例子说明他表现出极大的消极性，南京的工作清楚地表明，存在多少右倾行为^③，例如不动员群众，群众没有做准备。由于正酝酿

① 删节号系原文所有。——原编者

② 删节号系原文所有。——原编者

③ 原文如此

酿着左倾并在准备没有群众参加的起义，形势并不见好转，反而只能更坏。

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路线，是为胜利的起义创造先决条件的路线，应予改变的并不是这条路线。如果说有什么需要迅速纠正的话，那就是李立三在其报告中所表现出的错误倾向。如果说有什么需要迅速纠正的话，那就是反共产国际的把戏，因为这是把中国革命当儿戏。

假如能尽快克服有害倾向和纠正所犯错误，中共中央就能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把中国党引向胜利。

远东局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 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

——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党的行动路线

(1930年8月5日^①)

共产国际主席团：

中央讨论你们来电之后，觉得必须将现在严重的形势，与党的路线报告你们，要求你们重新讨论。延长数年的军阀战争已经使全国广泛工农兵士群众陷于绝地，使统治阶级统治力量日益削弱，而造成现在革命高涨猛烈发展的形势。

一、现在红军猛烈发展，全国二十二军计三十余万人，农民占主要成份，主要各军均有工人干部的领导。第五军已与长沙工农暴动汇合占领长沙，何键在长沙军队完全崩溃投入红军。长沙附近各县几百万农民兴起。现正与帝国主义及军阀联合军作残酷的战争。第三、四两军即可攻克南昌九江，第二、六两军已攻克沙市，第一军已截断京汉路，第八军已下大冶，都在向着武汉进攻。

二、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处工人的罢工运动，都在猛烈的发展，特别是各铁路工人不断的举行罢工，黄色工会更成为国民党压迫工人的工具，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完全破产，各处罢工，大多数在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之下，坚决的反对黄色工会国民党，每一罢工都成为直接的武装冲突，广泛工人群众都要求武

^① 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装，要求暴动。最近两星期来在上海，南京的赤色工会特别是赤色先锋队发展极为迅速。

三、全国有组织的武装农民有五百余万，有组织的群众三千万，农民暴动普遍全国，而且都坚决的要求夺取中心城市。

四、军阀军队极端动摇，到处哗变，找寻党的领导与农民联合，特别是党在军阀军队中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飞速扩大，现在南京镇江驻军主要部队，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并且要求即刻暴动，汉口主要驻军的大部分，也在我们影响之下。在军阀双方前线的军队，尤其反对军阀战争，其中党的组织也有相当的扩大。特别是十余万伤兵热烈要求党的领导。

这一客观形势，无疑的是武装暴动的条件正在成熟，因此党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在这一路线之下，特别加紧全国工作的配合，尤其是工人群众的工作，已在各产业中心每个工厂当中组织行动委员会，猛烈扩大赤色工会，特别是赤色先锋队，以准备全国总同盟罢工与武装暴动。我们觉得最近五个月来革命高涨的猛烈发展形势，未向国际报告，而前一电报又极简略，使国际无从明了实际情况，自然要反对现在组织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所以再将现在革命猛烈发展的情形电告，〈请〉求国际批准中央的决定，并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予我们以实力的援助。

中共中央政治局 忠发

八月五日忠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16日)

关于南京的群众性发动问题

亲爱的朋友们！

根据我们同李〔立三〕的谈话，现将我们的建议阐述如下。

我们应该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士兵中细心地广泛开展反对在工厂实行白色恐怖的运动。如果我们的力量足够强大，我们应该准备群众性罢工。甚至我们如果能在重要工厂搞成十分钟停工以示对长沙、武汉、南京白色恐怖的抗议，那也就是很大的成绩了。如果我们的力量得到巩固，我们自然就能够提出更广泛的口号。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单纯地提出罢工口号就坐等事态的发展，而要通过我们的支部、通过红色工会、通过工厂行动委员会、通过要米委员会，通过所有群众组织精心组织罢工。

我们还应该用这样的办法准备示威游行，准备用纠察队和同情我们的士兵保护这种游行。必须在士兵和警察中（用“不杀自己的兄弟”等口号）加强鼓动。

我们是否应该号召士兵参加游行？

对这点同李〔立三〕有过一些争论。我们的意见如下：每遇

群众发动，尤其是示威游行时，我们都应该号召士兵参加。

根据李提供的情报，我们在南京能够组织四五万人的示威游行并吸引 5000 士兵参加这种游行。但我们应否这样做倒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吸引过来参加示威游行的只是大队人马中的我们信得过的人，那么把他们派去参加游行就是错误的。那样就会把作为我们基本依靠力量的人从大队人马中清洗掉。

但是如果我们能在 15000 名卫戍部队中预先争取 5000 名士兵参加示威游行，再加上 10000 名工人、手工业者等等，那我们就应该组织有士兵参加的这次示威游行。在目前形势下这样的发动会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不言而喻，我们应该准备应付剧烈的冲突并精心准备领导这样的群众性示威游行。但我们对组织这样的群众性发动一刻也不应该犹豫。

不言而喻，如果发现我们过高估计了我们在南京的力量，发现我们还不能举行四五万人的、有 5000 士兵参加的示威游行，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所谓的“小发动”。这种放弃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我们能在一些最重要的企业中哪怕造成十分钟的停工，散发一张很好的传单，组织一次很好的哪怕只有 1000 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那么，这在组织群众的道路上就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就能证明党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情况下还有组织和领导群众性发动的能力。

务请将在南京筹备群众性行动的每个步骤告知我们。

远东局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3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20日)

关于工会问题

亲爱的同志们!

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一封详细的信件(附抄件给〔中央〕政治局),其中就中国尤其上海工会运动的若干迫切问题发表了意见,并且除了我们对当前最重要的(铁路工人的、纱厂工人的、丝厂工人和市政工人的)罢工运动的评价外,还就巩固和扩大罢工运动,就巩固我们的红色工会的切实措施作出了具体指示。

自法国租界的铁路工人罢工最后失败以来,我们就得到了关于纺织工人、丝厂工人的运动状况、组织状况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工作的详尽报告。我们在远东局详细讨论之后,尤其在我们收到中华全国工会联合会代表的最新情报之后,我们认为必须及时告诉你们,我们最担心的事果然应验了。即:

1. 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最近已经不是作为独立的群众组织行动了。它们已经不再履行自身作为独立的、革命党领导下的群众机构的职能了,特别是最近,在建立了无所不包的行动委员会之后,它们只是个空架子,它们仅仅作为党组织的部门还在行使职能。

2. 显然行动委员会力图取代工会,因为工会的全部工作和职

能现在都由行动委员会包办了。

3.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同群众、各企业和下层工会机关的联系异常严重地削弱了,最近的斗争尤其在纱厂和丝厂中的斗争证实了这一点。据工会同志们的亲眼见证,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具有光辉战斗精神并与警察斗争过,他们曾经寻找我们的领导,但未能找到(大多数离开企业的丝厂工人不知道为什么而罢工,甚至不知道最重要的要求,因为在他们中间并未进行过发动工作)。

4. 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同志的任何批评和这些负责同志就实际上取消工会机关和不能用行动委员会取代工会问题表示的丝毫怀疑都被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然而要讨论和澄清这些异常重要的问题又是不可能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多次向我们表示,他不能和我们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不应该就此发表意见,因为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问题。而他为遵循政治局决议的指示和遵守纪律起见,不应该和我们谈论政治问题(!)。

5. 我们正需要一份革命的群众性机关刊物,以便找到一条途径去接近企业里的群众和动员他们参加由我们领导的、组织良好的群众性战斗,可就在这个关头,每三天出一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被取消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现在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投入斗争和准备起义工作为理由,把会议推迟到1月举行。以同样理由拒绝召开铁路工人和海员的全国代表大会。此事的发生很不合时宜:几天前召开的上海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你们在这些工人中的地位是非常不牢固的,而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绝对不能认为上海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是成功的,据我们的同志所报道,大会的筹备很不好)。

这些事实以及上海无产阶级(电车工人、纱厂工人、丝厂工人等等)最近几场重要斗争的经验迫使我们提请你们注意,绝对

有必要尽快讨论这些问题——绝非“纯组织性的”而是有极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

1. 各工会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重新取得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他们应该建立赤色工会，当然要在党的最严密的领导和监督下，但在组织方面保持独立并且尽量同企业和基层工会机关保持直接联系。上海工会联合会及其他工会领导机关当然也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赤色工会才能履行其最重要职能——群众性斗争的职能和罢工运动组织者、领导者的职能。只有这样，它们才能为加强我们在企业中的地位进行工作。党组织不能也不应该企图去取代工会机关。这只会削弱党，并且不可能去动员企业中的群众，不可能为斗争、为在斗争中领导广大群众做好准备。最近一段时间的斗争已清楚表明因对工会实行这种取消政策而造成的有害影响的初步严重迹象。

2. 行动委员会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工会。行动委员会是常设机关，行动委员会是为了十分明确的目标，在十分具体的形势下建立的，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实际取消群众组织，更不用说工会了。行动委员会不能甚至也不应该有取代工会并集其职能于自身的打算，因为它们不能象工会那样同群众和基层组织保持联系，为罢工和其他运动充分做好准备（最近的斗争已向我們表明了这一点）等等。

3. 党应该把有关工会的问题、巩固赤色工会、实际建立产业委员会、切实筹备各种产业代表会议例如铁路工人代表会议的问题（据同志们自己的见证迄今为止筹备工作是绝对不足的），把有关罢工委员会利用我们最近几次斗争的经验和我们应从中吸取的教训等问题立即提交讨论。这些问题应该不仅是政治局认真讨论的对象，而且应该是整个党组织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上海工会联合会认真讨论的对象。应该比过去更为严肃得多地提出有关罢工和筹备罢工的问题。迄今为止关于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问

题在群众中间的讨论一直是过分轻率和抽象的。例如，我们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同志那里得知，大多数丝厂工人甚至不知道罢工要达到什么目标。他们被解雇了，但是还不知道具体的罢工要求。罢工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基层工会组织认输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断言群众不想罢工，说他们只想起义呢？既然预先不向工人说明这次罢工直接的具体要求，不宣传这些要求，不去做必要的组织工作，这样怎么能发动群众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呢？丝厂数千名女工的罢工很快就被破坏，尽管女工们表现出了杰出的战斗精神和斗争意志（同警察搏斗，游行示威等），但是，正如同志们自己所说，她们找不到我们的领导，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不能协调纱厂工人许许多多分散的战斗，因为，正如我们的同志所承认的，我们没有在企业里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这是不足为奇的。尽管市政工人成功地举行了代表大会（20多个企业共派出30名代表参加），法国租界电车工人的出色斗争遭到破坏，44名积极分子被解雇，80名工人被处罚，而我们却不能发动起公共租界的电车工人和电厂、电话局及自来水厂等处的工人（尽管市政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宣布同情罢工），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4. 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反对政治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压制一切辩论和同志式讨论问题的做法。每当我们远东局试图同工会同志讨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时，他们就对我们说，纪律禁止它们同我们讨论政治问题。如是不涉及政治问题，那么谈什么呢？根据什么能把最为重要的工会问题同政治问题如此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乃至禁止人们谈论如行动委员会的职能和工会必须在组织上保持独立性问题，否则就给你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呢？要知道，我们远东局已与政治局商妥，政治局可以随时派出一名委员去参加每一次同工会同志开的座谈会。但是，如果政治局根本就禁止同志们同我们谈政治问题，或者禁止涉及某些有争论的问题，那实际上就无法工作。

5. 我们还要坚决反对取消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或者把它变成不定期的、很少出版的机关报。应当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纸变成比现在更广泛的群众性机关报。当前，在党和工会面临艰巨的任务，首先是面临着发动企业里的群众、组织和领导群众性战斗这一任务的时刻，这尤其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必须尽快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会。这样的全会应当很好地准备，这一点我们同意，但是，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现在就应当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全国范围的产业工人代表会。简单地取消铁路工人和海员的代表大会是错误的。必须认真准备，在最近召开这两次代表大会。

同志们！在准备夺取政权的时期，红色工会是动员和争取群众最重要的杠杆。轻视这个问题或者实际上取消红色工会，是与准备革命的任务格格不入的。

望你们尽快答复并报告你们为取消这些错误措施采取了哪些步骤。

远东局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 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

(1930年8月)

关于农民问题，以前我们曾有几封指示信给你们，这些指示，我们认为依然是有效的。现在我们特别提出使你们注意：党对于农民的策略，必须分为苏维埃区域与反革命统治的区域两方面来说。

苏维埃区域之中

党在乡村中的基本组织任务，是组织雇农，苦力工会及贫农会。在这一原则之下，必须把贫农与中农联合起来，以对付反革命派及富农等阻碍土地革命发展的企图。同时也必须把红枪会与大刀会等一部份的组织抓取过来。在苏维埃政权的疆域之内，在每个乡村与每个城市之中，必须首先把雇农，苦力工会及产业与手工业工人的工会组织起来。定出这些工会的目的与任务的纲领。尽可能的在最短期间召集这些工会的县大会与省大会。为着组织雇农工会，苦力工会及产业与手工业工人的工会，以及吸引他们之中最勇敢最积极的分子入党。应当组织各种辅助团体，使党经过这些团体很容易的接近苦力，雇农与工人群众。对于雇农妇女及女工也应当与男的雇农与工人一样的吸收她们加入这些团体。她们在这些团体之中，也得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

雇农工会，苦力工会与工人(包括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的

工会之间不独应当有兄弟团体的关系，而且必须在政治上与组织上互相合作。产业与手工业工人既然比较觉悟些，他们必须一致的帮助雇农与苦力，以对付富农及一切剥削者。产业工人的工会对于雇农与苦力的工会，必须实行一种“领导制度”（某一产业工会对于某一雇农及苦力的工会特别负起一种领导与帮助责任的一种制度）。举行产业工人工会与雇农，苦力工会的联席会议，并可以共同组织文化教育团体及合作社等等。

贫农会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起。雇农苦力以及其他乡村的工人都应当参加贫农会。在这里命令主义是不能有的。在贫农会之中，应当实行很宽广的革命的民主制度。一切贫农会的领导机关，须由群众大会选举出来，贫农会一定是在村苏维埃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在有贫农会而同时有雇农与苦力工会及工人工会的地方，后者应当整个的加入贫农会。每个雇农苦力及工人既然都是贫农会的会员，就应当享受同样的权利及担负同样的责任。雇农与苦力在贫农会中，必须组织小组，受自己的工会指导，而在一切行动上必须照党的指令来领导他们。在特别的情形之下及对于某一特别问题，可以召集上述的工会（雇农苦力工会及工人工会）与贫农会的联合会议。在贫农会里也像在雇农工会，苦力工会及工人工会中一样，女子得享受同男子一样的权利。

在苏维埃疆域之内，不必组织农民委员会，因为保障农民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的，已经有苏维埃，雇农工会苦力工会及工人工会与贫农会。

在苏维埃区域之中，农民协会不能继续存在。假使在有些地方，农民协会还是在军阀政权之下组织起来的，其中包含有一切农民——富农也在内，则党必须在苏维埃之中，主张逐渐的来解散农民协会。解散农民协会，决不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命令来执行的，而当经过广大的政治与组织的工作，使农民协会的一切信用，都归苏维埃所有。在这些农民协会中，党必须组织党团，把贫农

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经过选举，吸引雇农，苦力及贫农到领导机关去，以占有其组织，或者以开大会的办法，把富农驱逐出去。

在某种情形之下，即使雇农苦力与贫农对于这一办法没有充分的准备，也必须把仇视雇农及勾结军阀，封建余孽，地主等的富农逐渐的开除出去；但是这不是说，不必要以行政的办法，来对付某些反革命的农民协会。

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必须严重的注意在苏维埃区域以及反动区域里游击队的领袖。首先必须尽全力的使所有的游击队在得力的共产党员直接领导之下。在没有共产党员的时候，也必须有忠实于苏维埃的人来领导他们。在社会关系上与我们接近的游击队的领袖，应当吸收他们加入贫农会以至加入党。

中共及苏维埃对付中国劳动群众的宗教迷信的政策，是有很重大意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按照当地的情形来解决，一直引导农民走向反对这些宗教迷信的地步。第一就是对于祖宗坟墓的问题。这里并不需要用任何强力来强迫他们削平坟墓。如果不是农民自己愿意，无论如何不要因为简单的需要耕种和分配田地的缘故而强迫削平祖坟。第二就是对于各种宗教团体的土地的分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与苏维埃政权必须尽力的说服农民：应当将这些土地没收，以便分配给土地很少的以及没有土地的农民。第三个问题，就是怎样对付中国的各种有传统性质的宗教团体。这里一样要经过文化教育的工作，来说服信仰者。同时苏维埃政权应当干涉为修庙，立菩萨等而强迫征收捐款或粮食，以及以武力勒索捐税等事情。第四个问题就是对于各种教会的问题。这些教会本来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正是中国劳苦群众的仇敌。中共与苏维埃应当向他们作残酷的斗争，一直到封闭他们的会所，驱逐牧师出境，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在这里党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作，以帮助劳动群众。

同时，中共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之下，应当对于一切反对苏维

埃政权与共产党的反革命组织，还要有坚决的正确的路线。绝对不能允许这些组织在苏维埃区域的公开存在。凡企图组织这些团体，或者宣传他们的思想的人们，必须以革命法律，严加取缔。至于反革命的组织——包括了一切反动的团体，从军阀国民党改组派与第三党，一直到托洛斯基派陈独秀派都在内。

对于暗藏在党内而倾向于托洛斯基主义与陈独秀主义的党员，必须先在国内同他们奋斗，只能在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之后，才以革命法律来对付他们。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反动政权统治之下的 乡村之中的任务

在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之下的区域中，党另有特别的任务。在这些地方，党在乡村中的工作必须注重于推动一切后备军来帮助先锋队。但是这里的工作不一定是从游击战争及各地暴动做起。以后，仍旧应当利用军阀之间之一切部分的以及小的冲突，扩大农民基本群众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的斗争，逐渐引导他们到革命的更高阶段。力争改善雇农的劳动条件，抗税抗捐，反对军阀战争，反对高利贷，特别是减租与抗租：这些斗争都依然是中共在反动统治之下的乡村中的工作的主要内容。同时，中共以后还是应当根据国际一九二九年六月给你们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的指示，继续在中国农民群众之中，广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务必使全国每个工人与每个农民都知道苏维埃政权为工人和农民作了些什么，在苏维埃区域之中，比较在军阀，封建地主豪绅高利贷主——国民党统治下的区域内农民的土地数量增加了多少，捐税减少了多少，农民生活改善了多少，一直到开办学校，俱乐部及群众团体等等。在反动统治区域内的每个乡村之中，必须召集群众

大会，报告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与行动。号召工人与农民派代表到苏维埃区域去参观，使他们从实际情形中认识苏维埃政权。必须组织援助苏维埃区域的农民委员会，这里所谓援助，就是说，在军阀封锁之下，供给苏维埃区域以米面衣服以及探听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军事等等。凡此自然都须与每省每县以至每村的劳动群众的利益亲密的联系起来。

为着更进一步的夺取在反动统治之下的乡村中的广大农民群众，党应当设法组织各种群众的团体。一切群众团体（党除外）必须尽可能的争得公开的存在。为此应当运用各种公开的方式与名称，以便掩蔽反动阶级的耳目。在不能公开的地方，其组织应当是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所谓群众组织的公开，并不是说把这些团体所有的乡村干部都公开出来，而是说，要有公开的群众工作，同时尽可能的使干部秘密起来——这便是我们的原则。

首先，应当组织雇农，苦力及手工业工人的工会，这些都是保护他们的利益的阶级组织。次之，就是农民协会。我们必须努力使这些农民团体都在我们的政治与组织影响之下，为此党应当在农民团体之下组织党团，而雇农等应当组织小组。在农民协会里，雇农与苦力工会应当有自己单独的组织。乡村中的富农土豪与政府的官吏都不许加入农民协会。假使发觉某一乡村的农民协会有富农在内，党应当努力把富农洗刷出去。假使这样作不通，雇农苦力及贫农退出这个农民协会，另行组织自己的革命的协会，同时把中农抓取过来。凡是在我们领导之下的中农，必须很积极的参加由党所号召起来的一切运动。

除农民协会外，可以组织各种农民群众组织，例如：俱乐部，游戏班，青年男女农民识字班，采伐薪木队及为农村女孩所设的缝纫班等等。同时在经常存在的农民协会外，遇有某一具体问题，应当组织农民委员会。例如：遇到灾荒，应当组织赈济灾荒委员会，以及抗租，抗税委员会等等。自然，只有使参加者很清楚的

了解这种委员会的作用，委员会才能建立起来。这种委员会必须由全村农民——富农除外（无论他曾否是农民协会的委员）——大会选举出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组织运动，在运动终结以后，向大会报告工作，如必要时，可以重新选举，给以新的任务。

由最好的贫农与中农所组织起来的精练的农民委员会与农民协会，在农村暴动或红军占领该地的时候，必须成为建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或临时苏维埃（但只是临时的）的基础。暴动的乡村中的一切革命政权，一定要由农民大会来选举；除非在特别的情形之下，可以由党或农民协会指定，但其存在只能是短时期的。

除组织各种在我们影响之下的贫民团体外，党还须到所有在国民党或汪精卫派（改组派）以及谭平山派（第三党）影响之下的农民群众组织中去工作。到这些组织中去工作，不是说去巩固他们的组织，恰恰相反，而是去使他们分裂，争取其中的贫农等等。党应当比现在更加多的注意灾荒区域，照着已经给过的指示积极进行工作。

为反对勒派军饷，强征捐税，军队的奸淫掳掠与糟踏田禾等事，必须组织自卫队，这一任务，应由党与农民组织共同担负。农民自卫队游击队应当是群众性的组织，其指挥者必须是可靠的分子。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 苏维埃问题决议案

——苏维埃建设条例
(1930年8月)

中国南部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有系统的在村镇(乡)与城市之中建立苏维埃政权，一直到建立这些苏维埃区域的总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务。

一 在暴动过程之中临时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

当城市与乡村的劳动群众武装进攻压迫阶级的时候，或者当红军占领某地之前，必须在这些村镇与城市之中组织起临时革命政权。这一临时革命政权，必须在事前由当地的党部及可靠的党外的群众领袖(特别是工会与农民协会的领袖)三人至五人组成之，命名为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权胜利之后，革命委员会应当按照军事环境而由下层选举重新改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领导暴动，在军事上动员革命的力量来歼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枪械。革命委员会必须发出布告民众的宣言，解释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并须立即公布初步的法令，宣布消灭反革命的物质基础，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

当苏维埃选举的时候，革命委员会须公布：地主，绅士，土豪，军阀及经常雇用劳工(雇农工人)的富农，以及使用一个雇员以上的商人一概剥夺其选举权。其他民众：产业及手工〔业〕工人，雇农，苦力，贫农与中农以及各级红军士兵得享有选举与被

选举权。妇女得与男子有同样的选举权。青年男女农民及手工业者的子女，即使还没有自己经营的经济，而是在他们的父母之下工作的，凡在十八岁以上，得与其父母有同样的选举权。苏维埃里这些社会集团的代表人数，必须有一个确定的估计，使苏维埃得有坚固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基础。譬如：工人，雇农与苦力可以由二十五人选出一个代表，而红军士兵就由五十人，贫农与中农则由一百人选出一个代表。这一个比例不过是一个例子，你们必须根据当地人民的社会成份加以变动，但无论如何须保障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在工人，雇农与苦力的人数没有到选举的法定数目的场合之下，也必须使他们有自己的代表参加苏维埃。

苏维埃政权最低的一级是村苏维埃（某村工农代表会议），不满十户的小村必须联合两个至三个同样的小村，而选举共同的苏维埃（某某几村工农代表会议）。各村苏维埃及由几个小村联合组成的村苏维埃必须选举代表与候补代表共五人，组织成乡苏维埃（以某镇为中心）。选举出来的苏维埃须于最短期间召集会议（这次会议须邀请当地的全体劳动民众来参加），讨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通过他们应提出的临时法律，并以该苏维埃的名义创立新的革命法令，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民。没收大的房屋与建筑归苏维埃处理，分配给苏维埃，党部，雇农，苦力及工会作办公处，办俱乐部，读书室学校等。没收的财产，或者分配给民众，或者用以办理公共事业（如建筑房屋，购买书籍），都归苏维埃来处理。在苏维埃成立以前，革命委员会必须将一切旧的官吏逮捕起来，交给革命法庭，同时把所有被帝国主义军阀逮捕下狱的政治犯释放出来，颁发出入苏维埃区域的通行证，办〔成〕立革命法庭。组织执行与行政的机关，如：乡村与城市的警卫队（赤卫队），肃清反革命，怠工与作投机事业者的特别委员会等等。这些机关不能用以前反革命的官僚，豪绅政府机关的名称。

在苏维埃之下组织各种委员会：经济，财政，教育，总务等，选举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由九人以下的组成的村苏维埃，只须选出一个书记经常在苏维埃工作。镇苏维埃（包括许多村而以某镇为中心的乡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须由三人至五人组成之。小城市（县）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应按照代表人数的多少与苏维埃的工作之轻重，由二十五至三十五人组成之，并选出三人至五人的常务委员会，候补常务委员二人。

为使苏维埃不致变为官僚机关及其工作不至与群众隔阂起见，必须使苏维埃的工作在劳动群众的眼前与监督之下进行，尽量的吸收劳动者参加苏维埃工作。苏维埃的会议（村苏维埃，乡苏维埃及乡〔县〕苏维埃的执委）必须有工人，雇农，苦力及有发言权的农民参加。必须在各乡，各镇，各城市，各工厂与企业之内召集群众大会，报告苏维埃的工作与决议，而去得到群众的赞同。一切参加者的提议及事务上指正，须交由苏维埃正式会议接受通过。

二 苏维埃政权的集中化

当暴动或红军占领了几个连接的村镇与城市的时候，必须分区或分县的召集乡区与城市苏维埃大会。由每个村，镇与城市苏维埃选派代表参加大会，选派代表的标准必须根据人民的多少，地点的重要来决定，并使无产阶级中心城市代表额数要比较多些。比较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的城市苏维埃应当起来作召集这一大会的发起者。红军必须有代表来参加这一大会。大会须讨论一区或一县的一切事务，选出由七人到十五人的区（或县）执行委员会，使一区（或一县）的政权集中起来（按此地“区”的意思，是联合许多乡的大半县或县城尚未取得时之全县）。

在县或“区”苏维埃大会之后，若进而占领几县或几“区”以至一省的时候，必须召集省苏维埃大会，选派代表的标准也同县

与区苏维埃大会一样。省苏维埃大会任务是：解决全省的事务，选举省执行委员会。这一大会的发起者必须由大会的无产阶级的“区或县或市苏维埃”担负起来，苏维埃版图再进一步的扩大起来，召集苏维埃省〔份〕的成立大会，以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变成实际的问题了。这个大会必须通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及其他基本的法律，指正并确定省，县以及村镇苏维埃的工作，决定各省县一致的法则，选举代表的条例及组织红军等等，最后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两个苏维埃大会之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成临时革命政府。

三 苏维埃与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

苏维埃对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必须以民族解放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利益来决定。村镇与城市苏维埃已成为国家政权的机关，必须依据工人，雇农，苦力与乡村贫民等组织，与他们发生经常的联系与经常的合作。在物质上帮助这些团体找办公处，大会场等等。当工人，雇农苦力与他们的雇主之间发生冲突之时，苏维埃须完全站在劳动者的方面，在物质上与组织上帮助他们，必须的时候，更以行政的办法来对付剥削者。另一方面，党必须经过党团，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群众组织一致帮助苏维埃与反革命奋斗与建立巩固的苏维埃统治。

四 苏维埃区域的守卫

劳动群众由斗争得来的苏维埃政权，需要有经常的与周密的保障，使他不致受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危害。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与土地革命的一切敌人的时候，必须有坚强的经常的武装来保卫苏维埃政权。为获得这一保障，目前就要使所有的成年民众受军事训练：学习运用枪械与装置军火及子弹，学习射击与为伤病的战士裹伤以及练习作宣传员等等。同时，每个在

苏维埃中有选举权的人，必须会使用枪械以及裹伤，装置军火子弹等等。苏维埃必须有经常的武装力量，如：红军，村镇，城市的警卫队（为保持内部的秩序），以及肃清反革命及保护苏维埃，工会，党部机关，火药库，粮食储藏所，牲畜豢养处的特务处与特务队。

五 党在苏维埃中的任务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工作的进行，整个中国共产党以至其每个党部，每个党员个人都负有最重要的责任。每个党部，每个党员必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帮助雇农，苦力，工人与贫农选出精干的代表，向中农宣传要选举最勇敢，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代表。在苏维埃之中的党员必须组织党团，受当地的党部指导。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必须注意整个苏维埃的工作及苏维埃每个委员的工作情形，并须留心不要使富农，已经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及其他劳动民众的仇敌混进了苏维埃。要把广大的无产阶级，雇农与贫农及红军士兵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

——共产国际东方部提纲草案

(1930年8月)

国内经济及一般的政治危机的日益加紧，新的革命高潮，苏维埃区域之迅速的扩大与游击运动的发展，最后，罢工斗争的高涨及其质量的水平线之提高，这些便是目前状况的特征，在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及反帝国主义运动确立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是非常紧迫，准备总同盟罢工的问题也迫切起来了。一九二九年是一般的阶级斗争之发展，特别是职工运动发展中转变的一年，革命的职工运动处在高潮上。

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复兴于一九二八年，先带着自卫的性质，很迅速的转到反攻与进攻，在这些斗争中的新现象，便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重要队伍中团结甚坚的群众，都走入经济的斗争，青岛的纺织工人，开滦的矿工，北方的铁路工人和南方的海员等，被吸引到这个运动来的，有无产阶级的新阶层，新的区域，四川盐井的罢工，女工和青年工人的非常积极性，经济斗争很快的转到政治斗争，在罢工斗争时，反对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口号益发多起来。所有这些，向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提出了许多新的任务与开辟了新的前途。所有这些，正要与机会主义尾巴主义的一切表现作坚决的斗争，要求与那些在转到高度斗争之下所发现出来的一切消极性或形式主义及机械式的来指挥群众组织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与赤色工会近来在罢工斗争中是有大的成绩的，他们积极的参加经济斗争，尽力领导这些斗争，组织罢工委员会，将经

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转变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总战线的一部分。可是直到现在,党与工会的组织比较群众斗争的准备性,还是落后的,在许多罢工斗争中,甚至于最近的时候,我们的同志还等待斗争的工作,最近一年来的最大的罢工,差不多都不是由于我们的同志的准备与发动(开滦煤矿的罢工,青岛四方纺织工人的罢业,北京车夫工人大罢工等……)我们的同志在一切的大罢工中与反对国民党的幻想(这种幻想在北方的工人中还很厉害)的斗争,都表现了不坚定性,我们有许多同志他们在黄色工会中能够占到领导的地位,在罢工斗争的实际工作中有厉害的机会主义,这点是必须指出的(如我们的同志黄色工会的领导者号召停止上海电车工人的罢工,邮政工人的罢工也是一样的)。中国党的中央,因此不能不在罢工的过程中实行坚决的干涉与改正这种对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关系与罢工的领导的不坚定性。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表面的机械的实行罢工斗争的革命策略的企图,这种企图,首先便表示在没有充分的技能去实现下层的联合战线(北京车夫工人与电车工人的冲突),没有充分估计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的统一战线的意义,机械的计划罢工,而不作动员群众的重要工作,特别要指出对罢工斗争的发展的机械的计划的无条件的错误与害处,例如党的上海的委员会在六月从〔以〕前预计“组织总罢工”的计划——这一切都表现出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薄弱,而这些联系是在秘密条件和白色恐怖之下失掉了的,党与革命的职工会是未得着这个中心任务的具体解决。

发展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共产党和赤色职工会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最重要的任务,同时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切经济斗争,都带着很尖锐的政治性质,注意到在国内存在着的革命高潮,共产党与赤色工会的重要口号,应该是在日益增长的经济斗争的浪潮上准备总政治罢工。

此种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在中国的革命职工会发展方面,是一

个转变,这个转变表现在二方面:一方面是,党在黄色工会中所采取的有计划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是发展与巩固赤色职工会。

中共对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估计不足的时期已经过去,在中国呢,改良主义的基础比较先进的国家中的条件要狭隘些,而且质量上不同,高等熟练工人的阶层并不大,工人贵族主要的是那些老板,监工夫,头目,实际上这些人不仅是工人,而且是工头,其大部份进款的来源,不是在企业中工作,而是从中介绍劳动力和参加剥削劳动力。

可是在中国(一般的在殖民地国家也是一样)改良主义还有另一个基础,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很大,这是发源于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包围,如手工业者,手艺人,小商人,职员,与无产阶级中(特别是北方)留存对国民党的幻想,特别是对“左”的武断宣言的改组派有一种幻想,对革命工人运动,采取恐怖政策强迫的手段,委派制,无疑的是中国黄色工会存在的基础,可是同时并不能忽视在现存的职工会中改良主义的基本。

必须说明党近年来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达到了相当的成就,在许多情形之下(唐山的铁路工人,开滦煤洞的矿工,青岛的纺织工人,北方上海的市政工人),中国 CP 能进行很大的工作,揭露职工会中的 KMT 的领袖向工人宣布他们的叛卖作用,他们对于工人迫切利益的仇视,不仅如是,在许多情形之下,中国的同志能将 KMT 的领袖赶走,推翻他们基本的错误,可是正在这里,就是一个斗争。主要的在许多情形之下,纯粹的反对坏的叛徒的领袖,而不反对整个的 KMT 没有将革命的职工运动的政纲和策略与国民党的政纲和策略对立,没有将群众动员起来,环绕于工人运动的许多基本问题的周围。没有在揭露国民党领袖的实际中将群众动员起来,这样一来,在很多情形之下,结局便是以另外一些还没有被揭露出来的领袖,来代替这些领袖,以改组派来代替蒋介石的分子。

这个主要的错误，又引起另一个错误来，我们有些同志在揭破赶走了旧的领袖之后，自己却让别的国民党来代替，或则让给中立分子，自己加入黄色工会机关，而不动员群众建筑自己的基础，他们成国民党上层分子的俘虏，很容易的走向机会主义，而终于成了黄色工会的领袖。

党乃认定这个政策是错误的，并且局部已在改征，必须更坚决的更巩固的来改正党在这一个中心问题的策略路线，便将有可能更广大的动员群众，来注意国民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所有的实际，并把这个问题与国民党的一切政策联结起来（土地的帝国主义的反苏联的问题）。

应指出党在建设红色职工会方面的几点成绩：（一）在最近半年内红色职工会会员增加了两倍，从三万增到六万；（二）组织在红色职工会里的成份有较好的无产阶级成分的改变，除小企业的工人外，大大的吸收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市政工人；（三）红色职工会的发展，主要的是在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上海，香港，唐山，铁路），但是这些胜利，还应看着只是开始，党在将来更应在这方面加紧广大的政治的与组织的工作，这个工作比以前更应努力加紧注意，应该消灭在这个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和弱点，比如，在红色职工会的领导中还没有充分估计到组织上要来巩固日益发展的女工的积极性，还非常薄弱（在六万赤色工会会员中大约只有一五〇〇个女工）。

若是过去党在长时期内，见不到党在黄色职工会工作的重要，那么，现在照全国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又演成另一方面矫枉过正的错误，它误为在黄色工会中工作，占有特殊意义，而组织并发展红色职工会的工作却好似成为次要的了。这种立场是不正确的，红色职工会是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桥梁，采用各种方法来发展和巩固红色职工会，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工人运动之落后，跟不上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使这个任务更为重要，他是

目前党工作中很重要的关键。

红色职工运动除了数量上的夺取以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运动本身的散漫和组织的薄弱，秘密的职工会是不能包括到几百万群众的，在白色恐怖与严格秘密条件之下，职工运动只能够吸收那些先进的少数的无产阶级加入红色职工会的，但在这种条件之下，组织上的巩固，各部份之团结与集中化的领导，却有特别意义的。中国红色职工运动大部分还带一种散漫的形式，每个工厂内部却有独立的红色工会，每个红色工会会员很少超过二十个人以上，因此，绝对必须把各工厂的赤色工会合并起来，合并成一种生产工会的地方工会。至于在这样的城市中，（如上海，天津，香港等）则必须开始合并为这一城市内的生产工会。如果不是这样，则对经济斗争的切实领导，对同盟罢工的真正准备以及工人一般的政治斗争，都会要感觉极端的困难。

而且就是在红色工会都好好的合并以来，可是因环境所迫而秘密起来的红色工会支部，依然不能把党的影响宣布到广大群众中去，这就必须要有公开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这样的组织。工厂委员会虽然仅只与这厂内的工人有联系，只是与他们的狭隘的日常要求有联系，但同时他却可以给我们一种可能，使我们可以影响到一厂内全体的工人群众。

只要是红色工会有正确的策略，则他便可以侵入工厂委员会，影响工厂委员会，散布自己的影响到本厂的许多工人群众中去，并在拥护工人日常要求的过程中，来和他接近起来，吸收最觉悟的工人到红色工会组织中，借以扩大红色工会支部，这样一来，就为自己在各企业中造就了更广大可靠的基础了。

自然在中国条件之下，就是工厂委员会也不能希望到完全的与长期的公开存在，可是工厂委员会可以用各种灰色的名义，此起彼伏出没无常的来发展自己的工作，借以发动和训练广大的群众，这种工作，一方面是需要很大的敏捷性与适当性，他方面又

需要党在支部与工会支部之极坚定的原则的与策略的路线。

对于失业工人的组织，是红色工会工作非常薄弱的地方，没有经常的有系统的去领导失业工人，失业工人运动只是临时运动的性质，在失业工人运动与企业中作工的工人斗争之间完全没有联系。

只有正确的发展红色工会的下级组织，建立无数的经过工厂委员会而和企业中群众联系着的工会支部，才能彻底的消灭从上而下的命令主义与委派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虽然在每次代表大会与中央全会议决中都遭受过裁制，但至今尚未消灭，结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减弱了整个红色职工会运动，在这方面，提拔和训练新的干部，有左右全局的作用。

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内红色职工会的问题，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将一切的苏维埃区域与中央革命政权联合，将许多工人的中心区域都包括到这些区域以内（虽然是不大的），在以苏维埃政权的形式而存在于这些区域以内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系统中来确定红色职工会的任务，此乃非常迫切的任务，此地红色职工会的工作，首先应该从战胜封建帝国主义的联合的利益。发展农民土地革命及帝国主义斗争，由现时德漠克内西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拥护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出发，红色工会应当十分注意农民土地革命，红色职工会应当用各种方法帮助巩固苏维埃区域的国家机关及红军。要在工人积极分子中挑选出优秀份子去作领导与指挥工作。

在民主专政的条件之下，工业还未收归国有，所以在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方面，红色职工会的任务，是为生活程度实际的改善，而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假使在还未收归国有的本国企业中，不发展罢工斗争简直是最大的危险，这在中国特别重要，武汉时期的经验，证明当时党与红色职工会简直阻碍经济斗争发展。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红色职工会实际工作中的中心

问题，红色职工会应该向国家提出实际和主要的口号：八小时工作制，劳动的保护，社会保险（保护失业，疾病灾害等），保证工人阶级的独立作用，是党与红色职工会的中心任务。但是在发展经济斗争的时候，绝对不要忘记保卫苏维埃境界，及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应当将工人的利益与农民土地革命的利益，以及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利益联合起来。列宁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之下指出在（一九二〇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还存在有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残余……在整个社会制度内，还存在下有社会主义的增长与这些残余的矛盾，职工会的各种任务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不是偶然的，在十年内还不能消除。而且这种矛盾在工农德谟克内西专政的条件之下，是必然的，这是正在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

至于国有化的企业（帝国主义与反革命者的）则红色工会的任务，完全是另一样，拥护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还必须提出积极的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的工业的任务。这也就是说提拔工人的积极分子到国有化工业的领导地位中去。

因此共产党必须在职工会中实行争取领导作用的坚决斗争。反对一切工团主义的份子，行会主义者狭隘的经济主义者，红色职工会应该是共产党与群众的传递者，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革命的国家政权的后备军。

最后最主要的而不可诿诸明日的任务——就是组织雇农的联合会，这个雇农联合会应该是实现无产阶级在现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反帝国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重要工具之一。

所有这些，须要在组织上巩固红色工会和训练新的工人干部的工作上的努力，所有这些，只有在红色工会内坚决的实现工人德谟克内西才有可能。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

——共产国际东方部议决案

(1930年8月)

详细研究中央及各省委关于组织工作的许多文件以及地方党部的组织状况的材料之后，就可以知道：党内对于党的当前许多组织任务的异常重要，还没有明确的了解。中央在第六次大会后对于许多根本组织问题的更加正确的提出特别是对于党的工作重心移到企业中去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成绩。但是，组织任务的提出还常常只是宣传性质的，没有估计各地方的具体经验，没有对于所发出的指示的执行加以检查，没有发动下面的建议。尤其不能使人满意的是吸引工业工人入党的情形，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性尽管增长，但党的工人分子的数量却继续着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

新的革命浪潮飞快的增长，迫切的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最有力的办法，使党的全部组织工作在最短期内实行最严重的转变，并且在最近时期内对党的组织上巩固的问题，要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

党的组织的薄弱，是党在许多大的革命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农民运动——之中不能取得领导的根本原因。在革命浪潮向前增长的过程之中，党的组织的薄弱，对于中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胜利，不可免的将要有更加严重的消极结果。

党的组织系统与整个组织工作，应当能够适合于全国现状的特点。现在时局的特点是从工农群众个别的革命行动进到总的革

命进攻的过渡时机。正在开展着的革命高涨的不平衡，许多扩大着的苏维埃区的存在，而在工业的中心城市之中，——帝国主义军阀的巨大军事政治力量，正在用自己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共产主义的危险，党的组织却还薄弱，所有这些情形，要求党的组织，要有异常灵活的系统，有指挥如意的能力，善于迅速随着环境，改编党的队伍从最秘密的斗争环境进到适合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反过来，从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而有准备的转入最秘密的状态。党的队伍要能够这样迅速的改编，党的力量，要能够这样迅速的动员，那就必须有凭借着与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思想组织上坚固的积极干部的中央指导与地方指导。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中心组织任务是考察和巩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巩固和扩大党的积极干部在中央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党的积极干部到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周围，在两条战线上——反对右的与“左”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无情的思想上组织上的斗争之中，来考验党的组织的各种部门的工作。

下列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现在应当居于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地位：

一、大规模的革命战斗的成熟起来，全国卷入新的强有力的革命浪潮的前途的增长，使巩固党的组织，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的积极性和党内纪律，最高限度的改善和巩固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党的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中央在最近必须集中最大注意力，去建立各地方的强固的领导中心任务。首先就要改善和巩固各省的工作。各省委最近最主要的任务，是巩固党的地方组织，首先就要巩固工厂支部与苏维埃区的党的领导。要使关于巩固地方的领导的决议不成为纸上空谈，中央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去改善与省委间的联系，有系统的去检查他们的工作，不仅看他们的书面报告，而且要经过自己的代表或巡视员去考察。关于下级党部的巡视工作，尤其更加紧要，特别是省委对于工厂支部的巡

视工作。

二、在党内应当进行最严重的教育工作。应当建立各种小组，开有系统的学习会议（如果没有可能开大会的地方，则可举行最狭小的会议），最广泛地进行个人教育工作，为要使党能够真正有准备的去进行将来的战斗，那就无论如何必须尽最大限度的精力，去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使每个党员能够自动地懂得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现时行动纲领。关于这一层，必须特别注意解释列宁关于党的学说的最重要之点，就是没有团结坚固的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党，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三、对于行将到来的革命战斗的准备，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与巩固党内纪律的工作，需要党的刊物的尽量的扩充，党的刊物在最近应当对于党的建设问题加以根本的注意，注意组织上的实际方法问题，在这些方法的帮助之下，党应当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在现时条件之下，党的中央和地方刊物的作用异常的增长起来。中央必须根据这一点，很快的作出一定相当的结论来，必须加强中央机关报的政治领导，中央机关报的论文，对于地方党部应当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对于这些文件，中央政治局应当经过自己在编辑委员会中的代表来负责。一方面详细估计到秘密环境的要求；别方面，文章应当带有最大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予党的地方工作同志以具体的实际的建议，要指出他们应当怎样在实际上执行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指示，关于工农日常斗争的领导，工农群众对于行将到来的决战的准备，以及这些决战的领导和进行。中央必须采取办法建立地方党报，各省与各县的党报，至少须经常的印发各种传单；这些传单，除出提到地方党部的工作问题以外，同时必须解释最重要的政治口号，以及党的其他的一般政治和组织任务，要向广大工农群众指明他们最近应当怎样向前开展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工厂支部出版的报纸和传单纲领的建立和扩大，应当加以特别注意。

只有一方面，在各地方发展起很好的中央机关报的党的通信员网，另一方面中央会组织起广泛地发行机关，党报才能完成其党的组织者的作用。

中央对于党的刊物的发行问题，最近应当加以加倍严重的注意，有系统的检查实际上到底是怎样情形，采取一切办法去改良和扩大发行机关。在组织党的刊物发行机关时，必须而且应当事先看到，有大量的党员尤其无党的工人群众是不识字的。因此，必须不仅注意将党的刊物发散到全国各处，而且同时必须做到使党的刊物内容真正能达到一切党员和同情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组织特别的读报的小组，责成识字的党员各个人对于不识字的党员与表同情的工农分子，讲解党的刊物的内容。

四、在一切党的组织的实际工作上与党的刊物上对于研究工农革命斗争的经验，应当加以最大的注意。每一个罢工，示威及群众的农民运动等等应当成为一切党的组织详细分析的对象。一切比较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由中央举行的群众政治行动，中央应当加以极详细的研究。每一次这种特殊运动和某种革命运动之后，中央应当在最短期间，把这些运动之中的教训详细无遗的指示给各级地方党部。

五、征收党员的工作是现时党的当前的各种中心任务之一。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之下，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而完全是必要的事情，党必须把征收党员的运动作到最高度的程度。首先很明显地就是要注意主要的无产阶级的中心，那些地方党是处在最严重的压迫之下，那些地方现有的党员数量特别是在企业中的数量真是太薄弱了。在党员数量这样稀少的情形之下，党实际上不能够真正去准备领导和进行正在成熟着的革命斗争。

中央在最近应当特别研究在全国一切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特别进行扩大征收党员工作的问题。一切由党进行的运动，一切工农的群众行动，党的领导应当善于应用他们，使在这些运动和

革命行动的过程之中，显露出新的革命工农分子，使党的组织尽可能地与这些充满革命情绪的工农分子发生联系，应当对他们作教育工作，其中最好的分子，应当吸引到党的队伍里来。中央及地方党部应当把在数量上和社会成分上检查征收党员入党的结果的工作，看成一种斗争的任务。使在最近期内，大企业中的工人开始一天一天加快的不断的加入到党里来。中央对于现在又有产业工人成为新党员的潮流的情形，一定要作到一个坚决的转变，中央应当以征收新党员建立新支部及巩固现存的党的组织的业绩，来作为地方党部工作成绩的标准。在征收党员的问题上，根本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征收大产业的工人，直接在企业中散发传单，召集工人会议，特别是进行经常的个人鼓励与教育工作，是这一征收工作的成功的必要条件。

党的组织在进行征收党员时，应当对于固定已经新加入的党员的任务，加以最严重的注意，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主要办法，是迅速吸收新入党员到党的实际工作中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线，向他们解释党的纲领，政策，纪律和其他种种任务。为到达这些目的，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当组织特别的会议，组织按照包括党的最近任务的最重要问题的一定纲领的短期训练班。对于新党员必须组织训练班并且把他们分成几人一组，指定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用个人教育工作的方式，教育他们应当怎样作党的工作，并且帮助他们了解一切最重要的党内问题以及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任务等问题。为着保证对于教育新党员的工作作得好，以及为着改善一般的党的工作，中央应当给予下级党部指示，使他们对于领导下级鼓动员和组织员的工作加以最严重的注意（开训练会议研究一些辅助材料——大纲，小册子等等），同时必须有系统的充实下层鼓动员和组织员的干部，吸收小组和各种党的训练班里比较有能力的分子以及从实际工作中提起来的有力的鼓动员与宣传员来参加这一工作。

征收运动不只限于吸收入党，同时党应当以新的革命工农成份充实在党的影响之下的各种群众的非党的组织——如赤色工会农民协会等等。

六、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全部工作需要扩大和巩固领导的积极干部。根据现有的材料看来，使人得到一种印象，就是中央对于党的干部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注意，然而现在这是党的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就必须实行最近革命斗争——罢工，示威和农民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力量上来扩大党的干部的任务。应当吸收这些同志到由党部成立的研究各种问题的委员会中去工作，派他们做个别的工作，——要他们经过下级党部及群众团体去执行某种指示，将来更进一步地吸引他们作更负责的工作，提起他们到指导机关的成分中去。

中央在这一点上，应当在最近期内将共产国际再三反复着说的关于党的指导成分的无产阶级化的指示实现到实际中去。

七、为使党的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在实际上有个真正的转变，就应当自上而下地举行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指示的执行的检查。这一检查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要达到使省委和下级党委成为名称〔符〕其实的机关，就是能够集中党的组织的一切力量去扩大企业中的群众工作，去建立和巩固党的工厂支部以及经过党的基本组织——工厂支部去扩展群众工作，检查工作应当用两种方法来举行：（一）派遣党的委员会的巡视员和代表到地方去；（二）扩展自下的自我批评。党的组织的巡视制应当按照新方法进行，过去巡视制用很长的一般的报告的办法，应当坚决的检举和停止。巡视制应当按照扩展下层创造性，帮助地方党部的指导，使他们实际上去实现党的领导——争取群众和吸收他们到斗争中来的指示。在扩展自我批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破坏党的秘密原则，要使自我批评成为为国际和中央路线而斗争的工具，而不要恶劣化为个人的或偶然性的无原则的争论。自我批评的锋芒，应当特

别向着反对不允许青年党员作积极党的工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情绪上去，尤其是要针对着反对把党的一切工作重心直接地转移到企业中去的情绪。

八、地方党部是应当执行党的路线的——他的能力的程度，首先应当看他会不会组织企业之中的工作，看他所管辖的区域里面，有没有和企业之中工人群众密切联系的工厂支部——能够独立活动，而且很有成绩的征收党员的支部企业——首先就是大企业，应当是党部注意力的中心。工厂支部应当尽他是党在企业之中的主要柱石的作用，而工厂委员会各种特派员（代表）会议，就是主要的组织上的动力机的作用，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党的工厂支部能够与企业的工人群众联系并且吸引这些群众到党的口号之下来作革命斗争。

党应当建立各种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反对关厂委员会，为恢复开除工人斗争委员会等等），作为在各企业中动员广大工人群众的各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些委员会应当在统一战线的广大基础上建立起来，他们应当尽可能是选举出来的组织。这些委员会应该凭借着各部门的特派员（同样要尽可能的有选举出来的代表），要吸收有革命情绪的工人以及国民党工会的下层的充有革命情绪的会员，做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党应当希图经过包括全城市的行动委员会去与各种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组织与小资产阶级的团体（学生，小手工业者等等），在斗争的具体问题上进行临时的联合。这个方法——经过参加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建立为着具体目的的各种特别的行动委员会，经过这些委员会吸收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以及学生的贫苦阶层群众参加斗争——是加强反帝国主义运动并且使之革命化的主要方法。

党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缔结临时战斗的联合，应当严格的注意到：使这些联合不是牺牲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与曲解党的政治口号的，同时使他们一定要成为吸引更广大劳动群众到革命斗

争中来的工具。

对巩固工厂支部的具体问题应当加以最大的注意，没有巩固的有自动力的支部，党是不能在企业中从组织上坚固起来的。中央应当有系统的检查地方党部关于巩固工厂支部的工作，研究已有的经验并且把〔它〕广泛地运用到全党范围中去。工厂支部中的根本工作，是使他们自己成为党与群众在企业中的联系机关。

九、在非苏维埃区域中党的全部工作自然应当在极端秘密状态之下，但是，同时党应当坚决的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便凭借着党的秘密机关在这种或那种掩护之下进行群众的鼓动和组织，最大限度的加紧党在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估计到加入到群众的国民党工会的广大工人群众的广泛不满意的生长。

当运动向前发展到广大的工农群众行动的时候，党应当在无产阶级的这些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同时保存和继续巩固秘密机关），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不得警察机关的允许而自动公开起来。首先就应当建立各种工厂的组织，例如工厂委员会，各间代表会，罢工纠察队，工人自卫队……等等。

至于非苏维埃区的乡村之中，党的最主要的组织任务根本上还照旧一样。乡村党的组织应利用抓紧自己的日常工作与苏维埃宣传的联系，利用苏维埃区的材料，扩大为着最近要求的日常斗争，直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央应当给乡村党部以指示，指出征收乡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成分入党是各种中心任务之一。如城市中一样，在统一战线的基础组织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应当是选举出来的组织，应当凭借着乡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成分的群众，农民委员会应当成为乡村群众工作的主要的组织上的动力机。

十、党对于苏维埃区的组织建设问题，应当加以特别的注意。最近苏维埃区的党的组织系统，应当适合于向前开展着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斗争的需要。正在进行着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

境，需要党在苏维埃区中实行军事纪律，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的执行，以及与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都要特别严格的负责；这对于在游击队或红军中的党员更特别重要。党的领导队伍应当最注意到：使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革命纪律和对革命事业彻底忠实的模范。关于这一点必须向党员和同情者进行解释工作，并且在事实上实行为反对苏维埃法律的罪过之每个党员的最严厉的个人负责办法。党员比非党员的工农更要严格的负责，这是铁一般的公例。这对于苏维埃区的负责人物和游击队与红军中的军官成分尤为重要。

在苏维埃区中建立党的强固的委员会，是组织任务的中心任务。这些党部能够保证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游击队与红军和区域内的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的领导。没有这样的强固的党部委员会，则苏维埃政权的正确建立与坚强领导以及斗争的向前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党的中央机关应当加倍注意：有系统的保证对于苏维埃区的党部委员会的帮助，特别是必须在苏维埃区党部委员会之中有保证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的坚决的无产阶级的干部。在苏维埃成分之中，在革命委员会之中，在工会之中和其他的群众组织之中，一定要组织共产党的党团，党团的领袖应该是最积极和最守纪律的党员，最好是党部委员会的委员。党团应该在他们工作的那种组织的每一会议之前召集会议，以便讨论怎样在会议上实现党团的路线，这是经常的惯例。党部委员会应当有系统的领导党团工作，坚决的从根本上预防党团的某些同志，尤其是整个党团不肯执行党的指示的最小企图。应当以最坚决的斗争态度，去反对有些指导工作同志之中存在的一些观点，就是以为“苏维埃政权机关是国家机关，比党还要高些，因此，党的指令对于苏维埃机关的指导者并不发生效力。”

在苏维埃区（在非苏维埃区一样的）所有党员应当服从自己

的指导机关——当地相当的党部委员会。

对于游击队和红军，党部委员会应当详细选拔最可靠的党员去作一切指导工作，保证在队伍内必须的团结性，和政治上的坚定性。党部委员会应当做到使大的游击队和红军之中的支部成分里面，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的党员。

对于苏维埃区的党的组织，征收新党员是异常重要的组织任务，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时，党部征收党员的活动，应当有最高限度的努力，党应当大开其门，让志愿者来加入队伍，然而这绝对不是党应该把一切志愿者都收进来，为的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战斗党的特性，在苏维埃区进行征收党员工作时，党应当按照下列主要规律，加以指导。

(一) 只是个人的吸收。

(二) 每个候补者，事先经过特别审查的委员会或者直接由党部委员会审查。

(三) 经过当地党部党员大会来通过新党员，在大会上，对于每个候补者作公开的和最注意的讨论，使每个候补党员怎样能成为一个好的正式党员。

(四) 在审查每个要求入党的志愿书时，对于下列各点应加以特别的注意：一、社会出身（富农不收）；二、是否曾经参加过反对共产党员的斗争，以及剿共行动等等（参加过的不收）；三、在什么地方表现过积极参加革命运动。

在征收工作之中，应当详细注意到，使党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贫农群众的，党的组织应当凭借着苏维埃政权去最高限度的努力，去组织当地的劳动群众。加强各种群众团体，这些群众团体应当有党对于群众的牵动作用；而且同时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些组织团体之中最重要的如下：

(一) 苏维埃：一、苏维埃的经常全体会议讨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以及进一步的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

问题；二、从无产阶级的与贫农的成分中吸收积极干部与苏维埃执委委员一起，成立各种委员会，经过这些委员会把乡村的一切无产阶级与贫农群众组织在苏维埃政权的最近的具体任务的周围。这样就使苏维埃政权显明的显示他的阶级性，明显的与城市资产阶级与乡村富农份子对立起来；三、执行委员会的各部部长经常的向苏维埃全体会议或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广大劳动群众的会议作工作报告。

(二) 乡村雇农工会。

(三) 对于农民协会应当采取使之自动解散的方法，使他们认为有了苏维埃政府之后，以前农民协会所做的工作，已经可以由苏维埃来担负，而且做得更广泛更好。

党在苏维埃区的工作，是公开的，但是党部委员会一定必须有组织的准备着迅速转入秘密状态的可能。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共产党的任务

(1930年)

米 夫

中国革命斗争的新高涨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中国反动派即使采取了疯狂的恐怖手段，仍然未能遏止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之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集团整个内外政策的破产，加深了国内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中国在经济上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农民群众不断家破人亡，工人阶级的处境严重恶化。这就不能不使工农群众奋起革命。中国反动派的所作所为，其结果只是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要对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做出估计，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正在重新酝酿一场革命。确实，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对于任何一种革命，特别是对于可能取得胜利的革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列宁是怎样提出问题的。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

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现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迅速产生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①

现在我们力求用这种观点大略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形势。我们就从列宁所特别强调的任何一种革命，其中包括可能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二个条件开始，即从统治阶级的危机问题开始进行分析。现在中国的形势，是不是“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②了呢？总的来说，形势并非如此。在中国，与我们相敌对的阶级，还没有达到发生全面危机的阶段。只要冷静地进行分析，我们就一定会得出上述结论的。统治集团中的分裂和内讧还不至于使他们全面削弱和政治上完全破产。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人民的这些主要剥削者——之间的相互斗争还未尖锐到使他们无力对抗革命阶级的程度。

如果说统治阶级目前还没有发生全面的危机，那么，我们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最近的事变正是急速地向着这个方面发展。中国统治阶级的危机并非一下子就形成的。因此，研究这一危机时，就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加速并逐步造成全中国革命形势的过程。事实上，最近发生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他们相互斗争也愈益尖锐。另一方面，中国反动派的营垒日益崩离析。国民党分裂的同时重新爆发了军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39页。——原编者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8页。——原编者

阎内战^①，这次战争的规模之大超过以往历次的军阀内战。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在致中共中央的信^②中正确地指出这些战争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认为：“军阀混战是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反革命政策的直接继续，同时，客观上削弱统治阶级政权，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激发他们日益积极反对军阀战争及其后患，因而促进独立工农运动的开展。”在中国，由于内战愈打愈烈，全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整个军阀制度的瓦解过程日益加快，正在形成一种使我们的敌对阶级完全削弱，使这些“上层人物”无法按旧的方式生活和统治下去的革命形势。

统治阶级的危机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上述援引列宁那段话的第二点。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和农民是否已认识到必须进行革命并准备为此而牺牲呢？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是否普遍都具有革命情绪，而会支持一切反对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和外国资本家的英勇坚定、舍身忘我的革命行动呢？这种情绪是否已热烈高涨起来了呢？在中国，毕竟还不具备这种形势。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开始高涨了，但目前远非整个工人队伍都是这种情况，农民各阶层还远未发动起来参加斗争，全中国范围内的发展还极不平衡，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地区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暂时还不能保证使革命具备突击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中国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取得胜利所必需的。

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革命高涨。但它正在迅速形成之中。被剥削群众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工人和农民不断起来参加革命。罢

^① 指1930年4月发生的蒋阎冯“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多万，死伤三十万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次大规模军阀混战。——原编者

^② 即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该信曾在1929年第51期（12月23日）俄文版《共产国际》杂志发表，同年12月29日《真理报》也刊载此信。中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81—88页，此处米夫所摘引的段落，仍从原文译出。——原编者

工人数逐月逐年地增加。1928年是四十万人,1929年达到七十五万人。1930年头几个月罢工浪潮继续高涨。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罢工正在转变为政治斗争。街头游行和工人同国民党警察间的武装冲突,已屡见不鲜。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增长,其阶级组织不断巩固。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不断高涨。武装游击斗争在中国南方各省发展尤为顺利。中国当前政局最值得重视的是一系列苏区的建立,这些苏区不仅经受住反动势力的斗争,而且在不断扩大地域。在方兴未艾的土地革命的影响下,军阀部队中士兵暴动的事件更加频繁。红军在成长,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的武装力量也在成长。

我们讲这些成绩的同时,不能避而不谈中国革命日益发展的新高潮中的一些弱点。首先,新高潮在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地区上的不平衡,这表现为,中国北方革命斗争暂时还发展较差,主要是在1925—1927年革命浪潮冲击过的地区,即一部分南方省分,革命斗争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不平衡情况还表现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现时还未汇合为一个整体。此外,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人运动稍落后于农民群众的斗争,这是指主要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还没有直接为争取政权而斗争。这种不平衡完全是中国国家不统一,国家四分五裂,外国资本和各军阀集团各有势力范围造成的,是各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各异造成的。

尽管相互斗争着的各种力量的对比最初对工农不利,革命高涨的前景仍然乐观。在革命解放斗争的今后各阶段中运动的弱点将得到克服。无产阶级组织和领导的农民战争将持续扩展到许多新的地区,其中包括工业中心。

应该从这个前景出发,来拟定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还要谈谈党目前所面临的任务。不过应当知道,革

命高潮今后能否发展，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能否正确解决革命新高潮提出的任务。

首先，我们要指出由于苏维埃运动不断顺利发展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任务。这不排除在最近期间红军部队有可能占领某个大的工业和行政中心城市，使之成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苏维埃运动的基地。同时，由于苏维埃政权已影响到国内一些工业中心，共产党在苏区的领导作用就将会有一个坚强的靠山。我们对红军的领导也将更有保证。在这种形势下，成立一个管辖所有苏区的临时革命政权机关就成为党最紧迫的任务。当然，只有以忠于革命的红军作为依靠，成立工农苏维埃政府才是严肃的举动。

为保证广大的劳动群众参与掌握政权，工农政府应该成为发动群众的工具，应该尽量协调工农群众的革命解放斗争，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在日益发展的国内战争中掌握领导权。当然，中国共产党要正确估计工农政府的意义，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建立工农政府的工作，要使政府能充分领导所有武装力量，要防止旧官吏和各种政客混入政府机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农政府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只要这个政府确实是群众的机关、起义人民的机关，它就一定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苏区，党面临的第二个任务是正确解决土地问题。我们从许多地方获悉一些令人焦虑的消息，说土地革命的口号要么根本没有实行，要么这些口号并不总是符合贫农与中农的利益。有的苏区没有彻底没收地主土地。有的苏区违背基本农民群众的意愿，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分配没收的土地，这就剥夺了雇农和相当部分的贫农获得地主土地的权利。在各个苏区，党应该毫不动摇、毫不迟疑地没收地主、寺庙和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平均分给贫农和中农。

党在解决土地的同时，应防止冒进，防止在这个领域里企图实现那些在以后革命斗争阶段上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其中

包括土地国有化的口号。这个口号，只有在全中国普遍革命的形势下，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取得稳固胜利的情况下，才应该成为党的中心宣传口号和实际贯彻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组织农村群众的问题，这个问题同土地问题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革命解放斗争的形势。在这方面，组织雇农和乡村贫雇农协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此同时，苏区现在已经有必要着手组织贫农团。贫农团的宗旨就是团结中农，使苏维埃机关的一切措施都符合贫农和中农的利益。苏维埃应当是一般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苏区的农会正在失去它原有的意义，因而应该逐步合并到农村苏维埃中去。这样来解决组织方面的任务，在我们看来是最正确、最符合土地革命的利益的。

目前在苏维埃运动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尽量巩固红军并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在苏区，党应该用一切办法武装工农。红军的兵员应当由工人和乡村贫农以及忠于革命的分子经常不断地加以补充。应尽可能集中红军的军事和政治领导。红军应该受到一切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劳动群众应该把红军看作是自己最坚定、最先进的弟兄。党应当动员全部力量和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去解决巩固红军的任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才能在进一步发展革命斗争的事业中起最大的作用。

现在，党在苏区还有一个需要明确规定对待工人的政策的问题。党在苏区应该最大限度地改善工人阶级的境况，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党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以下两点。第一，无论在其它问题或在这个问题上，党都不应该使自己的政策服从狭隘的行会利益，而应使之服从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群众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利益。另一方面，党在推行对待工人的政策和改善工人境况的大部分措施时，不应当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应该让工人群众自己通过阶级斗争去取得成果。正

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通过法律程序确立八小时工作制，维持最起码的社会法制，以及保证有组织阶级的工会和进行活动的自由，是比较正确的。在这种形势下，工人要想在今后取得成就，就必须由工会进行活动，当然要紧密结合当地具体条件来进行活动。

如何对待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党要有严肃认真、周密思考的态度。党应毅然决然地根除封建主义和高利贷的遗毒。同时，党又不应该陶醉于左倾词句，不应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现阶段的斗争。应当避免采取那些为时过早的措施，因为这只能使农民群众脱离我们的影响和领导。苏区的实际工作中就有许多这类措施，而这些措施只能被看作“左派”幼稚病的表现和跳越尚未完成的阶段的做法。建立国营农场、许多地方禁止自由经商、禁止买卖土地、试图实行集中供应、规定价格等做法，都属这类措施之列，而采取这些措施既非出于军事之需要，又非因为要同投机倒把作斗争。党在苏区的经济政策不应有这类冒进的做法。党应使革命机关的一切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开展真正群众性的斗争，有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从这个观点看，目前这方面的革命急躁情绪，并由此而引起苏区形势尖锐化和复杂化，都是极其冒失的。

苏维埃运动向党提出一系列其他方面十分复杂的任务。比如，党应制定苏维埃宪法，这部宪法既不完全照抄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宪法，同时又能防止我们的敌对势力包括富农渗透到苏维埃机构，以免制定的政策不利于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

另一方面，党按照苏维埃运动的路线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同党在其他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全部工作结合起来。党还应比过去更好地组织、发动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党要实行政治总罢工的方针。然而，低估与工人的细小的日常的经济要求有关的罢工的意义（可惜这种情况许多地方都有）也是不正确的。党不仅应该领导这种斗争，而且在组织政治罢工中，在提出总的政

治口号的同时，还应当提出使一切工人群众都感到亲切的经济要求。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这样做，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全部经验也提示我们这样做。

只有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并加以领导，党才能在不断发展的农民战争中解决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任务，才能把土地革命运动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才能提到引导反帝革命取得胜利的阶段。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要想真正解决土地问题，统一中国，进而再将这个革命转变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统统都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只有党在思想上保证布尔什维克的团结，我们才有可能完成上述全部任务。党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应当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主要危险。在当前革命业已开始高涨的形势下，整个党或党的个别组织可能会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这对党是一种威胁。党应当克服个别组织中害怕反帝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主义情绪，应当彻底克服合法主义倾向，克服不敢坚决揭露、有时甚至向黄色工会的头目投降的错误。党应制止党的队伍中某些人在苏区支持富农的要求，应克服党组织中哪怕是个别组织低估游击斗争作用和意义的错误。

同时，党应当加强反对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的斗争，这种倾向表现为对群众的作用估计不足，组织脱离工农群众的士兵暴动及经济政策方面的左倾冒进等。

只有同时加强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加强反对右倾这一党内主要危险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胜利完成所面临的任务。

(摘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立 三

现时革命斗争的发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严重的任务摆在我们前面。如果对于这些问题不能找到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解答，我们将会犯到可怕的严重的错误，甚至断送革命。我在最近几期的红旗上面写了一些短篇的论文来解答这些严重的问题。虽然是零碎的篇章，却还可以找出系统的贯串。又因迫于实际工作不能再作长篇论文，所以把他汇集起来重行在布报登载，暂给这些问题以初步的原则的解答。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一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帝国主义的统治失掉了中国，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三主要帝国主义日，英，美，灭亡的到来。所以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主要柱石之一。

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一定要决定于国内的无产阶级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要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

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

中国革命的开始，不只是一定要遇到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马上要遇到更残酷的国际战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一战争只有，而且必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及全世界殖民地工农劳苦群众站在一边（无疑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这一战线的领导者）全世界帝国主义与全世界殖民地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站在一边；作决定各自寿命的最后的搏战。中国革命要在这一最后的搏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

如果有人拿一九二五年——二七的革命，国民党政府可以用外交政策来缓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来比拟将来的形势，那么，他是完全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的转变——那时帝国主义还可以采用引诱中国资产阶级叛变的方法来消灭中国革命——与整个国际形势的截然不同，无疑的这样忽视对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是极危险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只有在与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大的援助与共同斗争的条件之下，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所以更加牢固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信念，加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取得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强大的援助与及时的一致行动，这是准备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的条件，这是中国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而且是国际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严重的任务。

二

依据中国这样的客观条件，取消派的人们便得出了他最无耻的结论，“中国革命高潮，只有在世界革命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爆发

才有再来的可能，并且才有胜利的可能”。这样等待世界革命与帝国主义战争再来革命的观点，这不只是没有进一步的去了解国际与中国的客观条件，而且没有了解极粗浅的革命的各部分的力量互相推进的作用。遂形成了他“睡在李树下等候李子落到口里来”的最无耻的懒汉的观点。

帝国主义是中国主要的统治者，固然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决难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胜利；可是就帝国主义统治的整个世界来看，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是最尖锐最严重的地方，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束缚世界的锁链中，中国是最薄弱的一环，就是革命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而且这一爆发以后，必要引起整个世界革命的兴起。

中国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日美冲突最厉害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最严重的地方，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最易为尖锐化的地方——譬如现在每次工人的经济斗争，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样一切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都集中在中国，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上革命来找自己解放的出路。这就是中国革命最易为爆发的主要原因。

假如中国革命首先爆发，自然要遇到极残酷的斗争，极严重的牺牲，然而这是历史赋予的伟大的使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有最大的决心准备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谁想逃避这样的使命为这样空前的残酷斗争所吓怕，他就必然成为取消主义者，客观上就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支持者。

三

目前革命形势无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条件，在全国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党的任务是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最严重注意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

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开始。根据上面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分析，更可知一省与几省的政权的夺取，是有的他严重的国际意义。他不只是马上要遇到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马上要遇到残酷的国际战争。所以在我们准备这一胜利的条件的时候，必须严重注意这样伟大的残酷的斗争，决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儿戏。

我们要特别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要准备各种革命势力的平衡发展，要准备全国的配合，而且要特别加强与世界革命的斗争联系，这都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世界革命浪潮的正在发展，无疑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可是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注意——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号召，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在准备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时候，要严重注意与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而且我们应当要求国际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注意中国革命问题，准备拥护中国革命伟大的斗争。

论革命高潮

一、革命形势决定党的战略

党的主要战略，是要依当时的客观形势来决定；我们要正确的精密的去估量客观形势就是为着要确定我们的战略，与战略的转变。在有革命形势与没有革命形势时，以及在一般的革命形势

和革命高潮时，无产阶级列宁党的战略是完全不同的。

六次大会正确的指出：“现时没有广泛群众的革命高潮，……武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将来新的高潮时，便应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

所以我们提出革命高潮问题是有严重的战略转变的意义：如果离开党的战略而斤斤于现时是否是革命高潮的争论，或者说“党的战略并没有什么不够”，而对革命形势又估量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名词的争论。这是十足的书生式的清谈，完全不是列宁主义者提出问题的方式。

二、革命高潮的标志

现时形势，无疑的是革命复兴，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可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确还没有表现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主要的标志。

对的，现时土地革命是有空前的发展与深入，生长了很多的苏维埃区域，特别是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工人斗争罢工运动也在继续不断的兴起，兵士群众也在日益革命化。然而这些只能说是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形势，还不能说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革命高潮的主要的标志，一定要注意革命势力中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只有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涌现了工人斗争的高潮，广泛的甚至落后的工人群众都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积极，才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标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根本，才能领导各种革命势力汇合起来，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暴动。现在工人斗争的形势，的确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已经渐次从国民党黄色工会领导之下脱离出来，走向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从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向直接斗争。这样的不同，的确有严重的政治意义，证明工人阶级已经得到很多的政治经验，已经有了更高的政治觉悟，成

为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主要征兆。可是另一方面的确表现出还停留在—厂—业的斗争，还没有汇合成为伟大的斗争，还表现出时起时伏的散乱的形势，特别是还留有不少的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幻想的残余，以及最主要的产业工人——铁路，海员，兵工厂，市政工人，还没有普遍的积极起来，这些现象就可说现在还不是广泛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高潮。自然在现在军阀混战日益扩大，统治阶级统治的力量日益削弱的形势，经济与政治的恐慌更加严重的形势，特别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会是很慢的。而且在这样客观条件日益成熟之中，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这是要我们严重的注意，决不可丝毫忽视的。但是即令明天就爆发革命高潮，今天这样的估量，仍然不免是错误的。

就一般的说决不是每一个工人群众的总罢工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各种必要的条件的配合。在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的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更是我们应当特别严重注意的。因此取消派在估计客观形势的时候，完全把农民暴动的发展除外，现在更进一步的与国民党同声的冒红军为土匪，这除掉帮助统治阶级欺骗群众来消灭革命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三、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 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

我们对于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左倾幼稚的观念固然应当避免；可是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错误。在现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左倾的观念，只要还

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必然会犯到这样策略上的错误），还不会大有害于群众斗争；可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错误，不要说连到策略问题，就是这种观念本身已足灰懒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已经是帮助统治阶级松懈革命阵线缓和革命斗争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应当严重的指斥这种观念的错误！

我不愿意多来批评取消派的“现在丝毫没有革命高潮的象征，只是统治阶级稳定，革命低落时期”的说法，因为这不过是帮统治阶级宣传的无耻的勾当。经济的事实已经回答他：严重的工业恐慌与军阀战争所造出来饥荒与破产都是表示出革命的形势。政治的事实也已经回答了他：反动统治的恐慌，战争的扩大与延长特别是工人斗争的尖锐化，农村暴动的普遍发展，红军的扩大与兵士的革命化。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革命形势的存在与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吗？如果否认这件事实，那么，他若不是瞎子便无疑的是在无耻的替国民党蒋介石作宣传。我要劝动摇于取消派的人们（声明一句决不是劝陈独秀彭述之刘仁谦梁干慈……等纯粹的取消派，因为他们已经是自觉的阶级叛徒，列宁主义的叛徒），去拿列宁著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第七章什么是国际主义中论到当时欧洲革命形势的一段细读二遍，便了然于这样的真理，便可知道陈独秀彭述之们现在干的什么勾当！

现在要特别批评的就是党内现存的一种对工人斗争的悲观观念，他并不否认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觉得现在工人斗争没有如农村斗争一样的高涨的形势，也还是对的。可是他因此便怀疑到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他觉得工人斗争很难有很快的高涨，这就是极危险的右倾错误。在他这一分析上，缺乏一点非常重要的认识。他只机械的看到了现在群众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党的组织是更加不够，便结论到革命高潮不会很快的到来。他却不知道在经济政治的恐慌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失业破产饥饿死亡没有

出路,这些革命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时候,再加以统治阶级改良欺骗日益破产和群众斗争已在发展的条件,那么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而且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之下,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的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日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这是在革命的历史上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证。如果在党决定策略的时候不抓住这样的客观形势,无疑的要犯到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无疑的将会成为革命发展的尾巴,甚至阻碍革命,那就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了。

自然这样的认识决不会使我们松懈对于加强城市工作的特别注意。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尤其要特别加强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极力扩大群众的组织与党的组织,加强群众的斗争力量与党的政治影响;然后才能树立坚固的基础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领导革命的彻底胜利。否则革命高潮的爆发,将使我们措手不及,而又受到严重的失败(不管这一失败是如何暂时的,都是严重的罪过)。所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的工作,加强赤色工会的组织,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是目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

目前全国范围内还不是革命的高潮,但显然的是逐渐接近于这种革命高潮的形势。因为如此,所以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在目前便应该使广大群众的严重注意,因为他造成了最近斗争的目标,他已经有了实际的策略意义。

就全国范围内看来,革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士兵,红军,确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的向前发展。在目前这一统治阶级大破裂的客观形势之下,使着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

必须显明的认清最近革命发展的前途。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已经无疑义的正在成熟，我们只是不能预料其爆发的时日，只是要尽量准备着这一爆发，只是要用最大的主观的努力，以配合与促进这一客观形势的发展。

在这样形势之下，怎样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我们党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上说：

“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

这个原则在目前接近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之下，他有严重的策略上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当全国范围内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但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集中的组织，还没有垄断全国经济之唯一的中心。上海是长江流域的统治中心，但还不能说是全国的唯一中心。南方的经济中心是香港，北方的经济中心是天津，满州的中心是大连与哈尔滨，他们固然都是受上海的影响，但上海并不能绝对的支配。这种形势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使全国政治上有许多封建军阀的势力，将中国分裂成一种显然割据的局面。这不仅对统治阶级有严重的影响，他同样也影响于革命发展的前途。柏林的暴动，可以——并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胜利便是在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确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上海是中国第一个产业中心，这里若发生了暴动，自然对全国以至于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并不能马上使全国反动势力都完全死灭，一九二七年的三次暴动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其他的城市，自然比上海的领导作用还要小。在这一种形势之下，革命势力在某一省或某几省得着胜利之后，反动统治还不免可以在其他省区内保持一个相当时期的最后挣扎。我们的任务是要力争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建

立全国的革命政权。来完成我们全国革命的胜利。

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还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但他必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这种政权虽然建立于一省和几省,但他的基础一定不只是依靠于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势力,而必然要依靠于全国范围之广大的革命高潮。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省或几省的政权,不但不是一个和平割据的前途,并且比现在各省苏维埃区域还要更激烈的斗争,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经过一省或几省的政权,过渡到全国范围内之苏维埃政权的胜利。

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

六次大会指示我们: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

最近政治事变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显示出全国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可是另一方面虽然全国的统治阶级无疑的都在日趋于崩溃,然而各省军阀撑持他的统治的力量上已有明显的强弱不同;因此全国的革命斗争虽是同样的日益尖锐,而发展的速度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也就表现在某几省区更加成熟的形势。这完全证明六次大会指示的正确。因此在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的战略。

第一,首先要了解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因此要取得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首先要注意全国的配合,没有全国的配合,决没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现在军阀混战的扩大与加深,无疑的是更便于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条件;可是只要革命已经或者将要在一省几省胜利的时候,

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帝国主义，马上要抛弃他们相互的矛盾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以前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来准备自己的力量形势，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是绝对不会有事。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以后必然是紧接着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战争。如果不是有全国革命的高潮，如果不能调动全国无数千万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拚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加上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的有力的援助，一致的斗争），决不能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一省与几省政权，必须是紧接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决不能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所以在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时候，如果只注意在某几省区的狭隘的范围而忽视了全国工作同时加紧的配合，便是绝对的错误观念。

第二，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所以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的策略。还要特别认识，在统治阶级日趋崩溃，乡村的统治日益失败的时候，必然要紧抓着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作决死的挣扎，因此城市的争斗必然要比乡村还要残酷十倍。所以在城市尤其重要产业工人中，树立起摧毁不坏的基础，唤起着广大群众拚死斗争的决心，是目前最严重的工作，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在中国客观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的暴动，兵士的哗变，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

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绝对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这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轻视农民，不要红军的思想，无疑的是企图削除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消灭革命的战斗力的反动思想。同样，认现在城市的工人的斗争尚未高涨起来，要现在农村中采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红军的发展的等待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伟大，比以前俄国革命的情形，还要严重得多；在土地革命中产生出伟大的红军力量，更是中国特有的条件，这是托洛斯基主义取消派所绝对不能了解的，所以托洛斯基主义的危害革命，在中国尤为严重。现在的形势，工人斗争固然还没有进到革命的高潮，农民暴动与红军发展也还是表现着不够。我们应严重注意加强工人的斗争力量，决不应过虑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超过城市超过工人。因为即令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超过城市，超过工人，决不会有害于城市工作有害于工人斗争，而且还可以帮助工人斗争更便利发展的条件。所以我们的策略，不是停止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而是要特别着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所以我们对于农民与红军，同样要采取积极发展，扩大与进攻的策略。

四月二日

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

现在革命的发展，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着新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一形势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把广泛的落后的群众——无论在城市与乡村都是一样，都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因此加紧准备武装暴动，准备并促进这一新的高潮的到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成为党的目前的中心任务。

按照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的条件，这一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将要在—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决不能与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分离，

尤其是要争取这一胜利，必须是工人，农民，兵士，红军斗争力量的总的汇合，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极广泛的罢工运动，没有中心城市的政治的总罢工，决不能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

因此无疑的，红军是主要革命力量之一，可是想单凭着红军的力量，来夺取一省与几省的政权，建立全国革命的政权，便是一种异常错误的观念；因为不只是不可能的幻想，尤其是这样的观念，便会在策略上忽视着我们最主要的工作：组织工人的斗争，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斗争，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一偏向的来源由于不信任现在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斗争的悲观观念。他觉得“现在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乡村的发展，特别是红军的扩大远超城市，远超过工人的斗争。”因此便形成单凭红军的力量可以夺取政权的观念。而在策略的结论上便必然走上忽视应特别注意加强组织工人斗争的偏向。

自然从这样对工人斗争悲观的观念出发，而走到这一策略的偏向，还是比较积极的较好的一方面，更坏的一方面必然会走到取消红军，取消农民暴动，取消革命的取消主义派倾向上去。

就现在的斗争形势看，乡村已有极广泛的农民暴动，苏维埃区域普遍的发展，而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是一厂一业的罢工而没有形成伟大的政治斗争，的确是表现不平衡。不过这仅仅是表面的，今天的形势。至于阶级斗争的实质与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无论城市与乡村的确是同样的异常的尖锐。无论在南方与北方，在任何一个城市中的工人斗争，每一个很小的经济斗争都很

快的转变为严重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转变为残酷的武装斗争；而且激烈的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斗争，已经普遍的在工人中发展，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都爆发了政治罢工与示威运动，这就充分表现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其所以还没有汇合成为伟大的总的政治斗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白色恐怖的镇压，统治阶级镇压革命的力量还超过工人斗争的力量。无疑的现在统治阶级是日趋崩溃的末日，可是正因为他在日益恐慌，特别是在乡村已表现失败的时候，他必然要尽他的力量在城市中作顽强的挣扎。这样就造成城市工人斗争，更残酷的更严重的条件，这样就造成今日城市工人斗争还没有总的爆发的形势。如果统治阶级在城市，也如在乡村一样毫无统治的力量了，那么，便已经到了他上断头台的最后的末日。

因此，城市的斗争，既然更加严重，更加残酷，所以更需要伟大的强固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才能冲破白色恐怖的镇压，战胜统治阶级，促进他的死亡，就现在主观力量的估计，的确，无论在党与群众的方面都还是异常不够。因此特别注意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加强党与群众的力量，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以汇合现在还在散乱的斗争形势，成为伟大的革命高潮，这是党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任务的最中心的策略。

可是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认识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无可解决的经济政治危机迅速的加深，无疑的要使到统治阶级统治的力量继续削弱，更促进工人斗争力量的飞速发展，而造成革命高潮的更成熟的条件。这就是说现在统治阶级这样的镇压，仅仅是企图维持自己寿命的挣扎，不只是不能由这一挣扎重复走到“稳定”的途程，而且一挣扎只是加速他的崩溃。因为统治阶级无办法缓和根本的政治经济的危机，自然最后挣扎的白色恐怖，只是更促进广大群众的愤慨与斗争的决心，使最最后的群众都会渐次认识除掉推翻现在的统治，毫无生路。所以我们目前特别注意

加强工人斗争的力量，是有很便利的客观条件。虽然这一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可是，确有很快发展的可能。并且在这样客观条件更加成熟的时候，将会在一瞬间，爆发出伟大的斗争，这就是说从现在到工人革命的高潮；决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如果只看见现在工人的总的斗争尚未形成便主张停止红军的发展以等候工人斗争，是异常错误的观念。

所以特别注意发展工人斗争的力量，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以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力量，这是现在党准备新的革命高潮，首先夺取一省与数省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中心策略。单想凭藉红军的力量以夺取政权自然是错误的观念；如果企图停止红军的发展以等候工人斗争的高潮，甚至主张取消红军，那就走到了与取消派的观念毫无根本的区别了。

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转变

现时全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的前面。紧随着这一问题要同时，而且必然同时提出的就是革命转变——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目前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所以无疑义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取消派认为现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终了的滥言，只是使我们放松民主革命的任务，放松动员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主思想。可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同时也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

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

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革命，经济怠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与武装进攻等。这一残酷的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这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一定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干到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削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并且为着对付严重的经济封锁必然要实行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同时在政治上，为着对付这样顽强的反革命的进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独裁的政权，这就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和银行，由革命政府来组织生产管理生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了。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

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时革命政府如果不坚决执行阶级的政策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和银行以削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武器，不只是一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会障碍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所以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另一方面如果以为“革命胜利的前夜，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开始胜利后，革命政权一开始建立便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政权”，也是错误的。这就忽视了革命转变的过程（不管这一过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必然是必然经过的），忽视了这时反帝国主义反豪绅资产阶级的残酷战争，还需要民主革命的口号和政策以动员千万，万万群众来克服这一反革命的进攻。所以这一错误的观念，也是很危险的。

革命胜利的开始，必然就是更残酷的阶级战争，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除掉极力进行反革命武装的进攻外，必然还要用尽一切方法来引诱尚留在革命战线的小资产阶级（乡村残留的富农与

中农，城市中的小商人……等）来反对革命。所以在革命转变的过程中不可免还要发生新的动摇与叛变。所以我们决不应幻想革命的和平转变，而要从现在起运用我们正确的策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雇农的独立组织并巩固与贫农的联合，肃清富农的影响，稳定中农的动摇，以减少将来革命转变的困难。这样正确的坚决的策略，的确有决定将来革命转变，比较顺利的严重意义，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的。

决定这一革命以及革命转变胜利的另一重要的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依据中国半殖民地的条件，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将是不可分离。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空前猛烈的斗争，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就目前世界革命浪潮正在高涨的条件来说）同时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所以特别加强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特别是加强斗争的联系，实在是目前严重的任务，是准备革命胜利与革命转变的主要条件之一。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合期）

四、共产国际与中共 六届三中全会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 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草案

(1930年8月)

正确的解决土地农民问题是苏维埃区域政策最重要的问题。苏维埃运动还没有发展到直接的全国的革命爆发，这一事实，阻碍着苏维埃区域土地改造的进程。贫农，中农主张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已经充分显明的毫无疑问的表现出来了。但是同时在苏区内，却发生了为分配土地的方法的斗争。富农与豪绅，高利贷者有密切的关系，总是妨碍土地的没收。在土地没收以后，富农便竭力要将地主，豪绅，高利贷者的土地转交于原佃的佃农手里，就算了事，或者主张按生产工具来分配，以适应他自己的利益。在许多苏区内农民群众自己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平分是唯一的方法，足以保证并彻底肃清一切封建的与高利贷的特权和残余。另一方面，在许多苏区内，我们可以看到对解决土地革命任务的动摇态度。甚至对没收地主的土地，也是动摇的，有些苏区内竟散布着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的口号，以及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高利贷者的债务，必须偿还的口号。小地主豪绅企图侵入国家机关居然并不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事，并不是不顺利的。至于富农，在有些区域之内，已经坐在苏维埃里面钻到国家机关和红军中去。但同时还有些个别的情形，企图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消灭富农阶级——这绝对的是不对的。在党里面，对于土地问题也有许多动摇的，不正确，错误的决议。企图把大的经济变成苏维埃农场，从上而下的决定联合一切已分得田地的雇农，成为集体农场，散布

只平分已没收的地主土地的原则，不运用平分一切土地的原则（农民的土地，农民的私有土地亦包括在内）。有些地方则禁止土地的买，卖，租，押，这些办法，显然在目前革命阶段上是过早的办法。有些地方，对于红军士兵分配土地的问题也有不正确的决定，他们认为只有在全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才能分配土地给红军兵士。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最危险的倾向，便是对于没收土地问题发生动摇的右倾和在分配土地中之右倾的富农倾向。坚决的反对右倾为目前主要的危险。同时，党亦应该克服跳过阶段的左倾倾向，就是在目前革命发展的阶段上，就企图自上而下的组织苏维埃农场与集体农场。

这些倾向的存在，表明出：目前运动内部的弱点，这种运动在阶级关系上尚没有充分的分化，中国共产党对于运动还没有充分的领导，苦力，雇农，贫农的组织还是软弱。只有坚决的为着平分土地，首先是保证雇农，贫农革命战士的利益，而实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主要的农民群众反对破坏农民土地革命的富农。

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消极行为，必然是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地位，向富农投降。农民的个别企图——要创立原始形式的共同耕种土地的协会——表明着群众运动向前的一切扩大和深入，将要在土地斗争之中引起中国农村各种不同的人民集团的分配和明显的阶级分化。

抛弃了一切托洛斯基主义关于中国立刻社会主义革命的妄谈，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实际上证明给群众看：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军阀，和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密切勾结的中国资产阶级（农村资产阶级亦在内），实行直接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之中，真能成为农民革命的组织者。

据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之内的基本任务，便是：

一、组织雇农与苦力，党应将他们组织在总工会之内，无论

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在民权主义的土地改造之中，党就应该认定自己的任务，是不动摇的力求农村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组织，向他们解释：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对抗的；向他们警告：小经济制度的增大，在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之下，永远是不能消灭群众的贫穷的；最后还要指明：必须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才是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剥削之唯一方法。

二、顺利的进行平分土地，必须有独立的组织，一方面是雇农，苦力组织在职工会内，另一方面是贫农的组织。

组织农村的无产阶级在职工会内，党应该谨慎的坚强的向他们解释：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相对抗的，在农村之中不进行巨大的集体经济，不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不能根本改善，即一般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也是不能根本改善的。只有显明的了解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农村无产阶级才能在农民运动中实现自己的阶级的领导。此外，必须有贫农的特殊组织——贫农利于最彻底的实行土地改造，并且接近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

因此，我们便必须：

(一) 组织雇农与苦力在职工会之内，党在他们中间应进行特殊的工作。

(二) 组织贫农团，一般的规律，是要组织在乡村苏维埃之下，在贫农团之内要组织雇农与苦力的小组。

(三) 在苏维埃区域之内的农民协会，在他尚未溶化于苏维埃之前，应在农协内组织贫农小组。

(四) 在现有的农民委员会内，应保证雇农、贫农的领导，同中农在一起。

(五) 在农民协会之内亦应争取此种同样的领导。

农村中的贫农团应在一乡的范围之内，组织在苏维埃之下，他

应该包括最积极的，最先进的，在斗争中最彻底实行的贫农分子和最有影响的游击战士。

三、(甲)推翻地主豪绅的政权之后，第一步的群众工作，便应该是在彻底的不调和的惩罚农民革命的敌人的基础之上，去团结雇农，苦力，贫农。一切反革命派不能危害革命的办法之中，只有最不可迟缓的，要自上而下的去执行（在地方游击队红军占领之时）。一般的说来，对于敌人的惩罚，要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领导之下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来执行。在这里，必须坚决的反对将土豪，绅士，高利贷者分为“善良的”，“恶劣的”企图。

(乙)同时，我们不仅要没收地主，豪绅，高利贷者的土地，而且要没收他的房屋，财产，仓库，耕种器具（凡是他所有的）。没收来的房子，须作为公共之用（〔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工农兵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学校，俱乐部等），或给苦力，雇农，贫农居住。没收来的财产，须立刻分配于红军，游击队的家属，贫农，苦力，和雇农。至于牛马，耕种器具（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只要全体贫〔雇〕农或贫农团愿意，便可组织“犁牛站”，用来耕种没有耕具的贫农所分得的土地。余剩的生产器具，则可分配于贫农，雇农，苦力。

(丙)苏维埃政府应立刻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废除一切田契与奴隶的〔的〕契约（口头的与文字的）。

苏维埃政府应废除一切捐税，和军阀与旧地方政府的一切征发。赦免一切被捕的，监禁的人，凡是农民群众不愿再拘禁的人，均应释放。

关于释放土匪和半土匪的问题，必须由农村农民群众来决定。

四、在实行平分土地的时候，须根据下列原则来领导：实行平分土地，要包括每一个乡村所有的一切土地，包括各种占有形式的土地——农民的私有土地亦在其列。

在决定各个分地的时候，必须计算土地的肥瘠，土地的位置，

特别是水田旱〔旱〕田的分别。我们必须明白，决不是土地面积的大小可以决定土地平分的标准，而是收获量。

一切苦力，雇农，一切农民均绝对有权利取得分地。只要他们声明愿意获得土地。对于富农亦必须分土地给他，只要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积极的反革命反对苏维埃政府。

特别在城市的附近，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即贫农，苦力，雇农到城市里去作工，而将自己的家族留在乡村，在此种同样的情形之下，工人的家族亦绝对有权利分配土地。

加入红军的农民，苦力，雇农，游击队的队员，均有优先权分配土地，整年在外服务于红军的兵士，更绝对的有权利分配土地。

在决定分配的时候，对于各个农民家庭，可以采取劳动率为原则或按人口来分配，对于这个问题，乡村苏维埃自己可以按照当地的情形与农民群众的意志来决定。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富农方面常常是大家庭居多，也有几代一家。所以采用劳动率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大部分是比较适当的。

五、平分土地是最坚决的最彻底的肃清土地上的封建残余的方法，肃清一切地主的私有制的遗迹，肃清一切富农与农民群众间所造成的压榨机关〔系〕。平分土地，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方法，而是最激进的民权的解决土地革命的任务，坚决的改善贫农的生活。佃农与中农，在平分土地时，即使比以前使用土地的数量减少，也是很有利的；因为革命把他们从压榨式的佃租之下解放出来了。私有者的中农，在平分土地时，也是有利的，因为革命把他们从压榨式的苛捐杂税中解放出来了。

同时，平分土地将领导主要的农民群众走向一切土地收归国有。

六、中国共产党主张将一切土地与水利收归国有，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之下，在工农民权的革命独裁的条件之下，一切土地

和水利收归国有,这不但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手段,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步,是农村经济进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宣传一切土地与水利收归国有,组织贫农,团结主要的农民群众在土地水利国有底要求周围。实现土地和水利国有的权利,要由苏维埃政府的巩固,革命在国内许多决定胜负的区域里面得到胜利,以及主要农民群众对于这个要求的拥护来决定。

七、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以团结,组织并教育群众,其目的在使乡村苏维埃内的雇农,苦力,贫农能占大多数并起领导作用。同时,并必须吸收中农参加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

农村赤卫队的建立与组织,应该按照阶级的原则来实现,武器主要的应该拿在雇农,苦力,贫农及最可靠的中农手里。

红军的招募,组织,建立,红军和赤卫队的指挥者的招募,提拔和训练,均应按照阶级的原则来实行,红军的成分主要的应该从贫农,雇农,苦力,及忠实可靠的中农组织而成。

苏维埃政府的租税政策,和供给红军的征发等,亦均应按照阶级的原则来实现。即尽可能的解除贫农的租税,把主要的重心移在富农身上,关于这些问题,对于中农应该极谨慎的注意。

八、土地的零碎分割,或相互隔断,这是半封建制度的残余,对于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障碍。土地平分应尽可能的采用革命的“土地经界”的手段。在这里,必须尽可能的注意中农的利益,注意宗教的习惯与农民一切的成见,不要干涉到祖庙与祖坟等。对于这些问题,只要一点不小心,便帮助了地主的反革命的忙。

灌溉的来源,森林,牧场等,凡是现存的,均应移归苏维埃。每区之内一切寺庙的,“公家的”以及其他各种公地,荒地,沙田等,均应移交于苏维埃,给当地农民去平均分配。

九、至于民〔氏〕族的土地,这在中国南部,和许多苏维埃区域,是有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些土地的处理,应注意以下的情

形：

(一) 氏族已经分化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氏族的关系，及与氏族有关的宗教的关系都掩盖了“氏族大人物”对氏族一般人员的剥削。

(二) 在氏族的土地上，对直接生产者——农民的剥削并不轻于普通的私有土地，氏族土地的收入均归“氏族大人物”所占有。

(三) 同时，氏族的关系，及与氏族有关的宗教上层建筑，均有相当的势力。反革命派挑拨出来族姓间纠纷，同族同姓的人分到族地出产的极小部分，祖宗的公同祠堂，传统的力量等等——有些地方都还是帮助着氏族内部的统治者的势力的。

(四) 我们的任务，在使氏族内部起阶级的分化，将农民与氏族内一般劳动者从该氏族内的地主，豪绅，高利贷者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很好的处置和相当的谨慎条件之下，这种任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五) 彻底的勇敢的提出问题，将氏族的土地移交农民并由农民平均分配，这是唯一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这里必须尽量注意对祖宗祠堂的关系，不要激动了民〔氏〕族人员的宗教感情（拜祖教）。

(六) 至于祠堂土地的问题，只有次要意义的，应当决定将这些土地移交于农民。族中有人要保持祠堂供养的时候，叫他们自己的担心这些事^①——是适宜的办法。

十、农村一切神庙的土地应移交作公共的地产。

十一、在土地分配时，对于红军，游击队，特别是在与反革命的地主斗争中有力的分子，参加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积极干部，被反动势力通缉逮捕的人，均应该绝对必须的分配他们以土地。红

^① 《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1944年版，这里是“叫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些事”。

军的家属赤卫队积极干部均应该获得交税时的优待，或者完全免除他们的租税。在分配地主，豪绅的财产时，也应该首先分配给这些人。

十二、一般的规律，设立苏维埃农场，是不容许的。因为生产工具的缺乏和不够，有很多地方已经自发的创立了“犁牛站”和共同耕种土地的共耕协会，共产党应该帮助这种运动。但是这种共耕的创立，只能是绝对自愿的。对于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上，就提出集体农场的问题，要认为是过早的不适宜的企图。

十三、为进行反对高利贷复活的斗争起见，苏维埃政府应该提倡和组织信用合作社。同时，在合作社内必须保证贫农的领导作用。同样，必须去竭力组织购买贩卖合作社。

十四、苏维埃政府应以发起人自任，创立公共农村储藏，以预防自发的灾荒，或在一切机会中宣传这种思想。

在苏维埃政府手中的粮食储藏，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方面的经济封锁，反对商业投机和怠工之强有力的斗争工具，这足以保证苏维埃政府在农村经济方面的领导作用。

只要有可能的地方，苏维埃政府应该以发起人和实行者自任，实行下列的设施，这些设施根据农民的眼光看来，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一) 开垦荒地。

(二) 改良现存的灌溉制度，创立新的灌溉制度，实行凿井。

(三) 在边地栽种树林，应该尽量利用适宜于当地的树木，能够给我们更快的成效的（如杨柳竹等）。

(四) 建筑道路，造桥修桥。

(五) 创办学校和农村读书馆。

实际的实现这些办法，只有在群众都准备帮助之时才行。

十五、正确的根据阶级的观点以解决租税问题有极大的意义。必须根据显明的容易了解的通俗的原则制定统一的农业税。捐税

的标准是进款。捐税应该是累进的。必须免除最小农的税，只要在有可能的地方，便必须免除小农主要农业税。对于中农基本群众的租税，无论如何不可超过以前而一定应该较反革命政权时候降低。在征收租税时，一方面必须吸收贫农团体的代表，别方面雇农，苦力组织的代表参加。在征收租税时，亦必须有中农的代表。苏维埃供给红军的粮食时，亦应在此种方针之上来进行。军用品的征发，只能在最必需的条件之下。

土地关系的复杂，国内战争时情形的制度〔剧变〕，力量相互关系的转变，使着我们对于解决这一切的具体问题完全没有可能给一个确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所有一切的转变之中，保存并运用无产阶级与基本农民群众联合的原则，运用此种策略，并实行自己的主要路线的时候，共产党应该开辟革命群众自己的创造力的道路。（完）

——最近印发的（一）经济政策议决案；（二）土地农民问题决案，都是五天以前才到的。

中央秘书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 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

(1930年8月)

一、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应该建筑在严格的估计目前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的条件之上。一切经济的设施，应该无条件的隶属于争取全国工农革命的民权独裁的基本任务之下。他应该成为实行无产阶级，雇农，贫农与中农，在反帝国主义，反对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同样也反对富农的企图缩小和阻碍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实行革命联盟的榜样。目前革命的基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是农民土地革命的内容，这是我们不可一刻忘记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内，无产阶级如果要离开主要的农民群众，没有农民直接的赞助，不去团结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来进行夺取土地与民族解放的斗争，而要走到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一定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区域的一切经济的设施，应该根据工人阶级与农民联合的利益观点，根据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的观点来检阅。托洛斯基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调，实际上只是掩盖他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实质(国民会议的口号)，完全是反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的，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陈独秀主义公开的要使工人阶级变成改组派等类派别的尾巴，这完全是对于托洛斯基主义的很自然的补充。实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这些反革命派别并反对对于他们的主张和口号取调和态度，——这是正确的经济政策必要的前提。

二、苏维埃区域一切经济政策底目的应该是：(一)保证顺利

的没收地主的土地，与平分土地。(二)肃清一切封建的与封建行会的残余，并实行反对高利贷剥削的斗争。(三)在军事斗争的利益上，巩固后方的组织。因此，一般的规律是：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商业自由的任何限制，完全不能允许；没有物质条件和组织群众的相当准备，要想用命令的方式来实行社会主义，现在就将工业与手工业收归国有，这样的企图是不适宜的，而且是有害的。每一种设施都应该与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与城市乡村的贫民，中农，小资产阶级的下层群众的利益，有密切的联系。最主要的事实是：在中国甚至于最落后的地方，农民平均总要出卖他自己的生产品的百分之四十，在市场上购买百分之四十的需要品。再则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事实，就是：在苏维埃区域的城市之中，亦是小的商品生产和中等的商品生产居大多数。

三、在苏维埃区域，与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反革命的武装干涉同时并进的，有经济封锁的危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还要与那些仇视分子的怠工和奸刁的商业投机实行斗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这些企业的领有者如果拒绝继续生产，苏维埃政府应该镇压他们，没收这些已经停工的企业，或者由工人的和手工业者的合作社管理，或者由国家机关自己管理。但同时苏维埃政府却应该尽可能的避免自己管理这种企业，有时亦可以将小企业与中等企业出租，甚至将没收来的小企业出卖。应该无条件的抛弃将整个产业收归国有的企图，没有特殊的原因，不可以造成国家独占的情形。企业之中的工人委员会应该在与资本家的怠工作斗争所必需的范围之内实行监督生产。苏维埃政府应该注意特别生产部门（制造场，小手工业，工厂手工业）的发展，以供给红军，在这里应该表现出最高度的建议力与坚定性。凡是为着防守利益而有必要的地方，可以实行广大的监督生产，没收企业，组织苏维埃的手工业工厂与制造场。

四、苏维埃政府应该保证商业的自由，不妨碍商品市场的关

系，这是一般的规律。只有在商业投机怠工，经济封锁足以危害供给人民群众以重要生产品的时候和地方，只有为着红军需要供给有必要的时候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可以对那些首先最必需的主要物品，规定最高价格。此种同样的设施，只应当在极度需要的时期之内发生效力，一有可能，便应该恢复商业自由。

五、苏维埃政府对于工人，店员，学徒应该立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限度的社会立法（休养假期，休养日和纪念节，医药费，病假工资，残废受伤人的津贴，失业保险等等）。至于工资，则应该用经济斗争的方法在职工会的帮助下，力求增高，用命令来增加工资，只应当在极必需的时候实行。苏维埃政府应当组织商业的店员在阶级的联合之内，而解散商会等的团体（同业公会，资本家行会），禁止大商人用同业工〔公〕会的意志来调节物品价格的一切企图，商会同业公会的房子应该尽可能的移交于相当的工会。行会的手工艺徒和学徒之中进行群众的工作，组织他们在阶级的职工会之内，这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任务。当手工业的艺徒和学徒相信职工会以后，便必须解散手工业的行会。这里，我们便必须注意这些行会的与宗教的成见，对于行会的宗教风俗习惯不必严加干涉。

六、如果有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便应该解散。

当铺里的东西应该立刻拿出来还给城市贫民。

取消城市中一切口头上的文字的契约和高利贷的债务凭据。在必需的条件之下，可以经过民众法庭，吸收城市贫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代表参加，来重新审查这一切的契约凭据。

坚决的取消家庭奴婢与长期奴婢的制度，对于一切企图恢复这种关系的人，都应该施以革命的严厉的惩罚。

七、必须根据累进税的原则，制定简单的显明的税收制度——征收对于资本及所入的税费。免除工人与城市贫民的捐税。在捐税制度下应注意小商人与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应该将捐税的重担

移在最有财产的阶级身上。

宣布旧金钱无效，这是不适当的。开始可以采用盖印苏维埃政府印章的办法，或者在旧的金钱上作各种可以分别的标记，假使技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制造苏维埃的金钱（如纸币），收取旧的货币，换用苏维埃的货币。对于发行纸币的问题，则应该非常谨慎，应该尽可能的避免苏维埃货币之跌价。只要在环境许可的地方，我们便必须给红军以金钱，设法使红军尽可能的用金钱购买食物。

有些苏维埃区域，很显明的需要组织有权利发行纸币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可以而且应该帮助合作运动和一般提高农村经济的设施。对于当地的钱庄必须任命特别委员监督他的行动。坚决的禁止银行家及其管理者利用当地钱庄进行反革命行动的一切企图。

八、苏维埃政府应该特别注意苏区内最必须商品的供给（如盐，糖，纱，布，药等等），盐业专卖的地方必须降低盐价。

至于苏维埃区与非苏维埃区的贸易，现在组织“对外贸易的独占”是不适宜的。最适宜的是苏维埃政府对于苏区与非苏区的贸易采取登记制度或他种监督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设法保证这种对外贸易能按照各地的情形供给苏维埃区以最必须的商品。银子的出口，须得到苏维埃政府的允许才可以。

九、苏维埃政府对于工人，苦力，店员，城市贫民应该调节房租，使之减低。地主，豪绅大官僚的房子与财产应该立刻没收。财产实行分配。他们的房子，可分给工人，苦力，店员去住。房子的没收不要涉及小商人与中等商人。大商人的宿舍，亦可以叫他们减少所用的房间。

十、苏维埃政府争取中国完全的整个的独立，应当有将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收归国有的方针（如租界，租借区，海关，银行，铁道，航船，矿山，工业的企业等等）。在目前，只有

当外国工厂能履行下面的条件的时候，才能允许他们继续生产。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并实行社会劳动法，承认工厂委员会。外国的企业家对于这些条件如果破坏一个，无论是怠工生产，关闭企业，干涉苏维埃政府的内政，或帮助反革命等——苏维埃政府均应立刻没收它收归国有。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 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

(1930年9月8日)

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确需要。坚强红军,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是第一等工作。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的发动群众以代替空喊的冒险。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在这一转变中,右倾机会分子已利用之作反中央的活动,将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对立起来。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准许盼复。

中政局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

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

(1930年9月24日)

(经过原报告人大致的校阅过)

恩 来

我在三中全会报告的记录，本有两种：一种是问友同志记的，比较详细；一种是善南同志记的，便是这个。后来问友同志病了，我想等问友病好整理那个较详细的一种，但现在已不再许可和不再需要了，因为四中全会便要开幕。我现在便将善南同志记的这一种发表。这一记录远在国际来信以前在上年十月内便抄送国际去了，我现在仍依原校正之稿不加更易的发表。虽然所记的太简略了，但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我自己亦将在党报上批评我这一有系统的严重错误。

恩来注 一九三一、一、三

我的报告是在特生同志报告的精神之下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党指示的路线。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分子对于国际路线之曲解。

(一) 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首先我很感谢红旗报已将斯大林与摩洛哥夫两同志在联共十

六次代表大会上报告完全登载出来，这里可以使我省事，不用更详说国际问题。

一、国际资本主义危机的生长

依斯大林同志指出的国际危机有四个特点，在目前形势中可以指出：（一）是这次世界政治经济危机包括了美国在内，而且美国是这次危机的主要部分。（二）这次危机不仅限于工业国，而且是农业国一样也发生恐慌。（三）资本主义在垄断的形式之下造成了广大失业现象——工人的后备军在主要的资本国家内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仅美国即有六百万。（四）在大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根基上，造成目前的经济危机。

二、一切国际间矛盾的加深

一切国际间的矛盾于是更加深起来。这矛盾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互相间的矛盾，世界大战危险日益加深，海军军缩会议后法意冲突加激，日本对于军缩会的不满意也是极其明显。第二，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加增了战败国赔款，也就是加紧了对于工农之剥削。第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现在帝国主义益加对于殖民地的剥削，同样的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日益激烈，如印度，南美，中国，安南。第四，帝国主义国内的矛盾，统治阶级是更法西斯蒂化，用社会民主党压迫无产阶级是更严酷而露骨，另一方面广大的罢工，工人斗争之发展，如在法国，波兰，德国等。从去年五一节德国之武装冲突一直继续到今日，德国共产党是不断在斗争着。今年在英美失业运动日，均有大批的失业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大示威。

三、苏联的巩固和空前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衰落

说到最后一点矛盾，也就是最主要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矛盾。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衰落，而社会主义经济是突飞猛进。苏联的五年计划伟大成功，工业的某些部门在三年或三年半可以完成，农业方面二年半或三年完成；这样，全部计划可以在四年以内完成。苏联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联邦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努力于社会主义竞赛和冲击队的组织，猛进的执行社会建设计划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模范。资本主义的没落，社会主义的兴盛，更加紧了帝国主义之恐慌，因此帝国主义更要在它的危机中加紧对苏联的进攻，从去年中东路事件起，欧洲许多和苏联交界的国家有同样性质的事件发生，如波兰图炸俄大使馆，罗马尼亚的武装示威等等以及英美对苏联之经济封锁，想从物质上对苏联予以打击，当然全世界无产阶级是反对这一进攻的，苏联无产阶级以空前的社会主义竞赛来回答这一封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给了他们以示威的反抗，喊出武装保护苏联，这样就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有所畏惧。

在资本主义深刻的危机中，更加反映出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伟大，这个成功是得着世界无产阶级热烈拥护的。这就使世界无产阶级更加认识“资本主义的崩溃不仅是可能，而且成为必然。”（摩洛托夫）。

四、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

有些国家已由经济危机转变为政治恐慌了，有些国家只是开始了经济危机，虽然这些发展是不平衡的，但都是要影响到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的中国的危机，也更使帝国主义不能稳定，同时也更加紧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在世界革命不平衡的发展中造成某些国革命有首先胜利的可能，这是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也就

回答了国际右派——布哈林等——的错误。说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美国除外”，“印度非殖民地化”等等奇谈。也回答了苏联猛烈发展之下要倒台的咒骂，更可以回答中国右派对世界战后第三时期特点的怀疑，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掀起世界革命。这些右派的语调都被事实打得粉碎。

（二）中国革命的新高涨与共产国际的路线

一、在全国经济政治危机上日益扩大的军阀战争

在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基础上，更扩大了军阀战争，这是中国事变的特征，中国农业的破产，工业的加速衰败，商业的停滞，铁路破坏和中断，米面的腾贵，不必重复去细说。同时三年来国民党内政策的破产，和平统一招牌撕得粉碎。在一年多的军阀战争中，每次上一个战争的结束，接着便是准备着下一个战争，张学良的进兵，很明显的新的战争又在准备中了。在军阀战争之扩大与继续不断的基础上，一面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更加强大，另一方面是工农劳动群众生活更加恶化与痛苦，战争死亡失业破产，使中国工农不能再生活下去，而救死求生的斗争也必然发生；这就更加引起群众积极的反抗和斗争。二年来群众虽在极严酷的镇压之下，但革命的斗争是日益尖锐与激剧。

二、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发展着群众的政治斗争

（1）土地革命深入，使苏维埃区域扩大到长江下游，深入了南中国，现在统计已有三百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统治着的人口有五千万。在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中建立了红军，十万武装的红军，在两次进攻长沙和一次占领长沙的肉搏中，表现了他的力量，表现了他已局部的开始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的战斗。

（2）军阀军队中士兵革命化，倾向于土地革命。反动军队之下兵士，他们是成连成排，继续不断的，投入到红军来，尤其在

最近半年更为增加发展。第一次进攻长沙时有何健部下的成团士兵投入到红军来，第二次攻长沙有戴斗垣^①三团人投入红军，鄂东北红军第一军作战时敌人有大批士兵的跑过来。这都是明例。

(3)城市贫民之日益革命化，最主要的是工人斗争的高涨。不必再说以前的革命斗争复兴与去年的日益高涨形势，只单说本年北方铁路工人斗争，中东路工人的斗争，青岛工人的罢工，上海的红色五月以来的汽车，电车，纺织工人斗争，以及最近丝厂五万多人之大罢工，武汉纱厂工人罢工，南中国香港工人的斗争与罢工，即一向落后的北京，也有近万人的示威运动，表现出工人政治斗争的决心之加增，常由经济政治的斗争，发展到武装冲突。

这些情形更证明中国革命之日益尖锐化，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前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苏维埃旗帜之下而斗争的。

三、两种战争两种政权的对立

综合以上的现象，确如国际所指示目前中国有两种战争存在着，一个是军阀的战争，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是更加崩溃了军阀制度，是已经局部开始了中国的国内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很明显的两次攻取长沙，这是消灭中国军阀战争的序幕。在这一基础上是有两个政权对立着，一个是工农民主的苏维埃政权，一个是国民党反动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是反革命的，它日益缩小，动摇而走向死亡。工农民主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是革命的，它要由分散而集中起来日益巩固与扩大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在革命与反革命极端化的形势中，不能容许有第三派的企图与存在的，如陈独秀派胡适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之企图，只有失

^① 系国民党军第四十七旅旅长，一九三〇年八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在文家市战斗中被击毙。

败。所谓国民会议就是分赃会议。一切欺骗的改良主义，都要被这革命的急剧发展中打得粉碎。

因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更加施行疯狂的残酷的白色恐怖屠杀工农，加紧进攻革命，尤其是在长沙事变之后。于是使黄色工会，以及取消派，改组派更加法西斯蒂化，以维持他们反动统治的最后呼吸。

四、革命新高涨的特点与共产国际的路线

在中国革命新高涨中有一特点，亦是国际最重视的问题，这就是全国经济政治危机上，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分割状态中，因之中国经济发展还保存很多地方性，政治变动有先后，革命经验有多少，这些条件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今天工人尚未拿起枪来推翻反动统治，而在乡村中的农民战争却已广大起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北方农民的痛苦甚于南方，然而农民群众却尚未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与分配土地。这就是在革命发展的程度与速度上的不平衡。

在这里，国际与中央的估量有些差别。中央虽然看到不平衡，但未重视不平衡，因此就不能回答目前的问题，因此在估量时往往将前途的某一可能而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在革命发展的速度与程度上发生了过分的不正确的估量，因此遂发生策略上的个别的错误，这是国际所要纠正的。

国际决议案说：“中国革命新高涨已成无可怀疑的事实”，这就回答了机会主义派的争论点。但是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尚未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可是国际并没有将这前途看得很远。革命形势即使不在全国范围也要包括几个重要的省份，这就回答了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在一省或数省争取首先胜利的可能，已在今天的全国革命新高涨形势

下逐渐显明起来了。

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共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央在自己正确路线之下曾坚决的与右派斗争。这些右派，他们的估量是和国际不同的，他们否认中国全国有政治经济危机，借口发展不平衡而怀疑革命发展的前途。所以只认为某省有革命形势，而不能有全国工作的配合，这就取消了中国的革命。江苏何孟雄同志，就是在这一路线的基础上向中央进攻。这一个取消主义是和国际无丝毫共同点，决不容许在这样路线上来进攻中央与国际的。

(三) 党的主要任务与中心策略

一、党在组织革命战争与积极准备武装 暴动中要实行着两方面的任务

在组织革命的战争中，依照国际所指的，我们必须实行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我们巩固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将分散的苏维埃区联合起来，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向工业中心城市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巩固的基础向前发展，要深入的向外扩大，中央过去对此工作之注意不足，中央只注意到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可是放弃了巩固与加强，尤其是对苏维埃区域，中央直接的指导是很不够的。这一任务，在今天看起来是更加严重了。在两次进攻长沙中，均可看出红军的指导尚不集中，彼此没有配合，进攻的后方还不巩固，

没有最高限度的发动群众，没有在敌人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尤其中央的直接指导没有，所以在主观上缺乏可以胜利的前提，以致敌人死命的孤守，我们即无办法。于此，更证明国际的指示绝对的正确。国际对于这一任务看得十分严重，认为是第一等的重要。但是不许象机会主义者那样曲解，将两个政权对抗解释成农民的偏安政策，更不许为富农路线所利用来反对向外发展。

第二，要发动城市工人群众的斗争，加紧宣传组织工作，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去积极准备武装暴动；这是另一方面的任务。

坚决发动与领导工人斗争，更积极去领导工人政治斗争，这样才能使工农斗争汇合，才能易于使苏维埃区域向中心城市发展。中央过去是加重了对这方面的努力，缺点是策略的运用上有错误，使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过去中央对于苏区的中心任务注意得不足，另一方面又犯了策略上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国际的指示是要我们在这两方面任务的加紧与配合上，来组织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的中央临时政府。

二、苏维埃区域的中心问题

依国际的指示，有下列几项中心问题：

(1) 建立苏维埃根据地 有了苏维埃根据地的特点是和游击战的流动性不同，这要能更广大的发动群众，在党的指导集中下，使苏维埃区域巩固，不是只限于小村小镇，而联络成为大块的根据地，这即是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也即如列宁在一九〇五革命时指示“奥的沙”的暴动要建立根据地要设立临时革命政府，而发动更广大的群众的意义；这一意义用在现在中国来是更适当的，更正确的。

根据地在中国目前来讲，已不仅是一个地方，而是有许多地方可以建立。现在红色区域还有许多地方未联络起来，还没有将

那些城市打下，这些地方多是半年前即可巩固起来作为作战的后方的。在湘鄂赣，在闽西都可以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这决不是农民偏安意识。这一问题中央过去是有些不了解的地方，因为防右倾机会主义的利用，对于正确的解释反而忽略了。

(2) 苏维埃代表大会与中央政府 前次五月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宣布了法令，是有红军和群众的领袖参加，但是没有建立政权意思，因为没有公开在苏维埃区开大会，实际上只是准备会的性质。那时中央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而没有注意集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统一指挥问题，统一法令与实现这一法令问题，殊不知这样是可以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可以更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这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当然在中心城市是比小城市好，但是这是次要的问题。中央对此问题，在原则上是了解的，但在运用上有缺点。

(3) 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 共产党是不会动摇反帝国主义的政策，尤其是不会在今天民主革命阶段中反帝是两中心任务之一的斗争上发生动摇。

问题是在我们如何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更发动广大群众，如〔为〕着能有把握的得到胜利，苏维埃政府应施行一种外交政策，在可能限度与不违背中国独立解放的原则上可与帝国主义进行外交谈判；这样可更暴露帝国主义狞恶的面目于群众之前，引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发动更广大的群众的反帝战线，以便有时间去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的实力。

对于帝国主义谈判的原则是帝国主义一切武装力量退出苏维埃区域，一切外国人应当遵守苏维埃的法令，不妨害中国独立，在这根本原则上来进行与帝国主义外交谈判。这点是中央也懂得的。列宁在不列斯特和约的精神，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应当了解的。中央是懂得此策略的采用，但怀疑今天是否有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

的可能，甚至说对将来是否有可能也怀疑。而国际指示我们是有利便条件时即有这一可能。

如第一次攻长沙，适遇湘江水浅，只有两只外国兵船在长沙，但是不能再派来了。这时可以包围他或解除他武装，而和他们讲条件，要他们停止再运兵船来，这样我们可以得一时间专门对付何健。这样的便利是有的，将来也一定还是有的。

同时要知道帝国主义者互相间也有冲突，我们不是如右派取消派的分子怕大炮而无办法，也不是以外交政策向帝国主义投降。同时，我们苏维埃政权主观力量的巩固，也将要推动客观的变动。

外交手段如何要看我们对于第一第二两点是否认识，固然目前与帝国主义办外交的可能性很少，但不能说以后就不要外交。所以要认清政府的作用，在这里可以用它的名义发对外宣言，这是给外国无产阶级看的，也就是答复了帝国主义说中国革命专门是杀人放火的谣言。这不能指为投降，也不能指为取消了群众反帝的决心。相反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外交政策，如对租借地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再放弃什么特权，而是收回特权，而是要发动起更广大的群众有决心的来收回特权。如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上所讲的，登山的道路不一定是走一条，但目的却必须是登山。

(4) 土地问题 中央与国际路线根本是相同的，没收土地的利益要落在贫农和雇农的身上，予中农以利益。决不是落于富农之手。平分土地的观念虽会被解释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可是列宁说过，只有如此才可以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我们是必须反对富农之阻止分配土地的意识，要反对以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分土地办法，也必须反对象如皋的好地给富农的办法。必须要使中国贫农及无地的雇农少地的苦力得到土地，不要怕损害及富农，但却要不妨害到中农的利益。这些中农在经济上，取消了高利贷，他已得到利益，更一方面要在政治上去巩固它，要从政治上去解除

富农的武装。对富农有两种左倾毛病，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这不但不应如此对待富农，在目前这样做，更加要动摇中农的。中农在经济发展上是有可能变为新的富农的，但今天决不能使中农离开我们，而减弱了农民的革命力量的。

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因为现在尚无全国的胜利政权可言；不能将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即解释为国有。中国土地问题中一个特点，就是有资本主义的自由买卖的关系，农民因为反对地主，更怕不公有土地，仍旧会恢复地主制度；但决不能说中国农民已经打破了私有观念。所以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当然土地国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彻底的条件，同时也是革命转变的前提之一。

我们反对地主租佃办法，只因为它是封建的剥削形式；但是资本主义的转租办法，是不能反对的。如闽西已经发生，好象寡妇或红军分得了土地自己不能耕种，于是和别的农民订立合作的办法，这是不应禁止的。即在苏联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式的转租制度，还是长期存在过。

过去中央所通过的苏维埃法令在解释中也有许多不合宜的，现在亦已改过。

(5)雇农工会与贫农团 这两团体在目前的任务更为重要了，但是已经组织的还少，中央在指示上不能说没有努力。苏维埃农村中的斗争是有两个，一个是彻底反封建，另一个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后一个斗争，就要从组织上去培养作战的基础，不仅从雇农方面着手，而要吸引贫农来反对富农。因为贫农是半无产阶级，在许多关系上是被富农所剥削。组织贫农团，包括雇农，贫农以至苦力；但是不和十月革命后的贫农委员会相同，因为贫农委员会的作用主要的是推翻富农的政权，而目前的贫农团在中国

是要做苏维埃政府的中坚，这样来抑制富农的发展。不要以为土地彻底没收了，富农的土地并不比别的农民土地多些，这样就根本没有富农了，这也是不对，是机械的了解。要知道新富农仍旧会发生的，虽然富农所得土地和贫农一样的多，要知道他是有特别的基础的，他有好的农具，有耕牛，有多的人口，有农业上的知识，在他小块土地上能经营得法，一样可以成为新的富农，所以将田亩数作标准，以为大家都是一样多的田，就不会再有富农了，是不对的。不仅这样，富农与地主是有联系的，他们是更容易受其他派别的影响。所以反富农是很重要不可忽视；即使富农的土地是和贫农一样多的时候也不可忽视。

同样也要防止对富农左倾的办法，不管对中农的关系，如南通如皋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不是雇农滚出去，这是策略上运用的极端错误。

(6) 经济政策 在今天民主革命的阶段上，经济政策的原则，仍然是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与劳动监督生产的原则之下许可自由贸易，营业自由，这为的是使苏维埃政权能运用经济流通的帮助来更集中注意力于组织革命战争和向外发展。但同时应注意内战时的工商业者是会和反动统治下的反动派勾结的，所以对这些怠工关厂以至有反革命阴谋的分子一定要加以处分，由小的惩罚一直到没收的行政处分，这当然不能解释为一般的经济没收了。

(7) 红军问题 今天来谈加强红军是很晚的了，在一年以前已有红军了，但还不都是真正的红军。红军虽由游击队生长出来，但一定要和游击队有分别，二中全会本已指出过，但是还不够。过去猛烈发展红军的策略上是打破了逃避的观念，但是不够的，一定要使红军成为国内战争的主要力量，要在无产阶级组织与领导下成为坚强而集中的红军。两次进攻长沙的教训更可看得清楚。国际的指示是：

(甲)红军的成份一定是要以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分子或其子

弟的贫农雇农苦力为中坚。

(乙)主要的干部要工人，要打破无组织的农民意识。

(丙)党在红军中要占有绝对的威信，肃清托洛斯基派取消派等各派别的影响，而且要肃清农民流氓的意识，这才能作战有力。

今天的红军除四五军对这些条件相当成熟外，一般的还是很脆弱的，我们必须要在国际指导之下，造成强有力的中坚的红军的“铁军”。

我们只有从这些正确路线下去了解国际的指示，然后才能达到真正巩固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战争以向外发展的任务。

三、在非苏维埃区中的工作

(1)城市工作 从国际对城市工作指示上，可以认识很明显是要在发展城市工作中立定几个中心城市总同盟罢工的方针来发展全国工作。远在指示反对改组派的信上国际已经这样指示了，要在一切工作上准备实行总的斗争，这是说在领导城市工人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都要向着总的斗争方面去发动。这样才可以看得出，无产阶级有了袭击敌人的力量没有。中央在这点上是没有动摇过。

这一路线从策略方面去实现，中央在七十号通告以后，便以组织政治罢工为我们中心策略。日常斗争中很多经济罢工转变到政治罢工，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成为不可分离。党的中心策略即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政治罢工，一切怀疑于在中央领导中没有实现过政治罢工的不是事实，在红色五月中有过政治罢工实现。党也领导转变过经济罢工为政治罢工，如上海水电罢工，唐山五矿以及北宁路的斗争，都是明显的事实。所以怀疑于这一策略不能实行的完全是右倾的观念。但同时我们要指出组织政治罢工中心策略运用得有时太机械了，必须将这一中心策略，配合日常斗争灵活的运用起来。我们运用这一中心策略时有机械或孤立，只想用

简单的政治罢工口号，而来配合部分的经济要求口号，因此只能有部分先进的群众被动员，而走到等待赤色工会或红军来干的情绪，落后的根本就不接受这口号。这是运用中的缺点。如准备武装暴动而组织赤色先锋队，在政治上是对的，但是不配合日常斗争，如果今天不动，明天不动，后天仍旧不动，这样就冷淡下来了，或者是离开了。这是实际工作中不能配合日常斗争的一种极严重的现象。右倾的错误是停顿于日常斗争中，不去联系到政治斗争或发展到大的斗争，另一种错误是不管日常斗争，只想准备大的斗争，这都是错误的。当然现在下级干部最大多数的错误还是停留在日常斗争中，不向前去推动。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如何正确的运用国际的指示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打破这两种倾向的错误。所以国际决议案上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战斗。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层的经济要求”。

附带说到中央过去计划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受着国际反对，国际不是在原则上反对，而是指示我们如何去准备，反对在今天或明天就做。国际是根据在武汉工人斗争的力量不广泛，在工人斗争中党的领导不强固，敌人的力量还可以战胜我们，因此国际不同意。特生同志报告中已说到过分估量的问题，这种估量是将某种可能代替了目前实际，在这样的基础上，当然发生了这个不适时的策略了。但是绝对不许机会主义者来解释国际路线是退守的。

(2) 加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 应当由今天起更加推广和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现在他的范围和组织力量都不够，且过去

还多是在小资产阶级身上，工人只有部分的参加。还没有能发动最高限度的广大群众。我们不怕帝国主义的大炮，正是因为我们群众的力量，然而现在这种群众斗争力量显然还不够，所以必须加强。

(3) 实行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极端化的过程中，要反对胡适，第三党，取消派，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在这些有形的组织上去反对，同时也要防止那些第三个党派意识的发展。在城市工会中黄色倾向，帮口观念，乡村中的富农路线农民意识，都是妨害无产阶级斗争的，决不能放松与之斗争。

在我们领导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上，尤其是不可忽略下层统一战线运用。我们一定要承认现在党及赤色工会组织力量尚不够，群众中反对统治阶级的情绪尚不坚决，只有最先进的群众可以在我们口号之下行动，次之同情者是不能自己动，再次一等的只是消极反对国民党，最落后的还有对着国民党某一派存着幻想的。如果不是这样，则在拥护长沙胜利运动中是会有极广大的群众起来的，自然大的原因是白色恐怖的压迫，但不能将这一解释作为惟一的单纯条件，尤其不能将这一条件来掩盖我们在发动群众策略上的错误；如果这样，只有待红军来消灭白色恐怖才有办法了。因此一定要使广大群众能在部分口号下先动起来，然后联系到中心口号，使他们了解中心口号是他们所需要的。不然，是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的。

(4) 广大的发展农民战争 现在全国各地激烈的农民战争发展着，有许多尚未得到我们的领导，所以国际指示要使这些自发的农民战争能够都在我们领导之下行动起来，尤其是北方的农民运动。凡是我们的农民运动够的地方，都必须如此。

(5) 正确的运用组织革命的兵变的策略 现在军阀战争的结果，使兵士生活更加恶化，同时红军发展与土地革命的事实放在

士兵的面前，使兵士哗变来参加革命更是主要的出路。我们要去组织兵士哗变，要使这一力量不被反革命所利用，如变为土匪等。使他成为革命力量，这样就普遍的造成了兵暴的基础。不论在当是推翻地主，或是城市统治皆是兵暴。今天要指出兵变第一个出路是去参加农民战争，因为现在工人斗争力量尚不够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所以在大工业城市的兵暴不是目前可以立即实现的。自然我们是毫无问题要领导条件亦已成熟的兵变，在小城市实行地方暴动。这里可以指出我们组织镇江南京伤兵暴动来占领城市的企图是错误的，不仅这一次，过去停止了一次的南京兵暴，也是一样有过高的估计，这都是左倾的错误。

(6) 青年与妇女 青年与妇女问题今天不必说青年工人农民与妇女在革命中地位之重要了，因为这是没有人怀疑的。问题是这一工作上实际上怎样。虽然有组织的革命青年群众有百多万，但是这百多万是否我们的青年团能够领导呢。这数目大部分是在苏维埃区，他们是与省委中央没有什么好关系。在大城市中青年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危机，各地团的青年运动是削弱，这是不可不注意。青年团的反对取消派托洛斯基派的在政治上的坚决是他的成绩，团自五次大会后执行转变至今连初步的成功还没做到。这个责任不仅青年团要负，党对团的领导是太不够了，至于最近“行委”的组织，实际是取消了青年团组织和工作，这是党更应负责的。

女工运动只有上海，或者再加上顺德，余则什么地方也没有了。北方根本没有做女工运动。现在党内的女工干部的缺乏，都是极应当注意的问题。党在上海女工运动中，得着许多经验，但是还未应用到全国去。

(7) 少数民族问题 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占了重要地位，正因为他领导殖民地革命中有极大的任务，围绕在中国四周的大都是弱小民族。内部也有许多弱小民族，虽然云南满洲只有一小

部分。

联系上述两方面任务的，就是全国拥护苏维埃运动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这一工作要发动各地下层群众选举代表，要在非苏维埃区域之工厂乡村中直接派代表共同来参加在广州暴动日开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任务显然是全国党的任务。中央已决定在双十节作一个拥护苏维埃政权之广大群众运动的发动，号召起群众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两个战争两个政权对抗中之党的最迫切的任务。

(四) 党的问题

一、党的进步与组织工作的弱点

党在二中全会后到今天，这一年中党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方才特生同志报告中已经给了一明确的答案，指出中国党是已经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摩洛哥夫在联共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报告中也说到了。但是要指出中国党在革命迅速发展中主观的力量常赶不上客观的发展。不仅中国共产党是如此，摩洛哥夫报告说到各国党的状况：“工厂作坊里的工作的不充分，下级党部软弱，群众组织里党团工作不充分，特别是工会工作不好，这就是各国党实际上最大的弱点”；这些语句用来批评中国党是再适当没有了。只要看现在我们所领导的斗争的群众是流动着的现象，这是说明中国党在组织上尚很弱，无产阶级干部还不够，特别在党内的产业工人只有二千多人。党的政治影响虽然大，组织力量还不能巩固这一影响，所以国际指出中国党的任务应特别加强自己的主观力量。

二、组织上的中心任务

(1) 扩大无产阶级基础 虽然党员数目有十二万，但是产业

工人数目只有二千多人，这个比重是太弱了，这个在领导的作用上，实在是太弱了。

(2) 巩固支部的工作。

(3) 加强干部，特别是引进工人干部，加强各级党部领导的力量。

(4) 加强支部及党团的在工会及群众中的核心作用。

三、党内自我批评与坚决反右倾的斗争

在二中全会后，就提出自我批评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中央因策略上犯了部分的错误，于是号召同志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检查自己的工作，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纠正这些错误，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

中央在检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这不是说政治局别的同志不负责，尤其是如国际指示的执行和传达迟缓是大家都要负责的。即如南京镇江的兵士暴动的问题，我自己也犯了错误。三个月来的工作总结，我们是接受国际批评，指出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多负责一些，但不能允许任何同志的挑拨，如孟雄同志那样说“立三主义”等话，同样的在检查工作中，也是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的。

自我批评，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一定要在巩固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不妨碍秘密工作环境，不超出检查工作范围变成攻击个人武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利用，他们利用中央个别的错误，加以造谣诬蔑，他们主要的是发挥自己路线，在今天与明天《红旗日报》上所登载的罗迈同志在江苏积极分子会上关于何孟雄问题报告的记录说得很详细。大概说，右派的路线是什么呢：

(甲)对革命形势有过低的估计,不相信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不相信战后第三时期。

(乙)对帝国主义的大炮机关枪怕得发抖,想从投降妥协帝国主义方面找出路。

(丙)对于农民战争的意义看得非常之轻,认为攻长沙是一个部落的行为,认红军为流氓土匪。

(丁)对于主观力量悲观,认为不能领导任何斗争。

(戊)对于政治罢工的观念动摇。

这当然是中央与江苏省委要号召同志与它斗争的,且这个斗争是已得了初步的成功,大多数同志是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主张肃清机会主义的暗探的。因为何孟雄的活动,以及政治观念不清楚的,或者真是有自己路线暗藏着的人,它们怀疑中央与国际的路线是否相同,在江苏已有陈韶玉^①,刘峻山等同志已表显出它们调和的倾向,这也是党要和它们坚决斗争的,自然不能因此而减弱了自我批评,同时必须号召同志作两条战线的斗争。

四、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是反右倾

列宁说:“当反对右派时不要被左派利用了,反对左派时也不要被右派利用了。”我们知道列宁党在某一时期内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常是集中火力反对某一种倾向——比较更危险的倾向,同时也不忘记另外一种倾向。我们现在要将主要的火力放在反右倾,另一方亦要反对“左”倾的危险。国际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主要的是传达资产阶级影响到党内来障碍革命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这需要党极坚决的与之斗争,即那些个别的错误,如群众斗争中的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等等也不能丝毫放过。

^① 即王明。

同时要反对在反右倾中的“左倾”发生，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过激情绪，如斯大林同志说的“胜利得热昏脑袋”。中央制止过南京杭州的暴动，就是说中央工作不是没有反对过“左倾”。同时对于一些个别的“左倾”错误，也要去反对他，如最主要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不去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只作革命的清谈，这种危险便在专限于少数先进分子中活动而离开广大的以至落后的群众。这值得我们积极去注意反“左倾”，这不会减弱反右倾的力量，而反能更巩固之，因为“左倾”亦正是加强右倾机会主义之立场的。只有如此，才能不会使自己阵线中有弱点。这是国际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分清右倾与左倾，特别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是中央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坚决的精神。

（五）革命的转变

一、中国革命的特点

关于革命的转变，这是带着一些理论的问题，在国际决议案上是占了一个重要地位，指出了在中国实际上将来可以实现的问题。国际决议案上很明白的指出目前中国革命中的特点：

（1）上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不再参加革命了，而成为反革命，成为我们要推翻的对象之一，政治上是要解除其武装的。

（2）中国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围绕着无产阶级，是工农联盟的强固基础。

（3）中国革命是反对封建阶级同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本统治，这是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表现出中国革命的特点。

（4）中国革命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发展着，这一政权形式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中尚未能确定，而在中国就决定了中国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最坚固的政权。

(5) 在政权中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党员占绝大多数, 不说将来的政府, 即现在各地农民战争中已是如此。主张国民会议的任何一派是不能参加的, 群众是不允许它们参加的。

这种优越的国内条件, 使中国革命在其胜利的道路上, 开辟了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在国际指示上, 更指出过渡的阶段, 要经过许多准备的阶段便要逐渐彻底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 不仅这个, 中国革命更有好的国际环境, 它是在大战后的第三时期;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的条件下, 同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成功, 这是列宁所说的国际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还不雄厚的中国, 因有国际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的可以绝对的保障革命的转变。

二、如何去培养革命转变的前提

(1) 社会的前提 使革命转变的社会力量, 一定要决定于无产阶级之组织力量和觉悟力量, 以及他与贫农的结合, 这些条件今天是正在生长着。现在广大的工人斗争, 和贫雇农的组织, 当然在政权取得时将会更加成熟。

(2) 物质的前提 国民党政府的企业, 帝国主义的企业要没收它, 民族资本也由行政处分上逐渐没收了, 这样可使一切大产业入诸政府之手, 并可以发展到农村经济大规模的经营——当然这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

(3) 政权的领导力量 政权在共产党占了多数情形之下, 自然是可使政权为革命利益而更集中组织, 可以不再参加有其它政治派别的分子, 以保障无产阶级唯一的领导。

这些前提的培养是今天就要认识的, 当然不是硬来就可以转变的, 例如我们只有一些乡村, 而后没收了作坊, 即谓是有转变意义, 当然是不对的。

三、反对转变中的错误倾向与反对三民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

最后说到反对转变问题中的错误主张，我们在今天不应忽略了民主革命中的另一个可能，即是在土地革命胜利的农村中有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存在。不注意到这点，即会发生错误。苏联的经验已有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尚且有新兴资产阶级的发生，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中是更多可能的。

如果仅凭主观想用人力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发展，这是不行的，我们是要培养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部分的转变的前提，才能在将来抑制另一种发展的趋势。因此民主革命的内容仍是目前的中心口号转变的前提的准备，也必须由这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中生长出来。右派将两个革命阶段划分得清清楚楚是不对的，但决不能说转变已是目前主要的任务。另一种更危险的，是以为取得了工业城市，即转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对于彻底实现民主革命到全国的范围有极大妨害的。

这样就指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关于这一点的解释是太机械了，可是反对两种错误的精神是对的。

最后党要发挥列宁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正确理论，要反对托洛茨基派所说的中国革命已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妄谈。同时也要反对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反动性与所谓国民党是要领导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欺人之谈。在理论上一定要战胜一切反动派别，要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中国胜利！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 党的总任务议决案

——1930年9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的中国问题
议决案的决议——

一、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兴盛和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现时世界的状况是：在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整个系统的一切主要矛盾剧烈到极点，开始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末日；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和集体农场运动已经有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成绩，虽然还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在布尔塞维克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赞助之下，苏联的发展已经是大大踏步的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这样，使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更加看见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的日益深入，这种主要矛盾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兴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动摇。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对于苏联的侵略，积极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因为更加要加紧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以发展着相互的冲突，日益促进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也极端的剧烈起来——资本家对于工人实行残酷的进攻，群众的大批失业，工资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加长，社会保险的取消，税捐的加重等等；

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蒂化，剥夺群众的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也法西斯蒂化，他们和资本主义的政府机关混合起来；工人群众正在用广大的罢工斗争来反对这种资本的进攻：国际的群众政治示威，失业工人的广大运动，德国，法国，波兰，以至英国美国都有广大的斗争爆发，殖民地的劳动民众，也发动革命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印度，安南等）。总之，世界的经济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反攻，和殖民地革命斗争的兴起，在有些国家里面，经济危机已经引导到政治的危机；所以全世界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而最近的世界危机只是更加促进殖民地上，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国内战争的开展。这种情形，很明显的把国际的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和党内右派对于世界革命的悲观的取消主义的估量，打得粉碎。

二、世界革命的高涨和中国革命

同时中国的反帝国主义革命，已经是在世界革命的总高涨的情形之下进行，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说只有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利的说法，固然是错的，同样，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掀动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亦是非常之错误的。

二、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三、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入

中国最近的事变指示出：中国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政府更密切的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全世界的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巨大的工业，农业，金融的危机，更加深入（工业停滞的和衰落，巨大饥荒的继续，失业之增加，银价低落和米价等的高涨）。工人受着中外资本

家极端残酷的进攻，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贫民，亦大批的更加破产和贫困化。而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为着抢夺劫掠中国市场，而加紧侵略中国，重新瓜分中国，争夺中国的势力范围。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他的各派军阀政客，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互相倾轧和排挤，在经济危机深入的推动之下，更加加紧争夺着对于工农贫民群众的“剥削权”，同时他们也就各自勾结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受他们的实际支配，而替他们争取势力范围。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斗争，不但已经爆发成为连续将近两年的军阀混战，而且已经完全毁灭了所谓“青天白日旗统一中国”的幻想，公开的分成几个互相排挤互相战斗的政府（北方政府的成立，满洲政府的“中立”和最近张学良的出兵进占天津北京等），一次战争没有完全结束，立刻又暴露更加扩大范围的第二次战争的准备步骤。更明白表演着：——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国民党军阀制度的崩溃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反革命的军阀混战的延长，和统治阶级的更加分裂，愈益削弱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同时这是更加加重对于群众的剥削和压迫，而日益引起群众方面更加积极的反抗和斗争。

四、中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新时期

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也正在走进新的时期。中国的工农红军，占领过长沙一次，接着在退出长沙之后，利用占领长沙的一切军事政治上的教训，集中并且改编自己的力量，而进行更有效的反对反动统治的战斗。长沙十天的苏维埃政府，不管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和陈独秀托洛茨基等怎样诬蔑咒骂，他对于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劳动民众都引起极广泛的同情和赞助。固然，第一次占领长沙之中：第一，红军各部队的力量没有充分的配合行动，第二，红军的进攻和长沙的群众斗争没有充分的联系，第三，当时没有充分组织后方和根据地，第四，仍旧保留着许多游击战斗的

性质。然而，长沙的占领，开辟了中国革命高涨之中的新时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苏维埃暴动，是前一次革命失败过程之中的“退兵的战斗”；而现在长沙十天的苏维埃，却已经是新的革命爆发的“进兵的斗争”——他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江西、湖北、广西、福建、广东的红军，正在这个时间更加发展自己的力量，新的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地方暴动，以及自发的农民斗争，也都在扩大。军阀军队里的兵变和士兵暴动的酝酿和发动比以前更加增加了他的力量，扩大了他的范围，尤其是和红军接触的部队。城市贫民自发的斗争，也往往成为广大的骚动和抢米运动。最主要的城市工人群众，在最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发展着群众的罢工运动，时常发生和警察、巡捕、军队的武装冲突（一九三〇年全国红五月的广大运动，和政治示威，八一运动，上海水电罢工，上海五万人丝厂女工的罢工，青岛的纱厂和人力车夫的大罢工，武汉裕元纱厂的罢工等等）——虽然运动和斗争的规模和力量，还没有充分的巨大，可是斗争的剧烈和日益高涨的形势是很显然的。一般工人反对黄色工会和国民党的斗争，更加普遍，更加剧烈，这是证明对于除出武装暴动没有出路和必须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开始更加深入到工人阶级里面去。这种斗争情形明显的表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长沙的占领和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在中国一般的新的高涨的背景之上的，而且苏维埃已经是能够总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唯一的旗帜。

五、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

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一）城市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充分的力量，足以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统治，可是正在更加剧烈和日益高涨；（二）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衡的

现象,有些地方刚在开始农民的游击斗争,有些地方却已经能够推翻当地的国民党政权;(三)而且红军战争的主要区域已经进到规模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正式战争,跟着军阀军队的兵士的革命哗变和响应红军的运动,也正在日益扩大。——这样,部分的说来,军阀混战已经开始变成革命战争;(四)苏维埃区域的逐渐汇合,要从零星散乱的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进到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来指挥组织革命的战争,集中革命的势力——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去和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对抗,去领导起全国的革命运动,为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

六、国民党的屠杀和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中国革命

中国国民党就用发狂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企图挽救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凡是反动统治现时还维持着的地方,不论是城市和乡村,都是这样情形。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军事顾问包探专家的帮助之下,特别布置主要城市(武汉等)的“防御工事”。国际各国的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和国民党各派军阀,都用极残酷的手段来攻打苏维埃和红军,施用飞机炸弹,整个的轰毁许多村镇,杀死成千成万的民众。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已经公然计划,并且实行出兵几十万到中国来干涉革命。

七、国民党改组派和取消派等的拥护白色恐怖政策

这样,革命和反革命决定胜负的斗争一天天接近,使一切种种所谓“第三派”更加加紧的企图用“国民会议”等口号的欺骗宣传,来蒙蔽群众,破坏革命。可是,国民党的改组派,汪精卫等,最近参加北方政府,公开勾结帝国主义,赞助军阀,宣传并且实行反对苏维埃革命的白色恐怖政策,使改组派的假面具完全揭露,甚至于完全丧失。托洛茨基陈独秀等取消派,亦跟着改组派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反对苏维埃,说“长沙是土匪占领的”,

这很明显的表示他们实际上拥护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其他胡适之的“民权派”，邓演达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是同样的作用。取消派等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实际上也是在努力维持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国际的托洛茨基派，以及白朗德尔派，也和中国国内的陈独秀一样的，他们对于残酷的白色恐怖，以及长沙汉口等处最近屠杀几千工人和共产党员，并没有表示半点抗议，而对于中国红军，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却极力的诬蔑。

八、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

帝国主义的列强，这样积极的实行领导反对中国革命战争，运用他们一切种种走狗的赞助，来镇压那争取中国解放的工农苏维埃革命；中国国民党各派的白色恐怖政策，以及陈独秀、邓演达等的反动宣传，都这样一致的来反对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这足以更加明显的指出：一方面对于中国革命敌人的力量（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需要更伟大的更有组织的发动极广泛群众的革命力量，来和他们对抗和斗争；别方面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自己已经认识清楚——在全世界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劳动群众，一般的革命高涨的情形之下，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都有极大的危险，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那简直是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

三、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现时革命情形的正确估量

九、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一致的政治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估量中国革命的运动说：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最近期间，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包括到整个中国，至

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省份的地域”，不过是“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的形势（武装暴动的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总合起来，这些运动还没有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然而“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新高潮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和一切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预言完全相反，中国最近的事变，照上面所讲的看来，正是确切的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根据于中国的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的新高涨情形，党的路线的确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说，要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在工厂中加紧党和赤色工会的作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密切的与政治口号及斗争联系起来，以动员和组织工业城市之中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时，使工业城市群众运动，与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创造总罢工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巩固并且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根据地。

十、中央全体会议对于过去错误估量的纠正

同时，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总起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现在的事实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还没有平衡，还没有汇合，农民战争之中还缺乏充分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组织作用；政治局亦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

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就已经有这种估量上的错误——认为“城市工人尚未走到‘客观革命的形势’的主要原因，只是由于白色恐怖的镇压”，而忽略共产党在群众之中和革命之中的组织作用的还不充分，亦是这种情形的一种重要原因；甚至于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和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客观革命的形势”。这种估量是不清楚而不正确的，一定可以，而且已经引起策略上的错误。

这种估量之中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一）现在大城市的产业中心里，还缺少更加广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发动；（二）各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发展扩大，还需要领导的加强和集中，需要建立巩固的阵地，去迎接更加残酷巨大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政治局过去的策略上，就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的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

为着更加坚决彻底执行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起见，必须遵照国际执委的指示，立刻完全纠正这些错误，而在一般策略和工作上，实行必要的转变。

十一、反对动摇党的路线

同时，中央全体会议指出来：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是变更党的路线。最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利用这些个别的错误，企图进攻中央的路线，企图用曲解国际路线的手段——认为现时应当采取保守政策——而来推翻中央和国际一致的路线。总之，左倾的估量认为全国客观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应该马上到处布置暴动；右倾的估量就否认全国总危机和一般的革

命高涨事实，而认为应该抛弃准备总同盟罢工，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方针，这都是违背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的。而右倾的估量，简直是投降政策——客观上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

总之，空喊“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的“左倾”机会主义，以及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创立武装暴动必要的条件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两种倾向都阻碍着争取广大群众及发动和领导坚决的战斗。党应当坚决的斗争：——反对空喊总罢工武装暴动而忽略工厂之中日常的群众工作，和群众直接的日常要求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只看到经济斗争而否认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的密切，不去努力创造总罢工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现在右倾是主要危险。

四、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十二、共产国际指出的任务的总意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决议议案，根据对于中国形势正确的估量，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目前任务，更有详细明确的指示。这任务的意义是：（一）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二）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样去坚决的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十二、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

革命势力——工农红军的发展，正在从零星散乱的游击战争，

进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正式革命战争；长沙占领事变的经过，更加明显的指出这样情形。中国红军的三，四，五，八军的汇合和广大的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是证明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苏维埃的根据地，创造并且巩固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以便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政治中心——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区域最为成熟。

十四、苏维埃区域里的政策

这种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不但继续扩大发展各苏维埃区域，而且要切实加强这些区域里无产阶级的领导：（一）要切实组织并且整顿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吸引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的参加，排斥富农和投机分子，（二）要坚决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最小限度的保护劳动的社会法令；（四）实行适当的以承认自由贸易和施行劳工监督生产为原则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抑制剥削者的政策及租税政策；（五）实行坚决的肃清反革命政策，和革命的民权独裁；（六）实行经过群众团体定期征调志愿兵的办法，去坚决改良红军的社会成份，建立红军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提高和巩固党在红军之中的领导作用及绝对的威信。……这就必须发动当地更广泛的群众，组织他们的斗争，发展并且巩固当地的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民团等，去团结中农群众于自己的周围，而肃清富农的一切反动影响和领导。只有这样，苏维埃才能有巩固广大的群众基础。国际执委的议决案，对于这些问题的详细指示，应该立刻坚决的去执行。

对于这一个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创造并且巩固真正的红军，以确立最有保障的地域（根据地）以及随着这个方针

而必须执行的许多步骤和办法——中央政治局直到最近才加以充分的注意。这个任务的执行，决不是“割据偏安”的“和平建设”，恰恰相反，只有在斗争之中，才能够发展出坚强的政治上稳固的真正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这种巩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肃清苏维埃区域内部反动势力的方针，正是要用更加巩固革命阵地的方法，使胜利的进攻得到充分的保证，这样去真正扩大苏维埃区域，——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现在不彻底的去准备苏维埃根据地，不加强和改造红军，不做政治上军事上更好的准备，而使单纯扩大战斗的政策束缚了自己——这是很有害的。

十五、城市工人运动里的任务

反动统治区域里城市工人的斗争，女工运动，青年工人和童工运动，以及失业工人运动，必须加以更加充分更加切实更加坚决的领导，对于自发的经济战斗和反对国民党及黄色工会的斗争，以及还在黄色工会等钳制之下的运动，必须加以更多的注意：要保障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使他不但不至于比客观自发斗争的剧烈化还要落后，而且能够得到组织上的巩固——首先就是党和赤色工会的发展，以及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切实执行和扩大，这就必须更坚决的去执行独立领导斗争，团结广大下层群众，反对黄色工会，消灭黄色工会的策略。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就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因此，必须努力加强对于日常部分的经济政治战斗的领导，扩大罢工运动，直到各业同盟罢工，并且发动群众的更广大的政治斗争，不但不把经济和政治要求机械的分割对立起来，而且要能够综合联系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去组织伟大的政治罢工。要能够发动群众的经济战斗和政治战斗，从这种部分要求的群众运动的领导，联系到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这样去真正切实的准备政治总同盟罢

工，以至于武装暴动。

对于罢工运动不能充分领导群众切身要求所激起的部分斗争，同时又并不能使政治罢工的鼓动深入群众，并且不能联系部分要求的斗争和总的政治斗争——这是争取群众的很大的障碍。至于机会主义的动摇分子，企图分割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要使运动停顿在经济的小斗争范围之内，并且把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推到第二等的地位——那就简直是尾巴主义的最严重的表现。

十六、争取群众和积极准备暴动的联系

反动统治区域的农民运动，饥民运动，兵士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等，亦都应当在这种原则之下去进行。总之，对于目前任何细小的斗争，党都不应当忽视；必须认清：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一直到落后的广泛的劳动群众——是和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任务，绝对不能对立起来的。恰恰相反，正应当利用工人和厂主，店员和雇主，农民和地主，兵士和军官……以及帝国主义军阀和中国民众，反动的中国政府和境内弱小民族之间的一切冲突，去领导和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削弱反动的统治，争取，动员，并且组织革命群众，这样去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十七、革命武装力量的扩大和准备

这些斗争的发展之中，应当注意到工人军事上的编制训练和武装训练；应当坚决的从抗租，抗税，抗债等斗争里，从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和土地革命运动的斗争里，发展更广大的农民武装，游击队和游击战争，适当的去创造新的红军；应当对于兵变给以正确的领导，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之下组织士兵暴动，使他们的发动，的确能够削弱反动军队，而加强革命的武装势力——和工人农民以及红军的斗争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是在所有这些运动之

中，实现并且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里，不能够有冒险的行动和布置；因为准备的不充分，以及和兵士群众的联系的缺少，或者因过于夸大计划而等待不可能的配合——这些行动和布置，反而可以断送我们在敌人军队之中的力量。

十八、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相互关系

自然，反动统治区域的这些斗争任务，决不可以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割离起来，尤其不可以互相对立起来。恰恰相反，这两部分的任务，只是一个整个任务的两方面，——这个整个任务，就是为着全国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两方面的任务，应当互相适合，互相联系。例如要在日常斗争里去引起广大群众的发动，在反对军阀混战，变军阀战争为反对军阀的革命战争的总口号之下，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反对攻打红军，阻挡运输军械军队去打苏维埃区域，号召兵士投到红军，工人替苏维埃政府去工作……等。总之，党的总方针，是要组织现在的革命斗争和积极准备城市暴动，互相配合和联系起来。

十九、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

一般的全国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斗争，苏维埃区域的政策，以及红军的战争，都要集中统一的组织起来，领导起来，适当的联系和配合起来。所以最近党的具体任务就是要领导起极广大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要能够切实的把全国大城市和一般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工农群众的解放运动，以至日常斗争，和苏维埃大会的准备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并且要能够真正发动各苏维埃区域极广泛的群众，来积极参加大会的准备，这样，使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和将要在大会产生的临时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的确有全国斗争的劳动群众做他们的支柱。

二十、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

全中国以及全世界范围之内，要发动广大的赞助并拥护中国苏维埃大会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广大运动。——要百倍的加强列强驻华海陆军里面革命的兵士运动。要经过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在一切宣传鼓动的运动里，提出主要的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和劳工团体监督生产，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建立独立的解放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国，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中国境内，不论是中国和外国资本家，凡是违背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法令的，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一直到把他们的企业租借区收归国有；——要公布这种苏维埃政府的目前大政方针于全国和全世界。并且要特别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来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及民众，共同拥护苏联，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进攻苏联以及压迫中国革命战争。

二十一、党的组织任务

所有这些任务，很明显的要求党努力去加强主观的力量。首先就是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广泛的征求产业工人女工入党，而征求农村工人雇农苦力等入党，亦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同时，要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的贫民群众之中，发展党的组织；要坚决提出工人干部，训练新的干部，要百倍的加强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直到支部干事会。要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团体，尤其是赤色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以及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少年先锋队，革命的农民及兵士团体，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等。

现在，一方面要努力加强党对于青年团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

众团体的领导作用：别方面正要更加扩大群众的非党团体，广泛的发动他们的组织，提高他们自己的活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并巩固党对于广大群众的政治影响，使有组织的革命势力，不仅仅限于最先进的先锋队队伍，而能极广泛的包含到伟大的群众。任何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某些办法，足以妨碍这种任务的进行，甚至于事实变成取消青年团以及妨碍工会工作等的现象的——都极端的有害，而不能不立刻改变；要真正建立并且坚固各种群众团体里的党团工作，要努力扩大并加强党的支部和他在群众之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产业支部。

以后党的最主要的组织任务之一应该是：有系统的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使他们在工厂之中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全总，上海工联，各省的总工会，以及各产业工会，都要成为有战斗能力的组织。要从工厂里面最好的最积极的工人之中，特别是从罢工及各种斗争里面最积极的分子之中，提拔新的工会干部。应当铲除害怕和不信任非党的无产阶级分子做工会指导机关工作的倾向；党的支部和党团，应当在工厂和工会里面，把这些选拔出来的广大的无产阶级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党团和工会，都应当特别注意劳动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运动，必须各级党部，团部，工会的整个指导机关，一直到每个支部，每个工会下层组织，都负责积极去进行妇女工作。

党对于青年团要注意到现时极严重的青年团的危机状态——青年工人的工作薄弱到极点，团员的工人成份，比党还要稀少，苏维埃区域虽然有青年群众的组织，而极端缺乏团的正确领导。党必须百倍的加强对于青年团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加强青年团的反对右倾主要危险，同时加紧反对障碍青年团实际工作转变的“左倾”清谈和关门主义，而切实执行青年共产国际所指示的转变，实行工作上的青年化，尤其要反对党内轻视青年工作的倾向。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关于“总行委”决议，事实上得到了取消团的组

织结果——这种错误直到最近方才纠正；——这种错误引起了取消青年团倾向的加强，所以特别要坚决的反对这种取消主义的重要危险。同时，也要加强斗争，去反对因为这些最近的错误而更加激起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

二十二、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

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是革命和反革命开始日益接近决定胜负的战斗，国民党改组派，陈独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邓演达的社会民主派，胡适之等的民权派，凡是这些企图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派“第三派”，都自然要更加努力帮助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地主资本家——想出比较巧妙的方法，来欺骗群众，拉住群众，阻碍群众的革命化，而维持反动的统治。他们一致的口号是“国民会议”；他们多多少少相同的策略，便是企图诱惑群众走到合法主义的“正轨”上去，甚至于露骨的做破坏罢工的工贼，出卖农民群众斗争的奸细——已经成为通常的现象。就是不成派别的工头，帮口，红枪会等类的首领（富农豪绅等）事实上也是传达改组派等影响到群众中去的工具。这种政治派别和破坏革命的分子，甚至暗藏在苏维埃区域里去活动，他们的活动，尤其是在反动统治区域，往往还能够欺骗落后群众，至少是使群众暂时的犹豫，散乱，认不清目标。所以共产党的任务，就要更加加紧反对这些派别和这些分子的斗争，争取群众自发运动的领导，主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争，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这样，在斗争的过程之中，要在每一步，每一件事情上，都切实去暴露这些派别，黄色工会的领袖，红枪会等类的首领……的反革命作用，以及他们欺骗钳制出卖压

迫群众的真相。

二十三、革命转变问题和反对孙文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是斗争急剧的发展和迅速的深入。因此，共产国际执委特别指出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途问题。中央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最近几次议决案上，指出“两个革命完全隔离”的说法，以及“革命开始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的说法，固然是正确的，可是，自己的群众，也是不清楚的，而且是机械的（“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就一定是革命转变开始”的说法）。党必须根据国际七月议决案的详细指示纠正这些错误，更切实更明确的指出并且解释：中国革命现阶段，还是民权主义的性质，而他的胜利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加紧反对孙文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五、反对倾向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二十四、自我批评和反对倾向的斗争

党现在要担负起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严重任务，要在组织上加强自己的战斗力，要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在群众里的影响，而争取广大的群众。为着执行这些任务，党必须根据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的七月议决案，和本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切实检查党的工作，实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从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国际和党的路线上审查批评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而坚决的执行纠正，使全党都了解这些错误的实质和教训。别方面要防止调和主义精神的非布尔塞维

克的“自由批评”——离开党的路线，甚至攻击党的路线的批评。并且党在现在情形之下，应当比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保障思想上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右倾和调和主义。

二十五、“左倾”的错误

因为必须坚决的领导罢工斗争，尽量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关系，除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机之外，又发现了盲动主义关门主义倾向的错误——就是往往不去争取群众，不能估计群众的力量而只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等等。同志之中发现“不理黄色工会”“凡是不是雇农，一律都应当开除出党”“杀尽富农”“只要领导十亩以下的贫农去抗税抗租”等类口号的提议。并且已经有放弃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忽视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和群众团体等的现象。甚至于借口“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论调，而实际上走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群众之中的这种情绪，只足以表示群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毒恨的增长，以及群众力量组织的需要的增加。如果因此就不去领导群众日常斗争，那就成了等待暴动。别方面，这一类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战争之中，往往会引导到表面是“坚决向前进攻”，实际是继续“没有后防的作战”方式；在苏维埃区域里，就是不会适用对于帝国主义的应付政策，脱离农民群众的“左倾”幼稚政策，反对富农而不会团结中农于自己的周围；以及一般的不会在政治上解除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富农等等的武装，而反对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左倾”的错误，是在于只看到先进分子的情绪，而不去切实艰苦的去争取群众，因此，脱离广大群众而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左倾”的错误，事实上是巩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所以一定亦坚决的反对一切“左倾”，不应当有任何调和的态度。

二十六、右倾的主要危机和调和主义

同时，现在党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力量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决定胜负的战斗，要勇敢的去发动，并且独立的去领导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条件之下，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现在的状况：最严重的危险事实上的确是对群众斗争落后的尾巴主义——有些同志甚至于说“群众都是右倾落后的”来掩护他们自己的怠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上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工会的合法主义（投降黄色工会，放弃独立领导斗争的黄色倾向），农村里的“富农路线”（阻碍土地革命，保守和平发展的主张，放任群众在富农影响之下等等事实），对于农民战争的蔑视，恐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过分”发展等等。可是最近这些个别表现之外，还有更严重的现象——甚至于形成整个的右倾路线，企图鼓动同志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种右倾路线是：（一）说“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中国革命是空话，而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是实在的力量”，所以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二）说城市工人没有革命的斗争，没有同盟罢工的可能，只能实行日常的经济的小斗争；（三）说农民的斗争，因为没有工人革命斗争起来，所以不能成为什么大的力量，说农民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长沙的占领是决没有前途的”）；（四）借口发展不平衡，否认世界的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潮（否认“第三时期”），否认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总的革命高潮；（五）因此，认为不应当有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并且根本否认党的成绩，发展悲观的论调——主张避免剧烈斗争来和平的发展“主观力量”，说一定要赤色工会组织了大多数工人之后，才有别的办法；（六）造谣挑拨说党内实行纯粹的委派制度，“弄得同志都不敢讲话”，发展煽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个路线显然是反对党的整个路线

——亦就是反对国际的路线。可是这些右倾分子却利用着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不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小团体的活动，而且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用政客外交的手段，冒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名目，实行反对国际和党的路线。这些分子的领袖，又正好就是从二中全会以前，江苏问题的争论，反对陈独秀斗争的最初阶段以来，一贯的是反对中央的。

而且，在党批评和打击这些右倾分子的时候，居然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说思想上反对右倾固然需要，组织上的制裁是用不着提起，只说中央和国际不会不一致，而不答复右倾分子的诬蔑中央；总之，调和主义的特点，就是说，在组织系统上当然服从中央，可是思想上的自由，讨论上的自由，即使是要动摇党的路线的也还要保留着。这些调和派是向来有小组织的派别主义倾向的一些同志，他们现在事实上是在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如果他们不抛弃暗藏的机会主义的立场，那么，自己也始终要走上公开的机会主义的道路。

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然后才能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工头富农的意识，如果这些同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继续坚持，那么，党必须肃清他们——因为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分子，客观上不能不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

二十七、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党和革命任务的执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的认为共产国际执行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为着要执行这些指示。以及为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案，纠正过去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并为着更加坚决的执行国际的路线起见，为着要担负起当前的严重的革命任务起见，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反

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同时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是现在阻碍党去执行当前重要任务的主要危险。

注：中央政治局从六次大会之后，大致已经习惯了把“革命高潮”的名词与“直接革命形势”的名词，用成同等的意义。字面上“高潮”和“高涨”极容易混淆，而“直接革命形势”（国际这次决议案上称之为“客观革命的形势”）和“高涨”在实质上却大不相同，所以“高潮”的名词应当废除。

以后划一名词：

（一）凡是表示革命运动向上生长的普遍意义的，一律只用“高涨”。

（二）凡是表示可以有武装暴动直接袭击统治阶级的统治之形势的，应当用列宁的名词“客观革命的形势”，以后不用“高潮”。（马鲁伊里斯基同志最近的解释：“直接革命形势”是以前齐诺维也夫所用的，也有不妥当的地方）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 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0年10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满意的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伍豪^①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共同决定的那些议决案。国际执委坚决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能够有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和彻底性，去实行国际执委的议决案，决议以及政治指令之中所包含的政治路线，这样去保证中国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前进。

然而，因为在中国革命现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机，国际执委和中国政治局几个同志，这是一方面，立三同志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这是另一方面，这两方面之间，发生了最严重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认为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发展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和政治委员会的那些议决案和决议，所以再来说一说这种不同意见的实质。因为必须明白的了解：——问题不是什么不同意，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的不同意见。必须完全明白的了解：——这里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这两条路线是互相反对不能并存的——那就不但

^① 即周恩来。

有害，而且要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立三同志以及在党的领导机关里面赞助他们个别同志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呢？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的时候，他是从对于当时时机和力量对比的什么样的估量出发的呢？

立三同志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并不是从对于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的——这种分析，对于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必要的责任。因此，他所做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然而这个方针，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斯基主义亦是这样的。从这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就发生了一种理论，说中国已经有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已经成熟了。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广州，香港，大连——武装暴动，对于长沙，南昌，武汉——用红军进攻，并且提议把蒙古平民共和国实行苏维埃化，加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请蒙古军队开进中国，动员苏联的红军出征满洲，对日本宣战，以至世界大战——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观念。他彻底的发展自己的说法，说一省几省的胜利就是全中国直接暴动的形势，这种观念，并且还有一个明明白白是托洛斯基主义的说法来加以补充：就是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立三同志提出的政治路线，就是这样的。这条路线的错误危险和害处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立三同志没有估计到中国现在革命高涨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发展，

程度，觉悟和组织能力，是非常之不同的。没有什么必要来证明：一方面，中国南部的许多地域已经是苏维埃区域，红军正在生长，游击战争正在发展，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正在扩大，别方面，其他地方的农民却只是刚刚开始加入斗争。甚至于在广东的南方，那地方是前次革命过程所开辟过的地域，革命运动也开展得很慢。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正在进行着农民战争，而浙江，四川，安徽，江苏农民战争只是刚刚开始，至于云南，贵州农民战争却还没有开展。

中国北部和满洲，我们对于农民的影响非常之薄弱等等。国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的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政权，是因为中国各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事实的本身指示出来：革命运动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区域得到胜利，并且已经胜利，而在其他地方，在国内决定胜负的部分，却是极端的反革命，敢于屠杀的反革命拿着政权。立三同志的说法，以为一省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范围之内已经成熟的革命形势，这种说法把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估量的事实，一下子都推翻了——这些事实是：中国封建军阀的割据，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立三同志的观念，是和国际执委的分析互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完全脱离了一个事实，就是农民运动高涨的速度和规模，赶过了工人运动很多了。自然，工人运动的高涨——并不是空想，而已经是事实。工人斗争已经波及到了最荒远最落后的地方。但是，不能不估计到：工人运动的高涨，一般的讲起来，甚至于在决定胜负的工业中心城市（长江流域的武汉，上海，更不用说广州，香港，大连，哈尔滨等），比农民运动还是落后。甚至于在上海武汉，自发的罢工斗争也还发展得不快，我们的党还没有成为巨大的经济政治罢工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今年上海武汉五月和八月的发动

之中，参加的只是先锋队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组织得很弱。我们和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谈话，已经能够发见：党宣传苏维埃的工作非常之薄弱，工人的基本群众之中还没有一种认识，认得清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可是，工人的基本群众之中却有一种情绪，以为红军来把蒋介石的军队打败了，工人方才能够发动。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情形的分析，应当估计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作用。正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中心城市，不但在帝国主义武力干涉的直接打击之下，而且帝国主义对于工商业行政的中心城市，有直接和经常的军事政治的控制。用具体的事实来说，就是：当立三同志提议在武汉暴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只有二百党员，赤色工会一百五十会员，而且最近武汉的一切发动指示出无产阶级的组织薄弱和没有准备。而帝国主义呢？据我们所得完全可靠的消息，他们确有等于现代欧洲式的军队十师的力量。上海的形势，也不比这个好些。况且国民党的反革命派，也还有相当的没有散乱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实行武装暴动，那就是把中国无产阶级的精锐，送到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之下去，把准备着将来巨大战争的决定胜负的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以及红军，送给敌人摧残，这可以把我们的运动往后抛掷。

武装暴动的方针是定下来的了。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大城市以及最大城市的武装暴动。然而，不估计具体环境，不分析现在大城市中的力量的对比，而组织暴动，这就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盲动主义。——现在力量的优势是在阶级敌人的方面呢。必须用全力动员群众，为着部分要求而斗争，这样去准备群众选择最好的时机来暴动。这是对于阶级敌人的真正进攻。一切企图了解或者解释国际执委的路线是退却的，就算说是暂时退却的路线，自然都是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

第四，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当清醒的估计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和弱点。要知道苏维埃政府在中国还没有，即便说有，也只在传单里，只是在纸上，而不是实现的政权——已经是暴动起来的群众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的实现政权。苏维埃区域还没有组织好。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团结。甚至于在苏维埃区域里面，土地革命还没有实行到真正解决最重要的任务。不但富农，甚至于小地主却钻到苏维埃里来，钻到新的政权机关里来，钻到红军里来，富农企图偷取土地革命的结果。富农式的口号——按照生产工具分配土地的口号，并没有遇到相当的抵抗，有些地方，提出只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有些地方还提出一种口号，说对于五十亩以下的地主高利贷者，仍旧应当还债。这种口号，只有谭平山会提出来，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平均分配土地，这是土地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可是实行了的地方很少。贫农的组织甚至于没有开始。贫民团没有建立。苦力和雇农没有组织工会。苏维埃区域的无产阶级就是很少，也必须组织到工会里去。我们可以说，现在还并没有真正照着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去开始解决这些任务。而不解决这些任务，是不能够建立真正的苏维埃的，是不能够把中农从富农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和他建立坚固的联盟的。新的政权机关还没有建立，苏维埃在许多地方还不是选举出来的。苏维埃运动的这些弱点之外，还有些过早的错误的企图，就是要想设立集体农场和国立农场，要想实行有规划的经济，实行专卖，没有军事必要的地方，也去调节经济生活。第一次苏区会议决定土地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对于许多问题根本上就解决得不对。说只有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才实行平均分配——这是不对的。说大农场不应当分割，而应当变成为苏维埃国立农场——这是不对的。说雇农分得的土地，应当现在就联合成集体农场——这是不对的。说红军兵士要等全国苏维埃政权都成立之后才能分到土地——这是不对的，非常之不对的。公布的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很

明显的带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精神。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政纲之中，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有了直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却不去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不去开展和实行自己的正确政纲，不去组织团结革命的根据地，不去联合苏维埃区域，以巩固已得的胜利，以实行真正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以组织后方和引进后备军。立三同志对现在时机这些最重要的根本问题，连提都没有提出。

第五，我们不来讲对于革命武力的神奇古怪的过分估量了——立三同志是有这种过份估量的（他说五百万工人，三千万农民，每个城市都有工人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也有五百万人等等），然而必须指出来：立三同志完全不明白真正的工农红军，有工人干部指挥着的，有强固的党的骨干的，现在还没有。现在红军的成绩是很大，他的生长，他的英勇的功绩，已经引起国际无产阶级的兴奋。然而这个红军还是薄弱的，还是组织得不充分，还没有充分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现在红军的社会成份还是不能满意得很。许多红军之中，旧的军阀军队里的兵士是占多数。富农钻到了红军里来。现在的红军，应当变成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工农的军队。苏维埃，工会和贫农团，应当共同努力，去使红军之中充满了贫农苦力群众，红军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主要的指挥官，要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不能够忘记红军军事技术上的弱点。红军的武装不好，军火很少，炮非常之缺乏等等。这种情形，使占领最大城市，猛攻帝国主义的现代军队，征取最大中心城市——还不是红军所能胜任的。经验已经指示出来：占领长沙和进攻汉口，对于现在的红军，还是力量不够的任务。这种情形是能够变更的，而且一定可以变更的，然而应当计算到现在的事实，应当清醒的估量力量的对比，而定出自己现实的任务。

第六，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总方针之中，发生许多其他的错误。说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示威罢工和经济政治的战斗，这种说法，事

实上用“左倾”的空谈，遮盖机会主义的消极。最近，党对于经济战斗的注意力削弱了。党看轻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赤色工会的工作，黄色工会内部革命派的工作，也削弱了。真正群众的真正斗争，被全国范围之内到处去“自动”开群众大会的政策代替了。不去真正组织和准备阶级的政治罢工，而在四月里号召四次总同盟政治罢工，五月里号召五次总同盟政治罢工，并且没有相当的组织和准备。党和青年团的支部合并，赤色工会也专去准备暴动了；这些，自然使党和工会的工作散乱起来。这样，仿佛革命的时候，党，青年团，工会的单独组织都不需要了，仿佛革命要从取消青年团，工会和党来开始。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遮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这是立三同志的一条政治路线。国际执委认为这条路线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所以指斥而纠正了他。这条路线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而可以引导到极危险的冒险。这条路线是和国际执委的路线互相对立的。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共同定出的路线之中，认为现在整个环境所要求立刻实行的主要实际任务是：

(一)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农红军，即使最初这种红军只有四万五千到五万人，他的社会成份应当是工农的，主要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着，要有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指挥者，要有铁的纪律。这种红军，要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应当有巩固的物质基础在一个或者几个苏维埃区域之中；这些区域就应当是革命的根据地。解决这个任务，现在是不能够丝毫迟缓的了。党内最好的力量，应当集中起来立刻解决这个任务。

(二)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共产党员占多数而吸引最好的非党工农兵士参加。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

命的根据地，而依据着红军。苏维埃政府规定并且公布自己的政纲，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政纲，开始实行自己的政纲，用事实表现给劳动群众看：苏维埃政权能够去掉帝国主义和地主而创造新的生活。实行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极端的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建立新的国家机关，勇敢的推选工农来参加，建立群众的组织（工会，贫农会等等），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些，都应当能够团结苏维埃区域几千万的工农群众在苏维埃的周围。

（三）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苏维埃区域之中实行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组织群众。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并且在这斗争的过程之中去组织群众。中国共产党应当明白：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不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忽视工人的日常需要和要求，忽视农民的日常需要和要求，这在客观上是帮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没有相当的前提而玩弄武装暴动的口号，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群众也是很少帮助的，不去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而玩弄政治罢工的口号，也是一样的。说工人只要暴动不要别的，这种理论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即使他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也不会成为革命的理论。必须动员群众去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增加工资的问题——正当现在银钱跌价，物价腾贵，资本进攻来减少工资的时候；工作时间的的问题——正当现在苏维埃区域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之后；社会立法的问题——正当苏维埃实行这些立法之后；失业津贴的问题——正当现在失业增加的时候；还有劳动条件，工人待遇以及一切关于工人的问题——都可以并且应当成为斗争的出发点。现在工人武装队的问题，当工人群众看见红军正在生长的时候，自然和以前更不同了。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赤色工会的扩充会员，共产党的征收党员，可以并且应当比以前不

同的去进行，因为苏维埃的胜利，以及一般政治经济环境，都提高了工人的斗争情绪。同时，必须开展暂时还不是苏维埃区域的乡村之中的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骚动像一个箍的一样的去围绕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组织军阀军队里的我们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去捣乱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去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够准备工业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动，用暴动起来的工人和红军占领这些城市。每一个罢工都是组织群众和准备暴动的一步。每一个罢工都是对于苏维埃区域现实的帮助。建设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政府，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是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主要的枢纽，要抓紧着去干。

并且，国际执委认为对于帝国主义者不但可以，甚至于必须应付手段。我们预先警告过中国共产党，说明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居的幻想，是有害的，危险的。但是，同时必须尽我们的能力，去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去削弱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联盟，去避免我们巩固以前的决定胜负的冲突，去推迟和帝国主义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同时，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十倍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动员和宣传工农群众，领导农民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全国性质的任务。

这就是国际执委路线的主要点，这个路线是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完全同意的规定出来的。

只有那种完全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没有丝毫相同地方的人，才会解释这种路线是退却的路线。中国共产党执行这种路线，不是退却，恰好相反，正是进攻呢。任务并没有降低，恰好相反，正是最具体现实的革命的決定胜负的任务。暴动的方针是定出来的了。应当用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和彻底性，列宁主义的顽强性，去准备组织暴动。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一定要去宣传，团结，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阵地上去。不用“左倾”的空

谈暴动，而要切实的努力工作，以准备组织暴动。不能有消极的状态，而要有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群众工作。不应当提出力量不够的任务，而努力去实行革命的最重要的现实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满意的接到通知，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已经接受这个路线，而纠正了立三同志的原则上不同的路线，希望全党都能够接受国际的路线。国际执委期望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中国队伍，彻底实行国际执委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国际执委完全赞成远东局的反对立三同志的方针和提议。国际执委以前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指示，完全是继续有效的。国际执委特别注意：必须坚决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国际执委认为现在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然而，必须对于所有积极的党员，完全明白的，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质，解释立三同志的方针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团结党员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

这尤其是有必要的原故，是因为立三同志的发言之中，有最危险的精神。立三同志竟用了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所用过而已经被打碎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他竟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说占领武汉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不能不引导到这种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

国际执委深刻的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抵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定完全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一致的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

(1930年11月25日)

政治局讨论过国际来信之后，决定：

(一) 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

(二) 认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以正确的估量。——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领导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

(三) 认为：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在过去，这种调和态度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四) 这种情形，就使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的各个反对列宁主义的论调，没有受到必须的充分的批评。例如对于立三同志对于策略转变问题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只批评他是机械的。

(五) 认为必须根据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根据政治局的本次决议，根据国际执委的来信，对于全党党员解释立三同志半托洛斯基路线的实质，解释这种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互相对立的——公布上述的材料和特别发一告同志书。

(六)认为现在要集中全力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和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这种情形〔是〕立三同志半托洛斯基主义理论的基础，现在“左倾”空谈的掩盖去掉之后，这种情形就特别的暴露出来。同时党应当加强反对托派的斗争，因为有些托派分子现在企图回到党内来加紧破坏的工作。

(七)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认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企图，——就是想把三中全会的议决案以及这次纠正立三同志的路线，解释成为改换党的路线——变成了退却的路线。同样，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

(八)立三同志以及赞成过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完全和共产国际执委同意，这些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的实际任务，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解释工作之中，仍旧是须要各同志的详细的讨论）。

(九)认为团的三中全会在少共国际和党的领导之下已经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正确路线，同时，团的三中全会的决议之中，有些地方的措词是和少共国际来信不同的（对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彻底揭发，对于取消团的主张，没有认清是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问题）。政治局认为团的中央必须把过去的错误路线，遵照着这次决议和少共国际来信彻底的纠正。

(十)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所以用通信方法询问所有的中央委员，是否同意，并且把这一决议报告国际执委。

一九三〇、十一、二五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央决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骥 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1930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在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发表之后，立三同志的路线在中央已居了领导地位。这一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他的出发点是从否认世界革命发展不平衡，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否认中国革命应争取首先胜利与保障首先胜利，否认中国革命应从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为起点，因而他曲解六次大会所指的革命高潮为直接革命形势，不相信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而等待世界革命同时爆发来“持续”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承认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必要而要以不可能的全国到处同时武装暴动来取消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这样，便形成了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当时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韶玉等四同志反对此种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韶玉等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三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与处罚不仅是不应当，并且更抑制了党员对指导机关的正确的自我批评与取消了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而复活六次大会所指斥的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这是立三路线中的组织原则。

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

不调和的立场上，认为过去对陈韶玉等四同志的斗争与处分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

（摘自《党的建设》第1期）

反立三主义要与改造党的 领导机关联系起来

为 人

立三主义，已有它思想上及组织上的系统。在立三主义统治时代，凡夸大空谈虚伪的谎话，都成了党中的革命理论。凡说谎话的人，都成了党中领导机关的干部主要分子。不能这样，便用一切右倾，危险思想，暗探，观念动摇等应有尽有的恶名加在他的头上。

因此，领导了整个党的策略，走上冒险盲动的机会主义；将整个党的组织，变成家长命令委派制度；党内真正的自我批评，完全没有，培养工人干部，只是一句空话，故其结果使党脱离了群众。

我们现在要来反对立三义，和肃清立三主义所造成的这些现象，若只说从思想上政治上揭破它出来就够了，对于党的领导机关仍如其旧，不加过问，结果必走到立三主义在党内不断的重复。很显明的，自国际来信后，中央始终没有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及反对立三主义。三中全会的决议，取巧的表面接受国际指示，实质掩护及保留立三主义，以后的二次决议，也只是三中全会的补充，解释，继续一贯的调和精神与作用。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根本上是不能并存的。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执行国际的路线，其中决没有可调和的存在。要执行国际的路线，对立三主义只有作无情的斗争，决不是如中央的数次决议，什么补充，解释。凡三中全会的决议及其补充，解释，都是要立即取消。从新做过决议，检

查立三主义统治时代的工作一切具体的执行国际所指示的路线。

谁能胜任这种任务？犯了立三主义错误的领导机关，已不能保证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和见信于全党同志。假使过去的领导机关内的同志，不积极拥护和发挥立三主义。立三主义何能成为党内的统治，领导，立三主义对中国党的领导，固然立三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但立三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发挥者，也不能完全逃脱责任，若我们只要立三退出中央领导机关，放弃对党整个领导机关的改造，结果是会彻底的，成功的。由小脚放成天足，岂是容易奏效的事吗？

现在有些同志说：“我们反对立三主义，不是对人的问题，而是政治理论思想的问题。”这话不是完全对的，若我们只专力于对人的问题，不努力于政治理论思想的问题，这当然是不对。若我们完全放弃了对人的问题，放弃了对党领导机关的改造，不管党员的成分和质量如何，不管党领导机关同志的成分和质量如何，这是有害的机会主义的理论。

怎样改造党的领导机关？我主张召集临时非常代表大会，解决之。参加的代表必须是群众工作中的产业工人同志和反对立三主义的先进分子，不然，仍由立三主义的拥护者及留恋者去开什么扩大会，结果是会讨论出立三主义的范围。

在与立三主义的斗争中，在改造党的领导机关过程中，必须防止对党目前工作的怠工，防止拥护立三主义或其他任何小组织的活动。党的铁的纪律，要由立三主义领导的家长制度的污辱中，拯救出来，和在国际路线之下发扬起来。

全党同志！起来！反立三主义与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同时并进！

十二月二十三日夜

原编者按：为人同志的文章是在四中全会前交来的。因为他所提的问题在四中全会后在党内还有许多的争论，所以亦把他发

表出来。

我们认为纠正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和改造党的领导机关两个问题，在扩大的四中全会上已经得了一个解决。扩大的四中全会的召集，是在国际执委的同志和国际代表的直接领导之下所举行的。国际的意见，并没有认为非常代表会议或紧急代表会议的召集是错误的，而是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去召集非常代表会议一定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准备工作，这样一来一定要放轻了。目前党的重要迫切任务的执行，故在国际的直接领导之下召集扩大的四中全会来解决政治问题与组织问题这实在是目前很迫切而适宜的办法，故目前的争论决不应该注意于扩大的四中全会与非常代表会议之争，而应该注意于扩大的四中全会对于党的政治路线是否解决得正当，如果扩大的四中全会能完全接受国际路线彻底的反对立三路线与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便应该在国际的与四中全会的路线领导之下彻底的进行全党的反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的斗争工作，自然，扩大的四中全会如果还有个别的缺乏和错误，我们当然还是要提出来批评并纠正之。

关于中央机关的改造问题，在四中全会上亦有相当的解决，对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如立三，秋白，罗迈，贺昌，登贤等同志均已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至于过去中央委员会内随声附和立三路线的人，当然不能采同样的处置，这些同志在过去固然犯了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但他们在四中全会上已经承认了错误，现在的问题是要看他们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是否能够彻底的纠正过来，能否正确的运用国际的路线。

最后在为人的文章中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便是他没有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整个党的改造问题联系起来，他只注意到改造领导机关，这是不够的，立三主义在党内有他深邃的基础，深厚的根源，要想彻底肃清立三路线，保证中国党不再重复立三路线的错误，只有实行整个党的改造，例如最近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便发

生许多不正当的右倾倾向，这显然是不了解国际路线不能正确的执行国际路线的明证，这种倾向，无疑义的，我们必须号召全党同志来肃清他。故四中全会的举行，只能说是中共中央坚决的正式的反立三主义，反调和路线的第一步，是整个党的改造之部分的开始，要想彻底的肃清中国党内的领导机关中的立三路线调和路线，彻底的完成整个党的改造，这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在这一个斗争的过程中，坚决的执行国际的路线无情的揭发立三主义调和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危害和影响，在党的组织系统，工作方法，党的传统精神上实行彻底的转变，积极的准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使整个党的改造在七次大会上能得着一个彻底的完成，这无疑义的，是目前中国党内每个同志应该万分注意的问题。

同时，也只有这样，才真能算是正确的继续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斗争，正确的运用国际路线进行整个党的改造工作。

一月十四日

（录自《党的建设》第1期）

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国际路线

泽 民

李立三路线的领导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使中国共产党陷于严重的危机。在事实的打击和共产国际的严重干涉之下，中共中央召集了扩大的全体会议，这就是所谓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的一个步骤，但是由于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所以仍然不曾把党救出危机。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领导之下，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仍然不能得到转变，而李立三路线的实际依然继续。

自从十一月十九日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的来信以后，中央政治局经过几次会议，终于发出了“为反对和肃清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的告同志书，指出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错误，向全党同志解释立三路线的错误所在。然而三中全会的影响实际已经普及到全国各级党部去了。并且告同志书本身又仍然陷于调和主义。这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上，已经指出来了。为要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和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情绪，中央党报不得不在指出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性以外，详细分析三中全会的路线的错误，使全体党员像一个人似的起来拥护国际路线的实行，消灭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

关于立三路线的领导怎样在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候实行冒险盲动的策略，布置全国总暴动，使党几乎完全脱离群众，干部受到极大牺牲，并且使党自身和党在各群众团体内的工作方法工作系统受到极大的影响——都照着李立三的方式去布置去了

——关于一切这些，现在不详细去分析。关于立三路线所产生的这种策略有怎样的整个理论系统为根据，见社论和其他各党报的文字，也不详细来说明了。现在只说三中全会决议案的本身。

三中全会决议案一共有政治决议，组织决议，职工运动决议案三项，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政治问题决议案。当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发展到了那样狂妄的程度以后，当六月十一号政治局的决议中，李立三的路线成了政治局的路线。而中央政治局于是走到了反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后，为“接受”国际的路线而开的三中全会的所有的决议案中，竟不但对于立三路线和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上的错误一字不提，不但连李立三同志的名字也影子都没有，并且在政治决议案中反复的加以肯定，说：“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①，“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的决议案，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因此要求全党来“坚决彻底执行”这“国际和中央一致的路线”^②，于是说“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是变更党的路线。”^③等等。在如此等等坚决的肯定之下，三中全会就把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混淆起来，而成为调和主义的路线。这种调和主义的路线实际上是肯定立三路线为正确的路线，是在国际路线前面掩护立三路线，是用卑鄙的虚伪的辞句去取消国际路线，不使中国党员群众认识国际路线。站在两条路线前面，没有中间的调和的余地。路线上抱调和态度，结果必然帮助立三路线的成长和发展。

关于这一点，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发出的告同胞书内已经指出

① 中央秘书处印发“三中全会文件第六号”“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第三章第九节“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一致的总的政治路线”；原文第四页。

② 同上第十节：“中央全体会议对于过去错误估量的纠正”；原文第五页。

③ 同上第十一节：“反对动摇党的路线”；原文第五页。

了。“到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此引号是我加的——作者)共产国际的路线,但这还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去接受并且更没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混淆了互相对立不能并存的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因此,遂不能彻底执行国际路线,反而对于立三路线加以辩护——所以仍旧是不正确的了”。^①但是三中全会决议的错误他却不只像告同志书中所指出这一点。三中全会并不是在一切其他的地方都接受了国际的路线,而仅仅在路线两个字上把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混淆起来。不是的,三中全会既然否认了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同时又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几个根本问题上离开了国际的路线,依然站在立三路线的立场上讲话。不过措辞的形式略为巧妙一些,隐蔽一些罢了。告同志书不能详细揭发三中全会的错误,不能具体的提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的任务,是他成为调和主义的文件的主要原因。下面逐一举出这些问题来看一看:

(一)第三时期的了解。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的了解是不正确的。他像国际的右派和托洛茨基派一样,第三时期看做与资本主义总危机完全同样定义的东西,而不明了第三时期是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中的一个最后的时期: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由剧烈动摇而至于完全破坏的时期。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写政治决议案,首先就应当对于这种错误观点给与驳斥。

三中全会没有这样做。放着许多别的决议案不抄,他偏偏抄了联共第十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在那个决议案上是没有特别指明第三时期的。说是抄了联共的决议案就不会不对么?当然不是的,在没有发生立三同志的曲解的联共,不指明第三时期不为不对,在发生了立三路线的中共,抄了不指明第三时期的联共决议却是有意避开政治争论问题,是机会主义。

^① “告同志书”第十二页。

(二)关于中国革命的内外关系的问题。李立三同志的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就是说，中国革命不能首先胜利，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不能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是不能继续维持的”；但是亦不会最后胜利，因为据立三同志的看法，第三时期的意义等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的意义又等于世界资本主义立刻要灭亡，而且这总危机的发展是没有不平衡性的，只要一处爆发革命那么立刻全世界转入直接革命形势——由于这一套“分析”他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然煽起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必然与世界革命同时胜利。”^①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一章第二节“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一题下面说：“同时，中国的反帝国主义革命，已经是在世界革命的总高涨的情形之下进行，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说只有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利，固然是错的；同样，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掀动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亦是非常之错误的。”^②一个造成立三路线的基本观点，一个使中国党陷于严重危机，一个在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前成为争论的中心点的问题，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仅仅说了这么简单含糊的一句话。对于立三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胜利之可能的观点不加以否认，对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必然与世界革命同时胜利的观点不加以否认，反而用决议去更加肯定这个观点，这就是三中全会依然继续立三路线的地方。

(三)不平衡发展的问题。立三同志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像前面说过，这是他的冒险盲动的策略的“理论”的根据。三中全会既然“接受”国际路线，那么毫不用说应当对于这种观念加以最不容情的攻击，揭破他的机会主义的性质。可是三中全会

^① “红旗”七十六期。

^②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二页。

决议不论在讲国际形势的一章里,不论在任何别的地方,对于这问题却死守了沉默。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成为争论中心的问题,似乎忽然的“忘记”了或者“忽略”过去了。这样,三中全会就用沉默保住了立三路线的这一个最重要的根本观点。

然而不单是在世界革命的方面。在国际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已经针对着立三路线,痛下针破,切实的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之后,三中全会开始来“承认”这个指示。可是他是怎样承认的?国际决议案中说:

“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过程,有他的特殊形式。新的革命高涨首先成熟起来的地方大部分还是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种下根基的那些区域,随后才渐渐的推广到其他的区域里去。……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农民的革命斗争,现在能够胜利的,还只不过在南部几省发展着……”^①在这里,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不平衡,农民运动本身在各区域中间发展的不平衡,工人运动在各工业区域中间发展的不平衡都指出来了。但是三中全会却把这个最重要的指示曲解了,因而实际的否认了。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说:“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总的革命进攻的过度时机”^②这句从国际东方部的“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中抄来的一句话,原来是指中国日前时局的,他去移来装在讲革命高涨的特殊形式上面,于是不平衡作为一种特点被模糊过去了。翻遍全部决议案,讲到不平衡现象的,只在这里有一句,就是“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衡的现象,有些地方刚在开始农民的游击斗争,有些地方却已经能够推翻当地的国民党政权。”虽然说到“现

①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第一页。

②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三页。

在的事实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没有平衡没有汇合”^①然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不平衡没有指出，各区域间的不平衡没有指出，工人运动自身的不平衡发展也没有指出。立三路线的最大的错误之一，用否认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不平衡来作为“布置”全国暴动的“理论”的根据，在这里又被“忘记”了“忽略”了。

至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何在，立三同志“解释”“表面上的不平衡”的原因，说是^②由于城市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秋白同志“解释”成为由党的力量在有些地方薄弱所致——两个人的意见都是实际的否认不平衡现象的存在。但是三中全会不但不曾对这种曲解不平衡问题的“解释”加以驳斥，反而完全沉默过去，不是因为这问题不重要呢？当然不是的，看中央秘书处所发表的关于三中全会的很不完全的材料，就可以知道这在三中全会中亦是一个中心问题，所以这种沉默，亦是保持立三路线的沉默。

把这三点综合起来，我们看见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在中国革命的这几个基本问题上所重复的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怎样的一种观点？很明显的，都是托洛茨基取消派的观点。因为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都保留了托洛茨基取消派的观点，所以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其他比较局部的问题上自然不能“传达”正确的国际的路线。

先看苏维埃区域的问题。

（一）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国际的路线：发展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农红军，在一个或几个苏维埃区域中有巩固的物质基础，这些区域应当就是革命的根据地^③。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把他简

① 三中政治决议案第四页。

② 三中全会材料第十二号秋白同志的结论。

③ 国际决议案。

单化，成为“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苏维埃的根据地，创造并且巩固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以便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政治中心”^①了。这里的错误：第一，把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问题和建立统一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混淆起来，实际是放弃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第二，苏维埃根据地看做“阵地”；因此是从一种军事的观点去了解根据地问题。这里牵涉到。

(二) 红军的问题。国际没有一次来信，没有一个决议案不注意到创造真正的工农红军。他并不像我们过去的红旗报一样，专门吹红军的力量有多大，丝毫不注意红军的弱点。三中全会呢？对于红军系统的“忽视”了。他只在上面所引的一般中说到了那么一句话：“创造并且巩固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这句话是看去很漂亮的，却是错误的。第一，这里应当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工农红军可以被巩固起来。第二，“军事上政治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很容易被解释成为有共产党员当指挥官的，有权力很高的党代表的红军；这样的红军还并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实际的情形是现在苏维埃区域大部分的红军是由国民党军队转过来的军队所编成，有些军队甚至连军长都是原来的，一点没有变动。这些军队的成分，多半虽是农民出身，可是大都脱离生产已久，不能算做真正红军。在这种条件之下，而讳言创造真正的工农红军，用创造并且巩固军事上政治上有坚强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去代替这个切要的任务，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畏避艰难的任务，怕敢动摇这些红军首领对于中央的服从，是国民党方法的残余。

^①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七页。

(三) 土地问题。国际指出应当没收地主土地，平分一切土地。^①这个路线有深刻的意义：没收地主的土地是因为要消灭地主阶级，同时平分一切土地必须将富农的一部分土地平分给其他农民，是动摇了富农的土地私有权，但是并不消灭富农这个阶级。只有这样，才能够打击富农而不损害中农，不超越革命的阶段而能彻底保护富农贫农中农的利益。过去在李立三领导之下的中央政治局在文件中只说了要平分没收来的地主土地；现在三中全会在国际的指示之下抄国际决议案，却把他抄成了“坚决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②这样模糊不清的决议怎样可以去指导苏维埃区域的土地革命？

(四) 决议案中没有提出苏维埃区域中组织阶级工会的自由的问题；把国际所指出的实行保护劳动的最小限度，变成实行最小限度的劳动保护；毫无限制的承认了在苏区中实行以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抄录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而抄错了的^③。

现在在苏维埃区域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党对于土地问题，经济政策，没有明确的答复，对于组织工农红军没有坚决的去执行，对于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有了不正确的了解，一切工作都把重心放到军事行动。这些实在都是立三路线在实际政策上的表现，而三中全会在这些问题上都错误了，口头上承认了国际的路线，而实际却继续看立三路线。

城市工人运动里的任务。在这一个问题上三中全会亦给了不正确的答复。

(一) 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 李立三路线在这个问题只是完全

① 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的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论李立三路线的信。

②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五页。

③ 同上。

放弃经济罢工斗争的领导，专门去“发动”政治罢工。国际指出了正确的路线：“党应当去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战斗……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方针。”^① 三中全会都把重心颠倒了过来，说：“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就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因此，必须努力加强对于日常部分的经济政治战斗的领导”^② 这样，依旧回到立三的路线上去了，就是口头上将政治罢工联系到经济罢工，实际都把经济罢工放在次要的地位。

(二) 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 国际作这个指示，意义是说他们要不问工人属于那一党派，受那种黄色职工会的领导，应当在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中将他们争取到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加入赤色工会。所以“党要加强自己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的工作，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③ 李立三路线完全否认了下层统一战线，三中全会继续的不了解或不愿了解这个任务，政治决议案中仅仅指出改组派，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等等的活动，然后说：“要之更加加紧对于这些派别和这些分子的斗争，争取群众自发运动的领导，主要的是在政治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争，尤其是在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在这里下层统一战线被解释成为“政治上解除改良主义派别的武装”的策略而“争取群众”的总路线的反被模糊起来了。什么是“政治

① 七月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案”第三页，第十七节。

②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六页，第十五节。

③ 七月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案”第三页，第十三节。

上解除改良主义切能^①的武装”？那是一个工具，使我们能够夺取群众的；为什么要解除他们的武装？为要争取群众，把“政治上解除改良主义的武装”来当做目的。而同时不提到组织的任务，这是实际上否认了“下层群众统一战线的方针”。

（三）这种错误观点是和对于黄色工会的错误策略紧密联系的。国际的决议案中提到统一战线就提到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的工作。因为不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统一战线是一句空话。党在立三同志的领导下，从来不注意黄色工会的工作，而三中全会决议全文系统的忽略黄色工会的工作，在上面所引述的“下层统一战线”一条中更完全搁下了黄色工会的问题。把争取黄色工会群众的问题简单化到仅仅成为暴露黄色领袖的问题。这显然是依旧脱不了立三的影响，不曾明了国际的路线。

三中全会对于反动区域的农民运动的决定也是不正确的。所有的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中，没有一个讨论到这个问题。在偶然牵涉到的地方，依旧是组织地方暴动，或者是起码一开始就做游击战争，而领导农民做日常斗争完全被漠视了。其结果使各省做农民运动的同志依旧做盲动的行动。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后解决河南省同志们的领导问题，依然不正确。对于主张“布置暴动”的同志不能切实批评，而对于有正确主义，反对布置暴动的同志依然加以处罚，这里很明显的亦还是立三路线的继续。

三中全会在这些主要的群众运动的策略路线上依然不能对李立三路线加任何打击，依然在比较隐藏的形式下面去保持李立三路线，自然就造成目前党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得不到真正转变，而（甚至在上海）李立三路线依然是在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中统治着的现象。

群众工作既然是放在不正确的基础上，党自身内部各方面自

^① 原文如此。疑为“派别”。——编者

然依旧会保持立三路线之下的一切现象。最严重的就是。

(一)三中全会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家长制的领导。李立三路线在许多地方是以陈独秀主义做根源的,陈独秀所遗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部遗产——党内家长制领导,在立三路线之下更充分的发扬起来,中央政治局逢有提出反对意见时,党立即加以严重的处罚。当中央政治局在八月间实行全国总暴动的“策略”时,陈绍禹等四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因坚决斗争的缘故,受到严重的处罚,由此造成极严重的现象,党员群众明知立三路线下的种种“策略”“行不通”但是不敢说话。党的文件被领导者称为“圣旨”,只可以建议,而不可以不同意的。党员所受工作的掉换,不依照党员的能力与工作上需要,但凭上级地喜怒。工作的进行不经过正当的组织上的手续,但听监督者的随时指挥,下级的决议和提议上级随便搁置,或不加以答复,而上级的决议或指示不许有任何讨论。对于这样严重的现象,三中全会一字不提,这就使^①。

(二)自我批评的破坏。在党内家长制领导发展着的地方,自我批评当然不存在了。的确,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便是三中全会没有实行自我批评的明征。然而在三中全会的各种决议中却都一致的说三中全会已经实行了自我批评。意思当然是说中央第一次在自己的决议案上承认了一些错误。于是只要是被迫承认错误,就成为自我批评了。这种了解完全是家长式的了解。^②由于这样的曲解自我批评,“自我批评”这个名词自然不再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的主要工具,不再成为党的正确路

^① 原文如此。——编者

^② 中央直支干事会所发的文件中有这样的字样:“自我批评”“相互批评”意思就是说:自己专说自己的错处就是自我批评,若说到别人的错处,就是“相互”而不是“自我”批评了。这种奇怪思想与上述家长本式的了解自我批评是一贯的。只有个人,不知有党,以致不知自我二字是指“党”而言的。这真是标本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

线的保障，而恰恰相反，成了维持党的不正确路线——立三路线——和党内一切恶劣现状的主要工具。“自我批评”这个名词被用做消灭自我批评之实质的工具。三中全会决议案中说“从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国际和党的路线上观察批评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别方面要防止调和主义精神的非布尔塞维克的“自由批评”离开党的路线甚至攻击党的路线的批评”^①对李立三路线调和的三中全会却要用“自我批评”的名义去限制自我批评，不许对于她自己的错误路线说话，一说话就是“自由批评”甚至是调和主义！一切都颠倒了！这就是李立三路线破坏党内自我批评的实际状况。

在这种情形之下，党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任务自然不能执行，而反左右倾及调和派的问题亦恰如自我批评一样弄得完全颠倒过来。党内斗争再不成为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而恰恰相反，成了李立三路线的统治用尽全力与搜罗出党内一点点存留下来的布尔塞维克种子，去将她们消灭净尽的斗争。试看三中全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三中全会自身向着用左倾的辞句掩盖着右倾的消极的立三路线调和的缘故，因为三中全会自身在许多重要的根本的问题上是站在立三路线上的缘故，所以这种“解决”是不可能的。前面所指出的三中全会许多用左倾辞句掩盖着的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的错误，在左倾的帽子一旦揭开以后，怎样成为系统的右倾的路线，在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中自然不能被揭发出来了，于是被指为“整个右倾线”而揭发着的却是取消派的路线而不是右倾的路线。政治决议案中说：“这种右倾路线是（一）说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中国革命是空话，而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是实在的力量”，所以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二）说城市工人没有

^①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八页。

革命斗争,没有同盟罢工的可能,只能实行日常的经济的小斗争;(三)说农民的斗争,因为没有工人革命斗争起来,所以不能成为什么大的力量,说农民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四)藉口发展不平衡,否认世界的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潮(否认“第三时期”),否认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总危机,和总的革命高潮;(五)因此认为不应当有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①——像这类的观点难道不是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的观点么,这些观点已公开的否认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成为纲领上不同意的问题,是党外的取消派了,为什么三中全会还认他们是“右倾”的观点呢?共产国际和联共认为右倾比这类取消派观点要不同的多。不必说工人没有力量,农民部落式暴动,只要像三中全会自身的决议案中对于革命根据地问题露着不相信农民群众的力量,希望由军事取得胜利的倾向:不必公然否认第三时期,和“世界的总危机”,“中国的总危机”,只要像三中全会一样把第三时期与总危机混淆起来,否认中国革命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希望中国和世界革命同时胜利,已经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了。把取消派的观点当作右倾打,自然火力就打不到右倾,而右倾成为“党的路线”,自然谁要是依照了国际路线来批评领导的错误时,他就成了“动摇党的路线”;同时三中全会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实质是用立三式的左倾辞句掩盖起来的,那自然凡有批评三中全会的路线的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或“调和主义”的路线了。这样所以三中全会虽然口头上同意国际实行上却不同意国际路线并且对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加以无情的打击。

这样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当然非常危险,如果不及早纠正,其结果非弄到第二个八七会议不止。这样的“同意”国际路线,自然不会长久,如果不及早纠正,其结果非再像三中全会的

^①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九页。

前夜一样公开反对国际领导不止。

实在的三中全会几乎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都对于国际路线加上保留二字，既有这样的实际，就决不能在口头上完全同意国际路线。因此，口头上的“同意”国际路线，在三中全会决议中并没有写得那么明白，三中全会前夜不同意国际路线的立场，在决议案中用了比较隐藏的情形保留着。试看政治决议案第三章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立题方式吧：

题目先不妥当了：叫做“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现时革命情形的正确估量”表面看，似乎是没有毛病的吧？是的。但是这种措辞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国际的估量全是正确的，（二）是国际的估量之中有正确的部分。三中全会究竟是采取的那一种解释，全看他下文的措辞。下文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估量中国革命运动说：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最近期间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包括到整个中国，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省份的地域”不过是“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武装暴动的情形）。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总合起来，这些运动还没有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然而“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新高潮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①不说对于国际的指示全部同意，而只将指示中几句话摘下来，说对于这种指示完全同意。这样的方式去承认国际的指示，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大会以来到现在不会有过的，是共产国际下面一切兄弟党的历史中所不会有过的，这是有条件的承认，外交式的承认，是实际上的否认。何以不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过去的路线完全错误，何以不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全部

^①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四页。

正确，尤其是某某某某几点上我们过去路线完全错误，应当用全力去纠正，在这里指出自己所有的严重错误来？何以不用这种诚实的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去承认国际的路线而用那种外交态度？因为路线上是不同意的，因为要避免直接与国际冲突而暗中保持立三路线。然而犹不止此。

在同一决议案的末了附带着一个“注”，这个“注”中大意说过去把“高潮”二字习惯了用作“直接革命形势”而“高潮”与“高涨”极易混淆，所以此后高潮二字应当废除。而代以“直接革命形势”这个名词。注中虽这样说，可是六次大会决议案中却依旧写着高潮二字，于是如果把直接革命形势数字到处代进去，那么三中全会所承认的国际指示中“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等等辞句都变成“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直接革命形势”了么？这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混淆国际的指示？这是一。此外，注之中又说“直接革命形势”一字，此次国际决议案上称之谓“客观革命形势”且为之解释说以后应当用列宁的名词“客观革命形势”而“马鲁依可斯基同志最近的解释：“直接革命形势”是以前齐诺维也夫所用的，也有不妥当地方。^①岂不是奇怪么？列宁全集上用“直接革命形势”的地方不知有几千百处，而三中全会忽然说这是齐诺维也夫所用的不妥当的名词。这岂不是明欺党员群众不懂俄文，和看不到国际决议的原文？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作为立三路线者对国际路线的顽强抗拒来解释，是客观上最确切的，因为“直接革命形势”原是全客观主观条件在一起来讲的。有列宁的最明了的定义。而客观革命形势却可以拿随便一个客观事实，如军阀战争，国民党政府的斗争，或经济恐慌等来说明“客观革命形势”已经具备，又可以“布置全国总暴动”了。这个名词实在是橡皮性的，随时可以把立三路线的内容贯注进去。我们不能说

^①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十页。

“主观上”究竟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也许会用技术上的错误等等“原因”来解释吧），然而“客观上”，在尽查了三中全会的决议全部路线以后，却确定的能够说这一件“小事”暴露着一种立三路线者的政治上的阴谋，反抗国际的路线。

在共产国际的严厉的监督，和全党布尔塞维克党员的一致的反抗之下，现在我们对于立三路线作坚决彻底的斗争。现在揭露三中全会的一切错误，并不是削弱党，却是相反的是来加强党的力量。只有在自我批评的炮火之下将一切错误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他们对于革命的害处完全揭露出来，同时指出正确的国际路线之后，全党的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才能够真正的发展。现在党正在危机中。由于李立三路线继续在实际工作中统治着的缘故，全国党和赤色职工会的组织已经受到可怕的削弱了。上海的党员一千多人，其中大半是学生，湖北武汉三镇的党员只有七十多人，天津只有二十多人，余类推，全国党员除苏维埃区域以外，只有五千人左右。赤色职工会的组织日趋衰弱，最好的上海组织。在三个月内会员数从三千多人降到七百多人。这种极严重的现象断不是用客观原因所能解释的，原因是由于党的领导路线错误。现在中国的经济危机日益紧迫，反动统治的危机亦跟着日益发展；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过程中，中国的客观环境使革命高潮日益前进。因此敌人作最后的拚死斗争来向我们进攻。武装进攻苏联的积极准备，蒋介石亲自督师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非苏维埃区域内敌人侦探警察和取消派工贼等的积极活动，都一方面证明敌人殆用拚死进攻去消灭他自身的危机另一方面证明敌人最后死亡期后迫近，我们的决定胜负的斗争快要到来。我们是在历史上最负责任的时期！我们要团结一切力量来做群众工作，完成我们的领导任务。只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用全力来反对立三路线，执行正确的国际路线。

三中全会的决议应当废去，在国际直接领导下的正确议案

应当产生，一切实际工作上的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必须纠正。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丢开了眼前迫切的实际工作来清谈反立三路线，相反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和立三路线斗争，消灭立三路线的工作方式提出国际路线的工作方式来执行，并且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够撤去不可改正的立三路线的干部，换上能够了解和执行国际路线的干部。我们也不是要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消灭党的纪律，各人自由行动，相反的，国际路线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是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只有立三路线才蔑视布尔塞维克的党的纪律“用家长制”的领导去代替他。只有发扬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的纪律，对于离开路线的立三主义者加以严格的制裁，对于立三主义者最初的小组织行动的企图加以严格的制裁，才能够保持中国共产党的一致，使他日益强固起来。现在为路线而斗争的工作方才开始，我们的任务还是重得很；我们要采取过去对陈独秀取消党内斗争不彻底的教训，在这一次斗争一步不放松的做去，把中国共产党造成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政党，完成中国革命的胜利！

(摘自《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1期)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

1930年12月

这讨论还是在去年的十二月间。我们接到这宝贵的文件，把它翻好，把它印好，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直到现在方能够在党报上发表出来。

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以为立三路线的错误，已经由四中全会改正，所以不用再谈。这实是严重的错误。过去我们没有深刻的研究陈独秀主义，没有深刻的研究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以及广东暴动的经验，所以我们后来犯了很多以前所犯的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过去忽视了用我们鲜血所换来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应该在自己的错误中，得到教训。

那些怕谈自己的错误，对于自己的错误除了写些声明书之外，不敢深刻的加以思索与研究的同志，实际上表示出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错误。他们只是在国际路线的前面暂时的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他们只是在等待机会，重新来发表他们思想系统中所能找出的“理论”！

我们对于这些倾向，必须给以严重的打击！我们在下一期日报上，还要发表立三同志自莫斯科寄来的声明书。希望同志们给它以正确的批评，尤其是那些对于立三过去的错误，同样负有重大责任的同志。

编者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

立三报告：

我已经讲过了东方部的书面报告，并且参加了东方部的几天的讨论。我对于东方部一切指示，都认为正确的。

关于我的错误，具体材料东方部的书面报告已经充分的说到了，我不重复了。我只来分析我的错误的思想上的根源和历史。东方部讨论之中所提出来的批评，不但对于我个人是很大的教训，并且对于中国全党都是很大的教训。这种讨论和批评以及东方部所指出来的路线，对于中国党和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从六月到九月中国有军阀混战和一般的政治经济危机互相联系着。同时又有革命的高涨。革命高涨第一个表现就是农民战争的发展，农业危机的深入，和苏维埃运动的扩大。

一百县的苏维埃区域，扩大到三百县。小小的游击队变成十万的正式红军。工人运动亦渐渐的由经济斗争进到政治斗争。兵士运动变成了军阀的兵士直接投到红军里面来的形式。这个时候，党的发展是很大的，举几个事实：我们党已经有红旗日报，消一八〇〇〇份，单在上海就有一二〇〇〇份，都是消到工人群众里面去，所有这些情形证明那个时期中国的确有革命的高涨。如果中国党有正确的领导，那么革命运动可以有热烈的发展和胜利。可惜当时我的领导作了严重的错误，把错误的路线和国际路线对立起来。这种领导和列宁主义完全没有相同的地方，因此，就是因为中国党不正确的领导，就是我的领导，所以使中国革命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的错误特别表现在六月十一号的决议案，然而在这个以前，错误已经是有了，再者在实际工作上的错误就是要组织南京武汉上海等等的暴动。

我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估量中国革命形势不正确。我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了解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不平衡，我以为工农运动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是他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因此

我认为工人运动不但已经反对国民党，而且可以组织暴动夺取政权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经济斗争一定带着反国民党的性质，然而决不能够说那些斗争已经是纯粹的政治性质，而且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方针，所以我认为上海南京其他大城市之中，工人运动已经激烈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可以直接武装暴动了。我有过这样一个意见，以为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总同盟的政治罢工应当和武装暴动直接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准备总同盟政治罢工，同时准备武装暴动，这是一方面，别方面当时在南京和其他城市的军队里面有我们共产党的影响，所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可能的。我想既然总同盟罢工可以转到暴动并且又有红军，那么必须立刻准备武装暴动。因此我以为只要提出一个武装暴动的口号，就可以动员工人阶级了。我们忘记了领导日常的经济斗争。这种错误的结果，就是党脱离广大的群众，我们既然认为中国已经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且武装暴动不但是一个政治上的要求，并且要作组织上的准备，所以我们不但组织上去准备，并且技术上亦去准备武装暴动，事实上我们的注意就完全集中在组织上和技术上而忘记了政治上的准备暴动。当时我们注意组织红军，而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对于职工运动的方法亦是不对的。当时职工运动的任务应当是：组织经济斗争，组织罢工运动，领导经济的政治的斗争，领导广大群众到我们影响之下来。然而我们那个时候，这些要紧的任务，并没有提出，实际工作也没有作，而只有一个空洞的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忘记了争取群众的紧要任务。我们错误是：武装暴动，单有政治上影响是不够的，还应当有组织上的巩固。我们那时以为中国党已经有很充分的广大的政治影响，所以虽然组织上的影响不大，然而已经可以去直接武装暴动了。当时领导同志的意见，以为革命斗争爆发的时候，在很短期间就可组织很广大的工人群众和革命群众。整个的方针是这样的，就是以为革命斗争是可以任

其自然的，只要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只要有党的政治影响，主观的薄弱是不重要的，党的组织上的巩固亦是不重要的，巩固群众组织亦是不重要的等等，这都是机械的了解，这是客观的自然论，这种客观的自然论，不管领导群众斗争的主观动力，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

第三个错误是我们不但不懂得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并且我们亦不懂得工农运动的发展亦不平衡，不懂得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以为一般的经济危机之下，群众革命斗争是到处一样的，假使一个地方已经有了直接革命的形势，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有直接革命形势。当时我们以为不但要在南京组织暴动，并且可以在武汉天津北京广州等等大城市组织暴动，这是因为我们的意见认为一个地方有了革命的形势，可以直接发展成功全国革命的形势，因为不懂得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我们也就不懂得国际必须巩固根据地的指示，有了这种根据就可以成为发展其他地方革命运动的主要出发点。我们不懂得这个根据地的意义，我们不懂得为着在别的地方发展革命运动，还要有长期的过程，就是残酷的革命斗争和国内战争的过程。我们以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到处一样的，所以我们不懂得革命根据地的意义，自然也就不懂得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意思，我们以为既然全国革命形势是一样的，那么一定要等到我们占领了大工业行政中心城市之后，然后才组织革命政府。因此我们亦就不懂得巩固红军的意义，不懂得要创造真正阶级的红军。我们只想红军不断的进攻，因为全国既然有革命的形势，那么红军的不断进攻自然是应当的，而忘掉了巩固红军，改良红军成分，加强红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任务。这也是反对国际路线的。

第四个错误是我不懂得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我不懂得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且不懂得资本主义的各国里面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我以为国际革命运动很快的就要高涨起

来，一直向上发展，而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应当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动机。中国革命运动的爆发，应当直接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这种估量是和准备南京武汉等的暴动相联系着的，和蒙古问题，苏联政治问题亦是相联系着的。我不懂得反对苏联的战争危险，我以为苏联应当采取对于帝国主义国际的进攻政策。别方面我过分的估量中国殖民地的地位。我以为中国的革命高涨是被帝国主义压迫而引起来的，所以如果世界革命不胜利，中国革命胜利的机会就没有。我以为没有全世界范围之内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以为单是中国的工农的力量，而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没有全世界革命运动，中国革命是不能够胜利的。这个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对于国际是早已解决的问题，我的估量和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的估量是一个样子的，而列宁对于这种估量已经屡次批评过了，而且中国的情形比俄国一九〇五年的情形还不同。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定要引起群众的革命运动，一定要发动中国极广大的革命力量。斯大林同志说，帝国主义对于印度的压迫一定要更加推动印度的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然而我没有了解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不但不能够征服革命运动，而且他要引起中国工农群众的极大的反抗。关于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国外条件，我亦不懂得中国革命有一个优点，就是现在已经有无产阶级苏维埃的国家。所以这些都表明我的错误是托洛斯基的错误，我的错误是在中国翻印的托洛斯基主义。

第五个错误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说要到全国范围之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一种观点是说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部分胜利已经就是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什么地方胜利，什么地方就转变。然而我提出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直接就是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观点是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我不了解这个

问题,在共产国际党纲上已经说明,在中国这一类的国家里面,因为经济状况的原故,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应当要经过好些过渡的阶段。对于这一点我是没有了解,因此我就走到了托洛斯基主义的了解。对于转变问题的理论上的错误影响到了苏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法。苏区里面自发的发生集体农场和苏维埃农场的运动,我们认为应当赞助这种运动。在第一次苏区会议的议决案上面说,我们应当发展集体农场和共耕。我这个错误的确是和转变问题的理论错误相联系的,我的错误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有很大的反应。在赣西南鄂东北这些错误现在中央已经去纠正了。再者我在土地问题上还有一个错误,就是对于富农问题的错误,这是中央的总错误。当时中央以为中国革命之中应当和富农联合,这个错误现在已经纠正了,但是还有好些影响,这种关于富农问题错误的残余,还反应在苏区第一次会议的土地暂行条例上。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很明显的:我的思想上的错误是托洛斯基主义性质的错误。我对于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之关系,对于革命转变问题,对于土地革命问题的意见,都有纯粹托洛斯基主义的性质。此外,我还有一种不要组织的理论。结果就形成不正确的冒险盲动主义的路线。我既然有了这样半托洛斯基主义冒险盲动主义路线,我的确不了解国际路线的正确,而且我反对国际路线。今年六月到八月之中,中央政治局是我所领导的,我领导他反对国际路线的执行。这是在国际纪律上不可容许的。我用我自己的不正确的路线,和国际的正确路线对立起来,不执行他的指示。

三中全会对于我个人的错误是抱调和态度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这次东方部的书面报告。我现在深切的了解:三中全会把两条路线——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弄模糊了,认为这两条路线是一致的。三中全会没有纠正我的错误,——这些错误在实际工作上,在许多策略上,是做出来了的。因此,三中全会不

但对立三错误调和，而且没有执行国际所给的指示，没有站到正确路线上去。三中全会没有实行路线上的转变——没有从不正确的盲动路线转变到国际路线上去。而且三中全会对右倾错误也是调和的。许多右倾错误的极危险的表现，如富农影响等，三中全会都没有给以打击。一切火力都只集中在何孟雄一个人身上。他的确有右倾的错误，然而因为他批评我的错误，因此就责备他右倾——这是不可以的。中国党内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是公开起来反对我的错误的。根据这一点来责备他右倾是没有理由的。

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清楚的规定现在时期党的任务，尤其是关于几个实际问题。没有估计实际工作的教训。如关于长沙事件，关于罢工问题，三中全会是采取了调和的方针，因此亦不能够正确的指导实际工作。所以三中全会一方面对于一切倾向表示调和，别方面曲解国际的路线。

现在说一说组织问题。六次大会之后，中央的组织路线，是和我的错误密切相关的。我们机械的了解了党的纪律。我们禁止自我批评，禁止对于政治问题的自由批评。譬如你们知道的“北方问题”，当时因此而不正确的开除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然而，江苏问题解决之后，比较的有了正确的方针。而在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们在组织问题上又走到了不正确的道路上去。当时陈绍禹，秦邦宪，莫斯科回去的学生，批评六月十一的决议案，中央就对他们做了组织上的结论。这些错误继续到现在。党实行党部的军事化。党部军事化只有在暴动的时候可以用。军事化的口号在现在的应用，是表现极不正确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是和我政治上的错误密切联系着的。取消青年团和工会，把一切工作集中在狭隘的中央，这亦是不正确的组织路线。虽然对于有些组织上的结论，我曾经反对过，然而因为整个组织路线是和我的政治错误联系的，所以我应当对组织工作负责任。

最后，我要说一说党内小团体。东方部的书面报告说党内有

不健全的两面派的小团体现象。我直到今天才明白这句话。秋白在莫斯科组织自己的小团体，而进行了无原则的国民党式的反党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共产党内是不可容许的。我应当确定的声明：立三主义在理论上是和秋白主义相同的。无疑的，我是在秋白影响之下。然而我申明：我和秋白的小团体是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的。因此，大家不应当怀疑我。我要求国际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让我做一个详细的报告，说明党内的小团体和小团体的关系。我应当很郑重的很忠实的报告你们。秋白同志理论上思想上对于我的影响是从五次大会开始的。然而我反对小团体反对无原则的国民党式的反党的小团体精神，是屡次反对过的。我曾经反对过国涛，和森或者秋白等等的企图组织小团体。我坚决的反对过他们的。不但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亦是如此。为什么我对于这个问题这样郑重呢？因为，党现在由于我的错误的关系，正在极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不及时救济，那么，可以弄到完全崩溃以至亡党。我因为认为反对一切派别精神的斗争是实行国际路线的重要条件。而小团体的形成，党内纠纷的发生却有很好的基础。第一，我两年以来在中央做工作，党的工作都在我个人影响之下，而且我的路线曾经和国际路线对立。如果我所影响的同志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就要发生无原则的小团体。第二，我们党直到现在都是奇形怪状国民党式的无原则纠纷的时期。虽然这种纠纷在六次大会上受着大大的打击，然而他的残余还是有的。第三，有可能发生右倾。我党右倾机会主义另有一自己的一个小团体。这种危险是很大的。再有一个条件，就是在中国的同志对于在莫斯科同志的成见和不信任，以及莫斯科同志对国内实际工作同志的不信任。这种互相的不信任是第四个条件。我认为这些可能是我的极大的错误所引起的。因为我对于党所起的危机，要负极大的责任。我一定竭力来反对一切派别小团体纠纷的企图。我认为只有坚决反对一切小团体，才能真正执行国际的指示。

现在我知道：我实际工作上的错误，在最近二年在中国做的，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的。别方面，秋白同志的错误是在罗明纳兹影响之下。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到了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我直到到了莫斯科，方知道这里有过秋白的小团体。在中国我是不知道的。自然，我既然知道之后，我就要坚决反对秋白同志的两面派的行动。自然，我不但反对这个，并且要坚决反对我在实际工作之中做出来的错误。前天我知道了：国内开除了批评三中全会不正确路线的同志。这显然是小团体工作的性质。当时把陈绍禹留党察看三个月，是我做的错误。然而我开除他三个月，却并非站在小团体的观点上的，而是因为站在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我承认我在这里是做了错误，但是我再申明一次，我不是站在小团体的利益上的，而是因为站在不正确的政治立场上。可是这亦证明这种开除更加说明我的不正确的组织路线。我申明：我反对为着小团体利益而开除站在正确政治立场上的同志。

结束的时候，我要向主席团提议。三中全会做了许多错误，有了不正确的方针，对我的错误调和。因此，我认为必须原则上彻底的纠正这些错误。这种纠正不但要上而下的去做，并且要一直达到下层党部，一直到支部，到工厂，因为现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不仅在上级党部之中。因此，我认为国际要向中国党提议召集四中全会，来纠正三中全会的错误，批评我的错误。然而四中全会的成分应当比较不同些——不但参加三中的人要到会，而且当初反对我的错误的同志也要到会，工厂支部的同志，几个苏区的大支部的同志也要到会，以便不但纠正上级党部的错误，而且纠正下级党部直到支部的错误。四中全会必须设法反对一切无原则的小团体，必须在国际指导之下正确的去反对一切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党离开危机的状态，实行大大的转变。我

们在中国革命这样紧要的时机，在国内严重危机的时机，必须在极短时期纠正我党领导所做的错误。

我们党现在有很大的任务，因此，如果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不能够纠正，那么，这对于中国革命是极大的危险。我对国际申明：我放弃以前反对国际的一切武器，我在国际指导之下“改换武装”，来反对我自己的错误，反对调和主义，反对两面派的手段，反对小团体，反对右倾和盲动主义。我申明忠实的改正我自己的错误，而在国际指导之下来坚决的反对这些错误。自然，我不能深信我从今天起我已经完完全全深刻的了解自己错误，从此不会再重复这些错误。我这是不敢说的。然而我鼓起勇气，用全力来纠正，用一切方法来反对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为着在国际指导之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苦秋莫夫发言：

立三同志在那里承认了：不应当怎样去干革命。刚才发言的红军军官是说了应当怎样去干革命。昨天我们问了同志之后，知道他们在广东苏维埃农村之中，怎样实行实际上的改选，我们就深信下层党部的干部会用布尔塞维克的方法，估计工人和劳动农民的需要和要求，他会用“布”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任务。小小一个例子。我们要知道广东东江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是否红军雇农苦力亦得分配土地，他们说：“凡是会吃饭的人，而又不是绅士地主等等，都得到土地”，这又是他们的实际革命工作之中，的确是雇农苦力兵士都给以土地了，他们是把土地去实行“黑色的重新分配”。我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党中央政治局有一决定，禁止给红军雇农苦力以土地，当然说了好些理由，理由是怕工人变成小资产阶级，怕红军兵士得了土地不肯打仗。这是中央走了陈独秀的老道路。(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不肯在土地革命之中给兵士以土地。为什么？——因为怕国民党的军队解体，因为地主的军官反对)。

我们同地方上来的同志谈话，我们不觉得他们有和立三及现在中央同志对于莫斯科，对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的那种“毒恨”的态度丝毫相像的地方。

现在我要讲到最紧张的问题。这问题就是一部分中国党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问题关系。因为现在秋白立三等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是无论在那一布尔塞维克的党部之中，都不能容忍的，所以不说明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立三今天表面上口头上很激烈的承认自己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他甚至于走得更远些（比上次东方部讨论的时候）——他以前只承认政治上的许多错误，可是不承认中国党实行反对国际的斗争，不承认中国党领导之中有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实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今天立三比较更进了一步。他申明他将要在国际监察委员会说最近几个月曾经有过的斗争。然而我们还要说我们不能深信：今天立三虽然说得很激烈，将来回到中国之后，或许又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又要实际放弃今天所说的话。为什么？我们有了好几次这样的例子——有些同志，在莫斯科，受着共产国际的布尔塞维克的压迫，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意国际的路线，等到回到中国之后，个人的关系要厉害些，原则问题是最后的了，又去照旧执行自己的路线。中国党与国际关系的历史之中这种例子很多，最近一个例子就是秋白同志。他在这里同意反对立三主义，同意国际一切指示，同意根本的当前任务的一切措辞，他回到中国之后，在私人关系的空气之中，丧失了自己的一切原则，而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我想必须使立三同志的这些承认成为中国全党的财产，一切党员都知道这些错误，使立三同志将来没有什么退路。必要使立三把派别斗争说得清楚而记载下来，使全党知道，可以不再重复。因为立三同志这一次始终还没有说清。最厉害的斗争方式——一部分指导者反对国际的斗争方式——立三同志对着国际主席团没有说出来。立三说这个斗争是在于他有了托洛斯基盲动主义的路线，和

国际路线不同的。这是不够的。我们知道立三在政治局之中的说话之中，有些地方不但是路线的问题，而且造成了一定的原则上的基础来反对国际，而且有了许多组织上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斗争。

我来引几个文件：政治局给国际代表的一封信中说：“国际工作之中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应当保障国际能够了解这个问题。我看：国际……”（速记生曰：苦同志读英文）

同时，还有第二种理由，就是说中国有许多特点，国际很难了解，差不多不能了解，因此也就不能够实际上领导中国的共产党。立三造成了“中国除外的”的理论，甚至说到这样的话：“我们到了武汉之后，那时再给国际讲话就不同了”。

这种敌视的，非“布”的，非无产阶级的对待国际的态度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极大多数的中国党员，对于国际是没有这种态度的。亦不会有的。然而这种态度，在党的机关干部的某些成分之中，是存在的，可惜甚至在政治局里也有。

现在再引几个文件，可以证明这种反国际的斗争没有结束。立三形式上承认错误之后，这一斗争仍旧继续。有一封信——政治局给长江局的——已经是在秋白同志到了中国之后写的，这封信说国际的坏话，而且对着全党公开的说。我念出来：

“……”（速记生曰：苦同志读英文）

在武汉我们有二百赤色工会会员，党员更少，国民党有军队有海军，帝国主义有军队，总数只得到二十师光景。这种情形之下，竟要暴动，而对于执行国际决定的国际代表——要预防中国党牺牲精锐的国际代表——却说他的坏话。

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立三同志今天也提起曾经把一些同志留党察看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说为着什么而把他们留党察看的。他们的被开除是为着他们不同意三中全会的虚伪——三中全

会说中央和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这是被开除的人自己写的。他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三个月到六个月。……这里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做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我还要举出别的事情，这种事情真是难说，然而不能不说。南京被捕好些同志，三十个同志。这三十个同志刚刚交到了一个部队——那里官长和兵士亦是我们的党员，所以这部队完全在我们手里。于南京市委和官僚主义的江苏省行委代表之间便发生争论。市委以为有完全可能救这些同志，只要把这军队开出城，变成一部红军——这种情形到处都有的。然而省行委反对，省行委的主张是要枪毙国民政府交来的那些同志，为的是完成全国暴动的计划，因为如果这部队开出南京，就不能执行暴动计划了。于是这些同志就由我们自己亲手枪毙了！事后，那一部队仍旧被政府缴了械。

对于同志的摧残这样容易，有些党部里面确有这样的特点——恩来同志在三中全会的组织报告之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讲文件）……。

现在我重新说到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极紧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并不是我们不满意，并不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位分，不能承认中国党领导的一部分人——这还是一半的不幸罢了。是因为这种关系妨碍中国党得到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

我们已经写过很多好的决议案。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说明了广州公社的错误。党及其领导是否估计到这种错误和经验，而应用到长沙去呢？没有。九次全会的决议和其他的决议一样，对于中国党的领导机关，只是束之高阁的文书。广州公社的经验，一部分是在于广州没有创造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长沙现在重复这个错误。工厂街道所选的群众苏维埃在长沙也是没有。而且直到夺长沙五天之后方才召集第一次的群众大会。并且只到了三千人，而长沙的居民有四十万呢。等到看见召集不成时，

又推迟到明天，明天又有其他工作，又没有开会。直到第六第七天才开了一万人的会。然而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却非常之大，当红军退出长沙的时候，虽然党没有群众工作，而跟着红军退出的有三千工人。

三中全会是否给了长沙经验以分析呢？没有。他说长沙是新阶段的开始——中国红军“从游击战争进到反对国民党的正式战争”（秋白）。这实际上是对于那种国民党的遗产，国民党式的不相信无产阶级群众的能力——三中全会没有给以打击。三中全会没有估计广州和长沙的经验。关于红军，三中全会说他开始了反对国民党的正式战争，这亦是官僚式的文章。难道以前红军没有实行革命战争么？这不是这样说法的。长沙的经验证明：——争取武汉的问题不是战术上军事上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要看我们能够怎样去发动群众——在长沙武汉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之下，要看是否已经有成千万农民群众起来斗争。长沙问题是这样的。这一问题三中全会亦没有估计——虽然有了好些很确定的国际的指示。

长沙红军的情形怎样呢？军队是有许多游击主义的遗产。军队进城之后，没有巩固，没有组织城市的政权，没有认真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又退出来了——这是因为旧的习惯，所游击之外不必有巩固的地域，而是得一城失一城，再得一城再失一城……红军的薄弱，长沙事件又和以前一样。这个经验中国党没有利用。亦没有认真去解决变更这种军队，使他们成为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一定的地域——革命的苏维埃根据地来行动。应当说明：游击战争对中国有很大的意义。然而在游击之中没有无产阶级式的纪律，坚决，那就不能够胜利的。创造正式的红军——从现在这种红军部队之中去创造——这是中国党当前任务最要紧之一。

第三个问题是职工运动。赤色职工国际有许多很好的议决案。

我们曾经和中夏同志争论群众工作的问题。从九次国际执委全会起，就说必须开展部分斗争的罢工运动，使经济口号和政治口号联系起来。然而三中全会不顾这些共产国际职工国际的指示。国际的指示是说：创造赤色工会的工作之外必须在黄色工会之中去工作。三中全会说：应当消灭黄色工会，中国文里的意思就是打杀黄色领袖。广州公社的经验是又有用处了，广州公社之失败之一部分是因为党不会在机器工会之中工作，不会去破坏机器工会。应当认明：我们在乡村创造苏维埃红军的成绩大，而在城市之中成绩很小。我在东方部的书面报告之中指出了职工运动薄弱的具体材料。我还可以引一引各产业的工会会员数目。这是很小的数目。至于党，则有十五万党员，其中只有很少很少的工业工人，而数量上百分数上工人尽在减少下来。一年以前是百分之二，现在连百分之二也没有了。为什么呢？我们看见有很大的罢工运动，照数量上说，中国罢工人数，占世界第一位。然而工人阶级的组织却很小，党内工业工人很少很少。当然有客观原因——白色恐怖在城市之中比在乡村之中厉害。然而这里立三路线的领导，玩弄暴动，玩弄政治罢工，完全不顾工人的部分要求，不去抓住这些部分要求——这是工人党员少的原因。

最后，三中全会只把立三路线的最显露最不能躲藏的“外表”去掉了。同时，却丝毫没有走近国际路线一步，三中全会把半托洛斯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病根赶到身体的内部去了，把不同意见混淆起来，把立三主义的实质掩盖起来。病根在党内没有铲除，这是党及全部革命运动的严重危险。

马其亚尔发言：

请准我不仅说说党内情形，亦应该说中国的一般状况。无疑问的，中国的经济政治危机是在继续，是在深入。只要看看美国领事，美国使馆商务参赞的消息：他们说在北方大战之后，在暂时停战之后，北方商业不恢复，上海工业危机继续，国内商业

缩减，银价继续低落。经济上的新现象是重要省份的年成今年算是好的。然而这对于反革命派，不见得是好处，因为年成一好，农业品的价格低落，尤其是商品用的农产品，农民是得不着好处的。

政治危机的表现是将要有新的空前的军阀战争——这些战争是反映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反映国民党各派的斗争，同时是英美日争取中国的斗争。军阀战争的暂时休止，使国民党有运用手段企图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的可能。……

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完全接受了托洛斯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托洛斯基可以说了：我的口号总算由蒋介石来实行了。没有疑问的，最近几月我们看得见中国又要有新的军阀战争，不但在北，并且在南。蒋介石现在打苏区，同时，又是美帝国主义资本打英国资本。他不但去打苏区，同时想去打英国势力之下的广东派军阀。然而主要决定一切的是：国民党反革命，中国地主准备很巨大的反苏区战争。蒋介石现在集中二十师的力量，所谓灰色军队去打苏区。他不能调动北方的好军队，因为怕北方军阀之间的新花样。美国和上海资产阶级给他钱去打苏区。江西的苏区受到相当的威吓。（南京政府说打江西要五千万元，这对于南方是很大的数目）国际的各国分部应当更加注意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反对中国苏区的战争。我们的各国共产党做的太少了——虽然国际已经有具体的指示。帝国主义并且在实行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文章演说，辩护攻打苏区的“义举”的。美国，英国下院（众议院）有许多书出版，说只有外国出兵干涉才能救中国。美国外交部东方司前司长拟了一个出兵干涉的计划，照他说起来，要用五万万美金，和廿万军队。美国新近又出一本书主张必须出兵中国的。英国众议院里一个自由党员提议由国际联盟来干涉中国。

这就是中国的环境——在这样环境之中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农民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农民战争正在日益生长。

然而中国党正在此时做了不少错误。

立三讲了这些错误，承认了，责备了这些错误。他的承认是否忠实，忠实到什么程度，还要在事实上表现出来。然而不但对于中国党，不但对于东方的党，并且对于一切共产党，却有几个教训。

第一，中国党政治局和立三同志认为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这是主要的方针。大多数不在此地的中国中央委员，也深信莫斯科不知道中国情形，不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莫斯科如何能明白中国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纷争等等呢？这种理论是一切共产国际叛徒，机会主义者，从鲁德非休，马史洛夫，路夫斯东等一直到……都是说莫斯科不懂他们国家的特点，不明白他们革命发展的具体趋势。莫斯科的俄国人很知道自己的事情。我们对于关于国际形势的议决案，都是赞成的，都可以签名的，然而对于我们国家的事情，那可对不起，我们知道得多些。我想用不着来证明：莫斯科是明白知道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莫斯科是知道你们的军阀混战，知道中国情形，比你们还好些，莫斯科的估量永久比你们的正确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亦可以应用到中国——这是已经证明了的。我们对着中国同志要承认一件事：我们的确不懂得——中国党内政治局内部的把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我们很懂得军阀之间的把戏——如果有四个军阀打仗，那么，一定会有第五个第六个参加，我们懂得这里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政治局内的把戏问题上，我们到今也还不懂得。立三今天答应了帮助我们，这是很可宝贵的应允。这对于研究中国党是很好的材料，使国际执委容易指导中国党的内部事情。

为什么这些错误和倾向是可能的呢？中国党是东方最重要的共产党，难道国际没有预先警告他吗？没有预先警告立三吗？立三同志却来提议一个国际范围之内的全国范围之内的大暴动计划。难道没有告诉过中国党：暴动是艺术，暴动应当怎样做法吗？国际对于这个问题给了很正确的指导，指示了中国党的中央。国

际九次全会，论到广州暴动，批评了广州暴动，分析了中国同志所做的错误——当时是在过去的国际代表领导之下做出来的错误。这个议决案怎样呢？为什么中国党没有估计这些广州暴动的教训，没有实行这个决议案。为什么重复这些错误。因为中国同志认为这些议决案只是一纸空文，写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些议决案上就算了。因为政治局要想在极大的范围之内来重复广州的错误，所以不去估计那个议决案了。

如果再说一说九次全会的议决案，六次世界大会的议决案，那么当时罗明纳兹在中国做了好些错误，九次全会是认为与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同样的。你们记得罗明纳兹的理论，他说中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资产民权革命，现在立刻就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错误，是有九次全会的批评的。这个理论现在却由立三同志来实行起来了，重复了，扩大，扩大到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为什么？因为中央没有认识罗明纳兹的这些错误，没有对全党解释。因为罗明纳兹和有几个政治局委员的关系很好。

既然立三今天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托洛斯基主义的，他就应当说：这个错误的根源是罗明纳兹发展的理论，国际对于这个理论是说明他的错误的，而中央把这些教训和经验隐藏起来不给全党知道。政治局委员在第九次全会的议决案上签了名，然而以为这议决案没有什么重要，而没有公布这个议决案。苏维埃区域之中有富农倾向的极坏的表现，如分配土地问题，富农小地主得势的情形，富农跑到了政府和军队里来。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人说——有地方不准工人加入苏维埃机关，那里有工人在苏区不应当做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诸如此类的富农理论。关于富农倾向，共产国际没有预先警告中国党吗？警告了的。中国党六次大会上有了——一句错误的话。立三就从这句话发展成整个的理论。说要联合富农来做土地革命。秋白同志在这里赞助这个理论。共产国际全体来反对这个倾向。史大林以下一切负责同志来解释过：这是不对

的，这不是列宁主义，不应当这样了解。中国同志签了名，写了一封信到中国去。后来呢？而现在我们得到许多苏区的兵士委员会的信，说那些地方以前没有做反富农的斗争，富农甚至在党内得势得很。这样，可见签个名的议决案隐藏起来了，又做了不少错误。军事动力问题。你们中国同志过份估量军事动力。用军事动力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苦同志已经讲过，在长沙怎样一回事。关于广州暴动已经说过：单是有一两营兵组织暴动是不够的，而要动员群众组织工人等等。然而长沙又是这样错误。一切中国党的指导者都听见过的：你们的红军太薄弱，不能去取大城市，一切负责同志，史大林，莫洛托夫等都给中国同志解释了的。史大林对你们说——不要到长沙去，要不好的。莫洛托夫说：现在拿大城市是红军力量所不够的。中国同志都同意了。到了中国，又发命令要第二次进攻长沙。第二次没有成功，中央又发通告要第三次进攻。

工人运动。中国党不愿意到黄色工会中去做工作。在中国一般不注意工会工作。皮同志写了一个议决案，通过了。中国同志签名了，说要实行经济斗争，要做工会工作，要到黄色工会做工作。然而一有机会，他们就利用来停止黄色工会之中的工作，解散赤色工会，停止经济斗争。在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之后，中国通过了一个议决案，说苏区之外，小小一个经济斗争，就是政治斗争，经过部分斗争就可以实行……（原稿不明）。

三中全会上秋白同志说：工人的政治斗争应当和经济要求联系起来。不是说经济斗争要和政治的联系起来，而是相反的——这是秋白同志的说法。我可以数出好几十个议决案，对于中国革命都是对的，都是中国同志所签名的，后来却是不实行。

这种情形必须取消，然后国际的议决案和指示再不会变成一纸空文。不能够签了名之后，又去照着自己的思想解释，弄成相反的路线。

就要完了,我想这件可悲的事实国际意义是:各国共产党的种种倾向和错误,过了一个时间总要反映出来。然而在革命的时候,革命过程之中——这种倾向错误的反映就要成为悲剧——中国就是如此。因为中央有不正确的路线,我们丧失极宝贵的时候,——这是革命之中的宝贵东西。就丢了革命的根据地。有些地方我们丧失了干部,丧失了我们的阶级的最好的力量。我以为立三同志讲的话是忠实的,他说他批评自己的小团体,揭发秋白同志的两面派的路线——这似乎是立三忠实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相信口头上的是不行的——列宁这样说的。立三应当用事实来证明。他应当帮助国际,使以后再没有玩弄国际议决案及指示的事。

我以为这是中国党那一时期错误的国际教训。

张国涛发言:

我首先从自我批评开始,——承认我过去做的错误,我有书面的写在这里,请把他读出来:(读)

自然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中国党现在正在最紧急的时机,要巩固党必须实行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右反左,反对一切国民党式的纠纷小团体斗争。这样才能实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立三的错误是半托洛斯基的冒险主义的性质。立三执行了反马克思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这些错误不但在罗明纳兹影响之下,而且在陈独秀鲍罗庭影响之下。现在党的领导在红军之中实行进攻的策略,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不反对富农对于土地革命的影响,这不是左的错误,这是右的错误。陈独秀鲍罗庭亦曾经以为取得北京之后,再谈深入土地革命的问题。立三的策略就是这样的。他们忘记了巩固红军,土地革命,不反对富农影响,这种政策是有历史根源的。现在一面反对立三主义,必要反对右倾的表现,——这是主要的危险。必要特别反对富农影响——表现在右倾之中的富农影响。职工运动中许多事实,纱厂罢工时,我们同志甚至没有企图去反对黄色

工会，放弃反对黄色工会的影响。这些事实的总和，可见右倾仍是主要危险，必须坚决反对。

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对立三的错误调和，拥护他的错误，而自己却没有清楚的路线。三中全会决定了召集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照材料看起来（红旗）这一大会的准备只在技术上，而没有任何的政治准备。土地革命问题没有提起，没有提贫农团的问题，没有提起平均分配土地的问题。工人群众之中怎样准备大会呢？

组织问题：中央和国际代表之间的组织上的关系完全是不健全的，苦同志已经说过许多事实，我不必来重复。对于个别的组织上结论，亦是表现组织路线的不对。好的同志，批评立三错误的同志，被三中全会当做反革命分子，留党察看三个月。用这种理由开除了好的同志。这是现在组织工作不正确的表现。

立三同志承认了自己错误，我昨天和立三谈了七个钟头。我们互相批评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同立三决定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斗争。我们有很重大的任务，要看得明明白白。我们党现在有危机。这是很严重的，要救党，要纠正错误，要服从国际路线。我们认为口头上承认是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上要改正。我劝立三不要单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还要在实际工作上执行国际路线。证明以前的错误是纠正了。

现在特别要国际帮助中国党。马同志已经讲了许多关于国际帮助中国党的话。我认为国际要用组织上的办法帮助中国党解决危机。此外，党的指导所做的错误，要使全党一切同志及一切各国共产党得到这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救中国党出这一危机，而执行当前的伟大任务。

萨活洛夫发言：

现在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之中的情形非常严重。蒋介石得到军阀混战的暂时停止，正在积极进攻苏区，要想“剿灭”他们。我

们当然不相信蒋介石会成功。然而要知道情形是很严重的，国际所定的方针是：应当联合，配合广大的农民运动去反对地主高利贷及绅士。我们要联合各苏区，依据苏区，而把农民运动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而工人运动亦是这样，自然，在西欧的条件之下这是不可能的现象：一方面有些区域有苏维埃政权，有红军，有平均分配土地，而有些区域却是蒋介石的政权，帝国主义的政权。中国的封建割据，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是有很大的作用。因此全中国现在革命还没有成熟。成熟的过程是很困难长久。运动同时是在进攻，依据苏区做自己的作战根据地。国际的观点之外，却有另一种观点和他对立，这一观点是完全独立的。如果以为中国同志误解占倾城市应当是同时一致的每城市爆发暴动，这就算错误的全部，那么这是不对的。事实上我们有了一个独立的路线。看中国党中央的六月十一议决案，已经说：“中国革命要在世界革命过程之中去取得胜利“……（读原文）……”这议决案中就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其中没有丝毫间隔”否认立即的革命转变，被认为是右倾，仿佛中国不要经过许多阶段而后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苏区会议的时候，立三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依赖在全世界的革命形势（读）……”八一政治局会议立三说：“我们现在没有组织上的力量，我们还是少数，然而如果……那就是机会主义，如果不估计到……（读）于是产生一个好大的计划，蒙古要立即加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立三等等竟有割让政策的倾向。再则，说西伯利亚的中国人要武装起来加入革命。三则，苏联和日本开战，牵涉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东方民族，赞助苏联——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革命得到胜利。

直到现在中国同志很专心的详细的谈论种种倾向，孔夫子式的谈论，如三中全会甚至说白郎德雨是托洛斯基派。然而自己却弄出了一条路线——不断革命论的路线。托洛斯基说的不断革命，

说到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这种方法论应用到殖民地。他的“不断革命论”——最近公布的他的著作，说殖民地革命亦不能够胜利，殖民地革命一国不能胜利，因为只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自然，从此立刻得到的结论，就是托洛斯基主义式的去估量农民。似乎大家都应当了解：中国现在有农民战争，帝国主义说过比太平天国运动还要大，资产阶级的报纸也在找历史上的比例，想来了解自发的极大的农民运动。而中国党中央却没有一个半字来说农民土地革命及其主要任务，政治议决案只说“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如何行法呢？——没有说。创造正式的红军——从现在这种红军部队之中去创造——这是中国党当前最紧要任务中之一，而苏区会议的决定，竟说红军兵士和雇农不应当分配土地，这简直是不可容许的错误。

很有趣的，我们问广东来的同志。他们说以前雇农和红军兵士分配了土地，后来中央来了指示，说不要分配，他们也就觉有无产阶级变小资产阶级不好了。我们问他这种意见你是不是以为对的呢？如果这样实行了，是不是你们那里的雇农都不再助红军了呢？他说——假使你们以为我们真照着中央的指示去做，那就是你们想错了（笑）。

因为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所以弄成这样不可容许的现象。现在条件之下“极左的左”倾，使党脱离工业群众，实际内容上是极右的右倾。土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富农在苏区是反革命政府的外交官。富农反对平均分配田地，和地主封建的剥削密切联系，防碍彻底的取消不平等状态，取消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在这种条件之下，反而不谈贫农团及农村工人组织的问题，对这些没有任何决定。三中全会的议决案之中，反而去谈抽象的东西。再则就是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不平衡问题的了解是这样的：当他们遇着立三同志说的时候，他说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以为要反对右倾，就要把革命转变说得快些。

关于富农问题，贫农团问题等，不过照国际路线而做些决定。这种条件之下情形怎样呢？看：中央给长江局的信，“鄂东北的情形非常严重。肉体消灭的办法（续）……”这真是极左倾的空谈和极右倾的实际工作，这是一方面帮助敌人，一方面削弱苏区的作战斗争力量。秋白同志在三中全会上说：南通用屠杀的方法，不但对付富农，而且对付富裕的中农，甚至小农……（续）这是党不去清楚指示怎样孤立富农，团结贫农和中农，而放任地方党部自己去寻办法对付的结果。而且有这样的事情，我们问立三：红军兵士去打仗，他的土地怎样呢？他说一般是他们自己把田租给农村里有些钱的人去耕。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我们把这个问题问东江来的同志，他的答复是不同的，他们十家之中有两家没有耕具，或者去打仗了，那其余八家替他耕种用共耕的办法。这种答复才真正是中国革命的先进代表的答复。中国农民像一九一九—二〇年的俄国农民一样，他们的行动是这样的。这种问题是生死问题，不能够用托洛斯基的空谈来搪塞的。

再则还有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如果我们问一问中共是否在执行国际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那么，可以说现在还没有去执行。而中央给长江局的信，就说仿佛国际并不反对现在暴动，仿佛国际认为在各城市现在暴动是可能的，不过认为工人落后，所以要等等。这样是中央解释国际指示的话。不说弄玩暴动是冒险主义，首先要巩固苏区，反对敌人进攻，要使广大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联系，要使城市工人兵士和农民在乡村之中的行动配合，不说这个，而说国际不反对全国暴动，只不过要等一等，这是不容许的。

这种情形之下，所以长沙会发现那种现象——英国新闻记者的好几封通信说的比中央的正式报告还好些。英国资产阶级被我们吓坏了，他们把共产党的行动描写得天花乱坠。长沙城里，我们的确是得到人民赞助的，三千工人跟着红军走的，然而并没有能够立刻开群众大会。长沙在红军手里的时候，敌人偷进来了，因

为全城一无秩序，白军军官假装红军，把政治部围起来了，弄得我们慌张的退走。这种情形是要有人负责的。在国内战争之中，我们这里是每人都知道应该怎样负责的。

组织苏维埃政府的问题，我们有许多要组织政府的决议。然而没有保障可以实现。我们敢说：立三主义及秋白的两面派手段的残余若还有些保留的时候，那是无论如何没有保障可以组织与发展下去。

立三先在东方部承诺并忏悔错误，第二次进了几步，今天到了最高点。仿佛是说国际是对的：用不着在上海武汉布置暴动，可以首先取长沙，组织苏维埃政府。这样组织政府的问题，仍旧是和冒险行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意见是组织政府要和巩固苏区相联系，而立三的意见是：“不能够在山上组织政府”。托洛茨基派十月号的公报亦曾说：只有工人的城市之中可以组织苏维埃政府，山上是不能够组织苏维埃政府的。这不但是政治问题，而且是军事上的政治问题。我问你，明天蒋介石，因为党的指导做了许多错误，真正就会把你们迫近山脚，那时怎样呢？如果照立三说来，那就又没有苏维埃运动了，没有一个组织中心了，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帜了，仍旧只能反对反革命进攻，亦不要土地令（清楚规定我们党纲的土地令说明红军兵士是有取得土地的土地令）等等。这种政策是打断中国革命的高潮。有人问，你相信立三的话吗？然而我想现在不是相信不相信立三的问题。问题是在现在环境之中，革命高涨，很好的群众运动。推进了有力的青年干部，我们却有了这样一个领导，弄出极大的困难，并且……（原稿不明）

还有一句话说：有些同志在莫斯科的时候，很客气地，到了中国又是另一种话了。例如秋白同志，他在这里代表中国党好几年，他参加我们一切决议的讨论，他参加对六月十一决议的讨论，他自己说的，立三是发了痴了。他到了中国之后，一个转变转了

一百八十度。甚至于他看了他的信仰可以受着损害的时候，他不去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在三中全会的结论里说：立三忏悔得太多了，立三承认错误承认得太多了，不要承认这样多，承认错误就要帮助右派。

总起来说，我想国际主席团要坚决的指出：立三的极左倾向应当到最下层的每个党的支部之中都去公布，每个红军游击部队之中到最荒远的苏区之中去公布去研究。只有这样，只有说明立三指导的路线是不正确的，是反对我们的决议的，三中全会纠正这路线的企图是很不确定的，是极端外交手段的，只有这样，才能说立三主义的恶果不但在口头上，并且在事实上将要能够消灭。

蔡和森发言：

我只有两句话。现在我们党有危机。立三来莫之后，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之中，仍旧反抗国际路线，运用种种手段，来继续自己的路线。下层群众已经起来反对领导，开始赞助国际路线。我们的指导机关做什么呢？他企图说下层的代表是小团体，是右倾，来抑制下层代表。他是不是小团体呢？不是的。这是下层的代表，群众干部的代表，几千几万群众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贫农的代表——他们反对不正确的领导。

谁是真正的小团体？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同志。李剑如是莫斯科的学生之中的小团体的代表，和托洛斯基派联合。而现在剑如做了中国红军第六军政治委员。

最好的同志都被赶到党外去。最近从少共国际回去的同志，中央不给他们工作。好同志被开除，说他们是小团体。

立三同志，你应当坚决的和两面派的手段斗争啊！这是我们的敌人啊！而新起下层代表不是小团体，这是群众的代表，他们批评上级的错误路线。他们是救党于危机之中的唯一动力。党的老辈——我是一个——已经不能做新的运动了。他们有过各种左的右的等等错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已经落后。

如果还有人企图抑制新生的干部，我认为事态是异常严重啊！应当对于这种企图大大的打击。

最后立三同志要在实际工作上证明，不但在口头上来说。他应当去掉自己错误的根，这些根在中国是有的，这样来执行国际路线。现在我们党内两面派的手段是特别危险。对左对右的调和亦是。对调和主义要打击。我在过去对于党亦是用过两面派的手段的，亦做过无原则的斗争的。然而我不但要口头上承认，而且在将来中国实际斗争之中证明这种无原则的小团体斗争是绝对的停止了。我希望立三真正诚意的说出他所知道的中国的小团体。来帮助国际了解这个问题而彻底消灭小团体的现象。

马努伊斯基发言：

关于中国问题，我们要在国际执委的扩大会议上讨论，要极广泛讨论一下，并且提出中国革命现在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革命转变的问题。我想，这个大问题今天不能预先讨论了，今天要说的是立三秋白同志所做的错误问题。我应当立刻把我的意见公开的对立三说。如果不只表面上今天来讨论，那么，今天的讨论情形真正是共产国际所希望的。立三做了错误，中央赞成了这些错误，中央因为莫斯科叫他，所以派他到了莫斯科来。莫斯科的空气对于立三大大的打击了，立三在东方部几次会议之后，就承认自己的错误。仿佛最好也没有了。然而我公开的说，我觉得这样容易的战胜立三的观点，正是使我非常警心的。我想不但我，一定还有许多同志，尤其是在国际之中有过长期的反对倾向的斗争经验的同志，自然而然要发生怀疑：是否整个的方针——立三同志领导之下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方针就此消灭了呢？这是根本的问题。我想问题不在错误上。错误是可以做的，错误是容易纠正的。如果要幼稚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在国内战争之中锻炼出来的，当前还要去解决民权革命的任务，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然而没有自己的列宁，自己的史大林，没有这样的

历史经验，要求他实行这个革命道路，一些错误也不做，那倒是很奇怪的了。很难这样希望的。然而假使没有这样一个整个系统的错误，完全和国际所认识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整个错误观点系统，那自然是很容易改正错误的。至于整个系统的错误，那就困难得多。

而现在的问题正不是你们做了个别错误的问题。例如立三的错误之中有对于经济斗争估量的不足，有实际上取消了共产党（在要暴动的时候），然而我们并不是仅仅批评这些错误。所有这样的错误，都是由于一个根本的错误——这个根本错误是发生于立三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上对于整个国际状况的估量。这里我们发现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盲动主义的方针——立三及其一派的立场。正因为如此，所以取消这个是不容易的。这种错误的重新发现，现在就会有的：——因为世界恐慌的关系。我并不是不看见立三错误的国际意义。我想：既然现在发展着世界的恐慌，同时，各国共产党主观动力又是落后，那么，这些时候会有人来责备共产国际没有跳过历史的阶段而一跃而至独裁。因此，立三的错误是现在时期的特色。根本错误在什么地方？在于对世界形势的估量。如果立三在这里拥护他这观念，而和我们逐条逐条来争，那么，我倒觉得放心些。正因为立三这样快的抛弃了自己的观点，倒引起了我的警心了。如果立三说：你们以为中国还没有“国际客观革命形势”你们错了。历史上从没有造成中国这种的理想的革命环境，因为经济恐慌动摇了现在中国的全部经济。如果立三来说：我们根据这个客观革命形势，动摇中国全部经济的形势，封建残余的基础之上，还加上帝国主义的压迫，有着极大的革命运动，现在中国所有农民运动非常之大，一九一七年都不曾有过。我们当然要起来反驳他这种说法。如果立三要说：你们要懂得我们中国的情形是和你们十月革命的情形不同的，你们当时还没有自己的红军，你们没有红军作战的战场，而我们有红军。如果立三

同志提出自己的理由来，我们当然要讨论，而且和立三争论起来。如果立三说：你们不懂得一个根本问题——苏维埃是不能建设在农民区域里，像托洛斯基说的，必须要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然而立三这些问题都不说了。立三现在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在于立三，中国同志不估计到中国革命遇着了一个很复杂的交错环境。凡是不懂得交错的环境，他一定要做错误。当一九二〇年我们打到华沙去的时候，列宁说为什么没有能够打破一九二〇年的帝国主义战线——当时好些国家我们有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涨，当时是世界恐慌很利害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应当退兵离开华沙？因为我们的进攻华沙遇见了凡尔赛和约的制度——整个的国际关系制度。立三是否懂得了：中国革命现在比一九二〇年的俄国革命，更好碰着了“凡尔赛和约的制度”？列宁在第二次世界大会的时候，估量“凡尔赛”是全世界分成两半边——二万万人统治十五万万人。这是凡尔赛和约的制度。他仍旧保存着，然而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时候，在第三时期之中，更加增加了新的矛盾。在凡尔赛基础之上生长出来了新的世界制度。现在中国革命遇着了整个的凡尔赛制度。因此，现在的任务是：中国革命在现在的阶段里，在现在的世界恐慌的规模里，在现在共产党情形之下，能否冲破这个制度？你们责备俄国共产党员说，我们只顾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不看见中国革命的作用。然而你们是否想一想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制度压迫着中国呢？你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依靠着苏联，依靠自己的红军冲破这个制度呢？这是根本问题，你们发展着一个整个的概念：一方面中国起来暴动，别方面……我们就可以开始冲破这个制度了。你们可忘掉了一个“小事情”：就是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的力量还不够呢。我们现在有各国的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稳定破产的开始。德国现在的情形是两个阶级走了决定胜负的战斗。我们看见好些国家有政治危机。然而危机还不够——不能讲到破坏整个凡尔赛制度。这里要有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感觉力，来

利用这个时机组织自己的力量，去动摇资本主义的稳定，我们有的是动力——就是共产党，就是工人运动。这是现在的根本任务。现在国际舞台上有着极伟大的事实。而你们只看见你们的螺丝壳，只看见你们国内的关系，而没有看见整个国际的复杂的交错环境。这是你们的错误。你们没能了解：现在不估计到无产国家的情形是不能够解决任何一个世界革命之中的问题的，现在没有一个革命之中这个问题能够不发生的。

你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你们的根本错误的来源。立三同志！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通过一个反对你的议决案，我们要你了解：你们表现了很厉害的地方主义。从此就发生其他的问题，因此说苏联有狭隘的民族成见，说俄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形，其他一切观点及整个的概念。自然，很可警心的是我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国际团结力量的这几年之中，我们惯于和各国共产党谈论，如果某党与国际不同意，那么，我们和他讨论。然而最危险的是，表面上是同意我们的决定，实际上执行自己的路线。譬如说中国同志以为我们拿到了长沙以及其他的大城市之后，国际和我们谈话就不同了。这不是共产党的说话，这是国际联盟的说话。立三同志，你以为你握紧了拳头，你的事情就完了，你要知道这种说话是在国际联盟里面说的。国际联盟里面是看力量的。国际和各国分部之间的关系的的基础，决不在这里。这是你们应当了解的。由此可见，你们只是很好的革命，可不是共产主义者。立三同志！你还只是一个很坏的布尔赛维克。

现在说两面派的问题。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如果看了这种情形，那么，议决案只管通过，到了中国仍旧执行自己的路线。如果这种情形是国际与共产党的互相关系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使国际灭亡。这就是你们帮助破坏国际的信仰，立三同志和秋白同志。如果你们实行今天的应允，今天的宣言——就是国际监察委员会里面去详细叙说中国党内的派别，那么，你们真是

帮助共产国际揭破这个痛疮，这个痛疮是必须揭破的，否则不会有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小团体状态是最大危险中之一。德国的小团体状态没有中国这样的根基。你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很薄弱的，你们有很大的农民区域，那里还没有走出封建时期。从这个观点上说，如果立三帮助我们，那是很好的。可是要立三真正和布尔塞维克一样，诚恳的公开的把材料和消息交给我们的国际监察委员会。此其一。

第二，我想不能限于批评。必须召集中国党中央的全体会议，提出所有这些问题，严厉的实行自我批评，不要糟蹋全体的领导机关，因为你们的行动之中亦有许多好的。在你们的榜样上，一切幼稚的殖民地共产党都要学习呢。中国的党对于殖民地共产党的作用，将要和苏联党对于全体共产国际的作用一样。应当说所有的好的一方面，同时严厉的自我批评，批评你们的错误。

第三，为着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布尔塞维克的学校，要他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不是随随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之中去学习，我想中央虽然只叫他来做报告，可是现在他不用回中国去。立三同志应当在这里留这么几个月，同着共产国际纠正他自己的错误。我想要认真的打击这造成的“侨民”生活的不健全现象，这是滋养小团体状态的。现在应当特别注意留在这里的同志。

这是我认为要做的。

白腊昆发言：

从立三同志所说的看来——还有比我知道中国情形更多的同志所说的看来，现在对于中国党最危险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和国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是所谓两面派的手段。这还不仅仅是国际纪律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话，可以总合起来——这种两面派手段的基础是一部分中国领导同志有了和国际领导和国际全体不

相同的方针——关于中国革命的一切根本问题的方针。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造成那种关系，然而经验指示我们——一部分中国上层同志轻意的说莫斯科不懂得中国的特点，并且不知道怎样应用国际十年来积聚的革命经验。这些同志说仿佛国际不懂得中国的特点，自己就不会估量中国的特点。三中全会对于土地革命的方针完全证明这一点。在这样的国家里面——正在进行着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资产民权革命，而只写了几句关于土地革命的话，说要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然而我们要提起谭平山以前和秋白立三现在所说的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平山是极右的右派，后来成了叛徒。我并不是要说秋白立三将来和平山一定是一样走到那条路上去。然而立三秋白对于中国特点的态度，和平山的态度是有些相同的。事实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共产国际屡次着重说明必须使中国同志认清中国革命的前程和中国经济状况的特点。这正是共产国际做的。那些骂共产国际，甚至整个的莫斯科（联共）不懂得中国特别情形的同志，他们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也和以前陈独秀谭平山，一点也不懂。他们不明白应用国际的革命经验。我只来说一说土地暂行条例。这里，领导苏区的中央政治委员，或是政治局一部分，否认平均分配土地，而承认只有没收来的土地才可以平均分配。他们不要分配土地给雇农，而现在就强逼雇农去组织共耕。这个土地条例说没收来的地主土地要立刻组织苏维埃国立农场，换言之，就是要立刻把这些地主土地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农业。那班认为国际不懂中国特殊情形的中央委员反而有这种主张，他们怕地主土地分配之后会损害生产力。并且可见领导这次会议的一部分同志认为红军的兵士不应当分配土地，而要等中国完全苏维埃化之后，要等到革命在极大的中国完全胜利之后。这是一方面证明中国同志自己不顾中国特殊情形，别方面这是不愿意承认国际的可悲的经验——部分的说来，就是我的经验，并且不止是我的经验，其他国家里（除出匈牙利

利)，如腊德维亚，立陶宛，甚至乌克兰，都因为不顾列宁的指示，不顾俄国党领导者的指示，而反对了这种政策。

当我读着中国苏维埃区域会议的土地暂行条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重复我们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法，重复华尔加等同志当时的所谓理论上的综合——这是在可悲的经验之后了。我记得我和华尔加同志，在做过了可悲的经验之后，甚至于还写过：用不着分配大地主经济的土地给农民，因为如果这样就不能够保障城市之中来的无产阶级分子的集团，这就是说分配土地可以损害生产力的意思。

共产国际以为这种可悲的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不致于是枉然的，然而中国有些同志却认为国际不知中国特殊情形，因而不能利用这种经验。

我想，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所经过的事情，现在立三同志也应当经过。我应当说：我当时还没有立三同志今天这样坚固的承认过自己的错误。然而正因为我没有一下子就这样坚固的承认错误，到后来却能够根本上承认错误了。我在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因为我们错误而被推翻之后整整的一年，为着我自己的观点而斗争，甚至于弄僵了，然而经过这样的情形之后，更加真正的脱离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立三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只有表面上的了解，轻意的反对了共产国际，同样，又轻意的认识这些问题的错误。可见立三不过要逃避他们的指导——实际指导中国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不愿意了解革命不是一个先锋队单独做得了的事情，而必须一切群众，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大多数在先锋队领导之下来做——逃避这种切实的认识。

他做了什么事情？决定了七次总同盟罢工，这是在一个月之中。这亦算中国的特点！苦乌西宁同志在布加利亚委员会里面证明：布加利亚革命的失败（以及匈牙利革命的失败），都是因为轻

意对付先锋队。这是叫全部先锋队的秘密组织暴露出来，这是轻意的不去细想的没有准备的用暴动去把先锋队送到警察手里去。并且，我们这里亦有国际的经验，我可以说一说回忆之中的事情。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那次事变之后，我们在德国亦是有些轻意的对付先锋队，没有充分准备广大群众去发动战斗，列宁骂我们，特别是骂我们牺牲先锋队，先锋队的恢复是不容易的。

立三说中国的特别情形，他做些什么呢？他真正是牺牲先锋队。萨同志和马同志都说过了：他们开除批评领导机关的同志，开除在莫斯科求学过的同志，开除执行国际路线的同志。我想在这方面，立三同志只是形式上的承认错误，没有切实了解他，秋白等所做错误的严重，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由于中国党的非列宁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我想这并不是第一次——国际遇到各国党内的“左”右机会主义者对付国际的关系的问题之中，这并不是第一次。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不但中国这样的党——中国党是已经真正在巷战之中在国内战争之中斗争过的，真正有勇敢的战斗员，用武器去打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不但中国这样的党，就是更幼稚的党也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然而必须对于国际有正确的关系。因此，我认为中国应当用快刀斩尽这种对付国际的不正确的关系——秋白的行为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关系。我相信秋白同志在这问题之中不是中国全党的代表。秋白同志不过是一个小小团体的首领之一，他们虽然暂时的有了党的领导，然而他是绝对孤立的，等到共产国际领导帮助中国分部和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之间建立不但是形式上的而且是真正的正确关系，这是中国党发展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

苦乌西宁发言：

现在用不着来重复大家已经说过的话，东方部同志说的话以及马努伊斯基的话我与他是完全同意的。我只要补充几点，立三

在这里很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但是亦有一种可能，在中国的同志听见我们这样利害的批评左倾盲动托洛斯基的倾向及应当为着反对立三路线而往右倾，这个不是我们的意见，亦不是我们的任务，立三讲话之中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没有说是没有注重的说他的左倾之中有很多右倾的成分。这成分在什么地方呢？我想首先是在他对于时局的估量，他说中国一九三〇年的情形与以前完全不同了，这当然是对的，如果他说在中国范围之内的确有了武装暴动的形势，那么，这是很明显的不对，这是很明显的左倾极大错误。然而他的估量之中，他自己亦不相信全国范围之内已经有了武装暴动的形势，因为他尽在等待苏联以及其他各国的帮助，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中国革命胜利。他没有相信中国已经有武装暴动形势这么一会事。

假使我们以为一九三〇年中国情形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很错误的，你们记得一九二九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封信给中国党，那时候我们对于中国形势有一个估量，现在的情形和那个时候就不同了。在一九二九年年终的时候，我们只说中国有革命高涨的薄弱征象，但是等到发展了很利害苏维埃运动，有了几十万人，在苏维埃区域之中，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在中国的策略就应当变更了。如果立三和其他同志要求变更以前的策略，那么，他们是有理由的。一九二九年我们怎么样决定中国党的根本任务呢？第一要巩固秘密的共产党，巩固他的干部及党部的影响。第二要反对合法的，和平发展的幻想，要暴露国民党的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反对这个政策，准备群众到新的高涨。第三主要的任务是取消党和广大的劳动群众脱离的状态，这种任务对于一九二九年是很对的，对于一九三〇年就不够了。一九三〇年苏维埃运动已经巩固发展，我们应当把全中国范围之内的中心任务另外来规定。我们对于中国同志最近的指示，很利害评中国党冒险主义的倾向，可是我们同时除出在全国范围之内就要有准备群众去暴动的方针。

如果中国同志就是那时的领导同志他们只要求这一点，那么这是很对的，因为要赞成苏维埃运动就要有准备群众暴动的前途和方针。然而怎么样去准备呢？这里就是主要的问题，中国同志没有正确的准备群众去赞成苏维埃区域去准备暴动。他们反而取消了群众工作。他们的方针是取消党，取消工会，取消青年团等等，取消罢工运动，他们只知道技术上去准备暴动，这就表示他们的右倾。在工业中心开展群众的罢工运动去赞成苏维埃运动，这应当是中心任务，然而他们所作的恰恰相反，他们的方针和他们对于工人情绪的估量，并不是去准备罢工的，而是所谓准备暴动的，这实际上是右倾的方针，这实际上是掩盖他们右倾的消极行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失败，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农民的后备军没有来得及给工人运动充分的赞助。我们现在看见中国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正是因为广州暴动之后，农民暴动又起来了，而同时工人运动还未能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中国党的任务，是要使工人群众起广大的罢工运动，那才是真正的准备全国的暴动。所以我以为一方面我们批评中国党的左倾错误，别方面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的方针，我们的策略和一九二七年是不同了，我们应当简直的说明中国党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群众去赞助苏维埃运动，为着要直接去推翻国民党政权，准备中国的暴动。我想我们今天会议之后要最终的决定这个问题，就要对于这一点特别着重说明，使中国党的右倾分子不能够利用我们的批评，就是利用我们反对盲动半托洛斯基的错误的批评，来解释到右倾方面去。

我稍微说一说秋白同志的东方式的外交，我们在今年夏天曾经在政治委员会上面省察过秋白同志参加中大纠纷的问题。那时决定秋白同志最好不要再参加中国的代表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其他的同志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就是李剑如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是实际上和托洛斯基派合作的。我们决定了秋白退出代表团，当然我想政治委员会的委员都没有以为秋白退出代表团就

要加入政治局，仿佛是为着在中大小团体工作反而得着了在中国的奖赏。现在在中国是什么情形，我们已经知道。这里作了一个错误，秋白在工作里面固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同志，亦许还是在党的中央，我不是说以后不能够再用他。然而组织党的领导不能够是这样组织的，因为这里一点都没有保障——他是很会作东方式的外交的，不能够保障这种情形不再继续下去。

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想，这里的确没有两面派的手段。秋白同志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自我批评。

再者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立三在自己的结论之中应当再着重地说一次——这就是忠实于国际与忠实于中国革命并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

立三在中国就作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两种“忠实”分开起来，现在他应当明白：忠实于国际就是忠实于布尔塞维克路线，决计不能够分开来说的。只有忠实于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就是忠于国际，方才能够保障中国党的领导能够有正确的路线。

黄平发言：

立三同志的路线已经说过了，是半托洛斯基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还要加一点，就是反国际的路线，他不但在理论上离开国际路线，他并且实行了很激烈的斗争反对国际的决定。他对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错误了解，完全是托洛斯基主义，他不懂得地域上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并且不懂得工人和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虽然他讲许多左倾的暴动等等的话，然而实际上他不相信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不相信能够战胜帝国主义，所以他说一定要有世界革命，一定要联合蒙古等等，这很明显的，证明他不相信中国革命，证明他的思想是托洛斯基主义。他在政治局里面没有注意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没有注意建立根据地，巩固红军，巩固红军之中的党部，组织贫农团，贫农团应当是我们在乡村之中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保障

革命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城市之中呢，在他看来，每天都是政治罢工。中国城市最好的条件有最利害的危机，米价高涨，银价低落，军阀混战，工人状况恶化，合理化加强等等自发的罢工运动很多，但是没有去领导罢工，比如看海员工会的报告，一只轮船开除了十几个海员，然而我们在香港的赤色工会不利用这个机会根据工人的要求去组织真正的斗争，而说现在要准备香港一切轮船的总同盟罢工。我们给工人说发工资的时候你们不要去领钱而准备打死工头，以引起政治斗争。这并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我说的不过是举一个例子来证明工会怎么样在那里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自然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这种实际工作之下，职工运动和我们的赤色工会自然不能够发展，自然现在中国赤色工会的海员是非常之少的，因为党不会去吸引最好的工人。现在的情形怎么样呢？有些同志说，立三路线还没有取消他的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还是有，并且不但在中央，并且在各省亦是有的，因为三中全会没有反对他的路线，没有暴露他的路线，反而掩盖他的错误，并且没有有执行国际的指示，所以这些错误是不能够纠正的。三中全会的领导对着国际把立三的错误掩蔽起来，这是外交手段。现在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全总常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亦有这样的错误，这个决议案说应当着重政治罢工，现在政治罢工是和经济要求混合起来的。这可以使我们惊醒国际路线还没有执行。

东方部的书面报告对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估量我们是完全同意的，这个报告的结论说，现在中国党内的问题是小组的问题，我亦是同意的。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在中大的斗争里面反对东方部的领导，亦就是反对联共在中大的领导，以及反对国际的领导，这都不是偶然的，这都是最没有原则的纠纷斗争。中大的斗争里面有一般同志是和托洛斯基派合作的，他们亦就是实行这种斗争的人。同时，在中国党的领导极激烈的

反对国际的代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自然不是偶然的。国际代表在中国甚至于不能够谈政治问题，因为中央不允许他们谈。这不但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并且在方式上亦和秋白等等在中大问题里面一样的。同时在国内反对莫斯科的学生，因为他们反对立三路线和赞成国际路线，甚至于把他们开除出党。同时立三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党的领导不但不开除他的政治局委员，并且替他掩盖错误，这是小团体的情形，我要举一个例子。

在东方部讨论立三错误的时候，我自己亦作了一个错误，我是对于他调和的，我现在明白了我所以作这个错误，亦是小团体的感情，因为有这种感情，不指出他的错误，不反对他。我很快的在反对立三路线的讨论之中，在几个人说话之后，立刻就跑到别个极端说，要反对张国涛。这不是政治上的，不是原则上的，而是小团体的情形。然而我要说东方部没有讨论之前，我参加了一次列宁学院的学生大会，校长也在那里的，我那时就公开的说立三路线完全与国际路线不同，这是托洛斯基路线，我们应当反对他。此外在职工国际的大会上马同志是参加的，我亦是站在国际路线上的，说要反对不要经济斗争的宣传。我想我当时相当的是了解国际路线的。然而讨论到三中全会的时候，讨论到立三路线错误的时候，我就不记得他的错误，而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就是对于小团体情形和对于政治错误的调和。现在我一定在国际领导之下反对两面派的手段，反对党内小团体式的领导，而实行国际路线，我还要加一句，党内领导小团体情形不是偶然的，现在领导机关里面还有陈独秀主义领导的残余。虽是同志声明抛弃陈独秀时代的机会主义，但是现在我们看看这些同志一部分说来就是秋白和立三还没有脱离左倾托洛斯基的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而且继续小团体的斗争，我同意报告上所说的领导机关有两面派的手段，所以我同意因此而应当有的组织上的结论。

皮同志发言：

我要讲的话已经很少了，我的感想是这个样子，中国同志甚至于中国党的干部直到现在还没有了解去年党所作的错误，我记得职工国际四次大会上的中国代表团在当时中国委员会里面差不多都在每一句议决案里面都要增加武装工人，武装训练，创办兵工厂等等的句子。后来与他们解释了很久，说明我们并不是反对武装，但是现在我们是讨论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必须说明白在职工运动中怎样作工作。今年职工国际五次大会开会时候是已经过了两年了，而中国代表团的主席以及许多代表的意见是和立三一样的，当我们与他们说领导机关作了错误，他们就完全赞成这个路线，这决不会是偶然的现象。我们的党没有作工作去研究一九二七年党所作的错误。政治局说到处都要暴动，在一切工业城市里面都要暴动，他说工人不要罢工，只要暴动，然而什么人来举行暴动呢？你们是知道的由党部由青年团经过他们可以领导暴动。然而中国的全总解散了，党部是解散了，青年团是解散了，怎么样可以领导暴动呢？中国党却组织了一个万能的参谋部，可是没有军队的参谋部，因为这个参谋部的决议是号令不出都门的，是没有人来执行的。我们有一九〇五年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你们知道一九〇五年革命最主要的动力，组织革命领导革命的动力是和工人有联系的党部。十月革命亦是这样的，当时青年团还没有巩固，党部是经过职工运动里面的共产党员去调动极广大的群众，如果解散了这些组织，那么还讲什么暴动呢。我有这样的感想，仿佛有一双手在那里指导我们的党，指出来须要暴动了，可是同时这只手把能够举行暴动的指头都斩掉了，所以就是暴动在什么地方爆发起来，党亦不能够去指导，如果没有这样的手，那么一定是不相信中国的力量，所以解散了团体。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比离我们最近的地方的交通关系都要好些。你们有了错误，我们曾经立刻纠正。当时你们通过了一个不正确的决议案来，我们反对这个决议案的公布，我们立刻就纠正路线，如果中国党的

领导同志愿意纠正路线，那么他们立刻就可以纠正，因为立刻我们就指出错误，并且就指出他们的出路。然而中央并不召集全会来报告他们和国际路线的不同意，而立三同志反而公开的反对国际，他是说过两条路线，他说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中国革命比国际重要，立刻要反对国际路线，这是事实，我们有文件在这里。国际曾经说对于帝国主义者亦要利用应付手段，不要一下子就反对帝国主义者，而要离间他们像俄国党在不列斯特和约里一样的采取应付手段，可是中国党回答说对于任何帝国主义者都不能够调和，他们都是我们的仇敌等等，我们的指示里面只有三四条主要的意义，这些意思到现在还是有用的，虽然我们己经空费了许多时间。这几条是什么？创造有战斗力的红军，就算人数很少也好的，要有无产阶级的成份和领导，要有很好的武装，要极力的保持他，不要让他散漫或者被打破，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所有的情形，是在任何一个革命都没有过的，比如说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我们在一九〇五年为什么失败，我们当时不但在城市里面甚至于在小城市里面都没有一个军队是我们的，我们当时没有武装，就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当时资产阶级在莫斯科暴动的时候，已经离开革命。我们还要反对警察，宪兵，军队，要反对当时组织起来的黑百团。如果我们当时在莫斯科或者在圣彼得堡有一个军队，就算只要有五万人，我们就可以胜利的。当时工人阶级全体是赞助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是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力量抵抗俄皇的军队，我们就可以胜利，你们知道的，在莫斯科资产阶级亦不能够运动一个军队，军队不是我们的，但是军队是中立的，如果我们有了小小的部队，那么这些军队都可以围绕着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胜利。我们在中国，这样部队是有的，不过是很散漫的，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红军的纪律不好，在长沙的时候我们军队已经要进城，但是有一个军官说退兵，于是大家就退了。所以红军要受新训练，并且要造成技术的基础。至少要有敌人一样的军纪。

我们一定要使红军能够建设，不能够使他们两三年都是跑来跑去的，这是我们将来革命胜利的基础。没有红军我们很难和蒋介石斗争，尤其是和帝国主义者。我们以前给的指示是这样的，这种指示在现在还是有用处，一定要作到。我们以前希望当立三作错误的时候有同志从这里回去可以纠正这些错误。但是他们在三中全会上面倒去研究他们的所谓不同意。我们指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巩固苏维埃区域，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要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为什么我们在一九二七年失败了？因为我们党不执行国际的指示，不发展农民革命，不给农民土地。不去这样团结农民在我们党的周围。现在亦是做这样的错误，第一个并且主要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我们革命的将来，要看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不正确来定：农民究竟是赞成我们还是反对我们。你们知道在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后，农民是极力保持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因为我们给了他们的土地，他们怕地主回来夺回他们的土地，他们同着我们一起奋斗，他们帮助了我们的胜利。他们难道以为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帮助了白党武装起来，无产阶级若没有农民的军队就可以胜利吗？十月革命的时候，正确的解决农民问题使我们得到胜利的。这个问题在中国怎么样解决的呢？在中国现在有些地方是按照生产工具分配土地，可是我们知道有生产工具的大半是富农，有些地方禁止给苦力土地，而苦力正是我们要依靠的人。不给苦力土地，仿佛是怕他们变成小资产阶级，对于雇农亦是这个样子。总之对于赞成我们的人能够与我们一同奋斗的人，我们不给他们的土地。在农民运动里面作错误就是失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里面我们拿农民的面包，他们不满意，有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对我们。然而哥尔加克占领的地方，他要把土地还给地主和富农，农民总是帮助我们去赶哥尔加克，因为农民知道以前的地主回来，不但要拿面包，并且要拿他们的一切。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对于中国的苏维埃农村有正确的关系，那么甚至于

用不着很大的宣传，因为这种事实到处传布出去说共产党得胜的地方给了农民的土地，并且生产工具也分配了，所得税很少，而且帮助农民组织设立手工工厂等等。而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地方，农民的一切都被人家夺掉了，这种情形是很好的宣传，比千万张传单还有用。我并不是反对宣传，反对演说，但是实行是主要的动力。我们主张苏维埃区域里面的农村应当真正的改造。

一九〇五年的俄国大概有八千万的农民，俄国人口总共不过一万万两千万，而工人阶级当时还只有三百五十万，现在中国呢，我们有三万万五千万农民，而工业工人顶多不过两百万。如果我们能够使这个广大的农民群众到我们这方面来，那当然要苏维埃区域有正确的政策，这是为着革命的，所以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

我们只是说要发展工业区域里面的罢工。我们知道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都有很大的罢工，在一九二九年有七十四万人罢工，自然我们并不是永久能够领导罢工的，自然有些地方我们是始终领导的。而到了立三大叫暴动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听见大城市里面罢工的消息，甚至于经济罢工亦没有，这是甚至原故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禁止罢工？是不是我们同志作了反对罢工的宣传？这要弄一弄明白，黄平同志说银价低落，世界经济的恐慌亦到了中国，工人状况自然更加恶化了，然而罢工倒反减少了，至少在大城市。这是因为不去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以便和农民运动联合起来，所以农民暴动没有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是因为不去发动工人阶级使他们拿到领导权，所以甚至于经济斗争亦没有，中国党领导同志对于我们指示的态度以及立三与我们的冲突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前从这里回去的代表第一个任务是赶掉立三亦许还要赶掉其他赞成他的重要委员。但是他们所作的事情刚刚相反，他们掩盖立三的错误，他们作的事情国际九次扩大会之后英国同志作的错误差不多，他们想把两条路线并成一条。当时英国共产党领导同志不去执行九次扩大会的决议，就是“阶级反对阶级”的路线，他

们反而极力的去对工人说没有什么变动，路线只有一条。所以他们的旧路线仍旧中央全会通过，现在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亦是这个样子。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不去清楚的提出这个问题，不去斗争和讨论，不去明白指出一九二七年盲动主义的倾向弄成了什么样子——这些倾向实际就是引起立三路线和国际指示的不同意的。这两条路线是绝对不能相容的，绝对不相像的。应当要使党的干部明了究竟哪条路线是对，哪条路线是错，无产阶级弄得莫明其妙，亦不知道立三路线是不是国际路线，这个样子怎么去宣传无产阶级并且去领导他呢？关于这一点亦没有写。

我们接到一封信说“我们派立三到莫斯科是为着好些组织问题，我们请求他作完了这些事之后就回来”，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派立三来，是我们去叫他来要问问他清楚，究竟他的路线从什么地方来的。而政治局却要他回去仍旧执行他的路线。

为什么以前不把这个很清楚的在党报上提出来使全党都清楚起来明白这些错误呢？我们枉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放弃军阀混战的时期，我们以前以为这里回去的同志可以把事情弄好，可以把事情弄清楚。他们是不是这样作了呢？所以我们在主席团把这个问题全部都提出来，使各个共产党都知道国际是什么路线，中国党是什么路线，就是那时的政治局是什么路线。

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要无产阶级知道已经作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作过二次，以后无论如何不能够作第三次，现在还是有办法的，应当

要实行国际的指示。

政治局曾经不要给雇农土地，然而政治局委员甚至于并没有去看看苏维埃区域。也许是很困难，但是我们俄国亦有过田尼庚，哥尔加克，尤狄尼茨，可是我们在那些区域亦作过工作，我们亦是用性命去冒险的。而现在中国党和苏维埃区的交通关系还没有建立，好的力量还没有在苏维埃区域里面，这种情形一定要变更，我不记得哪一个同志说过的，蒋介石已经派了很好的军队去打苏区，我想这个同志是对的。现在军阀战争有一个小小的停顿，然而这个战争一定又要很快的开始。我们应当仍旧注意苏区派工人派党里面好的力量到苏区去，去巩固苏区，当然并不是要立刻占领长沙武汉等等，而是要在苏区内部巩固起来，实行我们的正确的路线给农民土地。要在非苏区工业城市里面发动群众的战争，提出具体的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进攻苏区，在工人群众之中广泛宣传苏维埃区域使他们看见苏维埃区域是一个基础，可以建设全中国苏维埃政权。

立三结论：

今天讨论之后，我听了许多同志的讲话，我更加了解我自己错误的精神了，我承认我自己的错误是很诚恳的，但是也许亦有个别的错误，对于我还没有完全了解，然而我要研究我自己的错误。我认为我过去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中国党向来不尊重并且看轻国际，这已经有好几年了，尤其是在陈独秀领导的时代对于国际是很不尊重的，同时以为国际不懂得中国的情形，不能够详细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我听见说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他已经总合世界革命全部经验。这是非常之对的。我作错误之前，我曾经有这样的意见，仿佛国际是不会详细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我现在知道这个意见是非常之错误的，国际是真正世界革命的领袖，只有列宁主义的领导能够使中国革命胜利，企图和这个路线对立是错误的。

我简单的说说我的错误。起先我懂得了我的路线与国际的路线完全不同的，然而我以为我的路线比国际的路线正确，在这个基础上就发生很大的错误：第一，当我一个人在中国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路线是一个特别的路线，但是恩来秋白回去之后，对我说你把自己的路线和国际的路线对立是不对的，如果你以为你有一个特别的路线，那你就是不懂国际的路线。我以为他们刚刚从莫斯科回去，一定是比我更加知道国际路线，因此我就与他们同意了。

(皮同志问：当时只有秋白说，还有别一个亦是这样说呢?)

不对，恩来亦是这样说，他们两人都是这样说的，他们说不要并且不应当把自己的路线与国际的路线对立起来，不要说自己的错误，不要削弱领导机关的威信。我为着保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起见，所以不承认我自己的错误。不但我是这样想，并且许多政治局委员都说不要讲两条路线。等到三中全会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有一条别的路线，我在自己讲话的时候，把我自己的策略错误和政治错误联系起来，但是不说明有二条路线，因为怕损害了领导机关的威信，我到了莫斯科来了之后，看了国际给中央的信，批评我的错误说不单有一个策略的特别路线，并且有政治上的特别路线，反国际的半托洛斯基的，我就承认了这完全是对的。然而我从没有像三中全会那样想法。我在东方部作报告的时候，我还是顾到要保持中央的威信，要保持三中全会正式文件的威信。我同意对于我个人错误的批评，然而我怕批评三中全会。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以为如果我要批评三中全会，那就是党的破产，那就要引起党的危机，然而我现在明白了，能够战胜一切倾向的，只有国际路线，没有别的路线能够战胜不正确的倾向，只有国际路线能够领导中国党胜利，只有国际路线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中国党在现在这种危机的时期，尤其重要的是小团体问题。形势是非常之严重的。

这种小团体状态在中国党里面现在还可以发展，这种小团体的纠纷斗争，现在比六次大会时期还要严重。

这种小团体的斗争首先就是秋白为领导的，秋白在六次大会的时期以及在六次大会之后，领导过不少次小团体的斗争，就是无原则的党内纠纷。所以他首先会领导和组织小团体的斗争，别方面也是从来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人，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会领导小团体的斗争？自然还有其他的许多原因，我上次在报告之中已经讲过了。

现在的确有许多条件足以引起党内的小团体的斗争。现在这种小团体的斗争可以亡党，因为中国的客观条件是极厉害的白色恐怖，这种小团体的斗争，就是党的舞台。因此严重的要求国际立刻要有组织上的办法去纠正三中全会的错误去纠正立三错误和立三错误的余残。要在党内开始实行从下层直到中央的关于立三错误的辩论，要使党员群众了解立三错误的根源，并且了解什么是国际，应当怎么样去领导中国的革命，什么是国际的正确路线。我要求国际把中国党从危机之中挽救出来。

我承认和森同志的说话是完全对的，在党的历史上领导同志的确作了严重的错误，无原则的小团体的斗争还不算在内。领导同志的任务是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抛弃以前的恶浊小团体的斗争，而把实行国际的路线担任起来，我了解自己的错误之后，我应当完全抛弃他，并且坚决的实行国际路线，不但反对自己的错误，并且反对对我的错误的调和，以及对于国际的两面派的手段。我答应国际，我要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并且实际上到中国去实行这个路线。每一个领导同志在这个地方的都要抛弃以前的小团体斗争，真正实行国际的路线去领导中国的革命。有许多同志要求我不但在口头上承认，并且要实际上证明。我完全同意在实际斗争里面我一定证明我已经改正我自己的错误，我已经有不正确的路线。我公开的说承认错误是一件事，改正错误又是

一件事，我能够相信我自己不是在实际的工作上一点小错误都不作了，因为错误不完全由你愿意作不愿意作，我的错误有很深的历史上的根源，所以要了解我的错误，一定要有长期的研究，因此我一方面极力要避免我自己的错误的重复，别方面我要研究我思想上的错误真正的去了解他，而使他不至于重复。

最后，我完全同意马努伊利斯基的意见，我是召集四中全会来改正三中全会的错误，彻底批评我的错误。然而我认为有一点，一定要指出来，就是四中全会的成分。四中全会里面一定要有地方党部的代表，大的支部的代表。尤其是以前批评我的错误的同志。四中全会里面一定要有大的工厂支部和苏维埃区域的代表。只有这样的四中全会才能够保障彻底的批评我的错误，而挽救党的危机。这是挽救党的危机的唯一办法。

不论国际要有什么办法来纠正我的错误，我都要尽力来帮助国际来反对中国党的领导的错误路线。我现在一点都没有怀疑：我的路线是绝对错误，国际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然而我不能够相信或者实际工作上不再做错误，所以必须坚决的站到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完全打破我的错误的路线及其一切残余。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

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 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

(1930年12月9日)

(一) 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开了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曾经有过很长久的冲突——就是在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之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以李立三为领袖，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站在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的，同时亦是站在盲动主义的立场上的。因此，要估量三中全会，就必须先简单的说一说以前争论的实质。

(二) 共产国际最近对于中国问题的文件是这样估量中国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人的错误的性质。

“立三同志所做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许多错误观点的总个行动，形成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总方针。这种方针不能够不发展到盲动冒险主义的策略。……”

的确的，立三同志的战术计划，策略上和组织上的路线是这样的：

它认为全中国的，甚至于全世界的革命形势已经充分成熟，同时，又完全不相信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土改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有战胜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可能，认为如果不是立刻爆发世界大战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中国革命不能胜利的——因此中国党政治局的领导就在今年六月到八月的时候，完全没有准备的决定在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到处去实行武装暴动（武

汉，南京，北京，天津，奉天，广州，哈尔滨及大连等等），并且
在上海决定实行政治的总同盟罢工。这些暴动的计划，并且还是
预算到苏联和蒙古来干涉中国事件——要想苏联和蒙古的红军派
到中国去，要想苏联先和日本帝国主义冲突起来，然后才发生世
界的大战以及全世界的革命危机。

他们提议，为着实行五年计划，为着领导世界革命，苏联和
国际应当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

这种托洛茨基主义式的观念，是责备国际和苏联有狭隘的民
族成见，其实是用来掩盖自己的悲观主义和拼命冒险的心理。这
种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同时又是盲动主义的战术计划，就认为中
国革命的现在中心任务是：

第一，创造城市的工农红军，要有纪律，成分要有工人的，要
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并且要有坚固的基础地。

第二，在这基础地上建立苏维埃政府。

第三，努力去发展工人阶级的经济战斗，使他更加革命化
(而工人运动到现在还是比农民运动落后)——总之，这种共产国
际的根本路线是清楚的估量了力量的相对关系，和现在阶段上的
革命任务，依照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情形，而规定出来的，
可是立三等实际上是把这个路线推翻了，他们认为这是割据主义，
这是不要苏维埃政权在城市中胜利的上山主义，只是要在无产阶
级直接影响之外的地方去建立苏维埃政府。

很明显的，这种方针在表面上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上和托
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相同的路线，托洛茨基最近对于中国问题的主
张，登载在它的机关报上（一九三〇年十月号托洛茨基派的公
报）；这种方针是完全不能估计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特点（中国的
封建割据状态，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极大
意义，中国革命的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土地革命日益生长的环境
之中，已经有许多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如果有正确的路线，

他们“一定能够保障革命的强大发展。”)

可是中国党政治局有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空谈,自然就不能够正确的解决土地革命的问题。立三没有了解土地革命的贫农中农的性质,贫农团的问题没有提及,现在就过早的禁止土地买卖,现在就实行有些地方的消灭富农,企图建立有计划的经济,集体农场和苏维埃国立农场,使中国离开革命。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甚至于土地问题里面引起农民暴动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在湖北的某县),并且引起游击队在富农领导之下变成红军的现象(第十四军)。

可是,党的领导却没有充分的反对许多党部里面实际工作上的富农路线(比如按照生产工具分配土地,甚至于承认重新分配土地不是革命的办法——这是孟塞维克主义)。

最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城市之中玩弄没有准备好的政治罢工(二个月之中决定过七次总同盟的政治罢工)并且阻碍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开创精神,党的领导完全不管组织工人阶级部分斗争的任务。在这个时期之中完全抛弃在黄色工会之中的工作,同时解散自己的工会,而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上层机关,所谓行动委员会来代替工会。现在中国赤色工会总共只有十一万四千会员,其中三分之二在苏区,在大城市之中赤色工会会员是很少的,比如在上海——二一〇〇,武汉——二〇〇,香港——九〇〇,天津——五〇〇,唐山——八四〇。

今年夏天党的领导,脱离群众而官僚主义化的证据,不但在于准备暴动的时候,取消了赤色工会,而且全国青年团的组织亦取消了,只剩了一个万能的中央总行委,仿佛C_y的组织阻碍群众运动,仿佛十月革命的力量,是在于一九一七年没有青年团。

很明显的,这种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的路线,不能够不使立三同志走到反共产国际的斗争。有好几个礼拜中国党中央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续准备已经决定的武装暴动,而开始把“忠实于国际”和“忠实于中国革命”对立起来,并且说国际不懂

得中国的革命情形。甚至于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只有权利和政治局几个委员谈论政治问题，而不能够和别人谈，甚至于和总工会的领导者亦不能够谈。

(三)虽然党的领导有这样严重的错误——象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荒谬绝伦的路线，但是同时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确有极大的胜利和发展。

苏维埃区域仍旧发展，现在已经有好几千万人民（四千万到五千万）；这些区域里面的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阶级私有制度和高利贷者，推翻了国民党的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红军已经有十万人以上，枪枝有六万，非常之勇敢的；工人运动虽然比农民运动落后，然而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假使还不能够算是全世界的第一位，那么至少亦是第一等国家之中的一个（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有七十五万人，一九三〇年一直到夏天，罢工斗争是没有低落），如果中国党有正确的领导，那么就可以保障胜利的巩固，并且继续发展革命的进攻，当然要按照国际所给的指示。中国党的三中全会是在这种条件之下开的。

(四)研究了三中全会的材料以及中央给各地的信，党报上的社论，还有最近在东方部的讨论（立三同志是参加的），所有这些，很明显的证明：秋白同志所领导的三中全会没有尽他的责任，没有揭发和纠正以前的一部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没有规定出具体的任务，没有估量到革命斗争的经验，尤其是苏维埃区域红军战争的经验。

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关于两条路线的问题。国际最近给中国党的信说，“必须要明白：不是什么偶然的不同意，或者是在估量时局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的不同意。必须完全明白：在现在中国革命极紧要的时期，有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着”。

而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说：“三中全会认为政治局的路线是正

确的，是和国际路线一致的。”这个决议案对于错误的批评是说：“可是三中全会认为必须指出政治局最近对于时局形势的估量，在许多重要问题里面，有不清越的和错误的地方，对于现在形势有过分的估量，忽视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视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同时三中全会指出来：纠正政治局的策略错误并不就是变更党的路线。

三中全会在这种方针之下没有一个决议案提到立三路线的问题。主要的火力不是集中在克服党的一部分领导的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而是机械的了解右倾的主要危险，而把火力集中到何孟雄方面；这个政治上的手段，三中全会的领导者不但是用来掩盖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错误，而且模糊了真正右倾向实际工作上的表现，以及假的右倾表现（何孟雄）。比如右倾的极严重的表现是在好些区域里面按照生产工具分配土地，是抛弃对于工人斗争的独立领导，是在苏维埃里面常常没有工人的领导等等，这些错误三中全会都没有讨论。

第二，关于长沙战争的教训，以及关于创造正式红军和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国际的信和电报里面说：“这些情形（就是红军和苏维埃的现状，工人运动的落后等）使我们必须要知道，现在去占领最大城市，猛攻现代的帝国主义军队，进攻最大的中心城市，还不是红军力量所能够的”。

这种情形，这个进攻长沙的教训，直接和国际上面所说的三个主要任务有关系的，（一是创造正式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二是创造苏维埃政府，三是开展无产阶级的部分斗争，而使他们革命化）

而三中全会说“第十三项，现在工农红军从小的游击战争进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正式的革命战争……现在这种情形（就是说争取一个和几个工业中心）在湘鄂赣区域尤其成熟。

所有以后的许多文件都证明中国党仍旧继续企图进攻长沙，

南昌,而完全不管或者不了解创造正式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第三,土地革命的问题

很明显的,正确的去领导土地革命,在革命的现在阶段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而三中全会对于土地革命的教训以及以后的具体任务,在很大的一个糊涂的政治决议案里面只写了三行:坚决的彻底的执行土地革命和分配田地。

三中全会没有提起共产国际说的贫农团,没有提起土地革命的贫农中农的内容,没有说出消灭左倾的混合物——就是企图禁止土地买卖消灭富农,建立有计划的经济,集体农场和苏维埃农场。同样三中全会没有去纠正右倾的错误:比如不分配土地给红军的兵士,按照生产工具分配土地。

很有意思的,三中全会亦没有责备立三的右倾错误,就是联合富农的说法(秋白同志是赞助他的)

第四,同样没有估计城市之中最近罢工斗争的经验,没有估计职工运动的十分薄弱,没有估计七次总同盟政治罢工的失败原因。不去责备对于赞助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真正广大斗争的不注意和消极,不去责备没有准备的玩弄政治罢工,三中全会却集中火力去反对一些尾巴主义者——他们是把准备政治罢工放在第二位。如果三中全会同时这个问题里面打击立三的错误,那么责备尾巴主义者是可能的。不然呢?这种说法就是很明显对于右倾路线的调和。

关于黄色工会的问题,三中全会只说要实行消灭黄色工会的策略。

第五很自然的,关于立三反对国际斗争,必须研究他的错误,使以后这种错误不会重复,并且布尔塞维克的去教育党员——关于这些,三中全会完全没有说起。

总结起来,必须指出最厉害的立三主义的形式(到处暴动的战术计划),总算是取消了,然而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病根却赶到身体内部去了,两种的不同意见,无原则的混淆起来了,完

全弄得模糊了。

(五) 必须特别指出秋白同志的在三中全会的作用。关于国际的方针秋白同志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些，秋白同志在动身到中国去之前（已经在反对立三主义的时期里面了）曾经声明完全同意国际的路线而责备中央的一部分尤其是立三的错误。

可是秋白同志到了中国之后，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领导者，不但去执行国际指示，反而对于立三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态度（政治决议案是他起草的，上面已经引过）这是对于国际的指示，运用两面派的手段，因为他已经对于国际指示是表示同意的。他在三中全会的演说，不去揭发立三同志敌视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而只批评立三有个别的错误，就是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和国际路线对立的。

很明显的秋白同志的出发点，不是国际原则上路线的利益，而是小团体的利益。秋白同志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六次大会的时候，他不但为着右派的错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而且为着和罗明纳兹共同在一九二八年所采取的托洛茨基盲动路线而受过批评。

总结起来，必须说：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二，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六，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的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

（国际东方部对于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报告）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

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

——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
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
(1930年12月22日)

一、国际七月决议案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真正发动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进攻路线，最近国际来信又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和危害党的实质，要全党的布尔塞维克象一个人一样，一致的团结起来实行国际的路线与对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斗争。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这一指示下，深刻的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认为立三路线之为害于党已成无可争辩的事实。立三路线之历史的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而组织上陈独秀的家长制度又给立三路线的统治以组织上的保障，所以自中央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遂日益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遂成为中央的路线而统治着全党。从此直到三中全会，中央的工作是站在反国际路线之下进行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方针，掩盖着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引导党到消极和失败，而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的。三中全会本是为的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但因为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来接受，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如说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中央路线在六月十一日后还是与国际一致等等；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

全党工作仍然在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直至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虽承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但在十一月二十五、十二月九日两决议案中，在中央告同志书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如首先肯定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国际路线，后来又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发展二十五日决议等等；这都是不能斩断调和主义尾巴之不可容许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现在公开的承认这些错误，并暴露这些错误于全党，要从错误的认识中来确定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与执行国际路线的总方针。

二、现在政治上与党内的情形是怎样呢？首先是红军苏维埃区域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不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去建立和巩固真正的工农红军，不去建立苏维埃政府与实行自己的政纲，不去发动广大群众有步骤的争取在湘鄂赣省区一省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反而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结果造成目前苏维埃区域整个削弱与红军受了严重打击的形势。立三路线的指导是在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调和主义的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仍旧统治着，从中央以至各地仍在空喊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的口号，而并未实际去真正努力组织群众的政治经济战斗，去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因此，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及发动群众的能力大大削弱了，赤色工会的组织退步了，党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大大削弱了，群众组织的独立系统受着障碍了，党渐渐脱离群众了，党的指导机关与党内群众也渐渐脱离了，青年团的转变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广暴纪念示威的失败，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证与总结。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党内情形也就呈现出非常状态：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打击了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同志，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几次反抗国际的决定和指斥，这就使最能保障正确路线执行的国际领导受到障碍，使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使党的领导

走上一错再错的覆辙；——这是目前党内最严重的危机！

三、中央政治局在了解了自已错误与党内危机之后，特通告全党执行下列的决定，以实现坚决的布尔塞维克的转变：

1. 三中全会的决议与最近两次补充决议及告同志书是不能领导全党执行国际路线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的。要坚定这一斗争战线来执行国际路线，只有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在这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与最近来信是党的目前行动的根本方针。

2. 为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根本的办法，改造各级指导机关是紧急的处置。在这里，必须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党内民主化而不妨碍秘密条件，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必须坚决的反对以派别观念对抗反立三路线的分子，而造成掩护立三路线的小组织行动。这样，才能冲破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而开展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斗争。

3. 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这不仅解决党内问题，且要更进一步去解决一切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如党纲问题等等。

4. 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一长期艰苦的工作。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所以反立三路线的本身便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一切用各种形式来掩盖在立三路线之下的企图，党都须予以无情的打击，这不仅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且要有组织上必要的制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必须在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来真正实行实际工作中的转变，绝对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将国际路线解释成为退却的路线，尤其要反对托陈取消派利用这一时机来做破坏党的阴谋。

全党同志们！动员起来！要挽救目前革命进展中的部分失败与消极，要挽救目前党内的危机，全党同志只有团结一致的站在这一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立场上，来执行国际路线，来实现上述决定，这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新的伟大胜利。

（摘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



五、共产国际与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

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 紧急会议的决议

(1930年12月9日)

最近在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的来信的指导之下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且开始进行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在这解释工作的初步所表现的许多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必须根据国际来信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更彻底的明白的指出：

(一)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立三路线。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前后，三中全会之前的最后一期，立三路线领导了政治局的工作。所以对于这一时期政治局工作的正确估量应当是：当时政治局的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是不正确的。

(二)三中全会却承认这一时期中央的路线仍是和国际一致的，承认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正确的。因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就是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路线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这就把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不能并存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混淆起来（恰如国际来信所说），这就不能彻底解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

(三)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就不能够充分正确和正确的遵照国际路线去规定新的策略和任务，更不能够使全党明白的了解，共产国际路线之下的策略和任务是和立三路线的策略和任务，原则上完全不同的，这样即使三中全会了解到必须实行策略

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整个转变,然这个转变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且实际上正如国际来信所说又正在重复这些错误。

(四)三中全会有了这种调和主义的立场,自然对于立三同志的各个反列宁主义的理论,也不能够给以必须的和充分的批评和指示。现在是却正需要从解释工作中领导这一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的斗争,反对一切调和主义的错误,执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以根本肃清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存在以及其领导的影响。

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而彻底明确的完全遵照国际路线来规定党的任务和策略,这样才能保障路线上的转变的完成,保障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斗争的彻底,消灭一切调和主义的错误,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得到完全的解决。

(录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

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①

会议讨论结束，要求同志们原谅。在四中全会之前，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国际，保证扩大的四中全会安全的举行，因此今日晚十时半钟必须结束，这是我们的责任。唐山同志来迟，要求发言，但我们不能因此动摇了我们会议的时间，动摇了对国际的保证，现在另约时间与他会谈。

结论只说三个问题：

1. 李立三主义
2. 调和主义
3. 四中全会和党以后应该如何去工作

1. 为什么中央的一切同志都无条件的服从立三主义，全总在取消工会时，没有反抗，C. Y. 在取消青年团时，也没有反抗，主要是同志们被立三路线“左”倾的词句抓住了，如秋白恩来也是如此，被“左”倾的词句抓住，结果使立三路线来与国际路线反抗。在六七月间我们如果如立三路线一样的认为当时已经是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的确将使党受到损失更为利害。如果我们清楚的认识立三路线是退却的，是与真正进攻的路线不相容的，即不会发生调和主义。调和主义的发生，根本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根本性，同志们只以为他是夸大的，只说他是热血的革命家，这样估量是不对的。他的路线，与真正革命的进攻路线是不相容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于暴动的前提也是不相容的，立三路线

^① 本文原件是未经整理的会议记录稿，文字错讹较多，内容也不完整，均照原样刊印。

使党、青年团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受到了大大的损害。我们要明显的认识，国际批评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热血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盲动主义的英雄，——一个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在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时期，我们要彻底的打击和肃清立三主义……什么是政治局对立三政策取妥协的调和态度以及发生许多动摇的原因呢？无疑的是没有明显认识清楚立三主义的根本性质。根本上这些同志们在想：这件事并不怎样很险恶呵，立三只是过分估计了现在的形势所以要举行暴动。他是一个过于热血的革命家。

立三主义这种估计对于党是错误和不幸的，它的理论及实际与进攻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义内）是绝不相容的，它与有系统的组织及领导革命，与有系统的建立暴动底前提无丝毫相同之处，立三主义的系统是领导党及群众走向失败，解体及解散的系统。在对于党这样严重的三个月（六月，七月，八月）中无疑的还无有直接革命形势，即使已经有了这样的形势，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亦必会使党破产。

应该绝对的了解，共产国际之所以严厉的批评立三路线，不是因为他是太热心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冒险辞句的英雄，因为他不是革命的组织者。站在全国暴动与中国革命胜利的观点上我们△△集中火力反对消灭党而不能使革命胜利的立三路线。为了在城市中能真正有力的组织与领导群众罢工，我们应〈批评〉立三对于总罢工的空谈。为了真正的获得与保持中心城市，我们应批评立三〔三〕在武汉与南京的冒险政策。从暴动的观点上我们应批评立三这种冒险的机会主义。

从六月到八月间的形势是怎样的呢？毫无怀疑的我们当时是在剧烈的形势与运动高涨的时期中。军阀战争与革命化的形势普及到更多的省份中，农民暴动一天一天的蔓延，苏维埃区域渐次广大起来，红军有伟大的成绩。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群众逞〔呈〕现

不安的情绪，时常发生兵变。小资产阶级亦日益进化，在城市中还无有广大的群众运动——这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无力量领导与组织工人群众——但是罢工的浪潮是增涨的。

自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不能决定暴动。在日益加剧的斗争中我们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力还是很小，还没争取了工人阶级最主要的阶层，在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还是很少，还无有建立了苏维埃根据地与将红军改造为革命底真正的铁军。

但是在这种很顺利的形势下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可以扩大他在工农及士兵群众的影响。如果党当时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党无疑的在对于群众的领导中可获得伟大的进步。共产国际当时曾这样警告党的领导：不要落在运动后面，不要冒险。

党本应根据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真正的进攻政策（在这个名词的真正的字义下），而立三却领导着党反对国际，并且采用了叛徒们所用的辞句，“或者忠于共产国际的纪律或者忠于中国革命。”

他开始谋杀了苏维埃大会的宣传运动。他超过了共产国际代表径自将准备会议改变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他解释说，现在是革命行动的时期，不能举行苏维埃大会。立三将苏维埃与革命行动对立起来，将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下群众的动员与革命行动对立起来。同志们，我问问你们，这是一个怎样的革命家呵！他空谈全国暴动与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是他谋杀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宣传运动的理由。

立三的第二步是六月十一号的政治决议。他自觉的将这个决议当作反共产国际的斗争纲领发给各级党部。这个决议是完成了所谓的立三主义的整个理论与实际。他反对共产国际的立场——集中苏维埃区域，建立铁的红军，创立苏维埃根据地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他反对我们发展与领导工人罢工以及在一切日常斗争中组织与领导工人的观点。他说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更不能保持

此胜利。

这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他根本怀疑为革命争取工人群众，所以在他的暴动理论中工人是无作用的。在讨论南京暴动时他公开的说：“如果我们暴动，工人们必会随着我们。”他不谈，为了进行暴动我们应争取工人群众，而认为，为了争取工人群众应举行暴动。“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形，中国工人不要罢工和示威，只要暴动”，正当上海以及其他城市罢工浪潮日益增长的时候他总是坚持这种说法，而不去领导与发展此罢工浪潮。这位立三同志是一个怎样热血的革命家呵！他的血已经热到这样的程度，竟连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与暴动中的作用以及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都不了解了。

在他对于苏维埃根据地问题的态度中亦明显的表现出这种机会主义与悲观主义：把苏维埃区域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全国革命的立时胜利，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不可能的，无有世界暴动与世界战争，全国革命胜利亦是不可能的。

革命底胜利对于立三不是党根据着具体条件有系统的工作的问题，而是一个奇异的问题。“他是任何一个大的事件中会到来的，任何一个大的斗争会忽然引起革命来的。那时党会忽然强大起来以及解决一切困难”。立三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任何问题不能与一实际的回答，他指责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决议与提议，因之这位热血的革命者走向了等待伟大事变到来的政策。立三在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再三的说到“只要革命形势到来一切都可解决”以及他根本不提党的作用而只着重地说客观形势的作用，这都不是偶然的。他并且引证着说，太平天国时无有党而却有广大的暴动。

你们特别在运动这样高涨的时期——六七八月中把立三的机会主义想象一下，你们在发动群众斗争与党的群众工作的具体任务前面把它想象一下，就可明显的看出这种危险的机会主义与消

极主义底冒险的结果。这正是立三的机会主义特别表现出来的。他是用“左”倾的辞句遮盖了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之下自然也感到了一般的高涨，因为它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无有正确的方法利用对于我们这样顺利的形势。因之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之下开始了它的冒险政策，它决定了在武汉南京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罢工，它决定了红军向大城市进攻，它决定了在一切省区与城市内骤然进行暴动，它决定了苏联红军应经过蒙古开到中国来，它决定了苏联应立时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宣战，在中国党的政治局内决定了全世界的暴动。好象政治局若对于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与指示不闻不问，便能更好的领导世界暴动一样。八一与八三的政治局会议是中国党的耻辱。政治局在这两次会议中用最疯狂的最大意的空谈自己决定了全世界的暴动，同时向用一切力量与冒险政策对立起来的挽救中国党的共产国际进攻。

但是立三在公开反对国际与执行他的冒险政策时，他有系统的解散了党，取消了青年团与群众组织。这是怎样的一个热血的革命者呵！党及赤色工会对于群众及工人斗争的关系再没有比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下决定全中国暴动的时期那样削弱的了。

立三并且从托落斯基那里借来了“左”倾的辞句。这不是进攻的路线。这个路线与列宁主义根本无有关系，他是原则上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根本相对立的路线。

不承认错误是一个政治的危险。不把党彻底的从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中解放出来，党是不会向前进的。为什么三中全会在党的真正转变中无有效果呢？为什么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以后无有真正的实际结果呢？为什么我们还不能改善工会的工作，不能加强我们领导与扩大罢工的工作，不能在苏区内执行我们的政策以及加强我们在士兵群众中的工作呢，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真正的在实际中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呢？三中全会接受了这个

决议的呵。

他的原因很明显的是，三中全会以及政治局的政策不能造成在党内执行真正转变的前提。立三把党领导到死巷中去，他使党脱离了群众，他告诉全党说：“我们现在要暴动”。

我们没有许多时间来详细说明立三路线，党内干部必须晓得立三路线给与我们的的是些什么，我们应当将这些教训，运用到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上面去。

2. 现在讲到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问题。

三中全会为什么他不能作出成绩来，他接受国际路线，决定扩大赤色工会，加紧农民运动，加强党与群众的关系，结果都是无效。因为他接受了立三路线的指示，谁要组织罢工，便是右倾。他一方面接受国际路线，一方面又接受立三路线。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同志们，工友们，农民们，兵士们，现在你们应该这样的去作这些工作，但同时又告诉这就是与过去立三路线没有不同的。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取消工会，一方面又要取消工会。一方面反对取消青年团，一方面又赞成取消青年团。他一只手拿着立三路线，一只手拿着国际路线。这不是国际路线不对，而是三中全会将国际路线隐藏在立三路线后面，使党的力量涣散削弱，这是政治局同志应当负责的，尤其是秋白同志。

三中全会党的领导很聪明的，他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在这里，中国青年团以前在中国革命中有他英勇的历史，各国的青年团对抗脱离国际路线，执行国际路线，都有英勇的历史，他是先锋的站在前面，中国青年团在立三路线之下牺牲了，在调和路线之下牺牲了。现在青年团是开始有了转变，我们相信在少共国际及少共代表领导之下，他必然可以恢复他以前的英勇的历史。

调和主义的中央政治局，不仅继续了立三路线，并且扩大了

立三路线，给他一保障，涂改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在组织上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对立三同志，而是反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玉，沈泽民，这些同志是立三同志反对的，三中全会政治局仍是继续立三这一意见来反对。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这里记起立三同志说有同志送到莫斯科学习结果就没有希望了，但现在证明这些同志将他们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先执行国际路线。这样错误，政治局也是应当负责的。

共产国际信到后，政治局同志才开始懂得三中全会是作了一种混乱的工作，他的决议足以使同志混乱起来。三中全会后，党的组织不能加强，红军不能健强，……这都说明三中全会必然的结果。在这时候，中央开始明了而渐渐转变到国际路线方面，此地可以看出国际来信之绝对的作用。虽然中央在转变中仍是对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及转变迟缓，但不能说他没有转变，决不能说他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如果他还是继续立三路线，我们即不是与他谈话的问题，开什么会议的问题，而是要毫不妥协的与他公开斗争。十一月二十五号决议是渐渐的转变向国际路线进了一步，九十六号通告是更进到第二步。同志说九十六（号）通告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是不正确的。在上面有许多错误，他对于两条战线的斗争没有说清楚、没有指出与实际工作联系，及说党的危机，但不是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继续。

3. 今天差不多有三十余同志讲话，有些同志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来反对四中全会，赞成紧急会议，同志们请你们等一等，让我来解释，现在党到了一个混乱状态，敌人用尽一切力量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作什么事呢？我们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是事实上不可能的，我们要在这混乱的状态中开四中全会来算算总帐，用斗争的力量来消灭他，进行真正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坚决执行国

际路线。这里并不是要几个派别来围着国际路线转，而是说要全党如一个人一样的一致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斗争。如果召集紧急会议，能从工厂支部中选出代表来参加，但这决不是目前马上能作到的，须四五月后才能作到。这样的会议我赞成，但他不叫紧急会议而是七次代表大会，所以七次大会在七八月中秘密条件允许之下，可以举行。过去中央号召软弱，但还不是根本不能领导，如果他根本不能回到国际路线上来，那我们早就运用“八七”会议的方式来解决，不待同志们要求了。现在同志们要求紧急会议是不对的，大家应该认识四中全会他是可以解决〔解决〕了我们目前急待解决的任务。

我们不但同意召集七次大会，而且认为非常需要的，并且要准备这一大会在苏区及非苏区内要有实际的准备，将一切经验得一总结，此会并且在国际的领导下来开。今天说话的同志们都说到反对立三路线，这当然是对的，尤其是工人同志的话是对的，现在需要全党在思想上及种种方面来反对立三路线，但我们问你反对立三路线作了些什么工作，他答复说〔说〕发了一个紧急通告，作一个决议，写了一些信，这一个铜板都不值，他应该说他发展了〔发展了〕多少工人支部，发展了多少农民支部，加紧了兵士工作，巩固了苏区，健强了红军，否则只作文章，不过是空废纸墨，没有一铜板价值的。我们不要空口去反立三路线，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四中全会是对这一工作的开始，今后我们来进到这样的过程中去吧！

同时在今天会议上每个同志要清醒的纠正自己的错误，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我们听到同志讲话很惊奇的，投降派，什么叫作投降派？如果立三同志在半年前投降国际、政治局三月以前投降国际，则党的状况将更加加强了。如果这样是投降，我愿大家都来投降，这样提出派别是无有意义的。在工

作中那个同志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就应当都滚出去，那么，大家都出去，让我们家中的三岁小孩子来，因为他没有从事过政治运动，没有什么错误的。锡根，于飞，章龙，反对立三路线是对的，但不能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能说我几月以前如何别个的反立三路线，在整个的立三路线之下，大家都有错误的。我们不要空喊反对立三路线，如果大家要撕裂党大家去发展好了，否则大家都投降到国际来好了，如果全总党团再继续下去，那将要可以成为一小组织。有老同志，但不是说就是派别，如果说有派别那只有一个党，同志有错误即滚旦，那大家滚旦好了，现在我们要聚积力量来执行国际路线，今天有很不好的现象，如果发展下去，可以分裂党，因此我警醒大家严重注意，立即消灭这种派别观念，站在国际领导之下工作。

再讲改造指导机关，主要完成国际与党的纪律。自然，应该吸引下层工人干部，但说要他们滚旦这是不负责的话。我前面已经说过，谁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应当出去，党里全没有人了。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玉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旦，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旦，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将中央停止职权，无论是下层同志的话及任何人的话都好，这是不正确的，这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

在今天讨论中听到许多同志说了很多的危险的话，如说党破产了，革命破产了，这是反革命的陈独秀取消派及托洛茨基派的意见，我们不是傻子，党没有破产，而是立三路线破产了，党是进而健全化的道路，革命没有破产，而且是日愈向前进步的，如果我们能继续坚决的反对立三路线，党将在反立三路线中更加强大起来，使党与革命更进到大的进步。

同志们，反对立三路线并不是□□，蒋介石也是反对的，只有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反对立三路线才是□□，如托陈派也是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是以反立三路线来破坏党的，我们应当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在党内也发生右倾的理论，如葛妙根^①的□□，这是托陈派的代理人，党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右倾，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党在困难环境中，党的基础薄弱，白色恐怖严重，我们要加以反托陈派的斗争。

再说何孟雄同志，他在与我们谈话中说现在没有右倾，因为有国际来信的保证，不管他是有意无意的，但这是错误的，是放松了右倾，一封信不能保证，而只有深切了解国际路线才能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如果只说，要中央滚且，处罚那些同志而放弃右倾，结果何以走到右倾的道路，这不是站在国际路线来反立三路线的。

我遵守时间不再说了，党要在铁的纪律上联合起来，在今天会议后要召集许多会议决定许多办法，如工会农民兵士等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作了许多英勇的工作，他现在总是有困难，但不是没有出路，今天要各同志承认错误，如一人一□□去进行工作，今天即是我们进行的第一步。

决议案由我们与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审查，并且以此草案为基础。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① 葛妙根，即郭妙根。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1931年1月^①)

为彻底肃清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

正当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时期中，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进程是愈加重了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幸，在这个时候党的中央立三路线发生了根本原则上的完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

全党同志为端正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上坚决与非无产阶级的立三路线及其拥护者作无情的斗争。在这个长时期斗争的经过中，是已遭受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顽强的抵抗，并遭受了他们的种种无耻的欺骗和诬蔑。在紧急会议被破坏四中全会举行之后，立三路线中央的背叛阶级利益的罪恶是愈加彰著了，全党同志为国际正确路线而斗争也就是为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责任是更加严重！

因此，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在今天应该有一种严重的责任，为肃清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勇敢坚决为着国际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① 原件无时间，此是原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一) 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 的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

中央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立三路线统治着全党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结果，使党与革命受到不可计算的损失，这证明中央的立三路线的领导现在是完全破产了（至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历史根源及其对于党与中国革命的恶果，参看另发之材料，此处不重述。

(二) 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加危险

中央立三错误路线曾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斥和党内同志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央始则用顽强的态度敌视共产国际的意见，用家长制度惩办手段压迫党内同志的自我批评。后来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间中国问题决议案等来到中国之后，中央召集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上中央更狡猾地模糊混淆着两条原则上不同的路线（国际正确路线与中央立三错误路线），硬说过去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同时否认立三路线的存在，对于全盘皆错的六月十一日中央决议还认为是正确的；又在三中全会根据立三路线补选新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因此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六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过去立三路线还更危险的东西。

(三) 三中全会后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继续 执行立三路线反对国际路线

三中全会闭幕后共产国际最后寄来一封长信，当时党内同志

反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斗争在全党已经到处普遍起来。中央一方面是用压迫手段阻挠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另一方面是用挑拨离间的造谣诬蔑对付一般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分子，但是结果都归无效。中央受着党员群众的威迫不得不从事修正三中全会决议，做出更无耻的几次补充决议。中央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说“三中全会路线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禁止讨论立三路线并限制国际来信及二十五日决议只可达到地方党部。在九月初充决议^①仍然掩饰调和主义的更大危险性。在九十六号通告仍然是一贯的调和主义，只是表面上承认立三路路线的错误，纸上接受国际正确路线，在消极的承认中央政治局的错误的时候根本抹杀了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实际任务，取消了国际来信所指示的各项迫切任务的主要内容（如苏维埃任务、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同时对于立三路线来源只是片面的认识（认为是盲动主义的残余），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对于党与革命的损害估量得非常不够与模糊，尤其错误的是认为反立三路线便包含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右倾观念，松懈了对于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的攻击。至于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央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的统治，中央在这期间是自觉的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没有丝毫诚意的接受国际路线。

（四）紧急会议是执行国际路线建立

党的正确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步骤

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调和路线更使党的危机加深，革命受着更大的损害，这证明中央已无领导革命的能力并缺乏对于阶级的忠诚（四中全会政治局报告公开承认中央自觉的反抗国际），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

^① 指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决议

完全破产。一般党员群众的呼声不是要修改三中全会决议，而是要根本废除他，废除历次补充决议，一致向国际代表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行使职权，由国际领导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组织临时中央机关，召集党的紧急会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紧急会议的要求是围绕着广大的党员群众，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是要求改变党的错误的领导使回复到正确的路线。一般对于紧急会议的建议如下：

(1) 紧急会议列席成份必须以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党的干部与群众组织中的干部同志为主要成份。

(2) 彻底接受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

(3) 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

(4) 正确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彻底予以肃清。

(5) 根据国际七月决议及最近来信，汇合全党各方面工作经验，郑重规定党的总任务，党的组织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等决议案（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意见，散见反立三路线各文件中，不久将另整理整个意见提出）。

(6) 根本改造政治局。

(7) 确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日期（与七次大会密切有关的即目前急需恢复党内民主，进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发表反立三路线的决议与文件等）。

(8) 执行铁的纪律，处罚有系统的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中央主要负责分子。

（五）为紧急会议而斗争

围绕在紧急会议周围的是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最坚决的广大党员群众，尤其是党的下层组织与在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工

作同志，他们是不约而同的起来作无情的斗争，就现在所知道的一部分说，已经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苏准会工作全体同志，江南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全体同志，北方天津党部，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上海各区委（闸北沪东沪西法南护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属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以及全国积极的工会干部同志等（青岛上海天津武汉海员铁路苏区厦门等地）。中央在党员群众威迫之下，知道简单的高压政策决不足以继续经〔维〕持其错误的领导，这样便采用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手段，用欺骗的方式向党员群众假装着接受紧急会议的要求，以和缓同志们的反抗，例如中央向全总表示决定召集紧急会议并书面通知全总党团负责人起草紧急会议职工运动决议案，忠发在中央工作会议全国济总党团及苏准会工作同志报告中央已正式决定召集紧急会议（会议的成分规定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参加者不超过四分之一等等），秋白恩来到闸北区到沪中区做报告时均详示服从区委同志决议，赞成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屡次向全总负责人员表示均言全总党团决议的正确并声明政治上组织上保障其胜利，同时却在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这一切都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工贼同其性质，另方面证明紧急会议的召集是急不容缓之举了。

（六）立三路线派及投降分子破坏紧急会议

立三路线派是极端仇视紧急会议的，因为他们知道紧急会议必然是要葬埋立三主义及其统治的，同时还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样犯有立三主义错误的陈绍虞^①等自然是怀着同样的恐慌，因为陈

^① 陈绍虞，即陈绍禹。

绍虞等过去是站在“左”倾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时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线的总策略的（即布置全国暴动总同盟罢工等），他们是用“左”倾的口头禅认为全国已有直接革命形势，而说六月十一日的估量为过低的，他们在三中全会后是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认为立三主义只剩有“残余”，只要中央承认错误“可以避免争论”（引文见陈绍虞十一月十三日意见书）。因此在紧急会议运动迅速发展之中他们是用种种不正确的宣传破坏紧急会议的工作，他们说“立三主义已不存在”，“反立三主义的理论争斗应该停止”，“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实现”，“中央省委已承认错误同志便不应该再谈改造党的组织”，“紧急会议是‘左’倾分子的活动”。这些便是证明立三派及投降分子等是时时在企图破坏反立三路线的运动继续维持立三路线的领导，并且他们这种企图是受着国际代表米夫不正确的指使，米夫是公开地向着全总党团，工联党团，海总党团负责人用派别的观点估量反立三路线的整个运动，命令他们离开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服从陈绍虞等领导（自然上述各党团负责人是当面拒绝并指斥了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便暗中布置合于旧中央及陈绍虞小组织派别的目的的四中全会，以代替党员群众需要的紧急会议。

（七）四中全会的经过

四中全会的召集，原则上与党员群众们所提议的紧急会议完全两样。第一，参加会议的成份是由中央政治局自由指定的，主要的分子是中央政治局本身，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罗迈^① 贺昌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长江北方南方各局的书记，这些都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占列席总人数的多数。第二，四

^① 罗迈，即李维汉。

中会议的举行，上述诸分子之外，中央对其他被召列席的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及群众的干部同志是全守秘密的，他们在赴会之前是完全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及会议内容的，因此引起各列席的群众中干部同志的愤怒与严重质问，并一致声明保留其对于紧急会议的意见。第三，会议与讨论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全部会议以时间规定仅仅十五小时，每人发言不得十五分钟，因此有些同志因时间限制连第一次发言都没有允许，这完全表现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

(八) 四中全会是没有解决党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并且保证立三派的继续领导

四中全会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中，拒绝同志们提议在肃清立三路线实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讨论党的总任务及诸项重要工作问题，这些不可再迟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被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始终忽略，认为不足轻重的和不需要的。第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明明是用调和主义的观点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但是四中全会不敢明白指出，反说“二十五日决议又向国际路线走了一步”（紧急通告已宣布废除三中全会及二十五日决议，四中全会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第三，及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站在离开领导的立场，只是消极的承认错误，忘却了目前党的迫切的紧急实际任务，同时在分析立三主义来源上，在指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在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等等地方，都犯着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理由可参阅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对紧急通告的决议）。这些错误都是从调和主义来的，但是四中全会对于九十六号通告却认为完全站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是正确的。第四，正因为上述这些原故，所以四中全会对于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及组织路线实际上是赞助的，在

决议案中虽然表示过要取消三中全会的补选，但结果三中全会的补选除贺昌罗迈之外其余多数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分子更加了一重保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公开拥护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把最高指导机关的中央解释成为教育错误同志，试验那些几年以来从陈独秀到现在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地方，因此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陈绍虞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第五，在会场上很明显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从属的上层机关调和主义分子的主张是一方面，坚决反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及下层群众干部尤其工人干部分子的意见是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中央是有计划的指定列席成分造成自己的多数，实际取消全场的民主，垄断选举，并加反对者以种种罪名（如“反国际”、“右倾”“取消派”“暗探”“小组织倾向”“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等等）。

（九）反对四中全会要求在共产国际 正确领导之下召集紧急会议

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这里更明显的是组织上的立三主义一贯组织路线（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变本加厉的继续发展，虽然表面上引进了一部分工人同志，但实质上仍继续着小资产阶级书生的领导（如周恩来陈绍虞等）。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如九十七号通告充满了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精神），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之下立即推翻他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

斗，要求国际重派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他召集和主持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产出的调和主义的中央的领导，反对他们召集和包办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十) 拥护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

现在立三派及投降分子陈绍虞等小组织是到处继续造谣诬蔑威胁欺骗那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最主要的借口便是说“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这种说法正如李立三及其党徒在三中全会时对于当时反对三中全会同志的诬蔑同一口吻。我们知道当时国际代表领导三中全会犯有错误，他曾经反对“把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对立”又说“党的路线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引语见远东局代表致三中全会的信）。我们是曾经反抗过这种错误的，并且现在已经证明我们这种反抗正是为忠实国际路线而斗争。这次米夫领导的四中全会是本其在六次大会时附和右派布哈林调和主义的立场及其私人派别的成见，完全抹杀党员群众的意见，重复着做出严重错误，显然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原则，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只有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才能使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障碍彻底铲除。

(十一) 号召全国团的同志为反四中全会召集紧急会议而斗争

立三主义取消了团的组织，是青年运动的极大障碍，立三主义在团里面还有很深厚的基础，团的中央是顺从着党的中央系统

地做着错误。因此在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运动中,党的同志必须领导团的同志,赞助团的同志在少共国际正确指导之下,从下而上的召集紧急会议,实行向团中央的立三主义调和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解决团的路线问题与组织问题。

(十二) 反对斗争中的不正确倾向

我们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实际工作上坚决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到底,并且要时时注意站稳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坚决的正确的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奋斗,尤其是反对党内最主要的右倾危险,反对托陈取消派分子乘机混进党内活动的阴谋,反对李立三及陈绍虞等小组织的活动,并且要在不断的以正确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来检查立三路线长期统治之下全党在各方面工作中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所犯的一切错误,同时要在加紧实际工作中去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以完成国际路线所指示给我们的迫切任务。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 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

——江苏省委关于王克全同志分裂
党的行动的决议

(1931年1月17日江苏省委常委会通过)

江苏省委常委对于王克全同志在本日常委会议上声明退出省委另行组织省委第二之分裂党的组织行动有下列的决定：

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开会的扩大的四中全会站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为拥护国际路线而进行，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斗争，同时，毫不放松地坚决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及其他一切危害党的不正确倾向（如放弃实际工作，极端民主化，不以自我批评揭发自己所领导的组织中的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无原则的派别倾向等等）；另一方面少数同志（如罗章龙何孟雄，王凤飞等）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假借反立三路线这一面旗帜来进行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实行其变相的继续立三路线和反国际路线的阴谋。

在四中全会后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如王凤飞，何孟雄，罗章龙等）便公开地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活动，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纲，在组织上公然破坏党的布尔塞维克的统一而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如王凤飞在闸北区第二区委，蔡伯真进行小组织活动等等）。

省委常委之一的王克全同志过去在江苏问题上与何孟雄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时是执行立三路线及

调和主义最坚决分子，最近还在继续立三路线（如用委派制度成立空架的区工联组织，又成立最空洞的二七工作计划，——被省常委否决了；以及坚持派别成见等等），因而对于取消派倾向及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及活动在四中全会前及四中全会上均坚持调和态度，四中全会后取消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部分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路线现在还不承认错误的立三主义忠实信徒，加紧从各方面对于共产国际及新的中央领导进攻，克全同志便从懦怯的机会主义者（调和态度）的地位走上公开地与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致的道路。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中全会后第二次省常委会议上，工联党国会上均公由拥护何孟雄罗章龙等之机会主义政纲，反对国际代表及四中全会。

克全同志在政治上既走上与右倾机会主义一致的立场，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在组织上要走上分裂党的统一，和破坏党的组织的行动的地步；因此不服从他曾经举手通过的四中决议，他公然宣传反对国际领导和新中央的领导，他反对过自己在政治局同意而且在省委会上自己代表政治局提出而自己又加以四个人的候补的新省常委名单，一直到他宣布脱离国际代表与政治局共同决定之新临时省常委，而另行组织不服从国际与中央领导之第二省委。

在目前拥护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区域，反对国民会议，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紧张政治形势中，克全同志现在这种分裂党的行动更毫无疑问的是对国际路线的执行消极怠工的，是在革命工作紧张中“开小差”的，是与罗章龙，何孟雄，王凤飞等破坏党的行动互相呼应的，是障碍了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是公开地反国际领导的，是帮助了取消派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

省常委要求克全同志立刻停止这种破坏党分裂党的行动，公开向中央省委及全党声明放弃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意见，承认错误，在国际路线与中央领导之下，立刻回到省委执行实际工作，否则克全同志须负政治上组织上最严重的责任。

克全同志报告的在波兰法国，安南，朝鲜，中国均存在的党内小组织——CSS 已发现于沪中区，省委认为这一问题非常严重，要求克全同志立刻将这一小组织的政纲，参加成分及活动情形负书面报告中央和省委，以便讨论。

克全同志对省委这一决议应当立刻用书面答复。

（摘自《党的建设》第2期）

中央政治局关于 1 月 17 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

(1931 年 1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央政治局在审查全总党团一月十七日会议报告与江苏省委报告之后，认为：

一，在扩大的四中全会开过之后，中央政治局正在开始领导全党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及对他的调和主义与一切不正确倾向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竟公开的以右倾政纲用尽一切小组织的方法来向党进攻。在这里，最露骨的表现便是：全总党团大多数同志在罗章龙徐锡根余飞三同志领导之下，公开的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在国际路线下的领导，说四中全会是调和主义，说国际代表应当撤换，最后并拒绝了接受国际代表关于拥护四中全会之国际路线的提议。王克全同志在江苏省委领导少数同志实行成立第二省委（他号召恢复江苏第二次代表会后的省委，这一省委是曾以罗迈同志为领导，现在已为国际代表及新中央政治局改造了的，并且他所领导而开会的只是第二次代表会后省委中一部分同志）反对四中全会，反对中央，反对国际代表与中央所建议而为江南省委所接受的江苏临时新省委，来分裂党：在这一领导之下，王风飞同志在闸北实行成立自己的区委，来与闸北党的区委分裂。同时海总党团不等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开会，便依据陈郁同志的报告而成立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苏准会工作人员在林育南同志领导之下，不经任何中央的报告与通知，便到处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而济总党团

在李求实戴晓云两同志领导之下表示对此问题的调和态度，先开始来怀疑九十七号对于二七号号召示威罢工，且用立三路线观点来解释。这些行动显然是反国际的，显然是想企图改变国际路线的，因为四中全会完全是在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之下接受国际路线的。

二，这一右倾小组织分裂党的行动不是偶然的。在四中全会前，王仲一公开说：他自六次大会后便反对中央一贯的错误路线：郭妙根同志公开反对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主张只要经济斗争不要政治斗争；何孟雄彭泽湘罗章龙三同志或在沪中区活动分子会上，或在全总党团决议案上，都公开的说目前革命领导和党内问题（这是不可分离的）与八七会议时代一样，不能回答六次大会后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而说立三路线已经破坏了中国革命；蔡博真王凤飞两同志在上海区书活动分子会上，公开说谁主张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谁便是不反对立三路线；罗章龙同志在全总党决议案上，公开要求已被二中全会承认开除中央委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仲一出席紧急会议；何孟雄同志与国际代表公开说国际来信后，右倾不危险了，（他后来又来信声明是“左倾”，但“左倾”也同样不对的）；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的来信说：我们的苏维埃运动被立三路线妨害到不能有最低限度的发展，苏维埃运动至今没有一种真正的群众运动；海总党团的决议说立三路线断送中国革命（今天陈郁同志才来声明是说断送中国革命可能）。在扩大的四中全会上罗章龙何孟雄两同志公开领导同志反对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要阻碍进行会议日程，最后，并与余飞王凤飞两同志反对四中全会改造中央指导机关；罗章龙同志公开坚持全总党团一月一日决议的错误意见，公开说目前没有革命高潮，而革命高潮只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何孟雄同志公开说不要夸大了右倾危险（当场锡根同志还批评了他的）：最后，这几个同志对于国际代表的结论都表示不同意。在四中全会决议案修改委员会中，锡

根同志又跟随章龙同志之后举手怀疑四中全会决议。这显然是一贯的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与国际路线背道而驰的行动，这是要以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国际路线的企图。这样，自然不能不引导全总党团与王克全第二省委右倾反国际与分裂党的行动。这样，就必然要掩盖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在这一行动中重复抬头。

三，在目前革命斗争紧张，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苏区的血战当中，在取消派阴谋回党破坏国际领导的当中，在立三路线“左倾”的空谈揭去之后，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沉，失望，悲观，动摇的爆发当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竟站在与国际路线的四中全会对抗的反对派的立场上，来反国际，来分裂党，来进行第二党的组织，来妨害革命紧张中的实际工作。中央政治局特号召全党，要有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要像一个人一样，坚决的反对这一反党反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行动，来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并发布一告同志书通告全党。

四，应批准江苏临时新省委对于王克全王凤飞两同志领导少数同志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并要求王克全王凤飞两同志立刻停止这一行动。

五，应决定严厉的斥责全总党团一月一日海总党团一月九日苏区工作人员会议一月七日的决议与济难会党团的来信。

六，应决定撤消王克全同志在江南省委与领导上海工联党团的工作，撤消罗章龙徐锡根余飞三同志领导全总党团的工作，决定改组全总党团，并要江苏省委改组上海工联党团。

七，应决定重新召集海总党团会议，中央要求陈郁同志在会议上在书面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决定改造海总党团的组织。

八，应同意青年团中央的提议原则，要王克全徐锡根陈郁三同志公开的在书面上在会议上承认自己的错误。

九××××××××××××××××××××××。在国际没有任何

决定以前，中央要求罗章龙徐锡根余飞三同志以及其他领导这一反国际分裂党的行动的同志立刻停止一切活动，绝对的服从四中全会后新的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

（摘自《党的建设》第2期）

中央巡视员会议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

听了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代表关于四中全会内容之后，我们认为四中全会路线是正确的，同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的解决，完全是满意的是对的。

在动员全体党员反对立三路线，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和积极准备第七次大会过程中，为得要解决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和真正接受国际路线，推翻三中全会的决议及中央紧急通告以前的决议和文件，而召集四中全会，这是完全需要而正确的。

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理论上在实际肃清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反对对立三路线各种形式的调和主义斗争中，我们仍然要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但同时我们丝毫不得放松反对“左倾”和陈托取消派这种号召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右倾机会分子(如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等的行动)最近的行动，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已经证明他们在反对国际，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现在中央的立场上作分裂党的运动，破坏中国革命运动。这种行动是不利于党的，相反的是帮助了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但在思想上形成一贯的系统，同时在组织上已经离开国际和中央的领导，形成他们自己反国际反中央的小组织，所以我们不但在思想上去反对他们，同时必须在组织上去裁制他们。同样地我们应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影响下的分子，作说服解释的工作，使他们走到国际和中央方面来而回头反对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活动，和分裂党的运动。

现在事实告诉我们，党内已经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形成了两个原则上不同的路线，一是国际路线领导之下的中央路线，一

是反国际反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我们应向全党党员宣告这种路线的成形和危险，动员全党在思想上在实际上在组织上肃清立三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同时为完成整个党的改造起见，我们应积极准备召集第七次大会工作。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的反对国际的领导，然他们只说反对国际某代表，不相信国际有电报对四中全会的指示，说某国代表包办四中全会等等，这些在实质上是反对国际对中国党的领导。我们应坚决的反对这种反国际代表和国际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集团和运动。

我们坚决地请求中央即刻停止王克全徐锡根，何孟雄等的职权，及其分党的活动。同时坚决反对他们对现在中央的污蔑。（又说中央告密秘等等）这种污蔑，完全帮助我们敌人。

同时指出刘抱一刘作人两同志在发言中对国际路线的怀疑，反对四中全会，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表示沉默，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分党运动不发表言论。这完全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对问题讨论的态度。为得要教育他们起见，及给他们以相当的时间，对这些问题加以考虑，并将考虑的结果，用书面答复中央，同时请求中央在未解决他们问题之先，停止中央巡视员的工作。

（摘自《党的建设》第1期）

全总党团常委决议案

(1931年1月26日通过)

(一)全总党团常委会认为四中全会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并宣布了立三路线的破产。正确的接受了国际路线,改造了党的最高指导机关。

(二)全总党团常委会认为全总党团过去在右派组织者罗章龙,徐锡根等领导之下,所通过的一月一号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以反立三路线作掩蔽右派小组织活动的纲领,这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认为一九三〇——三一年的革命形势与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是一样的,对于党转变到国际路线过程估量(二十五号决议与紧急通告的计)完全得到了取消的结论等。

(三)一月十七号全总党团会,便是以这个右倾纲领来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反对中央,并且基于这一个纲领,作出反共产国际反党的决议,这都是极严重的错误。

(四)这一个右倾纲领,实际已成为团结一切右倾的与立三路线的继续者以及一切反党的旗帜,在这里,我们坚决指斥过去在罗章龙的右派小组织领导派人到各省进行分裂党的行动,利用全总机关印行反党反国际的右派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这个小册子完全起反革命的作用。以及王克全,王凤飞等在江苏分裂党的行动,破坏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变,这是布尔塞维克党绝不允许的事。

(五)全总党团常委会坚决警告参加小组织活动的同志,如果你们不觉悟回到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的路线之下,你们发展的前

途必然与陈独秀取消派托洛茨基派汇合起来。现在罗章龙的观点与托陈派完全一致了。

(六) 我们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拥护政治局, 对国际绝对的尊重, 更认为对四中全会的一切造谣与污蔑以及右派所提出“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口号, 右派提这一个口号就是因为右派在四中全会企图以右倾纲领, 来代替国际路线失败的原故。

(七) 全总党团常委会完全同意中央对罗章龙徐锡根撤销工作与立刻停止小组织活动的决议, 如果他们仍继续分裂党的小组织的活动, 党应给他们以组织上的制裁。

(八) 在全总党团过去这一反国际反四中全会的右派行动中, 余飞同志是参加了的, 余飞同志现虽已承认了他对右派调和与反国际反四中全会的错误, 党团常委会更进一步要求余飞同志要在实际行动中来证实他真正放弃对右派的调和与派别成见, 并坚决的与右派以及这些错误来斗争, 这才能表明他是真正接受中央决议的。

(九) 我们要把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伟大的转变放在实际工作中。因此根据国际与四中全会的方针与职工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实际工作。在这里, 必须指出有罗章龙的右派小组织活动的期间是阻碍反立三路线实际工作的转变。……

(录自《党的建设》第3期)

立三同志给政治局与四中全会的声明书

在对于形势之不正确估计的立场上,我提议了全国举行暴动,并曾认为国际的观点,在建立苏维埃政府,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及加强红军等问题中是不正确的,因此我提议了与富农联合,以立时实行土地国有及组织集体农场来解决土地问题。

我拒绝了从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曾提议:如不能将经济罢工变为政治罢工,即应举行暴动。我曾认为革命已经来了并继续增长上去。同时,我不相信中国工农的革命力量。在一切这些问题中,我把我的路线与国际路线对立起来,而拥护了半托洛茨基主义与冒险主义的路线。

三中全会无揭发了我的错误,并且混淆了他,所以使党解体,希望四中全会严格的指斥过去的错误观念,克服三中全会的调和行为及秋白同志虚伪的批评,党的路线及支部工作需要执行转变。秋白同志说: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而立三路线是相矛盾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自欺是党内生活走向转变路途上的最大阻碍。政治局应与派别倾向斗争,执行自我批评,将一切同志在国际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将反对立三路线的积极分子吸引到中央的指导工作中来,公开的在国际执委面前揭破派别观念是绝对需要的。

立三

(录自《党的建设》第3期)

秋白同志声明书（一）

国际执委和中央：

四中全会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恰好是模糊混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互相对立不能并存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立三同志的路线。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三中全会的前后，屡次提出立三同志在冒险主义政策之下走向反共产国际斗争的道路上去。可是，我和当时政治局都不赞成他们这种意见。这种对于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的态度，更使调和主义的错误加重，因为当时并没有清楚的提出不赞成的理由，而具含混的简单的不把国际代表的意见写入三中的政治议决案。这样使当时国际代表没有可能及时来纠正当时政治局的调和主义错误。四中全会指出：这种调和主义错误（三中全会及其后），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的最主要的责任。是我应当负的。我对于这种指斥完完全全的接受；我对于议决案的全部，是完完全全拥护。

我在四中全会的发言里面，曾经公开的对于全党承认我的错误。党在国际指导之下，经过四中全会纠正了自己的路线，解决了党内问题——更新了党的领导机关，将要在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之中，在一般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之中，特别是反对现在右倾的主要危险，将要在这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部分的也就是反对我的过去错误的斗争之中，领导工农群众的广大斗争。不但补偿过去错误所给的许多损失（四中全会所指出的），而且引导革命新的胜利。我必定尽我的力量参加这个斗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和中央的领导之下，坚决的纠正自己的错误，反对立

三路线，反对其他一切形式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及其调和主义，反对假的反立三路线斗争掩盖之下的右倾其他分子的不正确倾向活动，这些分子是在企图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个人的派别的斗争，其结果也要走上反共产国际的道路的。

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有系统的。因为我对于革命的好些根本问题，例如“第三时期”的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矛盾和战争的观察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殊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富农问题，中国改良主义的作用和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武装暴动和征取群众的问题——从六次大会之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过好些和立三同志大同小异的观点，因此，三中全会的时候，虽然我是参加过共产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讨论的，可是看见了考察了立三同志和当时政治局的意见和路线（六月十一日议决案等），居然会以为这不过是个别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际不同。这证明我以前连六次大会所批指评斥的盲动主义错误，也是没有真正认识和了解的。立三同志的许多观点，只是我在六次大会前后的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我当初看见立三的意见就自然只觉得他在个别问题，在估量时局上等等是过分了，除去这些部分的地方，仿佛或正确了！在这种基础之上发生我在三中全会前后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和对于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态度。

我以前这种非布尔塞维克的立场，既然使我事实上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所以我对于党内派别问题的观点也是绝对错误，我在莫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者的时候，对于在俄中国同志之中的派别斗争问题，不但没有能够有正确的立场帮助联共党的领导去取消这种派别斗争，反而客观上卷入派别斗争的漩涡。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已经有过决议。可是，我对于国内党里面存在着同样性质的派别观念，仍旧是没有能够实行

坚决的正确的斗争。党内这些种种形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观念，都是布尔塞维克化的很大的障碍；这些派别观念之中，有些是以工人和知识分子对立，以“实行家”和“理论家”对立，以“老”的干部和新的干部对立，以国内工作者和国际留学者对立；这里包含着极坏的倾向，甚至于武断的煽动说国际执委的某某工作人员故意到中国党内制造派别等等……——这样企图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个人纠纷，把为着国际路线的斗争解释成为派别的斗争，攻击和破坏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的信仰。对于这种派别观念，我以前是没有正确的和他斗争的。这种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和我过去整个的非布尔塞维克的立场联系着的。正因为政治立场的错误。所以对于这些派别观念，不去坚决的反对，不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上从政治问题上去打碎派别成见，却想去调和这些派别，使之互相谅解——这是市侩式的“和事老”的立场。

现在我公开对国际执委和中国全党揭发和承认自己的错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

（录自《党的建设》第3期）

秋白同志声明书(二)

一、我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至四中间之调和主义的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斗争。

二、反对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反对罗章龙等右派小组织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揭破并打碎立三主义者和右倾小组织的联合企图，是现在为着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及真正执行国际路线所万分必须的。中央最近开除章龙（他发布小册子是反革命的行动），开除王克全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委员，开除王凤飞中央委员，警告贺昌，对于锡根余飞陈郁同志的要求，以及对于江苏省委问题的一切处置，我都是完完全全拥护，而且在以后党反对立三路线，反对右派小组织，调和主义以及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反对取消派及其暗探的斗争之中，我必定尽我的能力参加。这个经常的有系统的斗争开始得还不久，此后正要更加强起来，更加深入到支部，深入到日常的实际工作之中去呢。

三、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和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李如剑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这是因为当初有过对于富农问题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之中有些是他们所赞成的。这种错误是我的非布尔塞维克的整个立场之中的一部分。现在我公开揭露和承认我立场的全部错误，和这种派别斗争的错误，而和他奋斗。

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七日的决议，要我写说明书——我在病重中不能多写，所以只写这一些。（以前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和国际执委）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录自《党的建设》第3期）

我的政治态度

贺 昌

当立三路线占着党的统治地位的时期，我在顺直省委和北方局发挥扩大了立三路线——从理论上一直到工作方式上，在三中全会后所召集的北方局扩大会议上，我做了比三中全会还可耻的错误，实质上是继承了立三路线；在国际十一月来信之后，我在北方局未能积极的领导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并起了阻碍的作用，在四中全会我的发言中，仍然还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的错误——如说三中全会后顺直已完全抛弃立三路线的组织暴动的方针。我完全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共产国际的总方针出发的。四中全会后，我在中央所召集的顺直工作委员会上，已将我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完全揭发出来了，并且我完全同意顺直工作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顺直工作决议的草案。我现在是铁一般的忠实于共产国际，现在坚决的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实际工作中，反对和肃清自己所犯的扩大立三路线的错误。

扩大的四中全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一致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真正进攻的路线，宣告了与共产共国际线完全不相容的立三路线的死刑；在这一基础上改造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引进了坚决反立三路线并能执行国际路线的最好分子到最高指导机关，在组织上来创立起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保证。我完全拥护四中全会的召集及其所通过的一切决议，和已经改造了中央委员会后及其政治局。我相信新的政治局能在共产国际路线的领导之下，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之下能将全党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为布尔塞

维克而斗争，来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右倾机会主义者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为领袖的小组织，他们是在反立三路线的空谈之下。进行反党反国际的活动。实际上是完全继承了立三路线。他们在四中全会上不顾国际的指示和客观条件，坚持召集紧急会议，并用退席来向党和国际代表示威；在四中全会后，他站在与国际路线的四中全会完全对抬的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反对政治局，来妨碍革命紧张中的实际工作；他们狂喊革命完全失败！党与革命已经破产，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取消派没有两样，他们用一切下流无耻的手段，进行分裂党组织第二党的活动，他们的前途，无疑要走上与取消派同一的命运。

在敌人集中火力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血战中，在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维埃的准备中，只有我们能彻底克服立三路线和对他们的调和主义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反党反国际的小组织和公开的暗藏的取消派的斗争中，在对于共产国际铁一般的忠实中，在执行四中全会与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的实际工作中，才能巩固我们的队伍，真正的执行国际路线。

一九三一，一，二〇。

（选自《党的建设》第3期）

罗迈同志声明书

中央政治局：

一、我在四中全会前和四中全会后，在党内斗争的立场和行动，除在公开会议上表示外，我并且将我与许多同志谈话的经过报告了少山和少愚同志，最近还报告过陈仁同志。

二、现在王克全蒋云等公开分裂党，组织第二省委区委，这种行动，其前途只有与取消派等。这证明克全与我谈话之阴谋，第二届代会选举之省委，我的领导已经破产。任何真正反立三路线与反右倾机会主义真正为国际路线斗争的同志，都应该一致拥护中央一月廿日决议和省委关于王克全分裂党的决议以与反党的分子作无情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不仅没有除外，而且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三、我现在仍是在省委同意之下，在适当范围内参加斗争，并且正在开始续做文章，以锻炼我自己，并望政治局注意指导我。

罗迈 一九三一年一月廿六日

(录自《党的建设》第三期)

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 及党籍的决议案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在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总党团及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案发表之后，右派小组织以罗章龙为领袖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并且公开的发表反党的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特成立下列决定：

(一) 这一反党的小册子，是右派小组织反党反国际的整个纲领之最具体的表现，而为罗章龙所主持的（便是与他同道者徐锡根同志也不能否认这是章龙编印的）。章龙在这小册子上，学尽取消派反党反国际的口吻：第一，他是公开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所以他说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表〔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而继续“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成立临时中央，主持紧急会议”。但是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指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并且罗章龙所继续号召的紧急会议与主张成立临时中央，更是露骨的分裂党的第二党的主张。第二，这样，他便更进一步的反对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国际代表。但是国际代表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来指导中国党的，所以反国际代表实际上即是反国际——这是陈独秀以及共产主义“左”右叛徒所用惯的把戏。第三，他更等

于向敌人公开告密，说四中全会是国际代表某某领导；这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因为除掉便利于敌人的巡捕房警察局外，再没有其他意义。第四，他说“立三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这一估量的根本思想是在本年一月一日他所起草的全总党团决议案上。这一决议上说：“立三主义是破坏了党与团的组织，是破坏了工会与其他群众的组织，是破坏了红军，是破坏了中国的革命”。这种不正确的估量，正是暴露他自己对于革命的失望，其目的是要得出取消派的结论。根据这种估量来借口反对整个领导，用意是在破坏我们的党。因此他说“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恶骂中央“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工贼同其性质”，所以他主张“立即停止中央行使职权”，“根本改造政治局”（即是全部撤换）。这与取消派的估量和要求完全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党从革命斗争紧张战线上拉到右派的退却路线上来。最后，他自然就暴露了他一贯的反六次大会的立场，他认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右派布哈林领导之下采取了调和立场的；其实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绝对正确的，不仅布哈林的右倾路线没有在那时暴露，便是布哈林演说中的个别错误也没有为大会所接受，怎能说到是调和立场？这样，就更加证明他的右派纲领与取消派一般无二。根据这四点，已足以证明罗章龙思想和行动，他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人了。

（二）这一反革命小册子的印行，完全是罗章龙把持全总党团机关用以进行其反党的右派的小组织之最具体的产物。同样，在一月以后，罗章龙主持的全总党团，除掉成立一月一日的右倾决议案外，并在一月十七日公开号召与领导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国际；在组织上派遣被他煽动的同志到各省（如满洲，顺直，山东，广东等省）在〔去〕进行反党

的右派小组织活动，最后他还抵抗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日决议的执行，丝毫不改变他的反党行动，而且还鼓动全总党团同志拒绝移交全总党团的工作。这一切，都表示他没有丝毫诚意来在全总党团执行国际路线，而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

（三）罗章龙这种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他远在六次大会前陈独秀时代和两湖秋收暴动时候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六次大会上，他并没有承认任何他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提出了不要任何旧的中央委员当选新中央委员的主张，当时是遭了国际代表与最大多数到会代表反对的。六次大会后，他对于六次大会路线的执行是机会主义的消极，在全总的工作可以做为证明，而且有些政治问题，是常常暴露他的右倾观点的，如对六次大会后至去年六月以前的中央路线是否正确不回答。对那时期党的进步不回答，认目前中国革命运动还不是高潮时期。他一直在四中全会上，四中全会后还是如此坚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他领导了少数同志，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国际路线，并声明退席。会后，他又在四中全会决议案修改委员会上举手反对四中全会决议案。所以他结果便拥护与取消派一类而已被开除的王仲一（他公开说他自六次大会以来反对中央一贯的路线）来参加紧急会议。在国际来信前党内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罗章龙是一贯的采取消极态度。国际来信后他便由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而站在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党反对国际了。尤其是他所进行的右派小组织，欺骗一些同志到环境不容许而对党秘密的地方去开会，便利敌人以破获我们的机会，这是要罗章龙负主要责任的。

（五）^① 根据以上这一切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之反革命的行

^① 原件序号少（四）

动，罗章龙是一刻不能停在党内与无产阶级队伍中了。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久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

(六)中央政治局特要求全党同志在深刻的认识罗章龙这一反党的行动中，必须坚决的与罗章龙右派小组织作无情的斗争，要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完全与他分开，并且与他完全隔离起来。中央政治局更号召被罗章龙右派小组织所欺骗所蒙蔽的同志，应立即醒悟与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并且要向全党公开这一右派小组织的一切活动的经过与罪恶。

(七)这一决议一直发到支部中去，使全党了解开除罗章龙，将是全党在反立三主义反调和主义的热烈斗争中解除右派武装的开始，将领导全党拥护四中全会执行国际路线更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执行坚决的转变，而加速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

一九三一·一·二七中央政治局通过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贺昌等同志问题的决议案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在右派小组织进行反国际和分裂党的现时，主三立义者和右派相互企图联合。这种左右联盟反党反国际的企图，已有许多事实可为证明，如□□□戴小云等同志的和右派联合，王克全同志对罗迈同志谈话，表示反对现在正确执行国际和四中全会一致的路线的省委的领导，企图恢复以罗迈领导的江苏旧省委。最近更发现立三主义者贺昌同志与右派李振瀛同志谈话后，贺昌同志公然向关向应同志表示对右派活动的公开调和情绪。在向应同志对贺昌同志批评过以后，贺昌同志虽承认错误，但尚不向中央报告和表示态度，且继续对右派斗争消极。

二、贺昌同志在四中全会口头上承认错误，而实际上并未真正认识与承认自己错误，在四中全会以后态度不明，所写的说明书对错误承认极不彻底，且发现他对右派又有如此表示。中央认为贺昌同志的这种态度，是依然保持立三路线，改变了方式反抗党和国际的路线。政治局决定要贺昌同志明白的表示态度，决定给贺昌同志一个警告，并且要它即刻在实际上去改正他的错误。

三、此外，秋白，罗迈两同志亦须写说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录自《党的建设》第3期)

关于开除王克全中央政治局委员与 中央委员王凤飞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在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案发表之后，经过一星期之久，王克全，王凤飞两同志犹丝毫没有放弃江苏第二省委闸北第二区委之分裂党的活动，这就证明王克全，王凤飞两同志是罗章龙右派小组织的坚决执行者，这里王克全同志完全没有履行他在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上亲口所承认的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与两天内交到声明书的两点。王克全同志这种分裂党的行动，远在一九二九年春江苏问题发生时，他便是领导无原则的反中央斗争的负责者之一，这次他与□□□徐锡根两同志又重复这错误，并且加深这一错误，显然不是偶然的，克全同志政治上的动摇与右倾，组织上的非布尔什维克态度，只就他在四中全会后在江苏省委的工作情形看来，已足证明，如他对于反□□□郭妙根右派斗争的消极，并且与□□□站在一起，对于军阀战争的分析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尤其是他先而拥护四中全会，拥护中央，参加政治局会议，同意新省委名单，忽而又反对四中全会，反对新省委，反对中央，在政治局声明他可以不服从中央决议，而私自成立江苏第二省委，占据省委机关，破坏秘密工作，委派各区委，指使外县独立，占据工联党团，不接受中央与省委改组工联党团决定，派各区工联，以实现右派小组织分裂党分裂工会之反党反国际的计划。王克全同志如此的直到现在犹不觉醒，犹不停止其反党的行动，抗命不到中央审判它的委员会，

是再也不能在指导机关担任政治领导的责任了。王凤飞同志在立三主义与对立三主义调和时代是一贯的坚决执行者，等到立三主义的左倾空谈破产以后，它就表现了他的机会主义本来面目，堕落到右派小组织的泥坑中，在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开过后，他坚决的反对四中全会，反对中央，反对国际，而实行组织闸北第二区委，并用反革命的口吻恶骂中央为国民党为黄色工会，反抗中央制止他的右派小组织的活动直到现在，这简直与罗章龙与取消派无二。因此，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而且最后警告王克全王凤飞两同志如果不立即公开承认自己一切错误，立即停止一切分裂党和反党反国际的活动，接受这一决议，便是自绝于党。

二、在这一同样情形下，彭泽湘同志在沪中区委坚持他与蔡伯真□□□右倾机会主义的意见，起草通告号召同志反四中全会拒绝省委派人加强沪中区的领导，并领导同志拒绝省委所召集的会议与省委对立而实行分裂党的阴谋，且他在莫斯科又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蒋云同志是坚决领导外县来沪同志脱离省委而独立的，并且他跟王克全同志之后反对新省委参加江苏第二省委，中央，江苏省委对这两同志须采取组织上的制裁，给这些右派领袖以迎头的打击……而严肃党的铁的纪律。

三、中央政治局要求与罗章龙同道的徐锡根同志再也不能有一刻的延迟，必须立刻停止一切分裂党的活动，必须立刻脱离右派小组织，与它坚决的分开和坚决的斗争，必须立刻向党公开右派组织一切活动的经过，并且必须马上执行中央一月二十日的决议来向全党彻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否则锡根同志将要随着罗章龙之后而跑到取消派的道路上去，这是中央特别要锡根同志警醒的。还有余飞同志虽然书面上承认了他的一部分错误，但它仍然没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它仍保留反国际和反中央的情

绪的残余,对他自在莫斯科以来的派别观念,还没有什么改变,中央要求他在这些地方要与右派反党观点完完全全分开的毫不隐瞒躲避的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于党于余飞同志自己最有益的要求。

(录自《党的建设》第3期)

关于开除王克全党籍决议案

(1931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王克全自四中全会后公开的反党，他领导一部分同志实行组织江苏党的第二省委，占领省委机关，破坏秘密工作，委派人组织党的区委，指挥江苏党的外县工作委员会脱离省委组织，指挥上海工联旧党团并委派区工联人员进行第二工会的活动，侵占工会经费作为第二党第二工会的活动费，他自身公开的参加罗章龙反党的小组织，而成为他的坚决执行者，并且客观上是赞助敌人来破坏党的。这一切，足以证明王克全分裂党分裂工会与背叛阶级的罪恶，已成铁一般的事实。最后他更以敌人奸细用以破坏党的话来骂中央与煽动同志，中央政治局曾于一月二十日决议要王克全立刻停止他的活动，两天内交到他的声明书，并将他的第二省委与骂中央告密的问题交到审判委员会去解决。当场他承认了，但结果一件也没有履行，并拒绝到审判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于一月二十七日决议尚仅先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中央委员，犹望他有最后的觉悟。但截至昨日止，不仅第二党的行动没有丝毫停止，并且变本加厉的破坏工联会所召集的工会会议，破坏各区党的组织，散布罗章龙编印的反革命的小册子到党的支部中并到群众的组织中去，同样又拒绝到第二次的审判委员会。因此，中央政治局为严饬党的铁的纪律与无产阶级的队伍起见，再不能容留这一阶级的异己分子于党内，特决定开除王克全的党籍，并向全党宣布。

(选自《党的建设》第3期)

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的斗争

(1931年2月5日)

泽 民

立三路线是“左倾”的辞句掩盖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在敌人猛烈向我们进攻以救他垂亡的命运时混进党内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起来了，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切教训违背了共产国际的一切指令和指示，反对共产国际所指出的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采取了脱离群众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其结果使党和中国革命都受到更大的损失。在敌人进攻的环境之下，我们是一天不能没有正确的路线来指导，一天不能迟缓实际工作中的转变的：因此在国际得到了三中全会的对立三路线调和的消息以后，立即来信指出中央调和路线的错误，同时指示我们在这样严重的客观形势之下，党应当更加紧群众工作，不需要有争论来妨害实际工作，而应当广泛的解释立三路线的错误，使全党的布尔塞维克像一个人一样的起来站在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帜下面去向我们的阶级敌人去斗争。

毫无疑问，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我们每个布尔塞维克同志所应当跟从的。谁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离开实际的群众工作，煽起党内纠纷，减弱党对敌人斗争的力量，便是违背国际关于立三路线的指示，同时也就是违背中国革命的利益。

国际为使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纠正路线，同时不离开实际工

作，不发展党内纠纷，所以指示中国共产党召集四中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的四中全会，确是解决了问题了。第一，政治上四中全会废弃了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指出党应当依照国际七月至八月开给中国党的一切决议案的政治路线去工作，这些决议案包含了中国革命目前斗争的各方面的一切问题，写得非常详细周到。党内大多数同志为拥护这些国际的决议案而作坚决的斗争，要废去三中全会的决议，把国际的决议去执行，这个斗争，现在达到目的了。确定党的路线的问题已经解决；四中全会以后，所争的已经不应当是中央应当采取哪一条路线，而是应当怎样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第二，为执行这个正确路线，四中全会同时加以组织上的改造。在四中全会中改造了中共政治局和中央的成份。同时在四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坚决执行改造中央以下各级的指导成分不能改正的立三路线干部撤消工作，换上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干部。这种改造当然是四中全会改造了中央领导机关所得到的结果。因此党内大多数布尔塞维克同志所要求的——在组织问题上求得正确的解决，现在也已经达到目的了。其他局部的问题不必去细说，在这两个问题上四中全会完全成了他的任务。可见国际的提议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却以为四中全会并没有解决党的路线问题，因此反对四中全会，这种见解当然是极端错误的，对党和中国革命都非常有害的。

四中全会会场记录，充分表现四中全会上这两种观点的斗争，四中全会在这个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自然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列宁曾经说：凡是布尔塞维克，一定是仔细研究会场的记录的，因为这是表现出党内一切政治问题的实质。在四中全会以后部分同志反对四中全会的争论成为一时党内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当详细来研究一下这些争

论中所包含的政治意义。

首先一个问题：对于四中全会的意义有几种了解？

我们的回答是：有三种了解。第一种是反对四中全会的，认为四中全会是依然妥协调和的，为的是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种见解以罗章龙同志和何孟雄同志为代表。第二种拥护四中全会的，然是不正确的拥护，在他们看来，四中全会只是审判过去立三路线者的错误的，或者是认为四中全会是来终结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恢复“党内和平”的，这种见解以贺昌罗迈为代表，第三种见解才认为四中全会是确定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政治上给全党同志以真正广大发展和深入反立三路线斗争的可能，团结党的布尔塞维克力量来向敌人作进攻的斗争的会议，这种见解的代表者自然是国际代表和国际代表的意见所领导下的一部分中国同志。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种见解有何不同的地方。

第一种见解反对四中全会的见解。他们的根本“理论”是什么呢？还可以从罗章龙和其他一部分和他思想相同的同志们的话去了解。他们的意见，以为：

1. 旧的中央既然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了，那么他们应当负政治责任，全部离开中央。所以他们要求完全撤换中央，而不赞成局部的改造。

这种主张显然不是布尔塞维克党的原则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公平主义所产生的处罚主义。因为一部分旧的中央委员过去犯立三路线的错误，既然不是像秋白和立三同志自己一样有一贯系统，同时又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决没有理由可以无条件的因为犯过错误就要求全部撤消职务。罗章龙同志领导的这种主张是不爱恤党的干部和不顾到目前的紧张环境，和对于领导干部的需要。

2. 由于上面一种见解出发，章龙等同志又以为这种犯了错误的中央同志既然应当全部撤消，那么四中全会就不应当由中央来

召集，而应当由国际代表先来解散中央，然后用国际代表的名义来直接召集紧急会议。因此他们就提议用“八七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

这种见解亦是错误的，试问：应当在怎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召集“八七”一样的会议？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就是中央依然反对国际路线，拥护立三路线，或依然对立三路线调和。这一层，章龙同志是懂得的，所以他在会议上竭力来攻击中央九十六号紧急通告。说这依然是一个调和路线的通告。其实九十六号通告虽然有种种缺点：可是因为在这中间中央自己承认了路线的错误，并且依照国际的主张，提议具体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已经不再是调和主义的通告了。关于这个，四中全会的决议有了明确的估计。九十六号通告既然表示中央已经放弃了调和路线，所以我们便没有理由可以来赞同八七会议。国际对于一个已经服从了国际路线的中央，不需要否认他，只需要认识他过去错误的严重性而加以适当的改组。站在布尔塞维克原则上的共产国际所以这样做，毫无疑义是因为保护中国革命。因为小孩子都懂得，在敌人进攻这样猛烈群众工作不可一刻停顿的时候，如果超过中央来直接号召党员群众解决党内问题，那么群众工作既然不能有中央去领导，同时亦不能由国际代表来完全代替，于是一切革命工作势必暂时停顿，这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所以在可能的時候必须避免用八七会议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党中央在继续调和路线的时候，党员自然不得不严厉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是为的什么？当然不是为的泄愤，而是为的要使中央接受了以后自动的改正路线。

当然罗章龙和其他领导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们唯恐中央彻底承认错误了，不能达到推翻中央的目的，因此不得不在九十六号通告之后否认事实，找到一二点个别错误来硬指中央继续调和路线，这就是想尽方法要不管客观环境如何来实现一个八七会议。

大体说来，反对四中全会的主张，其理由不过是上述两点最为重要，而这两种理由都是反对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反对中国革命的利益。如果要在上面求这种主张与国际的主张的关系，那么我们应当说：章龙一派同志的主张和国际的主张没有丝毫相同点是反对国际的原则的。

为什么罗章龙等同志会有这样的主张？第一种原因，在章龙同志自己的话中可以找到答复。因为立三路线已经“破坏了党”，“破坏了中国革命”了。由于章龙同志的影响，全总党团还通过了这样的决议。这是一种什么观点？毫无疑问是右倾的悲观消极的观点。更可注意的，就是在同志们批评过了这种见解以后，章龙同志还依然认为他这种估计是正确的。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不相信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陷于沦亡，不相信有十年历史的中国的党尚有这种布尔塞维克化的程度，不能被立三路线所完全破坏，虽然立三路线本身毫无疑问是要来破坏中国的党和中国革命——推而言之，是不相信共产国际是真有充分的无产阶级斗争经验和力量的世界革命组织，具有充分能力可以来纠正中国党的路线，所以章龙等同志在四中全会上公然反对国际所提议的四中全会（要想在未开会以前先来一次表决要不要四中全会，向国际示威）虽然他们同时口口声声拥护共产国际。

第二种原因，可以从他们对改造中央问题的选举时的表现中找到答复。他们既然力言推翻整个中央，同时又另提一个名单几乎全是和章龙同志思想相同的同志，从这里我们又知道章龙同志所领导的这个运动实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小团体的利益而不顾党和革命的利益，不惜孤注一掷来反对四中全会。

这些，都表示小资产阶级在党和革命的困难时期，慌张绝望，因而提出这样的纲领来。这种纲领自然不能不是反国际的。章龙和何孟雄等同志在四中全会上种种表现，甚至公然宣言退出会场，痛骂国际所提议的改造中央的办法为不合组织原则，甚至不

顾一切秘密环境，拍案大嚷，都充分表现了。他们主要的政治意义，就是代表党内这样部份被敌人的进攻吓到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要求党从冒险盲动的立三路线下转回来的时候，不要回到进攻的国际路线而回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这种实际，也是由全总党团的决议和标准会之工作人员的决议等之件，以及其他反对四中全会的领袖们的谈话所加倍补充。现在一切文件上的表现都已经完备充分的暴露这一种假的反立三路线斗争的派别，是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了。

在这里如果还要补充一点，那么我们可以指出章龙同志自己在立三路线统治时和三中全会，后党内已经发展了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斗争时，他所抱的政治上暧昧的态度，同时也可以指出何孟雄同志自己在这整个历史中，装着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的道貌而装腔做势的时势期中，他在政治问题上是如何的懦怯动摇，和思想混乱，（他向国际代表说自从国际来信以后，右倾已经不危险了。后来又自己声明说是那句话说错了，他是要想说，左倾已经不危险了。）又说目前中国阶级战已经高涨到极点等等，便充分的表现出他们四中全会的时候，尚且倒在右倾的怀里忽然又跌倒在左倾的怀里，如此颠倒，又完全是机会主义者的表现。反四中全会的分裂派英雄王克全同志是在中央发出十一月二十五号调和路线的通告以后，尚且写声明书给中央同意于这个通告的。好一班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好一个“原则上”的团结！

由于自告奋勇“反立三路线”的罗章龙派同志们的行为的影响，四中全会在讨论中对于第二种见解，立三路线拥护者们的见解，所给的打击的确是不充分的。读会场记录的同志们应当看得出章龙等同志在四中全会中所演的角色是反对国际而不是反对立三路线。他们除少数工人同志以外，对于立三路线本身几乎完全没有攻击，对于罗迈和贺昌的发言竟全不说一句话，然而两个同志所代表的倾向，的确是立三路线派的倾向。

罗迈同志的发言，在表面上一看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的。但是从头到尾听不出他一点积极的情绪的表现是一种被审判者的供状，而不是布尔塞维克的承认错误的演说，是一种退休者的辞职书，不是革命战场上战士认识了自己错误的呼声。秋白同志的发言也归在这一类。至于贺昌同志的发言，那简直是躲在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帜之下来做立三主义者的发言了。贺昌同志的发言“精神”与三中全会政治决议的“精神”可称毫无二致。然而他们都是自称拥护四中全会的。

当然，拿这样的态度来“拥护四中全会”是把四中全会去作立三主义的解释。

第一，四中全会不是审判的会议，也不是“清账”的会议。只有立三的处罚主义才把这种会议当做是党施行赏罚之地，而不把他当做是计划今后工作，解决路线问题的会议。只有那样的去了解四中全会，才会在四中全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就自己松了一口气说好了，我现在承认了错误了，今后我也不负责了，一切都不关我的事了。这种态度要不得！这不是党员的态度！不是革命家的态度！而是衙门吏役的态度！

第二，这种态度，同时包含这样的了解：一个布尔塞维克的长处就是能承认错误，错误既已承认了，就一切事情都完了，他们也可以不必再来批评我了。总之，四中全会把我解放了。这种见解亦是最庸俗可耻的衙役的态度。我们固然不应当像右派那样在承认了错误之后还必须撤消一切职务以为惩戒。同时必须注意承认。越是对于承认了错误的同志，哪怕他承认得正确，还是应当特别严厉的监视。因为这些同志既然过去错误了，必然是由整个观念系统不曾布尔塞维克化。也只有这种严厉批评和监督，才能够帮助他们所担负的工作，和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完全脱离出来。同时也只有对于他们重复旧的错误的时候不容情的斗争，才能够免得他们的错误观念又在影响别的同志：

然而这是我们都要说明的，就是章龙孟雄等同志，在听了这些同志自己承认错误以后，就仿佛很满意的放开了。就忙着去做他们的“组织结论”，这就表示两个斗争的派别虽然处在敌对的地位，可是他们观念上的根据却是一致的。

第三，从这种观念得下以下的结论，就是，既然在四中全会上，中央同志都已承认了错误，那么四中全会以后，对于中央同志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可以停止了。如果在四中全会以后别的负责的同志也同样的承认，那么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都可以整个的结束了。因此陆定一同志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少共中央宣言说，现在可以作反立三路线斗争的第一次总结。

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也是站在这样的观点上来赞成四中全会的，右派也是站在这样的观点上来反对四中全会的。他们表面上是针锋相对，实质上是同样的对于四中全会的任务，与意义作机会主义的曲解，同样的是取消反立三路线斗争的任务。

其实刚刚相反，四中全会以后，不是反立三路线斗争的任务减轻了甚或消灭了，却是更加加紧了，四中全会以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不能刚是要求中央纠正路线作为满足，而是应当再进一步的去深思熟虑一切当前的革命问题用充分的自我批评去发现中央一般正确的路线之下各个局部的错误。不断的指正，使一般正确的路线能够继续保持其一般正确或使他更加近于完全正确。这里包含着扩大了党内斗争，将不是反对党分裂党的斗争。而恰恰相反，是巩固党的斗争。在一切群众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任务。同时也更加扩大了，严重了，我们在无数的实际策略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去一个个的找出立三路线工作方式的结论来按照正确的国际路线提出的具体办法。这种工作，就是叫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做，也会觉得是异常艰巨的。在这种战线上，稍为一点忽略就可以放松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因为立三路线已经这样的深深钻入全党的工作方式，思想方式和组织方式中去

了,在你真真去和他斗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是形成了一个有机体的整个,不容易迅速加以转变的。在这样的斗争中你会觉到从中央的总决定起,到每一个罢工的指导,以至于每一个会议,每一个对工人的谈话,都渗透立三路线的观点,须要将他们去掉,而在作这种斗争时,你会感觉到自己还得跟自己斗争,到处防止你自己被四周的立三路线的观念所同化了去。当你认清楚了国际路线而同立三路线作广泛的斗争时,你会看见到处遇见观念上的冲突。而这个斗争依然成为残酷的斗争。

真真站在国际路线上来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因此对于四中全会的估计是认为他是给了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真真大规模的来开始反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绝不是反立三路线斗争的终结,党在目前所需要的是这个,党没有可能去企图得到更大的东西。四中全会给了我们这个东西,因此他是完全完成了他的任务的。

现在再来说一下四中全会以后右派和立三派如何对国际路线抗拒。

现在右派为掩盖他自己的反四中全会政纲的空洞无内容,已经开始企图在中央所有的通告中来指摘错误,用政纲来对抗了。当然,他们如果能够这样做,是比空喊反对四中全会有意义得多的。可惜从右倾的头脑里倒不出正确的丸药来。他们一开始尝试指摘中央二七通告中策略的“错误”就反对号召示威和罢工。他们要想在四中全会以后的新中央的苏维埃运动中找一点“立三路线”的“错误”出来。就宣言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反对继续号召革命战争。这样,一提到政治问题,就立刻落到取消派的泥坑中去把自己的面目揭破。

反党反国际的右派,现在已经没有揭起任何政纲来和党和国际的政纲对抗的可能了。因而只得利用四中全会材料没有发表的时机,任意散布谣言,混乱党内空气,借大多数同志对立三路线

的愤恨，把他们的愤恨转移过来，不是去对付立三路线和对付蒋介石，却是来对付党对付共产国际。他们现在急急乎发展分裂运动，想把十年来的多少英雄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所换来的中国共产党分裂起来去破坏中国革命。在这里我们却又看见了右派和立三派公开的结合和互相勾引。

李求实同志的忽然从积极拥护立三路线转入反对四中全会的罗章龙右派，戴小云的向右派妥协，王克全的分裂江南省委，去和罗迈谈话，拥戴顶顶大名的立三路线拥护者和创造者为省委书记（无乃和布哈林的找季诺维也夫谈判小组织相似了吧？）表示这两派在国际路线的打击之下怎样逐渐融合起来的过程。在这里，当然，真真觉悟了立三路线之错误的同志必然站在国际路线上给这种倾向以严厉的打击的。

由乎这种右派的反党运动，现在人人都明白，我们在许多区的实际工作是几乎完全停顿了，二七运动眼看得准备不起来，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实际已完全停止，甚至因此而遭受敌人严重的破坏，右派领袖们的“反立三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便是如此。他们这种斗争就叫做反党的斗争，反共产国际的斗争。全党的大多数同志中自然可以有一部分暂时受他们的欺骗来做反对四中全会的工作，但是革命的逻辑是必然要使这些右派和立三派的企图遭受最后的失败。在党的领导方面的说服和领导之下，全党同志将像一个人样的起来揭破这些右派和立三派的取消主义的真面目，给以应得的打击。

（录自《党的建设》第2期）

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 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

——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

(1931年2月)

一，中央代表团对于中大直接责任在于尽量赞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中央来解决培养中共干部的困难而复杂的任务。尤其是代表团应当协同中大的领导机关向各种倾向，派别以及学生中的扰乱分子作斗争，因为这些分子使学校的工作解体，破坏学校执行直接的任务。

但是代表团没有执行自己的责任，他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这就说明中共代表团不去赞助完会消灭派别，他自己反而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

二，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翟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秦）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

三，至于代表团的个别代表有同情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嫌疑一事，政治委员会认为这一类的嫌疑，只是根据托洛茨基主义者本人之叙述，这种嫌疑是没有证实的。但是毋容争论的事实是：中

共代表团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充分的思想上的斗争，反而用自己的方法，为增加自己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来与托洛茨基派作斗争，且对于李剑如余笃三派企图利用托派来取得中大的影响一事，采取了调和态度。

四，学校工作之破坏，一至于此，政治委员会绝不否认学校领导和支部局应当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政治委员会同则要指出：在这件事上相当的一部分责任也要落在代表团身上。代表团方面实际上赞助派别作斗争，接近代表团多数的李剑如余笃三派所进行的无原则斗争，代表团中代表的个别政治错误（如关于富农问题）以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的决议以后，也采取不充分明确的立场——凡此种种，均便于托派扩大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均便于他们破坏的活动。

上述代表团的种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及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

（录自《党的建设》第四期）

中央政治局关于 1929—1930 年 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

(1931 年 2 月 20 日)

国际政治委员会去年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完全是正确的。当时中央派赴国际代表伍豪同志已经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审定了刷新中共代表团成分的办法，而调鞫秋白，邓中夏，余飞三同志回国工作。本年来党内斗争的发展，中央政治局认为：

一，中大李剑如余笃三派反支部局正确路线的派别斗争是影响到中国党内的。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即曾以中大大学生中反支部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后来中复余飞两同志回国，不但没有依照国际决定向中共报告，来认识他们所受到国际坚决谴责的严重，反而以自己的派别立场加深当时中央的派别观念。这都是不可容许的错误。

二，中共代表团多数（少数的国焘同志不是在最初而只是在后来与其他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因为在国际对于中大李剑如余笃三派采取了以右倾政治意见（如富农问题）来领导他们走向反国际情绪的行动，对于李余派利用托洛茨基派一事采取了调和态度，所以当他们回国以后，秋白同志便领导了三中全会不仅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接受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而且对于国际代表也表示极不尊重的态度；中

夏同志在当时也没能接受国际代表的意见来反对立三同志的错误，反而到鄂西以后尽量去发展立三路线的错误，余飞同志则在对于立三路线采取调和主义以后，更走到与右派罗章龙小组织联合，而做成反国际的行动（一月十六日全总党团会议）。这些事实都是代表的个别政治错误（如关于富农问题）以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的决议以后，也采取不充分明确的立场——凡此种种，均便利于托派扩大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均使利于他们破坏的活动。

上述代表团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及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份。

（录自《党的建设》第四期）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

——报告四中全会经过

(1931年2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国际直接指示之下开会的扩大的四中全会已经正式顺利地完成了，全会一致地宣布立三主义的破产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严重错误，部分地改造了中央及政治局，决定于最短期内召集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会一致地严厉指责在立三路线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的反国际路线及不尊重国际代表的不可容许的错误，坚决认为国际路线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路线。在全会上及全会后，以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余飞，王克全为领导的一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下，公开提出右倾政纲，并且公然进行反国际及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全党同志现正在坚决为拥护国际路线，肃清立三路线，反对机会主义及对立三路线与右倾调和的调和派争斗，坚决执行实际工作中的大转变。敬礼！

(政局正式候补委员共到十一人，八票赞成，三票（徐锡根、陈郁、王克全反对）

国际执委：

一、去年七月的国际决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国际分析中国的局势，是说“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保证必需的

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的省分”。因此，国际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的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

二，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却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大家都知道立三路线早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立三同志路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严重的事实，真是举不胜举。现在说他最主要的是：因为党在空喊暴动，而不去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是党对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因为党更以空喊的口号在厂外号召，不真正去到厂内发动群众，每次示威变成命令的；即只有少数党内干部，也要命令他们孤露到街上，送给敌人摧残，于是党的动员群众的能力便大大的削弱了，到现在，这种空喊政治口号与厂外号召已经完全破产了；因为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而组织总行动委员会，于是削弱了群众团体的行动，尤其是青年团取消了，助长了党内对于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好些地方还是党团合并的状态，而取消了青年运动，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

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说已由四千多退到几百人，香港由两千多退到三百多人，因此，我们的职工运动向后倒退了，在上海许多工人斗争，我们没有关系，许多罢工，我们不能领导，甚至还不知道，即去冬开滦五矿，赵各庄七千矿工的大罢工，虽是我们领导，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发动，事起又没有很好的组织，以致罢工虽胜利了，而我们的工作却没有进步。不仅工运方面如此，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中所受的损伤，江苏南通淮盐、浙南、皖西、直南的失败，便是显著的例子。在反帝运动以及一切革命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与组织，也都大大的后退了。这些，都表现出立三路线的领导，不是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去尽量巩固和发展党与青年团，及群众团体，反而在事实上取消青年团，取消群众团体，涣散党的组织。别方面：立三同志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取消或监视他们的工作，如对陈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予述四同志及对何孟雄同志的处罚，这就使党的生活引导到非常的状态。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帮助了托陈派，利用这一时机，去进行反党阴谋以达到破坏党的目的，别方面帮助了党内右倾分子抬头，他们公然反对国际的进攻路线，主张放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如郭妙根），并且攻击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就是一贯的错误路线（如王仲一、罗章龙等）。

同时，立三路线的领导，当时在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好多次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布置武装暴动，如在武汉、南京的武装暴动的布置，北方三大城市及广州的武装暴动的布置，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都是不估计环境，没有成熟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威信丧失，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特别是武汉、南京的损失最大），使我们的组织在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如武汉、香港、河南、南京等处）。最后，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

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立三同志在苏代会中的领导,以及以后他的个别指示,都是要红军无条件的扩大,一意的进攻武汉,反对国际指示的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因而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机会主义与过早办法的法令。这样,就使对于中农的联盟,发生危害,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发生危害。尤其是因为不去巩固苏区内部,反而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攻坚,这样,就更加帮助富农路线在苏区的发展,帮助富农分子在党内政府内红军内占着领导地位,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如江西 AB 团鄂西“北极会”赣东北改组派等等。立三同志还有取消游击战争,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指示,他主张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来,——这样,就使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受到削弱,我们的红军受着严重的打击。自然,这并不是说,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便没有发展了,相反的,现在一、三集团军及第一军都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群众与英勇的战争曾经击破了敌人一方而得到相当发展。

三、在这里,我们要说到立三路线怎样形成及其理论的系统。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基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障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

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否认中国革命有争取首先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

可能。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因而他就取消了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于是他遂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红军与暴动起来的农民占领长沙后,立三同志就主张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来响应长沙的胜利,要用脱离革命运动的兵士暴动来代替工农兵武装暴动,并且要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起来暴动,好援救中国革命。根据这种观点,立三路线使用完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一省几省政权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简直根本否认了列宁主义对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而公开的投降于托洛茨基主义。立三路线暴露出,他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与工农群众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他用纯空想的说话,以为党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只要革命一起来,几天之内便可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后,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等等,而取消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立三路线对于武装暴动的解释,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朗吉主义,推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这些,恰如国际来信所说,“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掩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四、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去年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他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的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和报告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

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共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以后党内的严重状态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忽视国际执委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我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

五、去年九月的三中全会是不是执行了坚决的转变呢？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可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只是很温和的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而丝毫没有指出绝对错误南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原则上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还说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作用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这是对立三路线的保障。三、这个决议案上重复的说，六月到八月的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更混淆了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四、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并在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方针上发生了许多具体的错误。这里，就必须严重指斥由国际回国的中央政治局代表秋白伍豪两人所犯的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这里，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立三同志政治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所以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

还有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他的错误程度更大。例如：一、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对于过去错误的批评比政治决议案还要温和；二、秋白同志在党报上发表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丝毫没有提起立三同志的错误，和他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三、中央在三

中全会后的通告里，也还是照三中全会政治决议的解释，说那时期的中央路线是和国际路线一致等等。这样，更不能领导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了。

六、此外，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更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犯着国际纪律，秋白同志在莫斯科时，已有信给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共中央对于国际代表的不信任，同时他在莫斯科解决学生问题时，也同样有不尊重国际指导机关的态度。三中全会时，国际代表与几个政治局同志预先商量好了的，对于三中全会决议案的修改词句，后来也没有完全加进去，其中有关于立三错误是原则上的，与中央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工作上的估量。并且，又没预先通知国际代表，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

七、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我们是回答没有的，很显明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中央几次通告都表现出严重的错误，如九十二号通告中对于军阀战争的估量，是离开了阶级立场，说反动军队在进攻红军的过程中，会自相开火起来。关于广暴示威号召，提出不断示威的口号。关于外洋船总同盟罢工的估量与发动的方式，也都有过分的地方。这些，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虽有巩固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计划，但因为根本路线没有改变，故红军仍在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使目前苏维埃区域，在敌人包围中继续受到削弱。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举行不断示威等等口号，而并未真正努力去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并未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苏维埃大会选举运动虽

号召了三个多月，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在非苏区中选出来的代表也没有几人，并且代表的群众数量也极小。去年广暴纪念示威在全国的失败，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

八、去年十一月国际来信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工作，给了确当的估量，指斥了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以后告同志书及十二月九号决议，也还没能将调和主义的态度完全纠正过来，如一方说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一方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等等。

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党的危机，是在立三路线盛行的时候造成的，现在党已进到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并且这样解释，反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的犹豫与动摇造成

的结果。

九、但在这里，党内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斗争的开展，是有了新的气象的。在立三主义还统治着全党的时候，中央指导机关中便遇到了陈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的反对，在实际工作中便遇到了许多下级同志因为执行立三路线不通，发生了怀疑，怠工或消极的反抗，这里边，也有公开提出不同意见的，显著的如当时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同志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河南省委中代表立三路线的少数同志(童长荣同志等)与反对立三路线错误的多数同志(徐兰芝、陈原道等同志)的争论；——这都表示当时党内确已有了反立三主义斗争的萌芽，而打破了立三同志所认为的立三路线团结了党内一切积极干部的错误认识。相反的，在立三路线发展与统治之下，许多机会主义动摇与投机分子，却能利用“左倾”的空喊混入党的指导机关，而掩盖其对于革命真实任务之执行的消极。这一现象，在立三主义破产之后，更加看得明显，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中去反对立三路线；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并且暴露了他在济难会工作中一切腐化；官僚主义与背叛阶级利益的行动，而被党宣布开除；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在立三主义统治时候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贺昌、晓野、童长荣、吴振鹏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之最坚决的执行者，但在反立三主义与拥护四中全会的斗争中，都曾发生过动摇。这证明只有国际路线，才能团结一切布尔塞维克在党的指导机关周围，而立三路线却只能相反的给党内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以压迫和打击。并且给机会分子以一些可以利用为反党基础的机会。所以当国际来信到后，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发表，党内立刻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意见在发展：一种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要求中央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反

对中央对于三中全会的任何留恋的调和态度，这种意见可以拿陈韶玉、沈泽民、夏曦等同志的意见书与在各种会议中的发言为代表；一种是也站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但暗藏着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的活动，而公开的说立三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已经破坏了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甚至断送了中国革命，这种意见的代表是以罗章龙为领导的全总党团海总党团（海总党团在后来是承认了自己错误而坚决反对右派了），以王克全为领导的上海工联党团，林育南同志所领导的苏准会工作人员等等，还有一种是站在对立三路线不断调和的立场上来接受国际路线，因此，对国际路线的接受是不彻底的是不真实的，对立三路线的揭发与反对，自也不能彻底与真实了，这种意见的代表可以说是九十六号通告以前的中央政治局和一些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如贺昌等。在这三种意见的发展中，共同发出要求紧急会谈的呼声。第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紧急会议的召集是可以容纳更多的反立三主义的下级工作同志，并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第二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当时中央已经完全破产，召集紧急会议是等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要求立刻推翻整个中央，主张由国际代表直接召集紧急会议；第三种意见的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方面是接受了第一种同志的提议，也主张由中央召集紧急会议，容纳更多的新的分子，改造中央指导机关，并发出九十六号的紧急通告放弃了对于立三路线的一切调和主义的立场。自九十六号通告发表后，前后两种同志的意见便一致了，共同的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彻底的反对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筹备紧急会议。但第二种意见的同志却仍然坚持立即撤换中央领导的错误主张，以进行他们分裂党的活动。关于紧急会议，后来经过国际代表的解释，经过国际对于四中全会召集的批准，中央政治局便完全了解了四中全会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紧急会议成为不必要的要求了。

十、在这样的转变之中，扩大的四中全会便于本年一月七日

开过。到会的人数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农民一，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会议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收到了他伟大成功。在会议上，一致的接受了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便是右派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国际路线），大多数的同意于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和他所提出的草案，在这报告与草案中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指斥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与秋白同志所负的最主要的责任，并具体的规定了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办法。会场中的发言，有些立三主义者如贺昌罗迈等同志还承认错误不彻底或不真实。而右派以罗章龙何孟雄为领袖的小组织，便在会场上暴露了他们分裂党的尝试；他们开始在反对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的前提之下，要求会议表决他们直到那时还主张的紧急会议，但为大多数所拒绝了，继之他们对于许多同志所严厉指斥的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决议案是右倾纲领，加以绝对否认，对于他们在立三主义下所做的错误完全不实行自我批评而只是攻击过去的中央；最后他们表示不满意国际代表最有力而正确的结论，并在选举时候，提出他们推翻整个中央的名单，等到大多数不同意，便以退出会场捣乱会场为要挟为恐吓。但是不管右派如何捣乱，国际代表的结论终得到最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中央政治局改造了立三、秋白、罗迈三同志退出政治局，陈郁、弼时、韶玉、少奇、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冲央委员会亦退出了罗迈、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同志，内中五个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成分中，十六人中十个是工人出身。这在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的工作上，确达到了他的任务，并请求国际批准。

十一、四中全会开过之后，右派小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便愈加暴露出来。本来，四中全会前，罗章龙何孟雄便找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同志开小组织式的会议，讨论党的前途、罗章龙即主

张分裂(这件事在锡根同志开始承认错误后才知道)。四中全会后,右派小组织在罗章龙何孟雄王仲一领导之下遂实行对党的分裂。首先便是海总党团在陈郁同志领导之下成立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继着,出席四中全会一部分不满意或认识不清楚的同志十三四人在罗章龙领导之下,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的会议,这些人中包含有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经、余飞、徐畏三、张金保、袁乃祥等。会议中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小册子,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会后,小册子即由全总印厂铅印分发,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江苏经王克全的活动,连敌人士兵支部中都散进去了。右派的临时中央既成立,于是王克全、徐畏三、蒋云、陈资华、吴国治、刘瑞龙便在江苏省委发动,反对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改组的新省委,而占领省委机关,召集江苏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员成立第二省委;全总党团在罗章龙徐锡根领导之下于一月十七日会议席上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并成立与党对立的决议;王凤飞便在上海的闸北,蔡伯真彭泽湘在上海的中区,蒋云便在外县来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们的第二区委,宣告外县工作独立,来反对省委来分裂党;罗章龙的第二党更派张金刃、韩麟会、王仲一到顺直去,唐宏经到满洲去,李震瀛到香港去,进行第二党的活动。这一切分裂党的活动逐渐暴露,全党反右派的斗争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也更加明显起来。在这里,中央与江苏省委首先成立反对右派分裂党的会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一活动,当时政治局中,陈郁同志开始转向拥护四中全会方面走,徐锡根同志虽举手通过这一决议,但同时又声明保留几点,王克全则放弃表决。从此,王克全一直不服从中央任何决定,并在右派小组织因为毫无顾忌的在旅馆中连续开会被敌人破获被捕三十多人后(内中也

有不是右派而被地址牵连的，被捕原因是由于右派内部中有叛变分子告密，现在已被枪毙的二十三人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蔡伯真、龙大道等同志均在内)，而说是中央告密，来煽动同志自相残杀，因此，中央决定开审判委员会，审判他这一问题他又两次抗议不到。先是中央开除他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停止他的活动；不听，乃开除他的党籍。罗章龙则自证明反党的小册子是由他编印后，中央根据他有意用这反革命的小册子向敌人告密，特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王凤飞同志则因他的行动完全与王克全一致，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这三个人的问题，均请求国际予以批准。徐锡根同志则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说之后，现在正式宣告脱离右派小组织，向党写过两次声明书，惟对于四中全会问题还没有能彻底承认错误，故中央曾与远东局有一度决议，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他现在并未出席政治局会。陈郁同志则转变虽早，但承认错误（也有一次声明书）还不忠实，直到最后一次政治局会，他始说出他曾参加过右派代表团会议，罗章龙并要他做负责的，他没接受但也没反对。王克全则在被开除后，始向党声明他愿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并报告罗章龙第二党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现改推王克全、罗章龙、吴雨铭、王凤飞、蒋云等六人负责，并推他做书记，为他拒绝。目前可以说，自罗章龙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第二党活动及反革命小册子暴露以后，加以中央省委对他们加紧斗争，右派便在党内宣告破产，所以全总党团中余飞等同志便开始承认错误，海总党团彻底转变，并不满意于陈郁同志承认错误不彻底，江苏省委中沈先定刘瑞龙等同志亦诚恳的承认错误，各区委中外县工作人员中亦多部分转变过来，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现在亦已多回到国际路线下来，而拥护四中全会并反对右派。李震瀛唐宏经到香港满洲都遭了省委拒绝。惟顺直党中，机会主义根基较深，而右派一些领袖又多在顺直做过工作，

如吴雨铭、韩连会、张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张昆弟、王仲一甚至韩磷符，他们都集中在天津，并且还影响了一些干部，所以那里的斗争还很艰苦，中央现在更派负责同志去巡视。同时，在这次与右派的斗争中，又发生立三主义者与右派联合的企图，中央为此事曾给贺昌同志一警告，并要罗迈秋白等同志写声明书，他们均已写来。党现在正处在两条战线的坚决斗争中，尤其是立三路线“左倾”的空谈揭破之后，右倾的悲观、消沉、失望、怠工都一齐进发，而要求党走向退却路线，同时这便是反党的基础。所以右派在这一时机又一度抬头。中央政治局现在在远东局直接指导之下，深刻认识要彻底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及右派小组织与对“左”右倾的调和主义，则不仅理论上要加紧这一工作，尤其是要深入到实际中去执行国际路线之彻底的转变。

十二、四中全会后，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始的艰苦，许多干部受到右派影响而动摇，使中央与各级党部在实际工作的转变的确受了很大阻碍。同时，敌人进攻革命的加紧，无论对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围巢”，或是对非苏区的白色恐怖，都使党的任务更加紧迫而繁重。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后这一个半月，关于实际工作的布置约有以下各点：

第一、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过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等，现在则侧重在活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而使政治的指导能善于运用党报来起真正党报的作用。现在已经开始试做。

第二、对于全国党部方开始执行改造的工作，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委正在加紧这一工作，要使上海每一工厂作坊的支部，真正能起群众中的核心作用，而发动厂内活动与斗争。过去上海党员有一千三百多，现在清查结果，要以能做工作与到会缴费的才算党员恐不到八百人。香港经过大破获，中上级干部被捕四十多，现在工作方开始恢复，党员只一百五六十人，而真正能做工作的

恐亦不及百人。武汉累次破获后，市委都难立足，现在主要的办法是重新打人生产。长沙、岳州、九江，南昌等地的工作，始终没有恢复。天津党员在生产中的不及二十人，只唐山矿工党员较多点，但也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满洲大破获后，仅抚顺、大连、营口有点党的工作，但亦甚微弱。总之，一切非苏区的中心城市工作，经过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时代给了很大的损害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转变。对于各地工作的布置，满洲、顺直、山西、青岛、河南、武汉都已派了省委市委的人去，执行这一转变。

第三、对于苏区工作的加紧，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对苏区中央局，已决定再派政治局委员三个人去和其他得力同志，成立九个人的苏区中央局。对鄂西鄂豫皖两处，亦决定组织中央分局。派两个中央委员去主持分局。其余赣东北、平、浏、修、铜、闽粤赣、七军等处亦决定加派政治领导人去。各军政治委员已决定改换得力的工人成分或有威信有能力的同志去。党的干部及工运人材正在由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党部审调。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现在对各苏区的交通方开始恢复，最近一月可去苏区一百上下的干部。

第四、对于苏区工作的指示，除四中全会前有一给红军的军事训令（十二月十日）外，最近复与远东局准备好了关于苏维埃大会的五种文件：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对各个苏区的指示，对鄂豫皖、鄂北、赣东北已有指示信发出，对鄂西的新的指示，正在起草中。中夏来的报告，简直是十足的军事投机，完全是立三路线的扩大执行者，中央已决定调他离开鄂西。一、三集团军最近因反 AB 团的斗争与赣省行委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中央现在仅收到一部分的报告，还不能作任何最后的结论，因此，中央政治局得到远东局的同意决定派全权

的代表团去中央区解决此事，同时即成立中央局与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各苏区与红军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虽受到了一些牺牲与损失，但敌人第一期“围剿”的计划，却也遇到失败。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曾于一月一日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发展到四万多人的主力部队。第二集团军也发展到近万的枪支。第一军人数枪支的过万。七军也有发展。按区域说，赣东北、鄂西洪湖、闽西龙岩等根据地是削弱了，但新的发展还有很多可能。蒋介石现在正订出第二次剿共计划，主要的内容是集中他们的主力，徐图红军的内变以便聚而歼之，针对着敌“围剿”的计划，依据着我们发展的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主要的要看我们不能坚决的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来采取适当的正确的策略。关于这一点，中央与远东局决定了一个给红军与各级党部的训令，通过后即将发出。

第五、关于拥护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中央曾成立一决议，要非苏区的城市的党部，首先征调工人去苏区和红军中，现在这一工作，仅上海才开始做，二三月份约有一百到二百人可去。别的地方还没开始动员。在敌人军队中或后防的破坏工作，中央曾输送了六十多个人到前线军队中去当兵，有效果的尚居极少数。在工人群众中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简直可以说没有切实的做。选派到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没有几个是广大群众选出来的，即有一两个是较多群众选的，也没做很好的宣传。过去苏准会的工作，完全是空机关，现已改为发动群众去在各厂各乡村成立各种各样的拥护苏维埃红军运动委员会。

第六、对于全总党团，现在已实行改组，工作人员与机关已大大缩小，中心工作要建立，在发动与领导真正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要密切与工人群众的联络，要发展真正群众的赤色组织及其辅助组织，并加紧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与工厂作坊委员会的组织。对于全总工作，中央已通过决议，并派了十个以上的得

力同志给全总党团，为的是派往各地去建立基本工作，关于二月二十五日失业工人运动，中央早有决议，但因各地无工作基础，恐届时不能有多大发动。三八妇女节，中央也发出决议给全党，现在有妇女工作的除苏区外，还是上海，已督促省委加紧这一工作。

第七、对于国民会议的反对运动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大借款等等，现在开始加紧来做。

第八、党报工作，在立三主义最盛时期虽办的很有规模，但以后迭受摧残，到现在红旗日报还只能日出一极小张，而且只能印一千多份，这是最大的不利。现在正计划恢复较大张的日报，并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党报的领导，以实现党报在政治上领导全党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党报现分四种：一、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刊物；二、实话五日刊——宣传党的政策的刊物，三、红旗日报——鼓动的刊物，四、党的建设——党内的刊物。这四种刊物，除掉印刷困难的原因外，还有因为做工作同志没有养成读党报与写文章的工作作风，所以常因稿少不能按期出版。

第九、济难会的工作因检查结果，发现党团负责人不仅政治观念错误，并且将救济经费最大多数完全没有用在救济在狱战士及被难家属身上，现已解散旧党团，重新成立新党团建立工作，并开除了负责同志戴晓云。

第十、中央本身工作，最近也并始在执行转变。机关与工作人员都尽量减少，要求得人少而得力，尤其是秘密工作，现在更成为巩固中央的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的报告便暂止于此，望国际给我们以批评。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931年2月22日)

国际执委：

一、去年七月的国际决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国际分析中国的局势，是说“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的省分。”因此，国际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的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

二、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却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上去。现

在大家都知道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立三同志路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严重的事实,真是举不胜举。现在说他最主要的是:因为党在空喊暴动,而不去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是党对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因为党更以空喊的口号在厂外号召,不真正去到厂内发动群众,每次示威变成命令的,即只有少数党内干部,也要命令他们孤露到街上,送给敌人摧残,于是党的动员群众的能力便大大的削弱了,到现在,这种空喊政治口号与厂外号召已经完全破产了;因为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而组织总行动委员会,于是削弱了群众团体的行动,尤其是青年团取消了,助长了党内对于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好些地方还是党团合并的状态,而取消了青年运动;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说已由四千多退到几百人,香港由两千多退到三百多人;因此,我们的职工运动向后倒退了,在上海许多工人斗争,我们没有关系,许多罢工,我们不能领导,甚至还不知道,即去冬开滦五矿、赵各庄七千矿工的大罢工,虽是我们领导,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发动,事起又没有很好的组织,以致罢工虽胜利了,而我们的工作却没有进步。不仅工运方面如此,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中所受的损伤,江苏南通淮盐,浙南,皖西,直南的失败,便是显著的例子。在反帝运动以及一切革命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与组织,也都大大的后退了。这些,都表现出立三路线的领导,不是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去尽量巩固和发展党与青年团,及群众团体,反而在事实上取消青年团,取消群众团体,涣散党的组织。别方面:立三同志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取消或监视他们的工作,如对陈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及对何孟雄同志的处罚,这就使党的生活引导到非常的状态。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

一方面帮助了托陈派，利用这一时机，去进行回党阴谋以达到破坏党的目的，别方面帮助了党内右倾分子抬头，他们公然的反对国际的进攻路线，主张放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如郭妙根），并且攻击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就是一贯的错误路线（如王仲一，罗章龙等）。

同时，立三路线的领导，当时在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好些次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布置武装暴动，如在武汉、南京的武装暴动的布置，北方三大城市及广州的武装暴动的布置，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都是不估计环境，没有成熟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威信丧失，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特别是武汉，南京的损失最大），使我们的组织在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如武汉，香港，河南，南京等处）。最后，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立三同志在苏代会中的领导，以及以后他的个别指示，都是要红军无条件的扩大，一意的进攻武汉，反对国际指示的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因而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机会主义与过早办法的法令。这样，就使对于中农的联盟，发生危害，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发生危害。尤其是因为不去巩固苏区内部，反而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攻坚，这样，就更加帮助富农路线在苏区的发展，帮助富农分子在党内政府内红军内占着领导地位，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如江西 AB 团，鄂西北极会，赣东北改组派等等。立三同志还有取消游击战争，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指示，他主张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来，——这样，就使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受到削弱，我们的红军受着严重的打击。自然，这并不是说，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便没有发展了，相反的，现在一三集团军及第一军都因为他

们联系着广大的群众与英勇的战争曾经击破了敌人一方而得到相当发展。

三、在这里，我们要说到立三路线怎样形成及其理论的系统。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斯基主义，布朗克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障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

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否认中国革命有争取首先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因而他就取消一省几首先胜利的可能，于是他遂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红军与暴动起来的农民占领长沙后，立三同志就主张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来响应长沙的胜利，要用脱离革命运动的兵士暴动来代替工农兵武装暴动，并且要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起来暴动，好援救中国革命。根据这种观点，立三路线使用完完全是托洛斯基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一省几省政权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简直根本否认了列宁主义对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而公开的投降于托洛斯基主义。立三路线暴露出，他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与工农群众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他用纯空想的话，以为党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只要革命一起来，几天之内便可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后，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

派制度等等，而取消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立三路线对于武装暴动的解释，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朗吉主义，推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这些，恰如国际来信所说，“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掩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四、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去年六月十一出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他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的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和报告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共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以后党内的严重状态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忽视国际执委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我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

五、去年九月的三中全会是不是执行了坚决的转变呢？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可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只是很温和的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而丝毫没有指出绝对错误的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原则上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还说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作用

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这是对立三路线保障。三、这个决议案上重复的说,六月到八月的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更混淆了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四、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并在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方针上发生了许多具体的错误。这里,就必须严重指斥由国际回国的中央政治局代表秋白伍豪^①两〈同志〉所犯的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这里,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立三同志政治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所以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

还有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他的错误程度更大。例如:一、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对于过去错误的批评比政治决议案还要温和;二、秋白同志在党报上发表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丝毫没有提起立三同志的错误,和他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三、中央在三中全会后的通告里,也还是照三中全会政治决议的解释,说那时期的中央路线是和国际路线一致等等。这样,更不能领导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了。

六、此外,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更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犯着国际纪律。秋白同志在莫斯科时,已有信给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共中央对于国际代表的不信任,同时他在莫的态度。三中全会时,国际代表与几个政治局同志预先商量好了的,对于三中全会决议案的修改词句,后来也没有完全加进去;其中有关于立三错误是原则上的,与中央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工作上的估量。并且,又没预先通知国际代表,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

^① 伍豪,即周恩来。

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

七、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我们是回答没有的，很明显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中央几次通告都表现出严重的错误，如九十二号通告中对于军阀战争的估量，是离开了阶级立场，说反动军队在进攻红军的过程中，会自相开火起来。关于广暴示威号召，提出不断示威的口号。关于外洋船总同盟罢工的估量与发动的方式，也都有过分的地方。这些，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虽有巩固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计划，但因为根本路线没有改变，故红军仍在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使目前苏维埃区域，在敌人包围中继续受到削弱。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举行不断示威等等口号，而并未真正努力去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并未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苏维埃大会选举运动虽号召了三个多月，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在非苏区中选出来的代表也没有几人，并且代表的群众数量也极少。去年广暴纪念示威在全国的失败，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

八、去年十一月国际来信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工作，给了确当的估量，指斥了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以后告同志书及十二月九

号决议，也还没能将调和主义的态度完全纠正过来，如一方说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一方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等等。

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廿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党的危机是在立三路线盛行的时候造成的，现在党已进到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并且这样解释，反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的犹豫与动摇造成的结果。

九、但在这里，党内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斗争的开展，有了新的气象的。在立三主义还统治着全党的时候，中央指导机关中便遇到了陈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的反对，在实际工作中便遇到了许多下级同志因为执行立三路线不通，发生了怀疑，怠工或消极的反抗，这里边，也有公开提出不同意见的，显著的如当时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同志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河南省委中代表立三路线的少数同志（董长荣同志等）与反对立三路线错误的多数同志（徐兰芝陈原道等同志）的争论；——这都表示当时党内确已有了反立三主义斗争的萌芽，而打破了立三同志所认为的立三路线团结了党内一切积极干部的错误认识。相反的，在立三路线发展与统治之下，许多机会主义动摇与投机分子，却能利用“左倾”的空喊混入党的指导机关，而

掩盖其对于革命真实任务之执行的消极。这一现象，在立三主义破产之后，更加看得明显，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中去反对立三路线；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并且暴露了他在济难会工作中一切腐化，官僚主义与背叛阶级利益的行动，而被党宣布开除；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在立三主义统治时候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贺昌，晓野，^①童长荣，吴振鹏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之最坚决的执行者，但在反立三主义与拥护四中全会的斗争中，都曾发生过动摇。这证明只有国际路线，才能团结一切布尔塞维克在党的指导机关周围，而立三路线却只能相反的给党内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以压迫和打击，并且给机会分子以一些可以利用为反党基础的机会。所以当国际来信到后，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发表，党内立刻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意见在发展：一种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要求中央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中央对于三中全会的任何留恋的调和态度，这种意见可以拿陈韶玉，沈泽民，夏曦等同志的意见书与在各种会议中的发言为代表，一种是也站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但暗藏着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的活动，而公开的说立三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已经破坏了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甚至断送了中国革命，这种意见的代表是以罗章龙为领导的全总党团海总党团（海总党团在后来是承认了自己错误而坚决反对右派了），以王克全为领导的上海工联党团，林育南同志所领导的苏准会工作人员等等；还有一种是站在对立三路线不断调和的立场上来接受国际路线，因此，对国际路线的接受是不彻底的是不真实的，对立三路线的揭发与反对，自也不能彻底与真实了，这种意见的代表

^① 晓野，即余泽鸿。

可以说是九十六号通告以前的中央政治局和一些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如贺昌等。在这三种意见的发展中，共同发出要求紧急会议的呼声。第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紧急会议的召集是可以宽纳更多的反立三主义的下级工作同志，并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第二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当时中央已经完全破产，召集紧急会议是等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要求立刻推翻整个中央，主张由国际代表直接召集紧急会议；第三种意见的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方面是接受了第一种同志的提议，也主张由中央召集紧急会议，容纳更多的新的分子，改造中央指导机关，并发出九十六号的紧急通告，放弃了对于立三路线的一切调和主义的立场。自九十六号通告发表后，前后两种同志的意见便一致了，共同的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彻底的反对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筹备紧急会议。但第二种意见的同志却仍然坚决立即撤换中央领导的错误主张，以进行他们分裂党的活动。关于紧急会议，后来经过国际代表的解释，经过国际对于四中全会召集的批准，中央政治局便完全了解了四中全会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紧急会议成为不必要的要求了。

十、在这样的转变之中，扩大的四中全会便于本年一月七日开过。到会的人数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农民一，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会议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收到了他伟大成功。在会议上，一致的接受了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便是右派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国际路线），大多数的同意于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和他所提出的草案；在这报告与草案中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指斥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与秋白同志所负的最主要的责任，并具体的规定了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办法。会场中的发言，有些立三主义者如贺昌罗迈等同志还承认错误不彻底或不真实。而右派以罗章龙何孟雄为领袖的小组织，便在会

场上暴露了他们分裂党的尝试；他们开始在反对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的前提之下，要求会议表决他们直到那时还主张的紧急会议，但为大多数所拒绝了。继之他们对于许多同志所严厉指斥的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决议案是右倾纲领，加以绝对否认，对于他们在立三主义下所做的错误完全不实行自我批评，而只是攻击过去的中央；最后他们表示不满意国际代表最有力而正确的结论，并在选举时候，提出他们推翻整个中央的名单，等到大多数不予同意，便以退出会场捣乱会场为要挟为恐吓。但是不管右派如何捣乱，国际代表的结论终得到最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中央政治局改造了，立三，秋白，罗迈三同志退出政治局，陈郁，弼时，韶玉，少奇，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亦退出了罗迈，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连〕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同志，内中五个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成分中，十六人中十个是工人出身。这在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的工作上，确达到了他的任务，并请求国际批准。

十一、四中全会开过之后，右派小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便愈加暴露出来。本来，四中全会前，罗章龙何孟雄便找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同志开小组织式的会议，讨论党的前途，罗章龙即主张分裂（这件事在锡根同志开始承认错误后才知道）。四中全会后，右派小组织在罗章龙何孟雄王仲一领导之下遂实行对党的分裂。首先便是海总党团在陈郁同志领导之下成立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继着，出席四中全会一部分不满意或认识不清楚的同志十三四人在罗章龙领导之下，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的会议，这些人中包含有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经，余飞（？）^①，徐畏三，张金保，袁乃祥等。会议中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

① “余飞”二字后的“（？）”是原件即有的。

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小册子，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会后，小册子即由全总印厂铅印分发，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江苏经王克全的活动，连敌人士兵支部中都散进去了。右派的临时中央既成立，于是王克全，徐畏三，蒋云，陈资华，吴国治，刘瑞龙便在江苏省委发动，反对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改组的新省委，而占领省委机关，召集江苏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员成立第二省委；全总党团在罗章龙徐锡根领导之下于一月十七日会议席上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并成立与党对立的决议；王凤飞便在上海的闸北，蔡伯真彭泽湘在上海的中区，蒋云便在外县来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们的第二区委，宣告外县工作独立，来反对省委，来分裂党；罗章龙的第二党更派张金刃，韩麟(连)会，王仲一到顺直去，唐宏经到满洲去，李震瀛到香港去，进行第二党的活动。这一切分裂党的活动逐渐暴露，全党反右派的斗争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也更加明显起来。在这里，中央与江苏省委首先成立反对右派分裂党的决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一活动、当时政治局中，陈郁同志开始转向拥护四中全会方面走，徐锡根同志虽举手通过这一决议，但同时又声明保留几点，王克全则放弃表决。从此，王克全一直不服从中央任何决定，并在右派小组织因为毫无顾忌的在旅馆中连续开会被人破获被捕卅多人后（内中也有不是右派而被地址牵连的，被捕原因是由于右派内部中有叛变分子告密，现在已被枪毙的二十三人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蔡伯真，龙大道等同志均在内），而说是中央告密，来煽动同志自相残杀，因此，中央决定开审判委员会，审判他这一问题，他又两次抗议不到。先是中央开除他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停止他的活动；不听，乃开除他的党籍。罗章龙则自证明反党的小册子是由他编印后，中央根据他有意用这反革命的小册子向敌人告密，特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并永远开除他的党

籍。王凤志〔飞〕同志则因他的行动完与与王克全一致，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这三个人的问题，均请求国际予以批准。徐锡根同志则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说之后，现在正式宣告脱离右派小组织，向党写过两次声明书，惟对于四中全会问题还没能彻底承认错误，故中央曾与远东局有一度决议，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他现在并未出席政治局会。陈郁同志则转变虽早，但承认错误（也有一次声明书）还不忠实，直到最近一次政治局会，他始说出他曾参加过右派代表团会议，罗章龙并要他做负责的，他没接受但也没反对。王克全则在被开除后，始向党声明他愿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并报告罗章龙第二党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现改推王克全，罗章龙，吴雨铭，王凤飞，蒋云等六人负责，并推他做书记，为他拒绝。目前可以说，自罗章龙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第二党活动及反革命小册子暴露以后，加以中央省委对他们加紧斗争，右派便在党内宣告破产。所以全总党团中余飞等同志便开始承认错误，海总党团彻底转变，并不满意于陈郁同志承认错误不彻底，江苏省委中沈先定刘瑞龙等同志亦诚恳的承认错误，各区委中外县工作人员中亦多部分转变过来。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现在亦已多回到国际路线下来，而拥护四中全会并反对右派。李震瀛唐宏经到香港满洲都遭了省委拒绝。惟顺直党中，机会主义根基较深，而右派一些领袖又多在顺直做过工作，如吴雨铭，韩连会，张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张昆弟，王仲一甚至韩磷符，他们都集中在天津，并且还影响了一些干部，所以那里的斗争还很艰苦，中央现在更派负责同志去巡视。同时，在这次与右派的斗争中，又发生立三主义者与右派联合的企图，中央为此事曾给贺昌同志一警告，并要罗迈秋白等同志写声明书，他们均已写来。党现在正处在两条战线的坚决斗争中，尤其是立三路线“左倾”的空谈揭破之后，右倾的悲观，消沉，失望，怠工都一齐迸发，而要求党走向退却路线，同

时这便是反党的基础。所以右派在这一时机又一度抬头。中央政治局现在在远东局直接指导之下，深深认识要彻底反对与肃清左三路线及右派小组织与对“左”右倾的调和主义，则不仅理论上要加紧这一工作，尤其是要深入到实际中去执行国际路线之彻底的转变。

十二、四中全会后，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始的艰苦，许多干部受到右派影响而动摇，使中央与各级党部在实际工作的转变的确受了很大阻碍。同时，敌人进攻革命的加紧，无论对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围剿”，或是对非苏区的白色恐怖，都使党的任务更加紧迫而繁重。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后这一个半月，关于实际工作的布置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过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等，现在则侧重在活动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而使政治的指导能善于运用党报来起真正党报的作用。现在已经开始试做。

第二、对于全国党部方开始执行改造的工作。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委正在加紧这一工作，要使上海每一工厂作坊的支部，真正能起群众中的核心作用，而发动厂内活动与斗争。过去上海党员有一千三百多，现在清查结果。要以能做工作与到会缴费的才算，党员恐不到八百人。香港经过大破获，中上级干部被捕四十多，现在工作方开始恢复，党员只一百五六十人，而真正能做工作的恐亦不及百人。武汉累次破获后，市委都难立足，现在主要的办法是重新打入生产。长沙，岳州，九江，南昌等地的工作，始终没有恢复。天津党员在生产中的不及二十人，只唐山矿工党员较多点，但也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满洲大破获后，仅抚顺，大连，营口有点党的工作，但亦甚微弱。总之，一切非苏区的中心城市工作，经过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时代给了很大的损害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转变。对于各地工作的布置，满洲，顺直，山

西，青岛，河南，武汉都已派了省委市委的人去，执行这一转变。

第三、对于苏区工作的加紧，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对苏区中央局，已决定再派政治局委员三个人去和其他得力同志，成立九个人的苏区中央局。对鄂西鄂豫皖两处，亦决定组织中央分局，派两个中央委员去主持分局。其余赣东北，平浏修铜，闽粤赣，七军等处，亦决定加派政治领导人去。各军政治委员已决定改换得力的工人成分或有威信有能力的同志去。党的干部及工运人材正在由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党部商调。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现在对各苏区的交通方开始恢复，最近一月可去苏区一百上下的干部。

第四、对于苏区工作的指示，除四中全会前有一给红军的军事训令（十二月十日）外，最近复与远东局准备好了关于苏维埃大会的五种文件：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对各个苏区的指示，对鄂豫皖，鄂北，赣东北已有揭示信发出，对鄂西的新的指示，正在起草中。中夏来的报告，简直是十足的军事投机，完全是立三路线的扩大执行者，中央已决定调他离开鄂西。一三集团军最近因反 AB 团的斗争与赣省行委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中央现在仅收到一部分的报告，还不能作任何最后的结论，因此，中央政治局得到远东局的同意决定派全权的代表团去中央区解决此事，同时即成立中央局与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各苏区与红军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虽受到了一些挫折与损失，但敌人第一期“围剿”的计划，却也遇到失败。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曾于一月一日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发展到四万多人的主力部队。第二集团军也发展到近万的枪支。第一军人数枪支均过万。七军也有发展。按区域说，赣东北，鄂西洪湖，闽西龙岩等根据地域是削弱了，但新的发展还有很多可能。

蒋介石现在正订出第二次“剿共”计划，主要的内容是集中他们的主力，徐图红军的内变以便聚而歼之。针对着敌人“围剿”的计划，依据着我们发展的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主要的要看我们能不能坚决的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来采取适当的正确的策略。关于这一点，中央与远东局决定了一个给红军与各级党部的训令，通过后即将发出。

第五、关于拥护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中央曾成立一决议，要非苏区的城市党部，首先征调工人去苏区和红军中。现在这一工作，仅上海才开始做，二三月份约有一百到二百人可去。别的地方还没开始动员。在敌人军队中或后防的破坏工作，中央曾输送了六十多人到前线军队中去当兵，有效果的尚居极少数。在工人群众中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简直可以说没有切实的做。选派到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没有几个是广大群众选出来的，即有一两个是较多群众选的，也没做很好的宣传。过去苏准会的工作，完全是空机关，现已改为发动群众去在各厂各乡村成立各种各式的拥护苏维埃红军运动委员会。

第六，对于全总党团，现在已实行改组，工作人员与机关已大大缩小，中心工作要建立在发动与领导真正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要密切与工人群众的联络，要发展真正群众的赤色组织及其辅助组织，并加紧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与工厂作坊委员会的组织。对于全总工作，中央已通过决议，并派了十个以上的得力同志给全总党团，为的派往各地去建立基本工作。关于二月廿五日失业工人运动，中央早有决议，但因各地无工作基础，恐届时不能有多大发动。三八妇女节，中央也发出决议给全党，现在有妇女工作的除苏区外，还是上海，已督促省委加紧这一工作。

第七、对于国民会议的反对运动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国会法，大借款等等，现正在开始加紧来做。

第八、党报工作，在立三主义最盛时期虽办得很有规模，但

以后迭受摧残，到现在红旗日报还只能日出一极小张，而且只能印一千多份，这是最大的不利。现在正计划恢复较大张的日报，并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党报的领导，以实现党报在政治上领导全党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党报现分四种：一、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刊物；二、实话五日刊——宣传党的政策的刊物；三、红旗日报——鼓动的刊物；四、党的建设——党内的刊物。这四种刊物，除掉印刷困难的原因外，还有因为做工作同志没有养成读党报与写文章的工作作风，所以常因稿少不能按期出版。

第九、济难会的工作因检查结果，发现党团负责人不仅政治观念错误，并且将救济经费最大多数完全没有用在救济在狱战士及被难家属身上，现已解散旧党团，重新成立新党团建立工作，并开除了负责同志戴晓云。

第十、中央本身工作，最近也开始在执行转变。机关与工作人员都尽量减少，要求得人少而得力，尤其是秘密工作，现在更成为巩固中央的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的报告便暂止于此，望国际给我们以批评。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向忠发

一九三一年二月廿二日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拥护四中全会宣布脱离右派的声明书

一、徐锡根同志声明书

中央政治局：

我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上，来认识我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现在只有彻底的检阅我过去的一切错误，才能使我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一)我过去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六次大会后对党内斗争，采取调和与消极态度的错误，在政治上的动摇更是我主要的弱点与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如一九二九江苏问题，我有派别的成见而采取调和态度，在客观上是帮助了这一无原则的反中央斗争的形成。以后在立三路线逐渐形成之前，立三同志在江苏党二次代表大会中所做的错误。我没有坚决的抵抗与斗争，如对于同盟罢工问题，封建势力占优势问题，客观革命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关系问题，我在当时都有不同意见，可是我只与几个工作关系比较好的同志（如大盛，江钧）谈过并争论过，并没有公开的在党的组织上与提到政治局来讨论与争辩，这是我的错误，也可说是这一次离开党而斗争的严重错误的一个来源；以后孟雄同志在上海区实党国联席会议上第一次反立三路线的时候，他在事前与我谈过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我亦感觉立三的错误决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他的一贯的有系统观念的错误，可是我因为政治上理论上的了解不够，没有办法拿出我一贯的主张与立三路线斗争，我当时与孟雄同志谈，认为应从实际工作上说起，揭发立三的一贯错误，我同意他在区书联会上，我在总行委上来揭发立三路线的斗争。恰

巧第二天下午七时总行委决定由立三通知我于当晚九时动身到南京指挥暴动，在这里，我又犯了动摇与调和的错误，我明明知道南京暴动是做不起来的，但又毫不反抗的去执行并与蒋云（江苏外县负责的）同志说，我做倒了台后，回来与他们打官司，我去了两晚三天回来，孟雄的斗争已经发动了，立三同志马上找我谈话，他把孟雄斗争经过与我谈并说那天会议二十四个同志有廿二个反对孟雄的意见并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立三要求我表明态度，当时我答复说我没有听到孟雄在会上的意见并且没有看到孟雄的意见书，我不能反对他，那时我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即受了许多同志的反对，因此在九月间少山回国后总行委会议上，我没有坚决的提出整个的不同意见，而只说一些在实际工作中的困难与走不通的事实，同时对孟雄这一次斗争问题采取调和态度，这些充分表现我在政治上的弱点是调和，动摇与不坚决的错误，也可说对最近孟雄同志的有些右倾观点不能坚决反对的主要原因。三中全会以前立三路线的形成与其领导了政治局，我在政治上组织上，亦应该负责的，我当时虽则感觉执行党的策略在实际工作中碰钉子，虽则感觉立三的一贯左倾盲动错误，但在政治上还是调和的动摇的。三中全会上与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所做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我同样要负责的。国际来信后，我没有正确的彻底的去认识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与认识自己政治上的动摇的错误，没有不断的在斗争中工作中去坚决的改正这些错误，相反的，因站在不正确的立场上去反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对右倾机会主义调和，成为右倾的俘虏而走上离开党与分裂党的行动，这些错误，我应当深刻的认识的。

（二）在四中全会以前，我曾经与文虎（即章龙），孟雄，大汉等同志最初谈过一次话，主要的是对紧急会议与四中全会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开紧急会议，同时说到党的前途问题，有三个意见：文虎主张离开党与分裂党的斗争，我的意见要真正执行国际路线

领导整个的党，对一切不正确的意见要坚决的斗争，孟雄是调和的意见，大汉在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这一次谈话会，在主观上没有什么，但在客观上是小组织的行动，助长了分裂党的形成，以后经过几次的谈话后，使我逐渐离开党的正确立场，因此全总党团决议在去年的便被文虎拿来利用主张已被党开除的王仲一参加紧急会议，在那时我对这一主张是不了解的，而在今年一月一号的党团决议案内容：①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②在解释上有许多毛病：四中全会后，文虎与我影响下的十几个出席代表通通不满意四中全会，另一方面，江苏党解决许多问题与在工作上使我不满意，因此同意了文虎的不正确意见，召集不满意四中全会的出席代表开了一次联席会。在会议上决定发布反党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小册子，同时决定了文虎，孟雄，克全，凤飞，以及我自己分裂党的干事会的组织，会议后韩连会出发顺直，唐宏经出发满洲，在这里我虽然和章龙有许多问题原则上的不同以及不断的与他斗争，但我仍是对右倾机会主义者调和而走到参加不正确的小组织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我现在已认识这一错误的严重，与反党的小组织分开，号召在反党的小组织影响蒙蔽下的同志立刻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坚决的与反党的小组织作无情的斗争。这种分离党的行动，是离开国际的指导。他必然要走到陈独秀取消派的道路上去。

(三) 对于四中全会：(1) 我认为他是在国际指导下开的，四中全会是揭发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这一前提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过去单纯反对四中全会是错误的；(2) 在四中全会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实行布尔什维克的转变。这一前提也是对的；(3) 如章龙说四中全会还是一贯的调和主义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4) 我过去对于四中全会的认识认为在政治上没有坚决的与过去立三主义者做彻底斗争，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障碍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同时可以障碍国际路线的执行；对于三中

全会到四中全会的过程估量我是不满意；在组织上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彻底改造指导机关（决不是完全推翻，）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是一种调和态度，同时四中全会后，对于右倾分子给以无情的打击是正确而必要的；（5）四中全会总的路线是国际的正确路线，我在这些不满意的意见上，是可以被右倾分子利用的，所以我现在放弃这些意见，同时到各方面去求得了解，另一方面，我这些意见也只有站在四中全会正确的立场上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斗争中来更求得彻底解答我这些问题。

（四）在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国会议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态度。与拒绝国际代表的提议是绝对错误的，现在国际代表是执行国际路线的，因此反对国际代表就是反对国际，同时反对国际代表我是有了成见，不从政治上去了解，都从国际代表对某些问题解答的不满意而反对国际代表，这更是错误的。

（五）中央最近开除章龙中央委员会与永远开除党籍，开除王克全中央委员会与党籍，开除王凤飞中央委员，对贺昌的警告，我认为完全需要的，我坚决的拥护这些决议。对右倾小组织影响下的同志，应立即觉醒起来，跳出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我现在只简单的写出以上几个问题。以表明我的坚决态度，此外对于别的许多问题，我当更详细的写出来，以及做成文章发表。

一九三一，二，八。

二、余飞声明书

中央政治局转共产国际：

我十九日第一次的意见书上，虽然我相当的揭发了自己已往的错误，力想从错误中间，完全转向到国际路线上来，可是我在今看来，这个意见书对于我与右派基本不同的意见，还是没有清楚地说出来，还是站在与右派调和和精神立场上的，现在我总觉得

我目前迫切需要把这些问题的中心完全说出来,公开与右派分裂,这是对党有帮助的,这是证明国际路线的胜利。

一、首先我应当承认目前在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中间,党内已经发生了右派的小组织活动,公开的企图分裂,企图反抗国际路线,右派的小组织在罗章龙同志领导之下,有系统地发表了他的政治,右派拿全总机关作了战斗的工具,在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暗中进行他的反党的计划,这在“反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小册子发现之后,更明显了。这个小册子是真真右派的政纲,当然一月一日全总党团的决议,已经是成为右倾观点的结晶了。我在这中间所犯的严重错误,便是看不清右派的一贯阴谋的企图,虽然对许多右倾观点,表示反对过,但我没有公开的指出,与之坚决的斗争,客观上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我肯定的说,我的主观上是绝对没有拥护右派,准备参加小组织的活动的,但是我不知不觉有许多观点与右派的要求相混合起来,因此我便不能不成为右派活动的工具。我除了脱离这个泥坑之外,将完全没有出路。

二、几个原则问题——从右派的泥坑走到国际路线道路上来。

我应当公开的承认我过去与右派有许多原则上不同的意见,右派这些观点,是非常之危险。这些右派的观点。正是混淆在许多同志的头脑,我的申明与揭发最坏的右倾观点,是希望着同志们,用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从速抛弃这臭恶的泥坑,回到国际路线上来。

第一问题 六次大会后到六月十一日以前,党的路线是否正确?

这个问题,我与右派分子是有显然二种不同的意见,他们说六次大会之后,六月十一日之前,党的路线已是完全不正确了,因此他们可以否认开除陈独秀,解决江苏问题等等正确的事实,他们可以号召取消派的“回到党内来”这些罗章龙同志赞成王仲一

恢复党籍问题，表显得最为明显。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全总党团会议上曾经反对过的，我在上次声明书上也已经提到过了，始终我认为一个时期内党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特别是对于处置取消派与托洛茨基派的问题，但不能否认中央曾经犯过不可允许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如没有国际的纠正，继续发展下去，可以动摇党的总路线，但不能说这些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这个错误的右倾观点是发现在全总党团会议上。

第二问题 对于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

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决议上是这样估量立三路线的结果的：“我们正确的估计，立三主义是破坏了党与团的组织，是破坏了工会与其他群众的组织，是破坏了红军，是破坏了中国革命，立三主义所发生的这样严重结果，将与过去的陈独秀主义、瞿秋白主义没有轻重的差别。”

这里不仅仅是估量立三主义错误结果的问题，而且发生了目前革命形势估量的问题了。这一段话中间完全证明了罗章龙等同志是深深认为“一切都破坏了”，这与取消派的观点，必然会汇合起来。

我的意见是认为立三路线是损害了革命，是给了党，团，工会以严重的打击，立三路线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无疑的是要“破坏中国革命”，但是在目前说来“中国革命完全破坏”的估量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很明显的还是在继续高涨，经济的矛盾，统治阶级的继续崩溃，土地问题的没有解决，帝国主义互相矛盾的增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成功，中国资本的加紧进攻工人，这些都是中国革命继续高涨的背景，虽然有许多群众的斗争，还表示自发性的，但都是表示群众斗争的要求是日在高涨。因此，立三主义结果，不能说已经与陈独秀主义领导破产的结果一样的无差别，这是再明显没有的事情。并且事实上红军与苏维埃虽然

受了打击，但近来红军还是继续有进展，苏维埃政权影响的日渐扩大，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右派的估量是取消的，我根本是与他们不相同的。一月一日通过决议，我很没很小心的去注意，这不能不说是我莫大的错误，但我在这一点上是始终反对这个右的观点的。

第三问题 关于紧急会议问题

四中全会之前，我主张紧急会议，与右派现在所号召的“力争紧急会议”的精神是有完全二个不同的出发点。四中全会之前，我在全总党团会议上，极力主张开紧急会议，我是站在巩固党，加强反立三路线立场上出发的，因为全国性的紧急会议是可以更详细的了解各地的立三路线执行的程度与结果，可以更多的吸引各地新干部分子来参加。所以四中全会之前，我主张开紧急会议是没有错的。

现在右派努力“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意义，恰恰与我的立场不同，因为他们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与路线，不满意右派分子没有在组织上的胜利，这很明显的“乘机活动”的阴谋。

我对于由国际所批准开的四中全会，我完全不表示反对，为秘密环境所限制，不能召集紧急会议，这一点我也能够谅解，四中全会之后，我并不坚持再开紧急会议，我希望早一点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我现在还是如此主张的。

第四问题 对于四中全会态度问题

从四中全会之后，全党发生了二个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反对四中全会，一种是拥护四中全会。我在这中间，一方面承认四中全会，表示在组织上执行四中全会的决议——我确是没有公开反对过四中全会。但我对于四中全会是表示不很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有两个：(1) 因为四中全会没有详细的讨论与决定各种政治问题（没有各项决议），所以认为是继续九十二号通告精神——消极的精神；(2) 四中全会没有彻底的改造，犯错误同志仍占大多数，

在选择时候整个名单付总表决，选举结果只补充了几个人。没有引进许多新分子。

现在我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这两个问题，我可以完全抛弃我对于四中全会的怀疑态度，我应当站在国际路线的立场上来拥护与执行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四中全会没有通过各项决议，当然是一种缺点，这些缺点，我现在从怀疑的态度，转变成为要求中央政治局从速解决，从速的定出各种政治决议案。其次，对于四中全会的改造问题，我现在也抛弃了过去怀疑精神，新中央政治局只要能够在正确的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之下，我无条件的要拥护，要帮助中央工作。

右派对于这个问题确是有另外一种企图，他们藉口四中全会没有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旗帜，实行鼓动全党同志起来反对四中全会，起来反对新中央，根本反对四中全会接受国际路线的正确性。这里很明显的有两种企图在内：（1）企图分裂党企图反抗国际路线；（2）在组织上夺取领导权。不然，就是无原则的派别行动，客观上破坏党进行工作。在这中间，我相信有许多同志（我过去也其是其中之一）因为政治上认识不够，组织观点的薄弱等原因，或者有某种成见，很容易被右派所利用，走上反国际的道路上来。我希望没有了解的同志们想想，这反四中全会的结果，是会跑到什么道路上去的呢？

第五问题 对于国际来信之后党转变程度的估量

我不同意说从国际来信，一直到四中全会之后，党完全没有转变的说法，党是有进步的，是向着国际路线上走的。十一月廿五日补充决议，在不抵抗国际路线上一点说来，是可以称为“进一步了”，这个问题我不再怀疑了。

现在右派煽动的中心口号，也便是说“中央一贯的调和”与欺骗群众——如黄色工会一样的欺骗。所以这不是一个不会估量的问题，而是企图破坏党的信仰，企图使党解体，这种精神决不

是如国际所说的，“全党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却是使党内群众对整个党憎恶仇视。当然有许多幼稚的同志是不了解这一点的，这一种不觉悟是可使我们脱离党，对革命消极的。我请求中央对于这些幼稚的同志，应当采取说服与教育的方法，不应当采取惩办的手段。

第六问题 分裂问题的危险

从“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小册子的发现，特别从江南省委分裂问题发生之后，我更觉得目前分裂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现象。分裂党的企图，无疑的是右派分子的要求，他们拿出不满意一切的口号，实行分裂党，不论他们主观上是如何忠实于党，但是要分裂目前的党，这非但帮助了右派，并且是革命的敌人。现在一部分党内群众，主张分裂的口号是“反对四中全会”，“反对中央欺骗”，但他们拿不出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的不同的证据，这不但是无原则的纠纷，事实上是跟在取消派，党内右派分子尾巴后面跑。他们一定要遇着布尔什维克纪律，铁的纪律的打击！

我对于江南省委问题，在今天还不知事情的全盘，但在原则上我根本反对王克全同志这种行动，这还是因为他始终不了解原则问题，还没有了解怎样回到党内路线上来。

至于下级各区各支部各别活动反党，这一切行动，我都认为是绝对错误的。

对于反党小册子问题，我因为手边没有（我拿来的一本已交中央了），不能详细驳斥他，但我总的立场是反对这个小册子的，我以上所说的各点，也已经可以回答了小册子上的中心问题了。

三、反对右倾与肃清立三主义

党内右派的积极活动，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是应当与以严重的打击与反对的。同时立三主义在各地工作中间，并没有

表示完全肃清，所以有人说立三主义现在只是残余了，目前可以减轻反立三主义的注意，这是不正确的。目前党内的中心任务，应当是站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彻底的肃清立三主义与右倾，消灭右派的活动，在理论上，实际工作上，在组织上必须并进的进行。加紧的反对右倾，是为着加紧的肃清立三主义。这样才能使党走上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最后，我申明一月十七日党团会议，我承认自己发言是错误的，并且反对那天会议上大多数同志所决定的决议。同时我还要申明一点，那天党团会议上，我对于国际代表所提议的决议，开始采取了调和态度，打算同意几条，后来因为不许我发言，我更举手反对了这个决议，这表示我从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同意了反国际代表的行动，这是我最大的错误。

我写了这个申明书之后，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右倾的泥坑，真正回到了国际路线上来了，若有同志以为这是“投降”，那我便应当回答他，这是向国际路线投降。这是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应当有的态度，勇敢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最后，我要求中央立即把我这个意见书公布全党。我相信有许多同志，也可以早点跳出右派的圈套。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余飞 一九三一，一，二二，

三、陈郁同志声明书

我到今天才写这声明书，这决不是希望依恋自己的错误，在开始我是还不十分明了自己已往错误的中心，当然写出来还是一定不能深刻的，但现在我已更加了解已往错误。最近又因实际工作很麻烦，海总扩大会等问题，又终使我无暇来写完这个声明书，这应当郑重的声明。

在反立三主义之下，公开的进行反党反国际的右派小组织的

活动，这已经铁一般证明了存在着，并且在继续着其反党反革命工作，我深悔我的党内斗争经验的薄弱，我不自觉的做了右派的工具——虽然这一过程并不很长，在我领导下的海总党团，过去同样是在全总党团的右派的领导之下，帮助右派这些错误并不能因我的主观对党忠实，没有参加小组织的活动，而掩蔽或减轻了我的客观上帮助了右倾的事实与错误。

一、经国际来信严厉的批评了立三主义的党在开始时一再的犯着调和主义的错误（如补充决议及告同志书）在这个时候已引起了我很兴奋的对党内问题的注意，这个时候同样是右派抬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全总党团会议上我更与罗章龙是完全一致的，用罗章龙起草决议，我很不小心举手赞成。我并不清楚过去的历史问题，如六次大会开除王仲一问题，六次大会后的路线问题等，结果，我无形的同意了右派的意见，第一问题，六次大会后党的路线是因错误而动摇了，我开始是不知道，后来有同志反对李大汉的意见（说六次大会后党的路线是不正确），我这才明白了，可见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是赞成右派的意见

第二问题，对革命的估量问题，在全总党团决议上罗章龙的取消一切观点，我的错误，即是在当时不深刻注意这个问题的严重，这证明我的政治认识的薄弱，但是我始终是认为中国革命是在继续高涨着的，立三主义的结果并没有与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破坏革命程度一样，海总党团决议上写着：“立三主义断送革命”，“可以”两字在少山同志出席党团会议已经更正了，这并不是海总党团有这错误的观点，也不是起草决议人有右倾的观点，这一点应郑重声明的。

第三问题，对于九十六号紧急通告问题，我受了罗章龙的影响的认为是调和的，这个估量无疑的是错误的，这一种说法与右派骂党“一贯调和”相混合了，这是否认党向着国际路线走的事实。

二、紧急会议问题在四中全会之前，我是最坚决主张的用紧急会议，这个意见为巩固党，为提拔新的工人干部的人员上主张的，当然是对的。我所犯的错误是由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表示不满，四中全会之后，我确实没有再希望坚持开紧急会议的，海总党团决议是说，如第七次大会不能很快召集，最近应当开紧急会议，这当然还是错的。我在这个时候对这个问题又是调和动摇了，这个动摇的观点就在于对四中全会不满做出发点的。这一点无形中与右派反对四中全会的要求将混合起来，对四中全会的态度，更加深了一层不满的空气。

三、四中全会以后我的错误。我在四中全会的态度是已经表示不满意四中全会。我出了这个会场依然继续我的不满的意见，首先是不经中央的决定，自行超组织的召集海总党团全体会议做决议表示对四中全会的不满意的。

对四中全会全党有三种不同态度：（1）反对的，（2）拥护的（3）不满意的，我便站在第三个立场上来对四中全会不满的，客观上就是反对四中全会与右派观点无相上下。对于四中全会我所表示不满的问题，也正是右派小组织拿着做为领导反党的最好的旗帜。不满问题有三个：（一）对改造问题不满意认为不彻底，补充几个不够，（二）四中全会没有各种决议及政治决议，所以我认为是与九十六号通告一致精神——消极的调和的；（三）对二十五号决议，我不承认“进一步了”，这也错误的，这不能不与右派的意见相混合起来，“因为他们的立场是说中央向调和路线跑的。

自少山同志出席的那次党团会议上我表示“组织上服从”保留我的错误意见，这也是错误的，那个时候我完全还不了解自己的错误，对于右倾还是调和的。

四、分裂党的问题。我对于分裂党问题，我始终与余飞同志同一意见，认为这是不应当的，我们主张一切不能解决问题提到

国际去解决。锡根同志对这问题主要理由是说下层已经分裂如何办法，后来几次谈话以后，他开始对分裂有点动摇，但他始终没有表示坚决的反对分裂。

一直到他们真的实行分裂了党，小册子发现了，江苏省委闹北区委分裂行为以后，我更坚决反对他们这一行动，也是使我觉悟的要离开右派的开始，但我在这时候还犯着不允许的错误，我对自己错误还不了解，我不同意余飞同志过早承认错误，我还不了解我自己是落后的调和派，一直到少山等同志与我长时间谈话之后，我才明白。

五、对黄色工会问题，一贯错误。在立三路线被国际揭发之后，在海总党团会议上有一回同志批评海总过去对黄色工会问题是立三路线——否认他有相当群众，反对打入黄色工会内部工作，我是始终反对这个问题，在几次会议上我的意见都是这样“左”的错误，我不承认是“一贯”错误，我反对决议案这样批评，结果在我坚持中，把这一条批评取消了。

在海总扩大会议上，我是另外犯着一个极“右”的错误，我把黄色工会群众分为“基本群众”与“群众”否认他有相当群众，但同时又说要打入黄色工会内部工作。并且还主张在我们力量薄弱的船上，只有“威胁”黄色工会来领导斗争，这是无异的取消赤色工会的“领导”与西欧国际右派观点一个样子。现在我懂得这是我“一贯”的错误。

六、对国际代表问题。我过去把国际代表与国际对立，这是我非常的幼稚的错误。我过去对国际代表不尊重的态度，这一点也应直说的。

现在我完全承认已往错误，对中央现在开除罗章龙王克全党籍是完全同意的，对陈□□同志当江苏省委书记问题我也是承认中央解释是对的，我没有一点成见在胸。

我现在所想到要说的只有这些，中央如认为尚不清楚可以提

出。

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陈郁 一九三一年二月三日

(录自《党的建设》第4期)

反对王凤飞的右倾机会主义

(1931年3月8日)

葛耀山

王凤飞是立三路线之下的坚决执行者，直到国际来信后，他还是很怀疑立三路线的存在。他与恩来说话时，他说：立三路线是没有的，过去我们所执行国际的路线没有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国际来信后指出立三路线之存在，他根本是否认的。在闸北区因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使支部同志消极，而右倾机会主义的王凤飞还感觉不到立三路线之影响的结果，反而骂商务内支部同志右倾怠工。而实际上恰好是王凤飞所执行的立三路线的恶果。

在右倾机会主义者王凤飞领导之下的闸北区在国际来信后，在名义上虽然有三十几个支部，而能够开支部会的只有11—12支部，其余都是线索，不能开支部会的。直到闸北和虹口两区合并之后，因为常委领导成分加强了一点所以工作方式稍微有一点转变，可是中央九六号通告一下来之后，右派机会主义者王凤飞在反对立三路线名义之下忽而跑到了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方面去了。因此在闸北区党的工作方式又遭受了变相立三路线蹂躏着。直到四中全会后王凤飞公开起来分裂党得到大多数常务委员反抗才把他的工作撤消。自此以后闸北区党的工作方式才能大踏步的走向转变的道路。

王凤飞有一贯的右倾的观点，他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形势的估量对于目前中国党的中心任务与策略的不了解。

对于九十六号紧急通告的意见等问题他完全是执行右派领袖罗章龙何孟雄王克全等的意见，而且是坚决的执行者。

正因为王凤飞有一贯的右倾的观点所以不得不反对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的四中全会的路线。正因为：要保持他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因此他不得不在反立三路线及拥护国际路线名义之下来掩盖他反党反国际的行动来造出许许多多无事实的谣言和煽动挑拨蔑诬中央黄色作用，来分裂党来进行捣乱党来组织他自己右派小组织的第二区委。私自印刷自己的反党反国际右派小组织的宣传品及决议案，不顾一切秘密环境和自召集会议在会议上大叫而特叫如犬狂叫一样反对四中全会。这是显然得很破坏了布尔什维克的绝对不允许的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铁的纪律和秘密，便是告诉帝国主义国民党处处逮捕我们就是了。在事实也就是向敌人告密。如，右倾取消派王凤飞在区常委会及支部会议上公开宣布米夫已到中国，便是向敌人告密的例证。

我们反立三路线应当是在实际中去回答，不要在亭子间内争论空谈反立三路线斗争而忘记了实际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国际执委认为现在来争论所有这些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国际这样指示是非常之正确的，可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王凤飞及蔡博真在上海区书活动分子会上公开说谁主张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谁便是不反立三路线。这是很明显的把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和实际工作分开，专门在机关内空谈反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而放弃实际工作。对于实际工作怠工的确是实际工作中右倾机会主义充分的表现。

在1930年十二月廿八日王凤飞所起草的上海闸北区扩大会决议案当中对于两条战线上斗争与反右倾的危险是一笔勾销。这是不足奇怪的，与何孟雄认为“国际来信后党内右倾并不危险！”在四中全会上说：“不要扩大不正确的倾向和右倾”完全是同样的

意见。

右倾机会主义者王凤飞及朱秀英等异口同声的恶骂中央黄色作用与国民党官僚一样，所以他们主张“即刻停止中央行使职权”（见闸北区决议案十二月廿八日）彻底的改造中央政治局（完全撤换）。这与反革命的取消派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同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党领导机关落入到取消派手里，使革命紧张斗争中拉到右倾派的退却的道路上来。这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以上所指出这些都是王凤飞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反党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现在我们只有坚决的与他作无情的斗争，可是我们应当而且是必须的挽救在王凤飞领导之下的被他所欺骗的党员群众而使他们回到党的正确的路线上来，来和我们共同完成当前革命伟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我们目前反右倾斗争的迫切任务。

（录自《党的建设》第4期）

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

(1931年4月)

中央局扩大会议，听了关于立三路线，及四中全会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盲动主义的路线。自从六月十一号政治局决议案起，他就完全统治了中央，统治了全党。但在苏区中，从苏大会起，立三路线就已经起了领导作用。在国际七月决议给与中国党以正确路线时，为要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三中全会，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把党从立三路线之下解放出来，转变到国际路线上去，反而向立三路线调和，使国际路线不能在党内得着实行。

扩大会特别指出四中全会的伟大意义，他深刻的批评了上述时期中央局的错误路线。痛斥了当时中央对国际指示，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他完全接受了国际路线，给党的政治路线一个彻底的转变，正确的指出党的目前任务。同时四中全会又改造了中央及中央政治局，把立三路线负责最重的同志，开除出政治局及中央。吸引了新的积极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及政治局来。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又给予罗章龙等所领导的反国际反党的右派，以严重的打击。并且能够克服右派。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

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四军前委是坚决

为工农政权而斗争，曾经坚决的反对过不要政权的流氓路线。前委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关于土地革命的一切机会主义，曾作残酷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此外前委又认清武装地方群众，正确的执行城市政策。前委为了坚决执行这些任务，曾向盲动主义，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流氓路线，作了长久的坚决的斗争。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坚决的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前委之所以能正确的坚决的为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路线而斗争，是因为前委能正确的分析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特别认清半殖民地的中国斗争的实质，农民战争的作用，才确定苏维埃之能够存在与发展，又从苏维埃运动实际斗争中获得经验。才能正确的运用策略，反对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但从汀州会议起（这时四军与三军汇合，成立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如土地问题，地方武装问题，红军的群众工作等，前委并未因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但攻打长沙后（这时一军团与三军团汇合，成立总前委），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这就已经在党的文件上，明显的确定了这个转变。这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斗争，才有这个结果。最后在宁都的黄陂会议，更具体的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

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三军团前委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完全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三军团在过去的军委及后来的三军团前委领导之下，作了许多英勇战斗，如长沙、岳州、平、浏、大冶等战争，确在红军战史上，写下最光荣的一页。三军团过去关于夺取群众，执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是忽视的，红军的战略是流动式的游击。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但三军团所以能够占领长沙，在政治意义上获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因为三军团前委正确地估量了长沙本地的敌我力量的对比（关于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分析前委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估量），是因为三军团的英勇斗争。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战争明显的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的彻底破产，使总前委的路线得着转变，使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的走上正确路线，虽然全国党部并未能立即了解长沙底战争底教训，来反立三路线。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的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底战略，——引敌深入，坚决底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着龙岗、东韶底伟大胜利。

江西党的路线大体可分为三时期说明：

第一，是一九三〇年二七会前的时期，这是机会主义的路线继续统治的时期，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赤色区域已经开辟了二、三年了，还不分配土地，地主、富农充满了党和革命团体，土地革命已经发动了，却不能正确的领导农民斗争，建立革命基础。

第二，是二七会议（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委的联席会）到二全会议（赣西南特委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这一时期是转变机会主义，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这才发动了赣西南的广大群众几次攻吉的英勇斗争，创造现在的苏维埃区域。二七会议是提出了“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

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但这一时期的缺点,没有从组织上坚决肃清机会主义分子,而且在后半期,在政治上就接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使苏区忽视巩固工作。

第三,是二全会议到富田事变。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完全集中到甘军卅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的攻打中心城市,攻赣。对于一方面军前委的批评“是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立三路线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合路线。中央局在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的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虽然在许多单个问题上(如地方武装问题,工会与苏维埃的关系,红军中的CY问题等),有了正确的解决。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而指出军团只是为了准备军阀混战而来进攻红军(见八号通告)。这种错误的估量,有放松我们的主要任务——击破敌人进攻——的执行,产生等待军阀战争的情绪的可能,仅只因为过去,总前委已经有了正确的估量,才没有发生这种不良结果。

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中央局的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的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

松了反 AB 团的斗争，使 AB 团能够在这种错误的解决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

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内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中央局没有认清革命的目前民主阶段，没有认清在中国现有土地关系之下，党是应该坚决的领导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中央局决议对平均分配是动摇的，如说：“平均分配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这是不认识平均分配土地是消灭封建关系最彻底的办法。只有在平分之后农民认为平分是已经平均了贫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这是幻想，党对这种幻想，应当谨慎的加以批评。一般的说平均分配是幻想，这是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决议，这是可以被利用来反对土地革命。再中央局决定以劳动力为主，以人口为辅的分配方法，而预先没有经过详细审查与研究，没有采用过去斗争的经验，这是不审慎的。再中央局没有了解中国土地革命是带了残酷的农民战争的形式，以人口平分，才能迅速的争取群众。此外，关于反富农问题中央局没有分清暴动前与暴动后反富农策略的不同。在暴动前，主要的不但从政治上反对富农的领导，还要在经济上废除富农的债务，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暴动后，（如现在时候）主要是从政治上肃清富农的影响，驱逐富农出苏维埃，巩固雇农贫农的领导，使富农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而不是照中央局通告所说的：“从经济上解除富农的武装消灭富农的半封建剥削”（分田后，半封建的剥削已经消灭了）。中央局的错误指示，不但不能纠正过去对富农问题的一切左倾错误，反而要助长这些错误。最后中央局没有深刻的采用过去执行土地革命的丰富经验，没有重视过去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斗争的经过。这都是中央局犯了上述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中央局对于改造苏维埃，创造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及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与

宣传等等问题的注意力，还是不够。这一切都是调和路线的结果。

立三路线在苏区执行的恶果是很明显的：苏维埃区域相当的缩小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中去了；党与苏维埃在某种行动上说，是脱离了群众；党与苏维埃在组织上涣散了；AB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得着机会发展，并且能得钻进党内与苏维埃内；红军因为过去执行猛烈的扩大，也受了相当的损害。

扩大会议在估量目前形势时，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反对军阀进攻红军与苏区的决议”以及中央给红军的几次训令。扩大会一致认为最近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反动统治的团结，来进攻革命，特别是进攻红军与苏区。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实行欺骗政策。如“国民会议”“大赦”“裁厘”等等来欺骗群众，组织苏区内的反革命团体，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北极会等等，企图从内部破坏苏维埃与红军。但同时必须指出统治阶级虽一致进攻革命，但他们内部矛盾，不但存在，而且继续发展。中国革命势力发展的不平衡，使革命势力对于各系军阀的威吓的程度不相同，所以他进攻红军时，军阀战争仍旧是有爆发底可能。并且最近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北方军阀备战的形势非常紧张。这是证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大规模军阀战争的积极准备。

南京政府虽派遣重大兵力向红军及苏区进攻，但红军是有击破这种进攻的充分可能，因为白军是不健全的，官长和士兵是不一致的，士兵的生活是痛苦的，进攻红军的各派小军阀间也是不一致的，有冲突的。在红军方面，上下完全一致，“万人一心”，又有广大工农的拥护，完全不是孤军作战。所以在红军与白军的残酷斗争中，红军与广大工农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争取得第二次伟大胜利。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龙岗东韶第一次伟大胜利，就是证明。

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1) 动员一切力量，把工农群众与地方武装正确的去与红军

主力配合，应用一切于我们有利的战略与战术，去击破敌人的包围与进攻，在击破敌人进攻的过程中，要达到把江西苏区创造成全国苏维埃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与号召，应当立即开始。

(2) 立刻规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尽量提拔工人，来担任领导工作，改进士兵的军事训练，建立铁的纪律，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

(3) 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流氓等等，还要建立苏维埃的经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获得群众的更高信仰，应当立即消灭党包办政府工作的现象，“党是立法机关，政府是行政机关”的恶现象。应当建立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一贯的工作系统。政府应当立即颁布选举法以及经济政策条例。

(4) 关于土地问题，确定以人口平分，在没有平均分配好的地方要立刻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已经分配好了的地方，就要肯定土地私有，不得动摇再分。地主的家属和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如道士，和尚，地理家等人中间的剥削分子，没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但允许他们租用土地（详细办法，当另有决议案），商人（乡村小市镇的贫民分子，多以农为主，以商为次的人，不在此例）不能分得土地。至于地主及其家属的房屋，亦应一概没收。转分给贫苦群众，但可以允许这些分子，移到已经空出来的坏房子去。

(5) 加紧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健全的阶级工会与工会工作，正确的去领导阶级斗争，去实现政府劳动法。在目前的苏区内，雇农工会的工作，是工会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独立劳动者，不得加入工会，但独立劳动者分得田后，如仍是贫农地位，得照其他贫

农一样加入贫农团。

(6) 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7) 加紧苏区内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与宣传，特别是反帝国主义进攻苏区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反对正在准备着的进攻苏联的战争，建立反帝大同盟的组织。

(8) 坚决的执行改造党的工作，洗刷异己阶级的成分，彻底改造干部，创造新的真正的工农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

(9) 加强在白色区域的工作，特别是白军军队里的革命工作，以求领导白色区域革命运动，捣混敌人的后防，瓦解敌人的军队。

扩大会议指出，只有正确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党才能正确的完成这些任务，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内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更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用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正确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以及四中全会的决议，这样一定能够引向新的伟大的胜利。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信

(1931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

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

(一) 现时中国革命危机

1.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达到革命危机的阶段。“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在有数千万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因此中国在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中占第一位。苏维埃与红军的建立，保证了民族革命运动中与反帝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胜利。这一领导权已经在初期政权中巩固起来了。”

中国的土地反帝革命已经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共产党的影响在发展中的工人斗争和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中继续扩大，红军的建立，生长和胜利，在中国南部与中部广大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在苏区中彻底实行了土地革命的口号等，这一切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同时事变的发展，证明了陈独秀派与托洛茨基派的整个反革命的观念的破产，他们预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顺利前途，国民党政权有长时期的安定。他们在国民党的“国民会议”口号下，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帝土地革命，反对中国苏维埃，反对工农独裁。

2. 中国革命危机指明了资产阶级与地主反革命的破产。指出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是与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日常需要绝对不相容

的。依靠在封建大地主与高利贷者制度上的半殖民地奴役已经造成一个空前的总的经济危机。很严重的农业危机已经变为长期慢性病，使几千万人到了濒于饿死的地步。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正在崩溃，而且大多数的民族工业是在帝国主义的手中。银价惨跌，更增加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势力。国民党政策的破产，国民党不能实践它因摧残革命与帝国主义妥协而保证中国经济安定与国家统一的诺言。在实际上，不仅没有统一，而且军阀间的冲突更加紧张（同时这代表帝国主义者彼此扩张势力的竞争），经济崩溃更在发展……等等。这一切更促进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中的分裂，增加他们没落的速度。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更加认识若没有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没有苏维埃胜利，则目前的形势没有出路。

国民党除用残暴恐怖主义直接压迫工农外，更想用一些花样（如召集国民参政会，颁布土地法与劳动法，欺骗宣传提高关税，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来消灭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绝不能轻视这些阴谋的危险。共产党要揭穿这些阴谋以消灭国民党统治。

3. 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虽然在有数千万人口的地域中顺利的建立了苏维埃制度，然而革命危机还没有使全国大部分地方的群众进行直接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

妨碍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到中国主要部分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他们团结一致，向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攻。在反对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外国帝国主义者一天比一天更变为主要的力量。他们不再隐藏他们对于中国劳苦群众与苏维埃红军的干涉。外国帝国主义者已经用军舰与武力占领了中国的主要无产阶级中心城市，他们与国民党合作来麻痹和摧残斗争的群众之革命的力量。

因为我们党在白区中的组织很微弱，所以这种阻碍革命运动的因素的力量是一天比一天加强。因此共产党不能很充分的领导，

组织和发展白区中工农的群众革命斗争（包括在大的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运动），虽然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与战斗意志是在生长。目前全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中群众反帝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也是由于同一的原因。过去党与工会的领导者完全放弃工会工作，不进一步的去发展和领导反帝斗争，这种现象现在仍然有。正是因为我们在白区的党有这些缺点，所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援助之下，能障碍城市的工人运动，白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与苏区工农红军的斗争相联合。

4. 虽然国民党集中了很大的军事力量，在帝国主义帮助下，来摧残工农运动，然而农民战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这一领导经过共产党，红军与苏维埃更加有系统的表现出来）日益扩大。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根据地在数量上与力量上都是日益扩大。目前革命运动的力量，趋势和影响的来源是由于群众自己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粮食，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群众自己创造红军，建立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的发展（这一运动正使整个殖民地世界革命化）是与苏维埃红军的根据地的扩张和巩固相联系的。地主资产阶级大部分靠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压迫工农，以维持他们整个的反动统治，群众稍一抗议与斗争，就不可避免的与整个国民党统治冲突，在这种形势中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自然是工农革命力量的集合场，是组织和巩固工农革命力量的工具，是整个革命运动高涨中最重要的杠杆，是中国革命危机的最高的表现，是推翻国民党的主要斗争方式，是一种绝对保证革命更进一步发展的力量。

5. 各级党部都要注意扩大苏区，建立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间广泛的斗争联系，使白区的革命斗争与工农红军的作战配合起来。党要尽量在自区宣传苏维埃与红军的的活动。为要保证革命更进一

步的胜利发展，同时建立革命发展中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是解决下列的三位一体的任务：(1) 在坚定的获得一个苏区根据地和继续扩张这个根据地的基础上创造与巩固红军。(2) 建立一个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苏维埃制度，在苏区中彻底实行反帝与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3) 发展白区的革命群众斗争，农民运动，特别是工人的罢工运动，努力工作加强和扩大革命工会运动。要把这三个任务与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帝斗争相联系起来。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党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同时在苏区中党要提高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运动到反帝革命的阶段。假使能顺利的实现这些基本任务，那么这就保障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二)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现时阶段中的领导作用

6. 因为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共产党的口号与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各地工农与军阀军队士兵中更加很快的扩大。全国阶级斗争的整个趋势，更促进千百万劳苦群众从事积极的革命斗争。这是共产党势力与战斗力的主要泉源，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学习把党在群众中的工作适合革命斗争扩大与生长的要求。党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的影响的工作是异常不够。党还不能与广大的群众一起组织实际的日常联系，不能在工人罢工运动中负担领导作用，不能在全国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不能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全国虽有革命危机，党不能在白区创造一个伟大的运动，反对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

在革命运动的现时阶段中，全国深处在革命危机中，在许多区域中建立了苏维埃，斗争的结果主要的并且直接的是依靠共产党自己，依靠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对群众的影

响，依靠党意识上与政治上的一致，依靠一切党员的行动上的一致和纪律的严明。

7.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认为在一九三〇年夏季革命运动使中国共产党遇到新的任务，在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进攻，准备与帝国主义进行决定胜负的战争，改造红色游击队为正式红军，建立一个中央苏维埃政府，在全国极大限度的发展工农的群众斗争，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一部分领导机关在李立山〔三〕同志领导之下，以反布尔塞维克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反对列宁主义路线。这一路线企图以冒险的盲动主义代替布尔塞维克政策，同时取消在群众中的工作，取消解决革命任务的真正斗争（在解决土地问题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在苏区作极端左倾的企图想建立集体与苏维埃农场，在中国其他各部企图取消工会与青年团……等等）。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完全同意彻底的斗争反对李立山〔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路线。李立山〔三〕用“左”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词句，反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斗争，反对巩固红军与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他轻视组织群众与争取工人阶级日常要求的重要性，他否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右倾机会主义。

8. 共产国际主席团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李立山〔三〕同志错误与半托洛茨基路线的实质。三中全会不了解克服李立山〔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认识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前提与特殊斗争的形式，在这一阶段中，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的危险。三中全会对于李立山〔三〕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采取了模棱的调和态度，因此使右派，取消派与破坏派，反动的陈独秀，罗章龙的走狗等能容易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在这儿必须很满意的指出当时在党的本身发生一种健全的要求克服当时一部分领导机关的动摇。

9.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很满意的指出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四中全会一方面击退了右派脱党论者与取消主义者的进攻, 他们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李立三错误与对立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满, 进行反党。在另一方面, 四中全会严厉的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和对于这种观点的调和态度。四中全会在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 改造了党的领导机关, 同时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开始了彻底的转变, 实际的彻底的解决党当前的重要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同意党在四中全会时和以后所采取的组织制裁(如选举政治局, 开除罗章龙及两个罗章龙的门徒, 因为他们发行反党的小册子, 作破坏党的活动)的必要, 因此保证党路线的执行, 巩固党的队伍。

10. 李立三路线的附和者对党的服从是更有利于党的反“左”倾机会主义的更进一步的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这一斗争。同时必须进行坚决反对目前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

右倾机会主义怀疑革命的力量, 妨害革命运动的发展, 降低工人运动的标准。右倾机会主义不去动员广大群众保护和援助苏维埃运动, 反而使工人的斗争和组织服从国民党的法律。右倾机会主义对于党的主要口号与土地革命反帝革命口号抱取消态度, 在策略上消极和等待主义, 因此妨害白区中农民运动与反帝运动的发展。在苏区中, 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剥削阶级, 妨害工人争取较高生活水准的斗争, 拥护用富农路线解决土地问题。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或者忽视建立红军与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的工作, 拥护苏区中的地方主义倾向, 取消或者轻视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斗争, 这样右倾机会主义为剥削阶级服务。右倾机会主义者阻止工人领导苏维埃与红军, 压制群众的革命创造性, 使党与苏维埃机关官僚化, 使党反对反革命组织(如 AB 团等)的斗争更加困难。右倾机

会主义的路线和策略是领导革命走到失败的道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时常提出它的反对党路线的公开政纲，这种事实不仅不减少反而增加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因为我们很难在群众面前揭穿它，而在实际工作中使它流行。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揭穿右倾机会主义的各种观点，在理论中与实际工作中与它进行无情的斗争。

11. 党与群众的联系，群众相信共产党，这是革命胜利有力的前提。因此共产党要积极的反对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与战斗力，反对看不起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创造性，反对轻视党的作用，这虽然是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综〔总〕是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机会主义的特性。只有经过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才能保证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执行。

同时，党要加强反对陈独秀与托洛斯基派的新联合战线。最近党在组织方面与理论方面都放松了反对这些反动派的斗争，而这些反动派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活动。估计到这些反动派用新的阴谋分化党与红军。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报纸中，在自己的组织中，在工农群众中，推动反对这些国民党与反动统治走狗们的斗争。

12. 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及各级领导机关中的社会成份与工人作用方面变成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革命的胜利发展。大胆的、有计划的和积极的吸收工人中的最好分子入党，这是各支部各党部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在大的重要的工厂中建立自己的基本组织，要在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恢复与巩固党的组织。党应该很快的恢复那些失去了关系的工厂中的党员支部，这些党员有些继续工作数年之久，没有领导，没有与党的组织发生关系。党中央要在各方面提高工厂支部在整个党生活中的作用，各级党部要倾听工厂支部的意见，要把党中最好的工作人员参加工厂支部，要把他们的工作作为全党的模范。党的支部要很快的成为工厂中真正的领导中心，

解决工厂中各种问题，团结与组织工人的斗争。

党要废除目前把大部分党的力量用在上层机关的这种不合理的使用党的力量，在上层的这些同志们，脱离了群众与群众斗争，变成为党的赘瘤而已，必须改造各机关中工作人员的成份，尽量把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派到下层组织，特别是工厂中去工作。目前党很需要干部，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注意有计划的提拔新的活动分子，特别是从工农队伍中。党必须改良党的整个宣传工作与党内教育，特别是在苏区要开办一个广泛的党校网。

要很快的解决苏区中党的建设问题，要立刻采取办法巩固苏区中党的领导机关与党的各级组织。要加强全体红军中党的支部与党的领导机关。要争取有计划的改善苏区中各级党组织的社会成份，要加紧各种群众组织中党团的工作。必须有系统的无情的肃清钻入党队伍内的异己分子。为了这种目的，应当在苏区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

必须在当地条件允许之下，尽量发展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苏区自我批评能成为而且应当成为加强党领导链环最重要的手段，成为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武器，特别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三) 发展白区的群众工作

13. 白区党工作的主要目标(为要达到这个目标，党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在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保护苏区，有力的帮助粉碎国民党对于工农红军的“围剿”。组织群众，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把这些斗争联系到拥护苏维埃运动的群众运动，党必须要抓住这主要的一环，唤起工业中心的群众积极援助苏区。

14.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党必须要恢复，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目前广大群众的不满意是很深刻的而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形之下，假使我们能正确的组织劳苦群众，特

别是工厂中的工人，那么，我们一定能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四中全会后，党的群众工作的进步，特别是在上海，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这些成绩证明革命工人运动伟大的可能性。党要恢复和加强赤色工会，在工厂中建立一个广泛的基本组织网，工厂工会支部，工厂代表制，选举的工厂委员会，首先是在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在大的工业中心城市，在大工厂，工场，矿山，港口，铁路，兵工厂等等。要在巩固基本工会组织的基础上，恢复各产业部门的工会。工会必须定出各产业部门中工人的日常要求纲领，提交各工厂中的工人群众在非党工人的大会上讨论。根据讨论的结果，工会定出最后的部分要求纲领，作为进行群众工作与发展工人斗争的基础。

15. 要用这种要求纲领为武器揭穿黄色工会领导机关与个别黄色工会领袖及国民党劳动法的阴谋欺骗，轻视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是一个严重的危险。黄色工会下层群众对于国民党特别是对改组工会的法令的不满情绪正在很快的生长。党要暴露国民党改组工会的阴谋，国民党想在工会群众革命化的现在，借口改组工会来更加压迫工人阶级。特别重要的是用具体的事实揭穿黄色工会领袖的两面派的把戏，他们在实际上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会，而同时在口头上反对改组。共产党员并不保护以前的黄色工会，应当利用工会的改组，使工人反国民党的斗争尖锐化，巩固赤色工会。改善赤色工会的工作，使赤色工会成为罢工运动的领袖，这样我们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黄色工会内建立群众的工会反对派，实行下层联合战线。党与赤色工会应该在黄色行会与国民党工会（包括已改组的工会）的下层群众中间进行积极的工作，在这些工会内建立工会反对派，甚至要利用最小的可能，进行群众工作。特别要利用黄色工会的俱乐部。

同时，各级党的组织要继续利用一切的公开可能和组织适宜的机关（夜间读书班，游艺团……等等），凭借这些机关的帮助来

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

16. 目前职工运动的特点是：虽然罢工运动是在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然而因为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很不适当，所以多数的罢工是自发的，没有革命的领导。不过很多的罢工带有反攻性，而且这种罢工的数目是在增加。这使共产党有很大的可能抓住与发展罢工运动。

因此在这一范围内的目前主要的任务是：不顾一切的去巩固与群众间的联系，准备，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这一定能很快的推动罢工运动，使工人的斗争采取更多的战斗方式。也如以前一样，革命工会运动的主要任务在：各重要工业中心，及重要产业部门中，组织与准备经济斗争。最近上海丝织工人的罢工已经在实际行动中证明号召整个产业部门参加斗争的可能性。但是这次罢工也暴露了党在准备这一运动中的工作是异常不够，党不能在斗争中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因此现在党要很注意的学习准备，组织与领导工人的革命罢工运动。克服对于经济罢工重要性的估计不足，“罢工是革命的学校”（列宁）。坚决的发展和组织斗争，党可以吸收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参加革命运动。假使经济要求是与政治要求相联系起来，各个产业部门的罢工，在本身是对苏区一个很伟大的帮助。假使党能执行一个正确的路线，能正确的革命的认识工人的情绪，假使共产党员能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扩大斗争，组织无产阶级，那么这样的一个罢工运动一定能很快的在“拥护苏维埃”口号之下，发展成为一个反国民党的伟大政治运动，提出政治总罢工的问题。

17. 在目前，机会主义最危险的表现是不愿与不能把争取日常经济要求的斗争联系到动员群众拥护苏维埃运动的日常的群众工作。共产党党员应当利用群众每一个不满的表现，利用他们每一个示威，来进行明确的政治煽动，解释红军与苏维埃活动对于全中国劳苦群众求解放的意义，保障苏区工农革命的利益。党应

当在群众的争取日常需要的斗争中，组织群众拥护与帮助苏维埃的运动，在工厂中组织保护苏维埃运动委员会，派遣义勇军参加红军，为红军募捐，组织群众政治罢工，革命示威，干涉运输军队，军用品等等。

除此之外，党要在失业者中进行有计划的工作。这种工作的开始是太晚了。党要组织失业者在特中定出的口号的周围，要把失业斗争与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总斗争联系起来。

18. 同时党应当采取一切办法更进一步的扩大反帝运动，保证党的领导。党要利用帝国主义压迫的每一个表现，利用国际帝国主义干涉中国苏维埃对中国反动统治进攻的战争的每一个事实，利用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穷苦群众的每一个事实。党要煽动与加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仇恨，组织群众积极的反对帝国主义。党应当加强党反帝的口头与文字的宣传和煽动，要推动反帝同盟的活动，成为一个群众组织。无论何时，只要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怒潮一经爆发，党就必须要建立行动委员会。

19. 党应更严重的注意妇女运动。要在这一方面加强党的工作，定出女工的特殊部分要求，利用特殊的公开工作方式，扩大工厂代表会议的经验，召集失业工人的妻子与国民党军阀兵士的妻子的特别会议。党要用这些一切方法组织女工，吸收她们参加总的革命解放斗争。

20. 党要严重的考虑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和帮助，因为由于李立山〔三〕的领导取消青年团的独立组织，所以青年团在它的发展中经过了一个很困难的阶段。中国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工农的领导者，在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中与斗争中，在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在完成土地革命中，在争取广大青年工农到党的周围的工作中，在加强红军的工作中，在创造新红军队伍中，青年团要起很重要的作用。中国青年团克服了李立山〔三〕主义，克服了青年团领导机关中对李立山〔三〕主义的调和主义，因此创造

了青年团发展与生长的有利先决条件。在反右派中，青年团坚决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青年团继续反左倾错误与立山〔三〕主义残余的斗争，适合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并且在这一方面的实际工作中获到了很大的成绩（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建立新的工厂支部，个别团部的发展，准备工人干部，开始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领导单独的青工罢工……等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领导与组织青年工人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帮助与参加苏维埃运动，加强红军，继续巩固青年团本身，改善青年团的社会成份。在执行中央四中全会所给予团的任务中，青年团在力量上与在意识上一定会生长的。

21. 同时，党必须努力坚决的发展国民党区域中的农民运动。党要建立农民委员会，要在农民组织中（如红枪会等）的下层群众间进行革命工作，要领导与组织农民的自发斗争，争取他们的日常要求（抗税，抗租，反对军阀的勒索等等）。党要使这种斗争革命化，转变这种斗争为没收与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农民运动与游击战争能走到而且一定要走到建立苏维埃的新的中心，扩大现有苏维埃根据地。

22. 党要努力分化军阀的军队，首先是进行“围剿”苏区与红军的军阀军队。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中，现时的客观形势比以前任何时都有利。土地革命的斗争已经使我们抓住了广大的贫困化的农民到工农革命方面来，军阀军队大部分是这种贫困化的农民。不过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利用敌人军队崩溃的过程，来消灭他们对苏区的进攻。我们必须避免李立山〔三〕时代盲动主义的错误，这自然不是说放弃争取国民党军队下层士兵群众，放弃利用，组织和发展兵士的哗变。以为敌人的军队完全是城市与乡村中脱离了阶级的分子，这种意见是错误而且有害的。取消利用军阀军队中士兵的部分经济要求，这是完全错误的倾向。共产党要传播毛泽东同志的积极的经验，或是组织短期训练班，训练被俘虏的白军

的兵士。要继续派遣最好的领导工人分子与游击队员到军阀军队中去组织共产党支部，进行破坏敌人军队的工作，煽动和援助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斗争。苏区更进一步的扩大，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大部分要靠共产党员与在共产党员领导下的游击队员的自我牺牲工作，分化军阀的军队，吸收下层士兵群众到土地革命与苏维埃的方面来。

23. 为要动员苏区的工农群众积极拥护红军与苏维埃，为要在各地方发展土地革命，中央苏维埃政府应当宣布一个中国劳苦与被剥削群众的斗争纲领，反帝土地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要宣布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任务，在苏区中实现政治，土地，劳动等法令，税收政策等等，这个反帝土地革命的纲领，要成为共产党员活动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和杠杆，领导全中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兵士，及城市贫民。

（四）苏区党的任务与苏维埃运动的前途

24. 目前主要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红军，使红军各部队取得一致的行动，工农群众完全拥护红军，击退国民党新的进攻，打败与分化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实行进攻扩大苏区，建立整块的苏区。

党必须竭尽心力，以实现下列的任务：

（1）用各种方法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这需要积极的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工作，每一个红军战士要知道和了解工农革命的目的与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努力工作，以身作则，加强红军的军纪。要在各方面巩固红军与劳苦群众间的联系，不仅在苏区，在非苏区也应该如此。要号召工人，雇农，苦力，贫农和中农参加红军。同时要肃清红军中，首先是指挥干部中的一切富农豪绅分子，要巩固与扩大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与赤色自卫队，改善这些队伍中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建立党与青年团在这些队

伍中的支部。要同青年团共同开始进行苏区中青年工农一般的军事训练。要很有弹性的组织这些群众军事组织与红军的一致行动。这些群众的军事组织要成为红军的预备队，由革命工农队伍中训练最好的干部来补充红军。关于改善红军社会成份，最重要的工作是由革命群众组织（工会，城市贫民，农民团体等）自动的派遣他们最好的分子参加红军。党，红军，苏维埃与工会应当有系统的，继续不断的向苏区的农民群众解释，要保障农民已经得了的胜利，只有扩大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

(2) 要在苏维埃根据地邻近的白区中组织伟大的工农示威行动，组织群众拥护红军的斗争。红军，苏维埃与工会要从工农队伍中派送千数煽动者和组织者到这些白区中去。这些煽动者与组织者应当广泛宣传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和目的，宣传苏维埃已经给予工农的利益，在白区中组织农民运动与游击战争，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这些工农代表要发起由工农自己选举与派遣代表到苏区去。

(3) 在苏区中彻底的执行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苏维埃的建设，红军的建设，必须要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与中农贫农的联盟，在苏维埃领导之下发展群众在公共生活各方面的革命的自动性。“尽量发展下层群众的创造性”（列宁），用工农独裁的力量消灭革命的敌人。

25. 要彻底实行苏维埃的民主，即是要保证苏维埃与群众间真正的亲密的联系，苏维埃政府各机关完全实行选举，选民有权撤回政府人员，要有系统的建立（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苏维埃与代表个人的责任制度。苏维埃要依靠工会。不应再延迟组织乡苏维埃中的贫农团，要把雇农，中农与贫农的整个群众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要严格的实行剥夺城市与乡村中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样要有系统的肃清已经钻进苏维埃中来的富农分子。

群众的直接自动性应当是苏维埃国家权力的来源，苏维埃应变成群众自动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有些苏区发生了机会主义干涉工农的革命创造性，官僚主义命令群众，应当无情的消灭这种现象。长沙及其他无产阶级中心区（安源，景德镇等）并不选举城市苏维埃，成立上层的苏维埃政府，这些经验证明轻视工人阶级与工人苏维埃代表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这种危险倾向仍然存在。这种倾向足以破坏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削弱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种倾向帮助富农干涉土地革命的发展，鼓励富农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解决经济状况的困难（如工业制品与农产品的价目相差太远）。

26. 赶快把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的建立在最安全的区域。苏维埃政府要宣布与实行反帝土地革命的纲领（推翻国民党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下求民族的完全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没收帝国主义的财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社会法，工人监督生产）。苏维埃政府应当根据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对少数民族实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

27. 党与苏维埃要保障由雇农，贫农，中农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解决土地问题。要无代价的没收大地主，军阀，豪绅，教堂，高利贷者的整个土地（不能例外优待小地主与“慈善”的豪绅），包括他们自耕的土地与出租的土地。在苏维埃监督之下，依据平等的原则，把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雇农，苦力，红军战士。不能给被没收土地的以前所有主任何土地。

没收土地不能影响到中农（包括小康农民）所有的土地。过去富农所有的土地应当作为贫农，中农，雇农，苦力，红军战士的土地基金。假使富农没有参加武装反抗苏维埃，他们过去没有雇用劳动而且以后也不雇用劳动，那么，可以分给他们规定的土地，不过这种土地不能是很好的土地。

有些苏区在苏维埃运动中解决土地问题时犯了错误，特别是

用强力实行平均分配土地。我们不能允许共产党党员用强力或单靠行政机关的行动来实现平均分配土地。共产党员承认平均分配土地是肃清土地中一切奴隶关系与一切大地主遗迹和影响最彻底的方法，这是将来土地国有的初步，共产党可以向农民解释这些好处，消灭土地零碎分散的制度和土地距农场很远的现象。新的分配土地是根据雇农，中农，贫农等的利益，可以增加农场的收入，但是共产党员不能坚持这样重新分配土地，应当让农民群众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只能在获得了农民与雇农基本群众直接积极拥护和拥有土地的贫农中农同意之后，苏维埃才能实行分配土地。至于实际解决这个问题，和关于这个问题的煽动工作，共产党员应当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形，估计到各地社会的经济的条件之不同，特别是在一些中国省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独立农民土地所有者，他们坚持着他们的偏见与小的私有的本性。

为要巩固无产阶级与中贫农的联盟，并且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权，我们党必须考虑到农民群众的利益，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必须获得农民的同意。关于宗教团体，寺庙等所有的土地，各地方党部与苏维埃机关要根据当地农民的意志解决这个问题（不要伤害农民的宗教感情）。同样，我们在乡村中的党与苏维埃组织要注意雇农，中农，贫农的利益，根据当地的情形，采取最有利的分配土地的原则。土地的分配可以根据“吃饭人数”或每家壮丁人数，或者劳动力与吃饭人数混和原则。不过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注意土地的大小，而且要注意土地的肥瘠。

党要警告实行关于土地国有的过早办法。只有在苏维埃革命在国内重要省份中获得了胜利后，只有在农民基本群众拥护国有土地后，我们才能实行土地国有。

28. 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目的应当是保证工农红军的胜利，彻底改良工农的经济地位。

苏维埃要消灭与肃清一切封建奴隶关系，取消劳苦群众欠高

利贷者的全部债务，反对一切恢复奴隶契约的企图，实行一个阶级的税收政策。苏维埃应当帮助发展贸易和合作社运动（首先是消费合作社与商业合作社），帮助发展苏区内的工业。苏维埃政权要采取办法（甚而可以没收）对付资本家的怠工或关闭企业。在这种行动中，苏维埃政权要依靠工人监督委员会，这种委员会要在一切大的，中等的工业，商业与银行企业中建立起来。

苏维埃政权应立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劳动法（每年有假期，星期休息，保护童工免受剥削，在小的私有与家庭工业中废除童工，法令禁止苏区中的一切工业企业用童工，病期内工资照给并要设法医治，工人因在工作时受伤，应给抚恤金，由雇主出资办社会保险，开除与雇用工人须经工会同意）。十四到十六岁的青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四小时，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六小时。关于雇农的工作时间，应在特别的暂时法规中规定。这些法规要注意到工作的季节的性质与中农，农场零星的雇用雇农等条件。

苏维埃要立刻设法救济失业与减少失业，要认识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长期存在才能完全消灭失业。要阻止私人企业关门与减少生产。在具有必需条件的地方，应当把失业者组织于合作社之中，首先是为红军军需及其他社会需要而工作。

29. 苏区党政策的出发点，是推进资产阶级民主土地革命，发展这一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现时苏维埃运动发展中，工农群众创造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前提。这前提是：

工人，农民与红军代表的苏维埃是土地革命与工农红军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专政的机关，革命的民众创造一个新的政权机关，这种政权机关给“被压迫阶级（工农）中最有阶级觉悟与最前进积极部分”的组织具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利用这个机关唤起，教育，训练与推动被压迫阶级整个群众前进”（列宁）。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贫农与中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努力最后的与彻底的消灭封建地主制度，这种斗争不可避免的要与富农冲突，这些富农已经是在拥护资产阶级地主反动统治。农村中的贫农起了更大的作用，有了更好的组织（在苏区中建立了贫农团等等）。

土地革命表现更浓厚的反帝色彩。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并且增加了力量。农民中的基本群众在自己的实际经验中认识了不起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则不能获得土地革命的胜利。

我们已经在革命运动中很巩固的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的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苏维埃的党，是工农红军的组织者与指导者，是工人与农民唯一的领导者。在政权的初期就已经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和过渡的步骤。

30. 同时为要创造中国过渡到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必须扩大苏维埃与红军的根据地，扩大苏维埃红军对反动统治武装力量的胜利，要在中国有决定重要的地域上建立苏维埃区。

只有苏维埃革命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工农运动的统一，推翻反动统治，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将要吸收更大的工农阶层参加革命，很大的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彻底的改善共产党的社会成份，吸收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直接参加苏维埃建设，供给苏维埃与红军的领导无产阶级干部，集中运动……），使中央苏维埃政府具有真正的全国的力量与威权。

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消灭封建军阀的割据与大的私人地主制度，建立一个单一的苏维埃政权，这将使阶级力量相互关系的转变于无产阶级有利。不仅是农民中广大阶层而且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群众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求

中国民族解放，这将使无产阶级——唯一彻底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成为众所承认的中国人民的真正领导者。

中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战斗联盟，中国工农与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日益发展。苏联人民的经验，模范和帮助，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些将要加强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在中国将来过渡到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此在土地与反帝革命过程中，要实现与发展无产阶级对农民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苏维埃正在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将来不仅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能保证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直接争取社会主义。

31. 苏维埃在争取中国统一，消灭大的私人地主制度与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中，将要不仅彻底实行把一切外国的企业收归国有，而且要没收及以后收归国有首先是有国家重要的本国资本家的企业（银行，铁道，军事工业，大的水上运输业，电力站，市政工业等等），把土地，水道，灌溉等收归国有，这将大大的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更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中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和反革命活动，地主，军阀，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崩溃，群众热烈的想在目前不能忍受的环境中找一条出路，特别是要保证民众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集团战争的胜利，这些情形，使苏维埃不得不在经济上解除中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实行国家监督，随后采取有计划的国民经济的办法。

这些办法要根据保持与巩固土地反帝革命胜利的需要和使革命成功的需要。要根据于广大工人群众与被压迫分子的需要。特别重要的是使工人与被压迫分子认识这些办法的需要。

还要注意到在中国，商品生产的范围很小，因为土地革命的结果，普通的商品（农民）生产是特别重要，在中国就会在革命

消灭封建地主制度使农民的基本群众有利（甚至于在平分土地与国有土地后），资本主义一定会继续发展。在中国因为生产力的水准很低，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比较薄弱，所以中国所需要的逐渐过渡的时期（及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长。

32. 从两个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将是党的主要任务，不过必须在中国最重要的区域中胜利的进行土地反帝革命，因为这样可以大大的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使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转变与无产阶级有利。

由于无产阶级（包括雇农）的组织和阶级觉悟加强，农村中的贫民团结在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周围，与中农建立密切的联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逐渐产生的苏维埃，将要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我们目前很难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将要采取什么具体形式。

在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斗争中的各阶段中，党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原则应当是巩固工人阶级与中农贫农的团结，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团结中的领导作用，争取土地反帝革命的胜利。以后逐渐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完全消灭资本主义而斗争，以社会主义教育农民，用有系统的说服方法和实际的经济帮助，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合作社与集体化）改造农民的落后个人经济。

只有巩固无产阶级与中贫农的团结，获得无产阶级已经胜利的国家直接的援助，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保障的。这是中国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先决条件，这是中国工业社会主义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前提。

33.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尽它们的责任竭诚援助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责成一切共产国

际的支部，在广大的范围上，进行群众运动，援助中国苏维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进行这一斗争，如在军队中组织革命工作，反对帝国主义在财政上与军事上帮助中国反动统治。要求撤回在中国的外国军队，反对反革命干涉。中国苏维埃的目的就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目的。

（一九三一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会发言^①（节录）

（1931年3月—4月）

第二次会议（1931年3月26日晚）

曼努伊尔斯基继续作报告

在中国

在中国，革命危机加深的实际表现是，在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这是当前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它使中国站到整个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最前列；这是革命高涨的最高形式，这是形成国内战争的群众武装起义在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已经取得的胜利。苏维埃的建立和红军骨干队伍的形成，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即在劳动人民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种领导权，不仅是通过共产党，而且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初步形式来实现和巩固的。

“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

① 本次全会的资料，是根据苏联党出版社1932年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速记记录）编译的，文末所注页码是原书页码。——原编者

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①

苏维埃的建立，以及由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红军的建立，对非苏区正在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千百万农民，同样也产生革命化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已经控制了整个地区，这一事实本身对于全中国劳动人民来说，就是极其有力的宣传，是年青的苏区政权实施革命政策的具体体现。

苏维埃和红军的存在，动摇了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反革命国民党的屠杀制度，从而提高了工人阶级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尽管笼罩着疯狂的恐怖，但罢工运动还是蔓延到国内最边远的一些大城市。同时，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使整个殖民地世界日趋革命化：主要靠粉碎蒋介石围剿部队武装起来的红军，逐月不断地在增强自己的力量。

中国苏维埃红军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在江西的第一次进攻，在湖南和湖北胜利地扩大了自己的根据地，最近又沉重地打击了华北和河南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

中国共产党现阶段正在解决下列三位一体的任务：

1. 使红军成为一支拥有巩固的根据地的正规部队。
2. 建立苏维埃政府，在苏区实施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纲领。
3. 在非苏区开展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通过斗争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工会、农民委员会，加强党组织，做军阀部队的工作）。

.....

（第一卷第 53—54 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326 页。——原编者注

共产国际各支部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

.....

1. 右倾危险过去是主要危险，在世界革命运动现阶段仍然是主要危险，在我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胜利战斗的整个时期，都将是主要危险。第一，右倾危险是由于资本对工人阶级实行残酷压迫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及其多方面的种种压迫机构和残暴的镇压机器存在，有些被压迫阶层就会希望规避阶级斗争的严酷规律，设法适应资本主义的苦役条件。工人阶级不是生活、呼吸和活动于实验室那样的纯洁的环境里，它受到其他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教育，以及科学、艺术、教堂和兵营的错综复杂的影响。第二，右倾危险是强大的社会民主派施加压力的结果。只要社会民主派还没有被清除出工人阶级队伍，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就不可避免地会重新出现右倾机会主义。第三，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化，也会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各种“原则意见”上主张“退却”。

目前，右倾危险由于某些地方尚有苟安情绪而依然存在，在报告所指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又一次出现了右倾现象，右倾陈独秀分子利用李立三集团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内抬了头，他们为国际上右派取消主义观点辩护；意大利共产党开除了反对党的积极政策的桑蒂尼、布拉斯科和菲罗奇，把这三个悲观失望的取消派代表清洗之后，党勇敢而有效地进行着反对法西斯专政的斗争；瑞士共产党驱逐了以布林戈尔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在这类右派叛徒（马里奥）中，有一些人竟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而直接倒向了社会民主派，另一些人（桑蒂尼之流）被托洛茨基看中，被吹捧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2. 出现“左”倾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事件的转折不明显，象在中国那样，要求党采取特别灵活的策略；也许是由于党的某些

干部在稳定时期有些固步自封，没有抓住时机开展工人运动；最后，也许是由于把工人阶级中不成熟的新阶层、即年青的优秀革命分子吸收到运动中来，他们刚刚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容易表现出革命的急躁情绪，往往重犯革命工人运动中业已犯过的错误。在最富有代表性的“左”倾错误中，必须提一提梅克尔同志的错误，他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同普通党员相提并论了。如果德共中央不及时纠正这种“左”倾错误，梅克尔同志的观点会给德国共产党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带来很大困难。德共中央的伟大功绩是，当这种错误刚刚露头时就给予揭露，这样就使得其他支部易于同这种极为有害的观点作斗争了，因为梅克尔同志的错误无疑是具有国际性的。

另一种更为鲁莽的“左”倾错误，是中国李立三集团所犯的错误。李立三错误的实质是，他企图把中国开始出现的革命高潮的某些征兆说成是中国和全世界革命形势的开端，并由此得出完全错误的盲动结论，致使中国共产党遭到毁灭的危险。

共产国际在报告中所指时期的第二项重大成就，就是德国共产党的成绩。德国共产党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获得了四百六十万张选票，这证明它在一贯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德国共产党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一年之内它在组织上发展了百分之八十，同时德国共青团在组织上也有了发展——这一切都表明，德国共产党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上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道路，德国共产党通过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柏林五金工人的罢工、鲁尔矿工的罢工和汉堡码头工人的罢工），通过反法西斯的群众性的街头示威，向群众表明，它是一个能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和饥饿、摆脱资本压制的唯一力量。应当说，目前在社会民主党拥有强大势力的德国，德国共产党是能够真正独立领导阶级搏斗的唯一政党，它能使大量群众摆脱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着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工会，它能建立企业

中的群众性组织，从而有力地动摇了社会民主党的牢固阵地。德国共产党是一支深受其他破产居民阶层敬佩的战斗力量，它的发展壮大可保证党扩大对农民和职员阶层（法西斯企图把它们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影响。

第三项成就是在中国拥有数千万人口的一部分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创立了红军骨干力量，使中国站到整个殖民地世界革命运动的前列。若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取得这个成就。在国内战争烽火中成长起来的年青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党，存在还不到十年，但它拥有一部可使任何一个欧洲共产党羡慕的英勇历史。中国红军的胜利，这首先就是共产党的胜利，因为它能够把这支军队中党的骨干组织起来，给军队以正确的政治领导，能够把团结在红军周围的、对红军进行忘我支援的千百万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建立苏区，根据群众的自身体会来宣传苏维埃制度，在苏区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一年之内，共产党从十五万人发展到二十万人，尽管在工业中心城市，组织上还很薄弱，工会工作也很软弱，但它能够在农村建立大量群众性的组织，而且这种组织的数量还在迅速增长，影响还在迅速扩大。

（同上，第70—72页）

第九次会议（1931年3月31日晚）

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刘先^①（中国）：

近来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对

^① 刘少奇的化名。——原编者

中国问题估计的正确性。

世界资产阶级为了在掠夺劳动人民和发动战争的道路上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空前加紧了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市场和扩大其在华的势力范围进行着斗争，它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斗争表现为国民党各派军阀集团之间的混战，其结果使中国人民群众遭到破产。这种斗争的另一表现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方面的竞争加剧了。现在，在华外国资本正在全线进攻。

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地打击着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由于农业危机造成殖民地原料价格的降低，对所有殖民地农民（其中包括中国农民）来说，乃是一场极其深重的灾难。世界市场上白银减价百分之四十，这使中国劳动群众的状况更加恶化了。最后，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通过中国地主、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来加紧掠夺中国农民群众。

中国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强盗行径的回答是：采取革命行动，在中国广大地区建立红军和苏维埃。由此可见，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如下论断完全得到了证实：当前的世界革命高涨与1918—1919年革命高涨不同之处，就是它具有普遍的性质，它不仅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而且是殖民地千百万劳动人民、首先是中国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

中国革命高涨的根源是，劳动群众不仅受世界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而且也受那些与帝国主义者串通勾结的中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极其严重的农业危机笼罩着全国。广泛的贫困与饥荒几乎遍及全中国。根据美国救济饥荒地区委员会的资料，1927年中国的饥民有七百万人，1928年有二千七百万人，1929年竟达五千七百万人。卖妻卖儿和人吃人的事情，在饥荒笼罩的中国各地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农业危机，农民的贫困状况，以及一般居民极其低微的购买力，决定中国工业不能有所发展和增

长。

采煤工业和冶金工业的衰退，不仅影响中国的企业，而且也影响相当大的一部分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的许多企业纷纷倒闭。丝织、纺织、烟草、火柴、面粉和皮革等工业，都处于严重危机状态；家庭手工业和小手工业也遭受着危机。进出口额日益减少，水陆运输混乱不堪，国内交易处于停滞状态。因此，造成了一支失业大军。劳动群众经济状况的恶化，小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的破产，由于银价跌落而造成的物价高涨——这一切，使生活在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制度下的中国劳动群众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国民党刽子手和南京政府在残酷镇压群众的革命行动的同时，企图口头上答应召开国民会议、实行土地改革（答应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农民赎回地主的土地等等）。然而，无论是国民党反革命的疯狂恐怖或是口头上的欺骗，都不能遏止中国工人阶级的激烈斗争、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骚动，也不能扑灭蓬勃发展的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

虽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镇压和疯狂的恐怖，但是，罢工运动不仅席卷了各大工业中心，而且扩展到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中国各地的游行示威和武装冲突日益频繁，参加者不仅是工人群众，而且还有城市贫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底层（店员、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农民革命运动比城市的革命行动要高涨得多。农民战争和游击队活动不仅席卷了中华和华南，而且在华北许多地区也普遍展开了。现在，我们已经在人口达五、六千万的二百多个县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守卫这些县的有三十万红军和三、四百万农民队伍。

在苏维埃地区，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平分给农民，废除了高利贷契约，没收了地主、土豪劣绅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房屋和财产；开办学校和医院，出版革命报纸和图书，设

立同反革命作斗争的革命法庭。

地主资产阶级军队的围剿不能把这一强大的运动镇压下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也不能把它扑灭，因为中国农民根据切身的沉痛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才能给他们带来土地和自由，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他们才能过丰衣足食的生活，所以很显然地，亿万中国农民要手持武器维护苏维埃，支持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这一指示：甚至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苏维埃都可以成为起义机关、政权机关，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被奴役的人民，使他们摆脱彻底的贫困和破产。

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陈独秀叛变分子，同世界帝国主义一起指责中国红军的行动是土匪行为，说这种行为“威胁着文明”。他们还重弹国民党反革命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老调，以此来对抗中国苏维埃。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巨大胜利。中国苏维埃运动是中国革命出现高涨的标志，它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

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1925—1927年革命相比，有着巨大的区别。当前革命的特征是，它没有资产阶级参加，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这次革命的参加者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基本农民群众，他们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残余，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的新高涨有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就在于这一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这一运动采用苏维埃形式，并为确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斗争，它能保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并能为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先决条件。这一运动的积极方面也在于，现在已拥有一支工农红军，即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武装的人民。这一运动的积极方面还在于，中国当前的革命高涨恰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世界帝国主义正经受经济总危机，其

统治业已动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世界出现了革命高涨；无产阶级国家——苏联正在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所有这一切有助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战胜世界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

我们运动的消极方面是在中国各地区发展得不平衡：虽然在华南和华中，农民武装起义早已开始，土地革命日益发展，苏维埃政权逐渐形成，但在华北，这方面的运动却刚刚开始。当然，运动发展得不平衡情况，在华南和华中地区也同样存在。在江西、湖南、湖北这些省份，苏维埃运动早已开始，而在浙江、江苏以及其他省份，这一运动刚刚开始。运动发展之所以不平衡，是因为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上分裂、帝国主义在划分势力范围。

我们运动的消极方面还在于，革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两者发展不平衡，即工人运动远远落后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落后的原因是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施行疯狂的恐怖手段，因而城市中的工人运动难以开展起来。

除这些客观困难之外，我们还有由于受李立三领导的影响，党采取的错误策略所造成的那种困难。

我们运动的消极方面还在于，在苏维埃地区，我们还没有十分坚决地实行真正彻底的土改，即将土地平分给贫民、雇农、苦力和中农；在许多苏区，苏维埃还没有摆脱富农的影响；在苏区，对于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巩固工作做得还不够，在那里，很少组织雇农协会、贫农团和工会，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工作做得还不多；红军还不大服从我们党的政治领导，红军中还没有建立起一支相当坚强的党的骨干队伍，红军的领导及其组织还不够集中。我们运动的消极方面还在于，共产党目前还不够坚强，因而难以领导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取得完全胜利。尽管党员人数很多（二十万），但党的成分多半是农民。在大城市里，我们党的组

织影响还比较弱。企业中的产业支部为数不多。支部的成员有流动性，支部的工作薄弱。此外，不久以前，党的领导由于受李立三的影响，在紧要关头犯了严重的、盲动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在国际范围内，也形成了一条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在那个时期，对阶级力量的对比也作了错误的估计，过高地估计了我党的力量和影响，没有考虑群众的情绪，轻率地试图在中国各大城市准备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也有了反映，它的表现是“左派幼稚病”，企图实现运动发展的第二阶段才应实行的任务，即企图组织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及实行计划经济等等。在各种“左的”漂亮词句的掩盖下，李立三路线实质上是一条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曾企图取消赤色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群众性组织。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严重地危害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在斯特拉霍夫^①同志的领导下，对这些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方针，同时对实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没有进行斗争。但是，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对中国党内许多犯有这种错误的领导人进行了打击。右倾陈独秀叛变分子及其在党内的残余，利用李立三的错误，假借捍卫共产国际路线，企图重整旗鼓来反对我们党和共产国际。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既反对李立三路线的种种表现以及对其采取的调和态度，又反对当时的主要危险，即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这次全会制定了我们党在今后斗争中的各项主要任务。

在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中十分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党的当

① 瞿秋白的化名。——原编译者

前的任务，其主要的任务如下：

1. 使红军成为一支具有巩固根据地的、服从党和苏维埃政权纪律的正规工农红军；

2. 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实施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纲领；

3. 在非苏区开展工农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工会、农民委员会，加强党组织，在军阀部队中进行工作）。

为了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党必须实行布尔什维克式的团结，坚持不懈地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既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又反对实质上是右倾的那种“左”倾，还要反对对这两种倾向的调和主义态度。党必须巩固自己的队伍，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要有进一步的提高，要培养和补充新干部。

中国革命也需要共产国际各支部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支援。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兄弟党做得还很少，尽管我们曾得到共产国际的多次指示。我们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给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以种种援助，给他们运去大炮、坦克、毒气等等外国武器，给他们派遣了军队和军事专家，送去了军用装备；德国按照美帝国主义的指示，派遣七十多名德国参谋本部的军官到蒋介石军队中工作；此外，还派遣了间谍和传教士到中国，让王德威尔得和托马斯这种社会法西斯领袖巡游中国，目的是给中国反动派打气、围剿红军和苏维埃。可是，我们的各支部做了些什么呢？我可以大胆地说：真丢人，做得很少。在这方面，今后需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所有的兄弟党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以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苏区和红军的干涉；应该组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以抗议派遣军队和运送军用品去中国，拒绝装运军用装备和武器去中国；在工人群众中间，尤其是在殖民地劳动群众中间，要广

泛宣传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

世界被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一方面是世界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各个国家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是苏联、世界无产阶级和准备进行坚决斗争的殖民地革命人民。在这一大规模决战中,我们应当给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社会法西斯主义以彻底的打击,争取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

(同上,第216—266页)

第十三次会议 (1931年4月2日晚)

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洛佐夫斯基(红色工会国际):

.....

中国工会中出现了特殊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到会的李立三同志的领导下,曾提出这样奇妙的主张:由于中国已具备革命形势,需要准备起义(可是,在全国并没有出现革命形势,不需要准备全国性的起义!),因而工会也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当时决定撤销工会,代之以行动委员会,而事实上行动委员会是个无所作为的委员会。这种左的倾向使中国工会运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疯狂的恐怖,工会运动本来已处于困难的境地,而现在自行撤销,就使我们党更加脱离群众了。

因为有时会出现把武装起义的任务同工会建设的任务对立起来的荒谬现象,所以在这里我要援引1905年列宁给左谢夫的信中的一段简短的话。1905年,敖德萨党组织提出了一种主张,认为在准备武装起义期间,经济斗争和工会组织应退居次要地位。但列宁在给敖德萨同志们的信中这样写道:

“武装起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为了使起义取得无产阶级

所认为的胜利，即为了使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起义（不是别种起义）取得胜利，必须广泛地发展工人运动的各个方面。因此把起义的任务同领导工会斗争的任务对立起来的思想是极不正确的。这会降低和缩小起义的任务。起义本是整个工人运动的总结和完成，而现在它却被分离出来。”^①

在1905年曾经是正确的那个论断，现在仍然是正确的。中国由于出现革命形势而取消工会的做法，是具有国际性的。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才严厉地谴责了曾给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的这种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弱点是不参加经济斗争。它没有利用秘密工会深入到群众中去，而是切断了党与群众发生联系的那条薄弱的纽带。这一错误曾被反党、反共产国际的右派集团所利用。这个右派集团曾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中居多数。这种经常发生的左倾错误，对右派是有利的。因此，不得不重新恢复工会。如果说革命工会没有必要，那么，在黄色工会中工作显然更没有必要了。所有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就是自为李立三用及其拥护者认为经济斗争是次要的，是运动的一种低级形式，不需要派大量的革命分子去做这项工作。李立三对政策或经济斗争，对起义或罢工，都作过这种形而上学的论述。而列宁于1911年在总结第一次革命时期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时，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

“在整个三年革命期间，每当政治危机尖锐时，我们不仅看到政治斗争的高涨，而且也看到经济罢工斗争的高涨。政治斗争和经济罢工斗争的结合，并不是运动的弱点，而是运动力量的所在。与此相反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他们恰好希望在工人参加政治斗争时，不把最广大的群众吸引到革命中来，吸引到反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61—362页。——原编译者

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

看来，李立三的“极左”策略，就是那种早已被伊里奇所认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策略。

有一点很清楚，只有党和赤色工会认真而坚决地转向经济斗争，注重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中工作，只有根据群众的日常要求细心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彻底消除危害中国工人运动的这种左倾错误。

(同上，第 420—421 页)

第十四次会议 (1931 年 4 月 3 日上午) 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库西宁：

亲爱的同志们，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下列问题：第一是印度问题，主要从民族观点来着眼；第二是欧洲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问题。另外，我想再简要地谈谈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提纲和工作报告。

首先，我想概括地谈谈我们在提纲中所提到的关于帝国主义者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不应认为，只有在将来爆发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重新划分殖民地的问题才能提出。不，帝国主义者目前已到处在实际准备这种新的划分。战争仅仅是他们经济上、外交上以及其他一切的准备工作的继续，仅仅是另一种手段而已。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准备工作是通过在苏联曾出现过的那种形式进行的，在苏联，臭名远扬的“K”和“P”，即举世周知的参谋本部的代表，曾领导反革命工业党的活动和孟什维克执行局的部分工作。法帝国主义的足迹几乎遍及欧洲大陆。美帝国主义到处采取攻势，首先是在亚洲、南美和中美，以及在澳大利亚、加拿大、

阿拉伯东部等地。美帝国主义四处活动，为自己“打开门户”，而在美洲大陆，却对其他国家关闭门户。正如斯大林同志不久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尤其是在伟大的、富裕而弱小的民族居住的地方，可以肯定他说，美元帝国主义会赶紧去那里为自己打开门户。首先对中国就是这样。在中国，近几年来，美帝国主义实实在在地在竭力向前推进。例如，中国的造船公司是由美国资本控制的，造船公司经理的姓名最能说明问题，他叫美元先生。近几年来，各种各样的美元公司不断打入中国：美商在中国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他们极力占领一些新的经济阵地，例如在上海，他们买下发电厂、排挤英国电缆专卖权、开设新航线等等。现在，正在进行关于美国白银贷款的谈判；与此同时，为中国提供贷款的一些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也出现了竞争。英帝国主义提出黄金贷款计划，但这一贷款应以人所共知的“国联”公司的名义提供，而且应以为期十五年的对华鸦片专卖权为担保。

假如我们一方面细心观察美帝国主义的活动，另一方面再细心观察英、日帝国主义的活动，那么就会看到，在中国正酝酿着一场未来的冲突。这三个大国象凶残的猛兽一样在中国横行无忌，吞食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躯体。中国迄今一直没有被瓜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曾提过这个问题），首先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并不特别热心于同别国共同瓜分中国，至少目前是如此，因为美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中还不能得到它所希望将来能得到的那笔大财。

（同上，第 429—430 页）

.....

因此，我不再专门谈论中国运动问题。我只是想强调指出，凡是在印度存在的基本矛盾，在中国都已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无论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或者是群众性革命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阵营之间的矛盾，都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最近，在革命

运动发展方面极其伟大的事实之一，是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至于民族资产阶级阵营，当它进入了政府，成为执政党，能够同帝国主义者进行谈判的时候，它就充分地自我暴露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嘴脸，这在中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国民党当前的立场，足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到十足的反革命的地步。但我们却可以看到，甚至象南京政府这样的反革命政府也决不反对民族改良主义的蛊惑宣传。南京政府正在使用托洛茨基那种伎俩（也许是依照美元先生的建议）进行宣传（例如它利用“国民立宪会议”这一口号进行宣传）。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帝国主义，还是南京政府，它们都一致认为：至关紧要的是，往后必须利用民族的蛊惑宣传口号来进行活动。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动荡和冲突，因而我们其他支部的某些同志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党近来只忙于党内问题，没有做其他什么工作。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有困难，这是党领导的错误造成的，如李立三同志的“左倾”错误，以及右派的攻击，右派曾想利用党的领导上的混乱来破坏党的工作，当然，白色恐怖也给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我们欧洲国家的秘密党，往往也很有根据地强调它们在白色恐怖情况下进行广泛的群众工作是多么困难。但是，中国党的工作条件比起它们要困难得多，尽管如此，应该说，中国党在开展重要的群众工作方面（如传播大众读物和组织群众集会），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朝气蓬勃的、工作富有成效的党。李立三同志和政治局的重大错误已受到严厉的谴责，李立三同志本人现已公开地、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那些企图利用党内困难的右派，以及那些想作调解人

来调和共产国际路线同左倾错误的人，就不是这样了。

虽然我们谈到美、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渗透，但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些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拿起武器来反对中国的革命群众运动，反对苏维埃运动。英、美的炮舰天天在轰击红军的阵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已成为常事。南京政府正在往江西调动兵力，为了保卫中国苏维埃，各国共产党该怎么办呢？在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这一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进行抽象议论时，我们往往显得很有才干。今天，在中国已经出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已拿起武器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以便保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时候，同志们，我们就应该以实际行动来支援这一革命，应该空前地大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宣传鼓动。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能不认为，我们党在这方面估计不足，行动太慢了。应该有力地支援中国共产党进行英勇而有效的斗争。对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印度支那的革命运动，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对于法国同志来说）。据我们一些印度支那同志回国之后讲，有一个指挥印度支那法军的法国军官说：“从殖民地给我们派来了一些多少接受点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我们就不得不动员整个整个的师去对付他们。”各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应当向这样的共产党员学习。我们的法国同志在某些方面完成过出色的工作。但在殖民地工作方面，他们应更多地向中国同志和印度支那同志学习。

（同上，第 436—438 页）

第十五次会议（1931 年 4 月 3 日晚）

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纽曼（德国）：

.....

共产国际最近一年的第二项重大成果是中国的斗争。目前中国局势的发展,对于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确实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从中国的实例中看到,无产阶级在遭受广州起义那样的失败之后怎样才能迅速恢复元气。毫无疑问,1927年底广州公社是以沉痛的、惨重的失败而告结束的。但是,遭受这次打击之后还不到两年,我们已经重新拥有数千万人口的苏区,即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地区。中国的农民运动并不是一般的农民运动,而是真正的农民战争。这个农民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点,并不仅在于农民运动本身,而在于它在相当多的地区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开展起来的,是由于无产阶级起义而发动起来的。必须强调指出这一点:广州起义尽管有其种种弱点和错误,但是,它是发动当前农民战争和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强大推动力。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起义中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封建资本主义国家的反革命实力,即动摇了国民党的整个国家机器,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实践中证明苏维埃政权有存在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华南和华中的每次农民起义都是在苏维埃革命的标志下进行的,每个农民运动,甚至规模很小的运动,都是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这方面,假如我们分析一下客观因素,假如我们考虑到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决定性因素(无产阶级是由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那中国革命显然处于比印度革命更高的阶段。当前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是,殖民地国家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运动(即使还不完全成熟,也已处于萌芽状况),并不是独自地进行的革命活动,而是同整个农民斗争的步调相一致的。

(同上,第487页)

第二十五次会议（1931年4月11日） 在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和各国革命危机的前提 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①

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的加剧

危机极大地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即加剧了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这个斗争表现在：美帝国主义向英国自治领施加压力，英国坚持帝国主义的关税政策（“帝国主义会议”），同时两国加强了在拉丁美洲和中国争夺“势力范围”。……

（同上，第623—624页）

中国当前的革命危机

……

在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和印度）中，由于经济危机和农业危机紧密交织在一起，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高利贷者加紧了剥削，由于群众纷纷破产，所以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民族革命斗争，因而深刻的革命危机迅速地成熟了。

这些革命危机的因素来源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当前的经济危机，并在群众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而这些革命危机的因素与下述情况有关：群众穷困已极，灾难深重，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不断增长；整个国内外资本主义统治制度已经动摇；各阶级力量迅速重新组合；上层统治阶层也发生危机，它们正在法西斯的道路上，在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苏联的道路上，寻求解脱矛盾的出路。

^① 根据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所通过的提纲。——原编者

(同上,第 626—627 页)

自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上次扩大会议以来,由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急速下降,失业现象日趋严重,职员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断破产,农民遭到大规模掠夺,殖民地极端贫困,以及苏联的革命化作用日益增长,革命高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革命高潮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罢工斗争和失业者的运动进一步加剧了;2. 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内,苏维埃和红军得到了发展和巩固;3. 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都加强了;……

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为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组织了苏维埃和红军,因而使中国处于殖民地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首位。建立苏维埃和红军这个事实,决定了无产阶级定能成功地取得民族革命运动、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而且这个领导权已在萌芽的国家政权中得到巩固。从土地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和红军,运用了群众易于了解的在苏区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和根据农民基本群众的利益而平分土地的经验,把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斗争,因而越加动摇了国民党反革命派的杀人制度。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不断促进了整个殖民地世界的革命化,而这种发展是由于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的扩大与巩固而造成的。

(同上,第 628 页)

前一时期共产国际各支部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 中国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共产党在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农民革命中发挥了领导作用;……6. 许多共产党(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有了发展。

(同上,第 631 页)

中国革命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自世界大战和苏联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全部

发展是一个不断向法西斯主义演变的过程。

.....

进行殖民掠夺，就是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的直接镇压；就是对印度成千上万人的监禁和大规模屠杀，对中国农村的狂轰滥炸，对蒋介石屠夫政府的直接支持；就是外国军舰在长江上同华南红军进行的公开战争，以及印度支那的大屠杀。

（同上，第 629 页）

中国苏维埃和各兄弟党的任务

在现阶段，各共产党应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并把这个斗争作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条件：

.....

3.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苏联；揭露帝国主义政府正在准备进行武装干涉；反对干涉中国苏区；各党应及时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以便转入完全的秘密状态；加强反军阀的工作；加强对青年工人的工作。

（同上，第 633 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 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

(1931年8月^①)

听了张彪同志关于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报告之后，中央委员会完全一致同意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并责成中央及各级党部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和不折不挠性来实现共产国际的决议到实际工作中去。

A. 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苏联的发展，与许多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成熟：

(一) 自从一九三一年年初一直到现在，世界经济的恐慌，还是在继续加深与扩大。而在苏联，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很大的成功。此种形势正如国际执委十一次扩大会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奠定正在完成”，(全会决议)深刻的两个世界的对立是目前国际情势中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对立加紧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一切矛盾与冲突。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日益紧张。中国，印度，安南的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高涨空前的勃发，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和纷争与杨格计划的破产，同样的是在继续增长，虽然这些矛盾不能够减轻反而只有增加他们对于苏联的共同的敌视和反苏联的反革命斗争的准备。

在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基础上，由于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

^① 原件无时间，此是原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恶化，惊人的失业，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农贫农的破产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革命化的作用，世界革命运动比之一九三〇年二月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时）有更进的发展，这主要的表现在：

a. 苏联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b. 中国创立了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他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血的斗争中逐渐巩固与壮大起来；

c. 在西班牙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巴尔庞的专制政府，正在为着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d. 在印度，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离开了并反对着甘地主义而与英帝国主义与印度的地主资产阶级作英勇的斗争；其他殖民地革命的增长；

e. 在德国与波兰工人阶级的斗争极端的紧张，走向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底成熟；

f.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和失业运动之更加深刻化，农民运动之崛起与发展；

g. 主要各国的共产党政治与组织影响之扩张；

但是“依照各国危机进展的程度和速度，资本主义内外的冲突的紧张的程度和速度，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高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这次经济恐慌和战后资本主义总的危机的特殊条件密切错综的国家中（如德国波兰），已经走向革命危机先决条件的成熟。目前，因于经济危机的深刻化，在西班牙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是很快的在增长，那里因为封建势力残余的强大，这一过程特别来得深刻”。“在许多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印度——由于经济危机与农业危机的交错，帝国主义与封建高利贷的剥削及群众的大量破产，千百万的群众起来作民族的革命斗争反对整个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革命危机的因素是很快在成熟”。（全会决议）

(二)在目前的阶段上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入与革命运动的更进的高涨,资产阶级日趋于公开的法西斯蒂的专政。他们按(接)一连二的公布紧急法令,禁止工人群众的集会游行和最低限度的“人权与自由”,逼迫工人阶级的组织走向地底下去,组织不满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流氓分子为法西斯蒂的武装团体以(对)进行革命工人及共产党员的屠杀;但是必须清楚的了解,民主主义和法西斯蒂仅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由掩蔽的财政资本的寡头专政到公开的法西斯的专政的转换,丝毫没有更换其阶级的实质。有时,更可以不变动民主形式的表面,而实行极端法西斯蒂政策(如白鲁宁政府)。并且亦不能认为法西斯蒂的形式已成为目前资产阶级统治的唯一形式。

世界经济恐慌更加明白的揭露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蒂面目,他的作用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的主持者,他不仅替公开的法西斯蒂专政开路清道,而且一切的资产阶级进攻工人的步骤都假手于社会民主党而实现,他们间接和直接的帮助资产阶级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削减社会保险费,增加税捐,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破坏罢工,压迫殖民地革命运动与屠杀本国的革命工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米勒政府压迫柏林的五一示威,解散“赤色战士队”,颁〔颁〕布“保护共和国法”镇压罢工,而为法西斯蒂专政的白鲁宁政府开路。在失去政权之后,并极力拥护白鲁宁政府的一切法西斯蒂的进攻工人的步骤。麦克唐纳尔因为镇压印度革命的劳绩,而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一致喝采,最后,他更是反苏联战争中资产阶级的一支尖兵。他们在全世界上为资产阶级进攻苏联的战争的舆论的准备,在苏联他们与实业党及少数党携手去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以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干涉的内应。

(三)两个世界的对立不能不引导到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积极准备,目前反革命的反苏联战争对于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

的威胁。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顺利的执行，使资产阶级失了其使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后〔复〕辟道上的最后的幻想；更加上经济恐慌的剧烈，使他们不得不以侵夺世界上六分之一的苏联为危机的出路，使世界资产阶级不断的采用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政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的增加，苏联边境各国的军士〔事〕准备的完成，美国的粮食准备，……一切一切都说明反苏联战争，已经近在眉睫。目前的事变，更加证明这种估计的正确，胡佛提议的真实意义，除了企图挽救德国的革命危机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团结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进行反苏联的战争。万宝山事件日本的武士道曾公开的宣称这是对俄必先对华政策之先声，而且毫不隐蔽的说，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第二次日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帝国主义内部的争斗，英美争取世界霸权，法意，英法，德法，美日等等的冲突与矛盾亦日趋紧张，以战争来重新分配世界，以挽救资本主义之危机已经变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政府的唯一出路。

B. 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与工农民主专政的发展。

(一) 由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与广大的封建残余的存在，世界的经济危机，推动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到完全溃灭的地步。经济危机与农业的危机密切的错综在一起。在前一时期中已经处在长期的停滞与恐慌状态中的民族工业（丝，纱，烟等），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大批的倒闭与非民族化。民族资本在重工业中的地位，更是逐渐减少，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完全的统治。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因为军阀战争的原因而破坏不堪；海运则非但外洋船完全在帝国主义者的掌握之中，而且内河船亦不能与外洋船竞争而宣告停班（长江上游）。另一方面正因为世界经济的危机，帝国主义者更加紧迫地加紧在华投资（从今年二月到六月各帝国主义者在华设立的新工厂约七八百所，资本达一万万五千万元）。在帝国主义地主高利贷的重重剥削下的农村经济，正处在空前的

浩劫的地步。在原料供给的市场上，中国除了特产品（大豆桐油等）外，几乎完全地被排挤。因为帝国主义和地主的非人的剥削和长期军阀战争的结果，毁灭了一切灌溉的设备而丧失千百万农民的生命灾荒，成为经常的现象。去年的西北的大旱及今年普遍十六行省的水灾，接着地震撼着世界的听闻。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官僚们（华洋义赈会赈务委员会等）更借赈灾的名目来进行搜括，高利贷和奴役农民（工赈，贷赈，急赈）。工业的破产与非民族化，帝国主义侵掠的深入，与农村经济的空前浩劫，这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图画。空前的群众失业，工人生活水平线的低降，资本的进攻，农民的破产与饿死，灾荒，战祸，这就是国民党统治所必然造成的而且已经造成的结果。

（二）世界经济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的影响，引起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根本矛盾更进一步的紧张。群众生活的恶化到饿死的水平线上不能不引导到一方面革命运动的继涨增高，在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的苏联〔区〕政权与红军的建立，革命危机在全国范围内的日渐成熟，另一方面，反动统治以全力保全自己的政权，动员一切力量进攻苏区与严厉地厉行白色恐怖。同时，他们更加积极地进行武断与欺骗的宣传。在土地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是无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条件，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政权的形式中实现和加强起来。苏维埃和红军的建立，使中国的阶级斗争走到了最高的形式——国内战争的形式。在国内战争中，红军正在夺取敌人的武装而武装自己。苏维埃政权亦正在与蒋介石，内部的敌人（AB团等），及自己的错误（立三路线）奋斗中获得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初步的丰富经验。千百万的暴动起来的中农和贫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不论红军怎样枪械缺乏和简陋，不论作战条件怎机〔样〕困难，而第一第二次的“围剿”的冲破给了帝国主义者蒋介石陈独秀罗章龙及党内的灰心失

望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一个良好的教训。第三次的“围剿”，蒋介石“溽暑亲征”的结果，在江西线上，除了红军为作战的必要而缩短战线之外，蒋介石没有任何的进步，而左翼的朱毛（是蒋介石的两个将军（朱绍良毛炳文），不是红军的领袖！）的覆灾，陈诚的溃败是国民党的检查员和帝国主义的报纸所不能隐蔽的事实；在鄂豫皖，湘鄂边线上，红军的发展已屡屡的引起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惊惧。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战绩，在中国的革命史已经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今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更进的发展，是依据在苏维埃和红军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之上”。

（三）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和封建的割据，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便是发展的不平衡，虽然，全国革命危机一般的成熟起来，但是他的程度和速度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存在着苏维埃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在更大的地域上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还维持着自己的凶焰。前者正在发展与壮大而后者则日趋崩溃。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的矛盾与冲突，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国各地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间的斗争，说明了为什么在对于工农民主专政一致的威胁之前，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与分裂的产生的真实原因。南京和广东的分裂，北方的军阀战争——反映着国际帝国主义的争斗，反映着英美日争取中国的斗争；另一方面，他更是中国统治阶级间为着怎样能够更好的挽救自己的统治与消灭苏区与红军的争斗。这种分裂和战争的本身，便是国民党统治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更进一步的崩溃的表现，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日趋紧张，不过他们内部矛盾的增长不但不能减弱而且只有增加他们与苏维埃运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产生军阀混战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基础没有被工农革命的风潮所推倒以前，军阀战争的重演与扩大将永远地威胁着中国的劳苦群众，只有工农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才能够消灭军阀战争与从完全的殖民地化与经济浩劫中挽救中国。

(四)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加紧,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屈服与投降帝国主义,经济的恐慌和灾荒,资本的进攻,群众的失业,生活水平线的低落与饥饿,及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引导到反动统治区域内的革命更进一步的高涨,这主要的表现在:

a. 反帝国主义运动新的怒潮〔潮〕,在工人贫农苦力激烈的反帝情绪面前,上海买办阶级的反日援侨会,只不过是一幅可耻的滑稽画,这些分子的企图便是“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失去其真正的领导;

b. 工人罢工争斗的更加紧张化,争斗更明显地暴露其反攻的以及政治的性质;

c. 兵变潮流的高涨;

d. 农民运动的继续不断的爆发;因为水灾的关系,在今年秋收争斗,党将处在空前的广大的农民骚动面前;

e. 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于南京政府的反对态度的增长;

客观条件对于党的工作是最顺利的。全国的革命风暴渐渐接近了,革命爆发的锁钥是在我们党的手里,只有党的积极性的活跃,才能决定革命大爆发的程度和速度。

C. 党的工作的条件与目前的紧急任务。

(一)在四中全会时,以及四中全会以前,共产国际曾经正确的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放着下面的三位一体的中心任务:

a. 创立有工作能力的得到群众拥护的苏维埃政府,来组织与领导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

b. 创立强有力的工农成份的政治上绝对是在党的指导之下的红军及巩固红军的根据地。

c. 开展工人阶级的部分的日常的经济斗争,引导他们到总的政治斗争上去,加倍对于反帝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领导;

这些任务中央认为在今天还是中国党的中心的迫切任务。

(二)在共产国际直接的帮助之下,四中全会坚决地责谴政治

局过去的错误路线，指斥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断然地肯定，立三路线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路线，指斥了当时政治局的某几个同志的对于共产国际的虚伪和两面派的态度，更新了党的领导的成份，毫无二语地同意并坚决的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国革命中唯一的正确路线。半年来党在工作的过程中，在执行国际路线的过程中，党得到了下面的成绩：

a. 对于苏区领导的加紧，造成了苏维埃和红军的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党和苏维埃政策的真实的转变，彻底的平民式的重新分配土地，因而大大的提高群众的斗争的积极性；在创立真正良好的铁的红军的工作上，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苏维埃机关的改造，混入苏维埃机关的富农和阶级敌人的肃清。所有这些工作的结果，使我们在苏区中的力量，更加强固。

b. 正确的政治领导与两条战线上的坚决斗争，使右倾机会主义的小团体（罗章龙派）完全地破产，并解除了立三主义的武装。思想上的斗争与某些组织的结论，一方面，保证了一部分被右倾机会主义所欺骗或立三主义者的“左”倾词句所玄惑的工人同志，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另一方面，党的和职工会的指导机关中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李立三主义者的肃清。这样使党有在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与组织上之稳固。在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竟成了重要的一步。

c. 开始了真实的艰苦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与厂内活动，恢复了青年团和工会的组织与加强了他们的领导；提拔了一部分新的干部作领导工作；改变了李立三时代以及陈独秀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度委派制度的恶毒的遗传，开始向布尔塞维克的作风转换。

（三）但是中央委员会不能不郑重地指出：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的许多严重的缺点和弱点。这主要的表现在：

a. 第十一次全会所指出的：“落在群众的积极化之后”，“落后

于许多重要的革命运动，失业运动，罢工，与农民运动之后”。“忽略了保护工人群众的日常要求的基础上动员群众为这些要求而争斗，将这些争斗与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争斗联系起来”。对于中国党同样是正确的。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党还不能善于利用和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在反动区域中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重大的成功。许多党部不善于依据工人群众的日常要求而动员，而组织他们的争斗。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至今没有什么成绩。没有学会把部分的与一般的要求联系起来，与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许多自发争斗没有能够抓住与领导；对于罢工争斗的准备常常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于失业运动的消极是极端不能容许的现象。

b. 第十一次全会所指出的：“反对战争危险的争斗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的争斗，其程度并不能到处赶得上帝国主义准备反苏联战争的程度，反战争危险的鼓动，进行得没有系统，有些地方只是一起一伏的”。这个指斥，对于中国党亦不是例外。中央严重的指出：这时期中对于反对进攻苏联的工作非但赶不及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的准备，而且有些党部是忽视了这个任务。特别是审判孟塞维克及实业党的材料没有充分地利用向工人群众作广大的鼓动。

c. 同样，对于拥护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亦是做得非常的不充分。关于动员到红军中去的工作各地党部都没有达到预定计划。甚至将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的工作，曲解为招募。

d. 关于士兵中的工作的积极性亦是非常的不够，中央的二月决议仍然还是纸上的空文；

e. 对于反动区域内的农民工作还是表现有机会主义的消极性；

f. 还没有学会布尔塞维克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及地下党与群众的联系，以少数的党的干部领导广大的群众争斗；

g. 许多党部还没有学会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与工作检查，许多“漂亮”的决议，依然成为纸上空文；与下级党部的活的领导与联系，还依旧是不够；新的干部的培养与提拔实现得非常迟缓。

h. 因为党的组织还没有能够深入群众，因为多数党员，还没有了解地下党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重要，以致党的组织与党的干部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与肉体的摧残。

i. 对于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还不够，未能及时深刻揭穿一切反动武断的宣传（如对于改组派，人权派，第三党，取消派等），因此这种宣传时常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一部分党员群众。

j. 党还没有能够很具体的教育党员群众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去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四)为着利用良好而顺利的客观环境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为着执行中国革命及共产国际在党面前提出来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来执行和完成下面的具体的迫切的工作：

a. 最大限度的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正确地执行一切党和苏维埃的法令，彻底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组织和利用群众的积极性为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而战。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以坚强红军和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苏维埃中央政府。

b. 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反苏联的武装干涉而战。揭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一切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真实地动员群众为拥护苏维埃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武装进攻而战。加紧反对军阀战争。动员重要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广大的普遍的创立“苏联之友”“红军之友”等等组织。扩大在反动区域的工农群众中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及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的宣传。

c. 真实地动员群众为反对资本的进攻而争斗；小心地周密地准备每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迅速地使职工会的工作有布尔塞维

克的转变，广大地发展赤色工会的会员；真正地开始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以夺取工人阶级中的最大多数。

d. 加紧对于目前正在剧烈开展中的反帝国主义的领导；组织与引导群众的反帝情绪的高涨到革命斗争的道路上；揭破一切资产阶级及改良主义者的假的反帝国主义把戏，这种把戏的真实意义只是在阻碍劳苦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自觉。为着完成上面的任务必须特别地注意公开可能的利用。

e. 各方面的努力的准备对于那必然要来的今年秋收斗争的领导。苏维埃运动与灾荒影响之下的农民斗争，假如我们有真实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则这些斗争将无疑的转变成为土地革命；同样反动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在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中有特别的意义，应该加十倍地努力进行。

f. 集中力量在大工厂内创立我们的支部；培养与提拔新的工人干部；广大地发展党的组织。

g. 根据目前的环境，各地党部要特别注意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组织，坚决地克服党内个别的叛变现象，彻底肃清机关主义和一切脱离群众工作的以及雇佣劳动的工作方式，消灭对于秘密工作一切忽视，务使今后工作能够经常的进行。用群众的力量来冲破一切白色恐怖与压迫。

(五)为着上面所指出一切的任务的完成：党必须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克服一切离开党的总路线倾向。党内主要危险，依然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在中国的特殊条件内，右倾机会主义紧接着公开叛背革命，同时他们更其采用了最可耻最懦怯的机会主义的两面派的态度。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同时丝毫地不能放松“左”倾的李立三路线的残留，这些残留还或多或少在各地党的工作中表现出来。

起来，对于党的工作实行彻底的检阅，在检阅中尽量发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发展下层党员群众

的积极性，消灭一切国民党时代瞿秋白李立三时代机会主义的残余，创造布尔塞维克的工作方法与作用，以完成历史放在我们党前面的中心任务！

通知：

因为地下党的工作条件与最近的损失与打击，使中央直到目前才能够详细的讨论国际执委的决议。这种迟缓是党工作上的极大损失。

各级党部接到此项决议与国际决议后，即应广大地举行讨论。讨论时必须将国际及中央决议更加具体地运用到各该地方去。并将结果报告中央。

国际决议与本决议应尽量在党报上翻印。

中央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的革命的职工运动的任务

(1931年12月职工国际执行部
第八次会议的决议案)

一、受着世界危机和社会性质的灾难(一九二九——三〇年的旱灾,一九三一年的水灾)的打击而加深了的中国经济危机,已表现国民经济总崩溃的趋势,国民党的四年统治的结果,使劳动群众遭受最残酷的掠夺,使几千百万民众走到破产与饥饿,使帝国主义的统治加强了。它并且替帝国主义者准备好了基础,让他们来割据中国(如日本帝国主义之并吞满洲,法国之侵占滇桂的一部分)。公开的武装干涉,开始完全瓜分中国。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中国民众,正在进行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英勇斗争,已在国内大部分的区域中建立了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与国民党对立着的有苏维埃的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对民众是实行封建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的掠夺,苏维埃的中国,是在实现土地革命和分配土地,把劳动群众从帝国主义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压迫下解放出来,把千百万的民众从饥寒,贫困,和奴役之下拯救出来。苏维埃的胜利,及国民党反苏维埃“围剿”的失败,其主要的条件,是在于无产阶级组织群众及领导群众的作用,是在于广大的劳动群众坚决拥护现有的武装革命力量——红军,是在于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及反帝革命的口号,以保证一致团结革命力量于苏维埃的周围及动员群众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和帝国主义。

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增长,和城市贫民群众的革命化,更加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世界帝国主义的先

锋夺取满洲的广大反帝浪潮汇合起来。集中在中国各重要口岸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指〔这〕是来反对中国民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的原动力，是苏维埃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还〔这〕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上，是占着极大的作用的。

在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的开始，国民党出卖民族政策的暴露，苏维埃和红军的生长与巩固，以及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将要发展到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并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实现这一革命的前途而斗争，是中国革命的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中国职工运动必须成为群众为争取中国的完整，独立和革命的统一而斗争的先锋。

二、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处在新的高涨中。经济斗争正在不断的生长，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工人（除了铁路工人及海员相当的落后外）都在卷入斗争。罢工运动的区域扩大了：除了许多防御性质的冲突及罢工以外，中国工人阶级反攻性质的经济斗争已增加了，而且占着优势。经济斗争往往迅速的发展成为政治斗争。胜利的罢工或成立有利于工人的协定的罢工，在数量上也增加了。在许多情形中，工人不顾官厅的压迫自动宣告八小时工作制，失业和饥饿的工人的斗争正在发展着，广大的工人群众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表现先锋队的作用等，这些都是目前劳动运动的高涨中的特点。

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中除了露天大会，游行示威，罢工，武装冲突的积极斗争的行动以外，还有消极的斗争形式（如怠工等），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现在的罢工运动，大部分还是自发性质的。

在苏维埃区域中，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性与阶级觉悟性正在增长着。工会和苏维埃政府已开始彻底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费，进行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以及改善妇女和青年工人的生活状况。

三、在帝国主义者，第二国际和亚姆斯德丹国际的援助之下，国民党在反对革命斗争中，不但对工人和劳动者采取白色恐怖，而且利用社会的和民族的武断宣传，利用改良主义的欺骗去蒙蔽他们。国民党为使劳动群众离开斗争，便由所谓“国民会议”颁布“土地法”和“劳动法”，颁布“劳动条例”和“工厂检查条例”等，同时国民党却用尽一切力量去消灭工人阶级的组织。国民党的工会法（由法西斯蒂的工会法抄袭来的），把工人阶级所有组织和斗争的权利都剥夺净尽。国民党曾经进行“改组”黄色工会，并实施工厂法，目的是在建立一个在“劳资合作”口号之下箝制工人群众的反抗的机关。为的是要用暴力强迫工人服从国民党警察式的仲裁。

国民党在压迫和摧残工人运动的行动中，是利用黄色工会的官僚，同乡会兄弟会的领袖，以及购买工人和职员个别分子等。

黄色工会在最近几年来活动得更加积极了。残酷的白色恐怖，大批群众的失业，利用破产农民，妇女与儿童代替和排挤旧的无产阶级的干部，来改变工人的成份，黄色工会在国民党极狭小的“合法”限制中所处的垄断地位，由于政府机关及工厂主的赞助和承认的剥削者有时对他们部分的让步，广大的施用社会和民族武断宣传，工头和走狗们的拥护，赤色工会的错误和弱点等等——这些都是黄色工会的影响增长和加强的主要原因。国民党黄色工会影响的增长及积极化的事实，更要在赤色工会面前加倍的坚决的提出夺取黄色工会影响下的群众工作任务。黄色工会影响增长到了相当的程度，表现出工人阶级要求改善其物质的与权利的地位，及组织和团结起来的愿望。但在国民党压制的条件之下和因赤色工会力量薄弱之故，他们依然未能成立别种组织。有几个黄色工会中反对实行“改组”，就是群众的积极性增长的一种证明。黄色工会的领袖用尽一切力量使群众脱离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污辱，分散并摧残他们的斗争，为达此目的黄色领袖还竭

力控制群众的不满与行动，一方面用领导他们请愿式仲裁的方法，同时即用恐怖手段，检举积极的工人交给军警，以出卖罢工。这种卑鄙的行为曾经屡次引起工人和会员自发的反抗行动，在个别情形下甚至将国民党的领袖驱逐出去。可是这些斗争，大部分都还没有能在组织上形成及巩固赤色工会。

四、虽然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但除苏维埃区域以外的赤色工会，都是极端微弱的，他们的组织状况远远地落在群众反抗和斗争之发展的后面。赤色工会这样的微弱，全国总工会旧的领导有一个时期执行了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的李立三路线及否认与取消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后来又采取罗章龙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立场——是要负大部分的责任的。直至揭发了李立三主义和罗章龙主义，并改变了会〔全〕总的领导之后，才开始进行工厂工作，建立职工小组，加紧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参加罢工斗争，重新形成职工会。可是革命的职工运动在工作中的成绩，达到决定的转变之完成，则尚很远。现有的赤色工会，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倒是工会机关及个别企业中的小组织或半公开的捕〔辅〕助组织，代替了群众组织。赤色工会的这种状况，更加上工会会员很大的流动性，有时失去和外界的联系，工厂内部工作的薄弱，共产党的方法和口号，在赤色工会中重复的应用，上层领导和群众联系的不充分，大部分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发生是没有经过赤色工会的领导和参加的。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所指出的中国赤色工会的错误与缺点，到今天还是没有消灭。

日益加紧的白色恐怖，一年来赤色工会迭遭严重的破坏，全国总工会的错误，及各企业中群众工作极其薄弱等，都构成赤色工会严重状态和大大的落在工人群众斗争后面的主要原因。

五、现时中国革命的职工运动必须抓紧的基本任务是：

(1) 尽量发展，组织和领导经济斗争，恢复，建立并转变赤色工会为群众的组织。

(2) 最大限度的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打碎国民党箝制群众的锁炼〔链〕。

(3) 努力争取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阶层，瓦解黄色工会，夺取其下面的群众。

(4) 扩大并加强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这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柱石。

所有这些必须在中国革命的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拥护并发展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去执行。

六、为实现这些任务，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要中华全国总工会注意下列的工作：

(1) 目前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只有在整个中国工人阶级卷入斗争中去领导这一运动，并使这一运动〔与〕真正的强有力的反帝国主义势力——苏维埃运动联合起来，才能得到胜利。这一任务的实现，主要的要看赤色工会是否进行有力的群众工作。组织和开展反帝国主义的罢工运动，把这种运动和部分的经济要求〔求〕与反国民党斗争联系起来，在各工厂，联络〔铁路〕，街道中建立群众的反帝委员会的组织，举行会议，群众大会，游行示威等——这些都是激发群众，反对武装干涉，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种种形式和方法。为完成这些工作，赤色工会必须：

(一) 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可能，使运动扩大和深入起来，巩固并发展已有的组织，在现有工人群众组织中取得领导权。

(二) 在大的会议上和群众大会上提出日本企业中男女工人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纲领并使其通俗化。

(三) 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准备和扩大日本企业中的罢工斗争，并竭力使其转变为反日反帝的总同盟政治罢工。

(四) 组织反对日本厂的关门和大批开除工人的运动，领导从

日本厂中被开除的工人要求国民党和市政局发给一年的津贴费，开办免费的食堂，豁免房租，没收日货做为维持费等。

(五) 深入各企业和黄色工会下的各种反日团体，并取得和巩固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

(六) 争取并领导广大的城市贫民，学生，工人群众的抵制日货运动，坚决的经过纠察队委员会，检查队等组织，彻底实现这一运动，和资产阶级半途而废〔废〕的抵货方法对立起来。

(七) 号召群众不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反对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把自发的反日运动转变为更高度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运动，在〔并〕继续不断的揭露国民党反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罪恶。

(八) 要求工人的武装及由赤色工会来组织工人军事训练班。

(九) 揭破黄色的和国民党的工会利用“民族统一战线”以加紧剥削工人的假面具。

(十) 进行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宣传及其反帝口号和土地口号，号召群众拥护苏维埃和加入红军。

(十一) 宣传(成为通俗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及其和平政策，估计到因占领满洲而增长着反苏联战争的危险，赤色工会必须在“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唯一大本营”的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

(2) 拥护苏维埃的斗争的加紧，中国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和反帝运动的发展，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赤色工会的面前，很迫切的提出尽量发展和领导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任务来。为此目的，赤色工会必须：

(一) 集中所有的一切力量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攻，依照每一区域，每一工厂，每一个别环境中的具体条件，应用各种斗争的方式(罢工，怠工，示威，群众大会等)。

(二) 赤色工会必须用所有的力量争取对自发的罢工运动的领导，他们必须参加每一次的自发的罢工，提出罢工的要求，帮助

工人更完善地组织起来(群众的罢工委员会, 纠察队, 募捐队等), 把群众组织从较低的形式转变到较高的形式(从怠工到完全罢工, 示威, 由工人自动提出的政治口号等), 同时必须暴露并驱逐罢工中的黄色领袖, 用自己的努力和不断奋斗取得工人的信仰与拥护。

(三) 赤色工会必须特别努力把每一个工厂中的罢工扩大到同一种类的许多企业中去, 更由此扩大到整个工业部门中去。同时, 赤色工会必须用一切的力量去发展并组织援助的运动(采取邻厂工人示威, 或罢工两三小时等方式)。

(四) 除必须参加自发的罢工以外, 赤色工会必须在大企业中进行准备并组织罢工的独立的工作, 并要使这些罢工成为广大的工人群众罢工的模范(这里需要正确的估计具体的环境和工人的情绪, 经常的提出工人的要求, 建立由全体工人选举出来的斗争委员会和包括很广的罢工委员会, 群众的纠察队, 示威运动, 组织别厂的援助与一致行动, 坚决反对仲裁, 无情揭露黄色领袖与国民党的罪恶等)。

(五) 工会必须实行调动工会干部及邻近的工厂, 商店和区域中的工会职员下层会员到最重要的斗争场所去。

(六) 工会必须普遍地建立群众的罢工委员会(包括一百至二百个委员, 而内中包括一小部分的领导干部)的组织, 罢工终结时要把这些罢工委员会转变为工政〔厂〕委员会或企业中其他的工人的经常组织。

(七) 工会要〔求〕估计到群众的斗争情绪的增加, 同样要估计到罢工期中警察, 军队及被雇用的流氓走狗所压迫, 因此在罢工时, 工会必须组织群众的纠察队, 并使成为工人自卫的经常组织。

(八) 召集正在罢工的工厂或已经罢工的工厂的工人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 研究斗争的教训, 讨论出更有效的形式和方法(斯

脱拉斯堡代表大会的决议)。

(九)一切在罢工或其他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工人，都要吸收到赤色工会，捕〔辅〕助组织及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来，同时对他们做有系统的政治的和阶级的教育。

(十)赤色工会必须在工厂和产业中开始募集罢工基金的运动，为达此目的，必须开始在工人，城市贫民和学生中间募捐，经常地向工人报告此项基金。

(3)赤色工会必须组织失业工人的运动，反对雇主，国民党及其政府，并把这种斗争和在业工人反对关厂与大批开除，用延长工作时间与合理化的办法抛掷工人于生产之外的斗争联系起来。要完成这项工作，必须使失业工人团结在他们自己所选举的委员会的周围，这个委员会一方面和赤色工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同时依然是基于失业工人群众独立的组织。凡有大批失业工人的地方，都要成立失业委员会。为达此目的，就须召集他们开大会，制定出失业工人的要求纲领，选举委员会(切忌委派制度)。委员会应领导失业群众到斗争中去，而且要依靠在这些群众之上，因此要在委员会下组成各部来实现自己的决议(组织部，经济部，文化教育部，管理住宿部，监督生产部)。失业委员会要组织失业工人回到原住的房屋(住在那里被驱逐出来的)去住，组织他们夺取货栈中的(尤其是政府的)粮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组织失业工人到城市中心，到当地的政府当局，国民党部和黄色工会去，强迫他们帮助失业工人。此外，失业委员会必须号召失业工人加入为把劳动群众从饥饿失业和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红军中去。城乡中几千百万的饥民也要在工人团体的领导之下和失业运动联合起来。

失业委员会的所有工作，都要充满着具体的内容，在群众的强有力的压迫之下，可以部分的改善失业工人的地位的。失业工人运动应该根据他们的特殊的要求纲领的基础之上组织起来。在

制定这一纲领时，应吸收所有的失业工人参加意见，下列各项在要求纲领的基础上应该加入进去：

(一) 由国家，资本家，和市政当局拿出钱来经常援助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及其子女开办免费的食堂。

(二) 房租，一切捐税完全免除，发给衣服和燃料。

(三) 增加失业的津贴金。

(四) 不要有一个铜板去付外债和军用公债，所有的金钱都拿来维持失业工人。

(五) 没收粮食堆栈，分配给失业工人和饥民。

(六) 反对从在业工人方面征收特捐或扣除工资来援助失业工人，而是要成立援助失业工人的组织，一切维持费都要由富有的阶级负担。

(4) 为暴露国民党工厂法的反工人的性质，赤色工会必须不限于做一般的反工厂法的宣传，而要抓住其中具体的某一项（如八小时工作问题，星期休息日的问题等），号召群众自动地用革命的方法去实行，同时更揭穿国民党用武断的法律去欺骗工人的企图。对于依照工厂法所成立的双方仲裁会议，必须利用工厂委员会去和他对立起来。同时赤色工会必须召集工人的群众大会讨论并提出要求的纲领，选举代表以与仲裁委员会指定的委员对立起来。被选举出来的代表，应拒绝参加这些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只限于将工人的要求向资本家和国民党提出。

(5) 在黄色工会中还有着很大数量的工人的事实，极端迫切的提出了夺取这些群众的问题。罢工运动的发展，群众对国民党工会领导的不满与自发的反抗的增长，国民党实行“政组”工会等等——这些都是全国总工会在黄色工会内部工作的便利条件。

赤色工会在群众中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愈好，则在工人群众中及黄色工会领导之间的裂痕愈深愈厉并且愈快的发展扩大起来，赤色工会应明白这一点。因之，赤色工会必须：

(一) 实行真正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每个工厂中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口号，和黄色工会官僚的武断宣传相对抗，利用具体的事实揭破这些官僚的真面目，动员群众赞助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反对黄色工会与国民党的武断宣传。

(二) 特别注意辨别各工会的特点，考虑各工厂中的特点和条件，不要提出一般的抽象的口号，而要依照各工会的情形把它们具体化和个别化起来。

(三) 对国民党黄色工会中的工作要采取一种坚决的转变。虽然在职工国际的信徒中通过了不少适当的决议，但在做职工运动的同志中间依然存在着一种对于国民党黄色工会内工作的意义有害的忽视，结果是决议案不能运用到实际中去。但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中没有改良主义的传统，同时黄色工会也缺少强有力的下层的群众机关，因此在这些工会中进行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是可以把国民党领袖驱逐出去，选举反对派和革命分子去代替的，特别因为经济斗争不断的爆发和工人阶级高度的战争〔斗〕力，夺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是完全可能的。

在这里，首先必须对做职工运动的同志做教育工作，使得他们了解在国民党黄色工会——有群众的团体中工作之重要性。职工运动的同志要在这些工会中团聚一切反对派与革命分子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必须建立群众的职工反对派，利用俱乐部，补习学校，互助会，同乡会，兄弟会及参加其他公开或半公开存在的组织形式，在其中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同时，在这些同乡会，兄弟会之中必须不断的反对乡土观念与落后的习惯，把工人吸收到阶级的工会运动中去。

(四) 为了实现工会反对派的领导，赤色工会必须经过他提出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从每个工厂和工会的实际情形中所产生的，对抗黄色工会的领导，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

(五) 主要的口号应该是：驱逐指派的委员，各工会机关须实

行完全的选举，驱逐国民党官僚，工头和走狗出工会，拒绝黄色工会征收会费，和反对克扣工资作工会经费，工会完全脱离国民党的控制，罢工自由等等。

(六) 赤色工会必须进行揭破仲裁的把戏，把每次国民党仲裁的结果指示给群众，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

(七) 在日常工作中要不断的反对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在内），因他们利用一切旧有的关系实行捣乱工作，在斗争中常常帮助国民党，反对工人运动。

(八) 为立即实现国民党法律中一些个别的条项而斗争，提出具体的要求（尤其是要求雇主，和黄色工会给予失业的保险，疾病的保险等），由请愿的方式转变到更高的方式（游行示威等），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揭破黄色领袖的真面目。

只有夺取属于黄色工会兄弟会等的群众，加强在他们中间的活动，发展工厂小组，赤色工会才能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扩大其影响并加强其组织。

(6) 现时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完全不能适应领导正在发展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认为，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得到胜利的重要条件，是恢复加强并扩大赤色工会。兹特责成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下列工作：

(一) 为团结自己的力量并加强自己在基本的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影响，要把工作集中到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去——纺织，丝厂，矿山，铁厂（兵工厂），铁路和轮船的运输事业；集中到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区域中去——上海，汉口，天津，满洲，广州，香港等；集中到和苏区邻近的区域中去——萍乡，大冶、长沙，南昌，景德镇，及其他；同样的要加紧有大量的农业工人的区域中的工作，必须特别注意在女工和青工中的工作，要估计到女工青工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占百分之五十。

(二) 赤色工会的工作中心要移到企业中去，建立对赤色工会

下层支部的日常的具休领导，并派遣大部分工会机关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到支部和工厂中去工作，并巩固这些地方工作。

(三) 根据各厂的具体情形，建立下层组织的工作，执行夺取群众的基本任务，扩大并加强赤色工会。

(四) 在有着很大的赤色工会会员的地方，在他们中间一方面要保存总的领导，一方面必须改组为许多小的支部——经过总的领导保持相互的关系——以便团结某一工厂中的广大群众在每个支部的周围，使工厂中一切的工人代表组织（工厂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等）中间都包含有赤色工会的会员。

(五) 如果工会小组是很少的（仅有两三个会员），那么会员要利用各种结合的方式，团结工人群众立〔在〕自己的周围，经过这样的小组来建立和群众经常联系，并且把这小组的工作和总的领导联结起来。

(六) 依照某一工厂中的情形提出具体的要求，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动员一切工人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工会必须领导这些群众，并在斗争的过程中吸收百数十的新赤色工会的会员。

(七) 发展赤色工会在工厂中下层的支部网，恢复已失的关系，召集并组织个别的会员，形成新的小组，赤色工会必须将全部工作建立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和经常做报告等），同时把他和秘密工作的条件联系起来。

(八) 在巩固赤色工会一切工作上，职工运动的干部，有伟大的作用。新的干部必须勇敢的从斗争过程中表现得最积极的男女工人中提拔出来，要组织补习班，学校，流动训练班等的密网，去训练大批新的领袖，特别要注意训练出青年工人的干部。

(九) 恢复并经常出版全总的机关报及各工厂的小报，传达工人的生活状况，斗争的经验，讨论斗争的最好的形式和方法等，并通俗化起来，是很必要的。在这些报纸的周围要建立工人的通讯网，进行经常的工作。

(十) 提高全部工作到更高的水平和加强下层工会组织的任务, 要求着领导机关在质量上的改善。特别要吸收在罢工斗争中已取得群众的信仰和有了经验的下级干部来加强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的领导。

七、在苏维埃区域中, 职工会要成为工农民主专政之最重要的群众支柱。工会要利用发展着的工人自己直接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基础上, 引导工人群众参加苏维埃国家和红军的建设, 要造成直接执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广大的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

团结并组织千百万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 在斗争中教育群众去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并使革命往前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苏维埃区域的工会必须成为“团结的学校, 学习管理的学校, 同情的学校, 保护自己利益的学校, 学做主人的学校, 共产主义的学校”。(列宁)

在现阶段上, 工会的最重要任务是为最彻底的实现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而斗争, 巩固并扩大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而斗争, 为达此目的, 工会必须积极参加苏维埃建设, 提拔工人起来巩固苏维埃及国家机关, 在群众工作中, 在实现工人的监督生产中, 在反对地主, 资本家, 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斗争中, 要帮助苏维埃机关。但在这里, 工会决不能代替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作用。

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会, 在参加中国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总斗争, 纠正一切狭隘的习惯和“工团主义”的倾向, 同时, 还须最坚决的发展保护工人阶级日常经济的利益的工作。工会决不能把这种工作看为“附属的”或次要的任务, 在苏区中依然没有消灭“在战争时期中要不忽略工会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一类的观点, 要向这种观点宣布无情的斗争。工会工作必须依照列宁主义的教训去领导, 这就是“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的时候, 群众才能卷入运动中去, 积极参加它, 重视它, 并发挥其英勇, 无

畏，顽强性与忠诚到最高限度。”

八、在动员群众环绕于日常经济的和政治的要求周围的基础之上，中国苏维埃区域的工会必须：

(一) 估量到一直到现在，有许多苏区中的工人还没有组织进阶级工会中去，因此最近将来工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新的工会，同时扩大并巩固已有的工会。首先要组织就是农村工人（雇农）的工会，苦力工会，手艺工人的工会和店员的工会。

农村工人工会除农村无产阶级以外，还吸收半无产阶级分子做会员，但不是农民也不是那些以出卖劳动力为附带收入的贫农，而是那些虽然自己有耕地，但逼得每年有系统的要替雇主劳作的半无产阶级分子做会员。

在工会〔人〕阶级的数量很微弱的苏区中，而且那里也没有其他工会的，那么农村工人工会在社会的成份多半应当是纯粹的无产者。

农村工人工会的组织，将是彻底的坚决的实现土地革命的最可靠的保证，他应当实现对广大的农民群众的领导，特别要由农村工人在贫农团中去实现这领导。

在手艺工人的工会中必须特别注意学徒，把学徒另外组织小组，象在闽西所有的。

(二) 在建立新的工会中，一开始就必须将剥削者的分子排斥出去。现有的工会里面那些业主，头儿（帮头），及富农——他们甚至已钻进工会的指导机关中去——必须肃清，同时除了基本的群众外，从生产中排挤出来的工人，和在执行土地革命之后已分得土地的雇农，也要吸收到工会中来。

(三) 使工会领导机关无产阶级化，保障在领导机关中有极大多数是从阶级斗争过程中起来的勇敢的工人——这个任务必须坚决的迫切的在事实上执行起来。一切借口工人的“文化程度低落”，放弃这一路线的企图必须给以打击，女工和青工必须吸收到

工会的领导机关中去。

(四)苏区工会在最近期内的一个紧急任务,是争取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劳动法中工人的主要要求的完全实现:八小时工作,男女工人同工同酬,规定最低工资,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的经费取偿于企业家等。要记住没有有组织的工人的积极援助,监督与创造,苏维埃政府将不能实现劳动法的。私有的资本家,雇主,尤其是许多小剥削者的反抗,甚至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把持,只有在广大劳动群众顽强的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战胜。

(五)为着动员工人群众环绕在苏维埃劳动法中基本要求的周围,必须进行普遍的有充分准备的运动,同各种雇主谈判并订立劳动契约,以巩固苏区中工人所得的利益。订立契约运动必须包括最大限度的工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农村工人,手工业工人和苦力——这些就是工会的当前迫切任务。

(六)工会也要满足那些没有被劳动法所审定的工人的要求,例如:增加工资,不经过工会规定工人的雇用或解雇的条例。改善学徒的生活和地位,减少工人苦力〔和不剥〕削动力的手工业工人的捐税,从剥削者没收来的房屋首先给工人居住等等。

(七)对于农村工人,工会必须满足他们实际的经济要求,如改良食品的质量和住所的条件等而斗争。在提出这些要求时,工会必须辨别富农雇佣者——他们在继续不断地有系统地剥削劳动力,和中农雇佣者——他们雇佣为的是辅助劳动力的不足,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

(八)最近期间中主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手工业者和商店的学徒并保障其利益——他们是手工业中最受剥削的一部分。必须禁止虐待学徒,缩短学徒的期限,规定特别的时间去进受普通教育的学校等。

(九)在失业工人中的工作是特别重要的,工会必须经过苏维埃从剥削者那里为失业者筹得物质的救济,同时和苏维埃共同商

定救济失业工人的具体方式（如募集特别的基金等），成立失业工人的协会，组织他们去为供给红军或其他社会的需要而工作，并可把因停工而没收来的企业转交给工人组合等。

（十）使工会有生气的基本条件是他的群众性和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工会机关之完全选举的原则，代表向全体群众大会经常做报告，撤回不称职〔职〕员的权利，经常召集大会由州，区委员会和全总苏区执行局站在广泛的自我批评的立场上，做报告，无情的与官僚主义，行政手段的倾向和工会机关庞大，不敏捷做残酷的斗争。——这些要成为工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只有在发展工会内部很广泛的民主化的基础之上，才能战胜那些混进工会机关中去的反革命分子（社会民主党，AB团，改组派，托陈派，罗章龙派等），同时克服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的李立三的思想。

（十一）对工会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予以严重的注意；组织俱乐部，流动训练班，补习班，学校，推广工会的报纸，组织群众的工会刊物，小册子，传单，标语等等的发行，就是提高工会会员的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的工具。

（十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工会必须进行军事工作：具体地帮助红军，如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骨干，而且要供给他许多干部，组织工人队，女工看护队，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去进行宣传 and 破坏工作等。

（十三）苏区中的工人组织必须尽量帮助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人，募集及赠送他们以物质的资助，组织专门的学校，或短期训练班，训练干部派到自区去工作，出版刊物等。

在帝国主义进行公开干涉，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和存在着两个专政——一个是资产阶级地主的专政，另一个是工人和农民的专政的情形之下，中国的革命的职工运动的一切工作，都要从积极拥护苏维埃的任务出发。只有坚决反对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的消极，反对掩盖在建立非赤非黄的“中

间工会”口号之下的取消主义，加强其组织，夺取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中国的赤色工会才能成为团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之组织，发动并领导他们参加去为脱离危机，饥饿与贫穷的胜利出路而斗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共产国际指示

——关于反帝斗争问题

(1931年12月29日)

中共中央：

抓紧法国侵入云南，完全瓜分中国，来开展群众的反帝斗争的新阶段。我们还没有得到你们关于实现发展民族的、反帝斗争的详细报告，中心口号：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号召推翻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解释只有苏维埃中国与中国红军才能够保证民族独立与解放及统一中国。苏维埃中国与中国红军是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奴役、封建束缚与军阀压迫的力量，苏维埃政府应该号召全国民众来武装保卫中国。发展罢工运动，经过你们的纠察队将抵货运动抓到你们手中来，号召加入红军，夺取反动武装，发展游击战争。领导学生运动，利用学生来煽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农民群众。尽量利用公开的可能，进行书面的与口头的宣传鼓动。创立群众的反帝组织，创立你们自己的武装自卫团，必要时可在军事教育组织的名字的掩护之下。加紧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号召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一致，特别与日本革命的无产阶级。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年版)



七、青年共产国际与 中国青年运动^①

^① 本专题资料均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编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给全团的一封信

——接读青年共产国际2月27日信及
中国共产党中央5月5日来函后的决议

(1930年5月20日)

中央在接读少共国际2月27日的“致各国团的信”及党中央5月5日的来信后，立即引起了我们极强度的震动和惊觉，而开始了连续三天的极热烈极透彻的讨论。少共国际的来信和党中央的来信，恰恰万分正确的针对着目前中国团的工作，极透彻极严格地指出了目前中国团工作现状的严重特征及其原因，实际地具体地指出了中国团转变的途径。

中国革命的成熟复兴，工农兵及红军四大动力汇合的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现在，青年群众更加在革命斗争中表现了他的坚决、英勇，在革命斗争中起了最强度的作用。但是，我们的团，充分的表现出不能抓紧这一形势，成为青年群众斗争的跛脚的尾巴。这种现象的延长，必然是中国团前途的一个严重的深刻的危险。

五次大会和二中全会针对着当时的环境指出了转变的道路，但中国全团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坚决的执行；甚至向全团团员很好的解释都未做到。目前的形势更加严重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将是团前途的严重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坚决的执行转变！

首先，必须一个搅动全团组织的全团一致的透彻的讨论，以诚挚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将一切错误和缺点，无情的指摘出来，讨论出具体的方法，坚决的把这些错误和缺点一一克服，创造出

一种新的力量来实践我们紧迫的新的任务!

目前团的工作到了一个严重时期

要执行团的转变，首先要以严格的自我批评来驱除一种夸大成功的倾向，要将我们目前工作现状之种种不满处与一切错误和弱点无情的指摘出来。夸大我们的成功，掩遮我们的弱点，无疑的必然障碍着团的转变。

估计我们的现状，决不能以我们已决定了的工作路线，我们起草好的计划或我们的某一部分的微弱的进步为标准。我们一定要以客观形势的发展和我们的迫切的任务拿来和我们的实际工作(已经做了些什么)来对比。不然，将掩遮了我们的弱点，忽视了转变的严重的政治意义和性质。

目前，整个革命的发展，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使广大的青年工农兵群众，卷向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前线去。最近各地青工的斗争要求万分迫切，自发的斗争非常广泛，我们的团，到底组织了或领导了这些斗争没有?严格的回答是“没有”!有些青工斗争已经结束，我们才知道，甚至一无所闻。团和团员，不是在青工斗争后面踱着脚步摇摇摆摆的来追随，就是袖手旁观。上海童工斗争中，顺直在北宁路南厂的斗争中，湖北在武汉铁路工人和纱厂斗争中，广东在香港、广州的不断的工人斗争中，满洲在中东路的斗争中，严格说来是一点事都没有做。以领导和组织整个青工群众、争取青年特殊利益为基础和任务的团，竟发生了这种跛脚追随青年群众斗争的尾巴现象，这是何等严重!这充分地说明了团的工作和组织全部的成为问题。

黄色工会还在欺骗群众且日益法西斯化，青年工人群众还未全部地断绝和黄色工会的政治的组织的关系，而我们团的反黄色工会的斗争和争取黄色工会下青工群众的工作，差不多全部被忽视和放弃。

全国青年工农群众，正在急迫地要求组织，要求对他们斗争和工作之正确领导。这也正是团的最迫切的任务。但是，团对于组织青工群众领导青工斗争的最好方式的青工部，并没有很好地去进行，至今全团〔国〕青年工人组织在我们领导下的只有三千，劳动童子团只在上海有一点微弱的组织（童子团不及三百人）和工作，农村青年的组织（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全国只有三十万人左右（并且是偏于广东的东江，湖北的鄂西、鄂东、鄂东北，江西的西南、东北，福建的西部，湘鄂赣边）。已经是微弱来利害。除这几省外，青年群众工作特别是青工群众工作，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更来深刻地检查一下这些组织和和工作，那我们首先就看到这些青年群众的组织，异常缺乏团的正确的积极的领导，以致不能充分地表现出它的斗争力量和斗争中的作用。（上海童子团罢工参加“五一”示威的极少，香港的一点弱小的青工组织简直没有工作可做；湖北、广东、江西的少年先锋队在农村斗争中很少工作，扩大红军的事，一点亦没有做。）

反对军国主义是团的基本任务之一。目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机危迫，帝国主义相互战争正在拼命准备，国内军阀战争的扩大蔓延和剧烈，白军中的士兵群众，普遍地日益革命化，兵士暴动和兵变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并且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大都是青年。而团在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工作，严格地说简直是没有，虽在某些团部有一点工作，亦是无组织无计划的，差不多是“碰运气”。一般的反军国主义的思想斗争和宣传鼓动，亦是少到了几乎没有。外国海陆军中的工作，简直是一个零。

全国红军已经超过了七万（除赤卫队和游击队不计），且正在猛烈地发展和扩大，但是，团对于扩大和发展红军的工作，对于红军中团的组织和和工作，简直完全放弃了，虽然有一些组织是红军中自动发展的。

团的政治活动和青年工作，不独在这些方面要受严格的批评，

而且在党内斗争上表现一种不十分关心的消极现象。特别是因为团内右倾危险，不独是党内右倾危险之一般反映，并且在团的特殊的右倾基础上——团的无产阶级基础大薄弱——产生出团的特有的特别严重右倾——清谈。而在团内斗争上，更表现出一种动摇的倾向。反右倾特别是反清谈的斗争，还没有深入地进行。我们团的领导同志大半不了解客观的新形势和团的新任务，不能坚决地执行转变和对转变的障碍——右倾特别是清谈，作最坚决地斗争。大部分不适合新任务的旧干部，都忽视了甚至是取消了工作转变的重要。

在团的组织上，我们首先看到工厂支部简直缺乏生活和工作，我们的工厂支部是脱离和隔绝了群众，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亭子间”中的。对于青工组织工作，和组织青工斗争的问题，完全象不是支部的事，支部至多负一点传达的责任。支部会议不能按时开，更难由支部同志自动举行自己主持，团费是不收和不缴，会议完了后，一切决议都抛之脑后了。支部的会议主要内容是听上级团部的报告，对于实际工作的具体讨论是绝少，更少分配工作和检查工作，至多是对某项工作决定“加紧”“注意”，正如少共国际所说的：“工作人员是动的，团员是被动的”。农村支部也是一样，并且更散漫更无组织性。

团在大工厂中的基础微弱得很，团的组织基础，始终未建立在大工厂中。团尚未能在大工厂的基础上改造团的组织。团员数量非常弱少（三万三千以上），团员中产业青工成分，更微小得可怜（占全数百分之三）。新的团员的发展，除上海、武汉、香港、满洲以外，其余各省，简直是停顿，甚至是减少了。就是稍有发展的这几省，也只是比较的说，始终没有广大的发展。

团的干部仍停滞在旧的基础上，青工干部少到极点，真正群众化、青年化、无产阶级化的新式的干部，在全国找不出几个，这些旧干部，大半是不能适应新任务，完成团的转变的。这些旧干

部中，很多是保留了旧的精神，旧的习气，旧的工作方式与方法，极度地缺乏自我批评和学习的精神。常常会象一个公司或洋行的“小职员”的样子，只管一些行政的事务，完全没有共产主义组织里工作人员的气概，特别是对于青工群众所发生的问题及其过程和发展抓不住，与青工斗争和团员没有一种活的关系。

团内的指导关系充满了“国民党”的作风，官僚习气随处皆是。指导内容是空泛的、一般的，今天给某地的指示信，下次还可以用，拿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用，上次的通告和下次的通告不同点只是文字上、结构上变动一下，内容是差不多，专事背诵旧的公式和陈腐的调子。指导的方式是官僚式的通告文书。中央通告到达了省委，省委一般地空洞地讨论一下也来一个通告，甚至较中央通告还要缺乏实践性，这样一再达到支部，简直空洞得一无所有了。对于工作之检查和考察一点亦没有，上级团部多不能透彻地了解下级团部的组织和工作的实况，下级团部对上级团部的报告，还不如国民党政府官僚的“呈报”。这些都使团内指导关系不能有一种活的接触、透彻的了解和实践的内容。

总结这许多现状，充分说明了目前团的政治活动和青年工作的落后，团的活动和工作还滞留在狭小的团内工作的范围内。团成为青年群众的跛脚追随的尾巴。团在青年群众中领导的落后，在革命斗争向前猛进、团的任务增加了许多倍的时候，更一天天明显起来。团的工作，还仅仅是在意识上转变的过程，实际工作中几乎完全没有转变。这种现象的延长，无疑地是团的前途的严重危机！

转变的全部是斗争，是反对右倾 **——就是反对清谈的斗争**

我们团现在必须立即执行少共国际、党中央及中国团五次大会二中全会所指出的转变了！目前形势的紧张和团的任务的加重，

更加加重了团的转变的政治意义!

团的工作的转变,是整个工作的方向的转变,绝对不是“一切工作路线都没有问题,只是执行得不够,现在要加紧执行就行了”或“这是工作方式和方法的问题。”这样将抹煞了转变的整个政治意义,而成为“实际主义”。事实上它将仍旧陷入右倾的泥坑中去。

转变是政治的,同时必须是实际工作的。正如少共国际的斐尔白克同志所说:“要使转变的全部工作上都盖上目前政治形势的印迹。”(见《列〔宁〕青〔年〕》十一期)

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地来探求什么东西或谁障碍了团的转变呢?就是说团所以还没有执行转变的原因何在呢?团的转变的性质是什么?

右倾特别是清谈,障碍着团的转变!转变的先决条件是坚决地反对右倾——特别是清谈。

右倾,绝不只是表现于公开或秘密的反对团的转变上,同时表现于口头上观念上接受转变,而实际工作不转变,表现于对转变和斗争的调和倾向,表现于忽视转变的政治意义的“实际主义”,及对目前工作现状的一种无批评或掩遮弱点,夸大成功的倾向上。

这些显示给我们:转变是一个艰苦的任务,而转变的全部,就是斗争。是一个艰苦的及〔反〕各方面右倾——特别是清谈的斗争。必须把整个组织搅动起来,把一切新的力量活跃起来,把它深入到团员群众中去,经过尖锐的深刻的讨论和艰苦的斗争,采取一切组织上的手段对付那些障碍转变的人,才能使这个转变深入而至完成。

转变的最好的工具——反右倾特别是反清谈斗争的最好的方法,是自我批评!各级团部,每个团员,对于自己的工作,必须树立一种经常的严格的自我批评,才能透彻的指摘出目前工作的

弱点和错误及其原因，才能决定办法坚决地去克服这些弱点和错误。在自我批评下，尤其是实际工作中，才能更明显地判别出谁是坚决执行转变，谁是障碍转变的执行，才能更有力地对右倾——特别是清谈，及一切取消转变拒绝转变的人，作无情的尖锐的斗争。

夸大成功，掩遮弱点，对工作现状缄默不言等，都是自我批评之死敌！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下，必须扫除这一切的死敌！

自狭小的团内活动范围转变到青年群众工作去

转变的武器就是中国团五次大会和二中全会的决议。现在要立即开始执行五次大会和二中全会的转变了！

转变的中心问题——转变的方向和实质是冲破现在狭小的团内活动范围，以青年群众工作为团的工作重心。就是说团的工作要转变到群众化、青年化。更具体地说就是要使团有对青年的政策。要使这种青年政策真正地密切而生动地联系到青年群众的实际生活和要求。特别是坚决地组织和领导青年群众为争取青年特殊利益的斗争。

在争取青年特殊利益的基点上，在青工斗争日益发展澎湃的形势下，马上要进行下列的几个最中心最基本的活动：

1. 在青年工人立即建立经常的组织工作：青工部有计划地建立和发展其工作，特别是产业工会和分会中的青工部更具有严重的实践意义和作用。

劳动童子团及各种青工群众组织，在各产业区域和各大工厂中要最广泛地建立和发展，加强培养童子团的干部，建立和健全团组的组织和领导，使童子团的生活、组织和斗争打成一片。

运用和发展这些组织，来建立赤色工会的工作。号召与组织青年工人群众勇敢地加入赤色先锋队（纠察队）。

青工会议、青工大会、青工代表大会，是组织青工斗争和行

动的最好的组织方式,青工罢工委员会是组织和领导青工罢工,引进青工更有力的争取政治要求的最好的方式和力量。这些,都必须充分去运用。

2. 立即严格地排除同志中忽视反动军队中士兵工作的右倾观念,全团立即动员去进行团的这一基本的任务,在团内和青年群众中马上举行一个“到军队中去,夺取士兵群众”的运动。大批地有组织地调派团员及少年先锋队队员到军队中去当兵。建立对士兵群众的经常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3. 在农村中团中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将青年农民群众组织到少先队和童子团中来。立即开始执行少年先锋队的转变:建立和健全少先队中团组的领导,培养少年先锋队的干部,转变少年先锋队的基础和领导,使之建立在青年雇农贫农的基础和领导上,加强它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积极任务,大批地有组织地输送少年先锋队之队员到红军中去,参加红军及游击队赤卫队的作战,参加地方暴动及游击战争和一切斗争,参加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斗争。

4. 全团立即在团内和青年群众中,动员“投身红军,拥护红军”的运动,征集和组织广大的青年工农群众加入红军,并调派同志到红军中去建立团的组织与工作。

5. 青年劳动妇女,在斗争中作用和力量非常强大,立即肃清忽视这项工作的错误,而在整个的青工工作、青农工作下,实际地将此项工作做起来。

6. 团的青年群众工作方式,须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要肃清一种狭隘的呆板的秘密主义的方式(如上海最近组织童子团,只是一个二个地去找……等),必须大规模地公开地号召和组织,特别是在斗争中,用一种斗争的群众的方式进行。

转变团员的作用和改造团的组织

执行转变的基本问题，是团的组织问题，特别是团员作用的转变和改造组织问题。

因此，下列几点是各级团部和每个同志必须共同执行的最基本的工作：

1. 工厂支部工作，必须有一个彻头彻尾的转变，使工厂支部的工作建立在青年群众工作上。工厂支部要“青年群众化”。肃清支部建立在亭子间中的隔绝群众现象。首先要使团员作用转变，要使每个支部的团员，都“做青年群众工作”，每个团员的工作应该以青年群众工作为中心，冲破狭小的团内工作范围。支部要自动召集和主持会议，会议内容要以青年群众工作为中心，要具体讨论“做什么”和“怎样做”，要具体分配每一个同志去做青年群众工作，要检查每个同志工作的结果。因此，支部中的干部分子的培养非常重要，及地方团部以转变工厂支部工作为中心任务而彻底改变对支部的指导方式和关系，成为转变支部工作和团员作用的主要动力。

2. 团员的发展和工厂的争取成为更迫切的问题了。目前团的组织这样弱小，无产阶级成分这样可怜，若再不努力于工厂的夺取和团的扩大，团组织力量将与客观形势的开展相差更远了。因此，铁路、海员、兵工厂、五金工厂、纱厂……等大工厂中，应以广大最大的力量集中去建立团的支部。向产业青工开门，必须在实际工作上大胆地严格地去执行，要扩大对青年群众关于团的宣传，公开地进行号召青年群众加入团。

同时，对于发展的新团员，一定要有很好的教育和指导，一定要运用入团典礼的方式，且必须以“团员的青年群众化”，团员要以青年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的观念深入每一新同志的头脑。一开始就要很好地分配督促和检查新同志的工作，这才能使这些新

的力量发挥起来。

3. 现在必须以最大决心加工〔努力〕地培养青年工人的新干部。团的转变的深入和完成,必须有大批的新式的无产阶级化、青年化、群众化的干部。目前应立即将工厂中的较好的青工同志拿来参加地方团部,地方团部组织必须扩大起来(多增加在业工人同志),在政治上工作上尤其是在斗争中加紧培养他们。短期训练班和流动训练班都是培养纯新式的青工干部的一种方式,在上海、香港、武汉、唐山、天津等地应立即采用。必须提高干部分子的学习精神,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教育,要养成干部分子成为青工群众的领袖,与青工生活密切联系,要有牺牲的精神,战胜困难的毅力,对无产阶级胜利的坚信,工作上刻苦耐劳精神,能分配督促和检查同志工作的能力,有爱团的热情,参加团一切工作和斗争,与团有最亲密的联系。

对于一部分不适应转变的旧干部,必须与之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一定要使他们了解转变的政治意义、新的形势与我们新的任务,并且在工作的执行上实际地执行转变。对于不能转变,拒绝转变,否认转变可能和在任何方面表现障碍转变的分子,要坚决地采取组织上的手段来制裁。

4. 指导关系应根本转变,坚决地肃清官僚化的习气。一切指导要实际、具体,排除一种陈言烂调的复弹,不独要回答下级团部“要做什么”并且要说明“怎样做”。建立工作的检查,使上级团部透彻了解下级团部的工作、组织及对决议的执行情形。指导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对弱点的无情指摘与具体的克服弱点的方法。消除官僚式的通告文书,代之以活泼生动的巡视指导和实际的具体的书面指导(通告与指导信)。工作及问题的解决要迅速,上级团部对下级团部要有经常的具体的工作报告。

立即举行一个搅动全团的壮烈而透彻的讨论

执行转变的先决条件，是搅动全团的壮烈而透彻的讨论，使转变问题深深地刺进每一个团员的头脑中，给全体团员一个最强的刺激，将他们潜伏着的伟大力量尽量地发挥出来，只有创造出一种新的力量才能执行转变呵！

这一个透彻的搅动全团的讨论必须以支部作为最基础的重点。它必须立即实践地开始转变团员的作用。

讨论所必须的和最起码的条件，要使每一个团员对于转变的政治意义和我们团在这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有一个最透彻的了解。对于自身工作（支部对支部的工作，地方团部对地方团部的工作，省委对省委的工作），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下，举行无情的严格的检阅，指摘出一切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自身的目前工作（支部，地方团部，省委）作最切实的决定，来实践地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

讨论中，必须坚决地排除消极和冷淡的态度，掩遮弱点的精神和不着实际的清谈倾向。

谁不能排除这种障碍，谁不能与这种障碍作无情的坚决的斗争，谁不能将这讨论充分地反映到实际工作的转变上去，谁不能坚决地来贯彻这一讨论，谁就是不坚决执行转变，障碍转变，而转变将请他滚到地狱中去！

各省委，在6月15日以前必须将全团讨论的经过、讨论的结果、对转变的执行情形，最详细地报告中央，中央将根据各省委报告到来的迟快，讨论的透彻与否，和实际工作的转变的程度，来判断哪一省是坚决地执行转变或对转变怠工或取消转变，而决定更进一步地领导全团转变的方针。亲爱的同志们！站到斗争的前线上来，来领导推进和执行团的转变呵！防止自己成为转变的障碍呵！

客观革命形势一天天地开展，团的任务一天天地加重了，共

产青年团能够完成一个英勇的基本的转变吗？它真能不再做着青年斗争的跛脚追随的尾巴而直站在青年群众的前头领导他们吗？

这完全决定于全团团员能否透彻了解目前的新形势和转变的政治意义，放出一种新的力量来执行我们当前的新任务！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

(1930年8月)

亲爱的同志们：

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他最近的一封信里配合了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团的现状，已经详细的指出你们的任务。你们的材料，特别是刘、陆、苏三同志^①的报告使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是执委会的指示主要的已为团的领导机关所了解，团的工作也都是根据了前次信中所指示那样布置。

这信是完全为了中国革命的新的的发展，给你们指出具体的政治与实际任务的。

对于革命之现阶段的估量，对于团之主要任务的确定，你们必须完全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案(7月)^②，在这决议案里对于最近几个月来发展事变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估量，把革命的前途与任务明显地确定下来，指出党在群众中工作的大纲。这一决议案必须广大的在团员及青年工农群众中作一个普遍的解说，必须把它当作团未来工作的一个政治根基。

城市工人之经济与政治斗争的发展(1928年有四十万罢工

① 指刘少奇、陆定一、苏兆征。

② 据本文所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的段落，这个决议当是“六月”，而不是七月。见《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中国运用)》第272—281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93—102页。

者,1929年加了一倍)、土地革命的扩大、红军与游击战争的壮大、苏维埃区域的开展……都证明了“中国革命运动之新的勃兴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共产国际决议)。工人阶级和农民已经从反动的打击中恢复了起来,现在是重新起来,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之反动统治的口号下面作革命的斗争。

这最近一时期发展的事变完全打破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陈独秀主义者以及其他取消派分子的预言,而证明共产国际及中央对于革命复兴的估量是绝对的正确。

外国和中国资本家之对于工人阶级的特别残酷的进攻,深广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广大的失业,工作条件的恶化,工资的减少与物价的高涨(米价涨高了百分之七十七)——这一切都使一部分无产阶级陷于饥饿的绝境。那个把几千万农民困于饥寒的灾荒,继续扩大的农民穷困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工人的破产——这无非是国民党几年来统治的成绩。群众已经明白认识国民党的无望之后,他们要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决心,便日益生长坚强起来了。

虽然“我们在现在还没有一个遍及全国的革命形势……但是事实却是向着这样的方向发展的,即在最近的将来这个形势如不立即包含了全中国,也必然要包含一部分重要的省区。使得这一进程迅速地完成,主要是依靠党的正确策略,特别是要党能正确的执行其领导任务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决议案)。

在这种革命形势之下,团的任务是更加严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更迅速地执行团的中心任务:夺取最重要部分的青年工农群众。最近一时期中团的工作能够向着这个方向做去,所以就能保证得很大的成功。团还需以更大的努力来执行这个路线。在一切青年工农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战线上,团必须成为斗争之真正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根据了这个理由少共国际执委会认为你们必须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到下列的中心问题去:保持正确的

政治路线，反右倾与“左”倾，领导青工的经济与政治的斗争，夺取青年的主要阶层，加强团在重要工业中心中的地位，执行土地革命发展中之团的任务。在苏维埃区域中的任务：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在白军中的反军国主义工作。

目前在重要产业中心中的一个特征是青工经济斗争的发展，并且这个斗争是一天一天地更带着政治色彩，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罢工浪潮的高涨，在这罢工斗争中青年中的作用是很大的。在目前条件底下，跟着生活情形的日益恶化，跟着资本家进攻的厉害，青年的斗争还要更加发展。这种形势要团必须密切地走去领导这些斗争。目前在几个重要产业中心，团在准备发动青工群众来参加总的政治罢工时，团必须还要加紧努力去发动青工为争取部分要求或基本要求的斗争，当联系到总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的口号时，我们切不可忘记，必须提出可以了解的具体的要求，使这一口号可以深入到最落后的阶层里去。为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去组织青年斗争，中央的团部应该提出各产业的，各产业中心的，甚至于各个重要工厂的青年部分要求纲领。

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发展，也表现在其阶级组织特别是赤色工会的发展上。根据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团报告，在赤色工会中的青年数量也是有增加了。可是我们还不能不指出团在工会运动中的工作是一般的非常薄弱，特别是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更加微小。中央在最近是已经了解这一任务了，其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却不能忽视事实：即有许多对于加强团部赤色工会和夺取黄色工会的青工群众的工作，是完全没有充分注意，他们借口说工会是完全由青工组织起来的，或者说建立青工部会把青工群众引导到黄色工会里去的。这个也可以由几个同志个人的错误假设（在二中全会上也曾发现）证明出来，这种假设是主张建立青工的单独工会。我们问题在工会上的路线，在前封信上是说得很详细的，这还是完全的正确并且由斗争的发展证明正确了。中央及全

团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来加强赤色工会，广大的吸收青工群众，在工厂的基础上来建立群众的青工部。立刻须开始在黄色工会中去作紧张的工作，去建立赤色的青工部，……但注意绝不去做黄色工会的上层机关。你们须立即开始建立工厂中的青工代表会，这个机关，这个群众组织形式可以联合整个的青年工人（无论他们加入了工会或者没有），这个机关须经常存在，它能使团与工厂中的整个青工群众发生联系，能在组织上领导他们并扩大团的政治影响。

少共国际执委会认为在目前团的中央来开始建立工厂中的“少年先锋队”正确是绝对的，并且也正得其时。你们须用一切的方法来加紧发展这一组织，使之成为工厂中青工的战斗队伍，并努力争取公开的存在，目前在几个主要产业中心中，首先就要建立“少年先锋队”的联合，只要以地方做范围好了（以城市为范围），但为要保证团的坚强的领导作用，必须加强在队中的团组织。“少年先锋队”的注意力须集中于工厂中斗争上的（保护罢工、打工贼、做侦探、保护演讲人……等等）以及取街道〔的支持〕（保卫示威），你们要建立这一组织作为团的一个群众辅属组织时，你们必须坚决地反对一种先锋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倾向，想拿这一组织来代替了团，明显是取消团的倾向，“少年先锋队”既是建立在工厂斗争的基础上，在一切产业中心都有广大发展的可能，我们必须吸收大批的青工来加入这个组织。

团在青年群众中，必须发展有力的反帝运动，提出这些口号：民族独立统一，中国国家之政治与经济的独立，消灭国际帝国主义之统治与压迫，反对进攻苏联，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劳苦群众。在每次帝国主义暴行的时候，团必须利用发动青年来参加革命的罢工，青年反帝同盟必须扩大，必须在每一产业中心组织起来，必须广泛地征求青工及劳苦青年加入。少共国际执委会认为青年反帝同盟与反帝同盟同时并存是不好的，中央应该使青

年反帝同盟与总的反帝同盟统一起来，使“青反”实际成为总的反帝同盟之青年部。

团必须组织并发展反对军阀混战及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革命群众运动，反对一切军阀和国民党的各派。在你们的政治鼓动上，在你们扩大你们的影响到青工群众去的时候，你们特别要加紧反对改组派、第三党和取消派，团必须把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的反革命作用暴露无遗，说明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和取消群众革命的观点，都是对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明显的帮助。

关于中国团的当前任务之一，少共国际执委会特别指出中国团之社会成分之不良（十分之一的青工）。无产阶级成分的薄弱以及非无产阶级干部的占着多数，使得在团里面没有巩固的无产阶级领导，并时常有小资产阶级动摇的危险。减少了对农民团员群众的无产阶级影响，要使团里面无产阶级领导加强起来，必须加强党对团的领导，并扩大团的无产阶级成分。所以继续加强党对团的领导和英勇吸收青工入团，使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实为中国团目前之急务。执委会建议无限地加强产业中心中的工作，建立工厂支部，勇敢地提拔青工到上层来。

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与团的任务

农民运动之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南方一部已走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了（农民武装夺取土地，保护苏维埃政府、红军），这在团的面前重新提出了农村工作的问题。在过去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团实际上在农村中没有做过这一些工作，到了最近，方才有一些活气，但执委会主要地指出团在农村中跟不上群众发展的这个事实，这是苏同志也承认，不过执委会很相信这种落后现象，在最近将来是一定可以克服过来的。

在未曾建立苏维埃的区域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抗租、抗税的运动，号召他们起来发动游击战争。苏维埃区域，号召并组

织农民去解除豪绅地主的武装,建立赤色游击队和少年先锋队,建立农民委员会、农会和斗争委员会,加强革命的宣传鼓动,特别是抓住灾荒和军阀混战来作广大的宣传号召。团必须在这几个省份里立刻建立组织,从工业区域中派遣最强的同志去特别工作,这些同志必须能以乡村的雇农和贫农里面提拔出的可靠的干部来组织并领导农民的斗争。你们必须在各种青年农民组织里竭力去争取领导权,因为那些用各色各样名义的组织,包含着广大的青农群众,我们不但只夺取领导权,并必须在这组织的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口号和行动纲领,以吸收更广大的后备军来参加土地革命。

在苏维埃区域里团的任务是:动员团的组织及青年雇农、贫农和中农,起来实行贫农与中农的土地革命,反对富农。他们时时想阻碍没收或主张依照生产工具来分配土地。以一切的力量来帮助苏维埃之经济政策的实行,以及劳动保护法的实施(八小时工作、最低社会法、阶级工会的自由……),组织雇农工会,组织贫农小组,把中农团聚在其周围。帮助苏维埃政府执行经济建设纲领(建立统一累进土地税,以阶级原则来建立革命的土地组织,改良文化设施,建立学校图书室,肃清文盲,改良道路,改良水利,培养森林,开拓荒地,开掘水井……)。在实现苏维埃之经济建设纲领这一工作中,以及在发展农民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团必须成为青年群众及整个农民群众的领导人和组织者。

在这些区域里团的工作,可以并应该经过地方苏维埃来执行(乡村苏维埃和城市苏维埃)。在帮助建立苏维埃的工作中,团应该必须占一个很活跃的地位,应该积极的与富农斗争,阻止他们混到苏维埃里去,应该吸收雇农、贫农到苏维埃去工作,应该帮助苏维埃来执行其决议。为达到这些目的,可以指定团员到苏维埃各部里去工作,提出团的候选人到苏维埃里去。

团在苏维埃区域里,应该特别注意组织上的发展,阶级的基础应该是雇农青年和苦力贫农青年,以及那些在斗争中表现能执

行土地革命与拥护雇农、贫农和苏维埃的中农分子。为要防止富农青年混入团中，你们必须举行日常的清团斗争，把富农分子完全驱出，并特别要努力吸收青年雇农入团。

少年先锋队的任务，应该是武装援助红军的行动，帮助游击队，帮助贫农中农武装，没收封建的土地，以及担任一部分必要的保卫地方的义务（民军的性质）。在少年先锋队的组织里，必须建立巩固的团的领导，党对少年先锋队的领导也必须加强，并且少年先锋队必须与游击队建立密切的关系。在苏维埃区域里，我们应该广大的征求青年雇农、贫农和中农去加入红军，特别要以少年先锋队中大批送进红军去。

在全国范围中，团必须以扩大拥护苏维埃政府和苏维埃区域的口号，号召为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而奋斗。

你们应该提出关于制定青工法令的问题（十^①岁以下四小时工作，十八岁以下六小时工作，同工作同工资，以八小时照算，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险，禁止雇用儿童作危险工作，十四岁以上加入赤色工会。建立雇农的最低法令，废除私人契约以工会的集体契约代替。契约中说明义务教育的设备由雇主出钱）。这些法令须由苏维埃政府来颁布，并由地方苏维埃政府来执行，如果在苏维埃政府尚未颁布这一法令之前，团亦应该开始准备执行这个法令。

这一切关于土地革命的任务，团必须执行，必须与一切不正确的“理论”，如认为青年农民没有特殊利益之类，作坚决的斗争。土地革命继续发展，必能解除青年农民的主要问题（工作、教育、政治上、文化上与集会、结社的自由，经济状况之改善，参加政治生活，参加苏维埃之建设……）。同过去以及现在还残留着的封建压迫，是全然不同了。

① 原文如此。参照前文，疑为“十六”。——编者

建立红军与团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了解在中国目前的特殊条件之下，建立一队十分有力的，在政治上健强的红军，实在是一个先决的任务，执行了这一任务就可以确实保障革命之更有力的发展”(共产国际决议案)。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应该成为团决定其对于红军之任务的出发点，建立及加强红军，团必须负着极大的责任。直到现在为止，从我们所收到的报告看来，团实在还并没有作它应做的工作，这必须坚决地立即转变过来才好。最重要的工作是以产业中心里，广泛地动员青年去加入红军，经常地动员团内的青年工人以及吸收在赤色工会青工部，工人自卫队中的青年工人踊跃地去加入红军，因为要使红军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基础，这一工作十二万分的重要。你们应该选举大批进步的青年工人去进红军的军事学校和军官的训练班，因为很明显的红军要有它自己的、可靠的、无产阶级的司令官，团必须负着很大的责任。现在的红军，我们知道还是兵士的成分占着大多数，我们主要的工作是要把红军变为真正的群众军队。红军主要的应该吸收哪一种社会成分呢？首先我们须吸收青年工人，特别是以产业中心的青年工人，次之青年雇农和苦力，贫农青年以及进步的中农分子，团必须坚决地反对富农分子混入红军，因为要在最近将来在红军中建立一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核心，其发展的成分实在是与革命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你们应该开始在红军中建立团的组织，但为避免与党平行，团的组织须依照整个红军的规律，集中起来，团可以成为帮助党的支部的一个小组，在党的直接日常的政治领导之下，帮助党部及军事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团的辅助小组须特别负责传达党的无产阶级影响到整个红军中去，并组织群众中的政治文化工作，提

高红军士兵的政治觉悟，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对于阶级的认识任务。这一辅助小组，与党一道对红军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作猛烈地斗争。

跟着红军中团的发展，团的阶级成分是必须注意，团的发展必须主要以雇农、苦力、贫农、中农的进步分子为基础，并且在这一基础之上，首先必须建立坚固的无产阶级核心。

团也有责任在附近群众中或在占领的城市或乡村中去组织文化教育的和政治的工作，去建立团的组织，去发展工人和雇农的职业组织，去团聚贫农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并帮助他们工作。

中央必须立即选举一批积极的无产阶级分子送到红军中去做组织团的工作，在青年工农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必须指出下列主要的各点：红军与中国任何其他军队的分别，红军的斗争纲领，红军是为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青年团的任务是要以一切的力量来帮助红军。

你们必须使少年先锋队的武装队伍与红军及游击队的行动完全一致，使少年先锋队的工作都建筑在帮助红军与游击队这一个基础之上。

在目前军阀军队中士兵的不满，是飞速地增加起来了，兵变和暴动是日有所闻，有时甚至是整队的投到红军方面去，在这样形势之下，我们到敌人军队中去做破坏工作，去领导他们的反抗运动，实在是加倍的重要了。主要的几点是：派遣团的同志到蒋介石主要军队（一、二、三、五、八）中去工作，去到那些与红军作战的军队中工作，去组织士兵的日常的部分要求的斗争，组织士兵与红军或游击队实行兄弟化或投到对方去，建立士兵的刊物，建立对外国士兵的宣传工作，必须无情地与那些不肯具体解决这一工作的人斗争，暴露其畏怯与机会主义的实质。龙州飞机袭击以及长江流域与长沙附近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与暴行，都说

明中国的工农革命，必然要遇到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因此团必须根据党的口号与政治立场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去做广大的破坏工作，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 ※ ※

在革命斗争的剧烈发展中，团必须保证政治路线的正确，团之必须有意识上的巩固，团之必须对一切曲解工作路线斗争，都是保障团能完成其任务的先决条件。只有对于两条战线的布尔什维克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左倾”闭关主义，反对任何的调和倾向，才能保障团的路线之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才能领导青年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目前阶级中，……，阶级斗争是这样的尖锐，即使会有某个单独的群众运动遭受暂时的失败，而整个解放斗争之发展是无可阻止的了。在这样条件之下，党的当前任务是要团结一切力量来准备即将来临的决战，党必须以革命的方法来发展它一切的力量，去争取几百万群众。在这时候，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一危险的表现是尾巴主义，赶不上客观的革命发展，是畏惧反帝斗争，不敢发动并领导罢工，合法主义，以及不敢坚决地暴露黄色领袖的罪恶，甚至于公然地投降，依他们的要求阻止罢工，对游击战争估量不足，在苏维埃里拥护富农利益（共产国际决议）。

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无疑都反映在团内，用着各种各样的形式，譬如：留恋学生及小资产阶级层（有几个团部），对青工作用及其在团内与在群众斗争中领导作用估量得过低，认为“青工不是开通的，又不识字，没有什么可以做的……等等”，要求与党合并，取消团的存在，合法倾向，在黄色工会中并不争取其群众，却只夺取其机关，否认土地革命的发展可以解决青年农民的特殊痛苦，忽视对青工罢工的领导等等。

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闭关主义的假革命空谈倾向，是发生于同一基础的，这一基础都是团之社会成分的糟糕，无产阶级

成分的薄弱（十分之一），所以反右倾斗争，反对其在党及团内的具体表现，在这革命运动开展之中，应该成为你们主要的任务。

但如果团对于反“左”倾斗争放松了一些，那便是大错特错，团必须一样地加紧反对这一危险，反对其在团内的具体表现。团的中央把这一任务提出在团的面前，无疑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

“不过在必须极度地扩大游击战争与英勇地领导工农罢工暴动与斗争时，一种盲动与闭关主义的危险便增加起来了，这表现在对于群众作用的估量过低，常常不顾及有没有扩大群众参加来计划暴动，把中心的重要只放在一个单独事件上，而不注意以农民斗争与士兵哗变来配合，或者在经济斗争中常常只会把革命策略死板板地拿来运用，或在苏维埃区域经济政策中则采取一种‘左’派幼稚病态的病……等”。

合着这些“左”倾的具体表现在团内无疑的还有许多对黄色工会中之革命工作估量过低，不想去夺取那儿的青工群众；企图把团看成“第二党”；过低估量了在反动军队中的工作，并没有决心去做；用假革命的词句来掩饰实际的无能，失败和没有决心做布尔什维克日常工作，以求其日复一日地加强在青工群众中的地位……等等。

如果认为团过去在五次大会前，在反盲动主义及反先锋主义获得了成功，就克服了“左”倾危险，这是错误的，却正相反，“左”倾正主要的还没有在团内克服呢！团还必须长期的与“左”倾危险及闭关主义作战！团必须特别在意识上向“左”倾闭关主义开火，团能向这些企图以假革命的言词来阻止布尔什维克日常群众工作的人斗争愈利害，则团愈能成功地向着群众工作转变过去。你们必须认为反右倾斗争是反对在转变为群众战斗组织路上之“主要障碍”的斗争（少共国际扩大会议决议案），是帮助克服右倾危险的斗争。

少共国际执委会确定的相信，中国的团过去曾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中的革命斗争史上，贡献了不少的光荣页篇，在现在，在中国党及少共国际的领导之下，在革命的急烈发展中，必能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来领导青工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必定能够吸引大批的青年农民来参加土地革命，必定能够协助着党来建设并加强红军，必定能够加强对两条战线斗争，必定能够加强其布尔什维克的统一。

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 关于接受青年共产国际本年8月全体会议 决议案的决定

(1930年9月5日)

一、中央局详细讨论了少共国际全体会议决议案之后，完全拥护少共国际全体会议的決定，并决以最大的决心领导全国切实执行。

二、世界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时期现在已经完结，到了新的剧烈恐慌时期。苏联五年计划胜利，成为世界上最巩固的国家。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准备，是目前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中最主要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互相冲突，特别是英美冲突，正在剧烈发展，资本主义宗主国内的工人罢工示威与武装斗争，与殖民地（尤其是印度、安南〔越南〕、中国）的革命运动，以空前的速度在进展。世界革命高潮遂在日益成熟。

三、中国革命更是日益迫近高潮。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举行以后，存在着两个政权——帝国主义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和两个战争——反动的军阀混战与革命的阶级战争。特别是最近农民暴动与红军配合两次进攻长沙、武汉、南昌，统治阶级的极度恐慌，城市工人群众斗争的日益急剧与政治化，迫切地要求武装暴动，小城市与乡村地方暴动的不断爆发，兵士革命化的可惊程度，显出目前已是暴风雨将要到临的时期，也是争取武汉附近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与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前夜。

反动统治下全国的深刻危机——经济上表现在工商各业的衰落，广大深刻的灾荒、失业，地主、资本家向工农的残酷进攻，银子的跌价；政治上表现在无耻投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连绵不断日益扩大的军阀战争与疯狂似的执行白色恐怖，以企图支持其最后的统治。国民党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就这样掘好了自己的坟墓。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成千成万地起来做救死求生的斗争，反动统治最后支柱的军阀制度，已经在土崩瓦解，这证明只有以革命的阶级战争消灭军阀战争，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劳苦群众的唯一出路，也是劳苦青年群众的唯一出路！这证明只有共产党是劳苦群众的真正领导者！证明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与国民党改组派的“国民会议”口号，是破产的、腐臭的反动口号！

党与团的总的政治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实行革命纲领，猛烈扩大红军，造成红军中工人阶级的骨干与坚强的党的领导，使苏维埃巩固扩大，革命的发展深入同时并行，夺取广大的群众到苏维埃旗帜之下来，坚决勇敢地领导群众斗争，在政治上、组织上与技术上准备武装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消灭军阀战争，消灭白色恐怖，建立苏维埃政权，保护苏联，推进世界革命！

青年在生产中作用的增长，和他们的激进化，使他们受到统治阶级的严重摧残与禁绝其活动，并且以党化教育、军事教育(童子军)、体育等方法想来麻醉青年工农。改组派、取消派在青年工农中活动，社会法西斯蒂也有同样企图。

决死战斗的时期已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日益迫向城市来了！夺取青年群众的问题日益严重，要求团的工作有急剧的转变。

四、五次大会以来，团的工作虽然有许多重要的成绩：团坚决执行了反对党内取消派与右倾的斗争，反对团内盲动主义、取

消主义、先锋主义残余的斗争；组织上相当稳定了团的组织；在白色恐怖最严厉的广州、武汉等处，恢复了团的活动，示威的举行，赤色工会中的青工部及青工小组的活动，青年反帝同盟的组织，苏维埃区域，团与青年群众团体的发展（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差不多有二百余万人）；但是团的状况还远远落在客观发展之后，严重到十二万分。团员数量，在中心城市中增加得很少，而且有些中心城市甚至减少，组织上又开始表现不稳定（上海、香港）。全国团报《列宁青年》在青年工人中一份也没有，青工自发斗争非常之多，团非但没有去领导，并且甚至有连知道都不知道的。黄色工会青工群众中的工作，非常之不够，青工群众组织非常之少，而且城市的反帝青年组织与儿童团，不是停顿就是削弱。乡村则除了苏维埃区域以外，极少青年群众组织。士兵工作，虽然与党同做，但团没有积极努力。工厂小报简直没有。城市组织成分中学生仍占极大数量。支部工作与干部问题非常的严重。少共国际五次大会正确提出的向群众工作转变，不但没有完成，而且连初步也没有很好地做到。

五、中央鉴于工作的严重，曾迭次郑重讨论工作的转变问题，并在党的督促之下，进行讨论，而且发动了全团对于转变的注意。中央正确地认识了右倾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同时也是中国团内主要的危险。但中央对于实际工作转变的主要障碍——“左”倾危险的斗争，尤其在二中全会以来，放松了甚至完全忽略了（虽然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曾相当的指出）。团曾坚决地反对清谈，但没有戳穿其“左倾”的面具，因此，反清谈不能得到成效。最近更发现了极严重的取消主义，在“左”倾的字句之下，笼罩了全团！这是转变所以不能执行的主要根源。

中央局完全拥护少共国际全体会议指出的青年运动中“两条战线上斗争”的路线。只有积极反对团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调和倾向，同时反对实际工作转变主要障碍的“左”倾，并且努力克

服干部中对“左”倾危险的姑息态度，甚至栽培态度，才能真正地执行转变。

团目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在目前革命激剧进展，日益迫进全国革命形势的时候，这个危险只有加重不会减少的。右倾危险表现在：对革命形势估量的不足；对于青年激进化的估量不足；取消主义不了解团的政治性、斗争性，把团变成文化团体的倾向（“有政治认识的团员都脱离团到党内去”的理论）；政治上的中立情绪，不懂得新的斗争方式（政治罢工，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国内阶级斗争）的意义与坚决地运用执行；不懂得运用新的工作方法（赤色先锋队、工会青工部、罢工委员会青工部、青工代表会等），公开或掩藏的对发展青工团员，把团的基础建筑在大工厂中的怠工，忽略政治宣传与动员，尾巴主义、等待主义，和平发展，惧怕白色恐怖的压迫而倾向合法主义。这个右倾危险，可以使团在政治上堕落，必须用全力与它斗争，特别最近党内发生公开右倾路线的时候！

同时，“左”倾危险在团中也表现得非常严重，他的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左”倾表现在：不屑做青年工作的第二党倾向，先锋主义的残余（上海、广东的“青年是先锋”的理论，与“团员少而比党好”的理论），苏维埃区域的“捣乱”现象；不了解团的政治教育性，不了解团应当是比党更宽泛的组织（团的“短小精悍”论）；忽视黄色工会中青工工作，只做政治号召，忽视组织的重要；对于工作青年化的怠工；对于“低级”的，但是必要的群众工作的怠工；同志中特别是干部中的英雄主义作风，畏难就易，不高兴做“琐碎”的切实工作，绝对不可容忍的不注意秘密工作的倾向。“左”倾的结果，使团成为狭小的“左”倾清谈家的集团，脱离对于群众领导，以致常常遭受破坏，最近甚至直接走上了取消主义。“左”倾是阻碍团执行实际工作转变，使团不能成为青工群众组织的主要障碍，只有发动全团，消灭对于

“左”倾危险的中立态度，甚至栽培现象，而积极地与它斗争，才能胜过困难，实际地执行转变。

六、实际工作转变的第一要点，就是克服团的闭关主义。闭关主义是对于群众的惧怕，这种惧怕常以“左”倾的词句作掩护自己的盾牌（“左”的清谈），结果使团脱离青工群众的关系和斗争的问题，甚至对最重大的事变没有领导。团的组织狭小，而且停留在学生的基础上，不能打入大工厂中。团领导之下的革命群众团体为数甚少。黄色工会青工群众中的工作甚弱，及国民党童子军中没有一点工作。

要克服这个严重的闭关主义，只有坚决地施用公开工作路线，非但在示威中，并且要在一切日常工作中应用。动员迫切要求革命的群众，尤其是团领导之下的群众组织，来为革命工作。目前这样紧张的局面，小规模的工作，是再也不够了！再沉溺于旧的秘密观念，惧怕群众，结果是推迟革命，对革命犯罪！广大群众已经在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发动他们起来为革命工作，是绝对可能的，而且必需的！

团必须努力地无畏地提出准备暴动口号，发展工人、雇农、贫农团员，发展赤色先锋队，赤色工会青工部，少年先锋队，及其他附助组织，动员广大的群众来做一切宣传与发展组织的工作。

七、实际工作转变的第二要点是发展青年政策与青年工作方法。

在开始的国内战争中，青年政策的中心问题，是苏维埃问题。必须加紧夺取广大青年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技术上，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同时，加紧领导与发动青工的日常的局部的斗争。同样的，必须要把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政纲、土地法、劳动法等草案、告青年书等，向劳动青年群众做极其广大的宣传，在每件有关于一般劳动群众和劳动青年的事变发生时，不论是小的或大的，我们的宣传，必须以苏维埃为中心。苏维埃区

域代表大会所决定、并且有些已经实行的法令，乃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屠杀、压迫、剥削的最好对比！必须抓住每个事变，提出青年要求与口号。

青年工作方法的目前中心问题，是适合于青年生理与心理的武装训练，应当应用各种适合于青年的工作方法，如体育、文化、娱乐、识字等等，以吸收广大青年群众。为此，应当建立以参加阶级斗争为纲领的各种各式的辅助组织。在这些组织的日常生活中，应有体操、打靶、侦探等的常识训练与演习，特别是要充实其团体生活（如经常集会与工作），特别是儿童团的工作方法，应有很大的改变，才能使之成为广大的劳动儿童组织，脱离现在的“儿童党”或“只靠橡皮球号召”的现象。

八、实际工作转变的第三要点，就是工作的切实化、具体化，空口讨论转变理论，与空口反对清谈，本身就是清谈。这是团过去最大的毛病，指导机关官僚式的、冗长的文件通告，不切实的告诉下级团部要做什么与怎样做，巡视员制度的内容空泛，不着实际的原理原则的高谈阔论，都是我们实际工作转变的死敌。这现象的结果，更使上级指导不明了下层情形，要克服这种现象，必须：

①深刻地学习苏联青年团的工作作风，以及他的最新经验。苏联青年团作风与新经验的最主要点，就是他的全部实际工作集中于完成生产计划（有数目字的实际计划），组织社会主义竞赛与“冲锋队”，发动广大群众用热忱与体力，来完成此最基本的革命工作。我们应该根据这种经验与少共国际全体会议的决议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制定“冲锋计划”，组织“革命竞赛”与“冲锋队”，把整个团变成一个大冲锋队。

②要实现工作的具体化、切实化，必须发动全体团员对于工作的热心，与对于团的了解。自我批评是发动团员的最好工具。必须要发展广大的，无畏的不顾面子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自我

批评，消灭官僚主义。但是必须在中央的集中原则之下进行，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极端民主化。

③必须积极提拔工人干部，坚决撤换那些只讲大话不做实事的干部，使每一个干部分子，都是真正群众领袖，真正的群众工作者。

④严格的工作，监督与活泼的指导方法。各级指导机关必须注意施行这种工作。巡视员在这个工作的执行上，有很重要的作用。巡视员应当是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与监督者，以及发动自我批评的人。

只有克服团的闭关主义，发展团的青年政策与青年工作方法，实行工作的切实化、具体化，才能不仅在口头上，而在实际上执行转变。

九、团目前的具体任务是在党的总路线之下，集中一切力量发动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来准备武装暴动，争取苏维埃的胜利。为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

①集中力量，在大城市大产业中工作，猛烈地发展团员，赤色先锋队，拥护苏维埃运动，赤色工会青工部，青工代表会及其他辅助组织的工作，抓住每一个罢工中青年群众的领导，坚决领导青年工人组织与参加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应当把黄色工会的青工群众广大的组织在赤色工会青工部，青工代表会及其他革命青工团体内，坚决地消灭黄色工会。团应在国民党的工人体育团体及党童子军中进行拆散的工作，把群众夺取过来。

为着团结广大青年群众，给以武装训练，在城市中应组织青工群众自卫的武装团体——少年先锋队，由纠察队指挥为赤色先锋队的后备军（详细解释及办法，中央另发通告）。

苏维埃区域的青工运动，现在亦已日益成为重要问题。团的中心任务是把全体青年工人统统组织起来，监督青工劳动法之实

现，并在私有的产业中，以斗争取得苏维埃劳动法之执行，发动青工参加政权及加入红军。

②苏维埃区域的团，应集中力量来动员全体青年群众起来保护与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同时猛烈地扩大红军。中央应当切实监督扩大红军计划的实现并保证优良的阶级成分，尤其是建立红军中工人骨干的工作，中央应当帮助这一工作的进行。苏维埃区域内少年先锋队与童子团应竭力扩大。团应努力领导一切社会的青年活动，在红军中，团要有在党支部监督之下的团的小组工作；要领导雇农工会青工部及贫农团中青年的工作。

③在非苏维埃的农村中，团的主要任务与工作，是猛烈发展少年先锋队，组织雇农工会青工部，加紧领导与发动各种反白色恐怖及国民党的一切压迫剥削的斗争，广泛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煽起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样才是树起地方暴动的必要前提。

④兵士工作应该严厉反对那因为团“显不出功劳”而根本不去工作的错误。应当执行“每个团员有士兵朋友”的口号，同时经过士兵运动委员会派同志到军队中工作，特别注意有系统地进行外国〔驻华〕海陆军工作。

⑤儿童团的组织应当极度扩大，在非苏维埃区域中，则尤其要争取组织之公开存在，活动的方式更要活泼。现在儿运的主要问题为干部，各地团应派遣有能力的年纪大些的同志做儿运高级干部。在非苏维埃区域应注意干部的秘密工作。儿运方法应有急剧的转变，使劳动儿童发生兴味。各级团部应成立健全的儿童局，建立自己的指导系统。城市中除工厂儿童外，应建立街道的同小学校的儿童团。各地儿童团以儿童联合会为公开的最高机关。

⑥各地团部应加紧本身的宣传鼓动工作，广大散发团的中央机关报《列宁青年》及出版自己的报纸。并抓紧每一事变，做团的单独宣传鼓动。团内工作应集中注意于巩固地方团部与建立支

部工作，使地方团部真正成为强有力的领导机关，使支部成为真正的群众核心，他要能切实具体地执行工作，领导斗争，分配同志以工作，出版墙报或工厂小报。为了培养干部起见，各地团部应当无条件地提拔工人与贫农积极分子担任指导工作，并且加紧团内的政治教育与训练。在非苏维埃区域的团，应依照少共国际全体会议通过的“秘密团的教育工作规程”，组织训练班，举行入团式，帮助同志自习等等。中央特别促起各地团部对于秘密工作的严重注意与研究，必须肃清轻视秘密工作的英雄主义浪漫情绪！

⑦在可能条件下组织各团部间的“革命竞赛”是引起每个团部与团员工作兴趣的良好方法。各地团部与支部在可能条件下可规定自己的“冲锋计划”，内容是具体的指出：在一定的时期内，要发展多少同志，多少群众组织，成立工厂小报，散发多少《列宁青年》或其他刊物等等。这一个计划，要全体同志都来讨论，发动他们热心地起来实现这计划。支部中同志间的革命竞赛，应以他是否到会，是否交费，是否做工作来做标准。支部间、区委间、县委间、省委间的革命竞赛，要以他完成“冲锋计划”与否来做标准。这种革命竞赛的结果，要在团的内部刊物上发表。

除了上级机关指定专为打入大产业的“冲锋队”以外，还应发动支部同志，自动组织“冲锋队”，这种“冲锋队”是革命竞赛的模范队，他除了与别的同志一样作工以外，特别努力于一项或二项事情，如散发传单书报、写标语、创立辅助组织、发展同志等。在示威、罢工等中更应组织各种“冲锋队”，可以用指定的方法。在他的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但须把他们另外组织为别一任务的“冲锋队”，吸收更多的同志加入。“冲锋队”绝对不可脱离支部与支部生活。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团成为一个大冲锋队，完成并且超过我们的具体工作计划。

十、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给团的工作以最好的发展机会，团

工作的落后，现在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状况，转变问题已是团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在党与少共国际的正确路线之下，来急起直追，才能追赶上目前的革命形势，尽共产青年团伟大历史任务。必须肃清清谈，发动全团的热心，来执行这个转变！

为要执行工作的转变，党团关系的切实改善，非常重要。必使全团以及全党都来注意青年团工作转变问题的严重，切实地来执行。团内必须增加兼党的团员，各种会议实行互派代表出席，要求党的各级机关以至支部，应当把团工作转变问题，列在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中。

各级团部（由省委至支部）收到此决议，必须详细讨论，规定具体实际方法，并将简单的决议寄来中央。同时必须发动全团对中央新决议的讨论与执行，各支部应召集团员大会来讨论如何执行这决议。

团中央局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鉴于农民运动的发展给中国团中央的信

(1930年9月)

亲爱的同志们：

鉴于农民运动的有力发展，发展到了农民的武装斗争，以及在过去一年中建立了好些新的苏维埃区域，中国团的面前，放着好些农村工作的新任务，在苏区中以及尚无苏维埃政权的区域中，我们认为需要在这问题上特别给你们一封信。

一、苏区中团的任务

(一) 团在苏区中的一个最重要任务，是帮助党来正确地解决土地农民问题。团必须动员农业青工，青年贫农与中农，经过没收地主、绅士、土豪与高利贷者的土地，依平均的原则分配与贫农的办法，来执行贫农与中农的土地革命，这革命是要依据于占乡村大多数的贫农、农业工人与苦力的反对富农的争斗，富农是想阻碍没收土地或想按照生产工具来分配的。

(二) 红军或农民队伍夺取了某些区域后，党与团必须立刻没收地主、绅士、土豪与高利贷者的土地；同时把他们的房屋、财产、仓库与农具也充公。团一定要做到，把充公来的财产中，指定一些房屋与地产，如俱乐部、学校，以及其他青年的文化教育组织之用；要做到，把土地与农具首先分配给积极参加红军或游击队的农业青工与青年贫农，并且免去一切的税。

(三) 团的大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与

执行经济建设的纲领。团必须把一批有准备的干部送到苏维埃以及苏维埃的各种组织中去工作，必须争到在乡村苏维埃中有农业青工与青年贫农的代表。团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之中，鼓动他们组织合作社的借贷（信用）制度来反对高利贷，尽量地组织买物（买进）与分配（卖出）的合作社；团要成为进行下列这些社会事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这社会事业如：筑路，造桥或修桥，种植树木，改良现有的灌溉制度，掘井，开垦荒地，帮助红军与游击队中农民的家属，组织学校、读书班、识字运动等等。可以组织一些特别的日子来做公共工作，要使无党青年与成年农民大家知道这些日子。

（四）团必须帮助苏维埃施行统一农业累进税，团要在一切所在，在团的会议上、在无党青年的会议上、在俱乐部中，向农民解释军阀的农业税和苏维埃政权之下的农业税的不同。必须注意勿使累进税受到误解，而要使一切劳动农民都懂得，苏维埃之下的税是减轻了。在交付农业税的事件上，团员应做无党农民群众的模范。

（五）团要成为组织者，来实现苏维埃对于青年劳动的法律，苏维埃政权关于教育的决定、青年与成年政治上权利的平等，青年经济地位的改善，青年的得到土地等等，如果发生不执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以致青年的地位没有改善的事件，团必须做到把这些侵犯者送交当地苏维埃机关办罪。

（六）团对于中国劳动群众宗教迷信的态度，是有极大重要性的事。一切可以侵害群众的宗教感情的强迫办法，例如在分配与耕种土地时强迫掘毁祖宗坟墓，不许祭祀敬神，捣毁庙宇等等，这种办法可以使青年离开我们。必须在广大信教的群众中进行文化教育工作，揭破宗教与传教者的真面目，只有在得到群众的完全同意之后，才可采取如封闭庙宇等等。团必须在俱乐部中组织“不信神道者”（无神者）的支部，以及经过他们进行反宗教的工

作。

(七)少年先锋队必须尽量地加入红军。其余的少先队应有帮助执行没收土地，组织乡村自卫等任务。必须做到苏区中每个团员都受过军事训练，以及能够在一声号召之下就加入红军。

(八)团在苏区中，有极大可能来发展团的组织。必须争取在最近的将来，在较大的乡村中都有团的支部。乡村中团的组织，要建立在青年贫农、农业青工、苦力以及较好的一部分的中农青年身上。为要把广大贫农与农业青工群众引进团来，必须召集无党青年群众的会议，讨论团的立场是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但是，在广大征收团员之中，必须用一切方法，不许富农子弟及其拥护者入团。因为许多个别的苏区的地位不稳定，必须把团的组织，建立得能够立刻转入秘密状态。

(九)团只有把青年农业工人、苦力与贫农围绕在自己周围，才能执行上述的许多任务。为了这个目的，团必须在工会中组织青工部，尽量广大地吸收农业青工、苦力、产业青工与手工工人加入（我们给你们关于建设青工部的方式的特别材料）。尚未有工会的地方，团要与党一起立刻开始把它建立起来。工会青工部要经常召集乡村会议，县的甚至省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许多青年问题。青工部把整个无产阶级青年团结在自己周围，它的基础是保障纯粹的青年利益，例如坚持青年劳动法律的执行，给青工以读书机会等等。青工部必须尽量地印发新闻纸、传单，组织俱乐部、读书班、文化教育的会社等等。城市中产业工会的青工部，要与乡村的青工部建立扶助的关系，给他以一切可能的帮助，在经济上，以及从青工中派特别的工作员、组织员去。

(十)建立一般青年农民的农会，如在苏维埃区域以外所有的，在苏维埃区域中是不好的，一切现存的这类组织，必须逐渐消灭，而把其中较好的部分，贫农与青年工人吸收到团内和“贫农团”之内。

(十一)整个乡村青年运动的无产阶级领导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团要在产业区域中动员青工,派到乡村中工作。团的工厂支部不可与派到乡村去的同志失去关系,而在一切工作中帮助他们。

二、团在中国反动统治下的乡村中的任务

(十二)团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的乡村中,其主要任务是发展基本农民群众的反对一切剥削的日常斗争,把这斗争引向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这个目的,必须一直利用任何小的冲突来煽动群众的不满意,进行不断的斗争,反对各式各样的税与捐,进行反对高利贷与反对交租的斗争,同时准备农民群众来武装夺取政权,以及帮助红军。但是,必须防止过早的行动,这种行动只能破坏这个事业。

(十三)团必须用一切方法发展工会,以及建立其青工部。青工部必须制成在地主的产业中与其他大农庄中作工的农业青工的具体要求,要求增加工资,与成年得同样工资、休息日,平等的政治权利,得到土地等等。而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之上来团结乡村中的整个无产阶级青年。

(十四)在苏区中,我们的任务是取消一般农民的农会,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之下的区域中,却相反地须要尽量发展这类组织,并保持对他们的经常领导。须要组织愈多愈好,愈广大愈好的群众组织,并且经过斗争来取得他们的公开的存在。在一切这些群众组织之中,要建立团组。

除此以外,需要建立各种青年男女农民的俱乐部、体育团体以及识字班,组织乡村女青年的缝衣班等等。一切这些组织,都要愈广大愈好的吸收青年农民,但是必须防止富农分子的侵入这些团体,以及这些团体中受到他的影响。

(十五)在农民团体如红枪会等之中,团必须加强工作,与其中的党团共同建立工作,使这些团体的整个工作趋向于反对反动

地主统治的斗争，以及给游击运动的发展以积极的帮助。

(十六) 在资产阶级地主反动统治之下的乡村中，团的大任务之一，就是发展与加强少先队的组织。需要做到每一个贫农都有武装而成为少先队的队员。少先队的任务是，保卫农村青年，反对强收军事捐，各种税、捐，军队调动时的没收牲畜与用具，以及过境军队的蹂躏农产。除此以外，要从先锋队中征调队员加入游击队来帮助常备的红军，先锋队也要给红军以帮助。

(十七) 这些区域中，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普遍宣传苏维埃共和国。要使每个青年农民与苦力，知道苏维埃政权如何改善了青年的地位给了他们充分的政治自由，建立了学校、俱乐部、工会，保护青年不受剥削阶级的剥削等等。每个团员要召集广大青农群众会议，在会议上告诉他们苏维埃政权一切行动的消息。要给红军以帮助，或则为红军在农民中收集粮食，或则告诉红军以敌人活动的各种消息。宣传鼓动的一个最好方法之一，就是派送青年代表到苏区中去，这些代表会在实际中知道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活动，而在他们回去之后把这些告诉无党青年。团必须举行号召青年农民加入红军与游击队的运动。

少共国际执委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团 关于工会运动中的任务的信

(1930年9月)

亲爱的同志们：

详细研究了青年团二中全会^①的经斗决议，中央经斗委员会扩大会议的通告以及苏、刘和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报告之后，我们要唤起你们对于经斗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注意。

一、团在青工斗争中的一般任务

(一)虽然中国团最近开始积极参加工人的一般斗争(上海的电车工人罢工、安迭生电泡厂、日华纱厂、英美纱厂〔疑系烟厂——原译者〕香港五金工厂的罢工、唐山矿工罢工等等)以及领导了一些青年工人的单独斗争。(老怡和纱厂的罢工、日华与申新纱厂的最近的罢工)，但中国团的落于青工斗争发展之后，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许多大的罢工斗争中，我们的同志们自己没有准备去领导，而仅在自发斗争开始之后，才设法去领导它。这种现象，如在上海公共事业的工人〔指电车——原译者〕的罢工中以及包含着二千以上青年工人的丰田纱厂的自发罢工中都可看到；最近在青岛、武汉以及其他城市的纱厂中，发生了好些青年工人的自发罢工，团在其中毫无影响。

团的主要任务，是合时的善于准备青年斗争以及吸引青年到

^① 指1929年8月中国青年团五届二中全会。

工人阶级的总斗争中去。团必须在为部分要求的斗争的基础之上把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必须与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口号一起提出具体的部分要求，这要求要广泛到直到包罗青年工人的落后阶层；团必须制出各产业的甚至单个最重要工厂的部分要求纲领，这纲领必须包含这一产业的一切人特别要求在内。

在号召罢工以前，必须举行一个广大的鼓动工作。如印发特别的传单，以及经过团报与党报举行广大的运动把青年要求详尽的普遍宣传。

为要获得成年工人的同情与帮助，必须在成年工人中进行特别的工作。

(二)在工人阶级的一般斗争中，团必须在把青年特殊要求包含到总的要求中的基础之上，在青年工人中进行一个特殊的工作，把青工引进工人阶级的一般斗争中来。罢工委员会之中必须有青年工人的代表。在最近的车罢中，团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虽然这罢工结果是胜利的，虽然成年工人得到增加工资与发米，但是因为团不能象党对成年工人一样去利用这罢工来组织青年工人，而青工所得到的仅是多发一点米。

(三)直到如今，中国的团，组织广大青年群众来做反对合理化的斗争的工作是极端薄弱。必须制出青年的反对现时正在进行的合理化的具体部分要求（例如反对减少工资，反对工厂作坊中所应用的一切新的加紧劳动的方法，要求新受雇的青年做与成年同样的工作，得到与成年同样的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资本家在合理化之中，是开始在更多的应用“养成工制”这个制度之下，自由的工人是被毫无工钱的青年工人所代替。必须要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个制度，要求直接给与这些“养成工”的青工以工资，与其他工人有同样权利，有住在厂外的权利等等，以及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之上，团结这些“养成工”的广大青工群众起来斗争。

(四)被总的世界恐慌所加紧了的中国经济恐慌,已经使成万的青年工人失业(南洋兄弟烟厂与强新〔译音——原译者〕烟厂的关门,许多丝厂与烟厂的关门)。但是直到如今团没有参与失业运动,团的组织对这工作很少注意。中国团的中央必须向一切下级组织提议,指定一些积极的同志来组织失业运动。必须在失业委员会中组织失业青年的委员会,并把他与青工部密切联系起来,必须要制出失业者的部分具体要求的纲领。如辞退工人时的赔偿金,按月发给补助费,失业青年工人有加入工会的权利等等。失业青年的要求必须也在在业的青工中广泛宣传,以获得工人阶级对失业运动的帮助。为了使失业青工与在业青工有更多的接触起见,必须召集他们的联席会议与示威。

(五)从10月到12月少共国际的各分部将举行动员一万团员到工会中去工作,这里面包含至少百分之十的在县区委与支部中工作的积极团员。中国方面,要动员大致数目是二千团员和三百积极的干部分子,这个数目必须立即指定。

二、在赤色工会和辅助组织中的工作

(六)虽然中国团在赤色工会中的工作有了初步的成绩,但是还必须指出这工作中的好些缺点:

①把青年工人吸引到赤色工会中来,以及加强赤色工会的工作是极端的不充分。虽然在赤色工会的六万四千会员中,年轻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但是这些青年会员的大多数没有吸引到团内来。

②青工部的数目是极端的少(全国只有二十个青工部),并且在其中没有经常的工作。上海、汉口、无锡、天津以及其他地方的好些大工厂与作坊中,直到如今没有去尝试组织青工部。

③吸收到辅助组织(如少年先锋队、体育团体以及其他团体)内来的青年,总起来不到三千人。

(七)中国团必须在工会工作与辅助组织工作中做一个转变。

必须指定一些领导干部去做工会工作。在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上海、大冶、香港、天津、满洲必须指定好些大工厂，其中青年是有基本的作用的，指定团的省委与县市委的个别同志去工作，以便在那里创造强有力的青工部，做其他青工部的模范。

(八)在现有的全中国二十个青工部之中，只有上海与香港的很少几个是建筑在产业的基础之上。必须要在最短的时期中，把建筑在区域的基础之上的青工部完全改组，依照工厂的原则改组。在现有的青工部之中是没有民主的，一切领导的工作人员都不是选举的，而是指定的。必须要在青工部工作中容许更大的民主，青工部的“局”(皮罗 [BIPO])的委员，应由青工部自己选举出来。青工部要制定青年工人的革命要求纲领。如缩短学徒年限，青工与成工做同样工作得同样工资，禁止工头虐待青工，废除一切罚款与保证金，工资要直接付给青年工人而不经别人之手，缩短工作时间等等。这纲领要经过报纸与各种会议，在青工中广泛宣传，青工部在这纲领的基础之上把青年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九)中国的团还没有充分地懂得在一切工厂与作坊建立永久的、青年全权代表的队伍，作为与下层无组织的青工群众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的机体之必要。现在所有的很少工厂中的全权代表是暂时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他们的大多数是在经济斗争中、示威中、会议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些事做完了之后就取消了，现在必须努力使这些团体在罢工等行动之后还能长期存在。这些青工全权代表的队伍的代表，必须为附近的没有青工全权代表队伍的工厂、作坊的青年工人设法也建立这个队伍，这个组织要成为青工部的组织基础。关于青工部中和青工全权代表的队伍中的工作方法我们另外给你们材料。

(十)团的工作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是在工厂中建立少年先锋队，成为青年工人的斗争队伍。少年先锋队必须为了工厂中青年的斗争而工作，例如：保护罢工、保护集会、保护演讲人作反对

破坏罢工者与侦探的斗争，保护示威等等。必须经过斗争来尝试与获得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公开。少年先锋队的组织要建立在吸引广大青工群众加入的基础之上，而不仅限于团员，如上海有几个工厂发生罢工时所做的那样。

三、黄色工会中的工作

(十一) 团的下层组织，大多数尚不懂得黄色工会中工作的重要性。最近时期中，黄色工会正在开始进行有力的尝试来争取广大的青工群众，如上海黄色工会的建立好些夜校，唐山矿与云南(?)铁路的工会学校，青岛的学徒学校等等。一切这些表示出必须经过自下的统一战线，在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工会的广大青工群众之中进行有力的工作。

(十二) 中央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必须指定一部分在政治上试验过的(即坚定的)[经过考验的]同志到黄色工会中去工作。这项工作必须集中于主要的工厂，以及黄色工会正在那里建立学校、俱乐部、读书班或用别的方法想来争取青工群众的工厂中，团的委员会中的委员，必须个人的在黄色工会有大的影响的主要工厂去工作，在那里创造一个革命反对派的运动。

(十三) 虽然二中全会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路线，但是你们在今年二月举行的中央经斗委员会的扩大会上做了一个大错误，你们决定在没有赤色工会的企业中的黄色工会中不组织青工部。这个错误与上面已述的错误是同一来源，就是你们以为青工部只是工会机关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群众组织，可以帮助团去把黄色工会中的广大青工群众争取得到我们方面来。必须开始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的青工部与青工委以及在其中建立团组。青工部的全部工作，必须在揭发国民党领袖与黄色改良主义者的欺骗作用，拆散这些黄色工会并使他的会员跑到赤色工会中来。

(十四)黄色工会中的青工部必须制出一个具体要求的纲领。如青年有工会会员之权,少纳会费,会费不从工资中减去,争取改善青工的地位,增加工资与减少工作时间等。而在这要求的基础上,团结黄色工会中的广大青工群众来加强革命反对派的运动。

四、乡村中与苏区中团的工会工作

(十五)中国的大数量农业工人与农场劳动者迫得我们给这工作以最大的注意,必须帮助党在乡村中组织赤色工会,把广大的农业青年工人吸引进去。在反动统治下的区域中要在工会中建立青工部,以及设法把农业青工愈多愈好地吸引进去,为要实现青年无产阶级阶层的领导农民运动,必须动员产业区域的团员派他们到农业区域去建立工会运动。

(十六)在较强团的苏区中象在非苏区那样建立青工部是不正确的,可是必须在工会的委员会中有选举出来的青年委员会在青年之中进行工会的工作。团必须在最近的将来在每个企业与农村中建立青年全权代表的运动。团必须召集青工的群众大会,青年全权的代表会议,在这些会上使青年最详尽的了解赤色工会的目的与任务。

(十七)必须做到苏区的政府发出关于青年劳动的特别法律。如十六岁以下的工作四小时,十八岁以下的工作六小时,工资与成年做八小时的相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险,禁止雇用童工做有害身体的工作,十四岁以上的青工有加入工会的权利,对于农业劳动者的最低法律,禁止个人合同而代以经过工会而建立的集体合同,合同中包含厂主出钱办强迫训练等等。工会与团要发动青年群众的斗争,以群众力量去要厂主真正遵守这些法律。

(十八)至于在收归国有的产业中,我们必须达到改善青工地位以及青工的基本需要,同时要达到改善生产与增加劳动生产力。

青年共产国际来信

——关于建立青工部与青年全权代表
团体的方式的材料

(1930年9月)

建立工厂中的青工部与青年革命全权代表团体，是中国团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青工部与青工全权代表团体，是工厂中的永久性的战斗组织，其作用是为着日常保护青年工人的利益，为着团结与动员青年，为着组织与领导青年，为着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团是非常缺乏清楚的了解，因为虽然事实上中国很久已经在工厂中建立青工部与青年全权代表团体。但是，至今尚不是有群众的，而且仅仅限于在有赤色工会的很少工厂中。这些已有的组织方式，尚未开始利用一切的可能来应用，所以这些组织的效用是极端薄弱。因此，我们认为需要给你们以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材料，使你们可以清楚了解工厂中青工部与青年革命全权代表团体的方式与其意义。

一、革命的青工部，必须在凡有工会的一切工厂作坊中组织起来。可是，还必须在此地特别着重地说，青工部不仅要在已有的赤色工会中建立，而且要在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工会中建立起来，那里有许多的青年。

二、在政治与经济斗争之中，要在青工之中发展广大的征收工作，吸收他们到青工部之中：这工作要在保障青工利益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到主要的工业，以及大工厂与军事工厂，必须利用每一个斗争来建立青工部。需要最严重的注意，鼓动青年工人，整

个团体，整个部门的加入青工部。

三、青工部是建筑在工厂的基础之上的。但在因为工厂的特别构造而不能以工厂为基础建立青工部的地方（小的手工业工厂等等以及部分的建筑工人与在家中工作的工人），青工部可以按照地方或区域来建立。青工部的建立，不可仅仅用统一已经有组织的青年的方法，而应当用广大的群众的征收，特别在工厂中主要阶层的青工之中〔征收〕。失业的青工要愈多愈好的附着于他们从前做过工的工厂的青工部，如果不能的话，则要使他们附着于最近的工厂或地方的青工部。

四、青工部必须在工会系统的一切机关之中与成年工人有密切关系，以及在工会的一切领导机关之中有青工部的代表。

五、青工部要有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在工会机关之中，要自己登记自己的会员，自己出版定期刊物，或在工会的机关报上有自己的特别的一栏。

六、青工部要经常召集青工部的全体会员大会或小组会，吸收广大的无组织的非工会会员的青年来参与。此外青工部要组织青年工人的代表会与大会，在会上制定具体的战斗纲领和为着发展斗争的具体办法。

无论如何不可以向青工部的会员收集特别的会费。在黄色工会之中，会费甚高，使青工不能加入工会，革命的青工部要为减低青年的会费而斗争。

七、青工部必须不仅保障有组织的青年的利益，而且也要保障无组织的青年的利益，要准备与领导他们的经济斗争，而教育他们以革命的精神。

全部的工作，必须向着拆散黄色工会，鼓动脱离黄色工会与加入赤色工会。

八、赤色工会的青工部，以及在革命的领导之下的改良工会，和国民党工会的青工部，必须经过工厂中的青工全权代表来进行

它的一切工作。按照着我们的包罗，争取无组织的青年工人，以及改良工会与黄色国民党工会中的青年工人，来做革命斗争的策略，我们在自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把这些青年工人吸引到工厂中青工全权代表的运动中来。

工厂中青工全权代表的选举与组织，必须在下述的基础之上进行：

(一) 要在我们的总的青年要求的基础上举行青年工人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之上要解释建立工厂中青工全权代表的需要以及进行选举，在大的纱厂、丝厂、火柴厂与五金工厂有许多青年的地方，这个选举要在各部门中进行，以及在各班（日班、夜班的班——原译者注）的时候进行。

在各部门中与各班上选举出来的青年全权代表，合拢起来就成为工厂革命青年全权代表的团体。工厂中各部门的青年全权代表，自己之中选举出一个领袖（各部门的领袖——原译者注）以及选出全工厂的领导机关，其中有三个至五个全权代表。这选举要在自下的统一战线与我们的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照着这样去做工作的时候，要把不仅有组织的青年工人，并且把无组织的以及在国民党工会与改良工会中的积极的青年工人，在实际行动之中表现出阶级觉悟的，选举为全权代表，和选举到领导机关中。特别是，要在准备与进行经济斗争的时候，在选举工厂委员会的时候，以及在厂内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如应用新的合理化的方法、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增加各种罚款、延期散发工钱、对于青年的重大意外事件、虐待青工、应用保证金制度、无理开除学徒等等），进行建立和选举青工全权代表。

在属于帝国主义者工厂中，要特别在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建立与选举青工全权代表。

(二) 为要建立工厂中全权代表的阔大的网，需要设法使至多每十个至十五个青年工人选举一个全权代表。这样可以快速的组

织战斗行动，察访青工的情绪，和经过全权代表给青年以通知。中国有大约五百万青年在小的家庭工业与手工业企业中做学徒与助手，所以必须尽可能广大的吸收这些企业中的青工到青年全权代表的运动之中来，在家庭与手工业企业中，每五个至八个人选举一个全权代表，在小的区域的基础上，创造小企业中的全权代表的网。

在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工厂中，除了在工厂中作工的青工以外，有许多青年工人不在厂内作工，而是把工作拿到家中去做的。所以把这部分青年工人吸引到工厂全权代表的运动中来，是极端的重要，要在每一带房子进行选举，十个至十二个青年工人选一个代表。“太平洋”的特点之一，是工厂中有许多童工，为此，在这样的工厂中要选举儿童的全权代表。

纱厂、丝厂与茶业之中青年女工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企业中占主要的作用，所以要从青年女工中建立青年全权代表。

(三)工厂的青年全权代表，必须与革命的工厂委员会和成年的工厂全权代表在工作上建立最亲密的联系，并与他们商量一切问题。要做到青工代表的领袖可以参与工厂委员会的会议，并有发言权。

在东方的国家之中，阻碍青年加入工会的困难与障碍，在一方面是由于青年是被认为无权加入工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不承认在某一年龄之下的青年工人有积极加工会工作的权利。所以，必须不断地为着允许青工领袖的选举权，以及在选举时候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斗争。

(四)工厂青年全权代表的运动，是革命全权代表的总的运动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青年全权代表是在团的支部直接领导之下的。如厂中没有支部，则在赤色工会的直接领导之下。人会登记等等手续，是由革命的青工部，或由附属于工会的青年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在一切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中建立）来做。

(五)为了工厂中青年全权代表讨论一切任务,为了准备经济斗争,为了进行活动与运动,为了讨论政治的与社会的问题,青年全权代表要经常开全体会议,与革命青工部的小组会,或把他们组织到附属工会的青年委员会之中。青工全权代表要按期的,以及在准备与组织经济斗争的时候,召集自己的区域的、某一地带的、或某一产业的代表会议、来创造一个一致的行动。

要不断地为我们的战斗纲领(这纲领要有某一产业的具体要求),与反对改良主义者及国民党官僚而不断的斗争。

(六)在组织青年工人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的事件上,必须进行经常的鼓动。这工作要得到工厂中青工全权代表的帮助,以及在革命的青工部或附属的青年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因此,需要印发许多材料(关于工厂全权代表的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的通知材料)。青年全权代表要在一切斗争的问题、劳动问题、学徒制问题的上面发表意见。需要建立与团的工厂报纸或别的机关报的积极合作,因此必须建立工人通讯员,以及与他们组织会商。

(七)工厂青年全权代表的任务中,也包含着同与他有关的青年保持经常关系;而且他要完善地告诉青年以消息。因此,需要召集各工厂部门的会议,青年全权代表在会议上报告所做的工作,关于全权代表的全体会议的情形等等。

工厂青年全权代表要详细知道本工厂的情形,他要知道青年与学徒的工资(按件工作、按时工作、年终赏金、回家做工等等),他们必须知道工作时间的情况,与工厂中实行着的工作时间规则(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与假期、罚款、学徒的时期与条件等等)。他们必须详细知道工厂中的一切特点,知道这工厂真正是属于谁的,学徒与儿童的百分数,谁管理雇佣工人与散发工资,这一工厂与同业的另一工厂有什么不同情形。只有这样,工厂青工全权代表才能够负起他的一切任务,而成为青年工人在为自己利益的斗争中的真正代表,他必须同与他有关的青年共同讨论,讨

论要求与战斗的方法，以及明瞭他们的欲望和情绪。特别加强经济斗争的准备工作。

当厂内发生冲突之时，必须在正当的时候提出青年的要求，以及设法动员青年在将要到来的斗争中达到他的要求。鉴于东方的产业中儿童与青年占极大的百分数，所以特别需要在准备与进行斗争的时候，选举青年的代表，和在斗争委员会中组织青年委员会，以便在青年之中进行特殊工作。为着在厂内特别的青年罢工——完全由青年与儿童举行的——中的准备工作，需要建立特别的青年斗争委员会。青年斗争委员会或青年委员会要牢固地把自己建立在工厂青工全权代表的基础之上。在斗争结束之后，青年斗争委员会与青年委员会要解散的。

在经济冲突的时候，青年中发生意外的时候，压迫学徒或青年的时候，青年工厂全权代表与赤色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一定要保障青年工人的利益以及帮助他们获取权利。要按照客观的具体环境，采取相当的战斗方法（例如：意外事发生时，如果是严重的，则号召一个抗议的罢工，提出具体要求，如应用安全的设备，改换工头，减少青工童工的工作时间）。

（八）一切这些，必须与为加强赤色工会与工会青工部的强烈的征收工作合在一起。在没有青工部而已有青工全权代表的厂内，青工全权代表必须建立青工部。

为要在尚无青工全权代表的工厂中建立一个广大的青工全权代表网，就需要与这些工厂建立关系，这件事要利用党在工厂委员会与全权代表中的地位。

（九）为要维持青年全权代表的经济，使他能执行其任务起见，需要在工厂中收集这战斗的经费。

（十）产业的资本主义合理化与已经爆发的经济恐慌，特别对青年给予严重的打击，许多产业，如烟厂、纱厂以及其他，几乎全部是青年工人在工作的都关了门，结果成千的青年失业。所以

现在要比从前更加与失业青工发生密切关系。这个密切关系的执行，要经过互派代表，联合的示威，与为发给辞退的工人以赔偿金或其他要求而斗争。

(十一) 青年工厂全权代表网必须建立，必须在团的工厂支部的直接领导之下。团必须在青年工厂全权代表的一切机关中建立团组，来得到对他的工作的领导。

青年共产国际致中国团中央 关于出版书报问题的信

(1930年12月18日)

亲爱的同志们：

印刷品(书报)是争取广大青年群众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资产阶级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在青年中散布极广的文艺刊物,如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军事小说等等,使青年有兴味地去看它。这些文艺刊物粗看是没有政治性的,但资产阶级却用这些来训练青年以资产阶级的精神。因为这些刊物,在其面具之下,仅仅包含着教育青年以爱国主义的精神,把保护祖国的战争理想化,把青年拉开阶级的政治斗争等等的政治内容。举例来说,中国有许许多多的杂志、报纸、书籍等等,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学生会、国民党以及帝国主义的研究团体,出版得最多。他们都有同一的最终目标,就是把青年拿到他们的思想的领导之下,把青年领在他们的背后。

中国共产青年团也必须特别严重注意这个斗争的工具。我们在此地是很难判断你们利用书报来争取广大青年群众的工作,做到如何程度,因为虽然我们向团中央屡次要求,愈多愈好地把团的一切出版物送给我们,但直到现在仅仅收到很少几份中央出版物。无论如何,就根据很少几份最近收到的《列宁青年》已经可以说,中国团还没有充分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以及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武器。

团必须不要忘记,秘密的团必须经过出版物,把它的鼓动不

仅侵入到一切无产阶级的中心，并且要侵入到老远的，因为警察与别的理由而口头煽动不能达到农民区域之中。报纸是团与群众思想接触的最大帮助之一，经过报纸，可以通知群众以阶级斗争中的事实，以及能够在这些群众的行动之中领导其斗争。

中国团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在青年劳动群众中广泛散发的报纸。当然，团的中央机关报《列宁青年》的印刷，是在现在的艰难的状况之下，它要首先回答直接有关于团的活动和内部组织的问题。但是中央机关报无论如何不能仅仅成为给命令与指令的机关报。团的中央机关报亦必须用容易了解的方法，充分注意工农青年的日常斗争问题，这些问题是不仅有关于团的较高阶层，而且也有关于下层团员和无党青工的。一般的说，报纸的内容与篇幅，必须从下述的观点上考虑：就是要使中央机关报不仅成为一个好的理论机关报，并且成为一个鼓动的机关报，以及一个组织者，它要能使工农青年的广大阶层对之感到兴趣。

“可是报纸的作用不仅限于宣布思想，政治教育与吸引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并且也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好比造房子时搭的鹰架，规定这房子的大概，使建筑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容易，帮助他们分工和看到这有组织的劳动所完成的总的工作成绩。由于报纸的帮助以及跟着报纸而来的，就将有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形成起来，这个组织不仅涉及地方的工作，并且及于经常的一般的工作，教导他的会员去细心地观察政治事变，去估量他们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人民各阶层的影响，去定出适宜的办法，使革命的党在这事变中发生影响。”——列宁

但是你们对于这个问题是缺乏了解的，你们的领导同志之一，化名“定一”的，在赫达洛夫同志的报告中关于“我们的报纸”的一段作了一个注解，说我们的机关报《列宁青年》是一个例外，只能作为一个理论的机关报而不是煽动的机关报，因为我们有别种报纸来做煽动的机关报（看1930年9月21日的《列宁青年》上

赫同志的报告》(原注——译者未参考中文原文)。这刚刚是你们所不宜做的。因为你们又能出版一个中央机关报,那么这无论如何不可成为纯粹理论的刊物,只合于很少数的读者,而应当同时也是合于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的煽动刊物。在你们的观点的基础之上,你们仅仅印一点长的政治文章,从别的国际共产主义杂志上翻印些长的报告、决议、宣言,而并无别的东西。这个报纸全不涉及工农青年的阶层,他们的经济地位与对于广大青年群众有关的问题;所以这报纸在青年工人之中发行得甚少。举例说,9月7日、21日、28日的报纸,仅有赫达洛夫同志的报告,占了篇幅的四分之三,续登了几期,此外只有很少的宣言和关于国际青年日的理论文章,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

你们必须改变报纸的内容,使之成为更群众化的报纸,你们必须经常地谈到这一个或那一个工厂作坊与乡村的工农青年的斗争与生活,同时也要广大的告诉青年以红军的斗争消息以及苏区中苏维埃政府对于青年劳动群众采取的一切办法的消息。你们要学着党的《红旗》来建立你们的报纸,《红旗》是一个好的报纸的例子。

使广大青年工农群众发生兴趣的最好方法之一,是建立青年通讯员。你们必须在许多工厂与乡村中建立专为读看与研究《列宁青年》以及散发它的小团体。

将来,你们要讨论到建立较多的青年报纸,如在汉口、满洲、天津以及中国南方,要尽力建立一个特别为广大农村青年群众的报纸。这个可能,特别在苏区是存在着的。那边直到如今你们尚未设法建立群众的报纸,虽然有了极大的可能。你们必须尽量的设法创立合法的与半合法的青年刊物。但在这些合法的与半合法的刊物上,无论如何,不可因为检查的原故而曲解我们的正确政治路线,以及把秘密的团的存在与其工作,向工农青年隐藏起来。

看到中国党的刊物,我们也看到中国团尚不能正当地利用党报,在广大青年群众之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例如,在《红旗日

报》以及别的报纸，和在苏区出版的报纸，几乎完全没有关于青年的文章。将来，你们要最严重的注意到党与工会的报纸。这些报纸的每一期，必须有特别的青年栏，其中有关于团的政治任务的、关于青年斗争的、关于农村青年的状况等等的文章。特别需要利用苏区中党的刊物，这些刊物中你们甚至可以有一个特别的青年员。

中国团的大任务之一，是组织工厂与作坊报纸，这是团的争取无党青年的最好武器之一。许多青年〔被〕吸引到产业之中，有许多企业，青年占了大多数，所以，必须在参加总的工厂小报的工作以外，还要设法特别为青年出版报纸。如果这件事难以做到，则要在每一期的工厂报纸中有特别的青年栏。工厂与作坊报纸必须尽量地公开出版，因为这样一来，这报纸才能包罗多数的读者。但是，合法性必不可以影响到正确的执行团的路线。

工厂与作坊报纸，将能够比中央机关报更合时的，与更好的反映青年的困难情形，和指导青年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工厂作坊报纸常常全部是中央机关报的长篇政治论文的转载。你们必须做到做出对于国际形势的愈短愈好的估计，以及对于各种青年生活问题的特别详尽的注意，如青年工作条件的惨苦、工资的微少、失业等等。工厂报纸要对于黄色工会的欺骗作用和鼓动青年加入赤色工会以最大的注意。工厂支部如能正确地解决工厂报纸的出版问题，它将能够把无党青工的广大阶层吸收来参加报纸的工作。这将组成一个积极无党青工的团体。你们必须实行各工厂的交换报纸。你们必须尽可能地在乡村中小城市中出版墙报。苏区乡村中每个团的支部必须出版青年的墙报。

我们再一次的唤起你们注意，把你们所出版的一切刊物，中央机关报，工厂报纸以及一切宣言传单等等，经常送给我们的需要。

团中央局关于党四中全会的决议

(1931年1月12日中央局会议一次通过)

听了出席党四中全会的代表团关于党四中全会的经过和总结的报告之后，中央局一致通过下列的决议：

完全同意四中全会的召集及其决议，四中全会完成他的历史的任务——确定了立三路线之完全破产和国际路线的胜利，四中全会对于彻底进行反对立三路线和执行国际路线，和党的工作的真实的转变给以一种保证。中央局坚决的指示会议上的一部分同志（罗章龙，何孟雄等）不顾国际的指示和客观条件而坚持召集紧急会议的行动，这种行动在实质上是妨害反立三路线的争斗和反对国际的。尤其四中全会后，还进行反对四中全会和坚持召集紧急会议的活动，无疑地，这种活动是小组织的反党的活动。中央局号召全国同志起来坚决地反对这种活动。

完全同意四中全会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实际任务的决定。中央局坚持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被立三路线所葬送了（海总党团），立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与陈独秀主义瞿秋白主义没有丝毫的轻重的分别，（全总党团），甚至以为革命已经失败了，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已经不是目前的中心任务，（郭妙根等），这些机会主义的意见是值得全国同志加以布尔什维克的猛击。

完全同意四中全会的估计，认为在集中火力反对立三主义时，必须坚决地进行两条战线的争斗——集中火力反对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同时绝不丝毫放弃“左倾”。

中央局极端愤懑地指责，章龙，锡根同志在四中全会后，决议案修改委员会上的行动。章龙锡根同志破坏了布尔什维克的铁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在委员会中反对四中全会已经完全接受了国际路线，这种行动是反党的，反国际的。中央局要章龙同志及其拥护者立即停止这种反党的，反国际的行动及他的机会主义的意见。服从及执行四中全会的决议。

中央局同样坚决的指斥陈友同志在海总党团的报告及陈友同志报告后，所通过的决议：以及王凤飞同志在关北区委的报告，他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公开地在党员群众间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煽动，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种反国际的行动，应该得到全党同志的布尔什维克的打击。很可惜，海总党团的同志，非但不会能够给陈友同志的反国际的小组织的活动以无情的痛击，反而一致地通过了反四中全会的决议，这是政治上绝大的错误，中央局号召海总党团的同志起来取消自己的错误的决议，服从和执行四中全会的正确的决议，并坚决地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争斗。

中央局认为有一部分李立三路线的拥护者（如贺昌）企图以外交手腕来“承认”错误，实际是在坚持和继续自己的错误，如说贺昌同志已经承认了错误，或者承认得不够，都是不正确的。贺昌同志是在掩饰并继续自己的错误。中央局要求这些同志的党承认自己的错误。不然，应该加以严厉的党的纪律的制裁。同样中央局要求一切在四中全会上已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的同志，实际上证明给全党看他们能忠实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

中央局认为必须加紧反对立三路线的争斗，从理论上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这里必须给那些机会主义的说法（认为提到实际工作，就是压制反立三路线的争斗——王凤飞，蔡伯真等）以猛烈的打击。反对李立三路线的争斗，不是要任何抽象的争论，而是和每一个支部中实行国际路线的具体办法的规定联系起来。在理论上，思想上——特别在实际工作中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

线是目前战斗的任务。中央局坚决地反对认为揭发立三路线，反对李立三路线的争斗已经部分地完成了（至少在上海）的意见，这是对于反立三路线最有害的调和态度的表现。中央局认为团中央代表团在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行动是满意的。

（摘自《党的建设》第2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7-1931）（下册）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页数=709

SS号=11039431

出版日期=2002年05月第1版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发言(节录)(1929年7月3日—19日)

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瞿秋白同志在十次全体会议上的演讲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通过)

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
&秋白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反倾向斗争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节录)(1929年3月)&米夫

国际共产党反右倾的斗争(节录)&亮萍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1929年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15日)

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少山同志在直支干事会议上的报告

反取消派斗争中之严重现象&伍美

反右倾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忠发

群众斗争的教训——党内严重的右倾危险&笑影

地方暴动与右倾观念&石恪

肃清对国民党与改组派的幻想&天生

反右倾与改造党的基础&笑影

反对派对于中国问题的错误*吴良赋

中国革命往何处去&沙法洛夫

中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顾秋莫夫

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秋白

三、共产国际与立三“左”倾错误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节录)(1930年2月21日)&立三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要求在国际决议上确认中央已定路线(1930年6月12日)

苏同志(中共)在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30年7月15日)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1930年7月23日通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信(1930年8月5日上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党的行动路线(1930年8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信(1930年8月1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信(1930年8月20日)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问题议决案(1930年8月)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议决案——苏维埃建议条例(1930年8月)

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共产国际东方部提纲草案(1930年8月)

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共产国际东方部议决案(1930年8月)

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共产党的任务(1930年)&米夫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立三

四、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草案(1930年8月)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1930年8月)

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1930年9月8日)

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1930年9月24日)&恩来

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

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1930年11月25日)

中央决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蔷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1930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反立三主义要与改造党的领导机关联系起来&为人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国际路线&泽民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1930年12月)

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错误的报告(1930年12月9日)

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1930年12月22日)

五、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1931年1月)

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江苏省委关于王克全同志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1931年1月17日)

江苏省委常委会通过)

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央巡视员会议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

全总党团常委决议案(1931年1月26日通过)

立三同志给政治局与四中全会的声明书

秋白同志声明书(一)

秋白同志声明书(二)

我的政治态度&贺昌

罗迈同志声明书

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关于贺昌等同志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关于开除王克全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王凤飞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关于开除王克全党籍决议案(1931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的斗争(1931年2月5日)&泽民

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1931年2月)

中央政治局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2月20日)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2月22日)

拥护四中全会宣布脱离右派的声明书

一 徐锡根同志声明书

二 余飞声明书

三 陈郁同志声明书

反对王凤飞的右倾机会主义(1931年3月8日)&葛耀山
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苏区中央局
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1931年4月)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信(1931年7月共
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

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发言(节录)(1931年
3月—4月)

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
(1931年8月)

中国的革命的职工运动的任务(1931年12月职工国际执
行部第八次会议的决议案)

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1931年12月29日
)

七、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给全团的一封信——接读青
年共产国际2月27日信及中国共产党中央5月5日来函后的决
议(1930年5月20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
书(1930年8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关于接受青年共产国际本
年8月全体会议决议案的决定(1930年9月5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鉴于农民运动的发展给中国
团中央的信(1930年9月)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团关于工会运动中的
任务的信(1930年9月)

青年共产国际来信——关于建立青工部与青年全权代
表团体的方式的材料(1930年9月)

青年共产国际致中国团中央关于出版书报问题的信(
1930年12月18日)

团中央局关于党四中全会的决议(1931年1月12日中央

局会议一次通过)

附录页